

文革史话

之

第四部

欲罢不能

上卷

目 录

- 第 1044 回：赣“三查”，“赤脚医生”为农民
审专案，准备十二中全会
- 第 1045 回：庆十一，工人住进中南海
要精简，全国办“五七干校”
- 第 1046 回：再落实，刘少奇专案材料
病危时，请专家全力抢救
- 第 1047 回：说文革，十二中全会召开
有朝气，党组织“吐故纳新”
- 第 1048 回：毕业生，四个面向去农村
小组会，众人批“二月逆流”
- 第 1049 回：孙维世，周恩来养女身亡
众审查，刘少奇专案材料
- 第 1050 回：讲六点，林彪在大会发言
通《党章》，开除刘少奇党籍
- 第 1051 回：左中右，十二中全会闭幕
重庆查，“国民党残渣余孽”
- 第 1052 回：参事室，起义人员大集中
逼供下，诞生出荒诞神话
- 第 1053 回：有成就，重庆市“一号专案”
武斗墓，山城学生下农村

第 1054 回：搞精简，总理只留俩秘书

江青闹，黄永胜访阿难行

第 1055 回：反右倾，黑龙江批斗干部

“徐海班”，临沂冲部队营区

第 1056 回：山东省，造反派突击入党

“反复旧”，有计划全省展开

第 1057 回：来势猛，上山下乡现高潮

搞“清队”，北京大学死人多

第 1058 回：又发生，翦伯赞夫妇自杀

起因是，当年国共谈判事

第 1059 回：闻死讯，毛泽东掉下眼泪

说刘、张，调整四川革委会

第 1060 回：止“左”难，云南搞“划线站队”

说浙江，总政治部被军管

第 1061 回：山西乱，再招晋头头进京

细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

第 1062 回：看泉城，“四根油条”闹哄哄

攻潜校，与北海舰队纠纷

第 1063 回：势难收，内蒙多人提防“左”

反右倾，继续大挖“内人党”

第 1064 回：诉冤状，千里向南奔北京

查历史，南京大学“清队”忙

第 1065 回：看北大，“清队”二十四人亡

惹众怒，全国指责杨保华

第 1066 回：陈伯达，写“九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安排四帅下工厂

第 1067 回：三月二，珍宝岛上起战端

发《照会》，中国政府提抗议

第 1068 回：集北京，商议筹备开“九大”

三一五，珍宝岛炮火连天

第 1069 回：毛泽东，再强调落实政策

执己见，伯达与春桥争论

第 1070 回：接线员，敢顶撞外国首脑

招老师，共商谈“九大”事宜

第 1071 回：争坦克，中苏两国施伎俩

派间谍，加紧研制穿甲弹

第 1072 回：纠错误，八三四一进北大

说贵州，上海组批判陈毅

第 1073 回：适可止，周恩来婉转叫停

四月一，九大在北京召开

第 1074 回：论文革，林彪作《政治报告》

陶铸病，毛泽东谈史说今

第 1075 回：毛泽东，为选举再做工作

九大开，第二次全体大会

- 第 1076 回：众发言，特别介绍孙玉国
纪登奎，他“是我的老朋友”
- 第 1077 回：四二四，选举九届委员会
皆顺利，大会正式拉帷幕
- 第 1078 回：三人组，酝酿政治局名单
四二八，开九届一中全会
- 第 1079 回：留京城，中央解决鲁问题
林彪见，云贵州三省领导
- 第 1080 回：放学生，北大开展大批判
疑问多，李九莲写信被抓
- 第 1081 回：到青岛，武汉胡厚民取经
再联手，江城掀起“反复旧”
- 第 1082 回：叫进京，武汉代表住京西
学习班，众人批判王效禹
- 第 1083 回：五一二，中央见武汉代表
胡厚民，朱鸿霞首先汇报
- 第 1084 回：继续听，其他人介绍情况
谈通宵，大家一起看电影
- 第 1085 回：连续见，内蒙古党政领导
钓鱼台，江青擅自召集会
- 第 1086 回：又查出，“中国(马列)共产党”
见“徐海”，与武汉“新派”座谈

第 1087 回：再继续，接见湖北省代表

念《声明》，批判工代会《决议》

第 1088 回：谈问题，听取众代表意见

反复讲，防止斗争扩大化

第 1089 回：小总政，内蒙平反“内人党”

五二六，中央接见徐海班

第 1090 回：下《通知》，公布军委办事组

发文件，中央见湖北代表

第 1091 回：济南稳，国务院进行改革

毛南巡，四老帅“研究小组”

第 1092 回：桂纠偏，贺龙三〇一去世

信尼姑，西藏尼木县事件

第 1093 回：离武汉，过长沙又到南昌

七月一，发社论指导“整党”

第 1094 回：七月五，中央接见山东班

七月八，八岔岛又起争端

第 1095 回：山西班，难止三晋武斗风

铁路断，客货列车被迫停

第四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第 1044 回：赣“三查”，“赤脚医生”为农民

审专案，准备十二中全会

1968 年 8 月 5 日，江西的程世清主持召开了江西省革委会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运动。会议结束以后，各地迅速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程世清积极贯彻中央以“群众专政”的形式“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于是，在江西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在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江西的“三查”运动开展还不到一个月，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 5000。而且，其影响还波及到了国外。1968 年 9 月 7 日下午，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去电：驻在江西的水电部×工程局派有一个工程队帮助刚果(布)建设一水电站。最近，这个工程队不少人(大部分是技术人员，也有工人)到大使馆反映，国内亲属来信说他们被群众揭发有严重问题，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已没有资格援外，要他们自动申请回国，接受群众审查，否则从严处

理。中国驻刚果(布)使馆人员说，刚果(布)与刚果(金)(即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只相隔一条刚果河，游泳就可以过去。而刚果(金)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问题处理不好，当事人随时可能游过刚果河，到东部的刚果(金)申请避难。外交部把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指示，由江西省革委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后将该工程局革委会的全体成员集中到南昌办学习班，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更恐怖的事情还有，瑞金县发明了一个新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杀戒一开，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据统计，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

杀了 500 多人。

直到此时，程世清才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急忙下命令禁止乱杀人。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前言》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院的亲切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 年 9 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将刘少奇 1925 年、1927 年、1929 年三段历史问题写成三个材料，作为三个单件上报。

9 月 15 日，公安部长、专案组副组长谢富治在向江青转报这三个材料时写道：“刘贼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三次被捕叛变、叛卖活动罪行，我们先把这些罪证（物证、人证）搞了个材料出来，请你审阅后再定。还有三个问题的罪证和综合报告初稿正在写，准备在九月廿五日以前搞出来。”

9月16日，江青审阅了这三份“罪行材料”后批道：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江青在将“罪证材料”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写道：“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

9月17日，康生在给江青的信中将刘少奇称为“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他写道：

“从各种材料看，他早在1925—1927年，就使用阴险、狡猾两面派的特务手段，来破坏革命。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是很早就受过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是否他在晏阳初的学校里就受过特务教育？”

他还主动做了自我批评：“1931—1932年在上海就职工运动工作，我写文章批评过刘贼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他在职工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并作过尖锐的斗争。但由于自己的

阶级觉悟不高，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差，我又错误的对此作过检讨，应引为教训。”

9月17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罪行”，其中写道：

“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说：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一连好几天，心情难以平静。有时走着走着就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他说：

“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贺龙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 1916 年率领 20 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说：

“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9月18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汇报了9月15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300人左右。

9月19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并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一是准备召开党的九大；二是总结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三是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

9月20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做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9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根据9月17日中央授权他们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一事，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递交《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初步选定国棉十七厂，上海阀门一厂（原良工阀门厂）和上海港务局第七装卸区三个单位在十月份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其中国棉十七厂和原良工阀门厂，都是老造反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一月革命”夺权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各项工作成绩显著；上港七区造反派队伍坚强，在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有贡献，党的核心中有老造反的党员，也有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

9月23日，毛泽东在9月22日上海市关于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林，周及文革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9月25日，陈伯达在江青批转的刘少奇三份“罪行材料”上批写：

“我对罪大恶极的刘贼，同样有强烈的革命义愤，并向高举毛主席伟大红旗，对刘贼及其一伙叛徒特务进行不妥协斗争的江青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

当天，周恩来也在这份“罪证材料”上批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

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周恩来于当天起草了报告。报告后来经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将《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的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以中发〔68〕144号文件批转了上海9月22日上报的《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9月29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不过，据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回忆，当秘书向林彪讲述《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文件后，林彪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划个圈时，立即惊叫起来：

“为什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 11 楼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11 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

“11 楼”是指江青在钓鱼台住的楼房号，就是指江青。

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

当李根清走过去时，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李根清回忆说：“应该申明的是，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有那么一句。”

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在铁狮子胡同召开中央专案组会议。专案组提出的材料一件一件讨论，有 100 多份。孟用潜翻供的材料周恩来等人都看了。江青、康生、谢富治、张春桥他们主张依然要用孟用潜的笔供，说他知情，有反复是因为他害怕。而周恩来等人主张只用有把握的 80 多份材料。后来又在中南海西楼开会集体审阅刘少奇的材料，讨论了一个礼拜，形成初稿。江青等人又提出修改，最后由张春桥亲自动手返工，将刘少奇的帽子改成“叛

徒、内奸、工贼”。

第 1045 回：庆十一，工人住进中南海

要精简，全国办“五七干校”

1968 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参加观礼，王洪文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他们住进了中南海。深夜，周恩来亲自到观礼代表的驻地嘘寒问暖，使代表们激动万分。

辽宁省的工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 1968 年的国庆观礼由毛远新带队。代表团到京后，周恩来对毛远新说：“毛主席要请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来。我已经安排辽宁来的 100 名工人代表住到一中队。”“一中队”就是 8341 部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那个中队。毛远新听了很高兴，随后来到一中队看望那些工人代表。代表们围住他，拉着他的手诉说着他们参加国庆观礼、住进中南海的激动心情。

一个煤矿工人代表对毛远新说：“我挖了一辈子煤，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新社会毛主席让我们当了国家主人，还请我们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感谢毛主席。”

一个鞍钢的工人代表说：“我从小就在鞍钢当工人，当牛做马，还挨过日本鬼子的踢。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剥削压迫，让我们站起来了。”

还有工人代表说：“住到‘红太阳’身边来了，住到‘皇上’身边来了……”

很多工人代表流着眼泪，激动的说不出话。毛远新听着

工人们的诉说，自己的心情也很激动。晚上，他兴奋的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

毛泽东很平静的听他说，静静的看着他，并没有特别的高兴。于是毛远新越说声音越小……

当毛远新说完后，毛泽东问他：“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皇上’、‘太阳’？”

毛远新解释说：“这都是工人说的。”

毛泽东说：“工人说的可以理解，但你这么说就是错误的，你是党的干部，你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工人农民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你、我、我们都是他们的仆人，仆人请主人住到家里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让张春桥叫王洪文过来，要与他谈谈。

王洪文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

这时，张春桥知趣的走开了。

穿着当时流行的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洪文一无所知。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

王洪文回答说，自己是吉林省长春市人，1935年出生在

长春市郊区。

毛泽东屈指算来，那正是伪满洲国时期，溥仪上台，长春易名“新京”，成了伪满的首都。

毛泽东问王洪文：“家里是干什么的？”

王洪文回说，是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从小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到16岁时，东北解放了，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后，又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

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

王洪文答：“是27军。”

毛泽东说：“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

王洪文说：“我就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党。1956年复员，又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当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又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

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礼拜都去劳动。”

毛泽东点头叮嘱道：“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谈话后，毛泽东、林彪和王洪文一起合影。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

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说：

“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

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

“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

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他归结起来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还有被打倒的干部安置问题。此时，批斗干部的热潮已经过去，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这些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这个问题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

究。”

正在这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发愁。一开始，还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工作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他们仍然闲着无事做。

黑龙江省革委会一、二把手潘复生、汪家道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5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而且，这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在庆安柳河开办这个农场，并将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决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此计划

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 5 月 6 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5 月 7 日这天，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的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在 1968 年 9 月 29 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 628 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 141

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 3000 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材料后，于 9 月 30 日写了一则批语：“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

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10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放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从此，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

10月5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

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29日，省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欢送原省级机关1600多名干部，下放南泥湾“五七”干校、杨梧“五七”干校以及延安、扶风、眉县、周至等县农场和生产队参加劳动。全省先后下放干部两万六千余人。

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各地的“五七”干校还办有加工厂，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这些“五七”干校，大多建在当地条件较好的地方。这样，当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实现生产自给。一般来说，“五七”干校的机械化程度比当地农村的水平要高许多，生活条件也比当地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相比较，这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单调的文化生活以及较差的生活环境，使不少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感到是处在艰难困苦之中。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

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李纳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这些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

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亲属在城市，但他们一年也难得回城一次。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似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来说，

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的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

第 1046 回：再落实，刘少奇专案材料

病危时，请专家全力抢救

10 月 6 日，曾于 1927 年任湖北总工会劳资斗争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劳资仲裁委员会主席的丁觉群写成了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供词：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

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散步，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散

步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

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

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10月7日，周恩来在审查刘少奇的材料时，追问沈阳“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

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

这位负责人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他了？”

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

周恩来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后来，“彻查办”对这些地方作了修改。

这个“彻查办”是中央 504 专案组，即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人于 1967 年 7 月 28 日在沈阳成立的。

10 月 8 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 133 人。其中 59 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等问题，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 57 人，未被打倒的仅 40 名，加上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的 10 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了 10 人为中央委员，他们是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共 50 人，已过八届中央委员的半数。

第二天，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当天，毛泽东召集开会，确定拟补选的 10 名中央委员

的排列次序。毛泽东提出解放几个人，于是解放了陈少敏、李志民、范文澜。毛泽东说：“再解放一个。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也算一个。”这样，就把胡耀邦从牛棚直接拉到宾馆。中央候补委员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

11日，周恩来将这10名中央委员，外加9名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列名单送毛泽东审定。

10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有些干部，错误是有，但今后可能还是要做工作的。”

当晚，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人选。

上海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代表们集体返回上海时，王洪文没有回去，他被指定列席参加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由于自1967年8月后，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情绪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据刘少奇身边的警卫贾兰勋回忆，到1968年3月，刘少奇吃饭、走路就已经很困难了。“他的一只腿走起路来只能拉拉着，勉强向前移动，手还得扶着

墙壁，吃饭时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中南海门诊部立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

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这样写到：“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5月19日的《情况反映》进一步写道：“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6月18日，针对刘少奇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中南海门诊部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

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

1968年6月初，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不如理想。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中南海门诊部初步诊断为肺炎。当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立即将病情上报。

汪东兴向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顾英奇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中南海门诊部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顾英奇和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4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恩来还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全力救治。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刘少奇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

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中南海门诊部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刘少奇的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他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称之为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至1700千卡。因此，到1969年，刘少奇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的结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南海门诊部留下了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

当时，医疗组对每天的医疗护理过程，都作了详细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

第 1047 回：说文革，十二中全会召开

有朝气，党组织“吐故纳新”

1968 年 10 月 13 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 133 人，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有 74 人，占与会总数 133 人的 57%，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请进了会场，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不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讲话，说明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构成，首先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59 人。其次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他说：“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经过这两年工作，逐步地扩大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今天出席的 5 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都是中央文革成员。5 位以外，参加成为碰头会成员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 7 位同志，一共 12 人。”

再次，就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有 6 位：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

另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 1 人。

最后就是中央直属机关 4 人：郭沫若、李天佑、曹轶欧、

郭玉峰。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是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一讲形势；四是专案审查报告。

接着，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讲话，他说：“会议大概开 7 天到 10 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 10 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说有那么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邓老你是很熟悉的。”

毛泽东说的是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周恩来说：“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4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毛泽东又说：“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

周恩来说：“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

毛泽东：“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

这时，曾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的军长，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张云逸说：“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借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毛泽东：“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他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

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做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士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

许世友说：“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毛泽东：“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做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

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毛泽东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没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军队

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 3》、《7. 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

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做工作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

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

毛泽东：“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

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 29 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

张国华：“还剩 500 人，都是坏人。”

毛泽东：“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 22 年，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 21 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

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

毛泽东：“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 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 80 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 10 万人，就有 7 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

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毛泽东对林彪说：“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毛泽东又说：“肖克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

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毛泽东：×××呢？

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当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

很巧，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曾化名“李得胜”，与“李德生”谐音。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

会主任、12军军长。”同时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看见了李德生，随即向李德生招招手说：“李德生同志，请你站起来一下。”

李德生从列席人员的位置站起来喊了声：“到！”同时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由自主的回过头来看李德生。

毛泽东笑着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2岁。”李德生答道。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大家以为这只是李德生的开场白，还等他继续说下去。静了一会，却听不见下文。这才明白李德生讲完了，隔了片刻，会场上响起一阵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他肯定李德生的经验，并且把这一话题

引导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经验，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他接着说：“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 110 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

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五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10月14日下午13时，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问到

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 50 年、100 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文章：《陈永贵：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记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的事迹》。文章说：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担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永贵同志，地位变了，职务变了，但他千变万变，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没有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好作风没有变，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没有变，艰苦朴素的好作风没有变。

他手里的犁把、锄把没有丢，手上一层层的厚茧子没有退，工作怎么忙也要挤时间和社员一块下田劳动，有时外出开会临走的前一、两个小时还在地里劳动，有时从北京、太原开会回到大寨，跳下车就下田干活。他还和大寨社员一样地生活，经常端着碗到饭场和社员蹲在一起吃饭，坐在炕头和社员一块谈心，坐在地头和社员一块学习毛主席著作。

他的头上仍然裹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穿着半旧的布衫，脚上穿着家庭自做的布鞋，社员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也有多少泥。大寨的贫下中农说：“永贵当了官不像官，还是咱庄稼人的老样子。”

10月14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中提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主席在谈到整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文章中提到“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

文章中还特别提到：“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文章特别说明：“毛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这个极端重要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的群众基础，深刻地批判了迷信选举的形式主义，指出了党的建设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根本方向。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

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

文章说：“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这种在革命运动中经过彻底的群众路线产生的革命权力机构，包括在其中工作的各方面的新、老革命干部，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更能深刻得多地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第 1048 回：毕业生，四个面向去农村 小组会，众人批“二月逆流”

从 1966 年废除了高校招生制度之后，大学已有 3 年没有招生。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 1966 年、1967 年和 1968 年 3 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分配，总数在 1000 万人以上。

1967 年 10 月 9 日，北京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人中、女十二中的 10 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这是北京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1 月 11 日，首都中学红代会发出《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呼吁“掀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的高潮！”紧接着，11 月 16 日，北京又一批中学生自愿到边疆、农村、牧场插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起来。

1968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工作。

然而，在这“四个面向”中的工矿和基层是一个什么状

况呢？1967年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4%，1968年又在1967年的基础上再降4.2%，只有1966年的86.2%。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局面，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都无力再招收新工人。对于城镇来说，这1000万毕业生已成为多余的劳动力。所以，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实际上只有农村和边疆。因此，自“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提出后，上山下乡一浪高过一浪。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66至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练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1968年安置经费2.5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

从7、8月起，在全国范围内，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和“贫宣队”进驻学校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

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广阔农村，大有作为”。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指出，全国即将实现“山河一片红”，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

到10月中旬，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0多万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声势最大、进度最快的是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等省、区。据当时中央安置办公室《上山下乡简报》反映：

辽宁省整个城乡的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街道和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全部发动起来，男女老少都卷入了这场深刻的大革命浪潮，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整班下乡，现已下去37600人。河南省革委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当前中心工作之一，许多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狠抓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浪潮。郑州市两批中学红卫兵下乡时，省、市革委会均组织二三十万军民夹道欢送，震动很大。

形势的迅猛发展，已使主管上山下乡工作的部门和接受安置任务的地区措手不及。到1968年10月15日，有21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按当时补助标准，需要安置经费5.52亿元。其中年内下去166.5万人，需经费4.42亿元，已大大超过原来1.9亿元的预算。

实际当年下乡 199.68 万人，国家财政拨款 3.5 亿元。若加上地方财政和单位的补助，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10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10月17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讨论。

康生参加第一组讨论，他在发言中提起了 1967 年 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的事情：“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16 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姚文元：“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

康生：“徐向前 2 月 13 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

姚文元：“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康生：“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吗？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撒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哪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姚文元：“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

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姚文元：“自己暴露自己。”

谢富治：“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66年8月12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谢富治：“‘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姚文元：“‘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2月16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

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 25 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

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

姚文元：“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康生：“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9个，第9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江青这里讲的“董连国”似应为董良翮。

谢富治接着说：“‘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

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姚文元：“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谢富治：“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姚文元：“‘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10月1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10月5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10月1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

连‘西纠’的9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姚文元：“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朱德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我看……”他的发言，立即被吴法宪、张春桥打断。

接着他们又集中向朱德开炮。

谢富治：“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谢富治：“‘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

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全会把这些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在 17 日的小组会上，第二组的陈伯达突然责问聂荣臻：“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心想：“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聂荣臻问了叶剑英，叶剑英说他没跟别人说。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说话又吞吞吐吐，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也没有人搭腔。

聂荣臻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没有说话。

陈伯达生气的问聂荣臻：“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聂荣臻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 1934 年的确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但她始终一口咬定自己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

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巡捕房见问不出什么，就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张瑞华趁巡捕房监视松懈的时机，带着不到 4 岁的聂力，逃了出来。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但是，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还是出现了“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

第 1049 回：孙维世，周恩来养女身亡

众审查，刘少奇专案材料

周恩来也对“二月逆流”作了发言，根据后来传达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以下 17 条，其中夹有传达者的话：

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916”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

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3、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副主席干的。

4、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5、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刘少奇、陶铸也支持肖望东。

6、66年11月13日至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副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大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7、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

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7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9、许立群的问题已经揭开，但叶剑英不报告中央，许立群说生病了，叶就想办法让他住进医院，保护起来。

10、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全国冲军区（8月7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月8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把，说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话。

11、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12、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13、67年1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副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14、聂、叶、徐3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3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2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15、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拇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当时总理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16、“上方宝剑”问题，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17、不听毛主席的告诫，毛主席在2月14日亲自找他们讲过：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他们在2月16日还大闹怀仁堂。2月18日，毛主席又批评了他们，严肃地指出：你们

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但是他们还是不听，66年10月高干会议上就打招呼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但是执行又是一回事。”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是世界观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另外，1969年北京外贸学院编辑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的重要讲话》中还记载的讲话有：

“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二十三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

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军以上干部会不对头。林副主席于三月二十日作了报告，就是制止他们。指出：‘不要提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后怕坏人钻空子，就把这段去掉了。不是林副主席指出，还有许多军以上干部借对‘八条’的错误理解，犯镇压群众的错误。是谁在保护老干部？”

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他和邓颖超的养女、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维世，于10月14日在关押处死亡。他在当天就此事批示到：“是否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对于陈伯达在17日小组会上的责问，聂荣臻没有回答，这让陈伯达很生气。散会后，他向周恩来说了此事。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

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10月18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在《审查报告》中公布了刘少奇几次被捕的情况：

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在《审查报告》中说：1925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活动，赵恒惕向刘少奇提出条件，刘少奇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着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被尚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汪精卫政府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审查报告》中说：在此期间，刘少奇“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一）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

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6月28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

《审查报告》中说：这是“为了掩盖他的内奸面貌，蒙蔽群众，刘少奇还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抗。”

“刘少奇写信给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充当内奸，工贼，出卖革命，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929年8月21日或22日，刘少奇与孟用潜在奉天纱厂被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

积极出谋划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给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提供的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1936年，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公开发表“反共启事”。

《审查报告》最后说：“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0月26日下午，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在党的八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林彪亲自向秘书们布置了“拉条子”的任务。他交代说：“在十二中全会上，我准备讲一次话，你们帮助拉个条子。究竟讲点什么，我还没有想好，你们可以帮助想一想，不要急于动手。”

过了两天，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散步，走到秘书值

班室门口时，问秘书说：“‘拉条子’的事，你们想得怎样了？”

“我们正在想嘞！”

“你们要抓紧。”林彪抬头看了一眼秘书，“不抓紧要误事的！”

“我们争取早点‘拉’出个明目来，再报告首长。”

林彪扬起右手，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不！我的意思是让你们抓紧想，而不是抓紧写，只要想好了，写很容易。陈伯达对我说过，他写东西之前就是关起门来想，一想多少天，不写一个字，等到成熟了，一口气就把文章做出来了。陈伯达是个大秀才，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你们要注意。”

林彪对拉条子并不急，可叶群却特别急。十二中全会召开后，叶群下令把会议《简报》让秘书们看，作为拉条子的参考。而中央办公厅通知，这份《简报》除参加会议的人员外，其他人是不能看的。

在叶群的督促下，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见秘书说：

“‘拉’条子的事，你们可以动手了。我和叶群商量过，准备讲六个题目：第一，讲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第二，讲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第三，讲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第四，讲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第五，讲讲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作用；第六，讲讲今后怎么做。这六个题目，我都准备信口讲，不能念现成稿子。但信口讲，也还

得有个条子作参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胜利这两个题目，由老虎帮助我准备一下，他还是一个娃娃，还不成熟，但我想叫他锻炼一下。关于路线和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这两个题目，就得靠你们帮助准备，我也不会讲很多，点一下就是了。”

林彪停了停，又说：“我准备在本月26、7日讲，你们抓紧写吧！”

秘书们从人民大会堂回到毛家湾，叶群还在睡大觉。12点，叶群起床后召见秘书。当秘书把林彪的指示转告叶群时，她说：“这些不用你说了，我都知道。”她说：“这次十二中全会很重要，会议的主题是批判‘二月逆流’，你们看过这几天的会议简报没有？”

一个晚上，叶群回来后将秘书叫去，对他们说：“你们‘拉条子’可得慎重些。我刚从一组那里开回来，给你们讲点新精神，不然你们也为难。”

“一组”是叶群叫毛泽东的代名词。只见她从手提包里摸出几页记录纸说：

“一组讲，现在会议要降温。”

秘书刚记下这几个字，叶群马上说：“这些话你不要记，知道一下就行了。对‘拉条子’有用的话再记。首长当面请示主席，他讲话时要注意些什么？一组说，随你怎么讲，我不干涉内政。首长说：我讲话时要点点‘二月逆流’，可不

可以点名？一组说：不要点名了。一组还说：对那些犯过错误的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还要选他们作‘九大’代表，但他们也不要翘尾巴。”最后叶群告诉秘书，“你‘拉条子’还要把批‘二月逆流’作为重点。”

第 1050 回：讲六点，林彪在大会发言

通《党章》，开除刘少奇党籍

10月26日清晨，林彪让秘书从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毛家湾，把他拉好的条子送过去。

这天下午，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他说：

“十二中全会，从13号起，到今天已经开了13天了。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开得很成功，对党章，九大代表产生法和对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认识和处理，都作了很好的讨论。这是对即将召开的九大作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同时，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亲自从头到尾领导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总理、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体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对整个的工作体会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讲一讲，我觉得很没有把握。主席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个大概，但必然讲的不够准确不够全面，同志们只听听就行了，不必记录，不要传达。由于我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够和思想提炼得不够，今天讲的话可能啰嗦。”

接着，林彪讲了6个问题：一、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二、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三、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四、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五、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六、今后怎么做。

在讲到“文化革命的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时，林彪说：

“我当然是不懂历史的。历史的权威是毛主席。在我们全党里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权威，我只是在中央开会经常听到毛主席讲点历史。就在那里，‘祠堂里的老鼠’ 听上几句的。在我看来，世界上的历史，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大致可以有四大次，有四次。

第一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在公元以前五世纪、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度是处于繁盛的时代，希腊的古典文化，也处于这种那个时候出现了影响全世界上二千多年来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世界思想的根源，那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那时出现什么人物呢？德莫克里特、赫拉克里德、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这些人都是已经载入世界的历史上的名字，他们是影响整个欧洲的文化，也影响后来中国的思想。但是，那种文化是什么呢？它有阶级性的，它是正处在希腊、罗马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的文化，是为奴隶主辩护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那算是一次大的

文化，奴隶主的文化。”

“世界第二次的文化运动是什么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资产阶级出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以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时候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性，但是他是没有阶级性的，他也不敢声明他是什么阶级的。没有阶级性的，实际上是有阶级性的，但是他不敢申明。提倡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他也不敢说是谁的自由。”

“在意大利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传到英国是英国的样子，传到德国是德国的样子，而到法国，就是法国形成一个启蒙运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孟德斯鸠、卢梭这么一些人。还有其他什么费尔巴哈，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人。他们是主张唯物论，但是也有主张唯心论的。后来这种思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来源之一，社会主义思想是来自于法国的，就是圣西门、傅立业，也来自于英国的欧文。更早一点，还有英国的乌托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

“第三次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是人类思想上的大革命。”林彪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接着说：

“这三次世界性的，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

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这就是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文化革命在世界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应该怎样排法，是更小，还是一样大，还是稍微大一点。我们来看，它是最大的。这是讲它的历史地位。”

林彪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专案组的工作，他说：“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林彪再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历史到现实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意义和发生的一些问题做了及其深刻而又深入浅出的阐述和发挥。他最后说：“我的讲话，就是夹生饭，不成熟，很啰嗦，不精练，越是思想不精练的时候讲话就越啰嗦。越提炼，话就越少。讲话讲到这里为止，最后喊几个口号，有十个口号要喊：

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在 10 月 26 日的讲话中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她在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上写了一些批语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泽东。林彪生气了，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但是，林彪还是将江青的批语转给了毛泽东。

10 月 27 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在此之前，江青在在讨论《党章》时曾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还强调说：“一定要写！”这次，江青又提出：“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全会通过了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主持讨论、修改的新党章草案，其中明确写进了林彪是毛泽

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对此草案作了多次修改、批示。

10月29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说：

“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林彪同志是我们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彪同志昨天的讲话是又一次实际的典范，告诉我们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的讲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对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高度的概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接着，康生谈了他对林彪讲话的体会，再次对林彪的讲话做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发挥。

1968年初夏的时候，《参考消息》原文转载外电一则，称林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向林彪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我主管中联部，这个差错我应当负领导责任，林总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副统帅，决不是总书记可以比的。今后请林总多批评，也可随时当面赐教。林彪思考良久，叫秘书打电话告诉康生三个字：“已收到。”

10月30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军委办事组的产生过程，她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开始是4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江青之所以说“看管小组”，是因为军委办事组亦称军委看守小组。

10月31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表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那时还没有电子表决器，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由站在主席台的负责计票的人负责统计。

表决开始，与会人员纷纷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她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文革开始时，她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场运动。

负责计票的康生环顾会场，再一次提醒代表们：“注意，现在开始计票！”

只见陈少敏把身子伏在前面的桌子上，用右手捂住自己的左胸。还是没有举手。由于以后没有进行反对和弃权的表决，这个人实际上是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按照那时的惯例，新闻公报中仍然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散会后，康生找到陈少敏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

陈少敏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康生不满的说：“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陈少敏没有说话。

其实，在小组讨论刘少奇的材料时，陈少敏的表现就已经上了简报。

10月22日印发的第四组《小组简报》载：“康生同志对陈少敏同志说，刘少奇有那么一套，吹捧你们女同志。他过去吹捧过叛徒章蕴、钱瑛，也捧你。这点你要注意。昨天大家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你睡觉，如果身体不好，可以告假嘛！大家对刘少奇那样的义愤，你自己一点义愤没有，这算什么共产党？”

10月23日《小组简报》记载：“陈少敏同志至今对中

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示态度。她今天在会上作了一个很不像样的检查：‘跟着’刘少奇‘犯错误的，执行他的路线的人，应该解放了’。”

这天的简报中还说，一些人在小组会上对陈少敏展开了严肃批评，说她敌我不分，不同刘少奇划清界限。

10月24日的《小组简报》中说：“小组同志对陈少敏同志今天发言东拉西扯，对审查报告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两次提出批评，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落后到惊人地步，一个农村老太太的政治觉悟也比她高得多。”

第 1051 回：左中右，十二中全会闭幕

重庆查，“国民党残渣余孽”

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这天，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前曾问：“回去怎么传达？”

周恩来说：“拟了个传达的通知。”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格。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他觉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他说：

“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13号，18天，就比较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议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

么？”

周恩来：“京西宾馆。”

毛泽东：“京西宾馆嘛。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他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谈那，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那，倒是不需要那么着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罗。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做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

邓华站起来。

毛泽东：“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

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对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说：“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吗？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座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

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座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泽东特别介绍了上海的王洪文，他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王洪文站了起来。

毛泽东继续介绍说：“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多大了？”

王洪文答：“34岁。”

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

尉风英站起来后，毛泽东问了她的年龄后，又问：“哪一位是刘殿英呀？”

刘殿英站起来，毛泽东问了他的年龄后说：“你好像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3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

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

毛泽东问：“你会讲汉语吗？”

达洛站起来答：“会。”

毛泽东开玩笑的说：“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

达洛答：“真藏族。”

毛泽东又想到了新疆：“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

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站起来，毛泽东说：“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他又提到陈永贵，陈永贵立即站起来，毛泽东说：“你

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

陈永贵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毛泽东又点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洗恒汉：“洗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

洗恒汉答：“不认识。”

毛泽东：“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

洗恒汉答：“都是兵。”

毛泽东：“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他说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

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国庆活动结束后，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毛远新因病住进301医院。10月13日，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毛远新，并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接毛远新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当两个人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曾绍山顺利进去了，但毛远新却被大会工作人员拦在门外，说参加会议的名单里没有毛远新的名字。

曾绍山对工作人员说：“中办通知我去301医院接毛远新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查一下。”

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回答说：“已经查过了，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没有毛远新，请回去吧。”

毛远新有些尴尬，心情不舒畅的回到了医院。事后，毛远新才从报纸上知道，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1月，毛远新出院，在回辽宁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谈话中，他提起了未让参加“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很委屈。

毛泽东问他：“你还有什么想法？”

毛远新说：“又不是自己一定要去参加会议，是曾绍山来接我，说中办通知让我参加会，到了会场又不让进门，很

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别人怎么看？”

毛泽东又开始批评他说：“这点小事你都受不了，真没出息。共产党人讲任劳任怨，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

毛泽东又说：“你的最大弱点是太顺利，没有经历过挫折，没有经历过磨难……”

毛泽东接着告诉毛远新：“会议前一天晚上，周总理送来的参会名单里有你，是我把你勾掉了，你还有意见吗？”

毛远新这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毛泽东说：“没有意见了。”

由于重庆武斗重开后，“反到底”大批的逃往外地，主要是在成都。8月9日，54军副军长、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白斌和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代表重庆市革委会到成都与“反到底”派外逃人员代表座谈，动员他们回重庆抓革命促生产。

8月10日，重庆警备区召开支左领导小组碰头会，传达林彪关于“制止武斗是当前的战略部署”、“当前谁离开制止武斗，谁就是离开中心”的指示。

8月11日，李大章、刘结挺代表四川省革委会接见重庆“反到底”派外逃人员代表，动员他们返回重庆。

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返回，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9月5日，重庆两派分别举行纪念《九五命令》下达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到警备区上缴武器。许多武斗人员在缴枪途中最后“过把瘾”，肆意对空鸣枪。一时间，山城上空枪声大作，震耳欲聋。

就在重庆市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渐趋平息的同时，重庆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清查行动也随即展开。

早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即6月4日，市革委主任蓝亦农就在市革委全委会上布置了对“钻进两派”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清查工作。随后，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原市公检法军管会，立即安排了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调查摸底，按照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四个等级列出名单。

“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文革发展到这一阶段时提出的新概念。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篇社论中和同时发表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都出现了“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和“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的提法。这个提法很快便被简化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而，凡历史上与“国民党”三个字沾过边的人，

哪怕是当年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民主派，曾与中共风雨同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的成员，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小公务员，甚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为民族解放流过血的人员，都统统被算作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当时，重庆的这项清查工作很快就被迎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的武斗枪炮声打断了。3个多月后，随着重庆上空的枪炮声刚刚稀疏，这项工作又被列入重要日程。9月13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建立了管训队和集训队。当晚，全市戒严。9月14日凌晨开始，对全市“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实行大搜捕，逮捕62人，拘押326人，集训、管训234人，周边几个区管训队另拘押了388人。

在重庆市管训队，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制订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家属探望等“规章制度”，并在被管训人员中追查“刘少奇黑根黑线”，为“清理阶级队伍”提供线索，重点是挖出“武斗幕后指挥”、“潜伏、派遣特务”、“私设电台”等问题。仅一个月，就挖出有关“黑根黑线”的材料356件，其中“重大线索”41件，包括“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重用坏人”、贺龙“与特务关系密切”、叶剑英“被捕变节”及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之类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快便被中央专案组取走。

不过，重庆市革委会管训队更大的“成绩”，却是在深挖“武斗黑手”中，挖出了一个“反到底派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于是便有了重庆市文革中的著名“一号专案”——《“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在这一大案中，涉及到原重庆市政府参事室的大批参事和民革重庆成员。

第 1052 回：参事室，起义人员大集中

逼供下，诞生出荒诞神话

“参事室”是解放后国务院和各地政府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安排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以及有代表性、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从事“研究政策，参与政务，联系群众，反映情况”等工作，做得最多的还是书写回忆录。

因为重庆参事室的参事中，大部份是原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于是便成了这次清查“武斗黑手”、“反到底派黑高参团”的重点。在 9 月 14 日的大逮捕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接到市革委通知，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连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也未能幸免，被请进了管训队。

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参事室最年轻的参事卢继东没有接到通知，他为此感到很紧张，便和同样没有得到通知的赵援一起去参事室打听消息，没有结果。他们回家不久，又来了一辆吉普车，把赵援接走了。卢继东的老伴在阳台上看到赵援被带走的全过程，感觉这次不像是一般的学习，赶紧进屋对卢继东说：

“这里还有一杯牛奶，你把它喝了。现在是 9 月了，天马上就冷下来，你多穿条裤子。进去后不管怎样，你放心，我会把孩子带大……”真有点生离死别呀！

卢继东心想，都在国民党干过，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就在家里坐着等人来逮他，一天也没敢出门。第二天，参事室却来通知他上班。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他进管训队：原来是解放后，卢继东在部队和南京军事学院经过了肃反和反右，已经接受过审查。

与卢继东同住一楼的原国民党军第72军少将师参谋长、著名川军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堂弟邓翰，在那天凌晨也没有接到通知，他和卢继东一样，正自感揣揣不安时，户籍警察送来通知，叫他去区革委会报到参加学习。邓翰高高兴兴地走了，是他老婆送他去的。但是邓翰老婆在送他到区革委会报到时，看到去的都是地段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心想不好。

进了管训队的人，很快就不准家属联系了，每月送工资和生活用品只准送到统战部转交，连管训队的地点在哪里，家属也没人知道。

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做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于10月15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由于武斗造成的影响，全市的百姓怨声载道，一些渐渐感觉从迷茫中清醒过来的人们，开始反思武斗的危害。随着军方强力地介入到制止武斗的行动中，强制收缴枪支弹

药和各区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权力不再掌握在造反派手中。两派的头目均受到通缉。此时，规模巨大的武斗已成穷途末路之势。

邓锡侯的堂弟邓翰平时爱发议论，对文革中重庆的两派斗争公开表现出同情“反到底”派，有些言论被反映上去，他在管训队便成了重点突破口。

10月13日晚，管训队开始对起义将领邓翰进行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刑讯逼供，逼其交待“插手两派指挥武斗的罪行”。邓翰交待不出，便被抓住衣领把他的头反复往墙上撞。邓翰哀叫头痛也无人理睬，要求上厕所也不得准许。最后又把他押进另一小屋通宵毒打逼供。

第二天下午，有南岸区某工厂造反派来管训队提解“犯人”回厂批斗。管训队负责人借机召集众人训话，声称若在这里不好好交待，送回原单位交“群众”批斗就更没有好结果。他还当众撕毁了邓翰头一天写的“交待材料”，威胁说：“你这种狡猾态度，只能受到严惩，决不能饶恕！”同时宣布将邓翰隔离。因为邓翰写的材料里面只承认了一些“生活错误”，并没有他们想要的插手“反到底”武斗的情况。

这些“政府参事”老人，昔日都是被当作“座上宾”受到欢迎、优待的，但是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越来越凌厉的反复冲击，自我意识中的“有

功之臣”这一概念早已退缩、淡化，“有罪之人”的“原罪”意识已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主导地位，精神上本已十分脆弱，更难经得起在“革命”名义下施行的严刑逼供，邓翰终于在10月15日被迫承认了“插手反到底派，出谋划策，指挥修筑武斗工事，挑动武斗”等几十条“罪行”。

于是有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邓翰“坦白交待”后，不但没有得到解脱或稍微改善处境，反而更进一步加大了逼供力度，叫做“趁热打铁”，先将他的“交待”进行“上纲上线”，分析出其所作所为决非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然后逼其按此高度再作交待。这位62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那些年轻力壮的审讯者们的皮肉“触及”，终于承认：他于1967年3月参加了裴昌会、鲁崇义、夏仲实为首组织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

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原国民党军川陕甘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

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中将副司令兼三十军军长。

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军中

将军长、立法委员。

邓翰供认，他们3人，趁文革之机，从1967年2月开始密谋策划，分头拉拢过去在国民党军中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前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李止舟、前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得到同意，于1967年3月6日在重庆市市中区春森11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裴、鲁、夏三人分别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124军少将军长赵援作会议记录，参加者还有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72军副军长卿云灿，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新编361师一团团长庞佑屿，重庆市有色金属加工厂业务员，原国民党第九绥靖公署第三处少将处长骆湘浦，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工作员郭崇皋，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国防部部员、国民党军第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陈希武，曾任国民党中央将副军长、1949年奉民革派遣到四川从事反蒋军事策反工作事泄被捕的周绍轩，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24军刘文辉部将领黄以仁，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陈先器，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工作员杜隆基，重庆市第37中学体育教师，原国民党军新编361师一团庞佑屿部少将副团长江诚，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24军西康军管区少将司令杨学端

等 16 人。

裴昌会宣布了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任职名单：集团军设总部，裴昌会任总司令，鲁崇义任副总司令，夏仲实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周绍轩任参谋处长和政工处长。集团军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鲁崇义兼第一军军长，卿云灿任第二军军长；每个军辖三个师，骆湘浦、赵援、陈希武、黄以仁、杜隆基、庞佑屿、陈先器等 9 人任师长。

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将所有“反到底”派编为 3 个师，并利用国民党残渣余孽，网罗袍哥土匪。

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

军事部署：命令卿云灿率第二军去自贡、富顺一带，插入云南；命令赵援师先占北碚，转向川南挺进；命令鲁崇义的第一军以两个师对付重庆警备司令部，一个师控制重庆市中区，先占重庆，发展全川，若失败，则向云南靠拢。

武器装备来源：一是利用“反到底”派手中的枪支，二是抢解放军的武器。

裴昌会宣布后，还拿出 1600 元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每个军发 500 元，各独立师发 200 元。

此外，还刻制有“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长方形印章和“总司令裴昌会”方形印章各一枚；在裴昌会家中架设有电台，由裴直接掌握，与台湾蒋介石匪帮联系，还与上海的“朱明坤”、广州的“邱长明”等人通电；并指挥赵援和卿

卿云灿在北碚一带的活动。

随后，该“反革命集团”于1967年7月至1968年7月先后在春森路11号召开了三次大会，策划了重庆两派群众的武斗问题，声称：庞佑屿在市中区搜罗了土匪、袍哥七、八百人，与“反到底”派一起活动；卿云灿在自贡纠集了1000多人，有1000多条枪；赵援在北碚组织了“反到底”派武装人员百多名。

邓翰还交待：他在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插手群众组织，操纵“反到底”派一些负责人，策划武斗，训练武斗人员，修筑武斗工事，指挥攻打“815”派控制的第六中学、儿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楷杷山等处……

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交待”，真让人感到了“阶级斗争”的触目惊心，让人感叹市革委及时狠抓“清查”工作的“正确英明，”让“管训队”的负责人兴奋得难以自抑。然而，稍微细想，就会觉得颇为蹊跷：

比如，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立请示了走资派李止舟、廖伯康。可是，李止舟和廖伯康与前重庆市组织部长萧泽宽一起，早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被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而被揪出、打倒，在1966年6月批判“三家村”高潮中又被重庆市委抛出来作为“反党黑帮”批判，再次被隔离审查。1966年底，北京红卫兵就将他们关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了，1967年2月以后，远在重庆的这

些参事们是怎样“请示”他们的？

再说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自1966年被《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后就已停止工作，隔离看管。1967年虽多次交给群众组织批斗，但都有解放军武装看押。在1967年2、3月，裴昌会等人是怎么见到他的呢？“请示”一说更是从何说起呀？

又比如，在春森路11号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一事。春森路11号是民革重庆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宿舍，并无礼堂，而民革重庆市委办公地点，在春森路10号和15号。这两处，早在1966年10月起就被改成了接待串联红卫兵的住宿点，后来又被一些群众组织占据使用，已经成了人员来往十分混杂的公共场所，一个如此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怎么会到这样的地方去召开“成立大会”？

再比如，被说成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鲁崇义、夏仲实等人，自1966年9月就已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并处于群众监督管制之中。离家到哪里去都是要请假的，怎么可能相互秘密串联或出席“成立大会”呢？……

但这些疑点已无人关心，管训队根据邓翰的交待，又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的“独立一师师长”骆湘浦隔离起来，进行追问。经过连续7天6夜弯腰90度罚站、不准睡觉等方法，骆湘浦在多次晕倒、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的

状态下，按照审讯者所提示的邓翰交待蓝本，也作了类似的交待。

邓翰、骆湘浦两人的“交待”矛盾重重，破绽百出。但这难不到“管训队”的办案人员，他们采取“弃异取同”的方法将两份“交待”加以总结上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得到报告，如获至宝，下令“乘胜前进，继续深挖”。

被列入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名单中的人员，又不断有了增加，最初的 16 人最后增至 54 人。其中大部份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或民革重庆市委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有的早已加入民革，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而甘冒风险对国民党军作过策反工作。

但这些，此时已无人顾及，让保卫组高兴的是，清查工作取得了如此意想不到的突破和进展。于是，一个荒诞离奇的神话就这样诞生了。

第 1053 回：有成就，重庆市“一号专案”

武斗墓，山城学生下农村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重庆“815”和“反到底”都在会上宣布：自即日起撤销市一级各总部。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10月28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市公安局直属单位的921名干警集中到大坪公安学校进行“揭、批、查”，规定“五不准”，即“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出校门，平时不准回家”。同时将巴县黄泥湾集中审查的公安局处以上干部也集中到公安学校，一部分继续武装看押，一部分交原单位揭发、批斗。

自8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的国防企业工厂和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会议进行到11月7日和8日，经有关方面权衡、挑选后，定为“典型”的重庆两大派各一位武斗头头：“反到底”派“工总司”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邓长春和“815”派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方文正在开会期间被逮捕。与会代表揭发了2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等罪行。

11月9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会

上，重庆驻军负责人宣布：邓长春、方文正两人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已“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逮捕”，并公布了二人的罪行材料。

重庆驻军负责人在讲话中宣布：“据我们掌握的确切材料，有一个秘密参谋组，一个很大的黑高参团，很大的反动集团。”

他说：“重庆过去是国民党的陪都，留下了大批国民党残渣余孽。重庆又是和平解放，在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任（白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包庇重用这些人，现在我们已发现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若干个反革命集团，他们没睡觉，他们打算在重庆建立一个国民党基地，把从旧社会留下的渣滓搜集起，叫他们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搞隐蔽活动，在武斗中引导夺取武器库，占领兵工厂，拿下市中区，再后是江北、沙坪坝、大渡口、北碚等区，然后控制全重庆后经贵州、云南与缅甸国民党残余勾结，占领江南各省，接台湾国民党反攻。”

即将随同54军换防调走而交卸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白斌，也在这个会上说道：“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邓长春背后有一个黑高参团，这些黑高参团成员已经有一部份落到我们手里……”

与会人员热烈鼓掌。

他们的讲话中，还将原重庆团市委书记于克书、原重庆

市南岸区委书记路斌武等干部公开点名指责为操纵“反到底”派的“黑手”，将重钢公司以中层干部为主的群众组织“遵义红旗”称为“坏组织”，称这些干部“挑动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出谋划策”，甚至“赤膊上阵”等等。

此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和杀人凶手陆续受到清查处理。

11月11日，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巴县陈家桥炮兵学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学习班负责培训省革委、成都军区作为“彻底改造公安机关的新生力量”而从农村招收的1190名复员军人。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代表市革委、警备区作砸烂公检法的报告。学习期间将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刘佑东、副局长王一押到学习班批斗、毒打。

11月14日，管训队上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集团案”被正式批准立为重庆“一号专案”。

正式立案后，重庆市革委会先后抽调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数十人组成专案组展开“侦办”工作。他们将原关押于集训队的“涉案”人员裴昌会、鲁崇义、庞佑屿、陈希武、陈定、陈华等提解到管训队，连同管训队中的其他一些“涉案”人员，分别隔离逼供，进行“车轮战”、“疲劳战”。对拒不按他们要求招供的鲁崇义、庞佑屿、江诚等人在大会上宣布拘捕。

72岁高龄的裴昌会在刑讯逼供中遭到毒打，连续几夜不

准睡觉并罚站弯腰，致使腰不能直，双腿肿胀不能弯，皮肤水肿溃烂化脓，并被毒打致右腿股骨颈骨折，留下终身残疾。

79岁高龄的夏仲实被刑讯逼供致神志恍惚，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最后被折磨致死。

被诬为“独立师副师长”的江诚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放回家后即含冤而死。

被诬为“副军长”的杨学端被毒打致颈椎伤残，头不能抬，死于管训队……

打人，在管训队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受审者被一巴掌打出鼻血，有的受审者被一巴掌打倒下去将身后夹壁墙撞穿一个洞……

在这样的刑讯逼供下，被定为“集团军参谋处长”的陈希武和“反革命组织骨干”的重庆市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第65军少将政工处长陈定，又被迫做出了“交待”。只是交待的许多细节不同，反革命组织名称也不同，一个说是“保安救国军”，一个说是“反共救国同盟军”。

裴昌会还“有幸”受到重庆市革委负责人蓝亦农、白斌的亲自审讯。尽管他向蓝亦农、白斌作了许多足以推翻冤案的陈述，但蓝亦农、白斌二人根本听不进去，还对他说：

“你不是想和我们较量吗？那我们就较量较量看！”

裴昌会只得回答：“过去我手中有部队，有枪有炮，尚且率部起义。现在我手中什么都没有，不知你们要我如何与

你们较量？”

在管训队报请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批准将拒不按要求招供的鲁崇义、庞佑屿、江诚等人宣布拘捕，抓进监狱后，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审讯时，查明对他们的指控确是不实之词，预审处军代表王哲彬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对拘捕三人的否定意见。但是没有被采纳。领导管训队的负责人振振有词的说：

“反正他要反革命，要活动，（交待的出入）或者大点或者小点也好，这不管它！敌人总是不会老实，不会服帖。”

就这样，鲁、庞、江等人被关押了9个多月。

管训队还以同样手法，逼供出了重庆水泥厂中医尹良臣“反革命集团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漆宗堂“反共救国军案”和教师陈东原“反革命案”，吴天鹤、杨德翹“特务潜伏案”等四起冤案，涉案20余人中，尹良臣、漆宗堂、陈东原被原单位提回批斗关押中死亡；吴天鹤、杨德翹在管训队死亡。此外，管训队还以“内外结合”逼供方式，将第十七中学李世楷、大渡口区联合诊所覃少海、李翰书3人让原单位提回批斗，被拷打致死。

11月20日，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事件，即枪击军车致解放军死伤的直接责任人、“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部负责人朱登明逮捕。

1969年1月，管训队原负责人郭春华调离，“一号专案”

涉案人员纷纷申诉、翻供。但是，饱受折磨的夏仲实再也等不到翻案的一天了。就在这个月的 23 日，夏仲实死在管训队。

1970 年 4 月 13 日，饱受折磨的邓翰在管训队死亡。

1970 年 10 月 22 日，管训队做出《调查结案报告》，称：“对邓翰、骆湘浦、陈希武、陈定等四人的交待，我们进行了分析研究。认定：裴、鲁、夏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五十四名成员，都是反动派的高级军、政官吏，虽在解放前夕被迫起义，但在过去刘、邓投降主义路线的庇护下，对他们的反动立场没有认真进行改造。妄图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组织反革命集团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具备的。虽然四人交待的反革命集团名称、成立时间、地点、组织编制、参加人员和活动情况都各说不一，矛盾很大，但又有不少相同相似的地方，与我市 1967 年和 1968 年所发生的一些反革命事件和严重的政治事件相吻合。”

但是《调查结案报告》认为：“这个反革命组织，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案件中的所有人员均不以反革命集团成员对待。”

最后的结论是：“这个反革命嫌疑集团的出现，主要是邓翰、骆湘浦两人坚持反动立场，妄图蒙混过关，在管训队内制造混乱所致。”

并提出：“对有意制造混乱的邓翰，虽在 1969 年（注：

应为 1970 年) 4 月在管训期间病死，拟仍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有意制造混乱的骆湘浦，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严加惩处。”

在基本否定“一号专案”时，这个报告仍然给冤案受害人员留了这样一条粗粗的政治“尾巴”：“……这些人的反动世界观，解放后未得到应有的改造，其中，有少数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我党，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变天复辟”。同时，又对另一个冤案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有个别人，具有特务潜伏的重大嫌疑。”

这个“个别人”，主要指的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刘宗宽。

刘宗宽，原为杨虎城将军陕西蒲城同乡和西北军部属，西安事变后其部队被国民党中央军吞并，其本人被诬下狱险遭处死。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利用机会和上层关系打入国民党重庆军事机关。1949 年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参谋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机密军事情报，同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许多导致其军事失利的参谋意见和虚假情报，其贡献被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但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受到打击，文革初期 1966 年 9 月又被红卫兵抄家抄出国民党时期的文凭、奖状、国旗、手枪之类物品，即被以“反革命”、“妄想变天复辟”等罪名抓捕，关押至

1967年3月下旬才获释出狱。在“一号专案”中，他也曾被诬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并任“参谋长”，但因所谓“成立大会”召开时的3月初他还关在狱中，此罪名很快即被否定。50年代初，他曾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后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许多解放军指挥员都作过他的学生。而这时，他又成了“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在文革中先后被隔离审查五年半之久，妻子崔东亚，时任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处长，被迫害致死。

事后查明，在被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管训队管训的234人中，迫害致死夏仲实等20人，致残裴昌会等3人，以“反革命罪”逮捕7人，管制6人，戴“反革命”帽子20人，交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审查批斗130人。共占被管训人员总数的80%！

此后，管训队人员被转送到设于重庆市政协的重庆市统战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审查，不准回家，不准通信，连上厕所都要几个人一起去。没有行动自由了。学习不久，政协里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你攻击我是军统，我攻击你是军统，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变成了“军统”，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这个学习班才草草结束，人们陆续恢复自由。此后，在1973年、1979年都对

此案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平反，但平反过程几经周折，而真正彻底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及查清冤案炮制经过、明确有关人员责任并提出处理意见等，直到文革结束整整 9 年之后的 1985 年底才得以完成。

1969 年 1 月，坐落于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群众自发修建的武斗死难者公墓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莹的修建。从 1967 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 113 座墓莹。其中现存碑文资料可考的 92 座墓中安葬了 345 人。死者多为武斗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 299 位死者中，最多者是工人，占 176 人，其次是学生，占 104 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 82 人。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 196 人中，最多者是 20 岁以下，占 69 人，其次是 21—30 岁，占 66 人。年龄最小者 14 岁，最大者 60 岁。因武斗中沙坪坝区为“815”派占领区，此地安葬的死者多为“815”派成员。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公墓。其中有一篇碑文摘抄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

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即原二十九中。





2月4日，重庆军民1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自此，大批中学生被赶到农村，其中一些人继续参加了当地已处于尾声的两派武斗。

第 1054 回：搞精简，总理只留俩秘书

江青闹，黄永胜访阿难行

随着机关精简的进行，9月7日后，国务院总理值班室撤消，只留下钱嘉东一人。两个月后又增加了纪东。11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它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1968年7月，中央专案第二组有一份报告，呈送人中有江青、黄永胜等10个人的名字。江青那段时间身体不好，有一个月没有看文件了，所以黄永胜首先看后，画了圈，并批“拟同意”。另外两个人也画了圈，文件最后才送到江青那里。江青看后大发脾气，将报告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喊道：

“混蛋！他的眼睛里哪还有我这个总负责人啊！这个人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越来越目中无人了。”

她大骂一通后，喘着粗气，擦着急出来的汗水，定了定神，又把报告从地上捡起来，挥笔批上：

“我是这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过去，这不是在夺我的权吗？黄永胜有政治野心！”

然后让秘书杨银禄打电话，把叶群和黄永胜叫到钓鱼台

11 号楼。

叶群、黃永胜进了客厅，杨银禄转身正要退出，江青大声把他叫住，说：

“小杨，你别离开这里，你可以作证，不然，他们是不會认账的。”

叶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脸色一下子红了，却不十分紧张。

黃永胜的脸色也一下就白了，显得十分紧张。

他们正襟危坐在沙发上等待江青教训。

只见江青气愤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走到黃永胜跟前突然站住，指着他说：“尊敬的黃总长！”

平时，江青称黃永胜都是呼“永胜同志”，今天称“黃总长”，还带有“尊敬”二字，显然不是尊敬，而是一种讥讽。黃永胜猛的站起来，不但脸色发白，而且两肋的肌肉也在抖动。

江青继续说道：“以前称呼你永胜同志，今天我得称你‘尊敬’的黃大总长，因为你官大呀，可不得了啦！”

黃永胜更加紧张，他用颤抖的声调说：“我不知道江青同志生我什么气，你不要气坏了身体，请你保重，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尽管批评和帮助……”

江青没有等黃永胜把话说完，就把那份报告甩到黃永胜那里，说：“你看！你看！”

黃永胜打开报告一看就全明白了，忙说：“我错了，我确实错了。这份报告应当先请江青同志审批，我不应该先表示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也是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的表现。我今后一定注意，请江青同志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嘛！”

此时，叶群也知道江青是生的那门子气了，赶紧站起来打圆场，对黃永胜说：“江青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江青同志今天批评的很对，她批评你，使我也很受教育。今后，第二专案组有什么报告先送给江青同志审批，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感情问题，这也是纪律问题，不要没有大没有小的。今后，大大咧咧的毛病要改，否则要犯大错误的，你懂吗？”

黃永胜忙说：“我懂，我懂。我一定接受教训，说话办事三思而后行，不说不干对不起江青同志的话和事。”

叶群、黃永胜好话说尽，但是，江青还没有真正原谅。她厉声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今后该送我什么，不该送我什么，你要想好了，把好关，不该送给我的送了，就是对我的干扰。该送给我的不送，就是封锁我，就是架空我，你可要记住！”

黃永胜满口答道：“是是是。”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1968年11月，黃永胜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上报军队调动的报告。他按照上任后的惯例，在报告的传阅名单上写上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人员的

名字。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报告上批道：“像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个人的名字（毛、林、周）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于是，以后军委办事组再有关于军队调动的报告就只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

江青发现军事方面的报告不给她了，大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他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

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他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工作。

黄永胜和吴法宪赶紧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说：“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我们无权做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

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起来。

那天，江青从大会堂开完会回到 11 号楼，脸拉得好长，气呼呼地上了二楼。工作人员们在想：又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大家走路脚步轻些再轻些，说话低声再低声，连大气都不敢喘，楼内静得吓人。正在寂静之中，江青突然打铃唤护士进

去。她让护士立即拿一块白布给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工作人员都愣住了，“她要白布干什么？”现在到那里找一块白布呢？还是小王聪明，从仓库里存放的旧的白窗帘上撕了一块，大约有一平米左右。护士将白布送给江青时，江青又命令把自己穿过的军服、军帽的领章帽徽统统找出来，把它们都别在那块白布上，然后挂在她的办公室的北墙上。江青面朝北墙站在领章帽徽前，两眼微闭，低着头，两手合十，作着揖，口中念念有词：“红领章，红五星呀，你们是我辛辛苦苦争来的呀，我和你们相处几年，今天咱们就要永别了！”

江青向领章、帽徽告别以后，又叫工作人员把她戴过、穿过的所有的军帽、军衣都找出来，由她亲自点清数目，用大床单包扎好后，这才抬起头来，对秘书杨银禄说：

“小杨，今天我命令你把这些东西亲自交给黄永胜，你见到他什么也别说，就说是奉我的命令行事，叫他把这些东西收下，并打收条，立即回来见我，我在家等着你。”

杨银禄将江青的8套军衣、6顶军帽从江青办公室扛出来，打电话找到黄永胜的秘书，询问黄永胜在什么地方？

黄永胜的秘书告诉他：“黄总长现在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

杨银禄对黄永胜的秘书说：“请你报告黄总长，我有事找他，请他在京西宾馆第4会议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杨银禄乘车赶到京西宾馆，很快见到了黃永胜。

黃永胜见到杨银禄，十分客气地问什么事情？待杨银禄说明来意，交给他一大包东西，请他写收条时，黃永胜脸色开始变白，两腮的肌肉也开始抖动，喘着气问：“这是怎么回事？”

杨银禄说：“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写个收条，我好回去交差，我还得快点回去，不能在你这里呆的时间太久，她还等着我回去呢。”

黃永胜没有再说什么，两手哆嗦得很厉害，拿起笔来试了几次写不了字，停下来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才勉强地写下了：

“收到江青同志的军衣、军帽共计 14 件”落款“黃永胜”。

杨银禄赶回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还在她的办公室里眯着眼坐在沙发上等他。

杨银禄说：“你交给我任务完成了，这是收条。”

江青接过收条后，问：“黃永胜说什么没有？你可要老实告诉我。如有半点隐瞒，我拿你是问。”

杨银禄说：“他没有说什么，写完收条我就立即回来了。”

江青站起来将收条塞进她自己的铁皮柜里，杨银禄也赶紧下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江青忽然想起，在中南海还有她的两套军衣，一顶军帽，立刻派人从中南海取了回来，然后对杨银禄大声批评道：

“你执行我的命令不彻底！为什么还有两套军衣不给黄永胜送去？！”

她没等杨银禄解释，就转过头去对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两套军衣送给黄永胜。你如果把这件事办好了，我奖赏你办不好，我处分你，快去快去！”

警卫员接受了命令，很快就回来了。当然，江青也没有提奖赏的事。

第二天，江青起床后到了办公室，还没有看文件就打铃叫杨银禄。看她的样子气是消多了，说话的语气也比较平和了，但话的份量依然很重。她说：

“有很多情况你不清楚，我是遵守保密纪律的，不能对一个芝麻大的官说。现在军队的情况很复杂，黄永胜这个人很阴，目中无人，对我越来越冷淡，不治治他还行？将来这个军队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11月18日，黄永胜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报告称：“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确定增加谢富治、温玉成两同志为办事组成员，我们非常欢迎。还要求增加李天佑一人。……”

11月22日，陈伯达、姚文元在黄永胜的这份报告上批道：“是否等几天之后，征求一下江青同志的意见。”

黄永胜于11月24日批：“完全同意文元同志意见。”

恰巧，在此之前，中央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就要到了，但因黄永胜一直没有为军事方面的报告只报毛、林、周一事件作检讨，江青不同意黄永胜出国访问。时间紧迫，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不好更改。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江青，江青也就不再坚持了。

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也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

黄永胜回国后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之前，毛泽东对黄永胜他们说：

“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原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

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

此事过了不久，中央文革的一位记者给江青写信反映，在中南的几个省，造反派正在受压，保守派正在得势。不少地区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多是保守派掌权，在那里是一片“白色恐怖”。在那里工作过的中央文革记者，也一个个当作“坏头头”被揪斗。信中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情况，是因为有根子。这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广州军区的上头还有人。信上虽然没有说明上头的人是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黄永胜。

江青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批了很长一段话：“我看了这封信非常气愤，信中反映的情况不仅中南各省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必须揪出这个根子。我建议用中央的名义把这封信和我的批语转发全国，以引起普遍注意。”

这封信江青是批给毛泽东及在京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文件发出以后再也没有传回来。

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对杨银禄说：“主席对江青同志给黄永胜一包军衣和江青在中央文革记者的信上的批语都不满意，说她不顾大局，尽坏主席的大事。主席叫我告诉她，别忘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

杨银禄问徐秘书：“你告诉她了吗？”

徐业夫说：“咱们一个当秘书的怎么敢呢？我把主席的

话报告周总理了。”

一天晚上，周恩来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 11 号楼江青的住处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他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他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他们来到江青住所后，周恩来让黄永胜他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江青出来，她看见黄永胜他们，一边下楼，一边大声说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不时插几句话。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黄永胜他们一声没吭。会议在晚上 23 时结束。

过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了，熟睡中的军委办事组成员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到钓鱼台 16 号楼开会。当他们赶到 16 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说：

“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做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了。不

要再反驳她，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这时，黃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走进的会场，坐在周恩来身边。

会议开始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黃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吴法宪听了以后马上说道：“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

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周恩来立即宣布散会。

过了一个月，江青又派人将她的军衣军帽从黃永胜那里要了回去。

第 1055 回：反右倾，黑龙江批斗干部

“徐海班”，临沂冲部队营区

1968 年 11 月中旬，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期间，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省革委会常委范正美的大会，宋振业陪斗。此后，在全省范围内，不少地县及基层革委会也开始随意在开常委会时批斗革委会成员甚至主要领导人。

扩大会议还没有结束，范正美和宋振业即被隔离审查。

11 月 22 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呈报《关于把范正美、宋振业分别放到基层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报告》，没有批复。

12 月，潘复生亲自到双城县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原来预计开 5 天，后来延至 21 天，人数原定 5000 人后来增至 7000 人。通过“不断反右倾”，在会上首先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进而又将一名县革委会主任、一名武装部长，当场撤职，交群众批斗。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双城反右倾揭批现场会。

在潘复生亲自督促下，双城的做法很快在黑龙江全省开花。据后来统计，这一期间全省被戴上“漏网走资派”帽子遭到批斗的大队以上干部就有两万九千多人。

我们再看此时的徐州地区。

中央知道 4 月徐州派来的 5 个“支派”代表不能代表徐

州“支派”的情况后，于5月13日电示南京军区，通知徐州“支派”的核心组织“淮海八三一”选派5名代表到京参加10人代表团。

5月23日，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王效禹在徐海地区的错误。接着5月26日，周恩来又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济南、南京两大军区代表、徐州驻军代表和徐州两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济南军区负责人王效禹、杨得志，68军军长张銍秀、政委李布德，徐州军分区司令员柴荣生等人。南京军区由江苏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负责人梁辑卿代表。会谈中不但两派群众代表争执不休，军方人员也相互指责，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江青提出由中央出面办学习班，周恩来表示同意。

6月1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就连云港的问题作检查，王效禹就徐州问题作检查。

7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煤炭会议讲话时又说：“徐州是一派当权即‘踢派’当权，是不对的”。

7月上旬，徐州、连云港两市和徐州专区下属八县2000多名军队和地方代表陆续来到北京，参加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的“徐海班”。

7月12日，“徐海班”在北京正式开班。但是，较早到达的徐州“踢派”代表杨正祥等人，因拒绝承认“淮海八三一”代表的合法性，一怒冲出学习班。与“踢派”联合的

“支派”头头朱成明等人也随之而去。他们一部分人乘火车返回徐州，另一部分人去找中央告状。当天，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指示：“冲出学习班是不对的。可以留下来参加学习，学习主席思想，斗私批修。”

7月24日，杨正祥在徐州工人文化宫召集“踢派”头头会议，研究如何与“支派”斗争。徐州“踢派”报刊还发起一轮强劲宣传攻势，揭发批判“淮海八三一”的反军活动，否认他们是正宗“支派”。

8月1日，中央安排“徐海班”全体成员参加“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以示关怀。

8月5日，“徐海班”领导小组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领导小组还对杨正祥和“假支派”做出批评，要求他们做出检讨。

8月下旬，徐州“支派”“淮海八三一”的群众，从南京返回徐州。数百人的队伍一进徐州，就迅速占领了火车站附近的“淮海饭店”，在淮海饭店垒起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露在饭店的大楼窗口，徐州开始骚动了，徐州“踢派”也建立起自己的武斗据点。

此时，山东临沂“八大”和“六大”两派组织的武斗也在不断升级。8月13日下午，“八大”下属组织大芦湖煤矿

“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工人王佐友被地革委“文攻武卫”抓走。该团工人到矿革委会要求放人。临沂“文攻武卫”开去13辆汽车满载武斗人员，将“红色工人造反团”赶出矿区，围困在紧靠204师610团营房的青云山上。

当晚，临沂地革委会常委曹德玉率6人，携带手枪6枝，匕首两把，乘临沂人民医院救护车前往大芦湖煤矿，途径册山大山前村，被“八大”群众抓住。地革委会闻讯，于次日晨，由“文攻武卫”开去一辆满载武斗人员的大卡车，前去营救曹德玉，也被“八大”扣留。于是，册山革委会在18日、19日，抓了沙沟、沟角公社37名“八大”群众。20日，“八大”群众冲进册山区革委会驻地，救出了被抓人员，抢走了册山粮库8000余斤粮食。

此时，有一些“八大”组织的群众逃进了苏鲁交界的马陵山区，但不时出来同另一派交战，当地称之为“马陵山游击队”。

8月20日，王效禹在接见临沂地革委代表团时说：“‘马陵山游击队’是武装土匪集团，实际是‘八大’组织的核心”，“省革委对‘马陵山游击队’已经表了态，最近写了个文件报中央批，宣判‘马陵山游击队’的死刑，要发动群众把他消灭。”

第二天，21日，临沂地革委调集上万名群众，将困在青云山上的“八大”组织500多人团团围住。这500人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跑到青云山 610 团营房寻求部队保护。610 团为了避免武斗流血，允许“八大”组织群众进入营房的礼堂，将两派群众隔离。

山东“山工总”、“山贫”等组织发表了《关于临沂地区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韩金海早在 8 月 19 日就要求“山工总”立即组织工宣队进驻临沂。20 日，他又招来临沂革委会副主任闫文征介绍“马陵山游击队”的情况，同时召开“山工总”所属 13 个地市、3 个大型企业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做出了《关于临沂问题的决议》，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临沂“马陵山游击队”“坚决打击，彻底取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之。”随后在济南召开了“誓师大会”，并于 23 日在全省组织 16 支“工农宣传队”，共 1400 多人，全都集中济南珍珠泉招待所，计划集训 5 天。

杨得志知道后，于 8 月 23 日亲自给正在肥城的王效禹打电话，反对这样做。王效禹在电话中说：“派工宣队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山工总’搞的？”当天晚上，王效禹对赶到肥城汇报的张美智说：“工宣队不用集训了，明天就出发”。

8 月 24 日，由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常委张美智率领的千余人队伍，从济南珍珠泉礼堂分乘几十辆汽车杀向临沂，号称“16 路联军”。他们会同临沂支持王效禹的“六大”组织开始包围冲击 204 师部队。

27日，王效禹以省革委、济南军区名义给204师发电报，下令204师“负责将原‘八大组织’的群众交由地革委处理”，遭到204师拒绝。

王效禹9月4日晚在枣庄电话招韩金海前去汇报。

9月5日，韩金海带孔世君等人到枣庄汇报。王效禹对韩金海、孔世君等人说：“不要划框框，不要以革委会的名义出现，要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搞。事后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各级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就是承担一些对群众教育不够的责任就行了”，“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在两三天内解决问题”。

当天晚上，韩金海等人经苍山返回临沂，向在苍山的张美智传达王效禹的意见。张美智马上召集县革委会、武装部、驻军、驻苍山的省工宣队（德州、泰安等）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连夜包围“马陵山游击队7支队”所在的苍山县神山区西北村。9月6日，在省工宣队的参与下，他们抢了神山区武装部的枪支。上千人拿着这些枪和各种冷兵器攻入村中，打伤大批群众，抓捕多人。称之为“苍山大捷”。

9月8日早上7时50分，韩金海挂帅，张美智为副总指挥，以省工宣队昌潍“飞虎队”为先锋，省宣传队和临沂地革委组织的近两万名群众，手持木棒、钢叉，向610团营房发起总攻，将610团担任隔离制止武斗的指战员强行架走。随后，担任前锋的昌潍飞虎队爬上大礼堂，掀开屋顶，砸烂

天花板和门窗，用手枪、钢叉、梭镖、砖瓦、石块居高临下，向挤在礼堂内的“八大”群众袭击。同时，冲进办公室、宿舍。武斗持续 5 个多小时，营区一片狼藉，大礼堂遭到严重破坏，砖瓦石块铺了半尺多厚。

山前营房武斗后第二天，韩金海在临沂召开两万人参加的“98 大捷”祝捷大会，把抓获的 30 多名“马匪”分子押上台示众，会后在临沂城游街。宣传队到处张贴标语“山前大捷好得很”。

临沂“98 行动”副总指挥、“山工总”常委穆悦奎到菏泽，向王效禹汇报 9 月 8 日攻打 204 师和“八大”组织的辉煌战绩。王效禹兴高采烈，大加赞赏。穆悦奎事后到处说“我这个汇报，王政委越听越愿意听”。

就在王效禹派工宣队进驻临沂之时，9 月 10 日，王效禹在菏泽召见济南铁路局负责人李金亭，听取由山东向徐州铁路分局派出工宣队支持“踢派”的安排情况。杨得志获知后表示：“要派可以，得有解放军参加，办几天学习班”。王效禹根本不听，让李金亭带领工宣队连夜出发。

山东工宣队到了徐州，立即上街游行支持“踢派”。中央很快知道这一情况。黄永胜给杨得志打电话：

“怎么山东的工宣队派到人家江苏去了？叫回去！”

杨得志想缓解一下，于是说：“得和王政委研究。”

黄永胜回答的很干脆：“研究什么，快回去。”

打着济南铁路局的名义派到徐州的工宣队只得返回山东。

9月上旬，连云港两派代表签订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措施。这是北京“徐海班”开办两个多月以来的一个重要进展，“徐海班”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

9月2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在北京接见驻徐州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做促进“大联合”工作。毛泽东的指示是：“徐海地区对‘七·三’、‘七·二四’布告落实不够”；“徐海地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联合起来”；“徐海已经翻了两个个儿了，不要再翻个儿。”

10月7日，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等军委办事组成员接见徐州68军军长张铚秀、政委李布德，杨得志陪同接见。

黄永胜、吴法宪先是一般性地询问了徐州派性斗争情况，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呼吁各派尽早实现“大联合”。随后，他们做出了如下指示：

(1) 要求两派不要纠缠于王效禹问题，不要听小道消息，不要挑拨江苏、山东关系。黄永胜指出：“打倒王效禹”的口号是错误的。

(2) 强调“八·三一”事件和炸桥破路事件都是少数坏人搞的，多数群众没有参加。吴法宪肯定“淮海八·三一”

是真正的“支派”。

(3) 宣布中央对徐海地区部队“支左”分工如下：1、徐州市由 68 军负责统一领导，组织驻徐部队进行；2、徐州专区以军分区为主，68 军工作组织积极协助；3、徐煤系统以坦克 2 师为主；4、连云港以连云港市“支左指挥部”为主，18 师及人武部积极协助；5、八县由 68 军“支左”小组及各县人武部负责。各师及工区加强领导。

这次接见没有产生很大效果，首先因为上述军队“支左”分工不够明确，存在多头并存、相互牵扯的问题。其次，中央“和稀泥”的态度遭到两派抵制。

10月9日，军委办事组再次接见“徐海班”领导小组成员。黄永胜说：徐州的问题“两个省都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嘛”。吴法宪接着说：“山东不要管，江苏也不要管，中央直接在管”等等。

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10月18日，徐州市、徐州专区下属八县和徐州煤炭系统两派群众组织也宣布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向中央报喜。然而此举只是一种表示服从中央的政治姿态，双方并未实现真正的联合。

吴法宪上报中央军委批准，1968 年 11 月 7 日，将驻徐州机场和连云港白塔埠机场的空军 29 师调到浙江衢州、笕桥机场，驻衢州空 12 师调到徐州。支持王效禹的空 29 师师长等人随部队调离徐州。

空29师调到浙江，可下属部队一些陷进“踢派”泥潭不能自拔的军人以各种理由继续留在徐州，参与地方文革。1969年7月15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原驻徐州空军的区队5人抗拒军委决议，开除这些人的军籍、党籍和公职，各单位不得挽留。

“徐海班”分别于11月6日、8日、16日和29日召集不同规模和层次的会议。但收效依然不大。于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又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第一，决定将徐州铁路、煤炭、电业三大系统代表从“徐海班”抽出去，分别由铁道部军管会、煤炭部军管会、水电部军管会单独开班学习班，由三个部军管会主任亲自挂帅。这样“徐海班”实际上一分为四，每个班规模更小，更易于控制。

第二，由铁道部派干部和“毛泽东号”机车组一起进驻徐州铁路分局，帮助分局开展工作，切实阻断“火车头总部”及其头头杨正祥与地方造反派的联系。

第三，向“徐海班”派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学习班成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查比看”等活动。

第四，由“徐海班”成员组成“徐州代表团回徐汇报团”，返回徐州宣传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促进当地两派群众大联合。

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促成“徐海班”内的大联合，也没有终止徐州当地此伏彼起的派性冲突。

第 1056 回：山东省，造反派突击入党

“反复旧”，有计划全省展开

1968 年，山东济南掌权的造反派又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省革委会副主任、“山工总”头头韩金海为首的省革委派，另一派是以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恩华为首的市革委派。

10 月中下旬，王效禹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韩金海等人在临沂忙着那里的事情。此时，杨恩华一派独占济南发号施令。韩派的孟庆芝、穆悦奎等人受压，跑到临沂向韩金海告急，韩派的刘长茂则在电话中向韩金海哭诉。韩金海立马赶回省城，在“山工总”开会研究对策，最后决定，由韩金海、孟庆芝、乔世俊、穆悦奎到北京找王效禹汇报。

因为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不准随便找人，韩金海没有见到王效禹，便在电话中向王效禹告状。正好 10 月 14 日，《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有一段关于“反复旧”的话，于是王效禹在电话中对韩金海说：“济南市恐怕是搞了复旧，你们先回去做些调查，我回去后再处理。”

韩金海从北京回到济南，于 10 月 20 日打出“反复旧”的旗号，在他的起家之地济南印刷厂召开 23 个工厂参加的现场“反复旧誓师大会”。

对于韩金海开展的“反复旧”，济南军区和省革委在济

南的李水清、赵修德、张子石、傅建吾等人认为不妥，李水清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反对。

中央全会结束，11月1日王效禹回到济南，下午先听取韩金海、刘崇玉等人汇报，研究商议有关情况。

11月2日，济南市召开庆祝发表八届十二中公报的军民大会，王效禹在讲话中说：“如果不击溃‘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企图干扰和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种反动思潮”。

当天，他继续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常委会上重点谈“二月逆流”问题。3日上午，他与韩金海谈话，下午听取孔世君、田雨汇报，晚上和傅建吾、杨恩华谈话。4日继续开会和谈话后，王效禹决定开展“反复旧运动”。

11月5日，王效禹带领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到济南车辆制修社搞“反复旧”试点，并在那里召开“反复旧”现场会，王效禹、韩金海先后讲话，济南革委会负责人杨恩华谈了四点意见，山东的“反复旧”就此拉开序幕。

11月10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第181期发表“学习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文章《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其中写道：“关于反对复旧问题，复旧是存在的，但这是很少数单位的问题”等等。

这篇文章，王效禹极为欣赏。山东的各种“学习材料”大量转载。

王效禹实施“反复旧”的内容，基本取决于毛泽东审阅的红旗杂志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等文章。主要有：

1、老干部掌权的单位，都有复旧嫌疑，《红旗》杂志说“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

2、全力突击造反派入党。《红旗》社论中强调“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

3、批判多中心论。《红旗》社论中有“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4、以批判“二月逆流”为名，矛头指向济南军区。

11月，各省市先后召开会议，上报出席“九大”的代表。此时，才想起一些造反派还不是党员。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发现河北石家庄国棉厂的一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竟不是党员。11月，各地出现造反派突击入党的高潮。

60年代入党，一个主要的基本条件是“出身”。但是在

山东，跟随王效禹的造反的人有些出身有问题，一些人曾是社会上的“混混”，个别还有犯罪记录。可他们反抗精神很强，有些人从社会底层造反到了领导岗位，所以非常感谢王效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要将这些人吸收入党，就有很困难了，其中有些困难还是王效禹自己造成的。

1966年底，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有些大学生造反派非常反感一些“混混级”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曾问王效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王效禹回答：“这些人能冲能打，关键时刻，稍一鼓动，就能冲上去。当年搞土改的时候，有些地方的贫下中农比较老实，难于发动。就是利用流氓无产者，先打开局面，群众发动起来了，再教育和处理这些流氓无产者。”

1968年2月17日，山东省革委召开“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大会”。会议刚开始，王效禹对在省革委任职的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济南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陈风来说：“要尽快组织一个班子，将新旧领导班子的成员审查一下”。并交待：这个班子由他本人和支左军代表赵修德、陈风来、秦洪洲4人负责，工作人员不要地方的参加，全从军队抽调。陈风来专门向杨得志汇报后，从军内各单位抽调师职干部1名，团职干部6名，其他干部6名，3月初组成审查小组，组长由淄博武装部副政委担任，隶属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成立后的8个月中，分两批审查了一些省革

委委员和机关领导小组成员，给部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建立了档案。

在省革委政治部审查小组的存放的这些档案中，记录了一些造反派头头的问题，这对发展他们入党带来了麻烦。于是，山东“反复旧”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把矛头指向了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的审查小组。11月11日，根据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廷藻布置，从济南12中、16中、28中、铁路技校这4所中学调集红卫兵学生23人，组成济南市红代会“反复旧调查组”，冲进省革委组织组，查封“黑材料”。

省革委政治部的人没接到任何通知，面对突然冲进来的红卫兵，拒不交出钥匙。

王效禹把组织组的人叫去，命令他们把门打开，让红卫兵检查。

13日，红卫兵以发现有杨恩华、张廷藻等人的黑材料为名，查封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王效禹召集省革委机关全体人员开会，说明情况。

张廷藻等人把查封材料的情况写了书面报告。王效禹11月19日在报告上批示：“吸收若干方面的代表把那些黑材料整理后烧掉。”就这样，审查小组调查的文革前的档案和重新调查整理的全部档案材料都付之一炬。

11月11日，杨恩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王效禹找杨恩华和韩金海谈话，要求两人团结一致，共同“反复旧”。于

是，以杨恩华为主，在“山工总”内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又发展韩金海等人入党。

韩金海等人的入党手续在“山工总”临时党支部通过后，由“山工总”总部作为上级部门审查盖章批准入党。就这样，韩金海等人的入党手续成为山东造反派入党一个典型。

还在山东省九大代表名单出来时，分管省革委会政治部工作的赵修德就对韩金海的历史有疑问。此时韩金海还没有入党，王效禹为他预留了九大代表名额，待韩金海办了入党手续后，马上补为九大代表。

11月12日，王效禹致信济南军区党委常委，提出4个问题，认为“二月逆流影响山东”，“有的同志想为二月逆流翻案”。“反对省革委和各级革委的邪风，在山东刮了已近6个月”，“济南部队党委看到这样严重的问题，而不认真对待，就不太合适了。”信中提出“三支两军办公室有鬼”，指责军区后勤部和装甲兵的负责人。提出济南军区支左军人如成为九大代表，军区定下后要省革委商量后再报。

王效禹先在省革委会的党员常委会上宣读了这封信，但会议没有通知杨得志，何志远、陈风来等军人常委参加，而是将信打印20份，发给济南军区党委各常委。11月12日同一天，王效禹又以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批示了十几封部队人员支持王效禹的来信。

对于12日王效禹发出的致济南军区党委常委的信件，

济南军区没有回音。

11月14日，王效禹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呈上一份报告，称：“我在传达中，遵照中央的规定，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没有点名。从山东的情况看，还是点名好。特别是军队中，不少人对‘二月逆流’中‘支左’的错误不仅不认账，而且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刮得很大。点了他们的名，对于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对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我们即照春桥同志的做法，召开较大的会议，深入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

对王效禹的这份报告。中央没有回复。

从11月开始，“反复旧”运动在山东省逐步全面铺开。

11月13日，王效禹首先批准撤销泰安地区革委会主任、原地委副书记房众夫的职务，换上军代表李毅之。接着，山东各地一些老造反重新夺权，只要是原老干部掌权的单位，基本都属于复旧行列。全省短时间内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青岛有一个造反派于景瑞，在青岛的造反派中也算个人物。因其父曾是国民政府的警察巡官，1962年才解除劳教，他受家庭出身影响而不得志。“四清”中，于景瑞又因经济

作风问题被整。文革中他参与造反，“122夺权”后，从轻工局的工厂来到市革委工作，一心追随王效禹、杨保华。到了1968年，形势相对平稳。因为于景瑞的个人历史问题太多，对他已不太重用。突击入党时，更没有他的份。

11月13日，青岛杨保华听说济南开始“反复旧”，便安排于景瑞去济南了解情况。另外，王效禹的老婆刘崇玉此时也正准备入党，于景瑞此去主要是把刘崇玉的证明材料带给她。

于景瑞到济南见到王效禹，汇报完后，上楼把证明材料交给刘崇玉。刘崇玉随口问于景瑞是否入党，于景瑞趁机说出心中不满。王效禹知道了于景瑞的入党问题，便安排他在第二天的省革委会发言，同时通知杨保华马上来济南。

杨保华和鞠维信、张子石等人连夜赴济，参加14日召开的省革委会。会上于景瑞先诉文革前长期受压之苦，随后王效禹作了长篇发言，拍胸脯要和鞠维信介绍于景瑞入党。

当天下午，杨保华等人在济南研究回青岛如何发起“反复旧”运动，准备以于景瑞入党一事为突破口，如果青岛支左军队领导不同意于景瑞入党，就要和军队顶着干。

杨保华向王效禹汇报，说来济南之前，驻青岛部队支左领导表示：不同意青岛全面复旧的观点。

王效禹说：“不同意也得干，不干不行”。

11月16日，杨保华回到青岛，即仿照济南做法，也发

起了一出冲击市革委政治部，批判市革委常委、政法部负责人季铭玲等人整造反派黑材料的事情。

接着，11月17日召开青岛市革委全委扩大会议，杨保华按照王效禹14日讲话的内容和基调，也发表长篇大论，宣传“造反派受压了”，发动“反复旧”运动。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1117讲话”。对于这篇讲话，王效禹安排济南印刷厂大量铅印，全省全国散发。

11月20日，山东省革委会在济南召开全省县以上党员代表大会，青岛杨保华带领鞠维信和青岛台东区的邱嘉鹏等人参加会议。他们在青岛马上就要上火车了，才想起邱嘉鹏等人还不是党员，去参加全省的党员代表大会似乎有些不妥当。杨保华临时遇到市革委一名非党员办事员，命令他急速回去办理审批这些人的入党手续。上了火车，杨保华对邱嘉鹏等人宣布：“现在你们已经是党员了，从这个月开始，可以交党费了。”

11月23日，在山东省县以上党员代表大会上，青岛、济南两个代表团联合发表《中共山东省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会议济南代表团、青岛代表团关于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支持王效禹，批判军队的支左问题。

11月24日，王效禹主持召开山东省革委会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批判“二月逆流”。会议开始不久，王效禹对韩金海说：“看来省革委这个权不在我们

手里，生产指挥部杨国夫大搞独立王国”，“市红卫兵进组织组十几天了，成绩很大，省红卫兵也进了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光这些小孩子不行，要组织工宣队进去，去了以后，工作一个阶段，好的留下，这样政权就巩固了。”

12月3日，山东省革委会第五次全委会议结束，通过决议《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以鲁革发[68]310号文件下发。在会议决议中，提出“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正式决定在全省开展“反复旧”运动。

这天，韩金海、刘崇玉在王效禹家中会客室召开会议，杨恩华、孟庆芝、穆悦奎等人参加，决定组建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组织组和生产指挥部，当场指定穆悦奎任进驻政治部组织组工宣队的队长。孟庆芝在会上讲：“让你们去做大官，当厅局长了，好好干，没有错。”

12月4日，由济南“文攻武卫”、“山工总”、“济工总”出面，调济南机车厂、汽车总厂、山东化工厂、机床一厂、小清河航运局等单位70多人成立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宣队，队长韩金海，副队长张美智。

5日，在“济工总”第2会议室召开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宣队全体会议，进行“战前”动员。韩金海讲话：“现在山东、济南形势很紧张，有人为‘二月逆流’翻案，把矛头指向了效禹同志”等等。刘崇玉也讲了话。当天下午，工宣队及随行助威的约千名人员，乘坐30多辆汽车，由三

轮摩托车开道，紧随着 5 辆宣传车，浩浩荡荡开进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在那里宣布了夺权声明，第一条就是“一切大权归工宣队”，批判杨国夫。

同日，穆悦奎也带领 4 男 1 女共 5 人工宣队，从王效禹家中乘车进驻省革委政治部组织组。第二天，6 日，工宣队宣布：“根据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进驻组织组。从即日起，组织组的一切大权归宣传队，处理任何问题，不经工宣队批准，一律无效。”

工宣队到省革委组织组夺权后，向刘崇玉汇报：“现在材料组的人都走了怎么办？”

因为材料组的这些人都是济南军区干部部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的现役军人，已经回到部队。

刘崇玉答复说：“把黑材料组的正副组长都揪来，先进行批斗”，“不管穿什么衣服的，一样斗”。

于是，穆悦奎等人把材料组长、副师职干部从淄博武装部揪回来进行批斗。

济南军区 1968 年 12 月份召开四好连队代表大会。12 月 7 日，杨保华通过军区前卫文工团拿到一份闭幕式的口号单，发现上面没有支持王效禹的口号，马上送到王效禹的家中。当天晚上，作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效禹，连夜组织 4 万人，于第二天冲击济南军区的四好连队代表大会闭幕式，在大会操场上演出丑化济南军区负责人的活报剧。杨保华向济

南革委会借了辆安装好大喇叭的宣传车，并派车把在济南参加省革委召开的县以上党员大会代表拉到济南军区的四好连队代表大会闭幕式会场。

12月16日，韩金海、孟庆芝等人经过商议，决定让济南的“文攻武卫”接管公安派出所。12月17日凌晨2时，济南“文攻武卫”司令孟庆芝在王效禹家中布置红旗区“文攻武卫”于当天早上7时30分进驻官驿街派出所，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并将派出所20多名民警全部集中到楼上，办了3个多月的学习班。

随后，红旗区“文攻武卫”按照济南“文攻武卫”参谋长李志江从王效禹家中打来的电话，查封了红旗区公安分局军管组的档案材料，同时交代：“要对军管会绝对保密。”

1969年1月7日，济南“文攻武卫”的李志江到市公安局，命令公安局以“指挥部”的名义写报告，要求“文攻武卫”进驻公安机关。

1月16日，济南市革委会主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傅建吾，市革委第一副主任杨恩华，济南“文攻武卫”参谋长李志江3人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成立济南市革委会区街公安派出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杨恩华讲话布置“文攻武卫”、派出所、街道造反派结合起来，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把公检法的权夺过来。

1月25日，以“文攻武卫”179人为主，加上其他人员，

一起乘汽车在济南游行，然后进驻全市 4 区的 38 个派出所。

“文攻武卫”代替军管会，掌管了济南的专政机构。

第 1057 回：来势猛，上山下乡现高潮

搞“清队”，北京大学死人多

1968年9月底的一天，时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顾立清要求《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记者马占海尽快把定西地区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了解一下。

马占海在会宁县掌握到几个事迹比较突出的人，逐一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王秀兰，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当他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王秀兰这句话正好符合他此次采访的目的。于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了她这句有点睛作用的话。

《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顾立清一看到马占海的稿子就感到不错，觉得王秀兰说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召力。于是，他精心对稿子作了修改，加了编者按，于 1968 年 12 月 8 日，在《甘肃日报》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稿子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电话打到《甘肃日报》

社，说“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并要求核实稿件是否属实，顾立清肯定地回答：“绝对真实。”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同时，《人民日报》还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共和国历史上一场规模巨大、几乎改变了整整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或分配工作的以外，纷纷开始去农村、边疆落户。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的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一场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就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锣鼓声中渐渐销声匿迹了。

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王秀兰也因为那句名言，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大名人。

12月的一天，北京56中的学生郭路生也离开北京到山西杏花村插队，他后来以笔名食指写下了《这是零点十八分的北京》这首诗，描述了当时离别北京时的场面：

这是零点十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12月，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被分配当电解工。蒯大富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一名电解工而苦恼，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一来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二来当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也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到部队当战士。

9月下旬，北京大学由工、军宣传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的干部、教师都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宣传队提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而且，所有清查对象，包括翦伯赞、冯友兰等几名重点保护对象在内，都集中食宿，不准自由回家。

周培源又一次住进了28楼，这一次是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接受审查的。此次与上次不同，上一次还有“井冈山”的保护，本派学生的尊重与温情，而现在则被视为“真正的美国特务”，所面对的是工宣队员，与他们无法解释他在美国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研究空投鱼雷的那一段历史。他上厕所、排队吃饭都受人监视，周末也不能回家……

10月，化学系“0363”齐菊生在文革中写给化学系同学陈醒迈和技术物理系63级程汉良、刘立民的一封信，被化学系一位女生发现并上交工宣队，工宣队在楼道里用大字报公布了这封信的全文。这封信借史喻今，表达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于是被说成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齐菊生、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他们4人也被定性为“四人反动小集团”，隔离审查。由文革中一直在校外的一位同学任专案组组长，也是年级领导小组组长。这位同学先是在学部参加运动，后来去了河南兰考，因此没参加北大的两派斗争，应该是没有派性。

不知不觉中，化学系的吕成信，樊能廷，雷祯孝，朱重远也消失了，他们也被隔离了。还有陈醒迈的女朋友陈珍德，齐菊生的女朋友游君玲，也都隔离了。

宣传队对聂元梓进行了“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

在清队中，对物理系一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历史进行审查，有人揪斗，有人贴大字报。10月16日夜，饶毓泰上吊身亡，时年77岁，他是周恩来指示的重点保护对象。为此，学校保卫组组长在向宣传队总指挥部汇报勘查现场的情况时，提出要加强对翦伯赞、冯友兰的重点保护，亡羊补牢。宣传队同意，把翦伯赞、冯友兰二人放回家。

16日当晚，还发生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崔雄崑，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失踪的事情。17日晨，崔雄崑被发现在校内红湖游泳池身亡，时年49岁。

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称其为“美国特嫌”。10月18日，他上吊身亡，时年52岁。

11月2日，北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委写了《关于不同意聂元梓参加市党代表会议的请示报告》。

11月4日，历史系原系党总支委员、系文革主任吴维能，因被点名批斗是陆平的黑班底及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在圆明园投湖自尽。时年41岁。吴维能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19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系总支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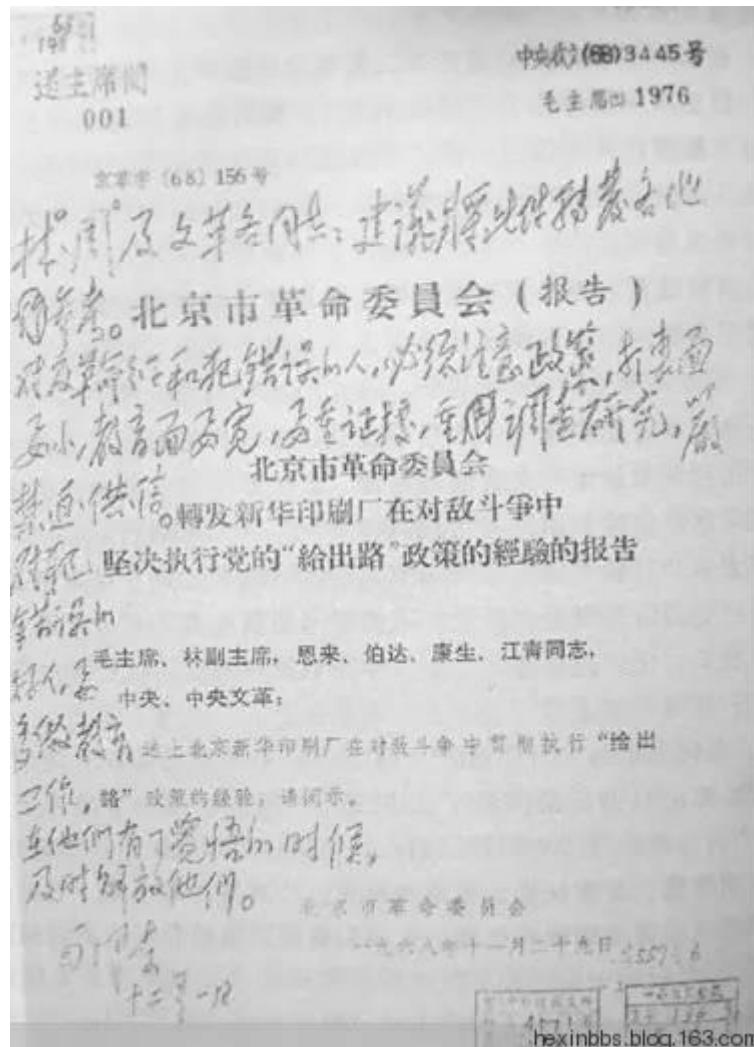
系办公室主任。1959年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对别人说了，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爆发后，他揭竿造反，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委员。谁知工宣队进校后，还是要追查他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

西语系党总支委员、系办公室主任徐月如，清队中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攻击三面红旗”，被日夜轮番批斗、逼供，并威胁要游街批斗。10日，徐月如上吊身亡，时年39岁。

北大校医院副院长郭淑贤大夫，于11月15日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头头，对其批斗，审问逼供。16日晨，他用刀片自刎身亡，时年49岁。

12月1日，毛泽东将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同时附了一封信。

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毛泽东在此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12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

12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在东操场召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万人大会，揪斗了“牛辉林反革命小集团”。

会上，突然宣布“将反革命分子侯汉清压上来！”正在参加大会的原北京大学“井冈山”一把手侯汉清就被人突然扭住胳膊，押上台去批斗，并当场宣布隔离侯汉清，实行群众专政。

一时间，北京大学上吊者有之，投湖者有之，服毒者有之，跳楼者有之。最密集时，这边跳楼者血迹未干，尸体未僵，那边又有人从楼上纵身而下……“牛棚”不止集中一处，各系均有“牛倌”。12月12日，工宣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人。”

中央成立了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起草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添加了几段话：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当天，陈伯达、谢富治接见“516”专案组全体人员。

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516’成员分成三类，这是

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

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

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

陈伯达指着“516”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

谢富治说：“总的讲有‘516’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

陈伯达、谢富治二人商量后决定：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王恩宇、傅崇兰交“516”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12月18日，北京大学又发生了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双双自杀身亡的事情。

这天早晨，负责照顾翦伯赞、戴淑婉夫妻生活的工人杜师傅突然泪流满面地跑到学校保卫组，扑通跪倒在地上，向学校保卫组组长哭道：

“两条人命，翦伯赞老两口都死了。”

保卫组组长闻言大惊，立即电话报告学校宣传队总指挥部，然后立即带着学校保卫组的肖祖德、蓝绍江和苑世男赶赴现场。

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总指挥、63军政治部副主任听到翦伯赞的死讯时也是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且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没有了，这个责任该有多大？怎么向毛泽东主席交代？而且，63军进京“军管”，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对进北大后如何工作，做了具体的指示。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说相信这个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岂不是辜负了周恩来总理的希望？指挥部里的解放军立即会同“工宣队”里北京第二机床厂的几名工人奔向翦伯赞的住所。

翦伯赞家住燕东园28号。由于10月16日夜发生了饶毓泰上吊身亡一事后，宣传队同意翦伯贝始家。因为燕东园28号在大院外，不便保护，宣传队接受保卫组组长建议，将翦伯赞夫妻二人搬到燕南园64号，学校保卫组原旧址63号旁，每月发生活费120元，白天有历史系的学生值班，夜间由工人杜师傅照顾。“宣传队”交给杜师傅的任务是：注意

翦伯赞夫妇在室内的任何行动，负责为他们做饭、端饭，他们穿衣、上卫生间等也要在旁守候。并明确要求历史系的值班学生和杜师傅，非经宣传队总指挥部批准，不准外来人员接触。

当大家赶到燕南园 64 号翦伯赞家时，看见进门客厅就是随时监视、照顾翦伯赞夫妇起居的工人杜师傅住处，通往里间翦伯赞夫妇的住房的门已被砸开，只见房中有两张南北向的单人床。左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翦伯赞。右边的床上，头南脚北仰卧着戴淑婉。两人面色安详，衣着整洁，均穿鞋袜。两人的体温，早已冰凉，没有脉搏了，但尚无尸斑出现。保卫组们立即电话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接着，他们继续勘查现场。首先搜查翦伯赞遗体的上衣口袋，在他的左兜里发现一张纸，上写：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右兜里也有一张纸，上写：

“我实在交不出了，才走上这条绝路。我走上这条绝路，杜师傅不知道。”

接着，搜查翦伯赞的床铺，在枕头右下方，发现了一个服药袋，里边有两粒进口的速可眠胶囊。

再搜查，没有发现其他异物。

又搜查戴淑婉的床铺，也未发现任何异物。

保卫组的初步结论：可能是服安眠药自杀。

接着，他们又询问住在外屋伺候翦伯赞夫妻日常生活的杜师傅。杜师傅详细谈了昨天晚上的情况：

“昨晚 10 点多钟，翦伯赞和往常一样准备睡觉。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还说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粮票给了我。他们睡后我也睡了。到 12 点多钟，我听到炉子响声，好像他们起床了，我问有事吗？正要起床，听见翦伯赞老伴对我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您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我就没有起来。我听到里面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了开箱子的声音。不久我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记起翦伯赞要我买油条的事，就到海淀的一个铺子里去买了回来。这时已经 7 点多钟，早该起床了，我稍等了一下，见里面还没有动静，以为他们还没醒，就叫了几声，见没有答应，就使劲敲门，还是没有答应。我感到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了，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一摸已经冰凉了。”

这时候，在翦伯赞住处值班的历史系学生王渊涛和胡敬梁也来了，保卫组没有让他们进入翦伯赞夫妇的卧室，就在外屋询问他们昨天的情况。王渊涛和胡敬梁二人说，昨天下午，中央专案组的巫中等人来找翦伯赞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他们一再追问刘少奇的问题，翦伯赞再三回答“记不起来了”。

第 1058 回：又发生，翦伯赞夫妇自杀
起因是，当年国共谈判事
专案组要翦伯赞交代刘少奇的什么问题呢？

时间要回溯到近一个月前的 1968 年 11 月 22 日下午，负责历史系专案工作的驻历史系工宣队李杰，突然把 65 级学生王渊涛和 64 级的胡敬梁召到设在 38 斋一楼的办公室，说中央专案组要提审翦伯赞，派他们二人去配合工作，并让他们马上到小东门去等中央专案组。以后有什么情况，直接向工宣队李杰汇报。

王渊涛和胡敬梁立即赶到小东门。一会儿就看到开来一部小轿车，在门卫室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个军人，自我介绍是中央专案组的，叫巫中。王渊涛和胡敬梁告诉他：“我们是系工宣队派来配合你们工作的。”巫中请他们一同上车，带他们驶向翦伯赞所住的燕南园。

中央专案组的名头让王渊涛和胡敬梁两位学生感到敬畏和拘束，在车上没有与巫中和随他同来的另外一人交谈。

车子开到燕南园 64 号。谈话基本是在翦伯赞夫妇住的里间进行，主要是巫中和翦伯赞之间进行，涉及抗日战争爆发前，翦伯赞参与为国共两党谈判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以及相关联的一些人物，问到谌小岑、吕振羽等人。

原来，翦伯赞 1926 年加入国民党，1929 年认识了国民党元老覃振。二人是小同乡，自认识后关系十分密切。这时

候的覃振，正在北平参加以阎锡山、汪精卫为首的“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然而不久即告失败。此后不久，他又南下广州参加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动的反蒋活动，同样不久也告失败。在覃振北上南下的全过程中，翦伯赞都作为他的随员，和他一起参加了这些反蒋活动。在这些反蒋活动连遭失败后，翦伯赞便蛰居天津、北平等地，和他的同乡旧友谌小岑、吕振羽共同编印《丰台》杂志，由于刊出的多是反蒋言论，不久即被迫停刊。此时，他还和吕振羽共同撰写和编译了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一些论文和专著。

1933年，覃振改变了他的反蒋立场，做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翦伯赞也到南京做了覃振的秘书。

当翦伯赞做了覃振的秘书而移居南京之后，他的同乡谌小岑也受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时任浙江省建设厅长的曾养甫邀请，到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任秘书。其后曾养甫调任铁道部政务次长，谌小岑也随同他到铁道部劳工科任科长。在此之前，谌小岑曾是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成员，代号为41。后来，谌小岑又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指导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等职。1936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兼民众训练科科长。



谌小岑(后排左1)与觉悟社成员合影

1935年11月上旬的一天，谌小岑来到翦伯赞家，说是受曾养甫的委托，要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作为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在国共两党打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之际竟敢与共产党联系，莫非是吃了豹子胆了？

原来，自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于1935年6月，通过“何梅协定”，迫使中国军队自平津、河北撤出。当年秋季又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冬初，日军向华北大量调兵，同时又策动汉奸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而1935年底的华北事变更是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国民政府内引起极大震动。蒋介石认识到，中日战争已无

法避免。他希望能得到大国特别是邻国苏联的支持，为此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又必须处理好中共问题。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字里行间，蒋介石看出，共产党的政策有了重大转变，他想以此为契机，看能否通过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

于是，1935年11月，国民党派陈立夫和张冲更名改姓来到德国，等候蒋介石的进一步指示。同时，蒋介石委派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直接与在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王明谈判。

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通过原国民党参议员、《中央日报》副主笔、福建《民国日报》社长、此时因“十九路军福建事变”避难苏联的《救国时报》主编胡秋原引见，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胡秋原的住所见了面。邓文仪向潘汉年表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领导人王明商讨联合抗日问题，希望能与王明面谈。数日之后，邓文仪同王明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联合抗日，至于联合的条件、形式等问题，应在国内通过谈判解决。王明还特别提出建议：蒋介石应派代表到陕北直接会见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并将他写给毛泽东等人的亲笔信交邓文仪带回国内面交。同时，受王明委托，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致信蒋介石，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

入苏区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此信件也由邓文仪转交。邓文仪回到大使馆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与共产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

正当邓文仪庆幸自己顺利完成任务之时，突然接到国内来电，命他立即停止与王明接触，转道德国，会同陈立夫、张冲听候命令。邓文仪无奈，只得向王明表示歉意并辞行。王明非常愤怒，大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他连续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指责蒋介石是“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

原来，蒋介石派陈立夫这样高级别官员赴苏谈判的消息被日本方面知悉，日方发出警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原有计划。另外，蒋介石在邓文仪与王明谈判的同时，还曾试图通过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要求中共向蒋介石“投诚”，遭到苏联婉言拒绝。第三，蒋介石此时还通过其他途径，与国内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已经接上了关系。这一行动也是在 1935 年底开始的，策划者也是陈立夫，还有宋子文。

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与陈立夫关系密切。当他得知陈立夫准备和共产党谈判又苦于无法联系的时候，便承担起寻找共产党的任务。因为曾养甫知道自己的老同学，此时的下属的谌小岑早年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交往颇深，因此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谌小

岑。

其实此时谌小岑与周恩来的那层旧关系已绝对无法利用了，所以当他接受了曾养甫交付的任务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同乡好友，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覃振副院长秘书的翦伯赞，于是便来到翦伯赞家中。

翦伯赞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位与他很要好的同乡前辈，这时却正因为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而被关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狱中。其人名叫董维健，曾在美国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做过湖南省的教育厅长。当翦伯赞听了谌小岑说明来意后，首先就提议最好把董维健释放出来，由他承担这一奔走联系的任务。在取得曾养甫的同意后，谌小岑与翦伯赞一同去狱中探视了董维健，董维健表示愿意承担此事。但当曾养甫向陈立夫请示时，陈立夫却不肯释放董维健。

董维健不能出狱，翦伯赞又提议写信把他们二人的同乡旧友、时任北平中国大学历史教授的吕振羽邀往南京。因为那时的吕振羽已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即使他本人不是共产党，在他周围肯定有共产党员学生。

谌小岑立即写信给吕振羽。他在信中用了很多笔墨回顾了二人之间的友情，并说明自己在政府中任职实乃生活所迫。信的最后说到正题，大意是，“近年以来，东临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可齐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希望吕能到南京面谈。”

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刻转给时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周小舟。周小舟又将情况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

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应邀来到南京，开始就住在翦伯赞的家里。

经谌小岑引见，吕振羽与曾养甫会见。曾养甫向吕振羽表明，同共产党谈判以便联苏抗日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决策，希望吕振羽能帮助当局找到共产党领导人。

根据吕振羽的报告，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达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进行谈判。而在周小舟的背后更高级的指导者，则是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为陶尚行。

周小舟与曾养甫的谈判并不顺利，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民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中共军队接受改编。从1月到6月，双方进行了三轮谈判。到1936年秋，终因分歧太大而终止。1936年3月，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曾养甫与周小舟谈判艰难进行之时，曾养甫还筹划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他请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出面物色一名赴陕北的信使。左恭推荐当时化名黄华表的张子华担当此任。张子华曾担任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临时中央被破坏后，他仍留在上海

坚持秘密工作。这样，张子华就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使者前往陕北。临行前，曾养甫再三嘱咐，此行乃绝密行动，务必谨慎。

与此同时，位于上海爱文义路、梅白格路口，今北京西路、新昌路口的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也受宋子文、宋庆龄兄妹委托，携带密信和宋庆龄交给红军的云南白药等急需药品，踏上了西行赴陕北之路。董健吾是中共临时中央成员，曾冒险收留毛泽东遗失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党组织遭破坏后，他以牧师的身份结交了笃信基督教的宋子文母亲。

因天气恶劣，张子华和董健吾二人恰巧同时滞留西安。他们分别来到张学良官邸，请求张学良提供援助。张子华、董健吾原本是同志，十分熟悉。此时不期而遇，惊异之余，只好装作互不相识。在张学良“介绍”之下，互相寒暄，如同演戏一般。1936年2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乘坐张学良提供的飞机前往陕北，同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然，二人都不知对方此行的目的。

张子华单独向在瓦窑堡留守的博古作了汇报，又赶赴前线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汇报。董健吾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相关情况。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前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联络、谈判问题。从此张子华数次往返于国共两党之间，传递信息。经过半年左右的沟通，中

共中央确信国民党对谈判颇有诚意，遂决定派由莫斯科回国的潘汉年前往上海。

1936 年 11 月初，就在周小舟与曾养甫在南京的谈判终止之后，中共正式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陈立夫开始了首次会谈。潘汉年提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要求是：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不得打乱红军的现有指挥系统；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选举产生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条件下，苏区取消；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可选派代表参加该机关，但同时承认，国民党将在该机关中占主导地位。从以上所列条件看，共产党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但是，蒋介石却把共产党的诚意看作示弱，他令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令共产党难以接受的条件：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共产党目前可保留 3000 人的军队，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政治上各点都好办。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就是要整个地收编红军，这理所当然地为中共中央所拒绝。12 月初，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明确指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线，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绝对

不做无原则让步。

正当两党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从此，国共谈判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过程看，翦伯赞只是在初期起了个推荐和接待的作用，自吕振羽与曾养甫接触后，国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就是吕振羽和谌小岑，而翦伯赞其实已是一个局外人了。

第 1059 回：闻死讯，毛泽东掉下眼泪

说刘、张，调整四川革委会

1968 年 11 月 28 日，巫中与他们组的几个人第二次来北大历史系，向驻北大宣传队指挥部斗批改组及驻历史系宣传队的负责人，介绍了“刘少奇在 1936 年以谈判做幌子进行与特务勾结的情况”，以及翦伯赞在其中的活动情况。

之后，巫中又来北大几次，但翦伯赞始终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12 月初，巫中让王渊涛和胡敬梁两位学生去查看翦伯赞的档案，看能否从中找到突破口。

一天下午，王渊涛和胡敬梁来到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大桌子上，翦伯赞的档案已摊开一桌，份数挺多，也很零乱。突然，其中一张普通信纸写的只有一张纸的信件引起了王渊涛注意。

这封信是建国后肃反时写给北京大学的，没有信封，因此不知具体收信单位。写信人是女性，她当时在陕西省某单位工作。信的内容主要是：她是江浙一带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是个青年，出于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仰慕，到南京向翦求教，住入翦家，翦指导她学历史，并告诉她，自己正在为国共两党代表的谈判牵线搭桥，国民党方面出面的是曾养甫，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周小舟，还有吕振羽。她还在翦家见过参加谈判的周小舟，皮肤很黑很粗糙……

王渊涛将这封信仔细看了两遍，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他

迟疑了一会，把信拿给胡敬梁看，他们一致认为，这也许正是巫中他们所需要的材料。

等到巫中再次来北大时，王渊涛和胡敬梁二人向他汇报了这封信。巫中看后如获至宝，把信带回专案组翻拍了数份。

12月15日，巫中再来北大，给王渊涛和胡敬梁看了翻拍件，然后就去找翦伯赞。

这次巫中态度强硬，虽然没有直接出示信件给翦伯赞看，但点了写信者姓名，要翦伯赞写出材料。然后和两位学生一齐到历史系工宣队，要求对翦伯赞进行隔离监护。但是巫中走后，系工宣队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监护措施。

再说翦伯赞这边，他在巫中他们走后，与夫人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

第二天，即12月16日，翦伯赞拿出笔和纸想写字。他握住钢笔在纸上画了几下，不出水，拧开一挤又没水，他叹口气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旁边有人听见后批评他说：“天天批判你的唯心主义，你还在搞唯心主义！”翦伯赞没有吭声，旁人又说：“你说你不迷信的，你怎么又迷信起来了？”

翦伯赞答道：“我是不迷信的。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信了。”

在场的谁也没有对翦伯赞说这句话引起警觉。

这天下午，按巫中的要求，王渊涛和胡敬梁去翦伯赞家

取交代材料，看到他用红格稿纸写了两张多，约千把字，写得很认真。可一看内容，不禁暗暗吃惊。对于政治方面，翦伯赞没有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对那个写信的女子，却写得很详细，并承认：自己当时年轻荒唐，和她有不正当关系，后来她结婚成家，就断了来往。

两位学生看完材料，就准备带着材料离开。翦伯赞随他们来到走廊，拿一盒快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盒，抽出一支点起来，和他们说：“和工宣队讲一下，给我增加点生活费，我烟抽完了也没钱买。不过我也想戒烟算了。”

学生宽慰他说：“会的，毛主席都讲了要给你出路，工宣队应该很快会落实的。”

当晚，翦伯赞向管理人员提出，他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晚的用量，而负责守护翦伯赞饮食睡眠的那个工人并没有监看翦伯赞服下。

从 15 日以后，翦伯赞与夫人都是默默无言地相对而坐。

12 月 17 日下午，巫中他们又来北大。王渊涛和胡敬梁把翦伯赞的交代材料交给了巫中，他看后极不满意，于是王渊涛和胡敬梁又陪同他们来到翦伯赞家。

因为巫手中有旁证的材料证明翦伯赞参与了国共两党代表谈判的联络工作，因此巫中说：“你不要认为一手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

翦伯赞伸出手说：“我的手就这么大，怎么能掩盖天下

人的耳目？”

双方僵持一会儿后，专案组的人让翦伯赞好好想想，把问题交代清楚，他们第二天还会再来。并且强调，如果交代不清楚，是要坐牢的。

这天下午的审问时间拖延很久，气氛紧张。

这天，天气极为寒冷。第二天凌晨，就发生了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身亡的事情。

学校保卫组组长不敢怠慢，亲自将翦伯赞口袋里的两张纸条送到宣传队总指挥部，拍照留底。然后又回到现场，同保卫组的人继续勘查。这时，中央专案组的巫中等人又来了，保卫组没有让他们进屋，叫他们直接去找宣传队总指挥部。接着，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也来了。

当天下午，翦伯赞夫妻的遗体送到北医三院地下解剖室，由北京市公安局赵法医主刀，对翦伯赞的遗体做了全身解剖，有关部位做了切片、取液等；对戴淑婉的遗体做了局部解剖，只取了部分胃液。肉眼发现两遗体的胃里均有尚未溶解完的进口速可眠胶囊。法医的最后结论是：翦伯赞、戴淑婉夫妻均为速可眠中毒死亡。

12月19日上午，北大保卫组组长手持学校宣传队总指挥部的介绍信，亲自到北京医院调查毒源。北京医院院部的负责人说：翦伯赞的病历，依照有关规定，属保密范围，非经特批，不准查阅。保卫组组长又立即赶到北京市委吴德

办公室汇报情况。吴德的秘书立即打电话给北京医院院长说明了情况。当北大保卫组组长再次赶回北京医院时，北京医院已把翦伯赞的病历摆在桌子上了。在医院专人帮助协助下，他们把医生开的处方和翦伯赞派人去取药的时间，一一排列出来，发现进口速可眠胶囊按间隔日期，依照规定数量，每次付给 20 粒，多年以来，没有变化。

回到北大后，保卫组组长又询问了平时为翦伯赞取药的历史系值班学生王渊涛和胡敬梁，二人说：“翦伯赞夫妻都是委托我们到北京医院给他取药。每次都有速可眠胶囊。有一次，我们还对翦伯赞开玩笑说：‘您可别一次吃了。’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不想死，要活着报恩毛主席、周总理啊！’”

对翦伯赞的自杀，北大宣传队指挥部深感事情重大，18 日当晚即将情况一边整理一边打印，于第二天，19 日上午 8 时，按规定将“翦伯赞自杀身亡”的简报派摩托车送往北京市革委会。

就在北大指挥部送报告的摩托刚刚发动的时候，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迟群突然来了。他走了不到一个小时，谢富治打来电话，叫走了在北大宣传队负总责的 63 军副军长。当这位副军长见到谢富治时，被他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糟了！”

原来，毛泽东听到翦伯赞自杀的消息，极为震怒。给翦

伯赞“出路”不是出自同乡情谊，也不是只针对翦伯赞一个人，而是要通过这个典型，给整个知识分子以“出路”。

毛泽东把谢富治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在场的周恩来也训斥了谢富治。

大约过了一周左右的一天上午，历史系工宣队通知王渊涛和胡敬梁去哲学楼开会。当他们二人到了那里，看见大房间里坐了很多人，学校工宣队的副总指挥魏秀如首先传达中央关于翦伯赞自杀事件的会议精神，然后会议的主持人汪东兴和谢富治，十分严厉地批评中央专案组的巫中说：“你们刘王专案组犯过不少错误，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

他们让巫中站起来，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

巫中说，北大的两个学生也搞了逼供。汪东兴和谢富治说：“学生也要做检查。”

开完会，王渊涛和胡敬梁回到38斋的宿舍，由胡敬梁执笔写了一份检查，王渊涛看过后签了名字，一起去哲学楼交给校工宣队，算过关了。

正在清华大学负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员谢静宜接到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给打来的电话，让她回来一下，说“主席有事找。”

谢静宜回到中南海，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她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

说到这里，毛泽东掉下眼泪，说不下去了……

停了一会，毛泽东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

稍许，他又对谢静宜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

沉默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 8341 还得派一部分人去北大啊！”

迟群、谢静宜等人来到北大召开教授座谈会，哲学系冯定教授在座谈会上说：

“不管天气多冷，都把人叫去批斗。他们一喊我的名字，我就吓得胆战心惊。预先穿好厚厚的棉袄、棉裤，因为一去挨批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免得挨冻。”

他又接着苦笑着说：“去之前，我有尿没尿都去尿，有屎没屎都去拉，免得一害怕，吓出尿来。”

冯定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冯友兰教授，用手指着他说：“你问他，他原来是大胡子，”说着用手比了一下，表示胡子有多长，接着说：“为什么把胡子刮去了？你说呀！”

冯友兰有点口吃地说：“因为每次批斗时，总有个别人揪我的胡子，我很害怕，从此以后嘛，就把胡子刮去了，不再留了，免得多受苦……”

谢静宜他们回到清华后，把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的发言向毛泽东如实汇报。毛泽东听了很是生气地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

后来当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毛泽东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他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 150 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

毛泽东还曾非常关心地问：“梁思成在哪里？”

原来，梁思成被从原来住的小楼里赶了出来，搬到两间平房里，阳光被前面一座高房子挡住。更严重的是，他的工资被“停发了。

梁思成在家中对来访的谢静宜说：“我有心脏病需要躺着，可是又有肺气肿需要坐着，很是矛盾。我体质很弱，自己系个鞋带之后，气喘得就像刚跑完百米赛一样。”又接着说：“我要感谢林洙了，多亏她帮助我。”

林洙是梁思成的夫人。

毛泽东听了谢静宜当面向他汇报的梁思成原话后，很是

不安，马上指示恢复梁思成的工资、搬回原处、送最好的医院治疗。并说：“不要让梁思成他们上台受批判了。批判旧教育制度，他们可以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批判，共同受教育嘛。”

我们再说一下此时的四川。

1968年12月的一天，成都军区的大门前，突然来了一汽车“兵团”组织的人，他们从车上卸下来沙袋在成都军区的大门外码成掩体，又支上防雨棚，然后就在沙袋上架起了机枪，枪口对着外面。

军区门口的警卫好奇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兵团”的人告诉警卫：“据‘红成’高层内部透露出的绝密消息，‘红成’准备在12月20日9点冲击成都军区，武装揪斗刘、张首长。”

这时，大街上已经到处是“兵团”和“八二六”的标语和大字报，揭露这个惊天的秘密，强烈谴责“红成”的罪行，表示要“坚决保卫成都军区、保卫刘张首长”，并告诉“成都革命群众注意事态发展，避免发生误伤”……

“红成”则竭力辟谣，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完全是“驴”“狗”造谣……

成都军区大门的警卫赶紧进去报告，军区领导紧急开会讨论，结果是“立即电报请示周总理”。

周恩来在电话里讲了对“红成”的三点意见，并要求成

都军区立即传达给“红成”。

住在军区里的刘结挺、张西挺听到了周恩来的三点指示，立即透露给“兵团”、“八二六”，于是满大街又突然贴满了“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不过有的是三点，有的是五点，而且这里的三点和那里的三点又有差别，也就是说“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霎时间出现了不少的版本，让人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那“红成”本来就对成都军区保护刘结挺、张西挺很有意见，多次想揪他们出来批斗，都是军区一直阻拦，这次又送来了电话记录的“周总理对红成的指示”，立即产生了三点怀疑：

一是“武装揪斗刘、张是‘兵团’、‘八二六’造的谣，周总理怎么会做这样的指示？”

二是“周总理的指示怎么和成都军区一贯的口气一样？”

三是“周总理给我们的指示，怎么比大字报还晚？”

怀疑的结果是：“周总理的指示是假的，是成都军区编造的。”

于是“红成”发起了反击，大街小巷到处是“红成”的大字报、大标语，内容就是一个：“周总理的指示是谣言”。

12月5日至12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

都军区党委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除了群众，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党委在《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提出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和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12月20日一过，“兵团”从成都军区门口撤退了，满大街的大字报都在宣传“由于我们揭穿了红成的阴谋，使他们不敢再动手了”。

12月2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党委提交的两个报告做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第 1060 回：止“左”难，云南搞“划线站队”

说浙江，总政治部被军管

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稿是姚文元12月17日报送毛泽东的。其中的第二条写道：

“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

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通知稿》第四条写道：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

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但是，各地、各单位在“清队”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宁“左”勿右。以云南为例：

1968年8月以后，云南省革委会在全省发动以“划线站队”为主要内容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划线站队”是“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简称。具体说就是以对前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的态度来划清云南文革中的“路线是非”。凡是打倒赵健民的，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站合”了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保赵健民的，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站错了队的资产阶级保皇派。

“站合”是云南古语“对”的意思。如此一来，云南“823派”是反对赵健民的，当然就是正确的，站合了队。而“炮派”保赵健民，当然也就站错了队，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1月18日，云南省公检法学习班正式开学。在这次学习班中，通过审查和“划线站队”，查出站错队的528人；被批斗的219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4人；犯有各种政治错误的25人；犯有严重错误的5人；受团纪或行政处分的10人；逮捕的3人；清除出党的25人；留党察看的24人；取消或延长预备期限的18人；按敌我矛盾审查的64人。

在审查过程中：被打伤的60多人；疯癫的9人；自杀的8人。

11月24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根据省革委决定，

开办省级机关学习班。12月12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739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169人；处级干部253人；一般干部169人。其中有：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郭超、薛滔、吴作民，原副省长刘披云，原省革委常委、委员张恩璞、张兴华、李文进、刘鑫、吴生敏、鲁大洲、何正廷。

在这次学习班中：有37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分子；有22人被开除党籍；有3人被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有17人被监护；1人被拘留；1人逮捕。

12月14日至20日，省、市革委第六次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揭开云南阶级斗争的盖子，继续深入对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的大批判，从组织上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划线站队”运动在云南全省全面展开。

12月29日，玉溪地区召开大型批斗会，400多名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跪满台上。据统计：全地区揪斗干部、群众27900多人，打伤致残1700多人，打死1089人。

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红河洲所属13个县市，12个州属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分清路线是非，共批斗了54324人，占全洲总人口的2.3%。其中，属敌我矛盾性质的23408人；叛徒439人；特务900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326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007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5人。到1969年9月底，全州批斗的人数上升到62397人。

1969年1月1日至15日，云南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

清查的重点事件有：

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滇西挺进纵队；

滇东北游击队；

摧资兵团；

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结合事件批判的重点人物有：阎红彦、陈康、赵健民、张力雄、林亮、候良辅等。

这次会议选举了出席九大的代表。选举中，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康落选。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云南省革委，指出：“云南省的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毛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赏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于是，陈康当选为九大代表。

云南省革委会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一案，批判“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云南的“二月逆流”翻案风，以支持或反对赵健民层层划线，把“炮”派组织划为错

误路线的代表。在这次全会上，再次宣传介绍 8 月 15 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抓反革命”、“捅马蜂窝”等经验，使“划线站队”的斗争更加残暴、疯狂。在“划线站队”期间，昆明市党政机关干部被强迫集中在北郊的冶金工业学校办学习班，学习人员如同置身监狱，完全失去自由。

1969 年 1 月 18 日，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823”的刘殷农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追查“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问题。在大会上，为迎接革委会委员回单位传达省革委会七次全会精神，参加斗批改，强迫参加“昆明市党政机关干部学习班”的 200 多名站错队干部戴高帽、挂黑牌、跪地请罪迎接。接着学习班按照七次全会布置，以 20 个问题作为划线依据，凡是参加过“炮”派组织的“摧资兵团”、“干部联络站”的干部都被划到错误路线一边，确定为被清理的对象，包括以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为代表的“混进地下党的坏人”，以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以及有被国民党逮捕、关押过等历史问题的干部。在学习班 1721 名干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 419 人，占 24.3%，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九种人的 127 人，占 8.29%，其中部局长以上被列为重点和专政对象的 124 人，占这一级干部的 75%。在被审查对象中，

1人被逼死，近百人被打伤。1969年4月1日，市级机关五七干校在官渡区小哨畜牧场开学。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1000余人集中到干校学习，主要学习任务是继续搞“划线站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以后又在干校举办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学习班。原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被定为“变节分子”、“三反分子”，市委书记处书记朱作欣被定为“叛徒”。在长达两年的“划线站队”中，全市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4163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1486人，被打伤致残的9708人，涉及全市的冤假案758起10373人，错案1213起2075人。

“划线站队”给云南全省造成极大的伤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很长的时期内，派性仇恨的对立，派性的明争暗斗以及拉帮结伙的现象，难以消除。同时“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又成为后来“清队”、“深挖516”、“一打三反”的依据，使“划线站队”的错误更加扩大。

1969年1月21日，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823”的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还说：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

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1月，滇南支左负责人到文山州的八个县作报告时说：“凡是军分区、军管会、人民武装部批准建立的革委会，都是赵健民在文山地区的代理机构，推行了武装夺权的一部分，要一律推倒重新建立。”

“文山把崔正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度人（军分区政委）揪出来，红线、黑线就清楚了。”

“今天会后要行动起来。群众要注意，革委会要注意，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可以。打，可以。但不要把他们打死。”

“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

3月，文山州革委会主办了《文山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派出大批“35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群众专政小组”，到工矿企业、农村捅马蜂窝。

文山州八个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打倒的有两个县；被打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6个县。有62568人被捆绑毒打；5624人受伤致残；534人被打死逼死；19000多人被立案审查；7664人被定为“九种人”；5252人被判刑；

其中，死刑 268 人（实际杀掉 6 人）；死缓刑 124 人；无期徒刑 188 人；有期徒刑 1600 人；监外执行 3072 人。

1969 年上半年，滇东北的 20 多个县、市、区和一些省直属单位，开展以清查“滇东北游击军”为主体的运动。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东游案牵连被审查的干部群众 60 万人，仅曲靖就有 293193 人，其中 2 万多人被批斗，2000 多人被关押，4000 多人被打伤，2000 多人被打残，200 多人被逼死，100 多人被打死。

1968 年过去了，动乱仍在继续。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降为 2015.3 亿元，在 1967 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 4.2%，只为 1966 年的 86.6%。其中，农业总产值为 6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为 1966 年的 99%。工业总产值 1380.3 亿元，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5%，只为 1966 年的 81.8%。

1969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为解决浙江驻军在支左过程中的对立问题约许世友谈话。随后要汪东兴转告周恩来和康生，让他们当晚再约许世友谈，落实解决浙江问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当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已经和许世友拟定了一个 11 人名单，准备 5 日或 6 日接他们来京开会，解决浙江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

1 月 8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部

队 20 军、空 5 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即使吵一架，最后还是要团结起来。为了减少矛盾，20 军、空 5 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毛泽东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20 军、空 5 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对此做了说明。

1 月 8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即后来浙江所说的“一月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 12 人出席。参加这次会议的南京军区负责人有许世友、杜平、钱钧，浙江省有省领导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和省军区领导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还有南京军区派驻浙江的调查组组长陈德先共 10 人。

1 月 29 日晚上 19 时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最后一次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与会人员围坐在一圈沙发上，周恩来主持会议。浙江到会的 10 人，每人都发了言，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态度，会场气氛显得十分严肃。

会议结束，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陈德先、罗晴涛等人被留在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南萍、陈丽韫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几天后，南京军区学习班负责人廖容标到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问他：“浙江的几位同志在那里情绪怎么样？你们多

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顾全大局，做点自我批评就算了。”

浙江省军区的几位领导干部做了检查，总算顺利地过了关。那年“五一”节，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他们登上天安门，在第一观礼台观看焰火晚会。然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对“二月逆流”的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对下不公布老同志们的名字”。

中央通知下发9天后，张春桥在给中央的“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他说：陈毅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有个领导干部，只在单位小组会上通了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

此后，“二月逆流”问题扩大了传达范围。

1968年11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工作记事本上这样写着：“目前在揭发‘二月逆流’。从现在起，对聂荣臻的生活不能再让他特殊化了。因为他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

一般来说，工作人员对首长都是比较有感情的，否则早就换走了。但是在当时的革命大环境下，每个人都在写揭发

批判材料。公务员不愿意为首长洗衣服、搞卫生了，厨师则几乎顿顿炒白菜再加一小碟腊肉以表示和服务对象划清界限，工作人员接连开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会。

聂荣臻的家庭人口少，女儿女婿在上班，只有星期天才匆匆回家。平时只有老伴张瑞华陪伴聂荣臻左右，常给以安慰。但老俩口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最令人难堪的是，年仅5岁的小孙女，平时天真活泼，常在跟前嬉闹。可此刻，因为跟阿姨参加工作人员的批判会，于是也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常用困惑的眼神看自己的爷爷奶奶。聂荣臻孤独苦闷，又值大病初愈。要写检讨，找不到需要的参考材料，除了老伴，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人。

12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办事组转报的《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最近思想情绪表现》的材料上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李广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内有批语，请黄永胜同志办理。”毛泽东的批语是：“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当天，林彪在毛泽东这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要他们好好休息，不要制造新的障碍。”并派黄永胜、吴法宪到李富春等人的家中传达。

1月5日傍晚，黄永胜、吴法宪来到聂荣臻家，向他传

达了毛泽东和林彪的批示。

聂荣臻与在他办公室工作了 10 年左右的 3 位老秘书谈话。他说：

“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你们都还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锻炼提高你们的能力。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我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秘书们很激动，忍不住潸然泪下。

1969 年 1 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会议期间，中央把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部分人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组织人员四处做工作，动员把“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来，坚持只“炮轰”不打倒。

1968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负责西北工业大学支左军训工作的 21 军副军长刘江亭突然接到命令：立即赴京参加总政军管工作。北京派来的一架小型飞机已抵西安接刘江亭。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他什么都来不及带即匆忙上了飞机。

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任命

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当时中央要兰州军区派一位副军级干部去总政，本来是要 21 军副政委梁济民去的，后经 21 军军长胡炜找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商量，换为刘江亭。

军管小组成员共 8 人，王宏坤挂帅，刘江亭负责具体工作，其他 6 人来自各大军区，一名是师级，其余均为团级。小组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是海军来的。这个“军管小组”只管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任务是：

- 一、实现和促进归口大联合；
- 二、清理阶级队伍；
- 三、进行整党；
- 四、抓革命大批判。

总政的“军管小组”进驻总政不久，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组长王宏坤叫副组长刘江亭讲，刘江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 1、总政的“社会状况”，即人员构成情况；
- 2、总政的案件；
- 3、总政的群众思想反映。

总政“军管小组”开始住总政机关，1969 年 1 月搬到了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借住和工作。原总政机关的人员除被关押者外，也都集中到这里，包括文工团也搬到了这里。

1969 年 1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总政问题。

吴法宪当晚对军管小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总政看成是坏的，只要领导工作做得好，和清华一样，以后也会赶上去的。林彪接着说：总政都是部队选拔的尖子，不能一锅砸。

第 1061 回：山西乱，再招晋头头进京

细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

1968 年 8 月 10 日，山西省革委会发表公告，称：“1967 年 9 月 5 日在省革命委员会驻地发生的‘九·五’事件，不应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现决定给‘红联站’平反；省革命委员会就此事件发表的‘九条’及两个通告，一并予以撤销，特此公告。”

自 2 月开始在北京举办的山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终于在 9 月底结束了，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们，在学习班里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山西各地也纷纷在 69 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开始了大联合。69 军的各级指战员，渐渐走上了山西各级政权的领导岗位。从 1968 年下半年开始，山西省革委常委会议和省革委主任办公会议就完全由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代替了。之前这些会都在迎泽宾馆召开，由于派性闹得厉害，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决定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主要领导集中办公。办公和开会的地点搬到并州饭店南楼，这是原来山西接待外宾的地方。一般食宿都在这里，核心小组成员集体活动，个人不得接待造反派，接待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必须集体参加。

山西的三大派造反组织名义上倒旗实现大联合了，实际上争斗从未停息。“红总站”的头头脑脑们常常在刘格平家中聚会，刘格平的夫人丁磊也从没有停止和“红总站”头头

们的接触。“红联站”的头头们则常与张日清取得联系，张日清说起山西的“土太阳”刘格平，依旧怒气冲冲，怎么看也不顺眼。至于“兵团”与袁振的接触，自然更未间断。当69军军长谢振华在北京忙着做工作，让三大派的头头们统统倒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在省城太原，省革命委员会也在谢振华的安排下，开始按伟大领袖的指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进驻大专院校。

而就在此时，1969年元月5日，山西杨成效带着他的“决死兵团”在五一广场集会誓师，以“太原工人”名义散发了一份《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誓师宣言》，当时被称为《一五宣言》。

《一五宣言》称69军自支左以来，支一派压一派，以大联合为名，吃掉了革命的组织，大联合后成立的各级“大联委”，实际上成了69军与“兵团”的家天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被他们残酷地迫害、疯狂地镇压、无情地扼杀了！”

《一五宣言》号召：“彻底批判反动的二月逆流”、“坚决揪出二月逆流在山西的代理人”、“砸烂镇压造反派的‘对等掌权’”，“誓与反动的二月逆流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血战到底”。

《一五宣言》还呼吁山西的工人阶级再次起来造反、夺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69军和军长

谢振华，则称之为“刘少奇黑的爪牙、杨成武的黑干将、卫、王、王的死党、刘、陈、刘的同伙”。

已经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太钢公司、第十三冶金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铁路系统以及远在晋南的中条山有色公司、第十二冶金公司等大型企业原“红总站”派的部分负责人，于是重拉队伍，另立门户，打出的旗号五花八门：

“太原工人”

“山西工人”

“产业工人”

“铁路工人”

“冶金工人”等等。

而且，杨成效等组织几万人上街游行，进驻并查封《山西日报》。

与此同时，山西的其他两派：原“兵团”和“红联站”的组织，也纷纷成立所谓“护厂队”、“护校队”，摆出一副“保卫红色政权”的架势。

1月7日，山西大学“8·14”派的师生，也发表了与《一五宣言》一个调门的《一七宣言》，宣布脱离驻校工宣队的领导，要重新杀向社会。

在太原工学院，也有“永红”一派的师生们做出了如此行动，以响应杨成效“决死兵团”的《一五宣言》。

1月12日，杨成效又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庆祝山西“112夺权”胜利两周年。游行队伍还冲进省革委，在省革委会大院里也游了一圈。

以此开头，山西各地又出现了工人、学生上街游行，以及冲击解放军驻地，抢夺枪支的行为。

1月30日22时23分至31日凌晨3时40分，周恩来接见出席冶金工业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山西第十二、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代表时，针对山西的情况说：

“山西夺权是第二名，紧接上海‘一月风暴’。现在是落后了，落后了就要赶上去。”

他要求山西两派搞“五不协议”：“不动气；不动口吵架；握手不动手；不带枪；不动枪。要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教导的‘五不’去执行。”

周恩来重申：“你说他保，他说你保，我都不管。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团结。”“两派不管什么派，反正我看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他当面指示杨成效等人，必须放行被拦截在十三冶给西山地区运送粮食的一百余辆汽车，要求占领设在榆次525军用仓库的“一把火”组织必须撤出去。

2月2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迎芒果大会。毛泽东将芒果赠给驻北大和清华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两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敢独享，又将它们分赠给各省进驻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当地人民。

那一天，到会的太原各界群众没有打出原先三大派的派旗。但是也有些工人队伍打着“冶金工人”、“钢铁工人”、“煤矿工人”、“电业工人”等旗子来到了会场外，要向会场里冲。而一些会场里的工人队伍也主动配合，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旗子里外呼应。原来，这是“红总站”总指挥郝庭云、核心人物黄锐庵同“决死兵团”司令杨成效策划的。你69军不是说要听中央的话，不准再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了吗？我们这一回打出的旗帜是系统的工人队伍，看你能说什么？随后，这些队伍又拉起了“热烈庆祝山西省1·12夺权胜利两周年”的大横幅，还散发《一五宣言》传单。更糟糕的是，杨成效麾下的游行队伍中，还抬着两具在一次武斗中死亡的尸体。

由69军的军长和政委一起精心组织，原本是想让省城人民群众迎接芒果的大会，终于被“红总站”的头头郝庭云、黄锐庵，伙同“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成效带着人马，以庆祝1·12夺权两周年为名的大游行给冲垮了。

面对“红总站”和“决死纵队”的挑战，“兵团”与“红联站”决心还击到底。各地的武斗再次出现高潮。全省范围内的停工停产此起彼伏。各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屡有发生。

当时，国务院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军工战线会议和冶金战线会议。2月16日，周恩来、江青、康生一道接见了参加这两个会的山西代表，同时接见的还有被叫到北京的山西军工

系统和冶金系统的一些群众组织头头。杨成效也在其中。

周恩来主持接见，开门见山说：

“冶金会议开了半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以后，其他单位都回去了，就留下山西的四个单位，十三冶、十二冶、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太原钢铁公司。还有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

“为什么把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山西在今年一月份又出现分裂了。原本是联合的，成立革委会了，当然还是不完善。有些单位，还需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根据真正平等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改组革委会，或者补台或者调整，这个原则对全国来说都是适用的。在你们那儿，也同样适用。……现在，太原，晋中，晋南的侯马、临汾，还是需要先把拖出来的，杀出来的，或者是赶出来的请回来，把这种形势改变过来。不能再分裂了。”

接着，周恩来、康生先后批评参加会议的杨成效。

周恩来对杨成效说：“你在学习班回去五次，康老很生气！”

康生说：“上次在解决山西问题的学习班上，你回去了五次。我赞成你回去，你回去吧！暴露给大家看一看，你杨成效是什么人？”“今年1月5号，杨成效还在那里拉队伍，还在那里发《宣言》，搞分裂，这是革命吗？杨成效同志，

你这个人我过去保过你，是不是保过？那时你是造卫、王、王的反，造陶鲁笳的反，那时我们保过你。因为当时另一派的矛头是对着革委会的，我保你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山西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山西的革命问题。现在是另一回事，要狠狠批评你。前年12月你从东北回来后，我看你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你要好好检查，你现在官做了，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据北京卫戍区反映，你在北京有好多杨公馆，杨成效公馆。”

杨成效反驳道：“没有。”

康生：“你不要说这个话，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周恩来插话：“任何单位来的人，只能在中央指定的学习班学习，你自己不能到处搞联络站，开旅馆，那不行。”

然后对杨成效说：“你要做好点！康老是谆谆教导你。”

江青说：“山西的主要问题是归口大联合，你们要和社会脱钩，每个厂自己搞自己的，听来听去，山西的基本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工人不搞生产，到处乱窜，这叫什么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山西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就是晋中有一条带子，这条带子的纽扣要自己解，不是说形势不那么好，就是晋中、晋南有个侯马，其他地方形势都是很好的。”

康生插话：“晋中，主要是太原。”

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说：“驻山西的军队同志要顾大

局，山西支左有些是有错误的，有的地方很好，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现在要拥政爱民。拥政，就是要拥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保卫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爱民，就是要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革命群众，不能只爱哪一派，什么‘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除了少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其他革命群众，你们都得爱，只爱哪一派都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屁股要坐得正一点，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一碗水要端平。……山西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最早的，现在落后了。……我们军队同志要好好检查一下支左工作，把春节拥政爱民工作搞好，把一碗水端平，把山西文化大革命搞好，把生产搞上去，赶上全国先进地区、先进工厂。”

随后，周恩来让参加会议的陈永贵、曹中南发言，他们做了自我批评。

接着周恩来说：“刚才陈永贵、曹中南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同志们应引起注意。他们都是革委会成员，他们都检查了自己有派性。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最近几个月，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陷入派性，被一派利用，对一派听得多了讲得多，亲一派，疏一派。我看那些材料都是一派的，把陈永贵的讲话夸大加以歪曲，支持自己这一派，挑动派性，这怎么行哪！革命委员会成员应

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按照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来执行，要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办事，不能另外成立一个中心，支持一派。这个自我批评很重要，我们欢迎他刚才的这种态度。刚才曹中南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也是讲的军队的态度。军队有时没有把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加深了两派对立。当然不是所有军队都是如此。领导上有这个倾向，下面就受影响。这两个同志的自我批评我们是欢迎的，希望他们回到革命委员会后，使核心小组加强团结，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听毛主席的话。”

当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的陈士法在会上说到自己要学习陈永贵时，周恩来说：

“学习红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刚才陈永贵同志讲了他自己有派性，你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从3月5日开始，先是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按时集中赴京报到，接着，省级机关两派观点的领导干部，加上按系统按行业列出两派观点的各级领导干部、有关人员也分批赴京报到。于是，全省凡是进入了各级红色政权的领导干部，和各个系统的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落地全部被召进了北京学习班。这回学习班简称“中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与上一回不一样，不是靠自己教育自己了，也不是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了。学习班的管理者和教育

者，是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而对这些管理者和教育者们进行管理和领导的，则是谢振华和 69 军党委。山西学习班的学员们，这一次可不比上一次了。上一次矛头对准了对立面，这一次呢，一个个全得斗自己的“私”，批自己的“修”，要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在 1968 年秋开始的清队整党过程中，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群众来信，揭发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

谢振华听到汇报后，立即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人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放过一个疑点。”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 3 人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 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说：

“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代表，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

调查组将调查的结果立即向谢振华作了汇报。谢振华当即召开支左领导小组会议。

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周恩来当即指示说：

“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恩来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12月，69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

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1969年，筹备“九大”期间，陈永贵作为“九大”代表候选人，主动找“九大”山西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负责人谢振华，交待了自己在抗战时期这段历史问题。

不久，周恩来陪外宾到大寨参观，谢振华当面向周恩来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九大”的问题。周恩来说：

“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

山西省委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

第 1062 回：看泉城，“四根油条”闹哄哄

攻潜校，与北海舰队纠纷

1968 年从 9 月到 12 月，山东临沂驻军 68 军 204 师各部队被冲击 56 次。济南军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 12 月 20 日把 68 军 204 师从临沂换防到青岛地区归属 67 军。同时调支持王效禹的 67 军 201 师到临沂归属 68 军。

12 月 26 日，周恩来就临沂、徐州问题打电话给王效禹：“临沂‘六大组织’告诉他们不要翘尾巴。一大派掌权，也要把其他组织联合起来。外出的人要接回来，把他们联合起来。”周恩来还谈了徐州两派联合情况。

王效禹在省革委常委会上传达周恩来讲话时说：“总理说了，山东的特点就是一大派掌权”，“徐州不能走临沂路子，临沂也不能走徐州路子”。

1969 年 1 月 11 日，周恩来接见驻徐州军队负责人。

1 月 22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解决徐海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严肃批评济南铁路局向中央递交的要求对铁路实行双重领导的报告，批评济南铁路局擅自停止青岛铁路分局革委会工作的决定。在谈到临沂问题时，周恩来说：“临沂被赶出去的革命群众决不是一人，至少是几百人，都要欢迎回来，团结起来。”

1 月 24 日上午 11 时许，山东临沂流浪苏北的“八大”群众回到郯城县莲五、孙堂一带时，临沂地革委会在军队的

配合下，组织临沂武装民兵师 2000 人围攻马陵山的“八大组织”，动用八二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步枪，双方武斗持续 5 小时 20 分钟，死 14 人，伤 20 多人。

1969 年 1 月 26 日，济南出了“四根油条事件”。

那天清晨，济南大明湖饭店店员在门前摆早点摊儿，炸油条，卖油条。济南市革委会常委常山林等人不排队乱挤加塞，与卖油条的马国莲为四根油条发生了争执。这位马国莲也不是善茬儿，双方对骂打了起来。常山林威胁要把马国莲从单位开除。马国莲自然不服，写了多封告状信。其中一封信落在韩派孟庆芝的手里，韩派大做文章，说马国莲这位女工是“反复旧”的代表人物。



当年大明湖畔的明湖饭店——1969 年“四根油条事件”现场

而在前一天的 1 月 25 日，青岛也出了大事：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调动“文攻武卫”人员武装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还包围海军高炮阵地和 4808 工厂。

一个月前，1968年12月29日，王效禹就向中央发了份状告北海舰队的电报，杨保华也于1969年1月3日，从青岛向中央发了份告北海舰队的电报。

由于与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的矛盾，北海舰队已从青岛多个支左单位撤出。但像捕捞公司这样少数在海上生产作业的单位，已由海军军管。

1969年1月11日，杨保华、鞠维信，调集数千棒子队员，攻打捕捞公司。数百人被打，军管会被砸，军管会主任孙福财，副主任黄宏远等人被打伤。抓捕了600多名船员，押到纺织疗养院办学习班。捕捞公司的海上生产全面瘫痪。

杨保华原想通过攻打捕捞公司，诱使北海舰队调部队干预，从而嫁祸海军制造武斗，逼中央改组北海舰队领导班子。没想到北海舰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反而将全部支左人员从捕捞公司撤出。捕捞公司成为一个刺猬，被杨保华捧在了手中。

杨保华攻打捕捞公司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又准备攻打4406工厂。

4406工厂是北海舰队下属军工企业，已经军管。厂内绝大多数职工的观点是支持北舰，反对杨保华的。全厂仅有一个7人的组织支持杨保华。

1969年1月20日，杨保华同这7人组织的负责人在市革委4楼房间研究策划了攻打4406工厂的计划。22日凌晨

4时多，数千名青岛“文攻武卫”人员冲进海军4406工厂，军管会成员被打并赶出工厂，抢走了一些枪支、弹药，档案文件也被抢。4406工厂全面瘫痪。

北海舰队还是没有派出一人，又把4406工厂的军管人员全部撤走。

这时，青岛的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正奉命向天津搬迁。这所在水兵训练团的基础上组建的潜艇士兵学校，校址原在青岛沙岭庄。文革时期，两派潜艇士兵学校也有两派群众组织，是“红色战校”和“红总”。“红总”支持王效禹，发展到后来，这个组织不到10人，长期在校外。1968年10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青岛的海军潜艇士兵学校，原学校领导机关搬迁到天津草坨子，组建“海军草坨子五七劳动学校”，学校教职员海军另行分配。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红总”的几名成员估计不可能留在青岛，前途莫测，于是向杨保华告急。他们向杨保华报告说：潜艇士兵学校正在向外转移材料，其中有很多是海军、北舰整理的关于王效禹、杨保华的黑材料，现在还有十几包未运走。杨保华听后大喜过望，认为把这些材料搞到手，就抓到了有力的证据。他决定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找到黑材料。

1969年1月22日，杨保华在居庸关路15号向“棒子队”副总指挥刘仲石布置，让他立即和“文攻武卫”联系，“抢出黑材料”。

“棒子队”负责人同海军潜艇士兵学校几个人研究后，察看了地形，制定了攻打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的计划。

1月24日约20时，“棒子队”在太平路总部召开紧急秘密会议。按照已经制定好的武斗计划，由市南、市北、台东的1000多名棒子队员，在市南“棒子队”副总指挥的指挥下，对4808工厂展开佯攻。同时十几部卡车组成巡逻队，在市南招摇过市，转移视线。

23时过后，6000多棒子队员分乘篷布卡车秘密集结到第三粮库等单位院内。

25日凌晨3时，“棒子队”在纺机召开紧急协调会议，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的几个人向他们介绍了校内的情况，刘仲石作了最后的布置。

7时15分，趁海军潜艇士兵学校早饭时机，攻打该校的武斗开始了。第一梯队乘卡车冲到校门口。这时，门口的数名海军警卫战士卧倒在地，阻止卡车冲进学校。数十名棒子队员上前，把警卫战士从门口拖开，数千人冲了进去。此时，校南、校北多处围墙也被推倒，大批人拥入，还有近千人翻墙进去。校内大乱。

“棒子队”首先强占校内广播室，广播准备好的“通告”。随即冲进电话总机室，打昏总机班长，砸毁电话总机，断绝海军潜艇士兵学校与外界联系。交通局数百人冲进食堂，踹翻餐桌，将就餐的军人押走。有80多人被绑架到第

三粮库、二库、面粉厂、青纺医院等地刑讯逼供。抢走了9麻袋的文件和材料，部分枪支弹药，以及大量军用和私人物资、物品。所有军队汽车全部被抢走。门窗玻璃、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几乎全部被砸毁。

这次行动，青岛共调集两万“文攻武卫”人员，是青岛地区最大的一次武斗，参与的人数最多。

北海舰队依然保持克制，没有派出部队和人员与“文攻武卫”正面冲突，只是搜集证据，迅速向海军和军委汇报。

1月31日凌晨，中央文革就“攻打潜士校”一事向王效禹发出3条指示：“请你查明事实，立刻报告中央”。“如情况属实，请你指令杨保华立即制止这种错误行动。”等等。

王效禹的秘书朱文接到电话，立即赶到王效禹家中汇报。王效禹一声不吭，坐了好一会，才对朱文说：“你给杨保华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这事，把中央的批评告诉他一下，如有这样的事，立刻制止。”

朱文不敢怠慢，立即赶回办公室，于3时30分给青岛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青岛那边说杨保华夜间不接电话。朱文反复交涉，近2个小时后，才与杨保华通话，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下达的3条指示。

31日当天，杨保华即向山东省革委发来电报，通篇都是海军潜艇士兵学校的种种错误和需要解决海军潜艇士兵学校问题的各种理由。

王效禹看了杨保华的电报说：“看来他们是进了潜士校了，很被动”，但还是将这一电报转发中央文革。同时他以省革委的名义给杨保华发电报，重申中央文革的第1和第2条。

2月1日，王效禹派济南军区一名副司令员和韩金海赴青岛调查处理“攻打潜士校”一事，又让秘书朱文通知杨保华要作高姿态检查，要主动。并于当天分别给中央文革和杨保华发出电报：

- 1、冲击潜士校是错误的。
- 2、进入潜士校的人立即撤出来。
- 3、杨保华要做检查。

当日15时，韩金海他们到达青岛，听了杨保华的检查，按照王效禹的调子，批评了杨保华几句。

2月3日，韩金海他们在青岛主持召开青岛市革委会、北海舰队、67军3方负责人会议，杨保华做检查并受到批评。北海舰队要求传达中央文革指示和单独汇报海军潜艇士兵学校事件，会议主持者未予理会。

韩金海他们回到济南，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杨保华已作了检查，批评北海舰队在此事件中姿态不高。

北海舰队的报告也到了中央。

当时杨保华幸亏没有攻打4808厂。这个数千人的大厂，除了少数人的“火线指挥部”支持王效禹、杨保华外，绝大

多数人参加的“大学派”都是反王效禹、杨宝华的。因为是海军的工厂，“大学派”一直没有被压垮。

4808厂“大学派”的领导等极少数造反派，为了防止青岛“文攻武卫”组织在67军的配合下强行武装攻打，私自秘密在厂区多处主要通道和地方埋放了大量炸药。如果杨保华指挥围攻，采取与潜士校相同的方式，以卡车乘坐文攻武卫人员强行冲入厂内，卡车和车上所有人都会被炸上天，那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惨烈武斗。万幸的是，1968年12月至1969年1月，杨保华指挥“文攻武卫”攻打的是基本没有防卫的捕捞公司、4406工厂和海军潜士校，没有染指4808厂。

青岛的事情刚刚告一段落，2月7日，济南市革委会召开政工会议，大力宣传表扬那位卖油条的女工马国莲，批斗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恩华等人。批斗时，刘长茂的老婆还打了杨恩华。与杨恩华关系很好的泰安国恕连跑到王效禹那里，批评“山工总”的打人行为，更加引起王效禹不满。

2月28日，傅建吾、韩金海、孟庆芝等人在黄台电厂召开大会，“文攻武卫”抓捕常山林以及济南汽车总厂革委会主任尹昭瑞等7名“杨派”人员，以男女作风问题扣留杨恩华。

王效禹指令济南撤销杨恩华“九大”代表，换上赵星元，同时开除常山林等人党籍。王效禹对赵星元说：“段福兴不是卖小鱼的吗，怎么还能当省革委委员呢？卖油条的为

什么不能当常委？明天在市革委通过一下。”

于是第二天，马国莲女士“油条常委”上任，马上离开大明湖边的炸油条摊，进入市革委上班。而2月7日济南市革委会召开的政工会议，也成为文革中济南著名的“四根油条政工会议”。

“油条事件”之后，有人作了一首打油诗：

山东大地坑连坑，
黄河两岸焊壶声，
大明湖边炸油条，
胶州湾畔卖花生。

这首打油诗，有多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描绘1967年1月至1969年6月之间，山东的四位著名造反派。

1、“坑连坑”是王效禹，脸上有麻子。夺权后成为山东一把手。

2、“焊壶声”是韩金海，以前的焊壶匠，济南小五金厂的工人，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

3、“炸油条”是马国莲，著名的“济南四根油条事件”主角，因此一跃成为济南市革委会常委。

4、“卖花生”是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原明胶厂工人，困难时期倒卖过花生米。青岛即位于“胶州湾”畔。

第 1063 回：势难收，内蒙多人提防“左”

反右倾，继续大挖“内人党”

1968 年 7 月 5 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 7 月 20 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 351 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同时，也向康生口头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成为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运动，并迅速在全区席卷而来。内蒙古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

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革委会的一些领导感到不安了。

1968年8、9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李德臣认为：“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塌了！”

这时，郭以青又站出来了，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一言不发。

以后，李德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1968年9月13日，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滕海清参加完这次常委会，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中共党的八

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就是回京参加这次会议。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内蒙古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内蒙古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月25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啦啦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25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

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

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上边记着滕海清、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内容。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滕海清、吴涛作为内蒙古革委会的第一、二号人物，列席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滕海清把李德臣召到北京。他一改离开内蒙古时的态度，狠狠撸了李德臣一顿，说：“你犯了右倾错误，跟着别人跑了！”

李德臣明白，这个“别人”指的就是高锦明。

第二天，李德臣又赶到滕海清处。这次，滕司令员缓和了态度，他一边拉开抽屉，一边说：“康老有指示，挖‘内人党’刹车，都是高锦明的圈套！我这里有材料，高锦明是叛徒。”

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讨论了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康生约见了滕海清和吴涛，指出高锦明政治上有问题，决定不提高锦明为“九大”代表。

滕海清、吴涛二人在北京当面对李德臣作了布置后，李德臣便匆匆赶回内蒙古，传达滕、吴二人的指示。

滕海清在指示中说，内蒙古的整个工作是好的，但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最近有些混乱，右倾又有抬头。

滕海清提到，“听说我在 9 月 13 日说过一句糊涂话，说内蒙古与乌兰夫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我忘记是怎么讲的了，如果讲了这个话这是错误的，要宣布收回。”

在指示中，他只字未提高锦明，语气也相当缓和。

10 月 18 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 月 21 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 70 人。其中，1945 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 23 人，1946 年的 33 人，1947 年的 10 人，而所谓 1962 年以后加入的只有 4 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10 月 31 日，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

11 月 1 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这天，呼市军民又一次隆重集会，庆祝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几乎就在同时，滕海清和吴涛等人飞回呼市。

11 月 3 日，自治区政府礼堂。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大会。高锦明同往常一样，坐在主席台上。

此时，滕海清却判若两人，突然在讲话中狠批内蒙古前一阶段的右倾问题，宣布停止高锦明的工作。

本来，挖“内人党”刹车也是滕海清拍板通过的，在10月的电话和口头指示中，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承担责任。但几天之后，其态度便发生逆转。

就在同一天，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日程是：一、3日至9日，以滕、吴指示为纲，全面揭批高锦明；二、10日上午吴涛传达党章（草案）和“九大”代表产生办法的决定，结合批判高锦明；三、10日下午至12日小组会继续揭批高锦明；13日吴涛传达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13日下午至14日上午，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继续揭批高锦明；四、14日下午，高在大会检查；五、15、16日，大会批判高锦明；六、17日讨论纪要，18日滕海清做长篇讲话，19日通过纪要。

从此，高锦明成了管制对象，隔三差五便被批斗一次，一次，在批斗会开始前，他身染风寒。发了高烧，滕海清说：“跟上个医生，不行了打一针，还得斗！”

当时，高锦明是内蒙古的第三号人物，他的升降去留，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四次全委会期间，滕海清找权星垣谈话说：“批高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次我到中央去，康老讲了他的问题，还给我看了一个名单。”

他也对李树德讲过：“反高是康老点头的。”

11月23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说：“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12月23日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32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

第二天，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于是，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是李树德。

此时，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进入高潮。

在呼伦贝尔盟地区，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人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

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去登记吧！”

在满洲里理发店，一坐上座照镜子，镜上写着：“你看什么？你就是内人党！”

苏尼特右旗挖出了“内人党”的变种组织“统一党”、“沙窝子党”8000多人。敖干希里大队通告全大队14岁以上蒙古人全去登记。67岁老人达木丁曹，听说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不然就被抓去批斗。于是反复背诵“统一党”三个字。然而到了大队登记站，受到惊吓给忘了，只好返回去背熟牢记再去登记。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200人打出180个“内人党”，其中死了10人。

12月2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宣布：“内蒙古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蒙修情报部。挖出了新内人党12个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

经摧毁。”

12月24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文章说：“一年来，我们大打了扫荡战，战果辉煌，横扫了一大片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分子。围歼这个暗班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要调动千军万马，打真正的人民战争。围歼这个暗班子，要打进攻战，全面出击，分兵包围，一鼓作气，各个突破。”

北方的12月，正是寒冬腊月，“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追索证据。受害者在痛苦磨难中煎熬。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要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他说：“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

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 8 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 24 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 8 个小组，执行抄家的 8 个小组，突击审讯的 8 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 年 12 月，滕海清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第 1064 回：诉冤状，千里向南奔北京

查历史，南京大学“清队”忙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祁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 30 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成“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打致死。

祸从天降，祁宝荣的遗孀在内蒙古哀告无门，便直奔沈阳，找到陈锡联，并通过他上告中央。

北京军区党委也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1968 年 12 月，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从 12 月 20 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内蒙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明显地感到：内蒙古军

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内蒙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即：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比如说“烤烧鸡”，就是把人按在火炉旁烤。还有“闷豆芽”，是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再比如将人手用力向内扳的“吃猪蹄”，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的“鸭子浮水”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张南生在内蒙古军区党委会议上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北京军区工作组在呼和浩特待了20多天，于1969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海清家。然而，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将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的意见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内蒙古的工作按照滕海清的意见办就行了。

滕海清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北京，准备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 1968 年 9 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已是 1968 年 12 月 31 日。

但此时，中央对内蒙古抓“内人党”扩大化似乎也没有察觉。2 月 4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晚 20 时整，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接见了滕海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和汪东兴都到场了。

腾海清先汇报了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的情况，手中拿的稿子就是李德臣起草的《汇报提纲》。

在汇报过程中，滕海清提出要增加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这时，康生插进来说：“要看一看，不要急于增加，清理阶级队伍后增加更有把握。不仅内蒙古有这个问题，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都有这个问题。”

姚文元称赞说：“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开展得较早，有不少经验。”

康生接着讲：“内蒙古的敌人很多，有伪满洲国的，有伪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解决内蒙古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要花时间，你们的步子太快了，中央从来没有督促你们，你们不要急嘛。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掌握政策，要扩大教育面，要缩小打击面。”

江青把话题拉回到革委会增加新人的问题上，说：“革委会刚成立，混进少数坏人是难免的，只要领导心里有数就行了，对这些坏人可以不采取很快作组织处理，防止反复。”

张春桥说：“内蒙古的形势好！对挖出的这些人处理不处理，除对山西有影响外，对其他地区不会有影响。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急于组织处理，防止敌人对革委会各个击破，防止反复。”

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要狠狠地打击。”

谢富治插话道：“‘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

人党’，要把它坚决搞掉。”

康生也说：“内蒙古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成了‘内人党’的部队，对这个部队要改造。”

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

接着，针对内蒙古的情况，周恩来指示滕海清说：“第一，对草原一定要很好地保护；第二，对国防工厂的生产要好好地抓。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完不成，你们的产值也就完不成。”

时间悄然流逝，接见会从晚上 20 时一直持续到午夜 24 时。

康生在接见会快要结束时，提到了高锦明，说：“高锦明的问题很严重，他的历史问题不清楚，还有三反言论，去年又犯了右倾错误，搞反复。”

康生还说：“群众运动中出现支流是难免的，高锦明的错误是把支流看得过重。你们要把‘内人党’的组织搞垮搞臭，要打击少数。”

这次中央文革碰头会对滕海清又一次莫大的鼓励。

1969 年 2 月，滕海清在北京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开会。会上，滕海清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说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问：“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

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人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500个‘内人党’，我打了1000，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1969年2月，内蒙古军区招待所，一次全自治区范围的“内人党”罪证展览在这里揭开了帷幕。展览中，除“内人党”外，还有所谓“内人党”变种组织的“罪证”，比如统一党、独立党、自由党、团结党、呼和浩特蒙古党、真理党、哈拉哈高勒党、蒙古联合党、成吉思汗党、沙窝子党等等。

之所以冒出这么多变种组织，是因为在严刑逼供下，受害人常常因不知道“内人党”这一名称而乱说一气，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无奈，只得将之统统归为“内人党”的所谓变种组织。

在这次展览会之后，内蒙古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将部分图片编辑成册，作为“内人党”反革命集团罪证，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层层下发，配合正值高潮的揭挖运动。

2月26日，内蒙古革委会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待“新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同以往的同类文件相比，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3月，内蒙古革委会起草《关于“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1969年3月，原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时任内蒙古区革命委员会常委的权星垣，他的妻子突然被审查，白天接受批判，夜晚放回家，勒令其揭发权星垣的“问题”。专案人员对权星恒的妻子诱供说，权星垣介绍了两名“内人党”加入共产党，而这两个人同时把权拉入“内人党”，以便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权星垣坐不住了。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他自动要求停止工作，说“免得组织上被动”。有人拍桌子说：“怎么，清队清到你老婆头上，你不干了？！”

吴涛淡淡地说：“要正确对待嘛。”

其实，此时吴涛的周围也是险象环生，自身难保。在2月4日，滕海清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内蒙情况时，曾经说过“吴涛已经不可靠了，他是乌兰夫反党集团的人。”周恩来当即批评了滕海清。但事后，仍然有几个专案组在审讯时暗地里追逼关于吴涛的材料。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挖“内人党”骨干马殿元，在宣传部副部长海山和教育科长赛希的专案组里，就要他们交待吴涛的“内人党”问题，他们屈打成招，

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说了。

此时，社会上也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不久就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内人党”来，这个人比乌兰夫小，但比迄今挖出来的还大。造反派的小报更加露骨，说是有一个掌权的“内人党”党魁，代号叫“口央”。“口央”组合不正是繁体“吴”字吗？

我们再看江苏。此时，南京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自 1968 年 8 月开始后，也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了，每个工作人员的政治历史又都重新被筛查一遍。特别是 38 岁以上的人。因为当时 38 岁，建国时 18 岁，已经成年，有可能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特务组织。除清查历史问题外，也要清现行问题，你是否思想反动、对现实不满，说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话等等。步骤是：本人交代、群众检举揭发、组织派人内查外调，务使每人的历史清澈见底。工军宣队领导动员大家，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大家冥思苦想，竭力挖掘。这时，有人说，他在图书馆三楼阳台墙上，发现有用红硃砂画的国民党党徽，现在颜色褪了，不认真看，看不出来，好像解放前就有了。

“有这样的反动图案？”大家都很吃惊，一齐上楼看。确实，尽管已很模糊，认真看仍可辨认。那么，这是谁画的呢？摸来排去，结果排查到了揭发人的头上，因为只有他解放前在这里，还知道是用什么材料画的，图案几乎看不出了，

别人都没看到，因为是你画的，你心里有鬼，想洗脱干系，所以主动揭发……揭发人当然不承认是他画的，又没有证据，排查好几天，定不下来，只好暂时挂起来。

又有人揭发，做摄影工作的老何行动反常。他每次开门、打电话，都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把手，说是怕传染疾病。“我们用五个手指开门和拿电话听筒，没见谁传染上什么病。他这样做就是怕留下指纹。”“什么人怕留指纹呢？那就是特务，他们处处小心怕留指纹……”

老何急得面色发紫，嘴唇哆嗦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明明是怕传染肝炎，大家都知道的么！”

其他人也不以为然，没人附和。

但老何依然愤愤不平，又提心吊胆，自己毕竟在国民党部队里干过，腰杆不硬。

流通组里，有人揭发老章的反动言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说每年节假日前，学校保卫科都给各单位发通知，什么提高警惕，严防特务破坏，年年如此，特务在哪里？一个没看见。

这句话问题不大，检讨一下过关了。

图书馆年纪大的人多，他们在旧社会干过事，多少都有些历史问题，就成了清队对象。没多久，就清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当过中学教导主任的、地主分子、右派分子等

等。每天早上学习前，让他们在图书馆大门外站成一列，低着头、苦着脸，口中念念有词的向毛主席请罪。请罪词是：

“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罪该万死，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我要彻底坦白交代罪行，改恶从善，争取宽大处理。”

这几句要反复念，直到专案组人员来，勒令他们写交代，或到组里受批判。

有一位 50 多岁的胡女士，参加过国民党，因此反复追问她在国民党里干过什么坏事？组长要求每人动脑筋，想出问题追问她，抓住她自相矛盾的地方进攻。问的问题很多，也很细，时常问得胡女士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但是，她始终说自己是集体参加的，既没有参加过活动，也没有开过会。于是说她不老实，叫她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又让她坐下，继续端正态度。如此反复，始终没有进展。后来，工军宣队张连长到图书馆主持工作，他想有突破、出成果，搞了奇招。

这一天，全校在大操场召开第一次宽严大会，各单位排队进入指定位置，还有外校不少人前来观摩学习。大家坐在地上，认真地听军宣队领导讲话。忽然听到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大家注意了，下面，把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押上台！”

全场的人四下搜寻国民党特务在哪里，只见两个专案组人员突然跃起，迅速揪起图书馆那个矮小瘦弱的胡女士，像抓小鸡似的，按住她的双臂，一路小跑奔向主席台。全场响

起震耳欲聋的口号：

“打倒国民党狗特务胡某某！”

“胡某某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胡女士晕头转向，脸色煞白。但是上了台后，仍然努力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竭力高声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这一从未有过的创新之举，不要说当事人被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连参加会的群众都惊得心头扑通、扑通地乱跳。图书馆的人个个目瞪口呆。

但是，台上的胡女士态度更加强硬，斩钉截铁、翻来覆去就三句话：“我是集体参加国民党的，我没干过坏事，我不是特务。”

最后也没查出她的其他问题。关于特务一说，更是子虚乌有。

1969年2月13日，南京大学教务长兼科研处处长杨世杰割腕身亡。杨世杰解放前是原中央大学地下党。文革开始后，他与南京解放前夕反蒋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华彬清、余建华、谢家及等人被认为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随后，天文系朱耀鑫“畏罪潜逃”，不慎落水身亡。

第 1065 回：看北大，“清队”二十四人亡

惹众怒，全国指责杨保华

此时的北京大学，1968 年 9 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正在继续。

1968 年 12 月，北大化学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批判 10 月发现的“0363”齐菊生写给陈醒迈、程汉良、刘立民的信为中心任务。参加学习班的都是过去“井冈山”的人，工宣队杨师傅挂帅。他说：

“你们这些人，过去与齐菊生关系密切，现在，你们是批判他的骨干，工宣队相信你们，依靠你们，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击中要害。”

参加学习班这十几个人心知肚明，诚惶诚恐，俯首是听，选择脱身，反戈一击。他们把齐菊生的信梳理出十几个题目，每人自选一个，关起门来写批判稿，先办了一个板报，然后准备面对面批判。

其中也有一人拒绝参加学习班，跟工宣队大吵大闹，他叫赵凯元。此人倔脾气，当年就总跟齐菊生顶着干，齐菊生拿他没办法。他是贫农子弟，工宣队对他也没辙。

一次召开小型批判会，齐菊生被拉来当面批判。学习班的昔日战友，此时轮番发言，炮火猛烈，情绪激昂。齐菊生把脸扭向一边，不屑一顾，表情木然。当有一个人发言时，他甚至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不久，1969年1月8日晚，化学系参加学习班的这十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他们每天早晨和看守他们的同学一起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上一次“晚汇报”。白天就是一句一句的念《毛主席语录》，然后写交待材料。每人面前是一支笔，一张纸，没有书，没有报，不许接触任何人，当然也没有人说话，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吃饭时与看守的同学两人一起去食堂。上厕所，看守的同学也要相跟到厕所门口。唯一定期进行“政策攻心”的是工宣队师傅，推心置腹，谆谆善诱，凡是审罪犯的话，几乎都说了。

据说他们也分为三等，最严重的关到31楼。二等不出屋，吃饭有人送。最轻的可以外出买东西，但有人跟着。

被审查的人没有别的事可做，每天冥思苦想，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每一幕往事，每一个细节，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

工宣队的师傅会反复给他们讲一个道理：“你如果不交代，没关系，我们把你挂起来，你档案里会有一句话‘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清楚，请继续审查’，这个结论会跟你一辈子，没有单位敢要你，没有人敢接近你。你将一辈子背黑锅，一辈子受审查，一辈子查不清，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历史不清白没有关系，不清楚问题就严重了，多少人因为历史的问题没有结论毁掉了一生。你是要趁着有工宣队帮忙把问题搞

清楚呢？还是要带着污点在以后被审查一辈子呢？我们是在帮助你呢。”

一个对自己前途本来有着美好憧憬的大学生，这些话是何等的残酷！被审查的学生面临着“不清楚”和“不清白”的两难选择。无论哪一个，都会让他一生都生活在痛苦的阴影中：以后每次运动到来，他都要被揪出来示众。没有运动他也要夹着尾巴做人，永远抬不起头，一辈子唯唯诺诺。这真是年轻学生的软肋。

很多被审查的学生痛不欲生，百爪挠心，精神崩溃。他们对文革中的“不健康思想”开始检查，反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不吝啬上纲上线的大帽子，又要小心翼翼让每一个落在纸上的事实空洞无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此刻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白纸黑字，将来全是反对自己的证据，所以写了又改，改又了写，既能应付，又定不上性。反正有的是时间，每天就琢磨这点事。只盼着有一天开恩，工宣队能放自己一码。他们当中，有的死磨硬抗，有的胡乱交代，有的是雷声大雨点小。

1969年2月22日晚上，北大化学系被审查的学生李人杰以上厕所为名，趁着看守他的人不注意，逃出了31楼，逃出了学校。风高月黑，寒风凛冽，他不停的奔跑，义无反顾，一直跑到30里以外的清河，在一个老乡家门口的大树上，用自己每天佩带的紫红围巾拴了一个套，吊死了。据说

第二天清晨大早，老乡一推开门，竟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连忙报案，在北大派人领取尸体时，这人还在抱怨坏了他家的风水。

在李人杰吊死的大树周围是无数转圈的脚印。也许他是在寻找合适的位置悬挂围巾？也许他是在最后的关头闪出了对人生的留恋？不得而知。

后来有人告诉李人杰的要好同班同学唐利，说李人杰死前的交代里曾这样讲：“我最恨我们班三个人，吕成信，杨惟立和唐利，是这三个人把我这个天真幼稚的青年带上了反革命道路。”

闻听此言，唐利的心在哭泣：“小白毛，你死得凄惨悲壮，死的不明不白，死不瞑目啊。”

“小白毛”是李人杰的外号。

唐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那个被精神折磨生不如死的日子，就是我自己，何尝又没想过李人杰这条路呢，只不过实行起来也不那么容易。我们有人把写的材料撕个粉碎，从窗户跳出去，准备一死了之。那只是二楼，摔个屁股墩，还得推开工宣队的门，低头认罪。姚建明则把开关拆下来，线拴在手上，以此触电而死。人没有死成，两个手指被电火花打在了一起。”

死人事件没有阻挡工宣队、专案组前进的决心和脚步。他们在二教召开了李人杰批判大会。

李人杰姐姐来北京处理后事，就是领取骨灰，听取宣布反革命的决定。没有致哀信，没有抚恤金，只有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语言。没有遗物，他的东西在武斗清楼时全丢了。没有遗书，走得毅然决然，不留只言片语。姐姐要看遗体，拒绝了。见见老同学，拒绝了。是啊，她一个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有什么理由提要求呢？

北京大学在这次“清队”中死了 24 人。

化学系三班的陈子明是“慨而慷”成员。因为是工人出身，大联合后被结合到班领导小组，成了“井冈山”仅有的领导成员。

这天，陈子明被拉倒了批斗台，站在中央。他本来就有点结巴，那天为自己辩解时更说不清了。

原来，工宣队审查樊能廷，啃不动。樊能廷水来土顶，兵来将挡，总是有词搪塞。于是工宣队怀疑有内奸。正好听说陈子明找了一些“井冈山”的人，告诉他们不要惊慌，沉住气，没有了不起的事。于是工宣队认为是陈子明在给他们通风报信，于是便以此为理由，把他清理出“领导岗位”。

再说山东青岛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在 1968 年 11 月的“1117 讲话”在全国散发后，受到多个省市造反派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多个大军区司令、政委、省市革委会主任的批评。

浙江金华的造反派则首先在《金华日报》上转载了青岛杨保华的“1117 讲话”。全国著名造反派，浙江的翁森鹤认

为杨保华讲得对。

1968年秋，武汉造反派在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中，日子很不好过。这年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而随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武汉各单位纷纷举办“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的“五不准学习班”，以批判派性和“捅马蜂窝”的名义，将大批造反派头头作为审查对象参加到学习班，有些人还被设立专案审查。在各级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其政治地位受到动摇，群众代表的作用也基本失去。

1968年10月，《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提到“反复旧”。武汉造反派认为湖北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在革委会里，干部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很多人认为，“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其实已名存实亡。

这时，吴焱金看到青岛杨保华关于“反复旧”的“1117讲话”，引起共鸣。他把杨保华的讲话稿带到了武汉工代会常委会。工代会负责人、“工总”宣传部长田国汉要把杨保华的讲话刊登在《武汉工代会》报上，吴焱金签字同意。为此湖北省革委会的军、地领导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张玉华把吴焱金他们找去谈话，批评他们刊登杨保华的讲话是错

误的，说“杨保华的讲话通篇只有一个地方提到毛主席，两个地方提到林副主席，18个地方提到了王效禹”。

江苏徐州的杨正祥等人也响应王效禹的号召，迅速行动，以“反复旧”为名，于1969年1月14日，第三次冲进徐州警备区，砸了警备区大门并焚烧牌子。紧接着27日冲击公安局，将军管会孙主任打成重伤。

1968年12月12日，河南革委会三巨头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召开全省地市县革委会党员代表大会，刘建勋开头就讲：“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总结报告，前天王政委（王新）的讲话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总结。这里，我只就最近议论较多的反复旧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在全省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妖风，这股妖风就是利用反复旧这个革命口号刮起来的”，“这股妖风刮遍了全省。有的地方，几个反动的多中心论者经过周密的计划，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了全城，喇叭上街，揪斗革委会的工作人员”等等。刘、王、纪3人点名批实施“反复旧”的造反派，王效禹在山东讲话批刘建勋和纪登奎是“干部上台，思想回潮”，“右的表现”。他还布置《大众日报》发表专门针对河南的两篇文章《秋后算账派可以休矣》和《彻底砸烂唯成分论》。

山西造反派印发杨保华“反复旧”的讲话，要刘格平向杨保华学习。

甘肃著名造反派张恒云1968年12月专门到青岛向杨保

华取经，1969年1月10日，兰州热电厂大量印发《紧急呼吁》。20日，兰州《工人战报》转载浙江《金华日报》刊登的杨保华“1117讲话”。1月22日，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革委会主任洗恒汉在省革委召开的兰州地区工宣队、军宣队、县以上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会议讲话斥责说：

“有些工宣队、军宣队对当前兰州地区出现的一股反动逆流，要求兰州地区、省革委会讲一讲”，“兰州市这个月的10号出现了一张《紧急呼吁》的大字报，说是‘打击了造反派’，‘复旧’”，“这个总后台，他们说是张、洗，就是张达志、洗恒汉。好，我们等待他来揪”。“一个《工人战报》大量散发，把山东杨某的讲话，在一些单位，作为学习班的文件，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依据，以这个来代替毛主席的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命委员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代替十二中全会公报，代替元旦社论。杨某的讲话是错误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洗恒汉狠批兰州工代会按照山东、青岛“反复旧”的宣传资料，准备在甘肃实施“反复旧”的活动。

得知兰州军区对山东“反复旧”的态度后，山东青岛的杨保华和鞠维信在济南发表谈话，认为兰州军区“镇压造反派了”，准备以青岛市革委会名义公函兰州军区。

江西程世清则把搞“反复旧”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浪

撤职查办。程世清原任驻山东 26 军政委，王效禹说“江西省革命领导人是我派去的”，“到了江西变右了”。

福建的老造反借“反复旧”，重新拉组织抢武器并且打死了人。韩先楚及时出手，予以镇压。王效禹指责福建是军人掌权，造反派没有活路。

第 1066 回：陈伯达，写“九大”《政治报告》

周恩来，安排四帅下工厂

2月2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报告中说：

昨今两晚，我们经过讨论，拟了一个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请予审阅。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在最近一两天内约碰头会全体同志开一次会，我们将陈述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意见。

报告还说：

考虑到各单位的九大代表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拟好了一个通知，请予审批。

毛泽东当天批示：“一两天内谈一次，另件照发。”

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 1969 年 1 月 11 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要》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到：“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在“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他说：

“要研究 1967 年 2 月开展‘三支两军’工作以来的过程，了解派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宣传队到学校、工厂、机关

后的情况，抓住少数单位，研究这些单位的材料，看看有什么变化。”

针对当时许多部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情况，毛泽东说：

“开什么‘积代会’呀？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搞这个站队那个站队。”

谈到群众运动时，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发动工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革命是起了作用的。后来就打内战了，不那么听话了。1967年我在武汉时，他们就不大注意掌握大方向了，方向就有些变。”

谈到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否当九大代表时，毛泽东说：

“总是要相信一条，资产阶级个别人物可以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能相信了。”

关于“九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提出：

“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同志挂帅，2月20号搞出初稿，报告写出来后才好开会。在报告里讲几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

毛泽东说的“几个里程碑”是指当时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林彪从毛泽东处开会回来，将秘书张云生、李春生叫去，

慢吞吞地说：

“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做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政治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再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如果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3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林彪停了一下，又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用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我这次作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的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

林彪授意后，张云生和李春生即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叶群说：“首长叫拉条子，你们就拉吧。但我看不能指望拉条子。老夫子是大秀才，还有张、姚两个笔杆子，人家

写的东西不比你们强百倍！就是拉条子，光靠你们两个加上老虎也不行，还得另调人。……”

叶群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再说陈伯达，他2月7日夜里从毛泽东处开完会，兴冲冲的回到家里。一进大门，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秘书的办公室，进门便没头没脑地对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说：“快给我准备准备！”

看他兴奋而严肃的样子，两个秘书不由得问道：“准备什么？”

陈伯达想了想说：“嗯，准备材料、纸和笔。中央、主席决定让我起草‘九大’报告。”

“都有谁参加？”

“还有上海那两个，主要是我自己写。”陈伯达随口说道，又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了一下中央碰头会决定召开党的“九大”和起草政治报告的情况，说时间只限一个月完成，写什么内容没有讲，由他自己考虑。

王保春提出：“是否找几个人帮忙，如《红旗》杂志、政研室的同志。”

陈伯达说：“不要。《红旗》杂志姚文元在管；政研室嘛，可以找几个。你去组织一下，人员你去选，不要出了名的名人。”

王保春从政研室选了几人，组成了一个班子，集中在沙滩的办公楼里。陈伯达去看过他们两次，先给他们讲了主题思想。怎么写，写什么，则由他们自己研究决定，并说：“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写什么。”

陈伯达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从林彪哪里回来后，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秘书一字一字抄清。陈伯达又一字一句地核对一遍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并于当晚，亲自将报告附上提纲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并提出：“邓小平打过仗，与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中不要提他。”

陈伯达坐在毛泽东旁边，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毛泽东的意见后，交毛泽东过目。毛泽东当即圈阅退回。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意见报告了周恩来，但没有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打招呼，而是自己关起门，起早贪黑地写起来了。

不久，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不接电话，让秘书答复说：“告诉他们：你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我有些身体不舒服。”

张春桥也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

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秘书答复：“不是有个提纲

吗？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秘书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要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

张春桥、姚文元又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

不久，毛泽东明确说：陈伯达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小组的组长。

2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到工厂去搞蹲点调查，也是接受再教育。周恩来亲自选定由8341部队负责支左的4家工厂：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化工三厂。这4家工厂也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六厂二校”中的典型。陈毅到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剑英去新华印刷厂，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荣臻在化工三厂。周恩来向各厂负责人就四位老帅蹲点时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作了细致交代。

2月4日，聂荣臻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明天起，我即到化工三厂去，每日去半天，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当个小学生，认真向革命群众学习。”

但是，当时化工三厂的生活条件简陋，对一位年已七旬、又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例如，工厂没有

卫生间，只有一个简单的露天厕所。小便还好说，但碰上雨天，也是够狼狈的。大便则蹲下去以后就起不来，得靠别人搀扶。后来工作人员设法做了个木架子带到工厂，下面放个脸盆，可以坐在上面大便，才解决了这个难题。工厂没有沙发椅，连靠背椅也很少，经常是坐在长条木凳上开会，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回来后就反映腰酸腿痛。

即便如此，几位老帅基本上一直坚持，风雨无阻。

2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开会。毛泽东对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到工厂做调查研究表示肯定，他说：

“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中央文革要到下面去走一走，否则要落后，要统一安排一下，不能走马观花。这些老同志下去有好处，研究工业、农业、教育，老同志可以多带点人去。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

陈毅谈到工厂里关了一些人时，毛泽东说：

“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放毒，写一点反动标语，你把他关起来干嘛？！说有些人是‘三反’，我就不信。说错话，说气话，总是有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三反”是指当时经常提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简称为“三反”。

毛泽东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只要不杀人，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还有我们从来不理什么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最近意大利、加拿大要承认我们，蒋介石有些慌，日本有些不安。日本人民对日本政府跟美国走不高兴。研究国际问题要注意哪一些我们不注意的国家。还有一件事，”他问李富春等人：“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答：“现在正在搞。”

毛泽东又说：“教育要改革。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毛泽东问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他说：“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有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列宁讲话，从来不用稿子，斯大林不同，是写好稿子再去讲。”

散会后，林彪回到毛家湾，让秘书打电话，请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到毛家湾谈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事情。

当 3 个人在林彪家的客厅中坐定后，林彪开门见山，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并且强调参考 1968 年 3 月 30 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这篇社论中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中有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 3 人从林彪屋里出来，林彪秘书张云生听到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然后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走了。

1969 年 2 月，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保定 38 军政委王猛到京，与郑维山一起向他宣布：保定问题，由 38 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

当时，北京军区政委有三位：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李雪峰为兼任，刘格平常驻山西。

2 月 24 日，军委电报：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 38 军组编为摩托化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

高炮团各一个。各摩托化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10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38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军。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他让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3天。其余时间，由老帅们自行支配，可以抽空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再由陈毅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恰在此时，东北中苏边境的枪炮声震动了北京，也震动了世界。

第 1067 回：三月二，珍宝岛上起战端

发《照会》，中国政府提抗议

1969 年 3 月 2 日上午，黑龙江省军区公司边防站 30 人分两组到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巡逻，与苏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苏联边防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开枪开炮，一辆装甲车进入江汊，威胁中方岛上巡逻分队侧后。中国岸上炮兵配合步兵予以还击，击毁苏军装甲车、指挥车、汽车各 1 辆。战斗于 10 时 30 分结束。中方死伤 52 人，苏联死亡 31 人，负伤 14 人，双方各自从岛上撤回。此后，中方据观察判断，苏军向珍宝岛方向增兵。于是，中方亦加强了兵力，并在纵深增调陆军第 67 师 1 个步兵团、2 个侦察连作为机动部队，以 2 个加农炮营和 1 个高炮营组成炮群，支援作战。

3 月 2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

府承担全部责任。”

珍宝岛地处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侧，面积 0.74 平方公里。原与中国大陆相连，后因江水终年冲刷，1915 年形成小岛。由于该岛两头尖，中间宽，形状似中国古代的元宝，因而得名“珍宝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从事生产和捕渔等活动。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 400 米。

这个珍宝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按国际公认的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国界，珍宝岛也是属于中国。可是，从 1964 年开始，苏联就在他们的地图上把边界线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中国岸边，将珍宝岛划归苏联所有。

苏联也有理由，认为这种划线虽然违反国际公认原则，但原来和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就是按中方一侧江岸来划线的。

中国边防军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1960 年以后，随着中苏之间国家关系的日益恶化，中苏边界亦开始多事。1960 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嗣后，苏方不断破坏边境现状，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活动，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等。1964 年，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方无视国际惯例，强称珍宝岛为苏联所有，不断进行武装侵扰，制造流血事件。从 1964 年 10 月至 1969 年 2 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达 4180 起。仅在珍宝

岛一处，从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联边防部队就入侵珍宝岛达16次之多。

1968年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吉普车共7辆，人员75名，越过中苏两国边界线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珍宝岛，武装拦截、阻挠中国边防部队执行巡逻任务，当场打伤8人。

1969年1月4日，苏军30多人侵入该岛，强迫在该岛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离开。

1月6日，苏军再次侵入珍宝岛，抓走了两名捕鱼的中国公民。

对于苏军的多次挑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国边防部队一再采取克制忍让态度，未予还击。

1月23日，苏军出动76人，携带军犬，分乘4辆军车，在直升机的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正在珍宝岛上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分队，打伤20多人，其中9人重伤。沈阳军区派出由副司令员肖全夫率领的一个工作组，前往虎、饶方向检查战备工作。

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反击方案，层层转报到沈阳军区、总参、中央军委直达毛泽东手里，并选定珍宝岛为还击重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安排。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沈阳军区令黑龙江省军区加强合江军分区的指挥和防御，又令陆军第46军133师两个侦察

排，第 23 军 67 师两个连，加强合江军分区所辖虎、饶地段边防力量。

军委指示沈阳军区成立虎、饶前线指挥部，由副司令员肖全夫、副政委李少元统一领导，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陆军第 23 军抽调部分干部组成。

黑龙江省军区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亮子村成立了由公司边防检查站站长孙玉国指挥的“公司临时指挥所”，由合江军区参谋长王子良负责，统一领导边防斗争。大批边防部队和野战部队云集虎、饶一带，随时准备出击。

苏联通过空中侦察也预感到边境要出大事，苏联滨海军区派出两个师在远离边境 100 公里外的地区进行演习以备不测。

2 月 7 日 10 时，中方两个巡逻组登岛巡逻。11 时前后，苏联边防军先后用冲锋枪射击和装甲车对中方巡逻分队进行冲撞等形式，阻拦中方巡逻，双方发生冲突。

这次事件后，2 月 19 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向沈阳军区、黑龙江省革委会、省军区发出指示：“同意暂时推迟在绥芬河边境架设铁丝网的斗争，选择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目标。2 月 7 日事件以后，必将有新的斗争。要求按既定巡逻线进行不固定的正常巡逻，一次派出 2—3 个组，兵力不少于 1 个加强排。自卫还击严格控制在主航道中心线中方一侧，行动突然，动作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

至有利地区。同意增调1个侦察连参战。由合江军分区指定一名主要军政干部负责。”

根据这一指示，虎饶前指决定再次派出部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向珍宝岛地区中国一侧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坐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采取行动。

3月1日和2日恰好是周六和周日，苏联边防军航空兵休息，2日又是滨海区送别冬天的节日——谢肉节。再加上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

3月1日，中国边防部队巡逻小分队在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下执行正常巡逻任务。他们刚刚登上珍宝岛，对面苏军边防军观察哨便向早已有准备的苏军边防军发出信号，只见两辆苏军车辆迎面开来。



苏军伊万上尉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拐着一条腿，冲着孙玉国和巡逻分队边跑、边喊：

“站住，你们再往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

他身后跟着 30 多名苏军士兵。随着伊万上尉的喊声，苏联士兵一下子全部散开，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根大棒，警惕的地盯着中国巡逻小分队。



“这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孙玉国严厉地说。

伊万上尉和他带领的苏军不仅不退，反而破口大骂。

孙玉国提醒战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先打第一枪，要严守巡逻纪律。”他们以沉默来回答对方的叫骂。

苏军边防军见中国边防军不说话，便举着大棒冲了过来，当场打倒了两名中国战士。

中国边防巡逻队没有还手，架着被打伤的战士撤了下来。

3月1日8时，中国133师1个侦察连又两个侦察排，23军73师217团1连及重机枪班，16军1个无后坐力炮连

约 300 人奉命上岛设伏。他们冒着严寒，于 2 日 0 时进入伏击阵地，伪装以待。

3 月 2 日清晨，气温接近零下 30 度。上午 8 时 40 分，公司边防站派出 30 人分两组登珍宝岛巡逻。由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组沿着冰道抵近珍宝岛，很快被对面苏军发现，从苏联境内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站出动 70 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1 辆敞篷卡车、1 辆指挥车，分别向珍宝岛飞驰而来，抢先赶到了珍宝岛的东侧，拦住了中国巡逻队的去路。

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为避免扩大事态，中方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以一部兵力向中国边防巡逻组的翼侧穿插，想包围他们。就在这时候，中方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双方处于荷枪实弹对峙的严峻气氛之下。

9时17分，枪声响起，中方巡逻第1组立即扔掉棒子，和设伏的1连开枪还击，毙伤敌数名。

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双方各执一词。按照中国的说法：“苏方的一个上尉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指挥苏军突然对中国第一边防巡逻组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 6 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

我已上岛的部队。”

中国边防巡逻第二小组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先敌向侧后的苏军射击，击毙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克格勃巡视员布依涅维奇上尉以下 7 人。随后，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发起反击，但遭到丛林中苏军的猛烈火力压制。中国边防战士于庆阳猛然跃起，向丛林苏军射击，吸引火力。苏军火力向他射击，击中他的头部，他倒下后不久，又顽强地站起，端起冲锋枪继续向苏军冲击，直至英勇牺牲，仍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副连长陈绍光指挥一个班迂回到丛林中苏军侧后，但一股苏军又从他的侧后冲来，两面机枪夹击他们。陈绍光一面指挥分队英勇还击，一面向苏军一个机枪火力点冲去。这时他身受重伤，仍然坚持移动到有利位置，打掉了这个火力点后，倒在了血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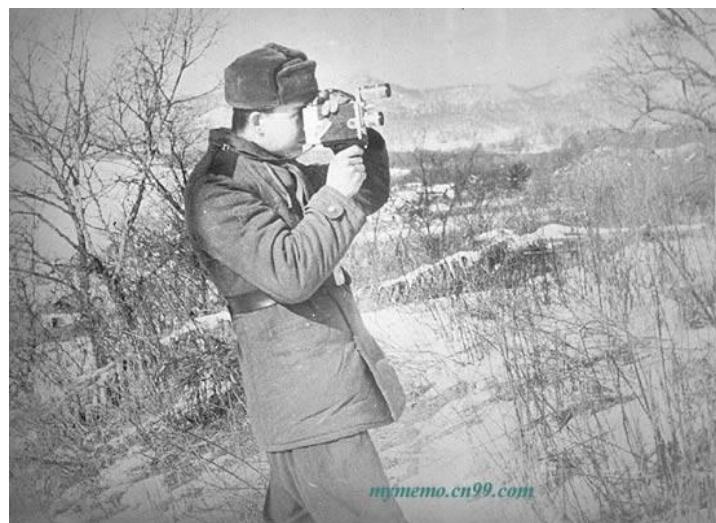
9 时 22 分，苏军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站长维塔利·布必宁上尉带领的增援部队向中方岛上的警戒分队冲击，预伏的 133 师侦察连与 1 连协同作战，将敌大部歼灭。此时敌装甲车 1 辆迂回至岛西江汊。中方伏击分队在岸上火炮支援下予以还击。

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至 10 时 30 分战斗结束，中方大胜。苏军死亡 31 人，伤 14 人，击毁其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中方共牺牲了 17 人，重伤 11 人，轻伤 24 人，并有 1 名通讯员失踪。中方在战斗结束后即带

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己方一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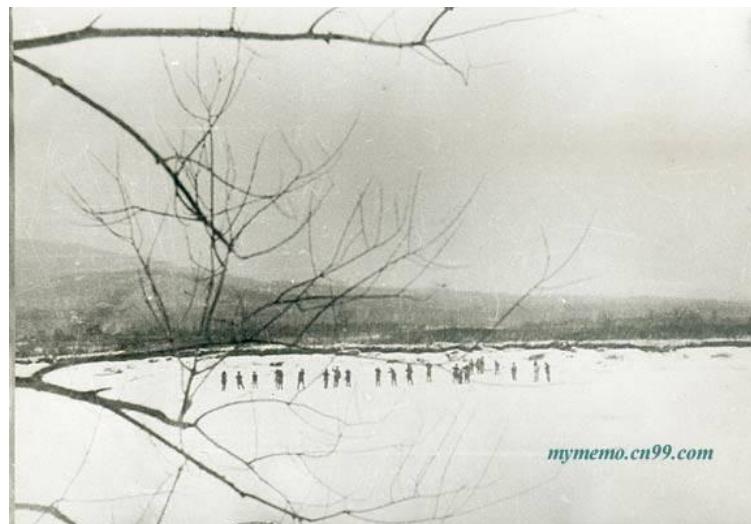
在珍宝岛战斗中的中国八五反坦克加农炮



彼得罗夫，苏军伊曼边防总队政治处士兵。1969年3月2日，在珍宝岛冲突中阵亡。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架照机，他留下了死前拍摄的最后3张照片。这是他生前（1969年2月）的留影。



彼得罗夫遗作之一（1969年3月2日）这张照片发生在交火前。



1969年3月2日，一队中国军人在珍宝岛的冰面上。这是苏军上尉彼得罗夫的遗作之二



珍宝岛上空的苏军直升机（1969年1月25日）



苏联方向拍摄的珍宝岛全景（1969年5月）

很快，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给军委打来电话报告。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

好！”对周恩来说：“他们早就要打，开始是小打，再往后，可能是大打，这一点我们是早有准备的。来了，也不要怕，怕也没有用。”

他说，在九大代表里应该有珍宝岛的代表。

周恩来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我们不想打仗，首先是不怕，还是我过去讲的那些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珍宝岛很小，就那么一点，但是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不能大意，对政策性问题，要处理好，要把握主动，有了主动权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周恩来说：“我马上和肖全夫同志再谈一次，情况是很复杂，我们要头脑冷静，要有理有节，争取主动。”

随后，周恩来赶回西花厅，接通了沈阳军区，向负责作战的肖全夫副司令员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3月2日当天，中国政府就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照会。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照会。

第 1068 回：集北京，商议筹备开“九大”

三一五，珍宝岛炮火连天

3月3日，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通知》要求在游行示威中要严格遵守“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中国使馆、机构和苏联在中国人员”和“群众队伍在同外国驻中国使馆之间划一道线”的指示。当时称为“五不”“一划”。

此时，陈伯达的“九大”报告写得很艰苦。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稿子进展缓慢，长时间的思考、推敲，大家都替他着急。

陈伯达也同样着急，但这个报告在他看来太重要了，他是字斟句酌，不希望出现一点纰漏。

3月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的期限已过了10多天，仍然没有消息。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他提出，“九大”可以在3月15日召开，会期10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中央和各省的文史馆保留没有什么坏处。”

他批评了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拖延时间，并问

林彪准备了没有？说“要吃自己的饭。”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称：“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要准备打仗。

3月7日下午，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代表，可以先找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谈一下情况，有些问题要同他们商量一下，如毛远新不当代表，没有通知他们那里。”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伯达同志起草的报告不是讲2月20日交卷吗？没有说明延长时间的理由，作了决定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

他问陈伯达：“你究竟要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你们有一个3人小组，又不在一起议论，索

性把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谈到里程碑的问题，毛泽东说：“里程碑的问题，我不赞成写，”他对林彪说：“你要讲，我就不赞成，写了没有益处。”

林彪说：“讲是要肯定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

毛泽东说：“做报告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讲就不突出中心了。讲一个中心，围绕着讲一点别的，每次开会都有一个中心。”

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

会后，3月7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全国各省市革委会、各大军区负责人到京开会。第二天派飞机将他们接到北京，共计123人。

内蒙的滕海清和吴涛作为“九大”代表早早赶到北京。第二天，康生就先向滕海清打了招呼：内蒙古清队有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这期间，周恩来也委托谢富治和温玉成找滕海清谈话，更全面地指出了其错误的严重性。

3月9日，毛泽东圈阅中央文革碰头会3月8日晚商定

的关于“九大”筹备工作事宜的报告。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 128 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

“九大”共有 45 个代表团，分为 6 个大组。3 月 10 日，周恩来参加由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 5 个省、市，以及南京、济南、福州 3 大军区共 8 个代表团组成的华东组讨论，许世友等人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会上，华东组很多代表对王效禹提出了意见。

陈伯达的“九大”政治报告进展依然十分的缓慢。秘书们很着急，建议他是否把已写出来的第一部分稿子先报送毛泽东，写完第二部分时再送。陈伯达同意，他用工整的字，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问候毛泽东外，主要介绍了他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想法和过程。信写好后，他挑了一个大的牛皮纸口袋，生怕上面有灰，用衣袖前后擦了一遍，然后，把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他已写好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第一部分一并装入，十分恭敬地封好，拿起毛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工整地写上“即呈 毛主席”五个字。派人送出报告稿后，陈伯达心里仍然七上八下。

送出的稿子一直没有回音。陈伯达的起草工作更加缓慢了。

第二部分写完后，秘书们实在憋不住了，在陈伯达休息时提出是否将第二批稿子送毛泽东。陈伯达说：“不用，写完后一起送一个完整的稿子，主席就会一口气看完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能一段一段给主席看。”

这时，江青听说陈伯达没有将毛泽东说的“邓小平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稿中不要写他”的话在文革小组传达，很生气。回到钓鱼台，立即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了这件事情，说陈伯达这样做，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他们3人又找到康生，讲了这件事，康生也很恼火，赞成江青说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于是他们商定：马上召开一个会议，专门批陈伯达。

这个会说开就开，就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前，江青通知了北京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宣布：“我是这次会议的主席”，接着，她简单讲了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问题，然后就给陈伯达扣了一大堆帽子，上的“纲”非常高。江青讲完，康生接着讲，也很激烈。康生发言后，江青让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解释了一句话，就被江青打断，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

陈伯达那天是穿着军装去的，江青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并对其他人说：“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根本没服气，跳起来高喊：“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这时，参加会议的叶群站起来高呼口号：“拥护江青同志！”

会上其他人也跟着高呼了这一口号。

陈伯达再次高声叫道：“大字报上街！”

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毛家湾，叶群马上给陈伯达家里打电话，解释说：“在那种场合，我只能这样喊。请陈伯达原谅。”

陈伯达说：“我完全理解。”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

毛泽东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

毛泽东说：“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他再次强调：“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

“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

他说：“不能引证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宁是帝国

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

“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

“对战争的问题一点未讲到。”

“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还有十月革命嘛！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

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陈伯达一句话未说，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散会后，他对周恩来说：“我那个稿子只剩下一点了，怎么办？”

周恩来安慰他说：“那你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他让陈伯达把已经写完的报告稿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一下。于是，陈伯达把写好的政治报告稿的前三部分拿了出来，交给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在讨论会上，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批评陈伯达的报告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

这天夜里，叶群从钓鱼台开完会回到毛家湾，慌慌张张地走进秘书办公室，用一种十分急促的口吻对秘书张云生说：

“老张，快把所有参加拉条子的人给我叫来，我要亲自给他们没开个会！我要不催，别人是不会着急的。”

拉条子的人被一个个的叫到了毛家湾，叶群开始教训起来：

“我对你们讲，你们给首长在‘九大’讲话拉的条子，现在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我刚从钓鱼台开会回来，我们讨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的部分初稿，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说陈伯达的稿子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我没表态。但陈伯达写的东西都挨批了，你们搞的东西还能有把握吗？我不亲自抓，你们也可能放黄枪，首长也跟着你们放黄枪，那个责任谁来负？现在你们都说说，你们分工拉的那些条子究竟写了些什么，我来把把关。……”

大家开始一一向叶群汇报。她一边听，一边插话。听了一阵，显然感到疲倦了，于是说：

“今天就到这儿吧，总之，你们要抓紧，限你们在三天之内交卷！”

但是还没到三天，张春桥、姚文元在 16 日便拿出了初稿。

在此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自 3 月 4 日起就开始举行游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在 4 日至 12 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全国参加游行的军民已过 4 亿人次以上。

从后来得到的苏联给东欧各国的内部情况通报看，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不知道中国的动机、目的何在。

苏军向珍宝岛方向正面增调了 1 个摩托化步兵团，1 个坦克营、1 个 122 加农炮营、122 榴弹炮营、120 迫击炮营、“冰雹” -BM-21 火箭炮营。

中方也增强兵力兵器，加强防御。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中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中国边防军派出 46 军 133 师 397 团侦察排排长于洪东带领的 1 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分队在岛西江汊的冰层中埋设反坦克地雷，并掩护 15 日巡逻队执行任务。

3 月 15 日凌晨 4 时，苏军 6 辆装甲车乘着黑夜掩护，在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的率领下登上珍宝岛，其中 30 多名步兵潜伏在丛林里，准备偷袭上岛的中国巡逻队。但是，苏军的举动被中国边防部队发觉。中方 1 个步兵排和 1 个步兵班迅速上岛，增强警戒力量，并用广播向敌提出警告。

上午 7 时 40 分，沈阳军区第 23 军 73 师 217 团一营营长冷鹏飞奉命带领一个加强排和另一支巡逻队登上珍宝岛。8 时 02 分，中国边防巡逻队与岛上的苏军潜伏小分队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中国边防军击毁苏军两辆装甲车，苏军

撤回到苏联一侧，第一次战斗结束。中方前指命令两个75无后坐力炮班、1个40火箭筒班登岛，令纵深1个75无后坐力炮排、3个火箭筒班向前机动，待命参战。

9时46分，苏军3架直升飞机向珍宝岛俯冲过来。接着，苏军在岸上炮火掩护下，出动坦克6辆、装甲车5辆，从南北两侧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其中4辆坦克向珍宝岛南侧江汊运动，企图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并以密集火力封锁江汊，拦阻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支援。

苏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坚硬的冻土和树枝树根被炸飞起来，然后又像冰雹似的砸下来，炮弹几乎把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岛翻了一遍。中方步兵一个排，利用依靠陡峭的江岸修筑好的工事沉着应战，在岸上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苏军的冲击。

苏军一看正面进攻受挫，就绕过岛的南端，悄悄地从珍宝岛西面的江汊上包抄过来，企图从背后袭击中国军队。上午10时，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中国的支援部队。

但是，苏军没有想到中方会在结冰的江面上布下反坦克雷。397团侦察排长于洪东看见敌人的坦克从南面上来了，心中暗喜，他命令用40火箭筒把坦克引过来。

“嗵”，40火箭弹准确命中敌人坦克的腰部，但只是将坦克震得微微一颤，根本没有钻过坦克的装甲。坦克中的苏

军士兵显然被这枚火箭弹激怒了，一边开炮一边加大油门朝中方江面上冲过来。

这时，中国边防军无后坐力炮班登上珍宝岛2号阵地，立即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然而，中国边防军使用的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无法击穿苏军T-62坦克，苏军坦克仗着先进的性能只管轰鸣着往前冲。中方无后坐力炮班长杨林见状，抢占有利地形，待苏军坦克驶近到只有10余米远时，他接连投出5枚手雷，打乱苏军队形。突然，“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冲在最前面的一辆T-62新型坦克抖了一下，随即升起一股浓烟，坦克闯入雷区，履带被反坦克地雷炸断了。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铁家伙，顿时瘫在江面上，再也不能动弹了，杨林也不幸被苏军坦克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两个炮班机动射击，连续击中3辆装甲车。刹那间，中方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打得跟在后面的步兵慌不择路地往回逃窜。苏军其他坦克、装甲车似乎是知道进入了雷区，一时间在冰面上打转儿，不敢乱窜。

于洪东冲到被炸瘫的那辆T-62坦克上，揭开顶盖把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后来才知道，苏军一名中校军官被炸死在里面。

苏军坦克慌忙逃回苏联一侧。

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请求增援。等上报到莫斯

科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在印度，勃列日涅夫正在去匈牙利的路上，没有人敢下令增援。直到下午，勃列日涅夫才得知消息，同意派兵增援。

下午 13 时 35 分，苏军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防御阵地、边防站及后方桥梁猛烈轰击，火力正面达 10 公里，纵深达 7 公里。中方则以江岸一侧的炮兵群加入战斗，以强大火力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猛烈打击。

苏军在持续近两个小时的炮击后，于 15 时 13 分，又出动 10 辆坦克、14 辆装甲车、100 多名步兵向珍宝岛发起第三次攻击。

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在距苏军几米、十几米的地方开火，与苏军近战，分割其步兵与装甲车、坦克的联系，减弱其火力。部署在 209 高地的两门 85 炮直接瞄准敌装甲车射击。

火箭筒手华玉杰越打越勇，在零下 30 多度冰天雪地里，甩掉棉衣和绒衣，先后击毁击伤苏军 4 辆装甲车。

15 时 30 分，岸上中国炮兵群以猛烈的火力集中轰击。35 分，85 加农炮营集火向苏坦克、装甲车射击，发射炮弹 1500 多发。打死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尔后中方炮兵转移火力，打击苏岸倒灌流、124.5 高地，大水泡子等地集结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下午 17 时后，天色转暗，苏

军全部撤出珍宝岛，第三次战斗结束。

这次战斗共击毁苏军坦克 1 辆、装甲车 2 辆、击伤 4 辆，击毙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扬辛中校等 60 余人，击伤 80 余人。中方张印华排长、杨林、张振万、吴文俊等 12 人牺牲。

当天下午 16 时，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但遭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拒绝。几个小时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抗议声明”。为此，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指出：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派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又一手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苏联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保留进一步提出要求的权利。”

第 1069 回：毛泽东，再强调落实政策

执己见，伯达与春桥争论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黄永胜、陈锡联、谢富治等人开会，听取了珍宝岛战况汇报，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

毛泽东说：“总感到要打仗，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

他说：“敌人炮火打进7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他进来，进来就好打了。”

他还说：“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照常打。东北、华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让敌人占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知道了。”

林彪说：“今天的行动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

挥的。”

毛泽东：“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毛泽东说：“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他说：“‘九大’这个会要准备一下，不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摆在我面前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

“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

谈到“九大”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

“报告还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常委会只搞一个。‘八大’搞书记处，又搞常委会，重复了。”

毛泽东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

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他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走资派嘛！死不改悔地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毛泽东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66年冬季和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

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毛泽东最后说：“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3月14日，《红旗》杂志第3、4期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最近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15日，《人民日报》做了转载。

张春桥和姚文元从16日起，陆续将他们起草的“九大”

报告稿分批送毛泽东和林彪审看。

接着，陈伯达也赶写出了他的政治报告全稿。两个稿子都用铅字排成清样分送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陈伯达收到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后，很快就在他房间里看了一遍。然后拿着稿子急匆匆地来到秘书办公室，很激动地对大家说：“他们这个稿子你们看了没有？他们这个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说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稿子。

陈伯达不甘心，通过与叶群的特殊关系，请求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

康生给毛家湾叶群打来电话，叶群作了记录。康生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老的电话，由我向首长讲。”叶群对秘书交待说，“张、姚写的稿子，我只能向首长将文革碰头会讨论的情况，

稿子的内容，就得由你们去讲了。老夫子的稿子已经不能用了，但他坚持印出来，还托我劝首长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对他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了，这是为了给他一点安慰。但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能讲得太细，以防首长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兴趣。至于张、姚的稿子，文革碰头会讨论过了，但还不知道主席的态度。可以等到主席有了态度之后再说。”

“我们拉条子的事怎么办呢？”秘书张云生问叶群，她规定的3天期限已过，除林立果外，其他人都已突击出来了。张云生问：“主任什么时候看？”

“我不想看。等一等再说吧。”叶群又不着急了。

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3月16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批示：“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秘书向林彪讲了。林彪问：

“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他的大意。”秘书张云生说。

“现在不用讲。”林彪说，“他们还要修改，等改过了再说。”他接着又问：“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看过了。”

“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他们哪一个好一些呢？”林彪

又问。

“很难说。”张云生含糊的说道。

“不要紧，你说说看。”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这在他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的。

“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张云生绞尽脑汁，挤出这么一句。

“不要迷信那些大秀才！”林彪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写的东西中有哪些可取之处，在给我拉‘条子’的时候，把能吸收的吸收过来。但他们作的是官样文章，这一点不要学。”

“我们拉的‘条子’已经差不多了，首长什么时候能听一听呢？”张云生乘机汇报说。

“不急。弄好了，先放在你们那里。最后可能用，也可能不用。你们可以不断作些充实，就是不用，也是练兵嘛！”

3月16日深夜，正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华沙条约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的勃列日涅夫听到15日中苏战况的报告后，非常震惊。当他得知苏军的一辆T62坦克还留在中国领土上时，对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大发雷霆：“这辆坦克不能落在中国人手里，一定要弄回来！实在弄不回来就设法把它破坏掉！”

格列奇科保证，一定不让这辆坦克落到中国人手中。

3月17日凌晨，苏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前沿阵地和纵深炮

击，并用火箭布雷器在岛上铺设了 1000 余枚地雷，封锁了通向江边的道路。同时出动 70 余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

中国边防部队立即实施炮火拦阻射击。17 时，苏军撤回苏联境内。至此，珍宝岛自卫反击战遂告结束。事隔一个多月之后，苏联的《红星报》披露了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阵亡的细节。

发生在远东一个不起眼的小岛上的战事，牵动了太平洋彼岸美国总统的神经。3 月 18 日，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共同度过了一个不眠的“中国之夜”。

尼克松总统问：“亨利先生，抛开我们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你认为，中国、苏联，这两个国家哪个更可爱些？”

基辛格认真考虑了一会儿，才笑着说：“阁下，你明明知道，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不愿谈论的，如果一定让我讲，我似乎偏向一点中国……我是一个犹太人，创世纪前，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毁灭，犹太人无家可归，四处逃亡，而又处处碰壁。一个国家接纳了我们，那就是中国。二次大战中，犹太人又遭劫难，许多国家因畏惧德国人，将犹太人拒于国门之外。又是中国，在上海港接纳了 2000 多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暴尸大海的厄运……这也是中国为什么百般呵责以色列，而以色列人从不恶言相向的原因……”

第 1070 回：接线员，敢顶撞外国首脑

招老帅，共商谈“九大”事宜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陈伯达在讨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草稿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意见，他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要把生产搞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你们只强调政治运动，是在搞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就主张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在会上还举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生产率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高的例子，又举了中国一些城市生产率高，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例子。他反复强调：“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张春桥立即反驳陈伯达，说他是在宣传“唯生产力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伯恩斯坦主义，张春桥说陈伯达是唯生产力论。这时，毛泽东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他起身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后，毛泽东发了言，他说：“陈伯达的意见是对的，应当考虑报告上加进陈伯达的意

见。”

周恩来也说，陈伯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应该加进“九大”政治报告中去。林彪随后也表态说陈伯达的意见好，要加上。

最后，大家都同意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文稿基础上进行修改，问及陈伯达时，他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

毛泽东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3月20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通令表扬珍宝岛反击战参战部队，边防部队侦察连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授予10名指战员以“战斗英雄”称号。

同一天，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6000人改为现役部队，但不列入部队定额。此后直到1970年，相继成立了江苏、安徽、兰州、内蒙古、广州、云南、福建、江西、山东、浙江、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

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群众建设边防，保卫国家安全；培养和造就亦兵亦农的社会主义建设队伍；开发和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农业。适应边防斗争的需要，生产建设兵团还组建了一定数量的战备值班分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平时配合部队和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作战或机动执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对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

新疆建设兵团 1975 年发展到 220 万人口，拥有工业、农业、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各种综合性企业，其工农业总产值占新疆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1/3。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系统垂直领导的组织形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地区性经济建设规划的需要，从 1972 年开始，各军区所属生产建设兵团陆续撤消或是改变领导体制。建设兵团的党、政工作和生产建设交地方党和政府领导，军事工作和现役部队则归所在地军区领导。

3月20日这天，中央军委批复空军，同意1968年12月21日《关于空军一九六九年部队组建计划》。据此，空军年内组建了两个军部、6个歼击机师、两个高射炮兵师。即：将空军兴宁指挥所改建为1个空军军部，5月4日改称空军第12军；在西安组建1个空军军部，11月10日改称空军第11军。组建空军第40至45师及空军高射炮兵第18、19师。

3月21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兵力，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就在周恩来召集作战会议同一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横越欧亚大陆，将电话打到北京，要求和毛泽东或周恩来通话。在苏联，有主战派，有主和派。柯西金是主和派，他迫切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避免两国爆发战

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莫斯科的电话就打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问他们“有没有中国领导同志的专线电话号码？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苏联驻华使馆回答说：“没有。”

于是，莫斯科又把电话打到中国设在总参通信兵部的北京国际电话站，询问有没有周恩来的电话号码和外交部部长陈毅的电话号码？

结果，北京电话站的接线员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3月21日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亲自要通了北京国际电话站，要求接通毛泽东的电话，结果被接线员大骂了一通。当时的电话记录是这样的：

莫斯科：“北京，我是莫斯科，我把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电话接给你。”

北京接线员：“是要苏联大使馆吗？……什么？我不懂。”

柯西金：“你用俄语讲话吧，好不好？”

北京接线员：“你用汉语讲话吧！”

柯西金：“我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给我接毛泽东的电话。”

北京接线员：“你找谁？找谁？我不明白。”

柯西金：“我现在把话筒给翻译。”

苏联翻译：“这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他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是苏联电话站的翻译吗？”

苏联翻译：“是，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请你转接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你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柯西金主席，他有事同毛泽东谈话。”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他是个大叛徒。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苏联翻译：“他有事情同毛泽东谈。”

北京接线员：“你跟我讲吧，叫他跟我讲。”

翻译：“喂，柯西金主席请你转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喂，喂，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叛徒，是个大坏蛋，是个赫鲁晓夫分子。”

苏联翻译：“你是谁啊？”

北京接线员：“我是北京电话站。你要干什么呢？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苏联翻译：“他要你把电话接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

北京接线员：“他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可以向他讲。”

苏联翻译：“请你找你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啊。”

苏联翻译：“是吗？你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你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北京接线员：“你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谈谈。”

北京接线员：“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

苏联翻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电话通了将近 10 分钟，柯西金依然是一无所获。

后来，总参三部的电话纪录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接线员的做法做了如下批示：

“精神可嘉，做法欠妥”。

当时，中苏高频热线电话有两部，一部在中共中央，另一部设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几个小时以后，柯西金的秘书拨通了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高频电话，就北京接线员的“无礼”提出抗议，并请转达柯西金想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接的电话，他告诉柯西金：

“苏联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没有正式关系。但是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

最后，非常恼火的柯西金要求把电话转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

柯西金在电话中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但电话站不予转接，接电话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能不能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周恩来或陈毅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泽东通话。”

叶立扎维金说：“我们要接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电话很困难，他们不给接。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电话。”

柯西金说：“好吧。”

叶立扎维金问：“除了毛泽东之外，同周恩来通话也可以吧？”

柯西金说：“最好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能讲的话，也可以同周恩来讲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电话后，叶立扎维金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有紧急问题要约见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答复说：“外交部副部长有事，没有时间接见，苏欧司副司长可以见。”

3月22日零时，外交部苏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与叶立扎维金见面。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双方的对话一开始就都充满了火药味。

李连庆副司长说：“首先我要向你严正指出一个问题：我在 3 月 13 日约见你，乔冠华副部长在 3 月 15 日约见你，你都拒绝来见。你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完全有义务应约来见。我不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什么？”

苏联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几个小时前，用高频电话想同毛泽东同志联系，因为中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柯西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要我报告这次会见的结果，我怎样报告莫斯科？”

李连庆副司长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中国共产党联系，那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

叶立扎维金：“就这些吗？”

副司长：“就这些。”

叶立扎维金：“我坚决抗议你在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

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议，你们在报纸上歪曲事实，说我们拒绝约见。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教训。”

说罢，叶立扎维金站起来就走了。

约见不欢而散。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电话的事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召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和苏欧司副司长李连庆等人商议。

周恩来在听取了李连庆的汇报后表示：“你说报告政府和我，这是对的。因为中苏还有国家关系。但是你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打击面就大了，而且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苏联领导集团。……”

经商定，中国政府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柯西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和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约见我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的具体情况，并将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的备忘录送毛泽东审批。

周恩来在备忘录草稿上批了“即准备谈判，送主席”后，即让王海容送交毛泽东。

当天，3月2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收到毛泽东批示后，李连庆副司长于 22 日深夜 23 时 45 分约见叶利扎维金，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

3月21日，张春桥、姚文元又送审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四、第五部分，毛泽东批示：“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

3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送审报告修改第一稿，毛泽东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

毛泽东删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一语中的“柯西金之流”。

3月22日下午，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到人民大会堂 118 厅毛泽东处开会。

看来，毛泽东对四位老帅的“蹲点”情况挺满意，一见到他们就说：“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

他又问：“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

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主席团 175 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

针对“二月逆流”的问题，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毛泽东问起北京电话站接线员的事：“柯西金打电话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电话的人很厉害，把他骂了一阵，说他是叛徒。把人家的总理都骂了一顿，人家说是不尊重我。我看应该给他转一下。”

周恩来插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毛泽东继续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法国大使叫人家帝国主义的大使，苏联大使叫人家是修正主义的大使。我们在有些场合揭露是必要的，但有时不要这样骂人。我们同蒋介石谈判也不骂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毛泽东又问：“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是不礼貌？”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给他们一个照会，说通电话不方便，有事情通过外交途径，不搞热线活动。”

毛泽东说：“热线活动不能搞，他们喜欢搞这一套。你们去一下，要不要通电话？”

毛泽东又说到珍宝岛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讨论，同我们一样。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不知道。”

毛泽东问林彪“九大”政治报告的情况：“文件你看了没有？国际边境事件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毛泽东说：“就在4月1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政治报告也不要什么都讲，报告上中央文革所有人的名字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

第 1071 回：争坦克，中苏两国施伎俩

派间谍，加紧研制穿甲弹

3月24日，东北前线部队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他亲切慰问了边防部队，同时命令一定要把那辆打瘫的苏联T-62坦克拖回来。周恩来在电话中特别强调：“这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有政治意义。有这个铁家伙作证，就不怕苏修在全世界面前耍赖。”

T-62坦克是当时苏联研制的最先进的作战坦克。它是苏联继T-54/T-55坦克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研发的新型主战坦克，1962年定型，1964年成批生产并装备部队，1965年5月首次出现在红场阅兵行列中。苏联T-62坦克的生产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T-72坦克投产时为止，共计生产约2万辆。为满足军火市场的大量需求，苏联还特许捷克斯洛伐克生产这种坦克，在1973年至1978年间大约又生产了1500辆。这种坦克自重37.5吨，配有115毫米滑膛炮1门，7.62毫米机枪和12.7毫米高射机枪各1挺，装甲钢板十分坚固，配有当时十分先进的红外线夜视装置，时速可达50公里，上面一些设备，比如红外线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等等，按照苏联人的说法，在当时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难怪勃列日涅夫会气急败坏，周恩来会高度重视。于是，中苏双方绞尽脑汁，各施计谋，为了这辆坦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

苏军3月17日动用火箭布雷器向珍宝岛发射了不少地雷，封锁了通向江边的道路。当时，中国前线部队并不知道苏军此举的意图，只认为是对方的战前部署，所以没有及时将地雷排除，只派出几个警戒哨防止中方人员误入雷区。

在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前线部队马上意识到这是苏军为争夺坦克采取的行动。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果断命令部队采取相应的行动，首先派人排除苏军布下的地雷。

苏军方面对中国的举动似乎有所察觉，就朝那辆坦克附近猛烈开炮，显然是想把江面上的厚冰打穿，让坦克沉入江底。但冰层实在太厚了，炮弹竟奈何它不得。

当晚，中国方面派陆军第77师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带领10名排雷能手，悄悄进入雷区排雷。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任务。但苏军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们，不停地开枪射击，孙征民和一名战士不幸牺牲。

苏军发现中国方面在排雷，立即觉察到中方的意图，在无法阻止中国军队行动的情况下，他们也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想把坦克上的一些先进设备盗走。中国军队发现后一阵猛烈射击，苏军小分队只好仓皇回逃。

格列奇科在莫斯科一日三催，苏军前线部队指挥官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万般无奈，只好再派一支小分队，去把坦克的

内部设施炸毁。这支小分队由6人组成，全是身强力壮擅长单兵作战的侦察兵尖子。他们携带了120公斤炸药，趁着黑夜的掩护，披着白色斗篷，悄悄摸过江来，实施破坏活动。

中国方面在这辆坦克的附近安排了8个观察哨。但是这天担任警戒的8个战士由于连日劳累，居然都伏在雪地上睡着了，谁也没有发现这股偷袭过来的敌人。苏军小分队搜索前进时，发现了一名伏在雪窝里熟睡的战士，一枪托将其砸昏，然后把带来的120公斤炸药塞进坦克驾驶舱。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响起了一串清脆的“哒哒哒……”的冲锋枪声。苏军小分队未及引爆炸药就赶紧撤离了。

其实，这枪声纯属意外——原来中方战士换哨时，其中一个战士被埋在雪里的枯树根绊了个趔趄，手指无意间扣到了冲锋枪的扳机，鬼使神差竟成了一次有功的走火。

天明后，战士们发现坦克上已经堆满了烈性炸药，真是好险啊！

就这样，苏军破坏坦克上重要设备的计划未能实现。

但是，中国军队要把坦克夺过来也十分不易。

一开始，战士们悄悄地将钢缆套在坦克上，然后用牵引重炮的卡车拖，一辆不行，两辆也不行，一直加四辆，坦克还是纹丝不动——30多吨的坦克再加上冰雪封冻，随便你怎么拖，它就是一动也不动。

肖全夫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情况，中央军委电令，一定要把这辆坦克完整地夺过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肖全夫几次冒着苏军的炮火亲赴江边观察，最后决定：架设人工绞盘，配合载重汽车，将坦克拖走！经过努力，终于把坦克拖上了岸。人们刚要欢呼，却发现这辆坦克被牵引的重力扯成了两半，拖上岸的仅是炮塔，而车身还留在江面上！

这时，苏军方面发现情势不妙，便集中火力朝江面开炮。由于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冰层开始融化，加上炮弹猛轰，终于将冰面炸裂，坦克慢慢地沉入了乌苏里江底。

中国方面决心既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4月底，乌苏里江上的冰全部融化，前线指挥部决定打捞坦克。5月2日，来自海军北海舰队的3名潜水员潜入江底，用钢绳把坦克缚住，岸上数辆重型卡车牵引，终于把坦克拖上了岸。

但是，围绕这辆坦克进行的斗争，并未因此画上句号。苏联方面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克格勃又登场了。他们派了一个叫窦祥松的人来实施破坏行动。

窦祥松何许人？他是黑龙江省某地恶霸窦顺仁的独生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窦顺仁就被人民政府镇压，窦祥松对人民政府怀恨在心。新中国成立后，窦祥松又因调戏妇女和偷盗公物被判了3年徒刑。

1961年，窦祥松刑满释放，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遣送原籍，

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他是个屡教不改之徒，又喜欢小偷小摸，拈花惹草，所以经常被治保干部叫去训话。1967年5月上旬的一个风雨之夜，窦祥松将治保干部张季英、郝某夫妇残忍地杀死后越境外逃……到苏联后，窦祥松很快加入了克格勃。克格勃对窦祥松说，中国准备把“盗窃”的那辆T62坦克运往北京，由专家进行破解研究，“窃取”苏联的技术机密。

窦祥松听到这里，已经完全明白了克格勃的意图，问道：“首长的意思是不是派我去把那辆坦克炸掉？”

“哦，窦同志，您很聪明，也很勇敢！您猜测得很对，是要派您回家乡走一趟，不过，炸掉一辆30多吨重的坦克，这不现实！我们只要您把坦克里面的一些仪器炸掉就可以了。具体如何实施，由我们的专家详细向您交代。当您完成任务从中国返回时，就不必回这里了，我们将把您送往莫斯科，在那里，已经为您准备了一幢不错的房子，当然，里面还有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如果您愿意，她将成为您的妻子。”

1969年5月8日深夜，窦祥松潜入中国境内。上岸后，他立刻加快脚步朝前走去。他在这里土生土长，知道此处不宜停留，必须尽快走到离江岸3公里之外，才算到了安全地带。不久，天上下起了雨，他心中暗喜，大着胆子往前走。在特务学校所受的残酷训练和营养师精心配制的膳食，此时发挥了作用，窦祥松只用了20分钟时间就走完了4公里泥泞小道，来到了一个屯

子外的破庙前，站在门口看了看，便走了进去。窦祥松知道这个屯子叫“光明屯”，前面有条公路，一头通往虎林县城，一头通往兴凯湖。在兴凯湖十几公里处，有一条通往密山市的公路。根据克格勃专家制定的方案，窦祥松将绕道兴凯湖转往虎林县通往密山市的中途，在某个小镇，等候运送T-62坦克的汽车，伺机破坏。

窦祥松打算拦一辆拖拉机，因为拖拉机都是农村的，乡下人不认识自己，那样比较安全。

这时，公路上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响，窦祥松定睛一看，正是一辆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Ⅱ型”履带式拖拉机，正向他这边开过来。窦祥松三步并作两步奔出树林，冲拖拉机连连招手：

“停一下！停一下！”

拖拉机停了下来，年轻的拖拉机手从驾驶窗里伸出头来：“干什么？”

窦祥松说：“搭个车。”

“去哪里？”

“我上兴凯湖。”窦祥松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扔进驾驶室。这香烟是从苏联带来的，但却是真正的中国货，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从北京采购后运往莫斯科的。

拖拉机手对窦祥松的大方很感激，点点头道：“谢谢！不

过我不去兴凯湖，我到郝家庙去拉木材。”

郝家庙是兴凯湖至密山市与虎林县至兴凯湖两条公路交叉点的一个小镇，正是窦祥松要去的地方，他心里高兴，脸上却故意显出一种略略失望的神色，说：“那这样吧，我跟你去郝家庙，到了那里再找车搭。”说着，从衣兜里抽出一张10元人民币，塞到拖拉机手的手里。

20世纪60年代时，10元是人民币的最高票面，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眼前这个拖拉机手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拖拉机手喜出望外，竟跳下车来，把窦扶上后面的拖斗。拖拉机经过一个检查站时，被检查员拦了下来。

检查站是公路和工商管理部门所设，除了检查有关交通、工商范围的情况外，还受公安部门的委托，对需要检查的过往人员检查身份证件。

窦祥松从身边取出边境通行证递过去。检查员看了看问：“是饶河的？”

“对，我是饶河县公安局的，到这边来出差。”窦祥松又出示了饶河县公安局的工作证和出差介绍信。

窦祥松所出示的这些假证件，都是克格勃技术活动管理局的专家伪造的，以眼前这个检查员的眼力自然难以辨别，于是很快就挥手放行。

上午10点多钟，拖拉机到了郝家庙，窦祥松谢过拖拉机手，

告辞而去。他计划是在郝家庙住一夜后，次日去密（山）虎（林）公路途中的小冲坡，那是个小镇，镇上有座桥，是运送T-62坦克的必经之地。他准备在那里下手炸坦克。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窦祥松在郝家庙镇上的“工农兵旅社”被捕。在他携带的背囊里，查获两枚高爆燃烧弹。这两枚特制的燃烧弹只要有一颗投进T62坦克，就能把里面的所有设施全部炸坏烧毁。

窦祥松被捕后，供出了其充任克格勃间谍，受命潜入中国执行炸毁T-62坦克破坏任务的全部经过。同年9月下旬，窦祥松在哈尔滨被判死刑，执行枪决。

在1969年中苏武装冲突期间，中国军队的各种口径反坦克炮，对苏军的T-62坦克都构不成威胁。在几位老帅的呼吁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但要求穿甲弹、破甲弹击穿透不同厚度的钢板，初速应该是多少？炮弹接触钢板时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又应该是多少？科研人员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没有准确的数据，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幸运的是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了计算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但不幸的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中国刚刚研制的计算机更不可能输入解这种方程式的程序。

叶剑英知道后，指出一定要加速研制出新型穿甲弹、破甲弹，还谈到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先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

讨教。而此时的刘先志，正在“五七干校”，因为当年刘先志曾主持过希特勒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火炮设计，而且据说还有一大堆的“历史问题”。文革一开始，他就受到冲击，不断被批判，后来被划为黑五类，打入另册。

两位奉命到山东请教刘先志的军人获悉这一情况后，不禁犯难了：解这道方程式关系到我军科研的动向，这可是绝密中的绝密啊！怎么办？两位军人商量许久，最后决定，身着便装前去，只让刘先志解方程式，别的一字不提。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干校的菜园里，刘先志正握着锄把在挖地。

两名陌生人拿出了那个方程式说：“我们是搞教育的，碰到一个难题，希望你能帮助解出来。”

老人放下锄头，扫了那个方程式两眼，闭目沉思了一会儿，问：“这方程式是什么用的？”

年长的那位说：“当然是教学用的。”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冷冷地将纸片塞到他们手中，重新摸起了锄把。

“你，你怎么这种态度？”

老人冷眼瞟了他们一下说：“既然不相信我，还找我干什么？”

二人无奈，只得离去。

几天以后，两人又来了。这次他们穿着军装，拎着两兜营养品，背着校领导，直接摸进老人的家门，进门就向老人敬了军礼。

两位军人满带歉意地说：“首长批评我们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

刘先志拦住说：“别说了，都是我不对，我怕你们不来了，那可要误了国家大事……瞧，我已经算出来了，你们需要的几个数据都在这里。”老人从床底下拿出一叠纸，纸上标满各种方程式和最后的数据。

年长的军人惊疑地问：“您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研究破甲弹、穿甲弹，打坦克用的。”刘先志平静地说。

“简直神了，老先生，没有方程式，您怎么算出这些数据的？”另一名军人惊讶地问。老先生敲敲脑袋：“我这手脚不利索，可这儿还灵光。”

两位军人拉着老人的手，喉头哽咽，再三嘱咐老人保重。

没过多久，在吉林某射击场，新研制的破甲弹和穿甲弹，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得弹痕累累，炸得坑坑洼洼，新型穿甲弹终于研制成功了。

北面，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被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摞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

许久，才叹息着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先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1978年，刘先志被平反，1982年被任命为山东省副省长，1988年病逝。但据知情的人说，尽管这个传奇故事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刘教授本人却从来没有认可。

那辆被我军缴获的苏制T-62坦克，后来被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室里。

1969年3月26日，周恩来就外电报道说苏联驻华使馆受到中国公民的骚扰和威胁并导致苏联使馆人员受伤一事批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富治）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过苏联使馆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如其要采取行动，要加以劝阻和干涉。”

3月29日，苏联就珍宝岛事件交予中国政府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但又“呼吁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通过谈判解决”，并提议苏中两国官方代表在最近恢复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

第 1072 回：纠错误，八三四一进北大

说贵州，上海组批判陈毅

1969 年 3 月 20 日上午，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杨处长在全校各级领导干部会上作报告，肯定了宣传队进校的成绩，接着说道：“根据北大的地位、贡献，应产生一名九大代表。让谁去呢？总指挥部认为，聂元梓去比较合适。聂元梓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她是一个造反派，造谁的反呢？造陆平一伙的反，她自己也是受陆平压制、迫害最厉害的，她的造反精神是很强的。”“九大中要有红卫兵的代表。红卫兵的故乡北京的红卫兵是有代表性的，首都红卫兵中，大专院校红卫兵更有代表性，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红代会核心组长就更有代表性，聂元梓是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是红代会核心组组长，聂元梓当选代表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她是代表全北京、全国的红卫兵，不是代表哪一个组织，更不是代表哪一派。聂元梓是反对王、关、戚，反对‘二月逆流’的。经宣传队七个月的内查外调，聂元梓没有反对、损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行，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感情的，是拥护的，她对军队的态度是好的。聂元梓的家庭很复杂，但她本人的历史是清楚的。”

他又说：“聂元梓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如实地传达毛主席‘7·28 指示’，对批评的话不是完全如实地传达，聂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上有责任，但主要是阶级敌人跳动

和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聂在思想意识、生活作风上有缺点，我们指挥部的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缺点的，这是小节，大节是好的。对聂的一些流言蜚语，经我们调查是不属实的。”

当天下午，杨处长的报告在全校进行了传达，并展开讨论。

3月24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81名军宣队员进驻北大，开始纠正前一段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清队”中的扩大化问题，另一方面继续清理阶级队伍。对当时还在开展的清查“5·16”，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北大自“宣传队”进校后就批判了极左思潮，所以北大现在不搞“5·16”，外单位搞，要大力支持，但北大不参加，北大现在搞教育革命，这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北大两派负责人各自进行旨在“消除派性、斗私批修”的“三忠于”讲用会。

聂元梓在讲用会上承认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承认“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大抓反动小集团，扣压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

侯汉清也在讲用会上讲了“井冈山”以暴易暴，大搞派性，歪曲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批示采用实用主义态度等等。

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定性为“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根据2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解决贵州问题会议情况，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指示内容各有五条，人们称之为“双红五条”。“双红五条”下达后，贵州革委会主任李再含被迫把关在监狱里的“411”头头放出来，并解散了支持李再含的贵州“818兵团”，改名为“捍三红”。从此，“411”的活动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

此事的起因据说源于1968年11月18日前后驻贵州的部队换防。当时，7611部队，即49师调到云南省保山地区。而0276部队，即41师从保山调到贵阳。

7611部队临走时与李再含发生矛盾。因为他们要求补充给养，被呼为“牙膏兵”、“肥皂兵”。而0276部队不满身兼昆明军区副政委的李再含在云南的言论，也给贵州反对李再含的“411”组织带来希望。

听说0276部队是乘火车在贵阳南站下车，“411”中学指挥部便悄悄的组织一批学生前往欢迎，结果部分学生被抓走。脱逃的“411”学生立即向0276部队报告，部队随即向

省革委、省军区要求放人。“411”闻讯欢欣鼓舞。

从此，0276部队的来访接待站天天都有到访的“411”学生、工人、干部和居民。“贵阳地区411兵团”趁势重建。1969年元月上中旬，贵州大学邓振新躲在市北路陈克久家楼上几天，写了1万多字的汇报材料，向0276部队反映贵州“411”遭受“踏平”的情况，请部队如实报告中央。

贵州“508”调查组安排一些人打入“411”兵团内部，掌握了“411”负责人陆光武的活动动向，于元月22日晚上20点左右，省工代会和“818兵团”10余人，在贵阳市服务大楼前抓捕了陆光武。

接着，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然后就有了“双红五条”。而此时，北京“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已进入到最后阶段。就在这时，外交部长陈毅又出现了一段故事：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的排名次序发生了变更，原来排在后边的王洪文，调整到了徐景贤的前面，排在了第三位。“九大”筹备期间，张春桥从北京给上海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徐景贤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80名，其中，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

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这封信盖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对上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谢和惭愧。

徐景贤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随后，张春桥催促上海抓紧材料准备。

上海市“九大”材料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清样就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

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标题有：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封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小册子编好后，送王洪文、徐景贤和王少庸审定。徐景贤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将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随后，印了 80 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1969 年 1 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除了收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收集“二月

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76份，1163页。

1969年3月7日，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中央通知，于第二天乘专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他们。皮箱里装的就是上海收集的“二月逆流”的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有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

3月27日晚，上海的80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参加。王洪文、徐景贤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大家在等候陈毅的到来。

王秀珍守候在会场门口。因为她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

“九大”秘书处由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开会，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过来，坐在后排做记录。

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进来了。主持会议的徐景贤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说道：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 81 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布批判发言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

.....

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他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他们的情绪处在兴奋之中，于是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3月28日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他们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来到京西宾馆，二人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听取了王洪文他们

汇报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当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大笑起来。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这天，张春桥、姚文元送审“九大”政治报告修改第二稿，毛泽东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

“林办”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林彪只让秘书给他讲毛泽东的修改之处。

山东省的其他“九大”代表第二批集中赴京。他们刚到北京，王效禹就把韩金海、傅建吾、杨保华三人找去说：“我一下飞机就斗上了，这个风是真不小啊！他们对你们这几个劲头很大。”

针对山东的情况，周恩来对杨得志、袁升平说：“是否可以利用‘九大’预备会的时间，把来开会的省里的、军区的领导同志找来好好谈一谈，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顾全大局，多解决群众之间、工作之间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进行，不要等正式开了再谈。如果最后有的问题不好解决，我可以参加谈一谈。”

于是，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找王效禹等地方代表谈，但没谈多久就谈不拢了。于是又改作个别谈，由杨得志、袁升平找王效禹谈。但是这次谈话依然是各讲各的，直到快

吃午饭，也没有结果，只好不欢而散。

3月26日，王效禹在山东代表组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选九大代表受到中央的批评，多选了11名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代表，这样工人贫下中农的名额少了。本来准备换一下，我们做了检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中央决定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既成事实就不掉换了。另外我们省新生力量多了一些，我们主动检查了，中央说新生力量还可以。”

3月28日晚上的“九大”预备会议，周恩来到华东组。讨论主席团的名单时，王效禹让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发言。赵修德讲完后，周恩来批评山东多选了6名军队支左代表，占了地方名额。王效禹为此作了检查。

山东终于开了一个全体会议，由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参加，预备会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说：“山东究竟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他让上海的王洪文主持会议。

首先是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发言，讲了青岛问题。接着，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从山东“二三夺权”开始，针对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越说越激动，讲了一个多小时。快到11时15分时，王洪文说：“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开到这，下午再接着开。”然后说：“袁升平同志今天上午讲的这些问题，听起来没有重要的。”

袁升平一听生气了，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你又没去过

山东，怎么知道我讲的不重要？如果这样，下午的会也不要再开了。

散了会，袁升平边走边对许世友表示不满说：“你怎么把会议推给王洪文主持？”

许世友笑笑说：“这些事你不明白，算了吧。”

袁升平又讲：“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会不能再开了，不然，不管预备会还是正式会，我都不参加了。”

许世友说：“好好，下午的会不开了。”

下午的会果然没有再开。

第 1073 回：适可止，周恩来婉转叫停

四月一，九大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

3月29日晚上，上海组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由代表们再作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

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也不太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都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他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1954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1958年，共当了9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40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

“陈毅不要评功摆好！”

“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的陈毅对这种场面已经很熟悉了，他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进行批驳。

王洪文见状，悄悄地对徐景贤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拿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说着，他从文件袋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徐景贤，让他发言。

陈毅刚讲完话，徐景贤就抓过话筒说：

“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徐景贤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的放在桌上，说：“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

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1929年6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徐景贤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徐景贤接着说：“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他们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徐景贤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

“就是你这个在40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40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

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40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徐景贤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陈毅！”

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

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下他那光亮的额头。显然，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嘴唇轻轻地颤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出现了许多问题，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

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在 1968 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上海组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年轻代表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他在座位上紧紧地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做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都散去。

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等留下来，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时，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 10 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他们逐一握手，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开了？”

王洪文3人频频点头，认为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3月31日，张春桥、姚文元送审“九大”政治报告修改第三稿，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

“林办”收到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稿，林彪仍然没有看。

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的秘书张益民拿着这份有周恩来批语的报告稿向林彪报告，林彪还是一字未看，直接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

这天中午，周恩来给“林办”打来电话：

“‘九大’快开幕了，打算早一些把政治报告稿子印出来，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副主席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接电话的是张益民。

“送给林副主席看过了吗？”

“送过了。”

“林副主席如果没有意见，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办，他们在等着付印。”

“林副主席已经把稿子批给主席了。”张益民说。

“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周恩来着急的说，“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不再看了，请林副主席最后定稿。这个事叶群同志是知道的，当时她在场。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

“我是否打电话把稿子追回来？”张益民请示说。

“送出多长时间了？”

“半个多小时。”

“不用再追了。”周恩来无奈的说，“已经来不及了。”

3月31日，毛泽东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这天，他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林彪原来布置秘书为他拉的“条子”，到了最后一刻，也决定不讲了。

1969年4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

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全球为之一震，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幕，这似乎意味着已有3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在《新闻公报》广播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九大”将在什么时候召开。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

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空军的飞机载着“九大”代表在北京降落时，北京早已夜幕降临。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别住进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因为“九大”政治报告还没有出来，“九大”又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但是代表都已经陆续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计划4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民大会堂位于北京市中心，1500多名“九大”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统一调配的大公共汽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汽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公共汽车的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

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漫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堪称滴水不漏。

第 1074 回：论文革，林彪作《政治报告》

陶铸病，毛泽东谈史说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4 月 1 日 17 时开始，随同毛泽东和林彪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口号声过后，毛泽东说：“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接着，毛泽东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176 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 176 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

大会主席团候选人共 176 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当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时，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代表举手。

毛泽东：“多数吧？通过了。”

周恩来：“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

毛泽东继续：“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

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这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周恩来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笑声。

林彪赶紧把嘴向话筒前凑了凑，大声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众人鼓掌。

毛泽东：“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赶紧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好！全体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接着，毛泽东说：“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1921年到现在，我们已有40年的

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 12 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

董必武站起来向大家致意。

毛泽东：“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

周恩来：“还有刘伯承同志。”

毛泽东：“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 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

周恩来：“还有王稼祥。”

毛泽东：“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这是毛泽东向大会致的开幕词，他没有讲稿。但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毛泽东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 649 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17 时 32 分，“九大”按照大会议程，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共分成 8 个部分：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一、二、三部分。

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林彪作完政治报告，毛泽东说：“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分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散会！”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之后，大会秘书处有限度地放宽了对代表们的保密要求，允许与外界通信。当时长途电话通话范围十分有限，不少青年代表纷纷涌

向宾馆附近的邮电所，满怀激情地向家乡或单位发电报，报告大会开幕和他们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景，要大家与他们分享这一幸福。有的代表从没有发过电报，在邮电所工作人员帮助下艰难地起草电文，有的一写上千字，绝大部分是电台广播的内容。

从4月2日至14日，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里进行了分组讨论，主要内容是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

4月3日，周恩来就苏联边防军炮击珍宝岛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苏联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他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4月5日，毛泽东同谢富治等人谈话时，再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说：“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他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8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

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副主任，7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副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像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周恩来在4月3日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上看到陶铸病重的

消息，于 4 月 5 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入 302 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 4 月 3 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周恩来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301 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

“九大”期间，江青主动召集了一次军队代表开会，她在会上说道：“主席的接班人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

姚文元说：“江青是文革旗手，当然也是主席的接班人。”

军委机要员将江青谈话记录稿送中央常委传阅，先送到康生那里。康生看后急了，马上扣下记录稿不许再传阅，并要求军委办事组收回其他可能的外流记录。

4 月 11 日下午 17 时至 18 时 30 分，毛泽东召集“九大”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负责人，征求大家的意见。

他见到李雪峰，就问他：“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

周恩来说：“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

张春桥：“是刘志兰、陈守中搞的。”

接着毛泽东征求大家的意见，说：“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 11 号，12、13 讨论两天，14 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对，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

他回顾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斗争后说：“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还有人

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

他又从和孙中山的合作说到蒋介石的屠杀：“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

“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

董必武：“我们在重庆不知道。”

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

毛泽东：“东北没传达。”

林彪：“我们在东北没有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毛泽东：“‘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

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

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

毛泽东：“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

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

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

林彪：“主要抓了典型。”

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

毛泽东：“工厂、农村，66年10月、12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

黄永胜：“搞了。”

毛泽东：“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 8 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脱，超脱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 900 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

张春桥说了上海关的人数。

毛泽东：“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

张春桥：“在扫地。”

毛泽东：“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

康生：“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

毛泽东：“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 1927 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

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

在大家商量了关于《政治报告》的修改、公报的发布等工作后，毛泽东又提起选举的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

周恩来：“还是小组提议。”

毛泽东：“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

许世友：“应当选。”

毛泽东：“王明他们……”

江青：“王明不同。”

毛泽东：“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

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

毛泽东：“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

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

毛泽东：“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

董必武：“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

康生：“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

他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

答：“六十几个。三结合的 5 个，地方 55 个。”

又问郑维山：“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

答：“军队另编一组，32 个人。”

毛泽东转向张国华问：“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他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

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

毛泽东：“从什么地方搞的？”

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

毛泽东：“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

看是个训练。”

第 1075 回：毛泽东，为选举再做工作

九大开，第二次全体大会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负责人开会。

他问：“有什么消息呀？”

周恩来：“准备今晚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开大组会。”

毛泽东：“这要传达干什么？”

周恩来：“主席的话不传达，说咱们封锁。”

毛泽东：“不是，我讲的是否符合事实？”

周恩来：“都符合的。”

康生：“叫他们翻一翻《学习和时局》。”

毛泽东：“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总工会刘少奇。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

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了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出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

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

毛泽东：“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 AB 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现在内务部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把他打倒。”

“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

只能太平一个时候。”

“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

“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

江青：“是。”

毛泽东：“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

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想知道。”

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

毛泽东：“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

大家笑。

毛泽东：“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

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

毛泽东：“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

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

毛泽东：“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

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

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

毛泽东：“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200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10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

周恩来：“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

毛泽东：“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

大家笑。

周恩来：“一点不透风也不好。”

毛泽东：“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分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

周恩来：“六、七亿。”

毛泽东：“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份，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份，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

谈到第二天谁发言，毛泽东要求他们不要讲得时间太长。康生问：“党章读不读？”

毛泽东：“不要。那是形式主义。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

周恩来问：“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

毛泽东：“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

王洪文：“很难呀！”

毛泽东：“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毛泽东继续做工作。

周恩来：“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张闻天、王稼祥。”

康生、董必武：“烂了。”

周恩来：“还有杨勇。”

毛泽东：“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近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

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

毛泽东：“取一技之长。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

康生：“曾思玉注意一下。”

许世友：“王近山开除了党籍。”

黄永胜：“康泽是他捉的。”

许世友：“王近山能打，过得硬。”

毛泽东：“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

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帅搞的。”

毛泽东：“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3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你们政委是谁？”

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

周恩来：“陈先瑞做实际工作。”

毛泽东对李雪峰说：“你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

李雪峰：“也参加会。”

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

毛泽东：“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4月14日下午，“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7时5分，毛泽东等人登上主席台，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

毛泽东：“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

接着，周恩来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他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

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他历数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会议以后所做出的成绩后说：“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听了周恩来发言后说：“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那中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那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强盛的国家，而能影响全世界，诸种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的英明的领导，

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像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17时27分，林彪发言结束，全场喊口号。毛泽东说：“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开幕时候，对于我们党的历史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深刻分析。”“我完全拥护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思想、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报告。”“我

完全拥护这一次代表大会将要一致通过的新党章。这是表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划时代的新党章。”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代表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都为我们这个代表大会而欢欣鼓舞。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蒋介石匪帮，却为之胆战心惊。”

“我们能够成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战士，这是最大的幸福、最大光荣。我们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正在胜利地开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让美帝、苏修和汉奸卖国贼去狂吠吧，让那个以卖国卖党为荣、多年来由苏修叛徒集团喂养的无耻叛徒小丑王明之类去狂吠吧，他们是永远不能得逞的，他们永远要失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全党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紧跟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第 1076 回：众发言，特别介绍孙玉国

纪登奎，他“是我的老朋友”

接着康生发言，他以谈体会的方式表示了对毛泽东开幕大会上的讲话和林彪所作《政治报告》的拥护，他着重谈了新党章的产生过程及特点：

首先是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次是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

第三是阐述了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是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特别是把“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规定为党的纲领性的战斗任务。

第五是内容简单扼要。全部党章只有 12 条，篇幅短，好记易懂，便于背诵。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说：“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

黄永胜在发言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讲话和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表示拥护外，着重谈了军队在今后要“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同全国人民一道，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并表示：“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

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黄永胜发言后，毛泽东说：“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郑重地从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边特设的讲坛，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全党发言。他的发言仅用了7分钟。

王洪文发言后，毛泽东看着主席台前跑前跑后的摄影记

者说：“怎么办呀？同志们，别那么忙。你们都是很忙呀，叫做争分夺秒、你追我赶。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陈永贵发言后，毛泽东问他：“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3月15日战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

孙玉国1961年入伍。3月15日，他在珍宝岛前线指挥作战的副营长负伤后，代理副营长指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他一上台，首先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和林彪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还礼，林彪和众人鼓掌致意。



孙玉国说：“我是来自珍宝岛的边防战士。3月2日、3月15日，苏联叛徒集团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进行了自卫还击，给了敌人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

“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我们全体指战员，怀着一颗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心，‘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就是粉身碎骨，也不向苏修让寸分！’在保卫珍宝岛的战斗中，有力地证明：苏修和美帝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纸老虎。同时，也再一次证明，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和战士都没打过仗，但是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战胜一切敌人，就无敌于天下！”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的胜利也一定是打出来的！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如果帝、修、反胆敢来犯，我们就一定把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统统把他们送进坟墓。”

孙玉国发言中间，毛主席数次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泽东、林彪、主席台上的人都起立鼓掌，微笑。

毛泽东问旁边的人：“他今年多大了？”

然后又问孙玉国：“你今年多大了？30？”

孙玉国答：“29岁。”

毛泽东：“哪里人啊？”

孙玉国答：“东北人。”

毛泽东：“噢，东北人。老家在哪里？”

答：“河北。”

毛泽东：“河北啊，打过仗没有？”

答：“没有。”

毛泽东开始对大家说：“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王字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不用飞机、不用坦克、不用指挥车。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副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副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苏联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3月15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500米我们不打，300米不打，100米还不打。50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不管用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

毛泽东回头看：“没有。”

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

黄志勇站起来。

毛泽东：“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说还要靠步兵。靠 200 米。要准备打仗，要做准备，各省都要能生产武器。主要是精神准备，新疆那里也可能要出点事。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下面请尉凤英同志发言，还是辽宁的。”

尉凤英在发言中说：“我们热烈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热烈拥护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热烈拥护新的党章。这些伟大的革命文献，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照耀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前进的灯塔。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坚决照办！”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一切。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心明眼亮不转向。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人换精神厂换貌、人换精神地换装。

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能千秋万代不变色。

有了毛泽东思想，帝、修、反胆敢来进犯，我们就能把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光！

有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我们决心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把全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们要以林彪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海枯石烂心不变，天崩地裂志不移！”

尉风英发言后，已是 18 时 50 分，毛泽东说：“怎么办？别忙。”他看了看表，说：“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他扭头往身后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是河南的。”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微笑道：“请你讲话。”

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

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

听了毛泽东的介绍，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纪登奎十分激动，他热情赞颂：“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教育太深了。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

他在 10 钟的发言中，37 次提到毛泽东。他还向毛泽东和“九大”代表保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充分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

他说：“开始，我对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很不理解，当革命群众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触及了灵魂。触及一点，理解一点，触及的深点，理解的就深点。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怕字少了，敢字多了，才逐步提高了点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

“我们那里有某些同志，虽然主观上是热爱毛主席的，但是，至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甚理解。不去看我们取得的伟大胜利，而是埋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些支流的东西，挑剔与伟大成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在那里闹‘三气’，就是那个怨气、泄气、不服气。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应该从某些犯错误老同志那里吸取教

训。我也算个老干部，今后更应当谦虚谨慎，按照新党章严格要求自己，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自觉地、虚心地听取群众批评，接受群众监督，‘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纪登奎讲完后，已是 19 时 02 分。毛泽东说：“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还有谁发言？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看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

众人答：“赞成！”热烈鼓掌。

毛泽东：“我们付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

众人热烈鼓掌。

毛泽东：“赞成的就举手。”

全体举手，毛泽东也举手，他看了看会场说：“都赞成，有希望噢，大概是多数，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

一致举手，毛泽东也举手，他看看说：“看来也有希望噢，多数，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

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

毛泽东：“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吃饭，散会！”

这段时间，苏联不断从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多方消息表明，苏联确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的使馆甚至报告了他们侦察到苏联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

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

4月14日，中方答复称，“正在研究”苏有关缓和边境局势的建议，并且将给予答复。

4月15日，“九大”进入第二个阶段，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

其实，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除这59人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其余74人，除个别人外，后来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根据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做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

在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时，很多代表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

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对四类候选人提出了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 210—250 人。各代表团提名相加实际为 493 人。

经过综合平衡，在 4 月 20 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 274 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 60 人，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中央文革碰头会的 12 人，以及军委办事组的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原八届中央委员 97 人和候补中央委员 73 人被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为 53 人。其中原曾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第二类 35 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的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秋里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恩茂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所以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候选人；第三类 99 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特地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的光辉历史和“文革”

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类 80 人，其中产业工人 46 人，贫下中农 25 人，其他劳动者 1 人，“革命知识分子” 8 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是实际上不止 8 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朱德参加“九大”时，已是 83 岁的高龄，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毛泽东上前扶了他一把，对他说：“老总，咱们两个永远要联在一起，我帮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别看有些人叽叽喳喳说你什么，我心中有数。”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不断地批判朱德，说他“长期以来反对毛主席”，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并几次要他站起来作检讨。朱德说：“我是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也反对过毛主席，但我已经改了。做什么事总要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我在红军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思想是存在的，你们要找我当代表，那就当吧。主席、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江青在 4 月 20 日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但依然有很多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第 1077 回：四二四，选举九届委员会

皆顺利，大会正式拉帷幕

4 月 23 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这次会议把候选人名单增加了 5 人，共 279 人，作为正式候选人。其中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委员 109 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 53 位，新排的 200 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

毛泽东说：“这个名单很难排。比如北京军区 6 个军，只有郑同志排上了。候选名单排上的，大多数是好同志，但并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排上名单的好的是大多数，能保证党的领导。但也有的不那么理想。还有很多好的没排上。这么大数目，怎么能都了解清楚呢？不见得选上的、排上的都

合乎理想。有的同志在中央工作犯了错误，不排又不好。也不是没列入的比列入的强。历史上常常证明后来者居上。头一次要进中央委员会的占名单的大多数，‘七大’没有这么多人，‘八大’也没有这么多人。”

毛泽东这里说的“郑同志”，就是时任66军军长的郑三生。后来，在郑三生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三生’有幸，当上中央委员了。”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毛泽东又说“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

他说：“工农占中央委员会70%以上，解放军是大多数，也是出身于工农的。”“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

他提到湖南：“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毛泽东接着问到：“胡勇呢？”

黄永胜答道：“刚入党。”

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湖南“工联”的头头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周恩来安排他和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四位工农代表坐在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的左边，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6个位置。4人中，胡勇最靠近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特地在城楼

上的休息厅内接见了他，交谈数分钟，问及湖南的文革情况和胡勇的个人情况。当时，正好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因此中断。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回到湖南后，10月，胡勇由华国锋和47军一位副政委一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毛泽东得知胡勇也是中央委员候选人时说：“我这个老乡，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于是，湖南改由唐忠富作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此时，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单大体上是公道的，但也有些不公道。譬如说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为什么这么分？我就说不清楚。恐怕困难的还是这三、四个老同志。要选他的话，如朱德检讨也检讨不清楚，不要写了，写了人家不满意。”

有人插话：“是董老给他解了围。”

毛泽东：“不能怪他了，他都忘记了，八十几了。如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

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吉、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吉柏）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划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主席团秘书处做出规定：既要保证毛泽东提到的10名反对派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预选的结果，秘书处感到满意。

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

陈励耘以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有一两只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4月24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正式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于16时05分开始，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

在大会堂主席台前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另一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

16时28分进行正式选举。首先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然后回到各自的座位。

这时，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他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

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16时52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

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时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江青获得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

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大声说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大家都默不作声。

江青不满。张春桥要求查票，说这是“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康生不同意，毛泽东也明确反对，查票一事被压了下来。

但是康生还是派中组部的郭玉峰到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

郭玉峰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吴法宪，吴法宪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说话。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压下了。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德 809 票；

陈云 815 票；

李富春 886 票；

陈毅 867 票；

徐向前 808 票；

聂荣臻 838 票；

叶剑英 821 票；

邓子恢 827 票；

李先念 922 票；

张鼎丞 1099 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 53.6%！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们的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 3 人。还有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山西的张日清、刘格平等人。他们在酝酿候选人时也有人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得 1435 票，刘格平得 1117 票，王效禹得 1066 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入选，分别得 937 票、1256 票、1400 票和 1152 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 170 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王白旦，农民出身，是地地道道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解放后，他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

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九大”召开以前，他已是北满钢厂的一名党员技工。当时，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成员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阴差阳错，王白旦被选为“九大”代表，去了北京，并一下子在会上当选了中央委员。

“九大”期间，周恩来看到他后打趣道：“王白旦，你这名字念白了可不太好听啊。”与会代表都会心地笑了，有人顺情说“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呢”。

王白旦做梦也没有想到被选为中央委员，更没有想到竟会有“大人物”热心给他改名。在那个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参加了，他听了周恩来的话，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如此，从北京回到黑龙江，王白旦不但身份变了，名字也变了。

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共选出的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的中委、候补中委53人。

选举后，林彪又作简短讲话，通报了国内外来信来电祝贺“九大”情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此时是21时37分。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

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第 1078 回：三人组，酝酿政治局名单

四二八，开九届一中全会

“九大”开完后，陈伯达收到从毛泽东处退回的一件文件。秘书们打开一看，原来是陈伯达呈送毛泽东的九大报告稿的第一部分，原封未动。毛泽东用粗粗的铅笔大大地写着：

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后面写着日期，字迹几乎占满了封面。

陈伯达和他的秘书都愣了，原来这份报告稿毛泽东从未拆封看过。

两个秘书一声未吭，悄悄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只剩下陈伯达一人在他的屋子里呆坐着。但秘书走后，他关起门来万分悲痛得大哭了一场，他很伤心，很伤心……

4月25日晚上，汪东兴电话通知：“主席要林副主席、总理、康老、黄总长立即到中南海主席那里开会。”

4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说：“一中全会怎么开法？我看全会没有别的议题，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选举政治局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办法，不提名单，只提一个数目范围，这个办法叫民主，但这又要时间；二是先搞出一个名单出来，为避免个人独裁，还是由恩来、康生、永胜3人先商量一个名单出

来。我同林彪同志不参加你们的提名工作，我们两个是幕后。”

林彪说：“政治局人选的方针，原则请主席指示，以便有所根据。”

毛泽东说：“那只好叫独裁，那我们还是 5 人独裁吧！”

周恩来说：“政治局委员定多少人，请主席定个数字，这对考虑人选有关系。”

毛泽东说：“我看政治局委员，可以定为 25 至 30 人，多了更难安排，平时开会也不方便。”

于是，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就在在中南海内开始酝酿提出“九大”的政治局成员候选名单。“三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他交代说：除了毛泽东、林彪的电话可以接之外，其余任何地方的电话都不要接。

4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看了三人小组上报的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据说，在王效禹、叶剑英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杠杠。后来毛泽东说：“我看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面也打了一个大叉。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我看到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的大局来考虑。”

康生说：“总理的意见是对的，但困难比较大，我们硬

着头皮留下来。”

黃永胜说：“我同意总理和康老的意见。”

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但是，毛泽东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并在名单的旁边写上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彪同上次一样，收到名单即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三人小组连夜研究，周恩来说：“整个名单就是江、叶二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情况出发，江青、叶群一定要进入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示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康生、黃永胜3人来到了毛泽东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一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的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一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名单之内！”

毛泽东同意了，他说：“你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周恩来3人接着又到林彪家里去了。叶群将他们3人领进林彪的会客室后，自动回避了。

周恩来对林彪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

单的问题，从现实的政治情况来看，我们三人认为一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

黄永胜紧接着说：“我们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对江青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建议对叶群的问题，你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

康生说：“总理、黄总长把我们研究的意见都说了。请林总从政治上考虑，同意我们的意见。”

林彪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泽东住处开会，确定了 25 人的候选名单。毛泽东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只好就这样了，有责任由我承担！”

接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 5 人分别在名单上签了字。

毛泽东又说：“中央的领导机构，力求简单权力集中的原则。政治局常委由五人组成，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请大家考虑是否合适？”

林彪、周恩来带头，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则。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毛泽东最后说：“我也同意。”

4月27日，军委办事组拟定了一份“军委48人名单”和

“军委办事组名单”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毛泽东当天批示：“宜加李德生。”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

27日，毛泽东召集三人小组最后商定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江青、叶群都在这个名单之上。这个消息，由黄永胜透露给吴法宪。下午16时，吴法宪立即把这一消息电话告诉给了叶群。

选举政治局委员，叶群可谓是煞费心机。

黄永胜他们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就有意识的没有投江青的票。此时，他本想利用毛泽东给的权力尽可能阻止江青进入政治局。然而，叶群不仅不让他阻止江青进入政治局，而且还要他主动提名江青进入政治局。

此时，毛泽东虽然同意了江青进入政治局，名单上也有了叶群，但她还是害怕林彪牛脾气一来，把叶群的大名划掉。但是几天前，叶群与林彪吵了架，几天来，她都不敢与林彪照面。只好找到儿子林立果，让他到林彪那里去为她求情。同时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彪正在出汗，阻止周恩来到毛家湾来向林彪汇报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27日，叶群一夜没睡。28日清晨5时，“林办”收到周恩来给林彪的一封亲启信，信封上标有“特急”字样。秘书代林彪拆开信，里面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以及周恩来给林彪的信。信上说：现在把昨日毛泽东处议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印成选票清样送林彪过目，如果

林彪不同意，望速告。如果同意，即照原定方案，于当日下午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进行正式选举。

林彪看了一眼那张选票：毛泽东、林彪用一号字排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用三号字排印；叶群（按姓氏笔划）以下是四号字排印。

林彪听秘书讲了周恩来的信，然后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不是按姓氏排列的？秘书回答后，林彪抬起右臂，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圆圈，示意秘书代他把文件圈退给周恩来。

叶群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选举政治局委员，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其中有原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中的12人继续当选。原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中没有包括已去世的3人。

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

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5人，此外，江青得150票，黄永胜得130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林彪为副主席。

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李德生习惯地戴好军帽，站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笑着说：“德生同志，请你把军帽摘下来吧。”李德生摘下军帽。

毛泽东问：“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会上讲话说：“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

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

“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

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

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

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次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第 1079 回：留京城，中央解决鲁问题

林彪见，云贵州三省领导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毛泽东当场主持召开中共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新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员：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洗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除原有人员外，新增加了李德生、刘贤权、李天佑、温玉成、谢富治。

随后，副军职以上干部任免，改报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批准。

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当晚，江青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她一到就坐在周恩来经常坐的主持人席上，周恩来见状，坐到一边主持开会。

会议开始后，江青上来就说：“今天的会是我召开的，我宣布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搞阴谋，一切事情不告诉我，电话也不打一个。你们别以为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旧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只要交给革命群众就够你们受的。”

当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1968年10月“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的一次谈话中所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际的最后的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九大”小组会上，福州军区当面批判王效禹直接插手福建地区，会后王效禹布置韩金海、杨保华、鞠维信向中央

写信反驳福州军区。

杨保华找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串联，被拒绝。南萍说：“你那篇讲话，我们省群众组织转登了，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九大”期间，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把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反复旧”的“1117讲话”交给康生。康生把这份材料交给王效禹，王效禹拿到后再也没有回音。康生第二次找到王效禹，并在材料上作了严厉批示。王效禹这才给康生写了封短信：“你二次转来的杨保华的讲话我们都传阅了，杨保华的讲话是有些错误，我对他的批评也有些错误”，“主要问题不是批评于景瑞不能入党的问题”，短信到此沒了下文。

杨保华害怕了，想对他的“1117讲话”做出检查，王效禹不同意。于是，杨保华只好在王效禹给康生的短信上只写了“阅悉，同意”4个字，即送交康生。

康生看了杨保华写的4个字，立时就上了火，当即在后面批了16个大字：“官腔十足，毫不在乎，无动于衷，令人惊異”。此处“异”字，康生写的是繁体“異”。后来杨保华面对康生时把责任推给了王效禹，说是王效禹不让检查。

“九大”结束，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济南军区及济南、青岛的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易耀彩、

穆林、齐威、王效禹、韩金海、杨保华等 27 位代表没让返回。

4月30日，林彪接见许世友、杜平、李德生、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主要谈团结问题。

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与杨得志谈话，再一次说到山东问题。当晚，康生与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等人谈话。期间，康生点名批韩金海、杨保华二人曾作反军报告。

5月2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接见时叶群在座。云、贵负责人未到前，林彪对四川刘结庭、张西挺二人说：“你们夫妻是受李井泉迫害的，我很同情，那时我就想见见你们，你们造李井泉的反，你们对，他们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了你们。他造你们的反，你们也造了他们的反，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还是起作用，也可能整死你们。该打倒的不给你打，不该打的猛打。”

李井泉这个人不好。我认识他几十年了，他一贯不好，不是一天不好，不是好人，是坏人。前年我在一次会议上狠狠地讲了他。他是不爱讲话的，但讲破坏话是很积极的。背后讲坏话是很多的，捣鬼是积极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他打倒了，大快人心，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党内没有好处，现在还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但是至少把他搞臭了。你们解放出来，这是件好事。

四川七千万人，等于德国人口，比意大利大，比法国大，比西班牙大，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在国内当几个小省。贵州多少人？”

答：“近两千万。”

林彪：“当三个贵州。你们就等于几个省的头头。从战争的观点看，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四川。云贵川主要在四川，无论从东面打来，还是从西面打来，四川都是后方，都是以四川为根据地，对美帝也好，苏修也好，我们的根据地都在四川，工业、粮食都靠四川，军事需要的东西尽量放在四川。你们要把四川的工作搞好，只要四川搞好了，我们就放心了。四川搞不好就不放心。”

云、贵领导到后，林彪对大家说：“会开完了，有些同志要见，要见一起见。”

他说：“主席讲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武器就是团结，这是列宁的话。马克思第一个宣言也是号召团结。这次‘九大’，毛主席号召团结，无产阶级赤手空拳，打倒资产阶级靠什么，靠的就是团结。

今天你们在座的同志，我知道不很团结，有的是对立面，有的是半对立面。对立面没有关系么，可以团结起来。过去抗日时期在一起，打土豪在一起，民主革命反封建也在一起，反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应该在一起。反帝反封建这不是共产党的特点，资产阶级也反封建么！我们共产党反

帝、反封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打下基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的职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党员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不是个人行动能行的。有种人主张只要打掉一个人就可胜利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列宁反对。列宁的哥哥刺杀沙皇被抓后杀了，列宁认为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团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代替的办法，要解决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要团结起来，唯一的办法是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他从理论上讲了团结的意义后，又说：“要马虎的，我们又马虎又不马虎，大问题上不马虎，小问题上就要马虎，马克思说过这个话：就是两个人组成社会，如果没有让步，就不能共为社会，就失去社会性，没有社会性，就是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有二个：一个是使用工具，一个是联合。没有联合就不能进行生产，就不能生活，就回复到几十万年以前的那种状况。有阶级社会就有革命，革命就要联合，就要求得本阶级内部的联合。因此，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响应落实毛主席的号召，为着胜利你们一定要团结，无论如何要团结。思想上的差别天天有，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总是不一致的，但我们又需要一致。差别总会有的，但不能因此而大闹特闹。文化革命初期要闹，不闹就革不掉走资派，就不能把他们打倒，就要回到资本主义去。现在是否就干净了呢？革命不能停止，有些基层单位还是有问题，还要延续

下去，要把基层搞好，革命还没有完，要夺取全国胜利，要继续搞革命就要团结，特别是上层，你们头头的团结，不团结就是空谈革命，口头革命，不利于革命，破坏革命，是团结好还是不团结好？我们国家兴旺好还是不兴旺好？是联合起来好还是不联合起来好，还是团结好，兴旺好，联合好。”

林彪说：“我的意见很清楚，我就是和稀泥，调和，为什么不能调和呢？不和不行，就是要和稀泥，不团结不行，又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矛盾，而是革命内部。”

“制度上的改变一下子就变过来了，但人的思想的改变就需要很长时间，俄国革命搞了半个世纪，现在还很落后，我们才搞了20年，破除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旧东西，有个共同特点是私有制。阶级社会5000年很长，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是很短的，资本主义才300年，更短，可是要破除私有观念，需要百年，几百年，需要很长时间。大家应该有共产主义精神，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我过去讲过公产主义，再简单说成是‘公’字，有的人讲其公，内心大藏其私，最后落得个假公真私。你们要走了，见一见面。”

“今天来的同志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不要在小问题上兜圈子，斤斤计较小事，不是共产主义者伟大气魄。要胸怀宽大，为共产主义奋斗，为解放全人类奋斗，这是伟大、光荣的事业，我希望同志们下定这个

决心，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自己都对，别人什么都不对，抓住一个小辫子猛上纲，这不对。一就是一，不能把一说成万。二就是二么，蚂蚁就是蚂蚁，象就是象，不能把蚂蚁说成象，见到一说成万就不对。没有反映客观。要正确反映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夸大，把微小的量夸大为巨大的量都不对。希望同志们不要这样做。小事情不计较，夸大，闹到社会上去，不要呕气。和睦相处，心情舒畅好，同心协力好，不要呕气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好。革命工作做好，不要去各抓一派。

今天见见面，有些是老熟人，张国华、梁兴初、谭甫仁、陈康、田维扬等同志，有些同志不熟，我不太了解你们的具体事，我也不注意了解你们的具体事，笼统讲一讲。”

九大结束，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已经成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均认为应该取消中央碰头会，改变中央工作方式。1969年5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中央常委主持工作，中央不再设书记处等其他机构。”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局面结束了。

这时，江青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上海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件送到陈伯达处，陈伯达批道：“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从那以后，中

央再没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文件。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当晚江青召集的那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为最后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

此后的政治局会议一般都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

“九大”刚开完不久，一天，江青到京西宾馆军委办事组的驻地，说是“找办事组的人谈谈话”，实际只找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当时吴法宪不在家。

闲谈一阵后，江青突然话题一转说：“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即席讲话，只有个讲话提纲，讲话内容事先也没有与中央碰头会通气，我们都不清楚。”“有些话讲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怎么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呢？那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嘛。”

黄永胜他们都没有说话，但立即警觉到，江青的讲话是不是针对林彪呢？

江青走后，黄永胜与李作鹏和邱会作议论，“江青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与我们讲？江青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讲话。”他们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到林彪那里去报告。

听完了黄永胜等人的报告后，林彪说：“让她去说吧。”

九大闭幕不久的5月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的名单顺序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

“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秘书杨银禄。当杨秘书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说：

“你看，你看！”

杨银禄不知道叫他看什么，捡起地上的文件，在那里发愣。

江青急了，从他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秘书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秘书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报告了江青。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第 1080 回：放学生，北大开展大批判

疑问多，李九莲写信被抓

1969 年 4 月，北京大学被隔离审查的学生全部被放出。重新相见，没有弹冠相庆，没有纵情狂欢，因为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还未痊愈，而且他们之中有的同学没有挺住，没有看到这一天。

宣传队对牛辉林等人的问题作了重新处理，下了“是一般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结论，并以原材料中有派性、有水分为由，以中央有指示不准保存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专案材料为理由，将牛辉林等人的专案材料全部烧掉。

紧接着，北大学习“九大”文件，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公私熔化论、党内和平论，还有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此时的学生已不再是革命闯将，而是老油条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倦怠，对政治学习穷于应付，失去了热情，似乎是看破了红尘。每天上午、下午两段时间挤在宿舍里，先念报纸，再鹦鹉学舌地发一通言，然后聊大天，耍贫嘴，顾左右而言其他。

当然，斗私批修必须联系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于是学生们逢场作戏，有口无心，人云亦云。

1969年3月初，正在福州当兵的原赣州“大中学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曾昭银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来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

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曾昭银收到此信后，于3月5日将信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回赣州地区保卫部。而曾昭银也在1969年4月，被部队作为“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临行前，部队领导还让他回到地方后继续协助调查这封“反革命匿名信”。

4月30日，回到赣州的曾昭银与他的恋人、中学同学、文革中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李九莲见了面。谈到曾昭银退伍的原因，李九莲告诉曾昭银：那封匿名信是她写的。

李九莲是赣州第三中学的高中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1966年，出于无限信任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8月，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该组织的三个头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年10月1日 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年10月底 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是“卫东彪”造反团的惟一女生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年4月22日，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舒北斗的5535人七天七夜绝食。

1967年6月29日至7月14日，李九莲姐妹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223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年秋，李九莲作为代表出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1967年12月，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中八名成员中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赣州市治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曾昭银则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

1968年2月，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这以后，李九莲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地变化。

1968年夏，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去了“共产主义大学”。

1968年秋，“清队”开始。江西的“清队”主要是“三查”。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全省各地很多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

当李九莲看到江西青年熊辉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刑的布告时，同情不已。

李九莲的父亲李忠华，本来是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只因与一名黄埔军校的人同姓同名而被“揪出”，逼写认罪书

正是这些事情促使李九莲于1969年2月28日，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了那封未署名的信。

1969年3月21日，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

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在爱情和原则之间，曾昭银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保尔·柯察金”一样，选择了原则。他当夜即向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作了报告。5月1日凌晨3点，李九莲所在的赣州冶金机械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她在“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在这些日记中，李九莲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和家庭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毛林的态度而定的”；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余晖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敢大胆地说：‘他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绝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其中一则日记这样写着：

“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偶像和倾向的名词，都有具体的内容和实质。他们之所以伟大美好，就是给了人民以幸福，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们歌颂和拥护他们，不是从名词和形式出发，而是从得到了解放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在我国，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实践体验是符合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下，这些名词代表的意义和人民的感受，有时是相反的。”

她对当时盛行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提出质疑：“火热的‘三忠于’配合着极左政策，将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什么？

- 一、将割裂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 二、将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 三、将真正损害领袖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我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能够抵制‘红海洋’，而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后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血淋淋的教训摆在毛主席的面前。我痛惜毛主席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迫害就是这样产生的，因而它不是无根无据，而是有根有据。问题在于，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路线和思想来指导，对问题做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而在本质上，它是用腐朽的来

扼杀新生的，用错误的来反对正确的。

红梅报春早。不做百花苦争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在无光的黑夜里边，发出自己的光，照亮一片小小的角落。而当太阳出来了，它心甘情愿地消失……”

5月1日，李九莲被拘捕的当天傍晚，曾昭银约见原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司令、他当年的造反战友朱毅，解释说：“李九莲‘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原来并不知道信是她写的。”

江西的李九莲被捕了。而此时的武汉，一场“反复旧”运动正紧随山东酝酿而起。

湖北省革委会自1968年2月成立后，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作用不大。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武汉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指向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

由于武汉军队干部对造反派明显的是支“钢”压“新”，于是“新”派给刘丰起的绰号是“钢政委”，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赵梗被人称为“钢参谋长”。1968年夏天，“新”派“工造总司”一把手、时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吴焱金在市革委会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

自从造反到如今，为何总是不翻身。
陈大麻子早揪出，百万雄师已踏平。
忽从极右到极左，有意支钢不支新。
陶式人物休狂妄，革命风暴就来临。
陶式人物是指陶铸式的人物，当时指陶铸为反革命两面派。

这首打油诗不知被谁抄写两份，一份贴在汉口水塔下的大字报墙，另一份贴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大门口。贴出两天后，刘丰把吴焱金叫到省革委会一间大办公室，张体学也在场。只见刘丰阴沉着脸，把吴焱金写的打油诗抄件向桌上一扔，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吴焱金答道。
“什么意思？”刘丰继续问。
“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反映一下我的心情而已。”吴焱金说、

“你反映心情为什么贴在警备区门口？谁抄的？谁贴的？谁指使的？”刘丰非常生气地问道。

“不晓得。”吴焱金说。
刘丰不相信，指责说：“你当面撒谎！这样的事你会不晓得？”

“我写了这首打油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谁拿走的。”

吴焱金如是说道。

刘丰气急败坏地质问：“你说，你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你含沙射影骂的是哪一个？”

“矛头没有指向谁，哪个支一派压一派我就指向哪一个。”吴焱金毫不示弱。

“你的诗贴在警备区的门口，你的矛头就是指向警备区的负责人。”刘丰说。

“不是我指向谁的问题，社会上群众都在说钢政委、钢参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吴焱金回答。

“你说的钢政委是谁？”刘丰问。

“谁支派就是谁。”吴焱金答。

刘丰发火了：“你敢说钢政委不是指我？”

吴焱金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刘丰气得把桌子一拍：“你还狡辩！”

造反派还怕这些？吴焱金也把桌子一拍说：“你莫以势压人！”

刘丰的脸色更难看了，这时，坐在旁边一直不做声的张体学笑着说：“我说刘政委呀，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年轻人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你犯不着跟小将生气。”他示意刘丰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让刘政委休息一会儿。”

工作人员把余怒未消的刘丰劝到其他房间去了。

这时，办公室里只剩下张体学和吴焱金两个人，张体学

说：

“小吴啊，你好大的胆子，你公然敢跟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的曾、刘首长拍桌子，你为什么发那大的火？来，坐一下，抽支烟，消消气。”

张体学口袋里经常有两种香烟，一种是“大前门”，是用来招待一般客人的，另一种是带过滤嘴的“中华”，是他自己抽的。他递给吴焱金一支“中华”牌香烟，说道：

“年轻人，火气不要太大。遇事要冷静，曾、刘首长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派来的，要尊重他们。”

吴焱金说：“不是我不尊重他，是他不问青红皂白搞我一顿，是他跟我过不去。再说，他们支一派压一派的情况，确实存在。我是有意见的。”

张体学说：“你在市里，刘丰跟你沾不上边，你怎么跟他吵那么凶？”

吴焱金说：“市里的方铭、张昭剑跟他是一路货色。”

张体学把自己的大腿拍了一下说：“什么张昭剑，纯粹一个跳梁小丑！”

吴焱金笑了，调侃地说：“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张体学说：“那不一样，你是跟曾、刘首长吵架，我是针对个人的看法。”

几天后，武汉市召开革委会正、副主任碰头会。会议休息时吃西瓜，方铭一边吃西瓜，一边问吴焱金：

“前几天刘政委跟你谈得怎样？”

“不怎么样。”吴焱金说。

“你的诗贴在警备区门口，是不是也有说我们警司支一派、压一派的意思？”方铭问。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以后在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就行了。”吴焱金说。

这下方铭也火了，他把正在吃的西瓜往地上一摔说：“我们怎么一碗水没有端平呀？”

吴焱金也把西瓜往地上一摔，毫不示弱的说：“一碗水端没端平自己心里有数。”

这时，开会的人都来扯劝，说：“小吴，这是你不对，你怎么能对方司令员发脾气。”

大家都对吴焱金承认错误，吴焱金也感觉自己过于冲动，就不做声了，但是也没作检讨。

第 1081 回：到青岛，武汉胡厚民取经

再联手，江城掀起“反复旧”

1969年初的一天，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武汉“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正在家里刷房子，看到外面开来几辆车，其中有一辆卡车上全是彪形大汉，是武汉造船厂的，还有武汉警备司令部的解放军，说是找胡厚民。胡厚民听说他们厂里原保守派要抓他回去批斗，就让他父亲出去对来人说：

“胡厚民去医院了，不在家。”

这几辆车于是又赶往离胡厚民家最近的四医院。胡厚民趁机跑掉。

此时的胡厚民也已经看到报刊上有关“反复旧”的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于是来到了青岛，见到杨保华。交谈后，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而此时，武汉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1969年2月20日，胡厚民从山东回到武汉。不久，他在汉口协和医院住院，离吴焱金家最近，于是派人来看吴焱金。夏邦银、朱鸿霞、“工总”组织部长郭洪斌、“工总”宣传部长田国汉等人也多次到吴焱金家上门转达胡厚民对他的问候，并转达胡厚民的意见：

“过去钢、新之争，我们是有些以老大自居，搞了‘以我为核心’、‘钢化江城’，《二八声明》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你们，伤了新派同志的感情，这是不对的，我们诚恳地向你们表示歉意。”

在后来的几次谈话中，夏邦银、朱鸿霞转达了胡厚民想“钢”、“新”两派联合起来搞“反复旧”的意见。

胡厚民出院后，邀吴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讲了抓他的经过和青岛之行，还反省说，当年你们揪“武老杨”时，我们共同对敌就好了。他还说，“反复旧”不搞不行，最好是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人出面挂帅牵头。其情感十分真挚。

吴焱金觉得，中央将要召开“九大”，在这个时候“反复旧”时机是否合适？风险太大了，表示要慎重考虑。

胡厚民谈了他去青岛的情况。青岛是造反派掌权，可是他们仍然带头“反复旧”，可见复旧势力是多么强大，斗争是多么激烈。胡厚民说：“山东形势那么好，‘反复旧’搞得有声有色，武汉同他们相差太远了，武汉不‘反复旧’是说不过去的。”

由于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反复做吴焱金的思想工作，吴焱金表示愿意承担在“九大”期间‘反复旧’的风险，共进退。

胡厚民说：“武汉的造反派是无娘的伢，只有天照应。

要搞就搞大一些，一定要通天。”他在武汉化工厂召集了武汉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都不是工代会的正副主任，只是常委，这次会议，就扩大到朱、李、吴三人。胡厚民传达去北京，大连、山东的见闻，讲了外地造反派如何神气，形势如何好。还说，外地造反派都问他：“720事件以后，你们武汉造反派在全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现在怎么搞得那么窝囊？”胡厚民回答说：“不要紧的，武汉的造反派有一个特点，要就不动，一动就大动，动起来就势不可挡。”

胡厚民讲：“1968年8月15日，北京召开国防工业口的抓革命促生产‘八一五’会议，曾思玉派孔庆德叫一辆小车来接我，说首长有事找我，我到会场一看是批判、斗争胡厚民的大会。这是湖北、武汉军队当权派最早向造反派头头下手的事例。”

胡厚民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工代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是站出来领导呢，还是当群众运动的绊脚石？我们不领导，群众也会干，甚至会把我们抛弃，但这样革命的损失就太大了。”

会上，大家分析了形势，李想玉说：“武汉的问题就是造反派受压。”

胡厚民说：“武汉的问题，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复旧。实质是复旧和反复旧、复辟和反复辟、夺权和反夺权的问

题。”

但是，当时中央正准备召开“九大”，许多人认为“反复旧”的口号是否与中央精神一致？胡厚民说：“群众运动嘛，看他的大方向，口号问题不是个主要问题。”

因为大家有意见。经过讨论研究，为了怕被人抓辫子，由工代会正式发一个公告，提出“庆九大、献忠心，认真总结经验，认真落实政策，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成果，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田国汉说：“这个口号不好，不提‘反复旧’，不提批判‘二月逆流’，就不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

胡厚民说：“这个口号是个总的口号，总口号是登报的，‘反复旧’、反‘二月逆流’提不提，同志们的心里有数就行了，我们要相信群众，如果群众认为这个口号好，到时候群众就会使用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给予支持嘛！”

这次会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反复旧”的大字报和大标语。3月17日，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特地选了对“工总”大逮捕的两周年纪念日，在厂门口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列宁选集》中的一句话：“我们决不半途而废”，从而拉开了武汉“反复旧”大幕。

“九大”召开后，武汉的“反复旧”马上就停息了，没人敢写大字报，吴焱金写了一篇《以实际行动向“九大”献礼》的大字报，田国汉将大字报底稿转给了胡厚民，胡厚民

又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九大”召开期间“反复旧”要不要继续搞。

田国汉说：“现在搞正是时候，曾、刘首长到北京去了，我们一搞就通了天，中央就会出面来解决武汉的问题。我们把材料准备好，到时候好说话。曾、刘首长，张体学欺骗中央，向中央汇报，说武汉么样么样好，好得不得了。我们就是要反，就是要让中央看到武汉并不是那样好，武汉市就是有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证明他们在湖北没有搞好。”

胡厚民说：“对，‘反复旧’不仅不影响‘九大’，恰恰是对‘九大’的最好献礼。难道开‘九大’就看着湖北省、武汉市不管吗？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和‘九大’精神一致的。”

吴焱金和朱鸿霞都同意胡厚民的观点，决定开“九大”期间“反复旧”要继续搞。

群众发动不起来怎么办？田国汉说：“那只好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个巨头出面，保险群众能发动起来。由朱、李、吴出面，使群众看到省、市革委会三个副主任都动了起来，这对群众是个鼓舞，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只要一煽就起来了。”

会上决定，由朱鸿霞起草以朱、李、吴共同署名的大字报。

朱鸿霞对吴焱金讲：“这回‘反复旧’要准备担风险，

准备再次被打成反革命。我是准备好了的，我和我爱人、家里都讲好了，我们早就作了安排。”

4月11日，吴焱金正在家里吃饭，田国汉匆匆跑来，手里拿着两张材料纸，说是朱鸿霞亲笔写的大字报底稿，让他过目，如果没有意见就签个名。田国汉说：“朱鸿霞是一边开会，一边用手掩着纸写的，你可以修改。”

这份大字报底稿，朱鸿霞起草后，胡厚民作了一些修改。

吴焱金觉得初次与“钢派”打交道，就改朱鸿霞亲笔写的大字报有不尊重别人之嫌，一边吃饭，一边匆匆看了一眼，就签了字。田国汉对他说：“大字报没有标题，你是不是想一个标题？”

吴焱金随手就将大字报原文中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两句话移到上面做标题。田国汉起身告辞，说是要到青山去找李想玉签字。

吴焱金说：“到青山这么远，你就莫跑了，我代李想玉签个字。李想玉对我说过，‘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签字，你代表我签就行了。’”

大字报写好以后，准备登在《武汉工人报》上，田国汉把吴焱金和李想玉找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联合印刷厂拒绝为他们印刷报纸。吴焱金和李想玉问：是谁不准印？联合印刷厂负责人说，是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长张景禄的指示。

吴焱金说：“张景禄只是个市革委会常委，我和李想玉两个市革委会副主任出面还不行吗？”

他们的强迫命令没有奏效，他们便赶到市革委会去围攻张景禄，朱鸿霞也从省革委会赶来参加了对张景禄的围攻。

朱鸿霞说：“笑话！你市革委会不给我印，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一样可以印，过两天一样印出来。你就是不给我印，也不要紧，我嘴还可以讲。”

吴焱金对张景禄说：“你今天下午不答复，我晚上就上街讲话。”

当天晚上，吴焱金第一个到街头演讲。

第二天，胡厚民间吴焱金说：“听说你昨天到街上去讲话，人不少吧？”

吴焱金说：“人确实不少，有几千人。”

胡厚民说：“你们当时揪‘武老杨’是正确的，我们当时不揪，现在很不好说话，反而被动。要是当时一块揪，肯定不是这个结果。我们当时也是准备揪的，但是由于派性，你们揪，我们不揪，想看着你们犯错误。现在看穿了，整了‘新派’压‘钢派’。”

朱鸿霞、吴焱金、李想玉3人署名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贴在水塔后，立即震动武汉三镇，转抄者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随处可见这张大字报。以后，吴焱金又同郭洪斌一道去中原印刷厂，该厂免费为他们铅印了

这张大字报的传单。

在当时形势下，人们是不管大字报水平如何的，只要有一个人领头，火一下就点起来了。各单位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反复旧”运动开始了。

这时胡厚民说：“声势还要搞大，越大越好。”他建议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还要走上街头，到处去作报告，造影响。于是，朱、李、吴这段时间在武汉三镇作了十多场“反复旧”的报告，每场都是数万人。有一次在中南旅社的台上讲话时，吴焱金喉咙嘶哑得说不出话来。同时在场的武汉锅炉厂王光照也几乎每回必讲，先后在武汉各单位作了 60 场大型报告会，与他同台演讲的有丁家显、吴焱金、朱鸿霞和李想玉等人。演讲的核心是：军宣队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

“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

许多群众还在武汉大街上举行规模宏大的火把游行。

胡厚民订出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由武锅、武重出面点火，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二步，群众起来了，工代会对运动进行领导；第三步，由省、市革委会领导“反复旧”。

胡厚民还决定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8年秋天以来，向大中学校派工宣队都是由军队决定的，派出的大都是原参加“百万雄师”的保守派工人，他们到学

校去的任务就是整文革中的造反派学生。“反复旧”时，吴焱金碰到朱鸿霞和胡崇元，胡崇元对吴焱金说：“工宣队问题不解决不行，不派工宣队进大专院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鸿霞说：“上海的工宣队都是由‘工总司’派出的，是由清一色的造反派组成的。武汉市现在完全由市工代会派出工宣队是不可能的，办法只有一个，各单位把‘反复旧’搞起来，发动各单位的群众，去把他们单位派出的‘百万雄师’揪回来，换上造反派的工人去当工宣队员。”

“反复旧”的第三步，就是由市工代会派出工人调查团进驻省、市革委会，对被当权派篡夺了的省、市革委会进行反夺权。

第 1082 回：叫进京，武汉代表住京西

学习班，众人批判王效禹

武汉“反复旧”的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胡厚民又召集了一次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这次不仅扩大到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而且将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工总”常委张耀忠和“工造总司”的龙梅生也扩大进来。龙梅生在会上介绍了他和张耀忠的方案：

“现在，‘反复旧’的火已经点了起来，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各个单位去，不提‘反复旧’的口号，在各个单位落实政策，把失去的权夺回来，‘清队’搞错了的要纠正。落实政策，名义上由各单位自己搞，实际由工代会统一安排。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常委们不要到社会上去搞，要到基层去。”

这个方案被胡厚民否定了。胡厚民说：“这个方案是右倾的，要害是要不要群众运动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否定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将‘反复旧’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他认为造反派本来在各单位就是少数派，清理阶级队伍有的挨了整，你叫他回单位搞，根本就搞不动，其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

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也都认为，“反复旧”靠各单位自己的力量搞不动，必须发动群众，在社会上形成冲击力量。旧势力很顽固，不这样冲击不行。于是，大家一致否定

了张耀忠、龙梅生提出的方案。

胡厚民提议，是否开一个争取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通过这个大会，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显示一下造反派的力量。对胡厚民的这个提议，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大家争论了很久。不同意的理由是，“九大”正在召开期间，开这样的群众大会好不好？胡厚民说：“只要群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4月27日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那天到会有十几万人，大会由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讲话，李想玉宣读大会公告，胡厚民宣读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声势浩大。这一天，武汉“反复旧”达到了高潮。武汉最繁华的中山大道交通断绝，大街上人山人海。

4月27日出版的《武汉工代会》报，刊登了《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的文章，文章指出，复旧倾向表现为：省、市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被打成“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牛鬼蛇神”；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解放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即老干部；那些造反派组成的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并且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所取代。文章号召“颠倒被颠倒了的历史”，夺回被

“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

过了一两天，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到湖北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开会，胡厚民建议，所有头头都不坐汽车，从大街上走过去，要在群众里产生大的影响。胡厚民刚吐过血，身体不好，但他举着毛主席画像走在最前面，吴焱金和朱鸿霞等人走在后面，群众一片欢腾。会后，他们被车子接到汉口东北远郊的肉联厂住了下来。这也是胡厚民的主意。他说，头头们集中起来有两个好处，一是有事好商量，有问题可以及时研究，第二个是防止队伍分化，防止出叛徒。

果然，这一下真的通天了，4月29日上午接到中央指示，请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5人到北京去解决武汉问题。

临走时，胡厚民又对他们讲：“你们到北京去，要把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好好学学。你们到中央一定要顶着，摊牌也不要紧。你们放心，我们在家里搞的动静越大越好，就是对你们最大的支持，我们是不会熄火的。”

朱鸿霞5人走后，家里的工作由胡厚民主持。4月30日，武汉工代会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通过了《反复辟、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的决议，认为所谓“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这个决议否认造反派有打砸抢的罪行和无法无天的行为，反对把造反派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反对把造反派赶出省、市及基层

各级革委会。

朱鸿霞他们到了北京，起先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一起住在前门饭店。

在武汉，张立国是不同意也不参加“反复旧”的，在火车上，朱鸿霞他们跟他谈了半天，他才表示同意“反复旧”。

在北京参加“九大”的谢望春对“反复旧”的做法表示理解和同情。谢望春还告诉朱鸿霞他们：“周总理点了名，要胡厚民同志来北京。中央首长批评了曾、刘、方、张，对他们说，你们有错误，给他们（造反派）作个检讨就行了。”

“九大”代表沈复礼说，夏邦银当上中央委员，就是沈复礼积极联系黄石市的“九大”代表柯林和其他一些地县的几个“九大”代表据理力争，才联名把夏邦银推选上大会主席团，并最终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家都认为“反复旧”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吴焱金给武汉写了以他们5个人署名的第一封信，张立国看过，同意署上他的名字。

第二天，张立国问信发出去没有，他说：“把我的名字刮了。”

吴焱金说：“信已经发了。”

由于朱鸿霞他们违反中央不许通信的规定，5月2日，中央通知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22名群众组织代表到京。胡厚民感到中央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

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于是指派“工总”组织部部长郭洪斌和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武汉客车制配厂革委会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方斌二人当“反复旧”负责人，继续领导“反复旧”，并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你们搞得越大，我们到中央说话越有分量。”

郭洪斌和方斌接过指挥棒，果然继续在武汉三镇大搞起来。

胡厚民等人到京后，中央要朱鸿霞他们搬家，住进了京西宾馆。这里戒备森严，有军人站岗，湖北省赴京代表驻地的房间的电话都拆掉了，不许打电话，也不许向外送材料，他们和武汉的联系就困难了。他们跑到其他省赴京代表住的房间去打电话，也不让打。于是以制止武汉“反复旧”发生的绝食为由，找张体学扯皮。张体学被他们搞得没办法，只好出面向武汉要电话让他们通话。

1969年5月1日晚，北京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也应邀参加晚会，并且上了离天安门城楼很近的观礼台，可以看清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

焰火一闪，时常有白色的物品在空中飘荡，有一些飘向

观礼台，吴焱金跳起抢到一个，原来是白绸子做的降落伞。杨道远等纷纷要将此留作纪念，吴焱金把它撕成四块，并写上“1969年5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焰火晚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分别保存起来。

代表们第一次住进京西宾馆这样高级的地方，虽然每天吃得好，喝得好，却与武汉的广大群众失去联系，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当时在京西宾馆食堂吃饭，在餐桌上经常碰到其他省、市的一些首长。有一天，吴焱金问同桌的一位老干部贵姓？那人说：

“我叫谭启龙。”

吴焱金说：“久闻大名，毛主席说过，山东有个谭启龙，从小当红军……”然后问他：“你和毛主席很熟吗？”

谭启龙回答：“见面不多，还是1931年见过面。”

“那毛主席怎么记得你的名字呢？”

谭启龙说：“这我就不知道了，伟大领袖嘛，记忆力当然不同于一般人。”

吴焱金又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谭启龙没有回答。

过几天，吴焱金又同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军人同桌吃饭，有人告诉他，这个麻子就是王效禹。吴焱金赶紧问王效禹住在哪里？王效禹告诉他住在405号房间。吴焱金把情况告诉胡厚民，胡厚民立即来了兴趣，要同吴焱金一块去拜访王效禹。

他们很快找到王效禹，问他：“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

王效禹说：“没有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

他又说：“在‘反复旧’问题上，我是犯了错误的，你们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胡厚民间：“山东是如何对待造反派的？”

王效禹说：“‘反复旧’以前，山东造反派还是掌权的。”

胡厚民他们又问造反派“纳新”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王效禹说：“山东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纳新了。”

胡厚民有些失望，准备再问。这时一位军人跑进来说：“王效禹，你又在同谁串联呢？”原来王效禹也是受监视的。胡厚民他们赶紧说：“是吃饭时刚认识的，随便来看一下。”便匆匆告辞了。

朱鸿霞他们在京西宾馆整天无所事事，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等首长也和他们聊天说笑话。方铭说：“以前有个男人常在外面吹嘘如何不怕老婆，有一天终于被老婆听见了，他吓得钻到床底下不出来。老婆吼道：你到底出不出来？丈夫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出来！”虽是老掉牙的笑话，从方铭口里说出来，还是觉得很好笑。有天，方铭戴了一个能转动的闪闪发光的毛主席纪念

章进来手舞足蹈地说：“我刚去了林副主席那里，这是林副主席亲自送给我的纪念章。”大家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确实比一般像章质量好，十分羡慕！

这天，吴焱金和胡厚民在院子里闲逛，突然发现墙外似乎有武汉的熟人，用手势打个招呼，果然是武汉来京送材料的同志。胡厚民叫吴焱金写个条子，用石头包着丢出去，条子上写道：“我们一挥手，你们就把材料丢进来。以后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联系。”他们避开哨兵，找到一个较僻静的地方，收到武汉来人丢进来的材料。

5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中出现的问题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5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简称“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年》，其中加了近700字的批判孔子的内容。因为毛泽东讲，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还不如“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五四”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于是，在社论中特别加上了批孔的内容。

就在中央召集武汉造反派头头进京解决那里的“反复旧”问题时，5月4日，被留在北京的“九大”山东代表团也开始办学习班，讨论解决山东问题。

接着，又陆续从济南召来不是“九大”代表的张子石、王竹泉、杨恩华、王新阳、刘长茂等人。其中的王新阳是5月10日清晨从济南监狱中放出后，当天赶到北京参加学习班。

5月9日，周恩来等人参加山东学习班会议。山东师院政治系学生、“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负责人、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王竹泉面对王效禹，想起解决肥城事件时王效禹要手腕对自己的批斗和被涮了一顿的屈辱，越说越气愤，发言1个半小时，国恕连在旁边帮腔。看到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周恩来打断制止王竹泉的发言，王竹泉声称只讲了一半。

政治局5月10日召开解决山东问题的会议，周恩来谈到谭启龙的问题。会议决定，将王效禹调离领导岗位，由杨得志负责山东省的工作。同一天21时，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黄永胜、江青、叶群、张春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山东学习班人员，周恩来主持会议。

江青首先讲话：“中央应当替山东承担一部分责任，不单单是官僚主义的缺点错误。……67年冬季，中央文革‘天天读’时间，杨成武强加于人，当时我和叶群未在，杨成武亲自起草了个文件，给了我们。当时是以杨成武为首的中央军委文革办事组，大概还用了中央文革的名义。我和总理、康老商议应当承担责任。杨成武用军委办事组的名义，要山

东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到徐州去建筑工事，这就使徐海问题更复杂了。不能只怪王效禹同志。当然王效禹同志是有错误的，那是他们的问题。但这里也有一些误会。……对王效禹同志要有肯定的方面，有否定的方面，要全面，不要搞得大乱”。

康生说：“王效禹同志应有信心，去掉一切怀疑。中央态度很清楚，保你嘛。九大选你为中央委员嘛，这是客观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有功绩嘛。难道因有徐州问题，临沂问题，谭启龙的问题，反复旧的问题就没有信心了吗？应有决心和信心能够把山东搞好等等。”

张春桥、叶群、吴法宪等人也发了言。

最后周恩来讲话，他批评王竹泉等人昨天的发言：“不光要攻，还得要帮。国恕连过去还不是跟着王效禹跑了一段，和王效禹一下子闹翻了，就讲的那么生动，像说快书一样，我担心你将来要犯错误。”

周恩来最后说：“山东还没有来中央办学习班吧，这次就来办一个。有些同志来学一学，刘崇玉可以来。谁破坏团结，谁栽跟头，谁犯错误。搞一个团结的局面回去。今天就到这里。”

学习班上，韩金海、杨保华也开始揭发王效禹。韩金海说，王效禹亲自给泰安、昌潍、淄博、济南等地区部署整驻军的材料等等。

第 1083 回：五一二，中央见武汉代表

胡厚民，朱鸿霞首先汇报

5月，在“反复旧”运动中，武汉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百舸争流》的刊物，他把已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又开始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性的东西，基本思想就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5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群众代表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夏邦银等人。

周恩来说：“今天开个谈心会，你们不是在湖北要搞‘反复旧’吗？搞了一些运动。把你们接到京西宾馆就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嘛。那是个很高级的、很严密的地方。五不准嘛，军委办公机关在那里，许多军队首长、省革委会主任都在那里，曾思玉、王效禹、李再含、刘格平也在那里嘛！他们也不准出去嘛！要守纪律。你们要摸我们的底，问了刘格平，没有表态；问了王效禹，他作了自我检查；李再含肯定了你们几句。“九大”开了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就是很严密。你们这次到中央来，不是66年的五月份了，也不是67年的五月份，也不是68年的五月份，而是69年的五月份，要有

纪律。时代前进了，不是串连的时候了，你们几乎闹着要走，在京西宾馆造反。这个反不能造，你们要造反，就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你们以为施加一点压力，就可以早点接见你们。今天当面给你们讲。先不听朱鸿霞的，先听胡厚民的。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他站起来回答：“来了。”

周恩来理说：“坐到这里来，叫你来就是听听你的。”

康生指着身边一个座位说：“胡厚民同志到前面来。”周恩来也打一个手势。

在场的人都为胡厚民捏一把汗。胡厚民似乎也没想到周恩来会突然这样点他的名，他小心翼翼走到周恩来对面坐下。

周恩来：“现在时代不同了，给你们先打个底子，要严格纪律。你们不守纪律，还带个‘联络站’。”

康生笑着说：“复旧啰！”

周恩来问胡厚民：“‘联络站’设在哪里！”

朱鸿霞答：“设在铁路上一个同志家里。”

胡厚民补充说：“在虎坊桥附近。”

周恩来明确表示：“是错误的，要取消。你们给我们来个示威，要我们接见，不可能！‘九大’开了以后，中央政治局接见你们，排了个顺序：山东、贵州、再你们，今天就接见你们。我们没有亏待你们嘛！你们真要走，就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告别了。你们要清醒点，你们不要以为自己百分

之百的对。当然啰，我们也不能光批评你们，今天是单独接见你们。时代前进了，这是‘九大’以后啊，同志！好，先听胡厚民同志的意见。”

胡厚民：“在前段时间，由于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由于派性作怪，没有加强市工代会的工作，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影响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影响了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能怪他们，主要是我影响了他们……”

周恩来点头说：“这样讲就对了！你好好讲嘛！”

康生：“‘九大’文件你们不学，有些人对我们‘九大’没有一点感情。”他指着胡厚民说：“你还是共产党员，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庆‘九大’，我今天接见巴西代表团，他们远隔千山万水还庆‘九大’。可是在你们武汉却是另外一种示威，还绝食，我说那种绝食可耻！”

周恩来问胡厚民：“你去过山东吗？”

胡厚民答：“去过。”

康生：“学‘反复旧’。”

周恩来：“我们不要复旧要前进，你听过杨保华那个报告吗？”

胡厚民：“在武汉看过。”

周恩来：“他自己已经作了检查。他还住在京西宾馆。山东已经丢掉了的东西，你们湖北又搞起来。‘反复旧’不是你们先搞的，是向他们学的。王效禹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犯了错误是前进中的错误。谭启龙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但愿意改悔的，和张体学一样。张体学犯错误，也在你们面前作了检查，痛哭流涕嘛！如果改得还不好，你们还可以帮助他，改了就好了，要革命，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康生：“复旧有的个别地方确实是有，有的甚至原封不动，主席讲要搞好斗、批、改嘛，还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嘛！‘九大’精神是什么？总要按林副主席政治报告‘九大’精神办事嘛！你们现在不是一般的群众的头头了，是革委会负责人，是当权派，有问题可以向中央报告。现在要讲三性：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科学性。”

周恩来：“是否把你们软禁了？林副主席提‘三性’，就是对我们讲的。”

胡厚民：“我刚从医院出来不久，情况知道不多，其他同志清楚些，但下面同志的错误应该由我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点头说：“这就对了，你影响了下面的同志。”然后对朱鸿霞说：“朱鸿霞同志，是我们去解放你们的嘛！你在沙洋，毛主席在武汉，叫我们把你放出来的。你们有意见，写个信给主席、林副主席和我们，还能不看你们的信吗？你们提出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解决？是可以解决的嘛。我们跟

你们是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的！”

他又问胡厚民：“你参加‘北航黑会’没有？”

胡厚民肯定的回答：“我没有参加。‘钢工总’勤务组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我也没有派人参加。是我们‘工总’下面的一个基层单位交通分部一个叫郭少华的同志，他因公调查他们单位当权派的情况来到北京，因和北航过去在汉串连的同学认识，曾去过北航。”“那天听说北航有个会， he 去听了一会就出来了，但不是代表勤务组。当天他就写回来一封信，给我们‘工总’的一个工作人员后转给我，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但他在信上还特地注明：这个会是乱军的，与我们‘工总’当时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不合。我看后把这封信交给了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邵洪基同志，回来也向‘三办’汇了报。后来武船的几个头头不知‘北航黑会’是怎么回事，问我，我跟他们三、四个人随便聊讲了一些‘黑会’的情况。我应该承担责任是传播了小道消息，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你没有听康老批判‘北航黑会’？”

胡厚民：“后来看到了。”

周恩来：“你同北航有联系，还是同清华有联系？”

胡厚民：“北航、清华我都没有联系。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和韩爱晶、蒯大富见过面，只同蒯大富通过一次电话。

‘720’后认识一些北京学生，‘720’以前我和朱鸿霞同志一起关在沙洋，7月19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和朱鸿霞

同志救了出来。”

朱鸿霞：“胡厚民是和我一块出来的！”

周恩来：“啊！你也是关在沙洋？”

这时，一冶的曹佩贤插话说：“一冶筑炉公司有个叫胡银帮的参加了‘黑会’。”

周恩来问：“‘钢工总’的还是‘钢九一三’的？”

曹佩贤答：“‘钢九一三’的。”

周恩来说：“和刚才讲的不是一回事吧？”

众人答：“不是。”

周恩来继续询问胡厚民都去了哪些地方？

胡厚民说：“今年元月底，他们要抓我，我就跑出来了，先住在郑州，2月5日又吐血，河南医院找不出吐血的原因，我又来到北京，后来又想到大连工学院住一段时间。”

他讲诉了自己为了治疗因支气管结石引起的吐血，曾到郑州、北京、天津、山东等地。

周恩来看见张维荣跟前的《红旗》杂志，说：“你们拿着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但没有学进去。”他对胡厚民说：“谈谈你的看法，座谈嘛！我们把底都交了，讲，不要紧么！”

胡厚民谈了武汉造反派头头被拉下来的情况，他提到了汉阳客车制配厂方斌，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汉光印刷厂高远飞等。

朱鸿霞插话补充：“还有武重厂的祝孝先。”

周恩来：“祝孝先是什么人？”

朱鸿霞：“是武重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胡厚民：“共产党员。”

朱鸿霞：“是预备党员，是我们厂的小胡厚民。”

周恩来笑了：“还有小胡厚民？”

吴焱金说：“武汉不是一个胡厚民的问题，问题是上面搞胡厚民，下面就到处揪小胡厚民、男胡厚民、女胡厚民、老胡厚民。”

周恩来、康生都笑起来了。周恩来问：“这是事实，结论怎样？”

胡厚民说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造反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周恩来点头，胡厚民继续说：“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周恩来点头表示肯定。

朱鸿霞说：“有‘打倒胡厚民，解放辛甫’的口号。”

胡厚民接着讲了湖北省党代会不批判王任重，不批判“二月逆流”，而是批判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爱生、杨春亭的问题，讲了国棉一厂王屏、宁桃珍、陈爱娥问题，讲了“九大”代表的问题。

周恩来说：“从你们的讲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是不是这样？”

康生指着《武汉工人报》说：“你们有句话：‘造反者被

造反，‘造反者被造反’，这在一个厂，一个单位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武汉市都是这样，那不把你们自己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否定自己。你们现在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你们是当权派了。”

周恩来：“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立过功的。不然怎么把你们请来呢？你们工作中有错误，但你们也是副主任、常委。”

康生：“你们省有常委、副主任，市有常委、副主任，你们的责任不小啊！你们不是简单的一个头头。如果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集中在这两句话上，‘造反者被造反，‘造反者被造反’，那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体现？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又怎么理解？湖北省有多少人？”“你们的地位已经变了，是当权派了。”

周恩来：“有些要改革，你们提。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不容易啊！一个新的政权就那么完善？它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是不断地改，不断地前进的。清理阶级队伍掩盖了另外的倾向，你们那里不是出来了吗？要举例子可能还会多，结论不要过早地做。”

康生：“你们不同主席、林副主席商量，不同中央商量，就上街了，就在全世界面前公开了，造谁的反！谁高兴？”

周恩来：“你们搞成 10 万人上街，谁高兴？叛徒王明高兴，美帝、苏修高兴，台湾的蒋介石高兴！”

康生：“‘九大’一完，你们就上街游行。”

周恩来：“‘九大’正在开，你们就上街了。你们冷静点，帮了谁的忙？当然，他们没有给你们做细致的工作，但你们也不听他们的嘛！”

康生：“我们也有责任。”

周恩来：“你们说‘百万雄师’反夺权搞复旧了，这最容易煽动人。你们能说曾思玉、刘丰是支持‘百万雄师’的吗？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头子吗？曾思玉是沈阳调去的，刘丰是支持你们造反派的嘛！‘720’保卫毛主席的，方铭也是这样。我是在你们放出来后才走的。所以结论不能下的太死。毛主席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什么都考虑到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统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你们认为全面复旧的结论，这符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康生：“主席对‘九大’的方针是团结、胜利的大会。”

周恩来：“你们采取分裂行动。”

康生：“尽管你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大方向是团结。你们没有很好读毛主席的书，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他问胡厚民：“你是不是要他们讲？”

周恩来：“朱鸿霞同志谈谈吧！你是钢‘工总’一号头头。”

朱鸿霞：“好，我向中央首长汇报……”

周恩来问：“你们还没有解决跨行业组织？工代会还没有搞起来？”

朱鸿霞答：“解决了。工代会早就成立了。‘钢’、‘新’两派很团结。”

胡厚民也肯定说：“空前团结。”

吴焱金也紧跟着肯定了他们俩人的话，说：“我们确实很团结。”

周恩来：“不一定吧，是观点一致在一起。”

康生：“朱鸿霞同志，我第一次认识你是 67 年 7、8 月份吧？”

周恩来：“67 年 8 月 8 日。”

康生：“那时有人说你在狱中叛变了，上纲很高嘛。当时我对你的印象比较好，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嘛。但是朱鸿霞同志，现在是什么时期，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是 1969 年，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座谈，不是两年半以前。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产了，当然不能说最后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讲了，不是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任务，但与两年前形势不同。我们是在‘九大’以后接见大家，方向应当按‘九大’方针，照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总的方针。你们同两、三年前也不

一样了。你们是当权派，不是简单的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头头。你们是红色政权的当权者，是国家专政的省、市革委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你朱鸿霞与刚放出来的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了！现在你们又搞第四次革命，过去北京伪造了一个文件，叫做五个回合中的站队问题，所谓重新站队就是新分裂。说是我写的，说什么要重新站队，这是造谣。”

陈伯达：“是河南搞的，不是北京。”

周恩来：“主席有个办法，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按单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贵阳棉纺厂实行归口大联合，是他们自己对立起来的，但他们自己不组织学习推广，自己把这个标兵破坏了，昨天我批评了他们。主席7、8、9从武汉、上海视察回来后，六厂一校，去年7月份总结了北京针织总厂经验，六厂一校经验你们不学习，现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席都想到了，都正在解决，要认清新形势。张立国同志，你找‘天派’、‘地派’没有？”

张立国：“没有。”

周恩来：“我知道你没有，再找‘天派’、‘地派’也找不到了！”

吴焱金把一大包材料送给康生。周恩来：“要解决好问题，你们也给我们供应点材料。你们可能准备来打官司的，我们是来搞团结的。”

朱鸿霞谈到市工代会小报不能出时，周恩来说：“小报

还是不出好，出了以后，美帝、苏修在香港买一张小报，用200元。”

黄永胜：“500元买一张。”

周恩来：“毛主席过去一直看小报，去年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以后，就不看小报了。你们再搞‘联络站’就落后了。”

康生笑着说：“复旧啰！领导上帮助你们不够。”

周恩来：“前年蒯大富要大串连，王力拿着小报给我看，满以为我会支持他的，那时杨道远你们也搞什么大串连嘛。你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有责任。只要你们愿意跟毛主席走，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你们。不要以为犯了点错误就怎么样。”

第 1084 回：继续听，其他人介绍情况

谈通宵，大家一起看电影

朱鸿霞继续汇报，讲了武汉军区“三办”，也就是省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领导一切，省革委会从未召开常委会研究斗、批、改问题，下面也普遍建立斗、批、改小组领导革委会，成立班、排、连等问题，周恩来很注意的听着。朱鸿霞提到曾思玉司令员乱点名的问题，方铭说“电信局只有 36 个好人”的问题，说群众组织头头有女秘书问题，张体学说“你们一年打、砸、抢，二年搞武斗，一减一等于零”的问题，刘丰政委对“钢派”说见了“新派”就头疼问题，方铭、张体学要“工总”整“新派”黑材料问题，张体学说“群众组织的头头现在只能代表两万牛鬼蛇神”的问题，省党代会不批判王任重和“二月逆流”，反对批判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造反派抢枪乱军等问题。

朱鸿霞说曾思玉、刘丰首长偏听偏信，汇报是假的，他说：“我们在京西宾馆，也没有说造反。”

周恩来说：“造反是我说的。”

周恩来又听了谢望春谈了国棉三厂阚驰受批判情况和军代表进厂情况，问了夏邦银关于汉轧吴勇功受骗情况，听了沈复礼关于武锅赵秀岳受批判情况。

接着，沈复礼汇报武汉锅炉厂的情况。周恩来说：“你的名字是个旧名字啊！”接着就笑了。

康生：“复旧的复，礼的礼，是个旧名字！”他也笑了。

沈复礼汇报后，王屏谈国棉一厂情况。

周恩来问：“革委会名义上还存在吗？厂里清除了多少坏人？”

王屏说：“厂革委会名义上存在，基层革委会没有了。军代表进厂捅马蜂窝，矛头对准革委会基层造反派头头，都用大字报烧了，用编连队的办法，把下面的造反派头头都排掉了，名义上是改连队，实际上排挤掉造反派，只清了一个坏人，是漏网地主，其他光整造反派。”

王屏谈了对他们厂的“九大”代表陈爱娥的看法，认为这是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问：“你对她有意见吧？”

王屏：“我个人对她没有什么意见，她也是劳模，是个好同志，但感情上一直没有站过来，不够‘九大’代表的三个条件。”

周恩来：“吴焱金同志谈谈吧！”

吴焱金：“我同意朱鸿霞、胡厚民的意见……”

吴焱金也谈到各厂均有斗、批、改小组，架空革委会的问题。周恩来问他：

“你们调查了没有，有多少工厂有军代表？成立了斗、批、改小组？”

众人答：“2430多个工厂。”

康生问：“斗、批、改小组的任务是搞清理阶级队伍吗？”
众说：“是搞清理阶级队伍，但不搞五种人，只搞造反派。”

接着，吴焱金谈了“长办”的情况，谈到市革委会原编制 90 人，现扩大到 1000 人，补上的绝大多数是站错队的，造反派所剩很少时，众人说：

“是 1180 人。”

吴焱金：“少说点好，留点余地嘛！”

康生问：“过去 90 人，现在 1000 多人，是否包括各局？”

吴焱金：“包括。”

其他人有的说包括，有的说不包括。

周恩来问：“你回厂了没有？”

吴焱金回答：“回厂很少，有时开会，接喜报。”

周恩来笑着说：“接喜报也是任务，成了一种负担了。”

吴焱金说：“我们群众代表的任务是：开会、看戏、接喜报、挨批评、开会坐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

周恩来笑着说：“还坐轿车嘛。”

吴焱金：“现在武汉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当了‘百万雄师’还觉得光荣些。”

周恩来：“当‘百万雄师’还光荣？那怎么看待‘720 事件’呢？”

吴焱金：“所以我们想不通。”

接着周恩来让李想玉谈武汉钢铁厂的情况，他随手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对李想玉说：

“向你们澄清几个情况！你知道，‘815会议’以前，武钢搞到几乎一吨钢都不出！”

周恩来了解了武钢几个人的情况后，李想玉说：

“冶金会议我们根本不翻案，我们要维护‘815会议’。”

周恩来：“‘815会议’前，武钢一吨钢都未生产，‘815会议’后生产上去了，现在生产下降了。今年一季度生产上升了，现在二季度生产下来了。如果说武钢扩大化了，压了你们这一派，要加以纠正，还说得过去。如果‘反复旧’反到‘815会议’以前，搞对立情绪，就不好了。如果斗、批、改扩大化了的问题，那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能说‘815会议’以后的生产比‘815’以前还差吗？我相信给你们讲清道理，你们不会这样做的。武钢大有潜力。”他接着问李想玉：

“你对徐道基的看法怎样？”

李想玉说：“他坚持‘118联合协议’，坚持大联合，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反对，说席位少了，是错误的。但对他个人来说，我们有看法，他在57年有右派言论，他原来是团委书记，受到开除团籍，撤职降薪的处分。武钢革委会开始，我们这一派一个也没有。”

周恩来：“不能说一个都没有吧？你不是副主任吗？”

李想玉：“我是后来补上的一个常委。”

周恩来指着到会的“九一三”代表说：“你们这些不都是常委吗？”

李想玉：“他们一个也没有在武钢结合。”

周恩来了解他们这一派被抓了多少人？挨斗的有多少？检查的多少？

李想玉说：“我们写信点名的 21 人差不多都抓了。武钢 21 个厂、矿、所达成的（在冶金会议期间）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都被撕毁了。他们把我们这一派打成反军乱军派。武钢 21 个厂、矿、部、所，187 个车间、站、段，1230 多个大小头头差不多都写了检查，百分之七十受批判，百分之五十被斗，有的被关。青山区 33 个街坊，各厂各车间都设了关人的地方。”

胡厚民：“武汉还搞了不少甄别教育所。对外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周恩来：“啊？批、斗的一半，检查的百分之七十！”

由于李想玉湖北口音浓重，周恩来对他说：

“你讲慢点，你讲的话，我只能听懂十分之一、二，”他指着康生、陈伯达等人说：“他们都听不懂。”

康生笑着说：“我听话的能力还是比较好的，可是听你的话却象听外国语一样。”

于是，接下来邓金福代替李想玉汇报。他说：

“武钢各厂、矿、部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到革委会的副

主任如姜振武、管胜祥、廖元凯等等和其他副主任、常委也靠边站。我们认为他们家庭出身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贫下中农，不应该靠边站，应分配他们搞斗、批、改工作。”

周恩来：“回去以后（指上次开完冶金会议回汉后），你们这一派可能受点压，对造反派要具体分析。你们想一想，你们得势时也压了他们嘛！”

邓金福承认说：“是压了他们。”

周恩来：“谈得太多受不了啦！每天晚上如此！今天其他讲话都不听了，最后一个听听学生代表杨道远的，你是钢‘二司’的？”

杨道远：“钢‘二司’的。”

周恩来：“啊，钢‘二司’的，前年到全国各地去支左的是你们吧，你是钢‘二司’头头，我们去武汉头一个就到你们那里。”

周恩来问了大学生的分配情况，接着，杨道远拿出稿子来念：“这次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周恩来打断了他，说：“你知识分子那一套又来了，要说什么就直截了当的讲吧！”

黄永胜也说：“不要念，他们工人都没有稿子。用自己的话讲，这样时间就短，念起来，时间就长了。”

周恩来：“朱鸿霞也很有水平，很会写文章。”他问胡厚民：“朱鸿霞是初中文化程度吧？”

胡厚民答：“是！”

当杨道远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时，周恩来说：“照你们参加的示威游行，文化大革命就不好了嘛。”

康生：“你们参加上街游行，你们就自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当杨道远汇报到夺权问题时，康生念了《武汉工人报》上的一段话：“这次反复旧斗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的斗争……”然后说：

“你们说‘反复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这就成了敌我矛盾了，是二次文化大革命提前论。主席批的革委会是资产阶级反夺权，你们是无产阶级再夺权，而这些资产阶级又包括曾、刘，也包括你们自己。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去了？你们本身是革委会的。”

周恩来：“去年‘钢九一三’闯了那么大的乱子，我们也没有责怪你们。并没有说你们是资产阶级，而是说你们有点派性。”

康生：“你们讲了许多材料，可能还举出更多，但却不能下这个结论。你们报纸上讲，这是第四次大革命，要重新夺权，包括你们在内，都成了资产阶级了嘛！你们把主席批准的、信任的人说成是资产积极反夺权，”他笑了：“你们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这就成了敌我矛盾嘛。你是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朱鸿霞讲话头头是道，是你们的东西，你们讲四

次革命，一次革王任重的命，二次革陈再道的命，三次革杨、余、傅的命，四次革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命。你们也是革委会的，你们也都是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了。那你们自己也不承认嘛，矛盾得很！”说着，康生又笑了。

周恩来：“新的权力机构，前进中可能错误少一点，多一点，你们掌权就掌得那么好吗？我看还得三结合。”

康生：“清理阶级队伍可能有点毛病，但你们没有一个人说要清理阶级队伍。”

黄永胜：“对造反派要作分析，造反派中也有坏人。你们连传达‘九大’精神都听不进去。”

周恩来：“你们听不进去，头脑太热了，今天给你们降温。”

众人反映：“材料发得较少，开始还说是小道消息。”

周恩来：“北京郊区木材厂有多少国民党，你们武汉就没有？”

康生：“刚才黄总长讲对造反派要作分析，确实是这样。我们中央文革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副主席在报告中也肯定了中央文革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那该是响当当的吧，可是原来 17 人，就包括了王任重。”

周恩来：“还有王力，我还保护过他。那时，我到武汉，”他指着朱鸿霞说：“把你从沙洋农场解放出来，当时还不知道有你胡厚民同志在内。我一直在等你们，船开得很慢，你

们走了，我才走。‘720’事件中，那时，毛主席指示要王力先走，叫刘丰同志保护王力。在武汉南边的一个什么机场？”

胡厚民：“在南湖机场。”

周恩来：“不对！”

张立国：“在山坡机场。”

周恩来：“是在山坡机场起飞，然后我们起飞。我的飞机又超过了王力的飞机。所以，我在北京机场，又迎接了他。那时，我是出于阶级感情。后来，我们发现王力是坏人，就坚决把他清洗出去了！”

康生：“我们中央文革还有戚，还不是‘造反派’吗？事物是变化的，你能说造反派都是好人吗？当然，好人是多数。”

杨道远谈到学校情况时，周恩来问：“教授还关在牛棚里？还没有落实政策？”

杨道远：“教授还没有动他。”

周恩来：“你们要把大方向扭过去，你们这样搞方向错了。”

杨道远汇报了武汉普遍搞“捅马蜂窝”的情况，从汉阳枕木防腐厂捅起，作为典型，在七千人大会上介绍经验，后全市推广……他还讲了武汉普遍存在压造反派的情况，汇报湖北省党代会大规模批判任爱生等站对队的干部，而不批判“二月逆流”，不批判王任重。

康生问：“你们有几个人参加了党代会？”

参加省党代会的代表都举起手。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不提批判王任重？”

众人答：“提了，我们提了不起作用。”

杨道远提到用大量汽车送喜报的问题，周恩来：

“报喜再不要用汽车了，这是浪费。

今天就谈到这里。今天是有意让你们激烈派放的。还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说了，今天专听激烈派的，我不给扣帽子，你们算是激烈派吧？胡厚民讲了，朱鸿霞放得最多，还有那个女同志王屏……

你们先回去，学习主席讲话，我给曾思玉打个电话，给你们传达传达。”

康生：“你们回去以前，都考试考试，看你们学习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学得怎样？看谁考得好。”

周恩来：“给你们出题目，看文件，再考，这是毛主席提倡的考试办法。你们要顾大局。你们要打官司，你们受了点委屈，或者受点压，不要讲个人恩怨，这样一场大的革命嘛！解放战争才打了三年，文化大革命三年了，‘516’差三天就到了，这是一场比较彻底的大革命，对世界革命是一个大推动。你们总是从小局着想，也许有毛病，但我们要看到大局。小局的问题，你们应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按毛主席的政策去落实。前途远大得很，要支援世界革命。”

朱鸿霞、潘洪斌插话说：“今天首长这样亲切接见我们，批评我们，就是打我们几下也是舒服的。”

周恩来笑着说：“哪能打你们呢？今天就讲到这了。再谈，我们这些老头子就受不了啦！我和伯达同志还有一个差事——审查电影《南京长江大桥》，大家都去吧！”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大家一起去看电影，有说有笑，十分亲切。周恩来坐在吴焱金和朱鸿霞中间，对他们两人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

电影演完后，大家恋恋不舍地送中央领导离去。当大家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天已经快亮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告诉武汉家里人：方针不变。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第 1085 回：连续见，内蒙古党政领导

钓鱼台，江青擅自召集会

再说内蒙的滕海清和吴涛“九大”前来到北京后，频频向内蒙古发电发函，口气调子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其间，滕海清接到康生的一个电话。康生说：“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为什么不能当‘九大’代表？我问过谢富治同志，高锦明是个很好的同志。”

滕海清急得大声说：“康老，高锦明不当‘九大’代表，不是当面请示过您吗？！”

谁知，康生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怎么，你连中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吗？！”

在“九大”期间，康生又参加了内蒙古组的小组会议。他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内蒙形势的批评。同时，他本人对内蒙古清队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 180 度的急转弯。

4月4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打电话给权星垣及其他留在呼市的自治区革委会常委，对内蒙古工作又做了一番指示，其重点是“落实政策”问题。

这时，内蒙古代表团秘书李德臣通过李雪峰找到周恩来，向他反映了内蒙古清队“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当即作了指示。

从周恩来处回来后，李德臣去找滕海清，说：“我们应当向中央认个错。”当时，吴涛、李树德也在座。滕海清闷

声不响，吴涛、李树德同意向中央写检查。

李德臣立刻起草了一份检讨报告，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名义，呈送给中央。这时，已是1969年4月19日。

5月初，中央将内蒙古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常委全部召到北京。

5月13日，京西宾馆，周恩来、康生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你是老同志、老红军，咱们以前在苏区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AB团，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

康生也对这位内蒙古的第一把手严加批评。

滕海清一言不发。

话题集中在滕海清擅自将高锦明撤职批判一事上。周恩来问滕海清：“你把高锦明同志停职，向中央报告了吗？经过中央的批准吗？”

滕海清埋着头一声不吭。

康生转向高锦明，旧话重提说：“高锦明同志，我原来就感觉你有点右。”

周恩来继续对滕海清说：“滕海清同志，你要是听了高锦明同志的话，犯的错误可能要小一些。”然后，他又对高锦明说：“你发不了电报，为什么不写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着对权星垣说：“权星垣同志为什么也不反映？”

康生问：“权星垣你是不是有些滑头呀？”

周恩来接着问：“可能吴涛同志更正确一些？”

接见临结束时，滕海清思想仍然没有通。周恩来向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人说：“你们帮助帮助他！”

第一次接见后，在京的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立刻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份文件：《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影响了斗、批、改的顺利发展……”

在《通知》之后，还附有一份《关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平反及其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草案）》。

5月16日，周恩来、康生等人第二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结束后，由李德臣执笔，以内蒙古核心小组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6人的名义，在5月19日又起草完毕一份文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精神是周恩来接见党的核心小组和军区党委成员时的讲话内容，有些字句甚至就是周恩来的原话。

内蒙古“内人党”冤案曲折艰难的平反工作从此开始了。

周恩来在召集内蒙古领导干部开会时，曾提到“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说的是他的亲侄女周秉健。

1968年夏，周秉健初中毕业，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行前，她与邓颖超联系，说临走想见见伯伯。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秉健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邓颖超。

直到吃晚饭时，周恩来才跨出办公室的门，亲热地招呼小秉健，问她什么时候走？思想准备得怎么样？

那时，周秉健只有15岁，是个十分文静的小姑娘，在伯父面前，还有些拘束。

饭后，周恩来领着周秉健来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给她指点锡林郭勒盟的位置，又交代了几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秉健下乡后的当天晚上，一位懂汉语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给知青们讲了形势。

那时，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刚刚结束，挖“内人党”的决议文件下发到了各基层单位。周秉健所在大队的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正好是“挖肃”骨干，他向北京来的学生们大讲“内人党”的滔天罪行，说乌兰夫要“叛国投修”，草原上到处都是他的“黑线”，全大队只有3户牧民是红的，

其余的都是黑户。

周秉健住在阿妈这，邻居都是反革命，紧张得她心怦怦直跳。

1968年10月1日，草原忽然紧张起来，纷纷传说苏、蒙修可能趁国庆期间打进来。周秉健所在的阿巴嘎旗靠近边境。那几天，她和伙伴们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夜里和衣而睡，小蒙古刀就搁在枕头下面。

周秉健每隔半个月就往北京写一封家信，通过周恩来身边一位姓赵的秘书转收。在信中，她把自己下来以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五一十地向伯父和邓颖超娓娓道来，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有什么价值。然而，周恩来还是从侄女的普通的家信中感觉到了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中似乎存在问题。

“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在草原上传开了。周秉健也听到了传闻，但她浑然不知这个“女知青”就是她自己。

5月17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他们到了钓鱼台11号楼以后，看见到江青和姚文元正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江青看见李德生进来后，就招呼开会。她说：

“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

大家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在一边悄悄作记录。但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江青首先讲自己的家庭出身，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与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途中，飞机曾在西安降落，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说，在延安，毛泽东认识她以后，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散步。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整理抄写的。1947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

吴法宪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写的：“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又说：总理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他在历史上就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

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总理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主席的批评。”

接着，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对康生，江青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就这样，江青一个人从上午 9 时一直说到中午 12 时，一口气说了 3 个小时，姚文元最后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

从钓鱼台出来，吴法宪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军委办事组，在车上他们俩就议论开了，觉得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符合程序：她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能单独召集 7 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这样做不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吗？而且，这样议论 3 位政治局常委，谈论毛泽东和她的私生活，实在有损毛泽东的崇高威信。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他们俩人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他们 4 人一起到来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

林彪听了他们的报告后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

他要黄永胜和吴法宪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与汪东兴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对黄永胜他们说：

“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黄永胜他

们：“毛主席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你们，汪东兴要你们赶快去。”

黄永胜、吴法宪他们来到游泳池时已近19时，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黄永胜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召集他们开会的情况，但没有时间细说。

毛泽东听了后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

吴法宪说了一句郁积已久的话：“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

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这时，叶群来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

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說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说完，毛泽东又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黄永胜和吴法宪到他这里来过。

此时，邱会作已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家里。据后来邱会作回忆，他将下午江青讲的话详细地对周恩来说了一遍。以前，每次江青议论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邱会作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透风”。周恩来听了以后总是沉默不语。这一次，周恩来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而且非常难过地对他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几十年呵……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

随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后，吴法宪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随后，吴法宪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

黄永胜、吴法宪在三座门向李作鹏、邱会作传达了毛泽东对他们所说的几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不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

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第 1086 回：又查出，“中国(马列)共产党”

见“徐海”，与武汉“新派”座谈

1968 年 3 月 13 日，谢富治对 1967 年 10 月 8 日发生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 8 军副军长赵登程说：“搞专案要大反右倾，不要下不去手，不要老观点，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是叛徒，中国赫鲁晓夫通过这些人，通过公安机关将矛头指向伟大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安部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对他们要有刻骨仇恨，绝对不能右倾。”事后，赵登程在笔记本上亲笔写道：“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看法。应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国第二个吓（赫）鲁晓夫、外交部某些负责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1968 年 4 月 28 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要追穷寇嘛，

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1968年8月19日，陈伯达等人再次接见“非常委员会”专案组。陈伯达说：“几个煤球工人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击‘二月逆流’的东西，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阴谋案，要注意‘二月逆流’。”

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谢富治说：“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邓小平、贺龙、罗瑞卿、谭震林”，“总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在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等人的授意下，赵登程领导的“非委会”专案组采取逼供、诱供的方式，竟在1968年12月间，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原来，196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敷，因“516”问题拘留审查。到了12月10日，周慈敷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伪中央

书记”是朱德，“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

第二天，12月11日，办案人员对周慈敷说：“你还没讲到了点子上，表现不好。现在是戴罪立功的时候到了，把知道的你都仔细讲出来就是了。竹筒倒豆子，干脆一下全讲出来。”

周慈敷被逼得山穷水尽，干脆来了个“你要啥我给啥，你叫讲啥我讲啥”。她越讲越起劲，越编越玄乎，像决了堤的江河，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云里雾里一下子交待了“中国(马列)共产党”的成立经过、领导成员以及活动等等。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秘密召开代表大会和成立党的经过。她说：

“秘密代表大会是在67年7月15日左右在原中直机关9号小礼堂秘密召开的。事先只有代表们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大会是在上午9时半开始，会场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前来参加大会的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宁一、董必武、聂荣臻等人。

另外有杨成武、余立金、肖华、傅崇碧……赵毅敏、刘

晓、刘长胜等也都坐在主席台上。”

“从大会代表成员来说，包括有各系统各部门选出来的代表 200 多人。”

“秘密大会由朱德主持召开，他致了开幕词。”

“陈毅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会议结束之前，朱德曾作总结。”

“会上成立了党中央，名字叫中国(马列)共产党。领导人是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中央的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

“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 9 人，中央委员有王震、肖华、伍修权等 16 人。”

“并且成立了起义行动的委员会，这个名字叫‘中共(马列)行动委员会’。”具体步骤是“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联名签署了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当然最后结果是由于毛泽东英明伟大，武汉“兵变”没有成功，是未遂的。

其中，国务院各系统以及军队都有具体领导人，又是 30 多人的一个大名单。

苏修、蒙修等秘密发来了贺电。

周慈敷讲得煞有介事，有人、有事、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

审讯人员像听她摆龙门阵一样，听得着了迷，再不需要吹胡子瞪眼，更不需要拍桌子打板凳，甚至不愿打断她的思路，让她娓娓道来。经过如此这番几次“交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齐了。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说：“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

但谢富治始终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上报，只是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

在此期间，赵登程等人又拿着周慈敖诬供的材料，对民族研究所另一个姓洪的实习研究员诱供逼供，30天提审43次。1969年1月27日，这位研究员也被逼供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左派）”；1月28日，他又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云、肖华等人是伪中央委员。

随后，赵登程等人根据周慈敖他们二人的诬供材料，指令国家经委群众专案组，对经委一位姓姬的干部诱供逼供，迫使他也供出一个“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反革命黑党主席李富春、副主席徐向前、总书记陈毅，委员有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1969年4月，“九大”召开，朱德、叶剑英、陈毅、徐

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伯承等人均当选为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

“九大”后，谢富治继续对“非常委员会”专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

赵登程等人搜集所谓“伪党”活动证据的罪恶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但始终也查不出个所以然，不得不于1969年8月，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这个“惊世奇案”不了了之了。直到1978年8月，中共公安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伪党”黑案的清查报告》，对此案进行了结案。

事隔近四十年后，香港民间历史学家胡志伟撰文称，他曾专访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退役的唐柱国，唐柱国向他透露，1967年10月天津沈剑云所写的那份《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的传单底稿，是唐柱国写的。

唐柱国本名粟明德，广西桂林人，1938年生，为桂系将军粟国宝之子。其父粟国宝，又名粟仁广，曾任中华民国广西省义宁县长。1950年，粟国宝任国民党总统府广西军事特派员，在广西组织反共游击战，兵败被俘，镇反期间，与妻子张玉英先后被镇压。

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已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读书的 19 岁的粟明德从北京一路逃到香港，再辗转赴台，被蒋经国吸收进情报部门，毕业于香港中大新亚学院历史系，后在台湾国立政大东亚研究所毕业，保送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第二组香港特派员、工作组组长、中央大陆工作会美国组组长、《中央日报》主笔、台湾外交部旧金山办事处秘书、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等职。并派往美国和香港从事情报工作。据说，唐柱国是蒋介石为他取的化名。

据粟明德说，他在文革期间，花了一个晚上起草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这张传单，由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短波广播，被沈剑云抄录油印。

退休后，粟明德在美国组建了世界广西同乡会，被推为首任会长。

改革开放以后，粟明德曾以世界广西同乡会会长身份回大陆参观，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王兆国的“亲切接待”。

我们再回到 1969 年的北京。5 月 19 日，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汇报内蒙、山东、贵州等地的问题，严厉批评这些地区负责人的错误。

由于北京的“徐海班”在 4 月底 5 月初再次发生两派代

表大批出走事件。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内蒙、山东、贵州等地问题的当天，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徐海班”和武汉的代表。接见时，林彪讲话，强调要团结，说：“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不团结就等于不革命，不团结等于帮敌人的忙，等于帮敌人打自己。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我们能够团结一致。你们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和稀泥又不要和稀泥，对资产阶级不能和，对自己的同志就要和稀泥。68军的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部队内部要统一思想。”

周恩来说：“今后完全支持68军，相信68军，支持以张铚秀为班长的68军党委。”

吴法宪说：“在徐海地区，不管是空军、海军，都要服从68军的领导。”

当晚21时35分至23时4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武汉的“新派”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郭保安、张维荣5人。

周恩来问：“毛主席接见了你们吧？”

众人答：“接见了，坐在最前面，最中间，看得最清楚，也最幸福。”

周恩来：“这是吴法宪同志亲自安排你们坐在最前面的。张立国，‘新华工’的。”

康生：“郭保安也是‘新华工’的。”

周恩来：“要回去了，张立国你讲讲。你是哪里人？”

张维荣：“我是广东人。”

高玉泽答：“湖北人。”

龙铭鑫：“湖南人。”

郭保安：“河南人。”

周恩来：“两个湖南人啰！你下去了吧？到哪里？”

张立国：“到通城去了一下。”

众人说：“他还没有毕业。”

周恩来问：“华工插队的多少人？”

张立国：“很少，华农、湖大多一些。”

周恩来：“华工革委会成立了吧？”

张立国：“成立了。”

周恩来：“好哇！”

张立国：“我们也犯了错误，怀疑刘丰，揪变色龙时。”

黄永胜：“揪变色龙，北京的东西。还有什么武老谭，广州揪广老谭，整我的嘛。”

张立国：“湖北形势不错，湖北运动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正确的，问题是可能有些单位扩大化。工宣队开进去是对的，但捅马蜂窝，造反派挂起来多了。”

周恩来笑了。

张立国：“‘反复旧’不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不

能压。”

周恩来：“湖大的龙铭鑫，我去过你们学校，补了一课嘛！”

龙铭鑫发言。当他讲到去年揪“变色龙”时，康生说：“揪变色龙，北京的。”

当龙铭鑫讲：“这次‘反复旧’，总理批评很对。”

康生问：“你是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也是？”

周恩来：“张立国是副主任。杨道远和他。‘钢派’一个，‘新派’一个，两个副主任。”

周恩来让华中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高玉泽也讲讲。当他讲道：“尽管自己不同意‘反复旧’也要承担责任”时，周恩来说：

“工代会占领了市革委会，你们知道吗？还有工代会发了一个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

康生：“工代会决议是错误的。工代会要领导共产党？”

22时30分，叶群进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周恩来：“你们‘钢’‘新’两派要团结。有的左一点，有的右一点，那没有什么关系。你们的观点有点差别。无论如何不要影响你们的团结。”

众人答：“不会的。”

周恩来问：“不会武斗吧？”

众答：“不会。”

周恩来：“你们要多作工作。郭保安谈，简单一点谈。”

郭保安说完，周恩来又让湖北大学的张维荣谈谈。

张维荣说自己对“反复旧”认识有反复，五一节参加三代会游行有错误。

周恩来：“与‘五一’有关系吧！今天就谈到这里。等一下一起谈，今天一定结束。你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回去了。武汉地处中心，武汉‘反复旧’影响几个省，不能这样搞。现在本来不分‘钢’、‘新’派，你们要向他们作工作，一道前进，不要对立。一时讲不通就多讲几次。我们只能把话给他们讲明白，把道理讲通。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搞好武汉。你们的态度都很好。”

“你们回去，主要是宣传贯彻‘九大’精神。（武汉）搞得好坏影响大局，但是也不会大离开，群众是不会也不愿意离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

康生：“你们的观点是好的，特别是你们看到了武汉的大好形势。如果按工代会 11 日决议那问题就大了。复旧有几种。我们知道的是二七车辆厂在整党中复旧了。《人民日报》上讲的主要是指二七车辆厂的那种情况。个别单位复旧了，武汉有没有？可能有。还可能有个别单位原封不动。也有另外一种复旧，把三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要重新夺权。这也是一种复旧。现在都变了，现在完全把武汉形势搞成是资产阶级夺的权，那是不是又复旧了？现在如果按 11

目的决议办，夸大到了极端，就走到了另一方面。你们的看法肯定了主流方面是对的。如果按工代会 11 日的决议办，朱、李、吴他们首先应该退出革委会，否则他们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了。所以从总的方面提出‘反复旧’，像上次说的，是资产阶级反夺权和无产阶级再夺权，这就完全错了。如果武汉完全复旧了，那么武汉地区三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武汉地区的胜利到哪里去了？这是自己否定自己。这种思想是不对的。你们那几个学校怎么样？杨葆华的报告，你们那里有没有？”

“山东‘反复旧’的关键是从清理阶级队伍想到整党建党。有的人开始是造反派，后来发生变化。有的人或者是家庭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历史上有些问题。有一个叫余金瑞，他祖父、父亲都是反革命。这个人能不能入党是一个问题。青岛市革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同意他入党，另一大部分说他不能入党。杨葆华同意他入党，但是拿不定把握，就去问王效禹。王效禹说这个人应该入党，否则就是对老造反派、老战友的歧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老造反派都是可以入党的。不能说每个造反派都比群众好。不能清理阶级队伍清到自己的老战友就发生抵触，就反感，就说清理阶级队伍是清理造反派，清理老战友。不从阶级观点，不从党性上看问题。不分清是非不行。造反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审查一下也是应该的嘛！就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抵触，口头上也承认

清理阶级队伍好，不分阶级关系，只要是造反派就一概保，不行。造反派应当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动力，也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对造反派要作阶级分析，对老战友有问题更应当帮助革委会解决。因为他是你的老战友嘛！这个问题郭保安讲得好，有的人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得了啦，那怎么行呢？红卫兵只准你审查人家，不准人家审查你，这怎么行呢？这是造反派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清理阶级队伍应该注意对造反派头头审查要特别核实材料，要重证据，不要随便挂起来，泡起来。就是有错误，还是应该帮助，应慎重处理。一方面造反派要接受，另一方面审查机关要慎重，这有一个了解的问题，有一个群众问题，有一个功劳问题。高玉泽同志，你参加了大会，知道开会前夕，主席提出徐海东当代表并参加主席团问题。徐海东同志错误不小，但是，他有一点功劳。所以对待造反派，应该清的就清，但是要谨慎。个别厂出问题，那很可能，可能还不只是你们反映的这么多。”

周恩来：“清理阶级队伍，一下子铺开，面很广。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有问题也不奇怪。高玉泽同志，你听过主席讲话，主席两次讲话都讲了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落实政策，这是很细致很认真很艰苦的工作。斗、批、改小组，你们那里（指高玉泽那里）就比较好，有的就可能粗糙一些，有问题可以改嘛！斗、批、

改是个新的运动，本身就要出现一些问题。北京‘六厂一校’也是这样，不断的改嘛！”

康生：“张立国同志说的武汉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对，但有的地方有扩大化，这是要注意的，这是最容易犯的。”

周恩来：“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打击面容易大，一讲清理阶级队伍就搞进去了。主席讲有的人是敌我矛盾，但是还允许他改嘛。这一点要注意，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康生：“这个清理阶级队伍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问题。一种倾向出来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对造反派扩大化不好，对站错队扩大化也不好。你们都是团的干部？马上要整团了。青年团还是光荣的。”

周恩来：“不要因为团中央有问题，就否认了青年团，不要这是共产党光荣，青年团就不光荣。”

康生：“你们几个党员？”

众人说：“小龙是预备党员，小张是团员，其余三人是党员”

康生龙“铭鑫同志是预备党员，为什么还没有转正？”

众人答：“搞文化革命。”

康生：“啊！搞文化革命还搞倒退了。”

周恩来：“年龄大了，还没有转正。杨道远是不是党员？”

康生：“预备党员，够条件的应当转正。”

周恩来：“张立国你写申请书没有？”

张立国：“写了几次了。”

周恩来：“水院没有来人？”

众人说：“丁家显毕业了，分配在云南。”

周恩来：“那好嘛！”

黄永胜：“你们那里知识青年回来了一些？”

众人说：“是的。”

黄永胜：“再动员下去。”

康生：“下农村，那有什么复旧？要叫他们下去。”

周恩来：“事情总有反复，有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们先回去，我们在这里，你们先回去，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再过去。”

第 1087 回：再继续，接见湖北省代表

念《声明》，批判工代会《决议》

接见了武汉“新派”后约 10 分钟，23 时 55 分，中央领导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再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成员。被接见的有：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赵福新、李化民、方铭、张昭剑、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夏邦银、邓金福、钟锡钢、潘宏斌、王屏、杨玉珍、龙铭鑫、谢华之、胡崇元、沈复礼、李洪荣、张耀忠、曹佩贤、龙克发、王锦铭、郭保安、张维荣、雪湘明、董明惠、谢望春、王步青、刘海江。

当中央首长步入接见大厅时，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

中央首长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当叶群和胡厚民握手时问：“你是李想玉吗？”

旁边的李想玉答：“我是，他是胡厚民。”

叶群说：“胡厚民同志我在台上看见他那个头发翘翘地。”

她是说当天毛泽东接见“徐海班”时的情况。当时武汉的代表也都参加了接见。

坐下后，康生问：“今天接见都去了吧！”

众人答：“都去了，我们很幸福。”

周恩来说：“吴副总长把你们湖北安排在最前面最好的地方。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黄永胜：“我看你们了，”他指着王玉珍说：“看见那个女同志。”

叶群指着胡厚民说：“我看你那个头发翘翘地。”

康生：“好好体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接见也有很多经验，前年去年有很多单位来告状，打官司，有的说，重庆谈判，”

周恩来：“那是内蒙古的。”

康生：“不知道他是国民党还是我们是国民党。”

曾思玉报告：“二七区工代会五十多个单位，在东单贴了大字报，4月27日贴的。”

康生：“有的人说，到了北京，中央要分化我们，有的人要揪叛徒，说在北京变修了，有的还要搞什么统一口径啰！”

周恩来：“过去在武汉还有什么‘不钢则康’，康老不在这里吗？”他笑着说：“我们都是生在康有为时代。”

谢富治：“还有叫什么康三娘子。”

众人笑了，说：“那是骂人的。”

康生：“办学习班、接见也有各取所需的，有的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当成鼓舞，拿主席政策来检查自己的差距，紧跟毛主席。一种是利用主席的接见把自己的错误掩盖起来。

主席接见是好事，但又各取所需，看是不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紧跟了毛主席战略部署。”

周恩来：“同志们：我们那天见面是 12 至 13 日，听取了胡厚民、朱鸿霞、吴炎金、王屏、杨道远等同志讲。李想玉同志的说话听不清，汉阳人，我们也讲了一些，从那天以后，本想再听其他一些同志讲话，后来内蒙古来了，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耽误了一下，直到今天 5 时东方红。今天你们又见到了毛主席，你们也可以交谈学习一下，后来 18 日看到了你们工代会一个决议，题目大得很。你们可以看一看，可能不是你们写的，你们在这里嘛！但在你们来前，武汉市革委会有一个查封材料的文件，大概你们没有参加讨论，通过文件不请你们参加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们李想玉、吴焱金等就发表一个声明，不承认，不同意这个文件，这样就引起了进驻市革委会，你们进驻了市革委会知道吗？”

众人说：“不知道。”

周恩来：“就是根据李、吴等的声明，17 日进驻了，武汉街上有一个进驻声明，我念给你们听一听，我们来请教请教。”

周恩来念《声明》，当念到“如果有人诽谤，攻击者，后果自负时”，他说：

“来头好大，我们今天就来攻击它一下，来个后果自负。”

当念到“限……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离职时”，周恩来来说：

“口气这么大，好像解放初期，我们派军队进驻工厂差不多。”然后说：

“1969年5月17日有20多人进驻，不仅在市革委会进驻，而且在街上撒传单。你们离开武汉后，有两个东西，一个进驻，一个是传单和进驻，全面复旧了，先听康老开讲、开讲。”

康生：“我想问一下同志们，你们看到11日工代会的《决议》没有？”

潘宏斌回答：“我们不知道，在体学同志那里才看到的。”

康生：“你们有什么看法？”

潘宏斌及其他：人：“是有错误的。”

康生继续问：“有什么错误？”

潘宏斌：“混淆了两类矛盾。”

康生：“怎样混淆了两类矛盾？”

潘宏斌：“重新夺权是错误的。”

康生：“这个决议是你们起草的，还是他们搞的？”

潘宏斌：“个决议我们的确不知道。”

周恩来：“你们的联络站没有给你们通消息？”

潘宏斌：“我们已没有联络站了。”

朱鸿霞：“上次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接见，批评了联络

站的事，我们认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回去就把它撤了，现在和外面已没有联系了。”他说：“这个决议虽然不是我们起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但责任应该由我们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这也是跟我们在家时的错误思想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因此责任不在这个决议起草的同志，不在留在家的同志，责任在我身上。”

周恩来点头微笑着说：“好，对。”

康生：“这个决议有个好处，你们的错误思想就容易看清楚了，容易认识了，是这种错误思想导致了这个行动。”

周恩来：“还有 17 日进驻人数虽不多，但它代表一种方向。”

曾思玉：“16 日还有一个，和 17 日一样。”

康生：“同志们很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决议》，从中得到教训，看到一种偏激的夸大的错误思想，可以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把一个主流和支流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了，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可以得到这个教训，不仅有《决议》，还有行动，用了调查团的名义进驻革委会，好像我们进驻国民党机关一样，因为你们认为全面复旧了嘛！反夺权了嘛！就必然产生此行动，同志们要引起教训，《决议》我看了，不讲人，从《决议》本身来讲，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是一个三反《决议》，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因此是反动的《决

议》，我这个看法可能不对啰！你们细看里面的内容，他们如何打着拥护毛主席，打着拥护‘九大’的召开，但实际上搞分裂的，‘九大’要团结，《决议》是要分裂的，把革委会的人当成走资派，包括你们在内。那你们首先应该退出，不然你们也成了资产阶级了，那参加省、市革委会的人一时是无产阶级，一时是资产阶级，那不是矛盾百出。怎么能从‘九大’得出完全把武汉三镇的文化大革命全部否定了呢？

口号没有根据‘九大’的方针、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完全反毛主席的，反对‘九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武汉开了一个党代表大会，这个会可能有些缺点，但主流应肯定，这个《决议》完全是反对的，似乎中国共产党应由工代会来领导，我们也被他们来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怎么能脱离共产党呢？列宁讲：工人阶级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会走上工团主义，反动的。‘九大’总结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包括武汉嘛！《决议》把三年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也包括把你们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功绩也否定了，武汉地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于你们的努力，也由于张体学同志的觉悟，张体学同志解放了，是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你们的成绩，是武汉文化大革命很大的成绩，不仅是我们的成绩，也是你们的成绩，这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嘛。《决议》的起草人把张体学作为靶子，实际上是对着曾、刘的，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曾、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结合的，他们是解放军

的领导干部，张体学也是解放军领导干部，如果武汉全面复旧，复辟了，在工厂是军宣队，在学校是工宣队，‘反复旧’的矛头是对准解放军的，山东的‘反复旧’是对准解放军的，武汉工代会的《决议》是矛头对准解放军的，所以说《决议》是对准解放军的，武汉工代会的《决议》用调查团的名义发了这样一个声明，还声明‘谁敢污蔑，后果自负’，我现在就要污蔑，就要负这个后果。《决议》中第八条‘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要时将阐明我们的观点，……’还要什么‘造反有理’。武汉开党代会，他们要造反，造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反，反共产党嘛！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要由他们决定，他们开，你们这样理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很高兴地听到你们在看了这个《决议》后，也认为是错误的。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朱鸿霞同志讲：虽然不是他们起草的，但是他们原来在家的思想的发展，主动要承担责任，这很好嘛。这可能是同志们原来一种错误思想的发展，发展到此种程度，这就说明了一种错误思想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直发展到实际上到市革委会去夺权。我认为革委会、军宣队是有缺点的，你们讲的可能有，甚至更严重都有可能的，你们讲专案组、斗批改小组把造反派头头错误地靠边站，挂起来，泡起来了。‘清队’是一个尖锐的敌我矛盾。‘清队’不仅可能扩大到造反派头头上去，还可能扩大到过去站错队的群众头上去，这都是不行的，要防止扩大

化。刚才听张立国同志讲，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对的，但有扩大化的问题。我希望曾、刘要注意，一清理阶级队伍，就会有扩大化的问题，但同志们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要肯定，至于落实政策方面，一个工厂的斗批改要经过很大的工作。《决议》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千万不能对中央、对毛主席的政策加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明明是违反‘九大’，说是维护‘九大’，明明是违反政策，说是执行政策，到市革委会去夺权，明明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说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是歪曲，这是欺骗群众的手段，歪曲‘九大’的手段。必须实事求是。《决议》有一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谁是反动派？曾、刘是不是反动派？不能搞实用主义，不能把毛主席的方针、‘九大’的政策加以歪曲，去欺骗群众。对主席的思想不要歪曲，不要打着骗人的旗号去欺骗群众，结果是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造你的反嘛！”

康生接着指出了武汉那个《决议》中其他几处违反“九大”精神的地方，然后问胡厚民：

“你见过杨保华没有？”

胡厚民回答：“没有。”

康生：“你不是到过青岛吗？”

胡厚民：“那是路过。”

康生：“朱鸿霞同志呢？”

朱鸿霞：“没有。”

康生：“吴焱金同志呢？”

吴焱金：“只是在这次京西宾馆吃饭时见过。”

康生：“李想玉同志呢？”

李想玉：“没有。”

这时，周恩来提到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 3 人署名的大字报：

“武重的那篇东西到处贴，最早的是《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这篇文章是三月份写的，落款你们三个朱、李、吴的名，是哪一个执笔的呀？”

朱鸿霞：“是我写的。”

周恩来：“啊！你们还能写一点东西。到了今年 5 月 7 日，就是三代会给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信，然后就是《决议》，然后就是行动。‘五一’‘五七’进驻，思想发展，游行进驻，夺权，你们把武汉的形势估计得一团漆黑。因为资产阶级夺了权，把你们自己也算在资产阶级里面了，再从资产阶级里面杀出来再夺权。‘720’把陈再道那个‘二月逆流’击退了，毛主席支持你们，‘三钢’、‘三新’，”

曾思玉插话：“还有‘三司革联’。”

周恩来继续：“然后成立了工代会、红代会，你们都是省市革委会的成员，都是战友嘛！现在分成两边，形势估计错了，其它就错了。你们是省市革委会成员，到底站在哪一

边？‘反复旧’到底对不对？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对的，是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如果是资产阶级夺了权，毛主席、林副主席不管吗？不支持你们吗？你们说的‘复旧’是资产阶级夺了权，那‘九大’估计形势不也错了吗？你们对省党代会有点意见，‘九大’前有些意见，‘九大’中间有些变化，‘九大’后有发展，你们在这里搞了两个星期，做了点工作，可能你们没有完全想通。”

曾思玉：“基本想通了。”

周恩来：“基本上想通了，错误难免，这次震动大，汉水流域 10 个县，你们认识了这个错误怎么改呢？你们回击‘二月逆流’，‘三钢’‘三新’有功，你们要紧跟毛主席胜利前进，要立新功！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刚才是哪个还没有讲的？”

接着，武大“三司革联”的谢华之汇报了武汉大学的情况。然后周恩来问“工总”朱鸿霞还有什么要说的？

朱鸿霞说：“这次‘反复旧’运动的错误，主要是我的责任，是我主席著作没学好，引错路，不能怪下面基层头头和群众，他们确实感到有问题，出于对革命负责才搞的，是由我们的错误指导思想引起的，才使他们走到社会上来，因此他们是沒有错误的，错误在我身上，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希望曾、刘首长回去不要压下面头头，不要压他们。”

曾思玉：“不会压他们的，我是革委会主任，我应该负

主要责任。”

朱鸿霞汇报到武汉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曾思玉向中央首长汇报，一直未能及时处理。这时，张体学说：

“报告总理，我有责任，我有几件事没有处理好。”他举了方斌、郭洪斌、吴金全等问题。

方铭：“主要责任在我们警备区。”

周恩来：“对造反派的战友们有缺点，处理要慎重。”

朱鸿霞：“这次造反派 90% 卷进去了，这里给曾、刘、张提点看法：我们很难找到首长，首长相信秘书比相信我们还厉害。我们找首长，秘书就挡了驾。”他说到这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都大笑起来，朱鸿霞继续：“如果曾、刘、张在三、四个月前，能像中央首长这样，听听我们的意见，也许问题不会闹到这种程度。”

刘丰检讨说：“我们工作作风上存在问题。”

康生：“这个经验要注意，要当心，秘书要教育，搞得不好他们会帮倒忙的，你们可要注意。朱鸿霞讲的这点是对的。”

朱鸿霞：“我们希望三代会能参加斗批改指挥部，去一个一个单位的落实政策。我们认为武汉革命群众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发挥得很充分，形势会更好。现在我们好像没有运动初期那样忙。我们‘反复旧’成了一个不好的典型，一定扭过来变成一个好的典型。”

周恩来、康生：“你们也是从山东接过来的嘛！”

接下来，周恩来分别点名让王屏、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讲讲，他们都表示同意朱鸿霞的意见。

第 1088 回：谈问题，听取众代表意见

反复讲，防止斗争扩大化

接着，周恩来问：“还有哪个同志讲讲，钢‘913’有没有人讲？”

钟锡钢站起来发言。当他向张体学提意见时，张体学表示：“武汉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批得好，我一定向谢富治副总理学习，批评我无事。回去以后一定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工代会副主任潘洪斌说：“这次‘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由我们到会的头头负责，不能怪下面的头头和群众。”他希望曾思玉、刘丰回去后不能压下面的头头和群众。他说：

“刚才朱鸿霞同志说他是工代会主任，应由他负主要责任，我也是工代会的副主任，我也要负责。我们‘工造总司’原勤务组彭祖龙同志，在四清后确定家庭出身都没有问题，在厂内一贯表现都很好。曾司令员在高级步校，点了彭祖龙的名，说他网罗牛鬼蛇神搞打、砸、抢，把这个同志在警司关了八个多月，其实他根本没有搞什么打、砸、抢，他是省革委会的委员。”

刘丰：“彭祖龙同志是他自己去警司的，这个同志是好同志，对这个同志的问题，我们军区党委开会，决定通知警司放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放，后来问警司说是怕坏人打他，警司把他保护起来的，对这个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错

误的。这次回去一定解决这个问题。”

随后，邓金福、龙铭鑫又作了发言。

然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讲的？没有了？曾思玉同志讲。”

曾思玉首先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重视，我们内心很不安。‘九大’开幕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怕干扰了‘九大’，没有处理，武汉出现了问题心里很不安，中央在百忙之中，把同志们接到北京来解决武汉问题，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最大鞭策。特别是今天你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我们湖北代表，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千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着他说了湖北武汉的形势，认为“整个形势很好。”“运动是健康的，缺点和错误是前进中的”，他说湖北“从去年九月到现在查出五种人有三万八千多，其中叛徒一万多人，特务四百多人，死不改悔的三十多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二万三千多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六千多人，立案的二千七百二十人，基本定案的八千多人，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他认为：“监护的多了，有七千人，群众监护，现在还有三千多，有的女的监护男的很方便。”

周恩来：“那实际就是专政，为什么要女的监护男的呢？计委有两个女同志监护一个男的，结果男的跳楼自杀，女的

拉也拉不住。”

康生问：“有没有搞逼供信？”

大家说：“有。”

康生：“这个问题要注意。”

王锦铭举了许多逼供信的实例，如：汉阳钢厂 120 多人批斗一半以上。武汉剃刀厂一群众组织头头、厂革委会主任被批斗，还被 30 多斤的铁板打成脑震荡。二七食杂公司一造反派头头，共产党员，被逼跳江自杀。汉阳炼钢厂原团支书，被逼供成现行反革命。汉阳钢厂张百发，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被批斗 200 多次。

曾思玉继续说：“解放干部问题上也存在着问题，湖北省局长以上干部 5054 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站错了队，现在解放 3707 人，其中参加三结合或工作的 2392 人，除了要打倒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外，百分之六十已解放，现在干部还不大胆，我们很棘手，推到第一线是解放军，干部有顾虑，感觉到这些问题很棘手。”

周恩来：“你们选进的三个委员要帮助他们，主席谈了不要一年就垮了。”

“三个委员”是指“九大”湖北选进来的三个群众造反派的中央委员。

曾思玉汇报后，方铭和张体学分别发言，表示了态度。随后，陈伯达和康生讲话。

康生特别提醒说：“这次‘反反复旧’错误回去以后，……不能怪下面的群众。我看曾思玉、刘丰同志回去以后，要很好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央讲话，我的讲话中，讲得尖锐些，是强调一下要同志们体会认识哪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提高头头们的认识，我的讲话，我看不必全面传达。”

“如果我们在纠正错误的时候去压群众，那岂不是同样把人民内部矛盾的东西用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吗？”

“你们不能把中央首长对你们的讲话，也完全对群众讲，你们不是说了，责任在你们，不要把中央的讲话拿到群众中去讲，因为不是他们的过错。”

“林副主席讲了，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我们自己的思想上要经常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造反派要经常想这个问题，要做革命的对象。不要满足，自我捧场，不要自我膨胀，像毛主席批评蒯大富、韩爱晶，说他们自己膨胀，害了浮肿病，你们听到没有？你们千万要注意，所以不要说有丰功伟绩，唯我独尊，大家共同注意。特别是你们还有点功劳。过去你是一个组织的当权派，现在是一个省市革委会的当权派。中国不是有句俗语？‘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曾、刘要注意，同志们一样也要注意。”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清理阶级队伍，必要性不讲了。同志们知道。造反派同志要注意，要警惕。我是不是可以检

查？应当。因为你是造反派嘛！你是当权派嘛！要清理阶级队伍嘛！阶级关系，出身要搞清楚，我们不但要检查人家的，我们还要让人家检查，我们有什么问题，人家了解一下，有什么不行呢？我们还应主动给人家讲。清理阶级队伍，大家检查一下自己是完全应该的。另外，因为我们是一起造反的战友，如果有什么历史问题，清理阶级队伍，有什么要检查就检查。如果检查你，抱什么态度？杨保华的报告中错在什么地方？一个余金瑞，是一个干部，他的祖父、父亲均是反革命，他是造反比较早的，和王效禹一起的。整党、建党时碰到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入党？革委会大多数是不同意的，当时杨保华还拿不定。王效禹平批评了他，说我可以介绍，批评杨保华对造反派没有感情，说可以入党。杨保华一转变，说复旧了，就反复旧。报告传到兰州去也是这样，工代会二号头头，造反最早的，清理阶级队伍并没有清到他，清到他的老战友，老战友就在他面前诉苦，于是社会上就发了呼吁书，也冲了革委会也是说反复旧。对造反派要有阶级分析，不管你造反早，造反晚，不是看早晚，主要看他执不执行毛主席路线。造反派之间，也是发生变化的，王、关、戚不也是造反派吗？王力他还同总理到武汉去过。回来时到机场还欢迎他，运动一深入就发生了变化了。杨、余、傅，余立金不也到过武汉吗？不要以为是战友，后来不是发生了变化吗？”

周恩来：“与他共事 30 多年，你们才 3 年，3 年就怎么知道没混进坏人。”

康生：“上海暴动时的区委书记，就剩下我一个人，大多数牺牲了，也有叛变了。我与陈毅是老战友，我在沪中作区委书记，他是支部委员，现在变成机会主义，反毛主席。”

黄永胜：“邓华浦东我们一起打仗，最危险的时候都在一起，后来，他还是跟彭德怀走。”

康生：“清理阶级队伍本身是需要的。至于专案组的人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清理阶级队伍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但对出现的错误要正确处理。同志们讲整了造反派的头头。比如说胡厚民同志的母亲是一个渔霸，他母亲根本没有打鱼，怎么会是渔霸呢？你们只是提了对造反派头头扩大化，我看不光是造反派头头，要关心整个群众。张立国同志说：‘清理阶级队伍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些单位有扩大化。’我很注意这一点，清理阶级队伍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搞逼、供、信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一个特务，越是不老实就越打，打了阶级敌人，好像问题不大，结果一传播，就好人也打。要你们去搞清理阶级队伍，也会犯错误，讲起来容易，做难。要经常总结经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不那么好分。还有一个问题，过去你们在一个工厂里，在一个学校里你们是头头，你们说了算，现在工厂进了军宣队，学校进了工宣队，不管关系怎么好，总没有

过去那么便当，中央党校就有这个问题，一部分权军宣队拿了，或者学校里面一部分权工宣队拿了，这两方面要注意啰！不那么调和，甚至军宣队有错误，会经常发生矛盾。

总而言之，大家在这里表现很好，今天会开的很好，回去以后要军民团结，干部中的老少团结，老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老年人看青年人那么爱提意见，青年人说老年人两面三刀，老的说年青的搞派性。要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们。北京六厂一校都有班、排、连，一选就选掉了。你们国棉一厂就是这样一选不就选掉了，王屏就空啰！具体来说，回去以后，新老干部团结，军民团结，广大群众的团结，老造反与迟造反的团结，有功与有一般功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我有这么一个信心，团结的条件很多。中央的教育，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接见你们，武汉‘反复旧’成为一个不大好的典型。这次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典型。我和富治从上海、青岛走了一趟，武汉最好。我有这个信心，希望同志们团结，取得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让谢富治讲一讲。其他领导调侃说：“你是湖北佬嘛，怎么不讲讲。”

谢富治：“完全同意总理、伯达、康老讲话。只要按主席在‘九大’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去办，武汉一定会把工作做得好的。”

他讲完后，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讲一讲，湖北佬嘛，他是咸宁高桥人。”

黄永胜讲完话。周恩来让叶群讲讲。康生笑着说：“你是半个湖北人，不讲还行？”

众人大笑：“欢迎叶群同志讲。”

叶群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刚才几位老首长要我讲，我从组织上服从，我简单讲两句。我完全拥护康老、伯达、富治、永胜的讲话，等一下总理、作鹏同志还要给大家作很好的讲话，我都完全拥护。”

她说：“对几个负责同志要有个基本信任，有些问题你们不知道，可以给你们讲讲：曾思玉是从沈阳调去的。他在沈阳是与宋任穷作斗争很坚决的，与陈锡联团结的很好的，甚至受了宋任穷很多迫害的。他有年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看到叛徒马明方，他气得坐立不安，连忙报告中央，说：马明方为什么不回去？还在食堂吃饭。怎么说这样一个同志一到武汉就镇压造反派了呢？正如主席说的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嘛，这个同志大节是好的。刘丰同志是‘720’保卫毛主席的，当时‘720’主席在武汉，林彪同志对主席安全很关心，叫我们打电话给刘丰同志，要保卫主席，就是誓死也要保卫，这是立功的好机会。我和吴法宪同志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当时还不知道王力是坏人，把他千方百计从树林找到了，救了出来，最后对主席也是很好地保卫了嘛。

张体学是个老同志，犯了错误是一个转变较快的，改正错误是个标兵，以前给党做过很多工作的。方铭同志也是在‘720’保卫毛主席的，还有李化民、张昭剑同志，我接触很少，李化民原是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张昭剑‘720’也保卫过毛主席，原在一军做过很多工作的。”

最后，周恩来让李作鹏也讲一讲。

李作鹏发言后，周恩来说：“已经东方红了，我没有多少讲的，我们虽然只接见了两次，一头一尾会还是开得好的，你们在这里等于参加了‘九大’传达会。来了近 20 多天嘛！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见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省、市两级都来了，有军队的，干部只张体学同志一个，群众代表来这么多，一共 34 个人。把毛主席讲话、林副主席讲话，都传达给你们了。开始学不进去，后来慢慢联系实际，‘九大’就是要联系实际嘛！你们闯了一个乱子，也会变成好事。扩大就会影响几个省，传出去就更大。传入你们那里就有能量传出去。因为‘钢’、‘新’有摩擦，现在‘钢’、‘新’团结，个别的观点不一致外，大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我们找‘三新’代表谈了，他们也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责任。有两个‘新华工’的，有两个‘新湖大’的，有一个‘新华农’的。我们和你们一道把武汉的走资派王任重打倒了，后来又把陈再道那几个也打倒了。你们来，我们先叫胡厚民发言，他们有准备，这就打乱了你们的阵脚。杨道远

准备的长，把他放在最后发言，没讲完。我们是会打仗的，这个仗，不是敌我，完全是人民内部。你们采取的步骤我们晓得，我们采取的步骤是帮助你们的。

我是很激动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去武汉，都在那里参加了战斗。‘720’你们不知道，邱会作、李作鹏都去了。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说服你们，伯达同志与你们接触很少，他第一次见到你们就有个印象：他们是能够说服的。结果事实证明，可以说服。至于今后还会不会犯错误，还会犯错误的。我们也犯过错误，只要跟主席就会前进。错误性质伯达、康老等同志都讲了，我都同意。刚才几个同志的讲话，我都同意。江青同志、吴法宪同志、邱会作同志，他们请了假，我想他们也会同意的，今天你们的讲话，从曾、刘、张、方几位领导同志，以及你们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女同志都讲得很好嘛！都作了自我批评。错误性质严重，就是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我们嘱咐你们，没有乱打电话，你们按那样办了。回去靠你们作工作，你们要把他作为经验教训。四个省，四个省的问题不一样。你们三结合是可以做好的。作为你们革命造反派是想把自己锻炼成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解放军也是要锻炼的，才能把各项规律抓到。”

曾思玉：“丁家显回来了，他说他到云南是充军。”

周恩来：“你们说服他，归口闹革命那不是充军，那是

分配。蒯大富不是分到宁夏甘肃交界的一个地方，搞的不错嘛！新华社最近有个报道，谭厚兰也下农村了，这是北京五大领袖嘛，聂元梓因为是教员，所以现在还在学校。”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问题上，稳、准、狠主要是准字，要稳偏低了，要狠‘空’了，武汉有苗头扩大化了一点。主席早就讲了，清理阶级队伍，容易掩盖另外一种苗头，扩大化。你们刚才说逼、供、信都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恨敌人，但不掌握准字不行。你们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你们去抓点，主席讲：你们不要一个人一个点，不然不好商量，起码要两三个人一个点，几个人一个点，几个老同志两三个人一个点。你们回去搞三结合蹲点，自己厂里还有劳动，半年在厂，半年在外，或者一个厂、一个公社、一个学校。特别注意清理阶级队伍，要老少互相尊重，新老互相尊重，唯我独左，唯我独尊不对，但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对的，军民合作、新老合作，老的老一点，你们也要不了几年就老了，你们要有伟大气魄，王屏你们这个厂造反派九百多人，还有二千人不是，你们经过了几次反复，一次是钢、新斗，这一次‘反复旧’，就可以看出人家的态度，要允许人家犯错误，改正错误。”

“你们这次反面经验对你们有好处，正面教育，反面教育，对你们都有好处，不然你们会膨胀。北京五大领袖是膨胀了。主席一次给他们谈了五个小时，这是给我们都没有的，

一次五个小时，结果他们还各取所需，硬要栽一个跟头，不要看人家错误那么多，现在反过来看看自己。我为什么批评张体学同志厉害一些呢？他说话有时是有些走火，我一听那些话，就知道是他的口味，是他说的，我相信他能改。”

康生看着曾思玉、刘丰刚送上去的一份材料说：“水电一个学生回来在民族学院作报告，说张体学你当了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说张体学是黑干将，曾、刘是黑后台。”

康生和大家都笑了。材料中说的那个水电学院的学生是丁家显。

周恩来：“你们现在笑，刚出来时，还可能说是打中要害，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风一吹就回来‘反复旧’，长江水总有点泥沙，那么清？我看武汉就没有清水，长江水总要夹着泥沙，形成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造反派的气魄是大一点，不能说里面没有一个坏人，共产党清除了那么多，难道造反派就没有？要把各种力量团结起来，连过去站错队的人吸取了教训，就会和你们一道前进。回去要用统一的口径传达，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在毛主席的旗下写几条，怎么传达，结束吧！我们能够起一点作用就是。”

接见结束时，已经是5月20日清晨7时55分了。

第 1089 回：小总政，内蒙平反“内人党”

五二六，中央接见“徐海班”

1969 年 5 月 20 日，中央决定，增补济南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山东革委会副主任。

5 月 21 日晚，内蒙古的滕海清一行没有向中央正式辞别，登上北去的列车，返回呼和浩特。临行前，滕海清亲笔写了一份检查，托周恩来的秘书转交周恩来本人。在检查中，滕海清承认“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此时此刻，几位内蒙古领导人的心情彼此迥然不同。

高锦明被无端打倒，险些断送政治性命，现在由中央亲自予以平反，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自然会感到扬眉吐气。

相反，滕海清却挨了当头一棒。此前，他一直有康生撑腰打气。可是忽然，康生似乎又把责任都推到他一人身上，滕海清心里很不痛快。况且，对内蒙古挖“内人党”中的错误，他也一直认为只是运动的支流，思想上一直没通，甚至在周恩来、康生面前，都不掩饰自己的抵触情绪，认错表态完全是迫不得已的。

吴涛、权星垣对“挖肃”扩大化问题早有看法，只是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受制于滕海清，随声附和。现在，内蒙古问题由中央一锤定音，明朗化了，尽管错误也有他们一份，但他们内心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列车飞驶，发出有节奏的震动声。满腹委屈的滕海清闷

坐在车厢里，谁也不搭理，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一动不动。

高锦明、吴涛、权星垣、肖应棠等人则来到餐车车厢。5月下旬，天气闷热。他们要了几瓶啤酒，边吃边聊。

不想，这些琐事被‘滕办’的秘书看在眼里，告到中央，后来竟成了高锦明的一条罪状。康生日后在北京就曾训斥高锦明说：“你们还庆祝胜利？！”

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达集宁，停车加水。这时，周恩来的专线电话从北京直接打到了集宁火车站站长办公室，要和滕海清等人讲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们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不打个招呼？”接着，周恩来同内蒙古几个领导人一一通话，责备滕海清说：“告诉你不要写犯了路线错误，检查里怎么还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不要按这个检查！”然后，又再次叮嘱他们一定要搞好团结，稳定内蒙古局势。

放下电话，滕海清等人继续登车西行，几小时后便回到了呼和浩特。

5月22日，中央关于内蒙古问题的中发(69)24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在中央批示之后，是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的《意见》全文。最后，还附有滕海清、吴涛、李树德3人4月19日的检查全文。

滕海清等6人的《意见》明确指出：“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

查外，其余立即释放。”

5月22日傍晚，内蒙古财贸干校，主席台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吴涛的声音：“下面，传达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照办。”

接下来，吴涛一字一句念了中央批示全文。之后，他又念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几点意见》全文。

会场沸腾了！

受尽冤屈、九死一生的人们泪水滂沱，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吴涛传达之后，滕海清讲话。他先宣读了4月19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向中央所做的检查。一口气读完后，说：“这就是我们三个同志的检查。我的检查要单独来检查。这实际上是吴涛、李树德同志给我承担责任啰。他们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主要是我来负责。”

滕海清讲话的时候，听众反应冷淡。

接着，高锦明做了简短的发言，台下则报以热烈的掌声。

宣布散会时，劫后余生的人们，互致问候，彼此打听亲友熟人的消息。后来，内蒙古干部群众将中发(69)24号文件称之为“中央5·22指示”。

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

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5月24日晨2时23分，吴法宪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向湖北省的曾思玉、刘丰、方铭、张体学、赵福新、夏邦银、董明惠等人传达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对这次在京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代表所写的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纪要》的指示。他说：

“你们哪个湖北同志们传达一下。你们写了《纪要》，中央首长总理、伯达、康生、永胜、叶群、作鹏和我都看了。有些意见，总理要我传达一下。请你们赶紧修改好，中央审查后加批语。我们现在正在解决四个省的问题，山东、贵州、内蒙都比你们写得好。你们写的差一些。文字太长，不集中。针对性不强，写的问题很多，但实际问题写得不多，不能解决问题。引用主席指示不准确。文章不尖锐，针对性不强，眉目不清，纪要缺点最重要的是两点，一点是‘反复旧’是错误的。因为它的矛头对准的是新生的革委会、党的‘九大’。

‘九大’精神是要落实政策要团结，因此‘反复旧’是错误的，山东杨保华的报告是错误的。第二点，三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破坏了一元化的领导，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红色政

权，三代会不能凌驾之上。”

他说：“《纪要》要按‘九大’精神写，‘九大’的精神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要巩固胜利，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央首长批评的话要写进去，才能稳定湖北的局势。否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革委会的成绩不要写得太长，缺点也要写一些。”“这是中央的意见，希望你们好好修改。这是你们集体写文件，中央加批语。你们回去要按‘九大’精神写，违背‘九大’精神不行，写得太一般化没有必要。同时时间很紧。向同志们传达这些，中央首长对湖北批评我没有参加，大的方面我知道，具体情况我不很了解。我们飞机都派好了，把你们送回去。”

于是，湖北代表就在这个会议室里，由夏邦银、方铭传达了中央首长对《纪要》的指示。

5月25日，中央批复山东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5月24日给中央的报告，并以中发1969年第26号文件，于5月27日印发山东地方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并转发全党全军。中央批复：“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并在肯定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后指出：“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希望他们“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

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当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联名给毛泽东、林彪送交关于山东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到：王效禹作了检讨，“平时为王所倚重的人均已起来揭发，故山东问题正在趋向好转”。

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 5 月 24 日给中央的报告在肯定山东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省错误地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料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十条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拥军活动；不要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不能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来“站队”；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撤消“文攻武卫”组织；“三代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要促进徐海地区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涉。

5 月 26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主持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周恩来、林彪、康生、陈伯达参加，汪东兴列席会议做记录。

毛泽东批评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他还对专案工作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会议决定：重新组建军委办公厅和一个小规模的总政治部；由省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落实城市防空工作；不再增加陆军定额，把定额留着扩建海军、空军和二炮；同意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移交军队管辖。会议还讨论了组织地方部队、野战军调防、一批军队高级干部调动任免以及大学生毕业分配、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等问题。

5月26日夜23时32分至27日凌晨2时36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温玉成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徐海班和徐州铁路、煤炭、电业班全体人员。陪同接见的还有：杨得志、王效禹、袁升平、李水清、余秋里以及其他有关负责人。

周恩来说：“徐海学习班，是我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早的一个学习班。不但包括徐州，连云港的各方面

的同志，还有铁路上的，煤炭方面的，电业方面的同志。我们在‘九大’以后，正在谈山东问题。当然也就联系到徐海问题。现在山东问题谈的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也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济南军区的同志，还有‘九大’的一部分山东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现在，我们先请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聂济峰同志，把这个学习班的情况简单地说明一下。”

聂济峰说：“今天到会的 2010 人，徐海班的到了 1221 人，铁路班的到了 238 人，煤炭班到了 409 人，电业班到了 142 人。最近学习班不请假跑回徐州去一些同志，截止今天，一共还有三十几位同志没有回来，回来了 79 位。另外这一次连云港没有来，他们主要是‘反到底’的同志。原来一些老学员 45 个人回去没有来，另外新学员 35 名没有来，就是 80 名没有来。加上跑回去的 119 位同志没有到。”

周恩来：“刚才聂济峰同志说，我们这个学习班办的时间很长，是从去年开始，现在已经是 1969 年 5 月 26 号了，快到 27 号了，差一刻钟。这样长时间的学习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然首先我们要自我批评啰，中央抓的不紧。但这个学习班情况也确实复杂。举一个例子来说，‘九大’开完了，胜利闭幕以后，在九届一中全会没有开会的前一天，忽然徐海班刮了阵歪风，是逃跑风吧，逃风。有一些头头不想在这里呆了，说非要去较量去了。‘九大’以后还要较

量，两派都有。一直连续跑到 5 月 18 号。20 天，逃回去 100 多人，19 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你们都参加了。”

其他领导插话：“徐海汇报团的部分同志没有参加。”

周恩来：“这样一个好消息传回去，我们相信回去的人应该知道，我们要解决这个学习班的问题啰。所以就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和 68 军军长张铚秀同志他们 3 位同志打电报回去，请回去的同志，就是跑回去的同志回来。因为跑回去的同志有 165 位同志。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全部回来。还是有人说，他们三位代表中央发的电报都不能信。那还有什么可信的呢？这就说明问题复杂啊。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现在先由徐州的、山东的、然后再由中央的几个负责同志讲一点话，然后我们再提出解决徐海班的问题。”

接着，张铚秀讲话。他首先对徐海的问题做了检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他说：“1967 年 3 月 18 日成立革委会后，由于对革委会等认识的分歧，徐州市形成了‘踢’、‘支’两派，我们又没有正确对待，而倾向了‘支’派，打跑了‘踢’派；7 月以后又在检查纠正前段错误中，又倒向‘踢’派一边，打跑了‘支’派。”

对徐海目前的状况，张铚秀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由于我们领导上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存有打官司，争输赢思想

情绪，所以在今年1月11日总理接见军队干部前很长一段时间，觉悟很慢，支左态度没有端正，部队思想没有统一，致使中央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实，还曾发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对军区领导不够信任，不够尊重，一段时间请示报告不够，有些指示没有认真执行，还曾出现一些公开‘打倒王效禹’同志的错误口号，所有这些，都是很错误的。我再诚恳地向中央首长作检查，请首长给与批评。”“徐海地区的革命和生产都处于落后状态，成了全国一个老大难单位。……问题在我们军的领导，责任主要在我，不怪济南军区领导，不怪兄弟部队，也不怪我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更不怪广大的革命群众。”

他说：“现在新沂、睢宁、东海、邳县，在中央首长接见后，很快要回去成立革命委员会。徐州地专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后，步子迈得很大，决心最近几天把徐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希望其他县、市都要向他们学习，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认真学习‘九大’文献，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争取胜利。徐州市要按照总理改组革委会指示的原则，很快把革命委员会问题解决好，最近有些地方形势很不好，抢枪、搞武斗，我们希望各市、县革命群众组织，把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集中封存，立即无条件交还部队，其他武斗凶器也必须上交，在采取紧急措施，坚决停止武斗。”

随后，王效禹做了检讨。他说：“今天我是来向全体同志作检讨的。刚才张铚秀同志讲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首先由我负责，是我犯错误造成的。我在处理徐海地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直到现在还没有联合好。也给部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我的错误就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之后，仍然错误的支持一派。”

“刚才张铚秀同志讲话的时候，说在徐海学习班上 提打倒我的口号，我今天向同志们表示：我犯了错误，同志们打倒应该，我和同志们站在一边，打倒我的错误以后，和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因此我感谢同志们。”

接着，杨得志也做了检讨：“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做检讨，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理解，对徐海地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上，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犯了很多错误，给徐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以至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问题。我们感到非常惭愧，非常痛心。检查起来，我们在运动初期，解散了‘红总’总部，在部队的两个学校，一个医院中抓了 26 个人，打击、压制了群众

的革命运动。以后对待踢派和支派这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又没有掌握端平的原则，特别在毛主席视察六省市发表最新指示以后，批准了对连云港问题的七条错误的决定，错误就更严重了。”

最后是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对他 1968 年 11 月 17 日那份“反复旧”讲话做了检讨。

在王效禹、杨得志、杨保华三人检讨后，黄永胜讲话。他毫不客气的说：“从我们办的这么多省的学习班来说，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同志们，你们徐海班是表现最差的一个学习班。”“从徐海地区的形势来看，同全国的大好形势比较来说，你们是落后了的。”

“你们到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已经十个多月了，你们觉悟是很慢的。”“学习班开学以来，你们徐州两派先后跑回去 200 多人次。仅‘踢派’就跑回去 160 多人次。有的人先后跑回去了 8 次。连云港‘反到底’跑走了 45 人。”“他这个连云港‘反到底’代表团，在头头王长发的带领下，跑回连云港达半年之久，经中央多次督促，至今不回来。”“‘踢派’头头徐锋带头跑，跑了 68 人。‘支派’的孟宪臣带头跑，跑了 30 人。徐锋在学习班先后跑回去四次。每当学习班形势好转，你们就跑，你们这样做，你们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学习班形势一好，你们就跑呢？你们要跑回去干什么呢？5 月 19 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徐海班全体

学员后，广大群众都欢欣鼓舞，正当热烈庆祝这一亲切接见的时候，你‘踢派’的什么陆继坤，这个同志现在在不在我們不知道，就不参加庆祝会，跑到前门外去喝酒，搞非法串联，最后也跑了。你们这样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呢？”

“徐海地区抢枪武斗的歪风一直没有停止。特别严重的是大规模地抢枪、武斗都发生在关键的时刻。比如去年11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你们大抢枪。有的头头带头抢，中央下命令要把武器交上来，你们迟迟不交，交叉不彻底。这次‘九大’以后，连云港两派都大抢枪，甚至于把戒备仓库的枪你们都抢了，4月29日，也是我们九届一中全会刚刚闭幕，徐州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但是你们‘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却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

“你们这样不是明目张胆地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对抗吗？中央是信任68军，也是支持68军的。但是68军在三支两军工作当中有缺点，有错误，中央要求他们改正错误，也相信他们能够改正错误的，并且正在改正。但是你们不是热情地帮助，而总是把矛头指向68军。”

“目前徐海班、徐州两派还在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争核心，争资产阶级派性的权。中央明确地指示，徐州革命委员

会要以现有革委会为基础，按着平等的原则，充分协商，进行改组。你们各取所需，歪曲中央的精神，‘支派’抓‘改组’，‘踢派’抓‘承认’。你们这样完全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而有些东西完全和中央唱对台戏。”

然后李作鹏讲话。之后，周恩来做总结发言。他说：“同志们，今天请你们来上一课。”

“九大刚开过了以后，4月14号闭幕，当天晚上就报喜了。可是，你们没等4月28日的九届一中全会开会的消息，就从4月26日起，就有这么一股歪风，说是‘九大’开了以后，各省都要回去较量一番。因此，两派的头头都整理行装，不告而走。逃的逃，跑的跑。”

“还有一个怪现象。本来打破头的，不在一起开会的，可是跑的时候互相支援，甚至互相送车票。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不是等于说，你们演的这出戏是反对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吗？所以不怪刚才康老那样的严厉严词来责备你们，这是有道理的。黄永胜同志那样地苦口婆心、义正词严地说服你们，是有道理的。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陈伯达同志也很鼓励你们，这也是有根据的。情况是复杂的，但是我们首先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一天天的迈步前进了，跟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而你们呢，不是向前，而是后退的。全世界称赞我们这个划时代的‘九大’开过，

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可是你们呢，要回去打架，要较量一番给中央看。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思想，什么动机？”

“你们说山东是一派掌权，你们就可以得到山东的支援。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对方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要么就过去‘支派’掌权，要么后来‘踢派’掌权。现在劝你们联合，口头上是同意了，文字上达成协议了，可心里头，思想上没有通，还是想一派掌权。现在你的话没有了吧？山东的声音你们这次听到了，你们要见的几位同志都在场，这总不是假的吧？不是中央造谣吧？电报不是假的吧？”

“这次请王效禹同志、杨得志同志、张铚秀同志给跑回去的同志打电报，有一部分回来了，还有一部分说什么话？说这次电报等级太差了，不来，要中央直接发电报。那么，中央委托两个中央委员、一位军长传达中央的声音还不行呀？这是借口！就是后头有人扯腿，不让他来。总之，造成一些幻想，造出一些奇怪的消息。”

“你们现在看，王效禹同志检讨了嘛，支持一派不对嘛，杨保华同志说得很沉痛，而且很诚恳，‘反复旧’是错了的，他要把这个版权收回。他承认了错误，要拿他那篇文章做反面教材，你们亲自听说了。这是一位山东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说这样的话是很光明磊落的，错了就错了，承认起来改了就好。”

第 1090 回：下《通知》，公布军委办事组 发文件，中央见湖北代表

5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5月27日，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当天晚上23时30分，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的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赵福新、李化民、方铭、张昭剑、朱鸿霞、杨道远、张立国、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夏邦银、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王屏、杨玉珍、龙铭鑫、谢华之、胡崇元、沈复礼、李洪荣、张跃忠、曹培贤、龙克发、王锦铭、郭保安、张维荣、雪湘铭、董明会、谢望春、王步青、刘海江。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527指示”。

“527指示”转发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说：“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

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运动性质被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周恩来在传达完“527指示”后说：“不要把我们大家的意见说是指示，作为意见用你们的理解去说服群众。中共中央文件是要执行的，我们的意见是可以斟酌的，否则任何一个意见都执行，那怎么行！”

他回顾了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说：“三代会也是三结合的一部分，不能架于革委会之上，更不能架于共产党之上。”“现在查出，确实有坏人，阶级敌人跳出来了，这也是好事，这就不同于群众，不同于你们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啰，他们要为他们翻案，坏人跳出来是好事。26日消息，他们要给有些人翻案。”“‘决派’写的《工人阶级现在需要什么》为‘决派’翻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鲁礼安翻案。鲁礼安是哪里的？”

张立国、郭保安：“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他父亲、母亲都是国民党员。”

周恩来：“啊，是学生！《扬子江评论》报共收了四份，还为鲁礼安、冯天艾翻案，冯天艾是哪里的呀？”

张立国、郭保安：“是我们学校四年级学生。”

周恩来：“呵，也是新华工的学生，《扬子江评论》是反动思潮，属于‘省无联’类，他们批评工代会在‘反复旧’

中有右倾思想。你们‘左’了，他们说你们有右倾思想。”“他们还说：你们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会谈的结果。我们这是会谈吗？是国共谈判？到底谁是国民党？过去有些反动的说是‘国共会谈’，一种说法是‘延安’‘西安’的问题，他说，不要妥协，不要只局限于打倒张体学。那就不光是打倒张体学，他们还要打倒一批。除《扬子江评论》外，还搞另外一个刊物《百舸争流》。在浠水搞了个‘巴河一司’。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仁舟翻案，还有长航分公司为日伪汉奸胡体安翻案。公开跳出来对军代表说：‘你们弄得我家破人亡’。另外，社会上渣滓，从4月17日发生了凶杀案14起，杀死6人。还有已经解放的干部重新揪斗。还有一些工厂，基层革委会被重新影响夺权。革委会有些变化，可以重新商量。因为革委会不可能一下子健全。除非一派的革委会，要联合另一方面，如‘二七’厂，第一次成立的革委会推翻，二次搞了两个，最后一次成立了。后台王锋揪出来了，这个人还相当厉害，接见解决问题他不来。王锋做徐凯、李与鹏的后台，做两派革委会的主任，这个家伙专门在后面搞坏事。”

“现在生产有些问题，武钢生产受影响，江岸车子总在那里出问题，”“希望大家好好做工作。”

“大家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四个星期了，我们见了几次？”“对，四次。康老谈谈，四个省，你们是最后一个。”

康生：“看了武汉一些‘反复旧’文件，使我想很多，

有一个问题，希望同志们研究一下，关于共产党问题，党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在‘反复旧’文件中间突出出来，有些文件好像是工代会要驾于共产党之上，同志们要严肃注意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关系到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通过共产党，工人阶级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真正负担起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任务，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有觉悟的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领导不好，镇压群众，有的当了走资派，因此产生了些错误的看法，好像没有共产党也可以。他们在脑子中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混淆，这一点，武汉‘反复旧’有这么一种苗头，这种苗头想同同志们谈一谈。”

接着，康生告诉大家：“领导群众革命，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怎么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他说：“我们加入共产党什么时候发过工资？”“同我们一道革命的多少人死了，我们是幸存者，是偶然活着的，我常想 27 年一个上海暴动，上海七个区，江苏省委死掉多少同志，现在剩下两个总理，再一个是我，我们也是偶然活着的，我们觉悟也不高啰！但当时在党的教育下并没有想到能看到中国人民解放，”

周恩来：“的确没有想到，我们是幸存者。”

康生：“只想给后来人作铺路。工人同志也要不断改造思想。我记得延安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传达主席的整风报告，有这么一段话，工人他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要不断改造自己，当时有一个叫罗少华，”

叶群：“此人在东北死了。”

康生：“他说我侮辱了工人阶级，他也是工人阶级啰！”

叶群：“他是二十八个半的。”

康生：“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走到什么路上去呢？我们看到欧洲许多工人阶级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就因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成行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工团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经济主义。武汉文件有这个苗头。同志们在学校里读过斯大林布尔什维克是一条，第一条就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唯一领导。因为欧洲国会、工会可以凌驾于党之上，所以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组织。”“工代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把红色政权看成不是自己的。”“你们现在有了政权又夺权，不是极左？！”“河南在你们两句话上发展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接管者被接管’。问题出现后，纪登奎同志及时作了工作解决了，这次面积还不小，河南东边同山东相同，南边同武汉相同。”

“另外一方面，有了政权，还站在政权之外，夺权不容

易，使用更不容易，其实是觉悟不高。”

周恩来：“夺权容易，掌权不易，不‘三结合’，不在共产党领导下怎么掌权？去年法国五月风暴，欧洲大罢工，由于缺乏共产党领导，没有成功。要区别走资派和共产党的领导，大家知道，我们造走资派的反，不能造共产党的反嘛！”

康生：“你们要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总结经验，看看三年中哪些是做对了，哪点做错了，各地方、工厂、学校、机关都要进行这样的工作。革命青年有做的好的地方，还有缺点的地方。你们不是参观了清华吗？去年7月27日向工人开枪，这个经验对你们学校、工厂是很宝贵的经验，清华不是造反很早吗？第一个反对刘少奇、王光美嘛！为什么‘727’向工人开枪打死五个人？”

周恩来：“这个问题要很好想想。”

康生：“同志们想一想，一个造反早的学校，蒯大富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当然现在有进步。毛主席的号召发动的工宣队，他们却在那里抓‘黑手’，毛主席说：‘黑手’就是我，你们抓吧！”

周恩来：“他们还不是造反派？你们有的到北京还拜访蒯司令。”

康生：“7·28晨毛主席和五大领袖从3点半谈到8点半，谈了五个钟头。”

周恩来：“那么大的高龄，那么大的耐心，那么伟大的

胸怀。你们问永胜、曾思玉，我们几十年跟主席，从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谈过一次 5 小时，当然加起来不止 5 小时。”

康生：“先四个领袖，聂元梓、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来了，主席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脱离了工人，脱离了贫下中农，脱离了战士，就连自己那派群众也脱离了。开始蒯大富没去，蒯为什么未去？跑到体育学院动员反攻，搞战略部署去了，主席一方面爱护他们，一方面严厉地批评他们，感动没有？没有！还是去‘杀牛宰猴’的，主席对聂元梓讲，不要杀牛。主席说：9000 多人的大学，就赶走了 900。”

周恩来：“派 8341 部队去，他们主席的书不读，语录不读，韩爱晶连语录都不带。”

谢富治：“有三个要入党的，连党章都不看，三个人联名写了一份申请书。”

周恩来：“一旦当了小领袖，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康生：“他们不知从哪里学的一些两面派的手法。”

周恩来：“不知你们发觉没有，北航出了个东西完全是讲权术。”

周恩来在这里讲的北航出的东西，是 1967 年 3、4 月份在北京流传的一个小册子，专讲政治权术的。小册子署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可是当时北航“红旗”的几个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

康生接着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从走资派、旧习惯那里学来的，完全是权术。批判刘少奇，清华首先开始的，有一次开会碰到蒯大富，说你们清华要狠狠批判刘少奇，党校组织有些材料，你们去找‘红旗’接洽一下。当时党校也有两个组织。一个‘红战团’，一个‘红旗’。‘红旗’支持我，‘红战团’反对我的，我当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蒯是支持‘红战团’的，蒯大富找‘红战团’要打倒我，说我转移目标，要打倒我，我诚心帮助他，他要两面派，一个23岁的青年怎么搞两面手法？我们革委会的同志千万不要言行不一，两面手法。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是刘少奇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用的，是反革命用的，我们工人阶级不要这一套。

有人问：‘反复旧’在理论上有什么大错误？错在那里，文件已经批出来啰！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理论上讲得通吗？刚才总理念那个文件就说明，‘反复旧’最后结果是真复旧，它否定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坏家伙又重新跳出来那必然走到真复旧，逐渐看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了。你们回去，同在北京不同，这里是人大会堂中央接见你们啰！住在京西宾馆，也没谁向你们宣传‘反复旧’，但一回去，你们的战友肯定要给你们很多材料，还会说你们修了，右了。一到当地环境，又会激动起来，啊！北京可右了，可能又转过去了。

最后讲一点，领导上有缺点，很好的同志没有帮助他参加党，转正的没转正，可入党的没入，当然整党建党的工作在武汉刚开始，还没有吐故纳新，故有，纳新不够，另外，同志们自己要努力，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当然要自愿，不能拉夫，把入党作为手段也不行。在毛主席领导下能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好的，拿自己要努力，领导要注意，大多数同志是愿意的吧！我就讲这一点。”

陈伯达表示同意周恩来、康生的讲话。他说：“我们‘反复旧’的结果帮助了敌人，搞翻案。”

周恩来：“领导会把你们和他们分开的。文件上原来写的‘这样做是错误的’，后来改成‘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教导的’，我把‘是错误的’划了，给你们减轻了，怕别人抓住你们，又一压，引起新的反复，有好多地方都减轻了，我想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会这样做的。”

康生：“还有一个问题，解放的干部又被斗了，解放的干部是我们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成绩，好像连这个成绩也否定了。张体学同志的解放这是武汉的一个成果，把一个犯错误的改过来了，这不容易呀！要想把他改得那么理想不可能，我们总得不断帮助他。”

周恩来：“把一个走错了路的，使他改悔，不要求那么高。”

陈伯达：“张体学同志我跟他接触不多，他听了主席的话，就向群众检查，这使值得大家学习，值得在座的学习，几十年的老同志向你们承认错误不简单啦，当然过去你们你们有正确的。”

你们‘反复旧’太过分了，不谨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帮助你们转回来了，这在你们斗争史上是一个教训。现在有一个问题，年青人脑子不要太膨胀了。”

周恩来：“他们到主席面前还提些怪问题。”

陈伯达：“蒯大富，我们说：你不要别人喊你‘蒯司令’。‘蒯司令’这个名字对你是很大的危险。当然一个他是‘三司’司令，一个是‘联动’利用。”

周恩来：“红卫兵串联到北京，说第一要见毛主席、林副主席，第二要见中央负责同志，第三要见‘蒯司令’。”

陈伯达：“我们很早就跟他警告过，叫他不要陷入所谓关心的危险中去。你们都是常委、副主任委员，地位不低，不要陷入‘关心’的泥坑。你们年龄都不大吧！蒯大富也是北京市常委，你们要用蒯司令的教训对照自己，看也是差不多，你们也要接受这个教训。”

康生：“我刚才讲的两面手法韩爱晶最厉害。”

陈伯达：“韩爱晶是我的好朋友，我很早就警告他，你们今后会失败在骄傲上。”

康生：“韩爱晶有个名字叫‘狐狸精’，他出的手法比蒯

大富还高明，玩权术。”

陈伯达：“你们湖北林副主席家乡的李四光，湖北黄冈人，今天和江青谈了一句话，古代有个恐龙，现在消灭了，有一个延安的化石，”

周恩来：“最近山东出土的，十二米高，二十多米长，这是很大的一个恐龙，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才好摆。”

陈伯达：“发展到哪一个庞然大物，后来就自然淘汰了，”

周恩来：“庞然大物，发展到不可发展就死亡了。主席说事物发展到一定极限就走向反面，列宁讲：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为谬论。一个事物发展到极限就走向其反面。恐龙的鳞片像钢板一样硬，爪子像钢爪一样。又那么大，要吃那么多东西，周围的东西吃光了，就走向死亡。所以我们不要走到反面去了，我们要说我们什么都不懂。”

陈伯达：“你们的脑子不要成为庞然大物。”

众人笑。

周恩来：“主席接见你们后找李四光谈话，讲了很多大道理，你们都不懂。主席说：‘天是塌不下来的。’这是个伟大的真理，天是个自然物，什么时候也塌不下来。主席又说：地球照样转，地球成天在转，主席说：坐地日行八万里，多快呀！我们坐这里不动，只有谢富治脚在动，就飞一样走了八万里。主席还说：地球如果缩小到这么大（比手势），球壳就只有一张薄厚了，我们一个人就走的地壳上，一张纸上

那么一点点小了（比手势）。地心是什么东西还没搞清楚，
杨道远，你们是搞地球表面的，不研究地心吧？”

杨道远：“不懂。”

周恩来：“地心可能是一种很重的合金。”

康生：“有很大吸引力。”

周恩来：“把我们吸住，地球就运转，我们没有个伟大的胸怀，世界上的事只要认识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陈伯达：“所以不要迷信庞然大物，也不要不知满足。”

康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几十年得出一条经验：青年人不能做昙花一现的人物。”

周恩来：“你们前年把汉阳叫‘白区’，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但我每次从汉阳过都比重庆安全，你们说的也不对。‘720’时，主席问谢副总理，到‘百万雄师’那里去过吗？谢副总理就没有。结果到了‘三钢’、‘三新’那里去了，最后经过‘百万雄师’那里，看了一下。主席这种最先到对立面去做工作的伟大精神，的确不容易啊！回去后把我们的话化为你们的思想做工作就行了，不要贴大字报，印小报。

告诉你们，省宣传部密加凡是王任重、周扬黑线的，要跳出来支持你们，你们要注意。”

众人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陈伯达：“朱鸿霞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你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小知识分子？”

朱鸿霞：“我是在厂业余学校学的一点。”

陈伯达笑着说：“有点夸夸其谈。”

胡厚民：“他喜欢文学。有人说：他是业余作家。”

黄永胜：“我看你的文章不像工厂写的像知识分子的。”

朱鸿霞：“我脱离劳动两年多了。”

周恩来：“我们年轻也写了一些东西，现在看漏洞百出。要研究一下，如何参加劳动，一年劳动几个月，回本厂劳动和原来的战友在一起离开了就不好，也要抓一两个点，不然领导上再不注意就当陪衬，表个态，讲顿大道理，这样不行。主席在北京住久了，也经常出去听不同意见。

方法就照你们报告办，逐步稳步的前进。贵州回去了，又反过来了，希望你们搞好，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地球照样转，这是伟大的真理，主席讲，坐地日行八万里，我们坐着不动，只有谢富治的脚在动，我们坐着不动，一下子就走了八万里。想到主席教导，心胸一开阔，什么都想通了，做主席的好学生不容易，你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很幸福，前途无量，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我们开始革命也东闯西闯，后来找到了毛主席，学得不好，跟得不紧，再过几年就见马克思了。”

周恩来又让汪东兴讲讲。

汪东兴：“我是来学习的，文件印了四万份，大家带回去。”

谢富治：“好好学习，好好前进。”

黄永胜：“希望你们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首长的指示带回去落实。”

康生：“坚决落实不动摇。”

陈伯达：“大家合作得很好嘛！”

周恩来：“要互相学习，武汉是全国的地理中心。”

康生：“你们搞好了，今年国庆我再和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一起到武汉看你们去！”

大家热烈鼓掌。

周恩来：“最后希望你们健康的成长！”

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央领导与湖北代表握手告别。

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当面对周恩来说：“‘反复旧’的责任在我们头头身上，我们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回去以后不要整群众，千万千万不要整群众。”

周恩来当即表态说：“曾思玉同志，你们都在这里，回去要做细致的工作，可不能压群众。”

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

“527 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却无法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对于群众中的这种抵制情绪，曾思玉、刘丰很是恼火，称为“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

第 1091 回：济南稳，国务院进行改革

毛南巡，四老帅“研究小组”

此时的山东，到济南、青岛已经传开王效禹犯错误的消息。杨得志等 27 人于 5 月 28 日回到济南，第二天，即 5 月 29 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济南军区就召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对山东问题的批示。6 月 1 日，王效禹在联席会上作检查。67 军 204 师代表在这天的会上，痛批王效禹、韩金海等人在临沂的所作所为，还提到“老大哥部队”紧跟王效禹的一些错误，转弯抹角批评山东其他驻军。

第二天，6 月 2 日，济南“文攻武卫”总部被砸。

紧接着，6 月 5 日至 14 日，济南军区和省革委又在南郊宾馆召开部队师以上干部、地方地市以上负责人的联席会议，简称“南郊会议”。6 月 5 日上午，杨得志传达中央领导有关讲话和文件后，下午王效禹作了一个 37 分钟的检查。第二天分小组讨论，准备大会发言。有 40 多人报名发言，确定 24 人发言。大部分与会者对王效禹的检查很不满意。

韩金海、杨保华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揭发。韩金海发言时，台下不断有人大声质问，最后被轰了下来。

6 月 14 日，首先袁升平、穆林讲话。袁升平说：“到会的同志大多不明真相，不知道真正的情况。通过这次揭发，过去对山东存在的问题，原因不清楚，不知道根子在哪里。现在这个迷揭开了，到会的同志大吃一惊。过去山东存在的

问题，如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群众、……这个原因和根子就是省革委的主要负责人”。

“这次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检查，还是有距离的，虽然进步是微小的，但我们还是欢迎的”。

最后杨得志作总结说：“通过学习，大量揭发，认识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严重错误，破除了他的迷信，认清了事情的真相”。 “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不只是他一个人，其他同志也有。我也有错误，我几次看到他的错误后，总是肯定他的成绩，对他的错误帮助不够。有一次我和袁升平同志同他谈心，3个人谈了5个小时，对他的错误有所察觉，有过斗争，但对他的错误还是帮助不够”。 “例如谭启龙同志的问题。省革委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想提出来，但又怕人家讲我和袁升平同志过去是保谭启龙的，现在又为谭启龙讲话，因此没有坚持这个原则”等等。杨得志对贯彻传达会议精神的范围、内容等讲了6条意见，提了6条落实26号文件的措施。其中有“不准串连，不准搞什么联合行动，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不准张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不准以任何借口，擅自脱离生产岗位”等等。下午16时，“南郊会议”结束。之后，山东工作实际上由杨得志、袁升平等部队领导人为核心负起主要领导责任，济南开始逐渐平稳。

这期间，曾被王效禹抓捕镇压的“山工联”等负责人重

新拉队伍，准备东山再起。

5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改组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销、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初步方案，以及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说：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要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北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这天，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又开始了他的南巡，5月30日到邯郸，5月31日在郑州停了一下，当天就来到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在这里一直住到6月26日。

这时的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部署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威逼中国。

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九届一中全会后，周恩来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四位老帅很不理解：经毛泽东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刚刚发表，其中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为什么还要他们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某些不同看法，那又谈何容易？即使能够，会不会被认为是对“九大”政治报告唱反调呢？

周恩来向他们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

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并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正。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他还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他强调说：“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毅他们4人带着各自的秘书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然后由陈毅将他们开会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就批评他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4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陈毅顿时醒悟，他认为，周恩来是担心他们四个人聚在

一起，难免不放炮，传出去又要惹祸。即使他们的秘书不会外传，但谁知道哪天再有风吹草动，再有人派红卫兵把他们揪走，勒令他们揭发检举，左右为难。不让他们参加，是免得他们将来受牵连。于是陈毅对周恩来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

周恩来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

陈毅说：“好，赞成，请总理马上下命令。”

周恩来说：“你直接同他谈吧。”

5月27日下午，陈毅找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谈话。两人一见面，陈毅就将周恩来亲自“点将”的前因后果对熊向晖说了一遍，然后问他：“你看可以不可以？忙不忙得开？”

熊向晖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陈毅说：“这个意见好，我马上报告总理。”

几天后，陈毅告诉熊向晖说：“总理让姬鹏飞从外交部

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并强调此人要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纪律性较强。姬鹏飞推荐了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当时就同意了。”

就这样，陈毅等四位老帅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算是成立了。6月1日，陈毅上报了“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第二天，6月2日，周恩来就在陈毅的这份报告上作了批注，进一步向四位老帅明确了三项任务：

- 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
- 二、对国际形势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 三、对国防问题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6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批复北京军区，同意组建守备第33、34师，分别归陆军第69军和内蒙古军区领导。12月22日，根据军委办事组决定，守备第33、34师依次改称守备第1、2师。

6月7日下午15时30分，“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南海武成殿正式开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陈毅在开场白中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头。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

《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

看、仔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 3 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打电话分别通知大家。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会’，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作第一回。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

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毅的“开场白”讲完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剑英 72 岁，聂荣臻 70 岁，陈毅和徐向前都是 68 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

6月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

社论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具体地说，就是要“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把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在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认真细致地做好。”

这两段话是毛泽东的指示。

怎样搞好团结？社论指出：“我们的团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大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大团结。”

具体地说，这就是：

1、从阶级路线来说，就是“工人阶级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巩固地团结同盟军，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对于那些犯了严重错误而不是不可救药的人，对于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不是死不改悔的人，都应该按照党的政策团结他们。”

2、从政治路线来说，就是“对后跟上的同志要热情欢迎。有的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站错了队，改了就好。不承认人家的进步，把犯过错误又已改正的人还总叫‘老保’，是完全不对的。有些最早造走资派的反的人，在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中，也会犯某些错误，也要认真改正。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

3、从领导班子来说，“首先是要加强领导核心的团结，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对已经解放了的干部，要大胆使用，不要一犯错误就算老账，重新打倒。对革命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亲一派，疏一派，你支一派，他支一派。”

6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上面印有毛泽东的批示：“照办”。

文件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像、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二、重申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

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

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

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第 1092 回：桂纠偏，贺龙三〇一去世

信尼姑，西藏尼木县事件

在这期间，广西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又搞出了一个“新反团”。

1969 年 1 月 16 日，广西军区支左办联络组长王生江等一些“支左”人员在南宁橡胶厂召开“阶级斗争情况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驻市 80 多个单位，共 100 多人。这次交流会实际上是追查广西“反共救国团”的一次现场会。王生江在会上说：“‘反共救国团’在‘422’中发展了组织，这是肯定的。有单线发展，也有集体发展，新闻电影院开的‘反团’宣誓会，正面挂的是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的后面是蒋介石像，宣誓时就把翻过来了……”“‘422’中的‘624’、‘625’部队，各分部都有他的情报员，后来其中有的参加‘反团’，至于哪些人是，哪些人不是，就很难分清了。南宁市搞‘反团’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很快就会公布啦！”

从此广西有了“新反团”的提法。没过几天，追查“新反团”的工作就在全南宁市铺开了。

由于追查“新反团”的目的主要是针对“422”一派群众组织，而且事先由王生江等人定了调子，所以追查一开始，就大搞逼、供、信。此事很快扩大到自治区内的柳州，桂林、都安、隆安、邕宁、武鸣等 10 多个县、市，还涉及到贵阳、长沙、汉口、天津等区外省、市。有的还直接通知部队，某

某新战士是“反团”成员，弄得部队某些单位也很紧张，将这些战士退回地方。

1月21日，广西荔浦县革委专案组以全体人员的名义，给广西军区党委、广西区革委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

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月29日，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亲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次会上，做出了“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的决定，并同时决定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拘留。

当天，在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了“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这里的“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扣发的工资，取消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18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324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处理。

南宁市在大抓“新反团”中，清出了2000多“新反团”

的成员，自治区、南宁市革委会及公、检、法机关对王生江等人追查“新反团”的作法产生了怀疑。2月28日，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抽调了区、市有关单位的20多个干部，组成清理“新反团”遗留问题的专案领导小组，进行了几个月广泛的调查。后来市革委会召开有关单位领导干部参加的千人大会，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王国典介绍破获“反共救国团”即“旧反团”确证案详情，强调指出这个“反团”的组织成员已查明，其全部骨干分子已全部缉拿归案，要求大家不要相信“新反团”的材料，因为那些是假的。

通过这次大会，原来打算搞“新反团”或正在搞“新反团”的机关、单位都停止了追查“新反团”的运动。

6月4日，广西自治区“南宁市清理‘新反团’专案领导小组”向区党委的核心小组和广西军区领导上报了一份《关于清查“反团”新线索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出“经过三个月的调查，肯定大搞这个‘新反团’是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假案”。并提出了4条处理善后工作意见：（1）统一认识，停止对这条线索的追查；（2）在已开展追查的范围内做好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本人的交待和从外单位转抄来的“反团”材料，应交本人当众烧毁，对因“反团”问题被隔离起来的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工作和自由，因刑讯受伤者要给予治疗；因此受冤致死者家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一些补助；（3）外县涉及这条线索的要转告有关单位；（4）对

此假案的成因要进一步组织力量深入调查。

南宁市革委会据此精神，由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胡庆辉在召开全市各单位保卫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贯彻。

6月8日早上，住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的贺龙听完广播后，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他爱人薛明非常着急，立刻去找医生。但是医生外出了，直到中午12时才回来。薛明向他讲述了病情，下午15时，医生为贺龙打了一针，仍未止住呕吐。

下午17时，贺龙血压减低，上腹部剧烈疼痛。住地工作人员和医生决定向上级报告。4个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他们将贺龙的尿样送丰台药品检验所化验。

9日零时5分，根据化验结果，他们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零时40分，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贺龙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还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6月9日凌晨，301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

曹副院长放下电话，立即找到曾给贺龙看过病的主治医

生黃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让他们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往象鼻子沟贺龙的住处。

黃秀琴医生来到象鼻子沟后，对贺龙进行了诊断，并立即向 301 医院曹副院长做了汇报。

此时，曹根慧副院长并不知道贺龙住在哪里，便对黃秀琴医生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

象鼻山肯定不具备抢救条件，而且这里距 301 医院的路途不远，且路况又好。黃医生请示送 301 医院抢救，曹副院长当即答复说：“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

放下电话，曹根慧副院长又赶紧向靳来川院长做了汇报。靳院长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

当告知贺龙要送去 301 医院住院时，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他们谁也没有表态。

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他那只已经瘦骨嶙峋的大手。

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

上午 8 时 55 分，贺龙来到 301 医院。此时楼里楼外在中央专案组布置下，已经戒备森严。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组织抢救，确诊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10 时 55 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 70 / 40。

11 时 30 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曹副院长立即组织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前来会诊，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萧志达医生推来拍片，发现贺龙肺部感染。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

但是，15 时 04 分，贺龙去世。

当天，301 医院向中央写了报告。

黄永胜指示，一定要薛明去看遗体，并指示一定要找到在京的子女也去见一见。

1969 年 6 月，西藏尼木县发生了军宣队被杀害的事件。

当时，尼木县的大多数乡村都属于西藏“造总”组织。两个翻身农奴，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县“造总”的头

头。不过轰动一时的杀害军宣队的“尼木事件”领导人还不是他俩，而是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

起初，尼木县也像别的地方一样陷入武斗之中，县政府的领导干部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是，在单增朗结和热群两人去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这场“斗争的性质变了”，变成了民族运动，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他们一方面要把汉人赶出西藏，同时也搞阶级斗争，家庭成份不好的人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

赤列曲珍，30多岁，是普松村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1959年前在普松村里塔斯寺受戒。藏人对尼姑的称呼是：“阿尼”。1962年组织学习班，很多僧人包括这个阿尼都去了。学习班里天天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等等，赤列曲珍开始心理不正常，从学习班回来后变得疯疯癫癫的，经常跑到山上一个人唱歌。于是，玛朗苍的一个咒师把她带到两个喇嘛那里。从那里回来后，赤列曲珍开始降神，说她自己是格萨尔传说中下凡的女神“阿尼占尼甲波”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但那时候已经在批评封建迷信，只有赤列曲珍周围的一小部分人知道她会降神。当时尼木县各地传说：普松的阿尼，就是赤列曲珍，能算命，会说预言。很多人见了赤列曲珍后，都说她能讲一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所以很多人开始信她。传说桑日村的一对夫妻去见赤列曲珍，在去之前，那个丈夫说应该带一个整茶砖送给阿尼，但妻子说

只需带半个茶砖，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带一个整茶砖。但见了赤列曲珍阿尼之后，阿尼把茶砖切成一半让他们把另一半拿回去。因此，她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文革一开始，赤列曲珍尼姑也参加造反。她背诵《毛主席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

文革初期，红卫兵冲击县城的时候，尼姑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

尼木“造总”头头单增朗结和热群找赤列曲珍占卦后，赤列曲珍成了尼木“造总”实际上的领导人。1969年6月的一天，他们攻击尼木县政府，举着一面两刀交叉的“四水六岗”旗帜。这种旗帜是1959年藏东康巴人组织的反共游击队用的旗帜，他们称之为西藏的国旗。

去进攻尼木县政府之前，他们举着这所谓的西藏国旗，举行了藏民族最普遍的一种宗教祈愿仪式——煨桑，呼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冲进了县武装部。

煨桑自文革开始后，已有很长时间没人敢搞了，因为那是搞封建迷信。

在这之前，两派武斗时，群众组织攻击过县政府一次，但像这次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帜向县政府进攻，性质就不一样

了。这天，在县政府的汉族军人和基层干部 14 人全被杀死，而且杀得很惨。这些解放军是属于“支左”军宣队，没带枪。尼姑手下的人是半夜三更突然冲进去的，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被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这些人都是鬼，而且还在坟上放着军帽。

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西藏军区派出两支部队，分别从羊八井和曲水两条路开往尼木县剿匪。

车子开过曲水大桥时，前面的路被人破坏了。桥下面是雅鲁藏布江，上面是很高的山，山顶上还有很多人，看来他们早就预料到解放军要来，因为他们闯了大祸，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羊八井的那条路也被破坏了。

军区得到报告，连夜派部队修路。

约有一个排的兵力，再加上尼木县里的部队，进山围攻赤列曲珍驻地。

赤列曲珍驻地的山谷里全是乱石成堆。一个个山头上开始挨着冒烟，这显然是发现解放军来了，他们用古时候那种烽火报信的办法传递消息。

部队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犁牛鞭（鸟杂），用这种鞭子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

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会开枪的，可能他们也以为部队不会打枪，所以气势汹汹的，用最落后的武器来对抗。但这次

性质不一样了，他们是“反革命叛乱”。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边追边打，一直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部队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

这样相持了一会儿，部队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部队挑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房子里面也朝部队开枪，但他们的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根本打不到这边。而部队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想冲上去，但这样就会肉搏，双方伤亡会很大。参谋长就叫战士们别打了，可战士们不听，都打红了眼，想冲上去把他们全部消灭。天色已晚，参谋长把部队撤回来。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到山上了。

部队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时，里边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尼姑的房子里还点着一盏酥油灯，油燃的不多，可能跑的时间不长。在房顶上有个简单的帐篷，一张桌子上面有几个盛满弹壳的盘子。弹壳都是自动枪的弹壳，只有部队才有，是不是收集在一块表示证据的意思呢？那楼下有个隐蔽的小经堂，点着灯，供着佛像，还有些经书、法器和护身符之类。后来有群众告诉他们，说院子一角的小房子里有两个伤员，被砍了双腿或双臂的。他们进去一看，果然有两个

人，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据他俩说是周围的老百姓给他们喝茶喝青稞酒才活下来的。已经砍了好几天了。是因为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在尼姑的门前一块空地上还钉有四个橛子，群众说尼姑处罚被认为是叛徒的人时，就把他们的手脚捆在橛子上再砍，那满地都是血，已经干得起壳了。

还有两个基层干部被活埋了，挖出来时，其中有一个浑身水肿，到处是刀口。

那两个被砍伤的男女很年轻，被立即送到军区总医院治疗。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

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经过公审后枪毙。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有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的头。

第 1093 回：离武汉，过长沙又到南昌

七月一，发社论指导“整党”

6月13日，苏联政府再次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并使苏中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意见和建议。要求“二、三个月之后”，即最迟在9月13日前开始边界谈判，这无疑是一种最后通牒。7月底，苏联再建议举行苏中双方高级会晤。

这天，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参、总后机关进行精简整编。

总参原编15部、局，精简整编为13个部、局。即：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三部、军训部、军务部、防化学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气象局、管理局。

根据中央决定，将中央调查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

总后原编13个部、局，精简整编为9个部、局。即：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卫生部、装备部、军事运输部、企业部、营房部、管理局。

6月16日，军委电复福州军区，同意将闽北指挥部改编为陆军军部，称陆军第29军，辖陆军第84师和由原独立第1师改称的85师及守备第7师。

6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

员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宏为装甲兵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为兰州军区政委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的任命，结束了北京军区自 1967 年 2 月以来没有正职司令员的局面。

6 月 22 日，山东省和济南市革委会、群众组织的部分负责人，以及支左军代表 570 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的学习，解决山东和王效禹等人的问题。

学习班到京的第二天，6 月 23 日，中央批准成立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由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穆林、赵修德共 7 人组成，组长王效禹。可这个山东最高领导机构中，王效禹绝对孤立。5 名军人中的杨得志肯定不会站到王效禹的一边；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坚决反他；赵修德 1968 年 12 月“反复旧”被整后彻底转变立场抵制王效禹；穆林是文革前的省委书记，文革初期遭批斗，1967 年 1 月被造反派关押，三结合进入省革委分管生产，因不同意出版《王效禹论生产》一书又挨了整。

6 月 26 日，林彪主持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问题及七一社论等事宜。

毛泽东在武汉一直住到 6 月 26 日。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东湖梅岭一号，他

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盛行的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这几天我派人去武汉观察了一番，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都比较稳定。你来武汉一年了吧？你还是依靠那个指挥所吗？”

曾思玉回答：“是。我们还是 20 多个人，住在军区茶岗一栋楼办公。”

“对，人不要多。我历来都是如此，机构要精干，有事要亲自办。周总理也是这样，有事自己动手打电话。你的助手有谁啊？”

曾思玉一一介绍了副司令员和副政委。

毛泽东说：“不要调多了，3 个可以了，多了不好。要

搞五湖四海，要放手让助手大胆工作。”

曾思玉又把群众组织的头头们的一个顺口溜说给毛泽东听：“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汽车一叫就来，什么权都没有，是摆设，后来闹补台，党票挂起来。”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也好嘛！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排，汽车一叫就来，这也是权嘛！你们要帮助教育这些过渡人物，还要告诉他们要谦虚谨慎，要好好学习和工作，不然就容易犯错误。”

6月26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的那天，同湖北负责人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对正在审查的干部，他说：“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

“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

“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这次在武汉，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曾思玉汇报他们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

丰收在望时，毛泽东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月26日，毛泽东乘专列自武汉来到长沙。6月28日上午9时45分至12时，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湖南负责人黎原、华国锋，陪同接见的有汪东兴。

毛泽东开始问湖南的情况如何？黎原汇报了湖南的情况，谈了湖北“反复旧”对湖南有些影响，也出过几张大字报，转抄武汉“反复旧”的消息，作了工作后，局面稳定。

他着重汇报了目前一个一个去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两派的群众工作。当汇报到对跟“永向东”梁春阳、尚春仁犯过错误的群众，亦重视作团结教育工作时，毛泽东指示：“‘永向东’、梁、尚是少数，要教育团结多数。”

当汇报到梁春阳、尚春仁曾说湖南 52 个县是老保翻天时，毛泽东问：“湖南多少县？”

答：“94 个县市。”

毛泽东接着说，“永向东”、梁、尚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子，实际他们搞复旧。又说：“他们说得那样革命，革命革得那样彻底，52 个县，还有 42 个县是革命的，成绩就很大。”

毛泽东问到：“‘高司’的学生怎样？”

黎原汇报说：“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已分配在军垦农场参加劳动锻炼，整个学生连队都表现很好，军队同志对他们很欢迎，六九、七〇届去湘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

毛泽东接着指示：“除年老多病的外都下去，教员也下去。”

他又问：“湖南这样大，47 军搞得了吗？”

黎原汇报：“在地区主要靠分区、县武装部支左，地区革委会的主任现在大都是分区或县武装部的负责人。47 军两个师搞生产，打算再抽一批干部参加搞去。”

毛泽东说，点铺的不要宽。

当问到湖南落实政策抓人情况时，毛泽东指示：“内蒙扩大化抓了 20 多万人，省并不大，好就是没杀人。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没有参加国民党不见得（注：按湖南话意思，即：不见得没有参加国民党。），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不要学北京大学抓了 900 多人，抓多了不好处理，抓了怎么办？总共 9000 多人，哪有那样多的坏人！”

毛泽东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你们也提出这个问题，小队还是大队为核算单位？”

黎原汇报了石门县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

当汇报到湖南去年能够取得丰收原因时，毛泽东说：“过去彭、黄、张、周的黄克诚，就是给韶山东西，不发扬群众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寨好，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他还说：“去大寨人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大寨是大队核算，80 多户实际是一个大一点的生产队。”

在汇报到干部解放情况时，毛泽东问了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的情况。

汪东兴插话：“遣特情的情况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指示的，应由他们负责。”

毛泽东说：“高文礼我看是好人，‘高司’、‘红联’、‘公检法’过去臭了，‘公检法’多数是好人。”

“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在省委工作，在长

沙久了可以到地区、县，在下面久了亦可调长沙，地区之间亦换一换。犯了错误改正就是。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如果你还要分两派，再搞三年，但总是要联合起来。要做工作，解放干部有些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有些可以调到别的地区。”

“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军队机关人少些，中央、省、地、县四级地方机关人多。”

“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 1966 年 10 月的工作会议，这会议是给打招呼不要压群众，不要靠一派压一派，他们听进去了，回河南召集地、县委书记开了会，现在他们地区、县革委会百分之五十一是原地、县委书记当第一把手，但他们没有给大工厂的人打招呼，所以那里的领导干部出不来。”

接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说：“‘高司’、‘红联’、‘公检法’ 大多数是好的。”

当黎原他们请毛泽东再作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面的想法是对的。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有些苗头应该看到，也不要估计过了。前年来时还不是急风暴雨，你们办公地点一天要搬几个地方。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

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接见从上午9时40分一直到将近中午12时。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离开长沙，驶往南昌。他在南昌只待了一天，29日又驶往杭州，在在那里一直住到9月18日。

6月28日这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学部宣传队和“大联委”时谈到清查“516”的问题，他说：“‘516’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516’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516’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社论指出：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

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都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问题上，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继续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要注意，绝不能把自己和党的关系摆错了。”

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并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

- 1、“继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
- 2、“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按系统、按单位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 3、“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 4、“继续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 5、“在那些大体已完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就要抓紧整党建党和其他的斗、批、改的工作。”

怎样整党建党？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论述：“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并说：“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

具体的作法，社论说：

“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即“用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彻底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批判他的黑《修养》，批判他的黑‘六论’”。

社论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翻案活动。那种认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可以‘歇一歇’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其有害的。”

社论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参加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对那种不搞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热衷于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对那种居功自傲，停滞不前，图享受，争地位的人，对那种沾染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而还不愿改正的人，对那种玩两面派、搞‘小动作’而不去认真、刻苦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人，我们要向他们问一声：同志，你是继续革命，还是革命到头了呢？”

社论指出：“在整党建党工作中，抓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组织整顿的工作一定要做，也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方法。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当清出除党，并不准重新入党。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根据毛主席的一贯

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同时，要认真地把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社论传达了毛泽东谈到整党工作时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并具体指出：整党要“充分相信群众，实行开门整党。”“要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进行整顿，要做过细的工作，不能粗枝大叶。整团的工作，也要着手进行。”

第 1094 回：七月五，中央接见山东班

七月八，八岔岛又起争端

北京，继续解决山东问题。7月初，中央做出决定：徐海地区“三支两军”工作统一由 68 军党委领导，所有驻徐部队均要服从 68 军指挥。

7月5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山东班。在此之前，21时10分，他们首先听取山东班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李水清、何志远、李燧英（济南军区副参谋长）3人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央领导要求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康生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

22时30分，再召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济南军区群工部长郑洪五及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一同进入福建厅。

陪同接见的还有聂济峰、贺盛桂等人。聂济峰原任 1 军政委，1966 年下半年任驻中央组织部军代表，“九大”后任中央在北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贺盛桂原任后勤学院训练部长。学习班的具体负责人都是军队干部。

康生说：“到北京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思想认识要清楚，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办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林副主席，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不是派性学习班，不是群众组织学习班，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

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九大’之后召办的第一个学习班，是在新的形势下办的，虽然有个别同志不是党、团员，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要加强党性教育，把山东具体问题先抛开。”

江青说：“要学党章，明天就要学。”

康生接着说：“你们组织参观先慢一点，先从党性开始，以共产党员的角度来想问题，都要鉴定一下，每个人都要写一个简历，家庭怎样，什么出身，干过什么，什么时候入党，刘崇玉要写自传，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刘老师’。开头一课把党章学好，先承认党章，有些人对党认识很差，要补上这一课，入党没有正确认识，这怎么行？党章要逐条逐句学习，有的要背熟对照检查。党纲是最大的毛泽东思想概括，共有几条，三、四、五条都要好好看看。党章是很多人鲜血的结晶。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按党章办事？新党员很多，连党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行？”

周恩来：“主要学毛泽东思想，你们学好了，把整个学习班空气可以变过来。你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说是代表群众组织讲话，你们不以党性为荣，以派性为荣，这是错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党的组织。”

“学习班要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学习班建立临时党委，各连建立支委会。学习班领导小组是行政领导，经过一段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好了，可以吸收几个人到领

导小组。”

康生说：“韩金海、彭士杰，杨恩华不能参加，把党的组织建立起来，提高党的威信，一切事都要按高的标准来办事。”

有人说，对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也要搞“三结合”，康生批评道：“这有什么三结合？这是糊涂思想。山东笑话多，出怪事，孔夫子思想很有市场，讨论‘九大’代表时，杨保华也提出三结合。韩金海、王竹泉提省核心小组也要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讨论批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杨得志同志给你们解释不听，还反对，过去王效禹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几个人说了算，有什么不好？这是党的原则，同王有根本区别。党内搞什么三结合，还要经过省革委常委讨论，这是错误的。党的核心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

“现在有人叫我们是‘军政权’，这事要抓住好好批判。”

“有人说军区夺了我们的权，学习就是要架空我们，这是王效禹的思想流毒没肃清。军队夺了权，否定了你们夺权，这是苏修的论调。”

“调查一下，学习班 500 多人中有多少党、团员和非党、团员。要抓党的工作不突出党的领导，很可能说是军政权，你们听起来不顺耳，不符合你们山东观点，你们代表群众组织吗？对我们有意见可以驳，党章不能驳只能学。”

江青：“你们的一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和你们的观

点不同，我是山东人，可以开除我。共产党是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党性是很重要的问题，有些党员降低到群众水平。”

康生：“你韩金海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党章第五条是什么内容，你是‘九大’代表嘛。”

韩金海：“我忘了。”

康生：“党章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五条是针对资产阶级派性的，这是最重要的，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要按党章办事。第四条是党的纪律，三条是接班人的条件，有的没审查就入了党，这是组织不纯。思想上大部分都没入党，必须要端正。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把党性降低到群众，甚至落后于群众，说你们是群众组织的头头就高兴，说是党员就无所谓。

杨恩华，韩金海反对你，王效禹把你抓起来，愿意改就好嘛。要团结，共产党员起码有党的知识。为了革命，才找一个党，我们和你们走的路不是一样，我们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把生命都交出来了，你们入党是为了坐官。”

周恩来问彭世杰住几间房子，合多少房租？

江青问：“有卫生间没有？”

陈伯达：“省革委‘一宿舍’是糖衣炮弹，最危险，要搬出来，否则成了个官僚机构，‘九大’回去后，回工厂参加劳动了吗？不劳动就没有代表性，你那时不是党员，要有工人本色，否则很容易变成工人贵族，比方英国的工党完全

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周恩来：“韩金海你脸上无精打采，精神不对头。你在去年的济南政工会讲话很生动，什么‘刘老师’，真是雷霆万钧之势呀。结果搞错了。刘志师、孟庆芝是什么玩艺儿？孟庆芝一会把你吊在天上，一会把你摔在地上。孟庆芝是什么的，是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

康生说：“是恶霸，是国民党。”

江青：“她骗了我（指刘崇玉），和她一起照了像，我让王（效禹）把她抓起来。”

当有人说山东把王效禹比做山东的毛主席，把刘崇玉比做山东的江青时，江青生气地说：“造谣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头上来了。建立青年班子，搞青年班子的实质是什么？怪事，把老干部都赶走了，只有青年人才革命？你们这次来京学习，就是要和王效禹划清界限，韩金海说没出路，什么是出路？向党靠拢就是出路，搬出‘一宿舍’就光彩，不搬就不光彩。”

她问杨恩华：“脱离劳动几年了？”

杨恩华：“做3年工，两年文化大革命中没劳动。”

江青：“你韩金海来这里检查，揭发错误，有什么包袱？你遇到问题总是为自己辩解，你的检查看到了，有微小进步，欢迎，思想不能一下通。你是原则抽象检查，具体否定，没有触及灵魂。你党性很少，资产阶级派性很多。”

她说彭士杰：“你把家都搬来了，住在‘一宿舍’，失掉工人阶级本色。”

又说韩金海：“你 66 年睡地铺，现在住 7 间房子，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不要都是为官、权。最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是共产党员。那些官、权是王效禹的糖衣，要注意。”

周恩来：“你们错误很严重，来了要好好学习，青年人缺乏经验，改了就好。你在南郊会议上发言了吗？你发言两次，检查不深刻，群众不满意，上纲高了怕丢官，低了群众不满意，这是自然的。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你（韩金海）把穆林搞下去是错误的。”

韩金海：“我只管几天。”

康生：“把生产系统搞乱了。你思想不对头，管一天也不对，是革命政权，张美智是谁推荐的？是王效禹提的，还是你提的？问你 3 次你都抛开不谈，张美智是两次判刑，你总是躲躲闪闪的。”

由于 7 月 2 日在北京学习班上，济南一个区文攻武卫的头头打了一个揭发问题的民警，7 月 7 日晚 21 时，康生、李作鹏亲自来到山东学习班领导小组处理这一打人事件，呆了 5 个多小时，。

康生、李作鹏、聂济峰指名把在北京学习班参与打人的济南红旗区（原市中区）革委会副主任胡金环、济南红旗区“文攻武卫”负责人汪永康、陈英叫来，对直接打人者汪永

康的辩解，康生厉声训斥：“胡扯！”“像话吗！像人话吗！”

康生问学习班有多少“文攻武卫”？有多少是“反复旧”上来的？有多少受压的？有多少人挨打……有多少党员、团员？非党、团员各有多少？都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是否填表了？填表了批准了没有？

康生说：“主席在延安时讲：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入党。‘反复旧’后入党的人有的组织上也没入，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拉进来的。”

他说：“学习班临时党委要小点，有些人去年12月才入党的，连党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在研究山东核心小组时，这些人把党的性质都没搞清。党、团员和非党、团员都要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要增加这样一个任务，增加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必须注意事项，是毛主席批准的。汪永康是什么人？是党员吗？在红旗区干什么？……”

北京直接通知山东省革委常委张美智，济南“文攻武卫”总指挥孟庆芝进京。

7月19日22时多，康生、姚文元、李作鹏、聂济峰、贺盛桂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山东班的李水清、何志远汇报，韩金海、彭世杰、杨恩华等人参加。

聂济峰原任1军政委，1966年下半年任驻中央组织部军

代表，“九大”后任中央在北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贺盛桂原任后勤学院训练部部长。

听取汇报时，康生点名：“孟庆芝、张美智恐怕在招待所不合适，直到现在用假面具欺骗我们，”“这种作恶多端的人应当送到卫戍区。”

20日，张美智、孟庆芝、刘崇玉3人被扣押，直接关进北京卫戍区。

曾经跟随王效禹的造反派，在北京看到这阵势，明白王效禹大势已去，为了自保，纷纷表态，矛头对准王效禹，狠揭猛批，王效禹成了孤家寡人。

在此期间，中国上上下下掀起了声讨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的高潮，沙皇俄国与满清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等种种不平等条约又被翻了出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当年沙皇俄国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让走了1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现在的3个法国或5个德国。“仇视新沙皇，蔑视新沙皇，鄙视新沙皇”的宣传教育几乎家喻户晓。

6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入我新疆巴尔克鲁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6月27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反华一再向帝国主义求援》为题，引用英、美报刊的一些报道，说苏联“作了很

大努力来使华盛顿了解同中国日益恶化的边界局势情况”，“故意把向北京发出的一个措辞强硬的照会内容转告给美国政府”。说明“紧张局势并不孤立于某些地区，而是边界沿线都如此”。苏联“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7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全文刊登了一份7月8日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苏修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的照会简略叙述了事件经过：“1969年7月8日上午8时30分，苏联边防部队乘坐两艘船艇，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8时40分上岛，并且毫无道理地向正在岛上生产的中国居民和民兵开枪射击。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把入侵者赶出中国领土。10时40分，苏联炮艇一艘侵入八岔岛附近地区，向该岛进行疯狂射击。16时20分，苏联炮艇两艘又侵入上述地区，苏边防军并上岛将我民房烧毁。11时20分到16时20分，飞机6架次侵入该岛和中国岸上八岔村上空低空盘旋，进行威胁。”

苏联方面也在7月8日当天向中国递交照会，就“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

“苏联部分”，向苏联河运人员进行“武装袭击”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9日莫斯科时间10点47分，塔斯社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俄国的岛从事耕种”的；过了一个多小时，塔斯社改称“中国的农民”是“根据双方的协议被准许在这个岛的俄国部分从事耕种”的，和苏联的抗议照会对该岛归属问题的口径保持了一致。

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今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由14个岛屿组成，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总面积约45.6平方公里。要比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1.6平方公里的吴八老岛大得多。

第 1095 回：山西班，难止三晋武斗风

铁路断，客货列车被迫停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主张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也积极备战，毫不示弱。而 1968 年底，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黑龙江又起到了加强边防的作用。1969 年 3 月 9 日，一列载了 1200 名杭州知青专列路过哈尔滨前往黑龙江合江地区。各地知青来到中苏边境地区后，立即被编入民兵进行军事训练。

1969 年 5 月开江后，知青和老乡遵照上级指示，陆续登上黑龙江上一些属于中国管辖但和苏联边防军发生过冲突的岛屿，一面种地、捕鱼坚持生产，一面暗中携带武器站岗放哨保卫边疆。当然，为了避免刺激苏方，他们携带的武器都做了遮盖和伪装。于是，对岸苏联边防瞭望哨看见的就是一群赤手空拳，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农民。他们对大批刚到的京沪津杭及黑龙江本省插队知青的动态和情绪显然缺乏了解。

在黑龙江东部抚远三角洲的同江县的八岔岛、董喀叭亮子岛上因为过去发生过苏联边防军上岛驱赶中国居民离岛的争端，上级也要求来自杭州的男女知青武装民兵参加登岛行动。登上董喀叭亮子岛上的民兵有 20 多人，除了有一些仿苏制 53 式 7.62 步骑枪外，另携带仿苏制 53 式 7.62 轻机枪一挺。他们在岛上生产劳动时，还有人划船在岛周边水域

打鱼，负责联络警戒。

很多知青是怀着保卫边疆的激情来的，能带着武器上岛，更让他们热血沸腾，结果7月8日在八岔岛上真的和苏联边防人员打了一仗。这是珍宝岛冲突以来的又一场双方都开枪的武装冲突，不同的是发起自卫还击的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中国民兵，还有知识青年，甚至有女知青。

7月8日8时，苏联边防军两艘汽艇进入八岔岛中方水域，进行“维护航标”作业。8时40分，苏联边防军和航标维护人员上岛作业，被正在岛上劳动的中国民兵前去制止。知青受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鼓舞，士气高涨，恰好遇到苏联边防人员入侵中国领土，自然会情绪激动地先进行说理斗争，还有一部分人在后面拿出了原先遮盖住的步枪和反坦克手雷、手榴弹等做了战斗准备。苏联边防军见蜂拥而来的中方人员较多，便开枪射击威慑。

对在所谓的“争议岛”上劳动的中国居民开枪警告射击，这是苏联边防军在驱赶中国老百姓时常用的手法，屡屡奏效。哪知道这次碰到的不是普通的中国农民，而是经过军事训练的有武装的知识青年民兵。他们没有严格遵循中央军委规定的“我方必须在两次鸣枪警告无效，苏方又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才可以自卫还击”的规定，而是见苏联人开枪动手了，在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无法请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立即开火还击，力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苏联边防人员措手不及，只好边打边撤。枪响后，在苏联汽艇附近的知青民兵迅速把手雷扔到苏联巡逻艇舱里，炸沉了这艘船，苏方死伤多人。混战中，中国民兵在击沉一艘苏联汽艇，并生擒苏联一人后迅速撤离该岛。

由于交战中苏方一艘汽艇被击沉，至少一名人员失踪，苏方随后开始了报复行动。10时40分，匆匆赶来的一艘苏联炮艇对八岔岛进行了长达6分钟的机枪扫射和炮火攻击，苏军直升飞机也多次飞临附近的八岔村上空盘旋威胁。下午16时20分，苏军炮艇多艘载大批军人登岛搜索，最后烧毁了岛上的中国民房和大批树木，火势持续到深夜。至21时，两艘苏联炮艇仍封锁住中国内河八岔河水道出口。

苏联边防部队在事件发生后的9、10两日，连续派炮艇进入八岔岛地区达39艘次，直升飞机10余架次，军人100多名。

后来证实这批进入八岔岛的苏方人员中确实有航标工作者，这次冲突是中国知青民兵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擅自行动，从外交上来看是失策的。所以中方对苏军入境的武装挑衅没有进行武力阻击，并且及时将在其它岛上劳动的所有居民和民兵撤回，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为防止违纪现象的发生和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方面在事后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射击苏联越境人员和车辆、船艇和飞机，不

能让一颗子弹飞到对岸苏联领土上；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要“有理、有利、有节”。中方在以后几年的一系列登“争议岛”显示主权的行动中，严令禁止上岛人员尤其是知青携带枪支弹药和匕首，防止偶发事件加剧冲突。所以在1970年以后，中苏边境东段黑龙江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双方交火激战的武装冲突。

实际上让苏联边防军恼火丢脸的还有一件事，7月8日，在距八岔岛60公里外的中国董喀叭亮子岛附近水域，他们的一艘武装巡逻艇居然遭到了中国渔民“武力威胁”的羞辱。

7月8日上午，并不知晓八岔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的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的杭州知青罗以民与同学王祖荣和往常一样，暗中携带步骑枪两支、手榴弹8颗、反坦克手雷1枚，以打鱼为掩护，划平底船下江巡逻。一艘前后配备14.5毫米高射机枪的苏联巡逻艇入侵中方水域向他们驶来，似乎有挑衅抓人的企图。两位知青不约而同地把暗藏的手雷和手榴弹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罗以民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又把4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2颗插在腰间，2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5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他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颗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

船，跳水游回去。”

尽管苏联巡逻艇围着他们小船高速转了好几圈，由于平时训练有素，小船船头始终朝着苏艇，未被苏艇掀起浪波掀翻。罗以民看苏艇越来越近，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都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将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接近中国渔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它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抓过中国人。

两船距离将近 40 米时，罗以民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突然举起了手雷，亮出了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那个苏联军官看见了他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

中方边防哨所通过高倍望远镜已经把这一触即发的斗智斗勇场面记录在案，罗以民后来被黑龙江军区合江军分区通令嘉奖。他的事迹在当时在边境地区广为人知。

此时，所有人们都明显的感到：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是，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师似乎另有高见。他们从 6 月 7 日到 7 月 10 日，进行了 6 次讨论，写出书面报告《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由陈毅定稿后，于 7 月 11 日报呈周恩来审阅。

《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认为，当时国际上的对抗，集

中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美、苏均以中国为敌，同时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但就美国而言，尼克松认为中国还是“潜在的威胁”，不是现实的威胁。美、苏现在都在布局。苏联要向美国控制的西欧伸手，美帝要向苏联掌控的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他们之间。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虽然“九大”后在北京举办的第一个学习班是山东学习班，但此时山西武斗依然没有停歇，致使晋中、晋南的铁路长时间中断。

1969年3月至9月，山西谢振华根据中央指示，继续在北京清河地区召集山西两大派头头办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山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厂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几千人参加。

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山西三大组织的派头头们，此时已控制不了下面的政治局面。山西基层的“红总站派”，依旧对呈联合态姿的“兵团派”和“红联站派”，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小武斗，造成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市场供应紧张；

市民半年多吃不上肉，买不到肥皂、火柴、电灯泡等日用品；市内垃圾满街，路灯不明，电车、公共汽车又少又脏。

3月13日，在临汾以北的冷泉至灵石铁路间，两派群众武斗，当场死亡6人，伤10余人。其中一派乘汽车路过平交道口时，由于车上自带的地雷因震动而爆炸，造成自身的伤害。武斗将铁路调度电话线打断，危及、中断铁路行车一天，现场查看被打断的线路计四孔21条。致使两对客车和42对货车停开和滞留区间。

3月14日，太原铁路局黄建常与生产组成员郭长生、曹益荣等协同现场工人乘马力车前往处理。他们于13时开始抢修，当工人爬上电杆时，又有武斗人员时断时续朝抢修人群开枪。他们于15时20分接通了线路，乘车返回。

4月1日，就在“九大”开幕当天晚上，驻介休的汾西矿务局两派武斗，伤亡数十人。

4月22日13时，临汾铁路北段南关至富家滩段发生武斗。武斗人员声称在铁路上埋了地雷，炸坏了道岔，威胁列车不得过去，致使384次客车中途停车。铁路局派就近人员前往查看，因武斗仍在继续，未获详情，此事延续数日。最后，由铁路分局派出专车单机挂卧铺和餐车各一节，由黄建常与调度所的刘柱带领解放军战士一个班的护路部队及工兵前往，排除了钢轨上设置的水泥柱等物，未发现地雷，道岔等也完好无损，只见大路旁小推车前躺着一具穿着红裹肚的尸

体。当铁路局专车到达时，384次列车上旅客及当地群众激动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

“解放军万岁！”

被困扰几天的列车旅客多亏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送饭送水，生活才得以保障。当日18时以后，铁路局将384次列车拉回太原。

4月24日，榆次站因武斗冲击，无人接发列车。16时左右，有单机挂守车在修文站等待。由于榆次站无人接发车，列车一直等了4个小时。后经调度电话出令，同意其开出在榆次站外停车，观察道岔线路，没有错误后才继续开进。接着549次客车也采用类似方法放了进来。从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延续到5月11日。

5月11日5时左右，榆次市在粮食局附近发生大型武斗，铁轨上放置了许多枕木、石头。麦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十几具尸体。

5月18日6时，介休、义崇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声称线路附近埋有地雷，并有武斗人员在看守。致使行车无奈中断，全天客货列车均受阻。383次列车在鸣李站停车3个多小时，直到20日才开出，到达临汾。

从5月3日起，路过襄汾的客货列车全部被迫停车，接受群众组织的检查，有的旅客被中途拉下车。

5月4日的384次和90次列车因故开不上来。客车在经过襄汾站时，被强行甩下一节车厢，并抢走17套卧具。

5月5日，9台机车在临汾以南被扣而滞留开不过来，严重影响了机车交路计划。而且机车乘务人员不断被殴打，并被威胁说“再敢过来就枪毙！”一些车站同样也遭冲击。由于上述原因，383次不能开下去，旅客只好到临汾后下车，自找短途抵达目的地。

5月5日，铁路分局决定381次客车要坚决开下去，虽已找好了机车的司机，却又因调度电话中断而不能开出。此刻却发现在侯马至襄汾间，有群众组织利用被扣客车和货车组成的列车运送武斗人员的情况。由于上述原因，5月14日，分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发电报通告说：“临汾以南客货列车因故暂停开行，通告广大旅客。”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电被临南的一派群众组织批为“大毒草”。

铁路分局决定以5101/2为专列开行。以太铁分局专列先导前卫车的名义开出，并事先在调度所放风出去给该派群众组织：此专列要直开风陵渡。专列于21日上午从太原开出，10时22分到达介休站时，临时停车，向正在该地区处理武斗事件的省领导谢振华、刘格平、陈永贵等请示。谢振华说：“大动脉！大动脉！赶快通……”并随即下令，沿线武装部门和部队要给专列通车以保障。列车一路以天女散花

方式向沿途各站散发宣传品，到达临汾站时，忽得报告，临汾以南调度电话全线开通。但当专列到达襄汾站时，只见数十人的武斗人员荷枪实弹，在麦地里匍匐卧倒，做出向列车射击的战斗姿态。站台上挤满了人群。列车在此停车一分钟，让事先已准备好的列车工作人员，从窗口向站台大量抛发中央1968年颁布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二六命令》和省里新拟发的《通车通告》。当列车到达侯马站时，以同样的方法，向站台上的人群抛出宣传品。

专列于当日17时40分顺利到达鸡鸣三省之地——风陵渡

第二天，5月22日17时40分，专列又从风陵渡开出，当天到达运城，向运城的群众组织做了宣传工作。23日9时30分，又从运城开出，14时03分到达侯马车站，当晚到达临汾站。24日由临汾发车，18时30分返回太原。至此，5101/2专次专列胜利地完成了此次通车任务。

24日开通临南线路以后，在列车勉强通行不到一周，临南的干扰铁路行车事件又重演，并升级了。晋东南群众组织公开开行了318派性列车，阻断全省南北公路、铁路交通干线。318次列车，不但以优先权运输着武斗队伍，同时出售车票向百姓敛财。

6月初，在枪弹袭击下，列车只好退回临汾。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7月23日。原南同蒲铁路，即纵贯山西大同至蒲

州的铁路线南段线上的客车和货车，在晋南平原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飞驰在晋南平原上的318次列车。

晋中地区东有太行山革命老根据地，西有吕梁山革命老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很多，其中不少打过仗的老队员此时参与了两派的武斗队。因此打仗的指挥水平都不低。“晋中野战军”吃亏的时候不少，一次被人家伏击打死二三十人的事发生过好几次。

晋中的武斗，多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晋南则有大规模的攻坚战。晋南地区当时有 20 多个县，多数县控制在“318”派手里，只有中共地委和专署所在地临汾县控制在“126”派手里，城外就是“318”派的武装。城里有 1500 多条枪，据说有几十挺机枪，他们在大的火力点上都安了电话，指挥很灵。

1969 年 5 月，晋中军分区与河北保定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中军分区下辖的 20 个县人民武装部也分别与保定军分区、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市、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晋南军分区与河北邯郸军分区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同时，晋南军分区下辖的 20 个县人民武装部也与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县人民武装部互换驻地和变动隶属关系。

5 月，中央召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在北京

开会，决定解决山西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会议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的精神，提出解决山西问题的 13 项措施：

1. 加强省核心小组领导，建议增加李顺达等 6 人为省核心小组成员。

2.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现在省革委会办事机构人员和原省委、省人委机关人员全部调出来学习，学习后另行分配工作。建议从军队调 300 名比较优秀的干部，组成精干的省革委会办事机构。

3. 建议由各总部和各军种、各兵种驻山西部队的负责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由 69 军政委曹中南任组长，谢振华、萧选进任副组长。

4. 所有中央、省属厂矿、院校、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政治思想工作，统由所在地（市）革命委员会领导。

5. 对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办的学习班上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谁也不准破坏。一切跨行业的组织一律取消，归口抓革命，促生产。

6. 太原市、晋中、晋南的两派，要坚决支持根据 1968 年 9 月以来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协议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7. 坚决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停止一切武斗，拆除一切武斗据点，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上缴一切武器。对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

实行军事包围，展开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追捕归案法办。除昔阳外，太原、晋中、晋南民兵的全部武器，都要上缴人民解放军保存。

8. 大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

9. 坚决执行中央颁布的关于铁路交通的一切命令。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火车、汽车，袭击车辆，冲车站，抢劫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抢去的车辆必须立即无条件交回。南同蒲铁路必须立即无条件恢复通车。取消非法的“3·18”次列车。

10. 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抢劫商店、仓库，霸占和私设银行，非法派粮派款，向群众敲诈勒索，残害人民，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严加惩办，并追回其抢劫的全部财物。

11. 对于煽动、威胁工人离厂，破坏生产设备，制造停工停产事件，以及强迫农民进城武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分子，要严办。

12.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革命秩序。坚决打击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犯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对太原市所谓“弟兄们”的流氓集团，应坚决取缔。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应判处死刑。

13. 为了迅速制止武斗，彻底解决山西问题，请求中央再派一部分部队协助山西驻军完成这一任务。同时请求中央

发一个布告。

第四部上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057 回；

刘少奇：

第 1044 回； 第 1046 回； 第 1049 回； 第 1050 回； 第 1057 回；

第 1058 回； 第 1059 回； 第 1069 回；

“六二六”、赤脚医生：

第 1044 回；

九大：

第 1044 回； 第 1046 回； 第 1047 回； 第 1048 回； 第 1050 回；

第 1051 回； 第 1066 回； 第 1068 回； 第 1069 回； 第 1071 回；

第 1072 回； 第 1073 回； 第 1074 回； 第 1075 回； 第 1076 回；

第 1077 回； 第 1078 回； 第 1079 回； 第 1091 回；

五七干校：

第 1045 回； 第 1054 回；

专案组：

第 1050 回；

清理阶级队伍：

第 1051 回； 第 1060 回； 第 1063 回； 第 1064 回； 第 1065 回；

第 1066 回； 第 1067 回；

批孔：

第 1082 回；

贺龙：

第 1044 回； 第 1051 回； 第 1092 回；

整党建党：

第 1044 回； 第 1047 回； 第 1050 回； 第 1051 回； 第 1056 回；

第 1093 回；

邓小平：

第 1047 回； 第 1051 回； 第 1065 回； 第 1070 回；

上山下乡：

第 1048 回； 第 1057 回；

二月逆流：

第 1048 回； 第 1049 回； 第 1051 回； 第 1060 回； 第 1066 回；

第 1069 回； 第 1070 回； 第 1073 回； 第 1074 回； 第 1091 回；

军委办事组：

第 1050 回； 第 1054 回； 第 1079 回； 第 1085 回； 第 1089 回；

第 1090 回； 第 1093 回；

总政：

第 1060 回； 第 1089 回；

清华大学：

第 1057 回； 第 1090 回；

北京大学：

第 1057 回； 第 1058 回； 第 1059 回； 第 1065 回； 第 1072 回；

第 1080 回；第 1090 回；

徐向前：

第 1060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048 回；第 1049 回；第 1060 回；

中苏冲突：

第 1067 回；第 1068 回；第 1069 回；第 1070 回；第 1071 回；

第 1089 回；第 1091 回；第 1093 回；第 1094 回；第 1095 回；

五一六：

第 1057 回；第 1093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072 回；第 1073 回；

中央非常委员会：

第 1086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090 回；

上海：

第 1044 回；第 1045 回；第 1051 回；第 1072 回；第 1073 回；

华北地区：

河北：

第 1066 回；第 1094 回；第 1066 回（保定）；

内蒙：

第 1063 回；第 1064 回；第 1085 回；第 1089 回；

山西：

第 1047 回；第 1061 回；第 1065 回；第 1095 回；

东北地区：

辽宁：

第 1045 回；

黑龙江：

第 1045 回；第 1055 回；

西北地区：

甘肃：

第 1057 回；第 1065 回；第 1079 回；

西南地区：

四川：

第 1047 回；第 1051 回（重庆）；第 1052 回（重庆）；

第 1053 回（重庆）；第 1059 回；第 1079 回；

贵州：

第 1072 回；第 1079 回；

云南:

第 1060 回; 第 1079 回;

西藏:

第 1092 回;

中南地区:

河南:

第 1065 回;

湖北:

第 1047 回; 第 1065 回; 第 1080 回; 第 1081 回; 第 1082 回;

第 1083 回; 第 1084 回; 第 1086 回; 第 1087 回; 第 1088 回;

第 1089 回; 第 1090 回; 第 1093 回;

湖南:

第 1047 回; 第 1093 回;

广西:

第 1092 回;

华东地区:

山东:

第 1047 回; 第 1055 回 (临沂); 第 1056 回; 第 1062 回; 第 1068 回;

第 1072 回; 第 1079 回; 第 1082 回; 第 1089 回; 第 1091 回;

第 1093 回; 第 1094 回;

安徽:

第 1047 回;

江苏:

第 1047 回 (徐州); 第 1055 回 (徐州); 第 1064 回;

第 1065 回 (徐州); 第 1086 回 (徐州); 第 1089 回 (徐州);

浙江:

第 1047 回; 第 1060 回; 第 1065 回;

江西:

第 1044 回; 第 1065 回; 第 1080 回;

福建:

第 1047 回; 第 1065 回;

文革史话

之

第四部

欲罢不能

下卷

目 录

第 1096 回：七月会，中央《七二三布告》

武斗止，解振华主政山西

第 1097 回：中美间，无声息互作姿态

召德生，贵州紫林庵武斗

第 1098 回：做检查，徐州三改革委会

西北败，铁列克提遭伏击

第 1099 回：形势紧，核大战一触即发

八二八，中共中央发《命令》

第 1100 回：四川省，各地、县仍有武斗

决心大，组织联合工作组

第 1101 回：“工农派”，永川、花果山施暴

“红旗派”，武装攻打何埂镇

第 1102 回：谣言传，朱杨、二溪人心乱

争逃离，长江上“白沙惨案”

第 1103 回：八一四，中央又提“五一六”

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

第 1104 回：促谈判，中美苏共同起舞

四老帅，再递交局势报告

第 1105 回：毛泽东，北京接见李德生

忆往事，林彪再上井冈山

第 1106 回：抓战备，全军开作战会议

迎十一，副统帅忙碌不停

第 1107 回：庆大庆，北京城内紧外松

看地形，林彪飞抵张家口

第 1108 回：防突袭，研究老干部疏散

细安排，筹划与苏联谈判

第 1109 回：林立果，任命空军副部长

看表演，周恩来安排疏散

第 1110 回：细安排，林彪苏州述“六条”

速整理，总参发“第一号令”

第 1111 回：急件到，毛泽东火柴烧掉

大疏散，苏联代表团抵京

第 1112 回：扩军忙，小平、陈云在江西

献勇士，一首政治幻想诗

第 1113 回：九二七，中央取缔“北决扬”

鲁礼安，赴黄石铁山被抓

第 1114 回：十月三，武汉修理造反派

判“无联”，山西班移到石门

第 1115 回：说贵州，青岛学习班打架

批二张，王茂聚北京自杀

第 1116 回：十一五，湖北学习班开学

一号楼，刘少奇开封逝世

第 1117 回：时装会，美国大使追翻译

几回合，华沙会谈重恢复

第 1118 回：转弯急，大草原再陷“真空”

设前指，内蒙古二次军管

第 1119 回：建总政，部队疏散返营难

判罪犯，下通知征求意见

第 1120 回：一二四，众领导说“五一六”

震动大，全国再次掀高潮

第 1121 回：下文件，掀“一打三反”运动

说湖北，北京召开公判会

第 1122 回：南京判，上海批斗“孙悟空”

孙蓬一，北大又贴大字报

第 1123 回：再办班，内蒙古仍不安定

订计划，筹备开四届人大

第 1124 回：汽车上，得知柬埔寨政变

不屈服，西哈努克要战斗

第 1125 回：下《通知》，抓“五一六”勿扩大

游雪涛，上海清查中被抓

第 1126 回：江苏省，南京大学突破口

文风来，“江苏没有‘五一六’”

第 1127 回：无锡市，许世友传达文件

查黄廉，湖北班批判三人

第 1128 回：“火上烤”，谈“不设国家主席”

在广州，开“三国四方会议”

第 1129 回：谈抗美，毛泽东会见黎笋

“谁怕谁”，拿起武器敢斗争

第 1130 回：游长城，林彪接见新总政

五二〇，毛泽东发表声明

第 1131 回：林家忙，温玉成被贬成都

轰江青，召集宪法修改会

第 1132 回：声震屋，修宪法争论激烈

被判刑，抓《知青之歌》作者

第 1133 回：轰隆隆，“行宫”上面建机场

开全会，众仙纷纷登庐山

第 1134 回：带“老虎”，空军的“两个一切”

接通知，上海代表团启程

第 1135 回：会前忙，为二中全会准备

牯岭上，庐山会正式开幕

第 1136 回：先讲话，林彪发言受欢迎

听录音，众人要求印材料

第 1137 回：华北组，陈伯达手舞足蹈

也表态，汪东兴讲话支持

第 1138 回：小组会，庐山上热闹非凡

争发言，华北组《六号简报》

第 1139 回：再震动，张春桥急见江青

看《简报》，毛泽东批汪东兴

第 1140 回：华东组，陈励耘指向明确

急叫停，庐山上风标再转

第 1141 回：问情况，聂元梓再次挨批

收记录，三司令同时写信

第 1142 回：找谈话，毛泽东召集开会

汪东兴，陈伯达都做检讨

第 1143 回：谈话忙，吴法宪斟酌检讨

刚上山，黄永胜即被召见

第 1144 回：毛泽东，深夜召见叶剑英

再挥笔，写《我的一点意见》

第 1145 回：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见江青，再接受“战友”斗争

第 1146 回：和为贵，庐山会议终结束

再拜访，叶群诸人心不服

第 1147 回：九江送，林彪没有再停留

下庐山，陈伯达形影孤单

第四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第 1096 回：七月会，中央《七二三布告》

武斗止，解振华主政山西

1969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给太原的徐志远并山西省临时领导小组打电话通知：中央要求，山西原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再来 110 人，其中太原两派各来 30 人，晋中各来 10 人，晋南、侯马鱼雷厂各来 5 人，中条山铜矿各来 5 人，十二冶各来 5 人，中条山铜矿军管会 1 人，十二冶军管会 1 人，侯马鱼雷厂军管会 2 人，太铁、太钢、西山矿务局军管会各来 1 人，地方干部 9 人：李顺达、王体、韩英、徐志远、李学敏、王振国、王金贵、刘汉儒、谭海水。共来 126 人。7 月 1 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报到，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准备参加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

然而，就在 7 月 1 日，临汾的“1·26”派和“3·18”派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大规模武斗，其程度，不亚于当年解放战争中的临汾战役。

这是一场攻城战役。掌权的“3·18”派把革委会迁到侯马后，从各县调集了大批民兵，号称万人大军，有百门大炮，于 7 月 1 日向临汾守城的“1·26”派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坚战。城内约有 5000 武斗人员，抢了一个军火仓库，还有机关枪等武器。

战斗异常激烈，晋南地委的办公大楼被炸，战场硝烟弥漫，一片狼藉。这一次武斗，以攻城的“3·18”派失败而

告终。武斗中除伤亡人员外，“1·26”派像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对付被俘人员那样，对所俘的武斗人员集中整训，提出愿留下的，可以参加他们的武斗队伍，愿回家的给每人发一件衬衫、一条毛巾。据说，有的还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这一次武斗看似结束，但对立的双方都在积极召集人马，修筑工事，一场更大的武斗在孕育中。

“3·18”派，多是从农村以每人每天3元钱的工资招募来的。守城的“1·26”派虽然只有5000人，但都是各县清理阶级队伍时逃跑出来的，觉得在家也是一死，在这里也是一死，不如在这里决一死战，所以这一场大规模武斗是很惨烈的。

这样的武斗，在山西的全境，正在大大小小，不同程度地继续发生着。

7月7日，周恩来针对南同蒲铁路中断，给陈伯达、谢富治、纪登奎写信，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恢复南同蒲铁路全线通车的措施不力提出了批评：“全文只一处提到如继续发生以上类似事件，一定要严追，依法严惩首犯。但如何禁止，如何严惩，并无交代，闹事者仍可置之不理。请考虑要他们进一步出一布告，严禁各项，如违反以武装逮捕，分别依法惩处。”

7月，毛泽东对山西问题指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

成的结果。”

为此，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于7月23日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中发[69]41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史称《723布告》。《布告》说：

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份地区，混在各派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份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

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国家计划。

《723布告》做出了八项规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缴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及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除同蒲铁路段非法的318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和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

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八、凡分裂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布告》强调：“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对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为使《布告》尽快得到落实，中央政治局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解决山西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核心小组组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张日清等调离山西，到河北省办学习班。陈永贵仍被保留在核心小组，但在北京也受到了批评。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陈永贵有派性，强令他在太原召开的公布《723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

就在中央发出关于山西问题的《723布告》的前一天，7

月22日，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也联合发出了针对保定地区武斗的《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

根据中央《723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山西省军区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1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723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他们到武斗最严重的地区，如大同煤矿、阳泉市、平遥县、长治市去制止武斗。经过20多天的工作，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平遥军火生产中心也在解放军开进平遥后垮了。

平遥县为了保护他们的军火生产基地，曾自己建立了一支城防卫戍部队，有一百几十人，全部佩带本地造的“五四式”手枪。平遥城被称作“龟城”，有六个城门，城墙是国家保护文物，没有拆掉，里面人把城门一关，外面很难攻进去。临近平遥的汾阳县是“兵团派”的天下，“兵团派”想“解放”平遥，就必须研究攻城术。他们在造炮上下功夫，把氧气瓶的底锯掉，做成炮身，怕炮身强度不够，又在外面加了几道钢箍，再加一个支架，就成了大口径迫击炮。他们

铸造的迫击炮弹，每发重75斤，相当大，但射不远。原因是他们怕装的炸药多了，炮膛会承受不住，会炸膛。这些炮已试射过，正准备用它轰平遥的城墙，中央的《723布告》来了，解放军把它们全部收缴，不然平遥城可能倒大霉。

8月初的一个晚上，月明星稀，盛热难熬。驻中办山西学习班的原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们，各自向他们管辖的小组发出了紧急集合的命令。没睡下的，急忙出门，睡下了的，急忙穿衣服准备出门。每人都拿上自个的小板凳，规规矩矩地在工宣队和军宣队吹响的哨声里排好了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时还是对立面，一见面就乌眼鸡似的，可现在却都在用眼神彼此打探消息，传递着同样的不安和恐慌。自从传达了《723布告》，一个个心里正紧张着呢，今儿晚上的紧急集合，天晓得又要出什么事情！

他们排着队来到操场，再一个个一排排坐在自个带着的小板凳上，等着开会。一位负责人宣布开会，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接见大家。主席台上果然就出现了由陈伯达领头，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随后的一干人等，一个个神色严峻，脸上绝无丝毫笑意。

说是接见，实际上是训话。陈伯达口口声声要学员们老老实实交待问题，最后就开始点名了：“刘格平和张日清，是山西两派组织的派头头，还有袁振也是个派头头……”

“谁叫杨成效？”陈伯达又用福建腔发问了。

杨成效便朝台上的中央首长点着头站了起来，山西省的夺权总指挥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顺从的模样呢。

“特殊审查。”

还有啥可说？杨成效当时就被叫出去，更确切地说，是被押了出去，接受特殊审查。山西的“兵团”司令、中学生刘灏目送着他的死对头消失在远处，手心里不禁捏出了一把汗。这决不是为杨成效，而是为他自己。

“谁叫汤建中？”陈伯达又点了一人。

妈呀！这下子轮到“兵团”了。刘灏司令心里那个紧张呀，汤建中可是众所周知他“刘司令”的“高参”呀……他也与杨成效一样，出列离队，接受特殊审查，罪名是混入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

台上中央首长们又训了些什 么话，刘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真有些想不通了。“兵团”明明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怎么你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如今是左右开弓，连个是非也不分了呢？他又想：“杨成效和汤建中被‘特殊审查’了，我呢？”此时的刘灏是啥话也不敢说了。

中办学习班里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次中央首长接见后不久，周恩来又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山西学习班宣布，由谢振华将军担任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主持山西工作。同时宣布将刘格平、张日清、袁振三人调离山西，由中央另做

安排。在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前，依旧留在学习班斗私批修。由此，身经百战的谢振华将军，开始在山西展开了稳定局面的工作。

过了一年，1970年8月，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逮捕杨成效。

1970年9月1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署名的两份《通知》，经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下发到全省基层单位学习讨论。

一份是杨成效的罪行，其中列举了四大罪行：

一、迫害老干部致死。

二、破坏生产，挑起武斗，多次进行打、砸、抢、抄、抓。山西历次武斗，多为杨成效挑起，对社会危害极大。

三、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造恶后还酿成了将被害女学生推下高楼致死的命案。

四、破坏社会治安，抢占民女和民间财物。

这些罪行中，除“抢占民女”中那“民女”实际是杨成效的情妇外，其他是件件真实。

另一份是汤建中的罪行。《通知》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汤建中的罪状”全文摘录如下：

现行反革命分子汤建中，男，37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上海市人，原系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机务科副科长，1953年因破坏军纪受撤消团内职务处分。汤犯的父亲汤家福跟随

英帝 20 余年，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奴。其弟汤正平曾三次妄图越境投敌被判刑 7 年。

汤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疯狂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61 年以来，汤犯多次在广播电台机关和 528 工地借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污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汤犯混入群众组织，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在各种场合，采取多种手段，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先后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并州饭店、太原五一广场、北京后勤学院等地，多次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攻击和污蔑，在党的“九大”期间，竭力为“二月逆流”翻案，借“二月逆流”干将之口，攻击污蔑我们的副统帅，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翻案。当“七·二三”布告发布后，汤犯又大肆诽谤中央对解决山西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妄图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汤犯自 1956 年以来，长期偷听敌台广播，无耻吹捧帝、修、反，胡说什么“现在还不能肯定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

等反动言论。

二、分裂、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

汤犯出于反革命目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大肆进行攻击、分裂和诽谤。1968年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恶毒诽谤说：全国的解放军“大都执行了‘二月逆流’，镇压了造反派”，特别是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余、傅被揪出以后，汤犯反动气焰更是甚衅（注：原文即如此。衅字应为嚣字）尘上，不遗余力的多次在北京后勤学院、民族饭店等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成武鸣冤叫屈。汤犯在北京民族饭店，竟明目张胆的造谣说“中央信任某某部队，不信任某某部队”，还以“王牌军”、“嫡系部队”等极其反动的言词，恶毒污蔑、分裂人民解放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

汤犯以资产阶级派性为掩护，在群众组织头头中，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月会议纪要“照办”是假的。汤犯还野心勃勃的搞了一套所谓“改组省革委方案”，自封宣传组副组长。

汤犯鼓吹、策划武斗，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于1967年底至1969年初，曾多次召开会议蒙蔽群众，鼓吹武斗，严重的破坏了局势的稳定。

四、汤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利用封、资、修一套腐朽、反动的东西，腐蚀、毒害青年，经常向本派的头头灌输封建皇帝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反动思想，“搞一派掌权”煽动群众组织，还让他们学习古书和“佛经”，胡说什么“这里边有辩证法的萌芽”，来毒害群众，制造思想混乱，阴谋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分裂太原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破坏太原地区的大好形势。

汤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极端恶毒的攻击、污蔑伟大领袖，疯狂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反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累累，证据确凿，认罪态度极坏，胡说什么他讲的“都是客观存在”，真是反动透顶。

杨承效、汤建中的罪状在山西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杨成效判死刑，汤建中判无期。

11月10日，杨成效被押上了刑场，执行了死刑。

汤建中则在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3月底被无罪释放。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81年3月25日下达了关于他的(80)晋法刑二甲字第109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根据汤建中向本院提出的申诉，做如下判决：

“现查明：原判认定汤建中的罪行绝大部分事实属于言论。但这些言论有些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有些反映了客观事实，原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是错误的。据此，判

决如下：一、撤消山西省公检法军管会（70）军管刑字第501号刑事判决。二、宣告汤建中无罪。”

汤建中被无罪释放后，重新回到山西省广播电视台工作，直至晚年退休。

第 1097 回：中美间，无声息互作姿态

召德生，贵州紫林庵武斗

1969 年 7 月，中南海西花厅。一份公安部转来的广东省公安厅的急电放到了周恩来那宽大的办公桌上。急电说：

7 月 16 日，在临近香港的海面，抓到了漂进我们领海的两个美国人。请示如何处理。

按常规，这类事情无非是作为帝国主义向中国挑衅的靶子在报纸电台上揭露一番。但是，如今情况有所不同了，自 1969 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

2 月，担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尼克松，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对华政策，“试探重新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美国政府还声称，准备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

其实，早在尼克松上台前后，毛泽东已经开始关注他。1968 年冬天，毛泽东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并对在中国的美籍专家柯弗兰写的文章，表示“欣赏”。他还仔细阅读了不久后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所写的《六大危机》，认为该文“写得不错”。1969 年 1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 1 月 20 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周恩来决定亲自抓广东省的那两个美国人的事情。他吩

咐秘书，上午立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的负责人来开会。他要公安部责成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的人去搞清楚两个美国人乘游艇闯入中国领海的真实情况。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不要随随便便给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两个美国人的住宿、饮食要妥善安排好。

果然，美国方面也在密切注意中国对两个美国人闯入中国领海一事的反应。本来，美国准备在这一天宣布放宽对中国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因为发生了这件事，美国推迟了宣布。他们要看看中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但几天过去了，中国方面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7月23日，周恩来接到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说：，经调查，这两名美国人是来香港旅游的。因其所乘游艇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周恩来立即批准释放这两名误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无声的对话。双方都没有给对方表白，但彼此都明白对方的意思。双方都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

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6国。就在同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

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同时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也派人召见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 6 月 17 日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或其助手。曼斯菲尔德在信中呼吁，中美“20 年长期交恶”，这种现状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7 月下旬的一天，驻安徽的 12 军军长、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正在合肥开会，忽然接到周恩来从北京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李德生不敢怠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安徽省各地官员打了声招呼，便于 7 月 28 日乘坐中共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于当天下午 15 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见到李德生，征求他的意见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

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回答说：“我在军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 12 军的职务。”

我们再说此时的贵州。“九大”以后，贵州“411”不再用“总司令部”的名称，而是由贵阳师范学院杨文华提议，姚德仁力促，在新调防到贵州的 0276 部队支持下，各山头经过反复协商，形成了“贵阳地区‘411’联席会议”，并于 1969 年 4 月 19 日宣告成立，以紫林庵“黑大楼”为驻地，常驻人员有姚德仁、金光祥、涂光禄、谢垂泉等。

5 月 1 日，“联席会议”勤务组在十三公里 0276 部队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推举原“贵阳战斗团”团长宋达山为勤务组组长，原“红色工人战斗团”耿铁和贵州工学院的田子明为副组长。

中央 3 月 27 日“双红五条”下达后，贵州两派矛盾的焦点是怎样搞好大联合。李再含要求“411”先倒旗再联合。而“411”则坚持要先联合才倒旗。

5 月 19 日，贵州省“九大”代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陆军第 41 师、贵州省独立师联合向毛泽东、林彪、党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递交了一个贯彻“九大”

和“双红五条”的意见，共 5 条。

第二天，5月20日，贵州省军区在京常委又对解决贵州问题提出了 5 条措施，向中央表态，坚决拥护、支持、帮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认为提出“打倒李再含”的口号是错误的。

5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9〕25号文件转发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这两个报告。

但是，群众组织“捍三红”依然在贵阳地区 25 个工厂制造武器。而“411”也在汽车三场用钢板将一辆汽车改装成“土坦克”。“联席会议”郭玉珍还从盘县弄来两支手枪和两箱炸药。工建交指挥部伍昆宪等带一车人从乌当区水田公社武装部弄来两挺机枪、25 支步枪，但只有 12 发子弹。贵州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前来问责，“‘411’ 联席会议”办事处组副组长郭平回答说：

“不能只许‘捍三红’造枪造炮，也要允许我们自卫。”

王参谋长无言以对。

与此同时，“‘411’ 联席会议”在 5 月 23 日接待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安一长、张新民时，提出要求：一是要求公开表态“411”是什么组织，为“反动大杂烩”摘帽；二是收缴“捍三红”的武器，制止武斗，惩办凶手；三是释放被关押的“411”学生和工人；四是举办两派学习班，解决归口联合问题。

5月26日，贵州省军区、军分区和7578部队，即省军区独立师的代表王光银、汪胜永、陈俊林、左从清来到“联席会议”，要求撤出据点，收缴武器。得到的答复是：缴武器“捍三红”应先兑现；杀人凶手要严惩；“411”是什么组织要定下来。这三条兑现了，“411”撤出据点。

6月9日，贵州“411”召开了全省各地州市“411”代表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都匀、施秉、凯里、兴义、盘县、毕节、安顺、平坝、遵义、铜仁的代表。

7月12日，贵州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0276部队青年科科长陈匡来到联席会议，就收缴武器和撤出据点问题听取和交换意见，表示今后多来联系。

7月28日晚上，贵阳市汽车三场和紫林庵方向的枪声响个不停。29日清早，人们起来一看，紫林庵停了很多汽车，车头上架着机枪，车底下也有人持机关枪伏在那里瞄准。周围全是头戴藤帽，手拿梭镖和冲锋枪的人，他们打着“411”旗帜，似要攻打对面的计委大楼。后来“411”说这些人是“捍三红”冒充“411”。

贵阳师范学院孙世正这天晚上恰好住在汽车三场办公楼里。第二天早上，他刚起来不久，就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计委大楼里向外开枪打死人了，并说其中一位卖纸花的老太婆中弹后还没死，就一起被拖进了计委大楼门洞里。

孙世正立即揣着一枚手榴弹与其他人一起奔向“‘411’联席会议”所在的紫林庵，然后顺着计委大楼东侧墙根往大门口摸过去，想看看门洞里的情况。刚一伸头，突突突几连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过了一阵，孙世正蹲下去试着再伸一下头，又是几连发子弹打来。他紧张的将裤子口袋里的手榴弹拉上火，示意后面的人，沿着墙根退回去。

此时紫林庵周围已集聚了许多人。孙世正绕到计委大楼前的一片柏树林里，从一棵树蹿到另一棵树，来到大楼前离大门较近的一棵树背后往门洞里看。但是门洞里光线很暗，黑糊糊地看不清楚。

正在这时，一位中年解放军干部从楼的东侧挤出人群，向大门走去。他斜背着军用挎包，一边上台阶一边举起右手向门里喊话：

“老王（黄）不要开枪！”

谁知话音未落，突突突几发子弹从门洞里射出。只见这位军人右手还未放下，左手捂住胸部，大声喊着转身往回大步走来，孙世正赶紧冲了过去，那位军人正好倒在孙世正身上。孙世正赶忙把他反背着拖进树林。紧接着，两位壮实的小伙子上前帮忙，3人合力将这位军人抬上一部公共汽车送医院抢救。但因身中数弹，伤势过重，在途中就撒手人寰。

这位军人是独立师的一位营职干部，名叫左从清。

此时，紫林庵周围已有数千人围观。

有人通知孙世正去建工大楼“411”据点开会，会上决定出动“土坦克”，车内带有5支中正式老步枪和1挺捷克式轻机枪。

“土坦克”开到紫林庵，停在计委大楼大门百米外的路口上。大门内的火力向“土坦克”射击，但是钢板很厚，只听见子弹击中钢板的叮咚声，车内很安全。

由于视线不好，这部“土坦克”摇摇晃晃地开上了马路牙子。

有手榴弹掉在车下爆炸，驾驶台有人受伤。车继续前行一段距离，在紧靠延安照相馆的修鞋铺旁一歪就停下了，车内人员开始撤离。

这时，成千上万人围在紫林庵周围，四个路口堵满了围观的人群。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情况慢慢往前挤，特别是小孩子总往前钻，于是整个人群逐渐往前移动。这样移动的结果，引起计委大楼上一梭子弹扫向人群前面的空地上，人群又如退潮般向后跑。当另一路口的人群往前移动时，大楼上又向那个路口扫射，而这个路口的人群又会自发地慢慢往前移动。子弹并没有扫进人群，但是有的流弹由地面反弹起来后可能击中围观的人。一阵枪响之后，在人群骚动中会有人中弹倒地。

在延安商店的顶楼，有几个记者在拍照、摄像。

停放在汽车三场的一辆由公交车改装成的“411”广播

宣传车开到紫林庵广场，播音员的现场喊话，但是被计委大楼斜对面的省政法大楼楼顶上，省射击队的射击手击中轮胎。接着贵阳七中女学生田成琴、贵阳十七中女生陈明珠被打死在车外。

大约到了下午 3、4 点钟，高音喇叭大声广播中央下达的两条命令，内容大概是：一、“411”不要包围计委大楼，立即撤走。二，独立师开枪是错误的。命令立即执行，违抗者法办。

事态于是很快平息，围观人群也很快散去。

战斗停止后，群众纷纷前去观看，只见计委大楼楼梯过道都是流淌的鲜血，很多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放在一起。撞在墙壁上的“土坦克”，钢板留下了被步枪、机枪子弹打的洞。下午，“捍三红”的几辆汽车全都放下箱板，把被打死者的尸体平放在汽车上，车上的人头戴藤帽，手持梭镖站在车箱两边，车头上还架着机枪。尸体运到北郊粑粑坳掩埋。

“7.29”事件共死伤 176 人，其中打死 54 人，仅停放在汽车三场的就有 14 具尸体。可谓尸横闹市，血流街头。

周恩来看到新华社贵州分社的两份观点和材料各不相同的关于贵州“7.29”事件内参后，立即派专机到贵阳，把驻在那里的 6 名新华社记者接到北京，其中分社 4 名，总社 2 名，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不要带资产阶级派性了。你们的观点一时改不了

不要紧，但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事实要搞清。我们这样相信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们。”

“你们要尽可能地听取双方的意见，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

周恩来决定从新华社抽调记者组成赴贵州调查组。

7月31日，新华社抽调的记者集中开会，首先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们到贵州后多观察、了解，不表态，只向中央反映实情。并指定国内政治组组长宫策负责带队。

第二天，8月1日一早，新华社贵州调查组便急匆匆地飞赴贵阳。空军人员对他们说：

“你们任务紧，只能临时安排这架运输机了，没有座位，只好辛苦大家了。”

新华社贵州调查组就蹲在空荡荡的货舱里，飞越黄河、秦岭，来到了贵阳。

新华社贵州调查组到贵阳后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留在贵阳，另一组到贵州武斗最严重的铜仁地区。

当赴铜仁的小组进入铜仁地界后，便遇到头戴柳条帽、手持武器的武斗人员拦住车辆进行检查。他们只好下车说明情况，并将写有“中央调查组”的字牌贴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以下是他们在铜仁城乡调查近一个月后，写的内参调研材料。

之一：

贵州铜仁地区乱打乱抓乱杀现象仍然存在

最近记者来到铜仁地区，耳闻目睹，了解到这里武斗气氛很浓，抓人、打人、杀人现象仍在不断发生。

据了解，许多县、区、公社都关押人。铜仁“三红”总部到目前还关着十四人，吊打多次。少数民族聚居的松桃县，各区、社大多关了人。石阡县城内关了人。印江县把人关在山上的王皇阁里。在印江县树黄区，记者看到了正关着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张xx。张对记者说，现在这里还关了不少人，经常吊打，我就被吊打了八十多次。

记者访问了松桃县孟澳区七江公社一个转业军人，他被关了两个多月，手被打断，最近跑出来。他对记者说，被关的人吊打得厉害，他总共被吊打了一百多次。他说，公社革委会委员代昌墓（“支红”派，党员），被抓回去不久就枪杀了，他母亲被吊打死了。

在铜仁地区，各地“三红”派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小组，总指挥部、民兵营等组织，指挥抓人、打人、杀人。在铜仁城里，治安保卫领导小组，经常深更半夜派出武装人员，以查户口为名，进行搜查。许多地方路口设卡，武装人员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搜查，记者就碰到过好几次。地区革委会主任李贵鑫，八月十三日从贵阳返回铜仁，在路上被一百多武装人员盘查达六个小时。

自从七月份以来，单铜仁城中，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因不

合“三红”派的口味而遭打的就不下十人。地区革委会成员赵保，在一次分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出来在分区门口就遭到围攻和殴打。地区财务局革委会成员叶芝长，因为拒绝批条子取公款就被“三红”毒打一顿。

之二：

铜仁地区双方继续大搞专业武斗队

铜仁地区对立的双方都还在继续搞专业武斗队，加紧造枪炮，直到八月二日、三日，“三红”派还用武力打下了“支红”派占据的铜仁县洋头区。被赶走的朱、杨一部分人，正在外边集结力量，准备打回来。据铜仁地区革委会主任李贵鑫反映，朱、杨这些人在贵阳还准备去抢公安厅的枪。据他了解，朱、杨在贵阳还杀死了三个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

记者到许多地方都看到武斗的指挥机构和专业武斗队。记者去“三红”专业武斗队指挥部所在地师范学校访问，看到里面戒备森严，有枪、有军用电话、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有三部小汽车和十三部大卡车，里面有百余人大吃饭。据“三红”派勤务组一位成员(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头头之一)对记者说：指挥部直接掌握六个武装连，六百多人，四百多条枪，现在都调在“前沿阵地”。记者到松桃县采访，见到这个县的武器比较多，很多散在群众之中。记者在一渡口的苗族民兵连长家里(转业军人)亲眼看到房子里面放着一支冲锋枪，一门六零炮，一个望远镜。

之三：

贵州铜仁地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迅速解决铜仁问题

记者在铜仁和群众接触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人普遍厌恶武斗，对当前局势不满，强烈要求中央迅速解决铜仁问题，保障人身安全。

群众谈起大规模武斗的惨状，至今还有恐惧不安的情绪。现在，“支红”派怕，中间派也怕，“三红”派内部也怕。据“支红”派的人说，现在逃出的人约三万人左右。“支红”派和中间派的群众提心吊胆，许多人整天不敢出门，晚上门紧闭。“支红”派都怕见记者。地区革委会常委潘中玉，记者专门找他都躲避不见。记者访问了一个叫 xxx 的青年工人，他原是“三红”派的一个小头头，参加了这次武斗，认识到杀人太多不应该。当他在向记者谈情况时非常怕，全家都很紧张。临走时，他对记者讲：“我是拿一条命来给你们讲的。”

由于局势不安，群众没有心思搞生产。现在，铜仁城里除了一个化肥厂外，其余工厂都已停工。全国最大汞矿万山汞矿七八千工人大都逃走了，全部停产。国家投资兴建的飞机场，按原规定国庆节前完工，现在也停下来了。

群众强烈要求中央解决问题，普遍的呼声是：(一) 要求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目前首先要无条件地收枪，解散专业武斗队。(二) 要求纠正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群众中挽回影响。

周恩来安排 0276 部队在贵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拨给人民币 5 万元，粮食 5 万斤。

学习班设在贵阳市望城坡 0276 部队通讯营，定名为“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都是“411”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通讯营房屋不够用，还就近借用了马路对面的贵州省城市建设学校大礼堂。

学习班以 1 公里外进出贵阳火车站的铁路正线为安全边界，要求大家的活动不要超出这条界线。学习班的工作由 0276 部队师首长直接领导。

8 月下旬，新华社调查组完成了贵州问题的调查。周恩来在看过新华社记者写的调查材料后，决定将贵州省和地区的相关人员、各派头头 87 人统统调到北京办学习班，具体工作由纪登奎负责，下设的工作班子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原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三机部军管会主任陈华堂牵头。学习班从 8 月 31 日开始，到 10 月 18 日结束，历时 49 天。学习班和工作班子都在京西宾馆，实行封闭式管理。

第 1098 回：做检查，徐州三改革委会

西北败，铁列克提遭伏击

7月27日，根据周恩来指示，68军党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承认68军党委“长期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给徐海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部队建设都造成了很大损失”，并提出改进措施，还附加一份《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提出革委会的成分构成和具体人选。毛泽东批示“照办”。

7月29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68军报告做出肯定性批复。随后，这份报告作为中共中央1969年45号文件转发全国。

当天，“徐海班”召集全体会议，由68军政委李布德传达1089回提到的中发〔69〕26号关于山东问题的文件。该文件是转发山东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人5月24日给中央的报告，印发山东地方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其中也提到了徐海地区的问题。

7月30日，周恩来、李作鹏、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海班”全体成员。李作鹏宣读中央对68军党委报告的批示。其他领导人对徐州两派头头做出严厉批评，提出明确要求。其中“踢派”栾昌善、徐峰和“支派”孔庆荣、朱林等人被点名。当夜，“徐海班”成员陆续乘火车返回各县市，持续一年零两周的“徐海班”宣告结束。

8月1日，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徐州市革委会再次改组，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宣告成立，俗称“八一”革委会。按照68军提交中央的改组方案，革委会由8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13人，占15.3%（暂缺9人）；军队代表20人，占25.5%（暂缺1人）；革命群众代表48人，占56.5%（暂缺两派以外的革命群众代表3人）；留给脱钩单位名额4名，占4.7%。革委会常委由27人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4人（暂缺1人），军队代表9人，革命群众代表14人。在7名正副主任中，张銓秀（68军军长）任主任，吴怀才（68军副军长）、刘汝贤（68军副政委）、韩本初（原徐州市委书记）、夏云芝（“革命干部”）、栾昌善（踢派）、孔庆荣（支派）任副主任。与此同时，张銓秀被任命为核心组组长。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

踢得好，
支得对，
一年一个徐革会，
干部乱站队，
群众跟着活受罪。

这首打油诗，后来又加了几句：

支的好，

踢的对，
一年一个革委会，
写不完的检讨，
站不完的队，
批不完的私心，
流不完的泪，
不知哪回才是对，
群众跟着活受罪。

“八·一”革委会成立后不久，张銳秀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吴怀才接任68军军长。在随后的“整党”运动中，68军政委李布德在68军党代会上落选，调任山西省军区政委，同情“支派”的军政治部主任田波升任68军政委。后来，支持“踢派”的68军副参谋长祖岳嵘等3名正师级干部和100多名团以上干部被审查、撤职，1名保卫科长被迫害致死。而许多支持“支派”的军队干部则得到提拔、重用。刘显模由徐州军分区副政委升任政委，吕文俊由68军司令部处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当地两派群众组织中，“踢派”和所谓“假支派”头头悉数在“清队”和“清查516”期间遭到清洗，杨正祥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徐峰、杨卫东等人被迫害致死。而对涉及炸桥破路事件的“淮海831”一些头头的调查处理最后不了了之。

8月9日，江青就当时文艺工作和普及样板戏问题致信林彪，要求林彪把她的信和她与姚文元合作搞的两个材料批发全国。随信附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对鲁迅《答徐懋庸》等几篇文章的《批注》，一个是对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的《评注》。江青在信中说，鲁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识破周扬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叶群从会场抱回这包材料，对“林办”秘书说：

“这是个大难题呀！你们谁去给首长讲讲啊？刚才11楼叮嘱我，一定要首长支持她，可首长为她那句话气还没消呢，怎么会给她批呢？我真担心首长会把她顶回去。”

叶群说的“首长为她那句话”是指江青对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的批语。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大半年了，看来林彪还没有忘。所以，秘书们平时谁都不愿意报江青的文件，此时，开始谁也没吱声。最后，还是于运深把“难题”接了过去。

据后来于运深说，他给林彪讲时，林彪接过材料看了一眼便扔在地毯上，气愤地说：“纯粹是假马克思主义。我是管打仗的，不要理睬她！”

江青的材料被扣压下来。这一点叶群预料到了，但她不愿意林彪得罪江青。第二天，叶群叫保密员李根清拿着材料去见她，对他说：

“这个材料不能压在咱们这儿，刚才11楼还来电话问

首长批了没有？要首长快点批。人家两个人搞了几个月，拿它当宝贝，怎么可以不理睬呢？”

叶群指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说：“这不，（江青）还等着我回电话呢！”

叶群靠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抬起身对李根清说：“小李，这样吧，还是你替首长批几个字吧，就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李根清觉得叶群这个主意很聪明，既没有硬顶江青，也没有直接把球踢给毛泽东，是替林彪化解了一个难题，于是在叶群面前替林彪划了圈，然后批上了叶群交待的那句话。

政治局会议讨论那天，叶群故意躲着没有出席。据吴法宪回忆，那天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坚持下发展全国，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多数成员都不同意，未予通过。江青等人仍坚持下发展，周恩来发了脾气，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展，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展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

最后，周恩来把材料报送给了毛泽东，被毛泽东扣压。

8月10日，河北省保定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

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多万人参加，北京军区、38军和保定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6国时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论，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6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

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

陈毅等四位老师比较研究了尼克松访问6国后，美、苏两国领导人的讲话。

叶剑英认为：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而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5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实施“两个放宽”政策，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而压

苏联。

聂荣臻说：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半个月前反华的调子还那么凶，现在却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

徐向前接着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

陈毅谈到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在 6 月 17 日给周恩来信中提到的中美 20 年来的关系，感慨万千的说：“‘20 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他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四位老帅提出：“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今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

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

他们认为：“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以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 135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 1968 年 5 月 28 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八岔岛事件后，苏联在伯力组织示威游行，当时正在伯力参加“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的中国代表团打电报要求回国。他们未带密码，周恩来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8 月 11 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对此，四位老师讨论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

然而，四位老师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又出现重大变化：8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

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1969年4月，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发电报，特别说明毛泽东的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龙书金签名后，便将电报放进了文件柜，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新疆军区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纷至沓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未请示中央即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8月10日，新疆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怀疑苏军有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哨所的几位负责人：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放置一旁，没有答复。当晚，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巴克图哨所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在裴映章副站长带领下按计划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两名电影厂摄影师——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李连祥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温炳林，及新华社摄影部记者王一兵也跟随在巡逻队伍中。

由于8月10日，铁列克堤边防站一名战士去邻区办事被苏军偷袭牺牲。为预防万一，12日午夜24时，中方在易遭敌袭击的巡逻地段中方一侧预设了掩护阵地。13日凌晨近5时，苏军的直升机开始在中方预伏地段上空低空盘旋……

苏联扎拉纳什科利哨所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间的“石头山口”地段，有一条中苏边防军都会经过的巡逻便道，它蜿蜒在诸多小山冈之间，沿途有三个高地，分别是“左高地”、“石头高地”和“右高地”，中苏对这几个山冈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

13日这天，当铁列克堤边防站巡逻分队行至此处时，遭遇苏军的指挥车、装甲车、卡车多辆，步兵数十人，正向676.5高地西侧的无名高地开进。苏军突然开枪射击，打伤中方两名战士。

巡逻分队派两名战士把受伤战士背回，随后立即进入无名高地，与预伏在那里的掩护组汇合，进入战斗位置。

中方打了几发点射提出抗议，苏方又打伤中方两名战士。中方在无名高地，以及后侧的几个高地上的掩护组，开枪还击。但此时苏军人数众多，出动了十几辆装甲车及 T-62 坦克，步兵 300 余人，在两架直升机助战下，猛烈轰击中方阵地。而中方巡逻队仅有一挺 56 式班用机枪和一具 40 火箭筒，三支 56 式冲锋枪，战士们配备的是 56 式半自动步枪，还有一些手榴弹，都是轻武器。在光秃的小山顶上，既无工事掩体也无草木遮挡伪装，完全暴露在苏军火力之下。空旷戈壁滩变成了的屠场。苏军在敲掉中方的机枪火力后，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一个个接近中方剩余的官兵，近距离开枪射击。最后的战斗随着中方最后一名身负重伤的战士拉响手榴弹而结束。中方除记者温炳林和战士袁国孝被俘外，其余全部牺牲。无名高地被苏军占领。

掩护分队和无名高地之间有 800 米开阔地，在苏军的重火器封锁下，根本过不去，只能眼看着无名高地上的战友们战斗到最后一刻。记者温炳林在敌人上来之前抽出胶卷曝光，砸坏照相机和摄影机，与被炮弹震昏过去的袁国孝一起被俘。后来在交还俘虏时，只有袁国孝一人。苏方说，温炳林企图逃跑被击毙。

中方掩护分队也有伤亡。整个战斗牺牲人数为 28 人，包括三名记者。他们也在最后的时候砸碎了机器，报废了胶片，捡起周围牺牲战士的冲锋枪和苏军打到最后。

等到中国陆军第 8 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 60 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他们看到的只有牺牲的中国军人尸体，有些遗体已被烧成了黑炭。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中国政府在 8 月 13 日事发当天即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半个月后，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乌鲁木齐。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汇报时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有电话记录可以作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却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铁列克提战斗的战场，那座无名高地，自 8.13 战斗后一直由苏联、后由哈萨克斯坦控制，2003 年中哈勘界划归中方。2008 年 5 月，为永远铭记烈士们的业绩，新疆军区决定，在当年的无名高地阵地，建立烈士纪念碑，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

2008 年 8 月 13 日，在烈士们牺牲的周年忌日，由塔城军分区司令员王国义带队，和铁列克提边防站的全体指战员一起，进行了铁列克提忠勇山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主体由褐色花岗岩构成，正面是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朱锦林题字：“忠勇山烈士纪念碑”。背面是塔城军分区署名的简要战斗经过：

群山峻岭，云水萧萧，卫国壮士，英魂永驻。1969 年 8 月 13 日，我铁列克提边防站官兵奉命执行巡逻任务。9 时 40 分许，行至此地，突遭苏军伏击。敌三百余名在坦克飞机和重型火器的绵密掩护下，悍然向我发起进攻。面对三倍于我的入侵者，我巡逻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展开殊死反击。8 名官兵强忍断臂、断腿的剧痛，向来犯之敌顽强扫射，掩护分队 6 名官兵在我巡逻分队被敌人火力层层压住的情况下，毅然向着西南方向敌人主力扑去，激烈厮杀，持续五个

半小时，战斗于当日 15 时 39 分结束。此次战斗，我官兵、尤其是巡逻小分队 19 名官兵、3 名随军记者，视死如归，表现出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28 名遇难烈士中，13 人刚刚或不满 18 岁，其悲壮惨烈，撼天动地、可歌可泣。值此新界勘定，昔日战场高扬我国旗、军旗之时，为慰忠魂，更为世代激励后人，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塔城军分区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三日

纪念碑后的忠勇山上，一面用紫红色花岗岩石块堆成的五星红旗格外夺目。国旗两边的大字让人看的心跳：“慷慨赴死，为国捐躯”！

纪念碑右后方的山梁上，一块巨石上刻着红色大字：“忠勇山”。



边界巡逻路去忠勇山的岔路口



第 1099 回：形势紧，核大战一触即发

八二八，中共中央发《命令》

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将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

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

8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送毛泽东等审阅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其中指出，“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

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

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

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胡涂观念。

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

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

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个指示的署名由“军委办事组”改为“中央军委”，并写了批语：“用军委名义发。”

8月19日，中国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照会，强烈抗议苏军6、7两月在中苏边境蓄意制造挑衅行为。照会说：从6月1日起至7月31日，苏联政府制造的边境挑衅事件竟达429起之多，严重的有：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构筑工事、修筑了望台，架设军用电话线路，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7月31日出动直升飞机、军用车辆和近百名军人侵入中国新疆托里县禾角克地区，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饶河县

七里沁地区、呼玛县吴八老岛地区，用轻重机枪、重炮向我边防人员射击。苏联各种军用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达 40 架次之多，还不断出动炮艇，向正常航行的中国民用船只进行种种挑衅。照会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入侵挑衅行动，立即全部撤除非法修建的设施和工事，不再阻扰中国船只在中苏国境河流的正常航行。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 27 军急调石家庄地区接替原驻防石家庄地区的 63 军，与驻守在张家口的第 65 军形成拱卫太行山筑垒的犄角之势，组成首都北面的屏障。63 军调防太原，作为大同地区 69 军的第二梯队，共同组成山西的防御。保障太行筑垒的左翼安全。太行山的右翼是燕山承德地区，原来属于后方，无野战军的一兵一卒。二战末期，苏联远东军的一支快速纵队就是从蒙古经承德、赤峰进入沈阳，一路上除了快速挺进，几乎没有战事，如入无人之地。毛泽东说：“在承德放一个军，我就放心了。”于是，原驻守唐山地区负责渤海湾抗登陆防务的 24 军调防承德地区，负责华北战区与东北战区结合部的安全。并根据林彪的指示，立即在燕山地区紧急修筑燕山壁垒，与太行壁垒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拱卫京畿安全。

8 月 20 日，中央军委命令：“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为了防止苏修突然袭击，加强张家口地区

的兵力部署，决定调 27 军进驻宣化、张家口地区，归北京军区指挥，协同 65 军在张家口地区现有部队，担任阻止敌人沿二连、张家口方向向北京突然袭击的任务”。

8 月 22 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加强全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

9 月 8 日，27 军军部率第 79、80 师全部到达宣化、张家口地区。第 81 师奉命暂留镇江，后于同年 11 月调防至河北邯郸地区待命。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 月 18 日外电报道，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官员曾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

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

第二天一早，当基辛格来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

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经过紧急磋商，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全球。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 20 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非但不会被中国相信，反而会以为美国是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尼克松说：“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 月底，中国情报机关也获得比较准确的消息：苏联军方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

8 月 27 日，经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 8 月 8 日《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议，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军委办事组负责人并吸收军队和地方有关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人组成。在领导小组之下，在总参谋部设立精干的办事机构，

根据领导小组的意图，对全国人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

《报告》对各省、市、自治区，省（自治区）、地辖大中城市以至各大中厂矿、企业人防领导小组的建立、健全亦提出具体意见。

《报告》规定人防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拟制对空防御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人口疏散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等队伍。报告建议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任组长，永胜、富治、法宪、仲川同志任副组长”。

8月27日这天，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这个“防空洞”在全国各地不停的挖呀挖，一直挖到1974年邓小平上台不久才停止。

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突然袭击，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毛泽东批示：“照办。”

《命令》要求边疆军民，尤其是担负着直接的责任，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命令》要求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命令》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命令》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对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命令》指出：“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

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723 布告》和《828 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

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在当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大都是些“活学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样板戏”、“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内容。

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

8月28日这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攻击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文章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同样是在 8 月 28 日这天，《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8 月 3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航空、电讯、常规兵器工业 3 个领导小组和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

《828 命令》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报刊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进行战争准备。国内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也一度出现“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9 月 3 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纸、电台上的打仗宣传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

9 月 4 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据此，各大军区机关进行精简整编，统一设司令部、政治部、

后勤部。

9月5日，军委分别批复海军7月2日和空军6月22日请示，同意所报直属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海、空军机关进行精简整编。海军直属机关由原来6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人员比原编制数减少50.1%，空军直属机关由原来11个部合并精简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比原编人数减少45.3%。

针对国际形势出现新情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又聚在一起进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一、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二、中央8月28日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是否可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

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

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

外交部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反革命两手既定方针，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是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我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毅表示理解：“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第 1100 回：四川省，各地、县仍有武斗

决心大，组织联合工作组

1968 年 10 月以后，四川全省也发动了“反复旧”运动。这一运动从 1969 年 2 月到 4 月达到高潮，6 月以后才逐步收场，却使四川生产又发生了一次反复。尤其在西昌、达县、江津地区，成昆（北段）、宜珙铁路及公路建设工地，永荣、广旺、芙蓉等煤矿以及电力系统，出现了较严重的反复。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成都市 1969 年的工业产值因受“反复旧”运动的影响，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 11.2%。期间，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的棉纱日产量由原来的 46 吨下降到 4 吨；棉布日产量由 21 万米下降到 8000 米。成都无缝钢管厂 216 毫米轧管工程的建设，原定 1969 年 5 月 1 日以前建成投产，由于“反复旧”，工程投产日期推迟了半年多。

而且，四川全省的局势仍然动乱不止，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虽有所收敛、减弱，但仍迟迟未得到平息，流血事件时有所发生。从地域上讲，川东盛于川西；从规模上看，由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逐渐转入地区和县城，甚至有些地、县的区、乡基层。

1969 年 7 月 7 日至 8 日，重庆万县地区开县两派分别抢夺了县人民武装部和县警备中队的枪支弹药，并于 21 日、26 日再次发生武斗，死 6 人，伤 60 人。

7月13日，涪陵地区垫江县“勤务站”一派8300人组成“万人上京告状团”，要求中央承认其为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经长寿乘船于当天上午到达重庆，进占重庆火车站内重庆—北京特快列车，造成20次特快列车停运18天，7月17日重庆站发出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一天。重庆站收入损失60万元，还毁坏了铁路车辆、电器设备，毁坏、丢失卧具，抢走食品等各项损失共计63万余元。

7月23日，中央针对山西武斗发出了《723布告》，提出了明令禁止的八条规定。为此，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决定乘贯彻中央文件的东风，由军地双方联合组成工作组，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当时动乱最为严重的川东永川、江津地区，指导和协助当地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与支左部队，采取有力措施，贯彻中央《723布告》，彻底平息两派武斗，撤除各自控制的据点，动员和组织群众返回原单位和地区，促进革命大联合和四川最后一个地区——江津地区革委会的成立，尽快结束当时四川全省动乱不止的局面。

7月31日，四川驻泸部队2300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723布告》。接着，先后派出宣传队1886个，共5400人次，宣传中央指示；举办学习班32期，集训武斗人员1000余人；收缴各种枪1407支、炮17门、枪弹12万发、人民币10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至8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

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8月11日，由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王诚汉、副政委谢家祥，和四川省革委会两位副主任张西挺、王恒霖带领军地双方机关工作人员联合组成的工作组，乘26次专列到达重庆。第二天听取重庆军地双方领导的汇报，分析情况，研究措施。第三天，在驻军机关会议室召开重庆地区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联系实际，宣讲贯彻中央《723布告》的重要意义，表达坚决落实的决心。至8月14日，联合工作组分工梁兴初司令员坐镇重庆指挥，其余大部分人员由军地领导王诚汉副司令员、谢家祥副政委和张西挺、王恒霖两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带领，分乘从成都带来的汽车前往永川、江津地区。王恒霖是成都工人组织“红卫东”的负责人。

当时，因紧邻地处长江南岸江津市西北的永川县有成渝铁路相连，交通较为方便，所以江津地区的党政机关和支左部队的办公室都设在永川县，因而联合工作组便住宿在位于永川县的江津军分区。

时处8月，川东的永川酷热难耐，但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住宿营房的大宿舍，睡通铺，按照连队的生活制度作息。

联合工作组到达永川的当天下午，便立即在军分区的大会议室里，召开当地两大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会议，宣讲《723布告》，表示坚决贯彻落实的决心和信心。其争分夺秒的姿态和斩钉截铁的表态，当即给人以雷厉风行、坚决果断

的强烈印象，使到会的党政领导、支左部队的干部、以及两大派的代表，都产生出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受到一些震动，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私下悄悄地说：“这样一个阵势，如此坚决的态度，这回，恐怕是要来真格的了！”

永川、江津地区有“红旗派”和“工农派”两大派，主要分歧在于对刘、张的问题和对部队支左的看法不同。在武斗争夺激烈时，由于在永川、江津城区“工农派”势力较大，“红旗派”观点中的骨干组织成员便纷纷撤离永川、江津城区，转移至同派观点势力较强的地域——大足和内江等地，准备稍示休整，储蓄力量，伺机“杀回永川和江津的老家”。

7月底，转移至大足、内江的“红旗派”头头，在内江市秘密召开会议，商讨“打回老家去”的问题。大家在会议上，情绪激昂，心怀不满，纷纷说：“我们背井离乡，在外已好几个月了，再不‘杀’回去，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地区革委会就要成立了，我们不打回去，人家可能会把我们搞忘了！”“权！权！权！命相连！造反不夺权，等于白球干！我们还等待到何时！”会上众口一词：“不容再等待，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抢夺枪支弹药，重整武斗队伍，杀回老家去！”

他们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立即组织武斗人员，抢夺内江军分区武器储备仓库的枪支弹药。

内江军分区当时大都倾向支持“红旗派”，当他们察觉

“红旗派”有抢夺枪支的企图时，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而是听之任之。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红旗派”组织数百名精干的武斗队员，在左手臂上系着白毛巾为标志，开着十余辆卡车，分别在驻军几个武器储备仓库动手。

他们几乎都是派出比警卫人员多4、5倍的武斗队员，猛地冲过去，将警卫战士包围起来，使他们无法施展拦阻的行动。然后，由其余的人员，迅速冲进仓库，将枪支弹药抢夺出来，互相传递着搬上卡车。“任务”完后，临走时，还要对天鸣放一阵密集的枪声，表示在抢夺武器之时，还与部队警卫战士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故作姿态，掩人耳目。

这次行动，加之先后的零星抢夺，“红旗派”组织，共夺得枪支一万余支。然后。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各组织武斗专业队，统一向由“红旗派”控制的大足县城集中，准备由北向南“打”回老家去。

一时间，大足县城聚集了几千名“红旗派”观点的群众，中、小学校，单位招待所，甚至机关的办公大楼，都是住得满满的。大足县城最繁华之地，本只一条街，现在这条街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有饭店全部营业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食用，大部分都还得在中、小学校，自己组织开伙。

正在这时，《723布告》传到永川、江津等地区，尽管大足县城区为“红旗派”一派势力所控制，另一派被迫转移至

离县城以南 33 公里处的邮亭铺聚集，但县革委会和在当地担任支左任务的某空军部队，仍然要大力宣传、贯彻《723 布告》。街头上贴出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大标语，宣传车也在街道上巡行，不断播送《723 布告》的全文。

当地“红旗派”组织的头目，已结合进县革委会当领导的，面对这种情况，也有点坐不住了，立即主动与永川、江津等地“红旗派”组织的头目们商量对策。他们提出：“恐怕根据现在这个形势，中央发布了《723 布告》，话说得非常‘硬扎’，把‘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抄、抓’，看作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破坏罪行’，要求‘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撤出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你们原先从北向南打回老家的计划，是不是应该相应地作些改变？”

外地“红旗派”组织的头目们频频点头：“是啊，说得有理，看这次中央发表的布告，措词非常严厉，提出如果‘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想必是真下决心，动真格的啦！”“这次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决心也很大，梁兴初司令员、王诚汉副司令员、谢家祥副政委和省革委会张西挺、王恒霖两位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坐着专列到了重庆。梁司令员坐镇重庆，其他的领导已带领工作组到了永川，协助重庆和江津地区贯彻中央的《七·二三布

告》。”

“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们不能硬着头皮往枪口上碰，被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抓了典型，使自己造成无谓的损失，我们是得认真考虑一下原先的行动计划。”

永川、江津地区转移至内江等地区的“红旗派”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些解辩的理由和行动的对策：我们在内江抢夺军分区的大量枪支弹药，那是在《723布告》公布之前的行动，不知者不为过，不该属于从严追究的范围。何况，

“红旗派”组织的群众，几个月之内，遭对方用武力“镇压”，被赶出了家门，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一后果，应由对方负责，“红旗派”并不愿意这样做。如今，“红旗派”返回老家，是按《723布告》上公布的“已离开的群众，限一月之内返回”的规定去做的，返回时，为避免继续遭受对方的“镇压”、“袭击”，夺取一些武器自卫，应该说情有可原，可以原谅。

他们还决定：改变原先计划的大规模武装“打”回去的做法，为分散的小规模的“武装护送”；对于“红旗派”被对方“镇压”、驱赶出来的乡镇，如今仍被对方武装守卫的，可视条件，采取“武装攻打”的军事行动，以示对“工农派”进行报复和惩罚；对现在已“掌握”在手的枪支弹药，暂不要按《723布告》的要求执行，待完成“杀回老家去”的行动之后，再视对方执行的情况，逐步上交。

聚集在大足县城的“红旗派”各武斗队，按照头头们商定的方案，先后离开大足，返回各自的地区。一路上，仍有一些区、乡发生了两派互相枪击的事件，也有“红旗派”群众遭“工农派”武斗队的埋伏，造成了一些人员伤亡。

8月14日，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领导率领联合工作组来到永川贯彻《723布告》，一开始就抓紧做当地两派头目的工作，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撤出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为外出的“红旗派”群众创造返城的条件。如果，在整个江津地区，永川县城就在工作组的眼皮底下，这些要求都不能做到，那在全区贯彻中央颁布的《723布告》，也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连工作组也会威信扫地。

在地、县支左办公室和县革委会的协同下，工作组反复对两大派做消除对立、解除封锁的工作。起初，两大派头头根本坐不到一起开会商讨问题，一发言就互相指责，把武斗的责任干干净净地推给对方，声声都说对方是制造“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经过反复做工作后，双方的情绪才有所缓和，继而重申，从现在起，大家都要以中央的号令为准绳，都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如再有违反，都将一视同仁，绳之以法。并规定，从今之后，两大派都不准再张贴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在组织“红旗派”离开本单位的群众返城时，“工农派”不能有任何形式的阻拦，要热情地欢迎

他们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红旗派”各组织按照在大足头头们做出的决定，对所控制的枪支弹药迟迟不上交，尽管支左的部队开着宣传车在各县、区、乡巡回宣传，深入各武斗据点开展思想工作，“红旗派”方面的收获仍然微乎其微，至联合工作组到永川近 10 天，县支左办公室的统计，永川地区的“工农派”已向支左驻军上交各种枪支 700 多支，而“红旗派”还不到十分之一，只有 60 多支。张西挺见此情况十分着急，便私下在永川单独接见了“红旗派”的代表，用似乎很关心的语气对他们说：

“你们的处境我完全理解，被别人用枪杆子打出去，离乡背井的，困难一定很多。但你们想一想，现在‘工农派’组织上交的枪支，比你们多过 10 倍，这样下去，叫我们怎样在支左部队和‘工农派’面前为你们说话，为你们争得应有的权利！你们可以考虑一种变通的方式，一面迅速返城，一面上交武器，用实际行动表明你们在执行中央的《723 布告》。”事后，她又专门派工作人员私下再去做“红旗派”组织头头的“思想工作”。

第 1101 回：“工农派”，永川、花果山施暴

“红旗派”，武装攻打何埂镇

8 月 21 日，永川的“红旗派”开始返城。为了壮大自己返城的声势，特地组织当天的返城人员和部分留守城区的人员，举行了一个上千人的“示威游行”，计划在游行之后，外出人员再各自分散返回本单位。

游行队伍高举着数十面红旗为前导，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紧随其后，不时播放出“红旗派”紧跟中央返城闹革命的严正声明：“强烈地正告一小撮阶级敌人，我‘红旗派’是打不散、压不垮的。为了坚持革命的原则性，我们被迫离开了县城，如今我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返城回单位，更是响当当的革命行为！”

宣传车之后，列队行进着“红旗派”组织的群众，走在最前面的人，高举着“红旗派”组织的队旗，格外醒目。后面的群众，人人都臂戴红色袖套，手里打着三角的彩色小旗，上书“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等字样，一路呼喊着响亮的口号。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出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长，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对组织这种“示威游行”，地、县支左办公室从安全着想，曾在事先极力劝阻，但“红旗派”组织的头目坚决不答

应，他们认为：“我们是被他们武装‘镇压’打跑的，现在，中央的‘七·二三’布告为我们撑腰，我们就是要理直壮地、浩浩荡荡地走回来！”

“红旗派”的游行队伍逶迤地行进在大街上，街道两旁站满观看的群众，不少人还站在楼上凉台或倚窗眺望。这种多少带有一点显示力量的“示威游行”，无疑对“工农派”的情绪有所刺激，增强反感，随时都可能引起对立，发生冲突。

果然，正当游行的队伍的前导人群走至“工农派”的“农总部”大门口时，不知从何处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好击中站在“农总部”楼上倚窗观看的一个人头部，当即倒毙在楼板上，楼上的人随即高喊：“有人开枪，打死人啦！”接着，从“农总部”里，奔跑出一伙人，直往游行的队伍中乱冲，高喊：“快抓凶手！快抓凶手！”

游行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红旗派”的群众纷纷向街道两旁闪开，躲避可能再打过来的冷枪。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激动地呼喊：“‘红旗派’的战友们，大家不要乱跑，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制造混乱！”

尽管如此，大家的心情都产生了惶恐，生怕再酿成更大的流血事件。“红旗派”的头头们，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意外的事件，当即做出决定：改集体的“示威游行”为分散小股的游行，然后各自返回本单位。

游行队伍当即在“农总部”门前分散，有的继续往前走，有的转身往回走，也有的拐弯走进了小巷，大家都不愿再在这“是非之地”多停留。

谁料，中午12点多钟，有一个单位的“红旗派”20多名群众，因天气炎热，聚集在一个饭店里喝水。突然，从饭店的后窗外扔进来一枚手榴弹，“轰隆”一声，在厅堂里爆炸，正在喝水的“红旗派”群众，当场就有4人倒在血泊中呻吟，有的炸伤了头部和脸部，有的炸伤了胸部和臂膀，鲜血流淌，疼痛难忍。要不是餐厅里有许多桌椅板凳阻拦，可能还会炸伤更多的人。在场的人，有的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动作快的，一个箭步冲到了街上。大家惊魂不定，回过神来，便赶快去扶救负伤的人。也有的人跑至后窗去搜索，只见后窗紧靠一条小河沟，河沟的对面是一片菜地，连一个人影也不见，显然是凶手已经逃跑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找来竹凉板床，把受伤的人抬着送往医院抢救。

消息迅速传至“红旗派”的总部，头头们愤怒已极，立即派人到支左办公室和工作组的住地——江津军分区，强烈要求省革委和成都军区联合工作组、地区支左办公室的领导，责成有关部门彻底追查、严惩凶手。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要想马上调查出肇事者，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据推测，十之八九，应是“工农派”所为，工作组和支左办公室只能从这方面去作“工农派”的工作，

正告他们不能再有这种破坏贯彻《723 布告》的流血事件的发生。当晚，联合工作组的四位领导立即集体召见两派头头开会，极其严肃地指出 8 月 21 日在永川城区连续发生的流血事件，都是破坏、阻挠中央《723 布告》贯彻执行的恶烈行为，一定要彻底清查幕后的策划者和肇事凶手！并表示：“不论阻力有多大，也不论破坏的行为有多厉害，都不能干扰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723 布告》的决心和部署！”

第二天上午，永川城东十几公里处的石庙区花果山煤矿，又传来了 21 日下午，“工农派”武斗人员将“红旗派”返城人员活活殴打致死的事件。

原来，8 月 21 日，在县城参加完“示威游行”的原石庙区大安镇和煤矿地区“红旗派”群众，集体返回至大安镇区机关所在地后，已是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饭。谁料，正在这时，闯进来一伙荷枪实弹的花果山煤矿“工农派”武斗队员，将“红旗派”人员团团围住，抓出其中“红旗派”的头头和骨干近十人，押解至花果山煤矿“工农派”总部进行“审讯”，追问他们撤离石庙区和煤矿后，在外面干了哪些“勾当”？如今返回本单位，又准备采取哪些行动？

“红旗派”组织的人员不服，“审讯者”暴跳如雷，除拳脚相加外，有的还用小刀首和三棱小尖刀，一边“审问”，一边捅向其中一些人的腿部和臀部，造成殴打致死的事件发生。

有一位区粮站的副站长殷希，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干部，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即被称作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审讯”中，被捅伤十余处，痛昏倒地，被“工农派”用卡车拉到10多公里外的璧山县界，丢弃在前不靠村，后不挨店的田野公路旁。至第二天拂晓被人发现时，殷希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又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得知此消息，联合工作组的领导都异常气愤，当即做出指示：尽快进一步弄清情况，一定要追究责任，严惩不贷！

22日下午14时左右，调查组按照领导的意见，立即前往花果山煤矿调查了解情况。正待出发时，突然看到在永川县人民医院工作的成都军区宣传部的一位干部的爱人杨恭洁，心急火燎地赶至工作组住地，急切地反映说：花果山煤矿被害人殷希的爱人刘玉荣，是他们医院的护士，与石庙区和煤矿“红旗派”的一些人连夜逃出，现已来到了县人民医院。其中还有一名受伤的人员在救治，盼望调查组能马上前去调查了解情况。

杨恭洁是永川县人民医院“红旗派”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是当地“红旗派”组织的骨干。闻听此情况，调查组立即和杨恭洁一道赶至医院。

从石庙区和花果山煤矿逃出的20多位“红旗派”群众，当时聚集在一间较大的病房内，其中确有一名负伤人员躺在病床上，已经过医护人员救治，受害人殷希的爱人刘玉荣也

在其中。经过详细询问、了解，调查组得知，当时在审讯中，被殴打致死的还有区税务所的一名干部陈光大，因在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就以此为由，遭到武斗队员殴打重伤致死。这 20 多人，个个面露惶恐，心有余悸，有的还流出了眼泪，纷纷诉说着，石庙区和煤矿如今全被“工农派”武斗队员荷枪实弹地把守。“红旗派”返城群众纷纷连夜外逃躲避。他们强烈要求工作组和支左部队，能为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查清真相，严惩凶手。并为他们创造平安返回本单位的良好环境。

江津军分区听到汇报后，当即决定立即召开两大派头头和骨干的会议，通报花果山煤矿发生流血事件的严重情况，严肃指出这一事件是严重破坏阻挠中央《723 布告》贯彻落实的“反动行为”。第二天，23 日，他们又进行磋商，认为花果山煤矿地处山区，位临城郊，与紧邻的石庙区大安镇一带，均为“工农派”所控制的地区，其武斗队员多为身强力壮的矿工，拥有的枪支弹药也较多，是“工农派”驰援城区，参与武斗的重要武斗据点。应趁此发生流血事件的机会，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收缴“工农派”的一切武器装备，撤除武斗据点。他们经过请示，于 8 月 24 日，在对外不露一点风声的情况下，从就近驻璧山部队调出一个连，会同县支左领导小组，武装进驻花果山煤矿，开展强行贯彻执行《723 布告》的行动。

8月25日，调查组的王参谋和永川县公、检、法军管会的人也赶至花果山煤矿。只见这座煤矿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山坳里，山高林密，山脚前的广场边，一条公路从西向东通过，矿部办公室和矿工宿舍分布在山腰和山脚。从军事角度看，其地形极有利于隐蔽和守卫。据了解，部队进驻煤矿时，“工农派”的武斗队已聚集至山顶据守。由于任务特殊，情况异常，连队进驻煤矿后，战士都是枪不离身，子弹上膛，丝毫不敢怠慢。谁料，有一名新战士，由于情绪过于紧张，当晚不慎发生枪走火自伤致死。

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煤矿，使“工农派”大感意外，武斗队很快土崩瓦解，各自解散，武斗据点立即撤除，所有武器如数上交。

8月28日，中央发布加强战备的《828命令》，迅速在全川公布，四处张贴。“红旗派”的头头们觉得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严峻，“武装”返城的行动，必须抓紧进行，不然越往后，会越被动，对过去“工农派”组织的“一箭之仇”，就会再无机会再报了。

在永川城南28公里处，有一个临江镇，这里是“红旗派”控制区，镇上“工农派”群众，都在几场武斗较量后，撤离到临江镇东南31公里的何埂镇，那里“红旗派”的群众，则纷纷撤离何埂镇，少部分人留在临江镇，大部分人都随总部行动，远去内江等地。如今，他们参与了在内江军分

区抢夺武器的行动，在大足稍示休整，按照“红旗派”头头们商定的计划，正悄悄地绕过永川县城，到达临江镇，准备在临江镇“红旗派”的协助下，武装攻打何埂。

8月29日夜，星光朦胧，气候闷热，暴晒一天的土地蒸发出股股热浪。“红旗派”不少武斗队员都是农民，他们赤身着短裤，赤膊上阵，都在光着的左臂上系一条白毛巾为记，兵分两路。一路由临江，沿铁路，经水碾，从东北方向进攻何埂，一路沿公路，从西北方向，直插攻击何埂。

8月30日凌晨2时左右，约定的信号弹在天空划着弧线，各响三声后，“噼噼叭叭”的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的枪声便连成一片，响彻何埂上空。

何埂镇面对临江镇的东北西三方，“工农派”都修筑有防御的工事，公路上用沙袋垒砌，建有暗堡，临近镇郊的大楼，都作为武斗时的“碉堡”使用。当“红旗派”发起攻击后，“工农派”立即组织火力予以还击。双方展开了真枪实弹的攻防战。

其实，“工农派”对这次“红旗派”攻打何埂镇的行动早已得知了消息。他们考虑到这次返城的“红旗派”在内江抢夺枪支弹药，装备得到极大的补充，又得到临江镇和外地一些“红旗派”的支持，势力比自己强大，如果硬与对方拼，必然会造成较大的损失，不如暂时避其锋芒，组织骨干有生力量向南撤离，如“红旗派”组织穷追不舍，就沿长江下游，

向江津方向撤退。因此，他们在前沿阵地组织强烈的火力还击时，位于镇上的总部和大部分人员，已悄悄地走上了南撤长江岸边朱杨镇等地的道路。不少“工农派”组织骨干成员的家属，惧怕“红旗派”打回老家后对他们采取惩罚行为，也不声不响地背着简单的行李，抱着小孩，尾随南撤的队伍一起上路。

枪声响了半个小时左右，“工农派”的枪声突然停了，只见何埂全镇一片漆黑，没有一点亮光，也没有喧哗，非常的安静。“红旗派”不知就里，一时还不敢贸然深入，怕中了“工农派”的埋伏。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先派出少量武斗队员，潜入镇上进行“侦察”。

“侦察”的结果得知，“工农派”的总部和武斗队员在一阵猛烈还击后，已利用他们熟悉当地地理环境、道路交通的优势，南撤了，留下了何埂镇的一座“空城”。

“红旗派”不敢南追，怕在黑夜里中了计谋，憋着一肚子的怨气，进镇后，首先直捣“工农派”的总部，见到什么就砸什么，桌椅板凳，宣传用的广播喇叭，都被他们砸得稀巴烂。悬挂的标语、大字报，也被撕碎，扔了一地。满屋一片狼籍。

当地“红旗派”成员知道“工农派”头头的家在哪里，有的竟怀着满腔的“仇恨”，荷枪实弹地冲进个别头头家中去算账。但是当他们三脚两拳，将大门打开，蜂拥般地闯进

屋里，里面已空无一人。人们只能抡起枪托，把家中的一些坛坛罐罐砸烂，以解心头之恨。也有当地的一些群众，看不过他们这种胡乱打砸的行为，出面进行劝阻，但却被这些打红了眼的“红旗派”组织的武斗队员，报之以斥骂，或举起枪托，挥起拳头打伤。“红旗派”的武斗队员们，满怀“复仇”的情绪和“胜利”的喜悦，在乡镇的街头上直闹到天明，然后才“班师”返回了临江镇。

“红旗派”组织武装攻打何埂镇的消息，迅速传到永川，“工农派”总部立即向部队地、县支左办公室告急，并在大街小巷散发“控诉‘红旗派’血腥镇压‘工农派’战士的罪行”的传单，贴出醒目的大标语：“强烈要求严惩武装攻打何埂的凶手！”“‘红旗派’不执行‘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就是炮打中央！”

联合工作组的领导看到“红旗派”组织武装攻打何埂的报告后，十分不满地指示地、县支左办公室，马上与“红旗派”总部的头头谈话，指出这一武装攻打的事件，虽未看到有人员死亡的报告，但发生在中央发布《723布告》《828命令》之后，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立即停止对另一派的攻击。外出人员返城，绝对不允许再采取武装攻打的行为，否则，部队将按《723布告》的规定办事，“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与此同时，工作组立即将这一严重事件的情况向坐镇重庆的梁司令员和省革委会与成都军区写出报告，把

“红旗派”组织的武装攻打，定性为“反革命武装攻打”。并慎重地在召集两派头头和骨干参加的会议上，严正地进行宣告。

张西挺看到这个报告的草稿时，曾私下不满地对省革委参加起草报告的工作人员说：“应该把‘反革命武装攻打’，改为‘反革命武斗’，这样进攻和防御，也都包括在内了！”这位工作人员觉得她这种说法不妥，便向她进言：“这件事，本来就是‘红旗派’组织武装攻打，进攻一方要负主要责任，当然武装阻击也不对，但如提为‘反革命武斗’，半斤八两，显然倾向性太明显，会在群众中造成不满。”对此，张西挺也觉有理，没有再说什么。

事后，按工作组领导的指示，县支左办公室趁此武装攻打事件的发生，带领少量部队前往临江镇，强制贯彻执行《723布告》和《828命令》，勒令“红旗派”马上撤除武斗据点，解散武斗队，并当即收缴他们的枪支弹药，消除以后再发生武斗的后患。对在临江镇上滞留的何埂镇“红旗派”外出的群众，提出可视情况，尽快各自返回何埂镇，抓革命，促生产。

第 1102 回：谣言传，朱杨、二溪人心乱

争逃离，长江上“白沙惨案”

“‘红旗派’打回何埂啦！他们搞武装镇压，我们赶快逃跑啊！”

“‘红旗派’搞报复，抓到‘工农派’的骨干，不是打就是杀！”

从何埂镇南逃到位于长江北岸朱杨镇的“工农派”群众，惊魂不定地在街头上这样夸大其词地传播着。这惊人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与朱杨镇一江之隔、位于南岸的二溪镇。

武装攻打的情景，越传越玄乎，说“红旗派”完全打红了眼，抓到“工农派”的大小头目，一律关押，审讯，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活活打死。所有“工农派”骨干成员的家，都被砸、被抄，有的还被放火烧毁，真吓人啊！

“趁早快跑啊！不然等他们晚上打到朱杨、二溪，我们就跑不脱啦！”

吓人的传说，造成人心的躁动，朱杨、二溪“工农派”的大小头目和骨干成员，连同从何埂撤来的“工农派”组织的群众和部分家属，纷纷奔向江岸，准备登船向下游江津方向逃离。

朱杨和二溪的江岸边，各只停有一只来往过渡的载人船只。两岸“工农派”的群众，争先恐后地争着登船，船头船尾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船体迅速下沉，显然

是超载了。

然而，在朱杨镇这边，仍有许多“工农派”的群体蜂拥至江边，眼看渡船已无法再载人了，只好相继拥挤在岸边的趸船上。不一会儿，趸船上也站满了人。

趸船是矩形平底船，比普通的船只高出一大截。由于自身并无动力装置，所以并非是真正意义的航船。它通常被固定在岸边，或抛锚江心，作水上浮仓或供船只泊靠的浮码头，初创于英国，获名“store ship”，即水上仓库的意思。

“要撤一起撤！把两条渡船并拢，把趸船拉走！”

用趸船载人，这显然是违反航运操作规程的事，但为了使大家都能撤离，免遭“红旗派”组织的“镇压”，此时已把是否安全的问题完全置之脑后了。

这时，已是下午 16 时左右，天空灰暗，阴云低垂，显得很闷热，预示着可能会下雨。

“工农派”的男女群众拥挤在船上，几乎没有空隙，不少人的上衣都渗出了汗水。有的实在太疲倦了，便不顾四周站立着人群，坐在甲板上，夹在人群的脚杆中打瞌睡。

还有一些家属，牵着几岁的小孩，怀抱着婴儿，更显得拥挤不堪。小孩哭闹要喝水、吃东西。不少家属央求男人们，赶快想点办法，在渡船上烧开水。但是船上的人太多，天气又闷热，开水始终供不应求，免不了有些人为争一杯水，打自己哭闹着急的小孩，或者相互之间发生争吵。这时，又有

男人们出面劝说：“现在是在逃命，大家都要发扬点风格，互相忍让一点！”

“哇啊——哇啊——”怀抱的婴儿啼哭不停，四周的群众，互相挤靠，腾出一点位置，让抱婴儿的妈妈坐在甲板上。母亲搂搂怀中的婴儿，轻轻地拍打着，口里不停地哼着“喔！喔！喔！”

两只渡船并肩拉着船体庞大的趸船，极为缓慢地向下游驶去，一来马力有限，二来是担心出事故，慢得几乎是在水上漂浮一般。

汹涌的江水，拍打着船舷，不时发出“啪打！啪打！”的声响。趸船的四周，光敞敞的，没有栏杆遮挡，虽然大都是男人们站在船边，但当船体左右摇晃，眼望着面前涌动的江水时，心里也不免有些惊吓，浑身渗出一身冷汗，大家都自然地把身体往船中心挤靠。靠近里边的人，也会伸出手来，拉着他们的肩臂往里挤。大家都默默地祈祷：“天老爷，大发慈悲，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江津！”

为了防备遇上“红旗派”人员在岸边偷袭，“工农派”的武斗队员上船后，在头头们的指挥下，荷枪实弹地站立在船头、船尾，有的还守卫在渡轮的顶篷上。趸船的四周，也都间隔分散站着武斗队员。大家都是警惕地眺望着两岸，密切注视着可能会发生的意外情况。

长江两岸乡村的男女老少，开始看到江中驶过来这么一

个“怪物”，上面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也想看个究竟。走近江边，仔细看去，发现船的四周，都站着、坐着男女群众，还有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吓得扭头就往屋里跑，生怕造成误会，引起开枪射击。

江面上很少有来往的船只，偶尔遇到一两只逆水而上的运输船，远远地望见这两只渡船拉着趸船的“怪物”，便立即鸣笛让道。船体擦肩而过时，运输船上的船员，看到“怪物”上站着武斗队员，人人荷枪实弹，心里猜想：这恐怕又是赶往那里去参加武斗的，只是默不作声地观望一会，扭头就走进船舱。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江面上的能见度也越来越低，“工农派”的头目们，担心趸船四周的群众，如果站立太久，身体疲倦，不慎挤掉到江里去，便调动少部分人挤到两只渡轮上去，然后，指挥趸船四周站立的人，尽量挤着坐下来，这样，即使打瞌睡，也不致遇到船体晃动，掉下江去。

渐渐地，天色黑下来，在船上已看不清两岸的轮廓，远处的房屋，只听见江水的哗哗声和轮船轰隆隆的马达声。不少人挤坐在甲板上，依靠在旁人的肩头上，打起瞌睡来；船舱里交头接耳的谈话声也听不见了，婴儿的啼哭声也已停止，安静地熟睡在母亲的怀中，四周显得比较平静。

慢慢地，天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让岸边发现他们的目标，船上没有开灯，完全是一片漆黑。小孩紧紧

依偎着母亲，女人拉着男人，大家都不敢随意离开一步。

晚上 22 时左右，远处的天空，突然亮出几下闪电，江面上也随之飘过几阵风。闪电越来越密，使得两岸、江面一片亮光，风也渐渐大了些。不一会，天空就细细撒撒地飘起小雨来了。天气凉爽了，对拥挤在船上的人群，反倒全身轻松了许多。

大约 23 时左右，船进入江北石门、江南白沙地段。突然，南岸白沙镇响起枪声，不时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一阵紧过一阵。有时，子弹还嗖嗖地从江面上掠过。不一会，白沙镇的上空，闪出一片火光，越来越大，映红了天边的一角，显然是有房屋被打着火了。

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枪声，船上的人全都惊醒的站立起来，武斗队员们更是手提枪支忙乱起来。头头们担心发生意外，一再喊叫：“大家保持安静，不要惊慌！”

越说不要惊慌，人们的心情越恐慌。大家生怕遭飞过来的子弹误伤，纷纷往船中心拥挤，苦了那些抱孩子的母亲，只有死坐原地不动，任凭年轻的男人们挤着从身边踩过。

特别是空敞的趸船，本来就没有动力控制船身的平稳，这时，人群拥动，船体渐渐地左右摇动起来。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也就在此时，雨也下大了，打在船顶棚上，啪啪作响。江上的风逐渐加大，涌起的波涛撞在有些摇晃的趸船船舷。

岸上的枪声更加密集了，火光映红夜空，掠过江面的子弹也多起来。趸船上的人十分惊恐，小孩呼唤着母亲，女人叫喊着男人，大家都想照顾好自己的亲人，人群来回拥动，在黑暗中乱作一团。风浪加着雨水，更加凶狠地推撞着船舷。

趸船的甲板，没有一点凹陷，完全是一抹平板，人群的拥动，再加上风浪的推力，船体开始左右晃动起来。起初还是轻微的摇晃，但当船摇向左，人群不由自主地往左倾，重心向左，再往回来，摇向右边，人群又不由自主地往右倾，重心向右，船体就比上次更为倾斜一些。就这样，左晃右晃，趸船晃动的坡度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时，两岸又同时响起一阵密如炒豆般的机关枪声，掠过江面的子弹，有的“嘶！嘶！”地落在趸船附近的江水中。趸船上的人群更为惊慌了，男人们和女人们，连同几岁的小孩子，几乎都发出了惊讶的喊叫：

“哎唷！快站不稳啦！船要翻啦！”

“快站稳脚跟，再晃下下去，人就要落水啦！”

“大家尽量保持镇静！互相抱着腰，不要再摇动！”显然这是一个头头在发号施令。

但是，不论你怎么指挥，船体晃动根本就不受人的控制，船体倾斜的坡度逐步加大。

由于趸船左右激烈的摇晃，牵引的缆绳拉扯着本也不很平稳的两只渡船左右摇晃，互相碰撞起来，随着江浪的冲击，

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响。渡船上的人群也紧张起来，在黑暗之中，互相发问：“怎么办？！怎么办？！”

头头们都不懂水上行船的技术，对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束手无策，赶紧去找渡船上的船工和驾驶员商量。

而渡船上的船工和驾驶员们，面对这种情况，也都惊恐异常。毕竟他们还懂得在江浪中行船的经验，有人便着急地建议：

“只有赶快用斧子砍断缆绳，不然趸船的摇晃加大，也会要把两只渡船扯翻的！”

“先把缆绳砍断，保住两只渡船的平稳，然后再设法去救趸船！”

看来只有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否则，再犹豫片刻，真会因趸船摇晃，掀翻渡船，那时趸船也难保，以致酿成“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不一会，两柄大斧同时挥动，“咚！咚！咚！咚！”利斧砍向绷紧而又来回摆动的钢缆。几乎也是同时，“咔嚓！咔嚓！”两根钢缆砍断了，相继腾地飞起一二丈高，渡船突然松载，船尾猛向后坐，船首高翘，马达发出震颤，随即，船首像抛下一般，船尾又高翘起来，好一阵前后摇摆，渡船才逐渐平定下来。

后面牵拉的趸船，在钢缆砍断的那一刹那，晃动着左右摇摆的船体，突然高昂船头，船尾猛陷至水中，就在这一时刻，悲惨的局面发生了：

随着一声尖利的喊叫：“快救命啊！”站立船尾的人，事先毫无一点思想准备，“哗啦啦！”像下开水锅的饺子一般，“扑腾！扑腾！”滑落到江水之中。紧接着，船首又突然砸下去，船尾翘起老高，站在船首的群众，不由自主地又顺着倾斜的甲板，接连滑入江中……

趸船上的人落水了，全船惊恐一片，女人高声呼救：“救命啊！救命啊！”小孩和婴儿一齐啼哭。男人们拼命地把女人的腰杆抱住，使劲往船中心挤靠，头目们嘶声喊叫：“大家把腰杆抱住，形成团！”

但是，猛烈的浪涛夹杂着暴雨，戏弄着这只失去控制的笨重船体，惊魂不定的人群，在平面的甲板上，来回摇晃，又为使生命走向死亡增添了不利因素。船体倾斜高翘右后方，站立在左前方船边的人，又跟着滑落水中；船体倾斜高翘左前方，站立在右后方船边的人，也身不由己地滑入水中……。

这时，长江南岸白沙镇上的枪声仍然响个不停，只是映红天边的大火渐渐减弱了些，雨水夹着风浪，仍然一阵紧似一阵，使人感到祸不单行。两只渡轮上的的头头们，已经知道可能有人落水了，但他们既不敢靠岸停船，请求人来救援，也没能力在漆黑的雨夜，开展毫无希望的救援工作，他们只有谢天谢地，忍痛割爱，让趸船上的“工农派”群众听天由命算啦，然后，各自开足马力，赶快离开这“死亡”之地。

他们卸掉了后面拖载的沉重“包袱”，船体显得轻松了许多，趁着下水，直驶向江津方向。

失去牵拉动力的趸船，左摇右晃地随着流水的推力漂流，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乘船的人到底有多少被倾滑至水中，一时谁也无法查清，人们不顾一切地互相呼叫着名字，有的女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男人，竟情不自禁地嚎啕痛哭起来……

白沙镇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武斗停止了，东方吐露出一抹鱼肚的白色，渐渐地天空亮堂起来。趸船随着流水的漂流，也渐渐地停靠在白沙下游的一个江湾边。船上的人，个个露出惊恐的神情，有失去男人的女人，失去女人和小孩的男人，泪水似乎已经流干，只是直呆呆地望着江水发愣。他们经过这次大难不死之后，已完全不再惧怕死神的降临了，都走上江边，有的疲倦地四脚放开躺在地下，有的妇女，双眼噙着泪珠，双手搂抱着婴儿，不住地醒着鼻子啼哭。再看那江面上，已经有漂浮的尸体，随着水波，一起一伏地向下游涌去……

“白沙惨案”的消息和详细经过，接二连三地传至永川联合工作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耳中，在感到极度震惊之余，他们立即指示部队支左办公室，电告驻江津的某部，火速派出指战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白沙进行救援，将所有生还的男女群众和小孩，妥善接至部队安顿，对手中的枪支弹

药一律进行收缴；认真查找两只前往江津的渡船，解散武斗队，收缴武器装备，所有人员经暂时安顿后，立即返回原地。

事后，据驻军报告，经过在出事现场的江面打捞尸体，这次“白沙惨案”，共死亡群众120多人，其中以妇女和小孩为多，也有一些是武斗队员。到底有多少人下落不明，因登船之时，没有精确统计，事后也未有人主动报案，至今都无法详细查清。与此同时，部队迅速派出人员，前往白沙镇，查清当晚发生武斗的情况，并趁机强制收缴两派的武器弹药，根除再次发生武斗的后患。

第 1103 回：八一四，中央又提“五一六”

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

我们再回到北京。8月14日，周恩来、谢富治、江青、姚文元等接见文艺口代表，江青特别提到“516”问题，她说：

“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516’匪团问题。‘516’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516’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姚文元：“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

江青：“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516’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待。现在有两个‘516’分子没有翻案，我保护他们，将来可能不给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他们打那样大的招牌，青年人很难……当然，他们的口号很恶劣。‘516’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

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搞掉，因为太凶恶了。”

谢富治：“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516’ 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在文艺方面他们钻进来了。工、军宣队责任更大了。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这是保证样板的巩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上、艺术上江青同志都很严。这个严是思想弄不好就要恢复了。”

周恩来：“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516’搞一搞。”

谢富治：“把‘516’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8月15日，8月28日，周恩来在两次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也提到清查“516”的问题：

“还有‘516’问题。我们在9月就知道了‘516’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516’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516’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

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516’的话。

‘516’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516’，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516’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516’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8月16日，经中央同意，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任青岛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长，副政委宋景华为第二副组长。

8月27日，山东王效禹写了份书面检查。

8月29日，青岛的740多人到北京参加青岛学习班。

9月2日晚20时50分至23时5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李先念、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等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办的各省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东班、青岛班、徐州班和贵州、西藏汇报团、内蒙古党的核心小组的全体成员。周恩来首先讲话，讲了形势与大局，讲了这次学习班的要求。然后，由各派头头发言，汇报情况，表示态度。

康生在大会上严厉地、公开地点了青岛韩金海的名：

“什么是工贼？就是钻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假充工人，或原来是工人变质了，打着工人的旗号”，“少数个别人利用工人团体进行他的派性活动，为个人谋利益。在座的韩金海就是这样！”

黄永胜在讲话中专门提到，支持王效禹的原驻徐州“空军有 5 个人不执行命令，在外不归队，发了指示，他说没有见过文件，提出了 4 条，说我是革命群众组织，对我无效。我们开除了他们的军籍、党籍、团籍、公职。”

1969 年 8 月下旬，79 岁高龄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病情恶化。尽管中国派去医疗组全力抢救，但周恩来仍不放心，又于 8 月 24 日和 26 日接连派出了第 2 个和第 3 个医疗组。8 月 31 日，又派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专家吴阶平教授乘专机到河内送急救药品，并进一步了解胡志明的病情。

9 月 1 日，周总理亲自听取了吴阶平的汇报，同时召集有关专家研究讨论，前后用了 5 个小时，最后决定再派吴阶平教授率第 4 个医疗组，携带部分专家和器械、药品，于 9 月 2 日清晨乘专机赶往河内抢救。遗憾的是，第 4 个医疗组的专机刚飞到广西上空，就得到胡志明已于当天上午 9 时 47 分停止呼吸的消息。结果，飞机不得不掉头返回北京。

9 月 2 日是越南的国庆日。鉴于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

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越南政府为防国内局势动荡，决定将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改为9月3日，并定于9月9日为胡志明举行国葬。

周恩来打破常规，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于9月4日专程飞往河内吊唁。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此前，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外国领导人的逝世都未做过这样的表示。越南领导人见到周恩来时，激动得失声痛哭。周恩来也沉痛万分，不止一次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9月4日下午15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因灵堂尚未布置完毕，中越双方领导首先举行了会谈。17时吊唁仪式开始。临时灵堂设在主席府正厅，这是胡志明主席生前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中国代表团设置的，后来的正式吊唁灵堂设在巴亭会堂。

周恩来进入灵堂时，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恩来拥抱。随即，周恩来转送了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中国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恩来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当晚19时，越方秘密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

胡志明主席的遗容，他们站在胡志明的遗像前肃立默哀，深切怀念这位异国朋友。他们也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当晚 20 时，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国。

周恩来这么快就返回国内，外电猜测，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

胡志明去世，苏联本来已派出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到了河内。但柯西金听说周恩来到了河内，他想与周恩来“对话”的欲望又重新在心头涌起。为此，他取消了当天下午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安排，立刻乘专机飞赴河内。但当他的专机在河内机场降落之前，周恩来已飞回中国了。

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紧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苏方提出：“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恩来总理。”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紧急报回国内。但中方未立即做出答复。

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

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

中国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外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站在第一排的苏联柯西金与中国李先念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葬礼活动结束后，中苏两国代表团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时，柯西金紧走几步，想和李先念副总理打招呼。柯西金的手都伸过来了，李先念副总理假装没看见，转身走开了……无奈之中，苏联只好通过越南向中方传话。

但越南外交部因故没有当即转达，而是在当天下午15时30分，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才来到中国党政代表团下榻的范老五宾馆，请胡志明生前的中国翻译梁枫转告李先念团长，苏联代表团要求越方向中国代表团转达如下事项：

“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团长获悉越南方面的传话后，立即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

10日清晨，李先念一直未收到国内指示，便决定按原计

划去机场准备回国。

就在李先念副总理和王幼平大使离开大使馆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方收到国内复电，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使馆政务参赞陈亮立即驱车前往嘉林机场。当李先念将要登机之际，飞驰而来的使馆参赞陈亮，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了国内的指示。于是，李先念将中方的意见告诉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文同说：柯西金已于一个小时前起飞回国了。

悉知此事前后经过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严厉批评越南外交部有关当事人延误大事。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苏欧司于当天中午约见苏联驻越大使，转达中方答复，并嘱咐立即转告正在飞行途中的柯西金。

10日晚间，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正式通知苏方：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叶利扎维金立即报回莫斯科。此时，柯西金已飞抵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杜尚别。

柯西金是从“南路”航线从莫斯科飞往越南的，他现在照原来的路线飞回去。先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领空，又经阿富汗，绕了半个圈子，于傍晚，飞机落在杜尚别，他们住进了政府公寓。当大家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

电话是莫斯科打来的，通知柯西金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

金会晤。”

此时，大家围着桌子刚打开啤酒瓶子，突然见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

“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就起飞了，机组人员甚至还未来得及装矿泉水，但飞机上有白兰地酒储备。

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去呀？得到的回答是：“去伊尔库茨克。”

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直到此时，柯西金才腾出时间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现在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柯西金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当晚，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表示：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还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他的问候。

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

周恩来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3个月时，周恩来指出：“要向前看，我认

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

接着，周恩来把中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

谈判解决。

周恩来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

“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

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

就此，柯西金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总理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

然后，双方又商定于近期各派一个副部长级的代表团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周恩来提出，面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5 周年之际，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两国贸易在某些项目上可以长期合作，过去有些建设项目，可能的话，应该完成。在会谈中，双方除了讨论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还谈到恢复互派大使等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

“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

换了意见。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他是指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月10日又从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

柯西金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

周恩来装作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机场设便宴招待柯西金。这是周恩来事先已为柯西金准备好的一顿国宴便餐。在柯西金专机即将抵达北京时，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周恩来指示：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人的口味，名厨徐筱波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中

的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而成。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道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的便宴上，周恩来与柯西金酒过三巡，徐师傅压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专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很好吃！很好吃！”还说个没完。

周恩来便问：“还想要吧？”

“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

于是周恩来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已经发动的飞机也停了下来。

飞机启动一次耗油惊人，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因此得名。

据参加会谈的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称：“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连同‘便宴’持续到16时。”

会晤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将会晤记录及时印成文件分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

第 1104 回：促谈判，中美苏共同起舞

四老帅，再递交局势报告

1969 年 9 月 12 日，中国各大报都刊出新华社 11 日发布的简短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 月 13 日，周恩来将会谈的内容报毛泽东，说：“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缓和边境局势的四条协议实现，准备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示同意。

此次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本来挺好，双方皆大欢喜。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联的主要政治人物勃列日涅夫等人没有到机场迎接，说明苏联当局有些人并不同意柯西金的立场。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从文字上确认双方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托词拒绝。苏联方面还是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口头谅解。

当秘书将会晤记录的内容要点讲给林彪时，林彪毫无反应。他根本不相信苏联人的那套外交辞令，甚至怀疑柯西金是带着“鸽派”的假面具，想重温一年前苏联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旧梦。

1968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派杜布切克当选为第一书记，斯沃博达任总统。随后，大力推行经济和政治

改革，改组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撤换反对改革的重要人物。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新的转折时刻，“必须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并提出建立联邦制国家，在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与合作的同时，发展同一切国家的互利关系等等，西方电讯社称该国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活跃局面。这些，引起苏联的不满。

1968年7月22日，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拒绝苏联提出的去华沙或莫斯科参加会谈的“邀请”。于是，苏联宣布，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使团将“访问”布拉格。7月29日，苏共政治局的委员们抵达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城镇切尔纳，同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会谈，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会谈在8月1日结束，双方分歧依然。与此同时，苏联从7月23日到8月中旬，以演习为名，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地区集结军队。8月20日晚23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机械事故，要求迫降”的信号，没有理由不同意。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24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市区。与此同时，苏联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4个苏军装甲师，1个空降师，1个东德师从波兰直捣布拉格；驻东德4个苏军师，1个东德师切

断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界；驻匈牙利的苏军 8 个师，匈军 2 个师，保加利亚军一部从南部进攻；苏波合成军 4 个师进攻北部。同时，苏军对北约和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

21 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并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话。

进攻开始 6 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这是苏军一次典型的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 4 个方面军，1 个坦克集团军，4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6 个师，约 30 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群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 9000 余辆。

这就是苏联武装干涉捷克的“布拉格事件”。

一年前苏联演出的这一闹剧在林彪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大鼻子”的话说得再好听，他也决不相信。

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也使大洋彼岸美国总统尼克松大为震惊。半年前中苏两国还是兵戎相见，怎么一下子就握手言和了？此事完全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美国方面事先未得到任何消息。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他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对美国来说非同小可。尼克松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感觉。他立即召见基辛格。

基辛格不愧是尼克松的得力外交助手。他从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告中看出了门道。他说：

“这是官样文章，他们这么长时期的矛盾决不会因为机场的一次谈话就化解了。你看他们的公告里连一个‘同志般’字眼都没有。”

这正是周恩来外交的智慧。本来，在送审的新闻公告稿中，有“同志般的”、“友好的”字眼，周恩来审阅时把这些字眼都删去了，只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坦率的”。实际上，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还算是友好的。

尽管基辛格这样安慰，尼克松还是有点着急，他要基辛格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同时，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 3 个小时的详细情况。

9月13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机场会谈”谈话记录，并进行讨论。他们认为，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中国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国，同时也摸摸中国的底。

陈毅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会更加震动全世界。”

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派特使去美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是：

一、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

二、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

三、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

四、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苏联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统阿格纽、国防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

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华沙会谈延续了 15 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

二是要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

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在这种情况下，四位老帅又进行了讨论，并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毅定稿，9 月 17 日报送周恩来。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向我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

然后，他们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深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了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

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而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 “苏修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计，并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他说：

“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调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

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

陈毅接着说：“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做出两项决策：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两项决策在当时世界上虽未引起轰动效应，但却预示

了毛泽东新的重大战略步骤的出台。经过深思熟虑与慎重的外交接触，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中国在国庆节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 28 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 83 字，已经不是口号，到像是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9月17日，《人民日报》及各大报均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 29 条，其中第 22 条口号就是毛泽东亲笔加的那 83 字。9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国庆口号第 22 条是伟大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第 1105 回：毛泽东，北京接见李德生

忆往事，林彪再上井冈山

1969 年 9 月 17 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通知》规定：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需要增补委员、常委和副主任时，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增补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

二、革命委员会中，有调往他处的或红卫兵从学校毕业后下放劳动的，都不要忙于免除他们的职务；对犯有某些错误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应按照“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不要轻易进行组织处理；对于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处理，应报请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要在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再上报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9 月 18 日，周恩来致柯西金信：“1969 年 9 月 11 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

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

该信内容于 16 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并于 17 日报毛泽东。

9 月 20 日晚，周恩来再次谈到清查“516”的问题，他说：

“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

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 1967 年的‘516’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516’是个阴

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516’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516’、挖‘516’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516’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9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来到上海，21日离开上海经南京抵达济南。他在济南停留期间，在专列上接见了杨得志、袁升平、王效禹3人。接见时，毛泽东颇为关心的问王效禹：“怎么样，能抗得住的吗？”

王效禹回答：“能。”

9月22日，毛泽东离开济南到达天津，他没有急于赶回

北京，而是在天津呆了一天，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驻津陆、海、空三军部分负责人，并乘车视察了天津最繁华的和平路，指示要在这里修建防空设施。



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天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全体成员、驻津陆、海、空三军部分负责人和天津干部俱乐部工作人员合影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天津同专列工作人员合影

9月23日，毛泽东返回北京。此次南巡，毛泽东在外地时间长达118天，是文革以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

次，也是随卫人员最多的一次。

不久，毛泽东要亲自接见李德生。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

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时，毛泽东随手拿起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李德生感到亲切。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是 12 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

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中共高官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

“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工作顺序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中央军委办事组。

当时，按中央的意见，李德生在中央军委办事组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

9月20日晚，周恩来到京西宾馆参加在这里举办的贵州学习班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已明确批评李再含，说他“不说实话，变成两面派”，“占了领导地位后，滑到危险的边缘了。”他还批评李再含在贵州自封小红太阳，搞多中心，是封建意识。

9月22日，在北京的贵州学习班给贵州省发回急电，提出7条意见，要求全省各地无条件收缴一切武器，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武斗队。

9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也是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周恩来发现贵州省赴京参加10月1日建国20周年大庆的观礼代表团105人中，没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代表，立即决定再补充20人，要求贵州省革委和0276部队落实人选。除铜仁和黔西各1名农民代表和贵阳市的许浔生、张谦外，其余均为“411”代表，于9月28日乘周恩来安排的飞机到北京，与先到的贵州省观礼代表团同住东单大街的北方饭店。当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主任、国庆节筹备组组长吴德来住地看望大家。

9月的一天，林彪、叶群、吴法宪和工作人员共100多人，分乘两架飞机，从北京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了江西的樟树机场。大队人马走下飞机，乘汽车径直奔向当地的下榻处。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也随后赶到。原来，林彪要上井冈山。

这天晚上，林彪、叶群与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江西省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及全体随行人员共进晚餐，吃红军当年吃的红米饭、南瓜汤。

就餐前，叶群根据林彪的安排首先讲话，简要介绍了当

年红军在井冈山战斗的英勇事迹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接着，由她指挥，与所有就餐人员一起，唱起了当年红军的革命歌曲。

此次外出前，叶群已安排先行人员从北京乘飞机到江西打前站。除了安排林彪到江西的食宿外，还试航了林彪的专机“子爵”号，并在樟树机场改乘双引擎“安—24”型小客机，检查了直飞井冈山以北吉安机场的飞行线路。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也亲自坐镇，把吉安城主要街道墙壁上的大字报洗刷一空，还按林彪的生活习惯准备好了住房。另外，程世清还让人从省里选了最好的5辆汽车。吴法宪也派出一架“安—12”飞机，把林彪和叶群乘坐的豪华轿车运到了樟树机场。

第二天早饭后，林彪从樟树乘飞机来到吉安。随后，即乘汽车前往井冈山。

车队缓缓行驶。在一个山巅之上，林彪的车突然停下。他下车小便之后，指着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对随身警卫的人员说：“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几十年了，没有这块立足之地，就没有今天。当年红军在这些天险要塞上面修筑了哨卡、工事，蒋介石倾巢出动，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重兵，层层包围了井冈山，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条件好，就很难保住这块弹丸之地。有了它，才保住了红军，最后打下了整个江山。应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的发祥之

地。”

平时少言寡语的林彪，这天特别激动，心情也特别好，一口气对下属说这么多话，这真是破天荒了。

有人问林彪井冈山是不是很大？林彪说：“大得很哪！方圆四五百里。当地人不叫它井冈山，叫大小五井。因为四周、山上有五口水井，现在不知还在不在？”

江西省给林彪在井冈山安排的下榻处是茨坪，这里有最好的两栋别墅。可是，林彪一下车，环顾一周后，下达了不住别墅，要住离街不远的井冈山宾馆的指示。这一下可忙坏了接待人员，也吓坏了随卫人员。井冈山宾馆此时还住着客人，又临近街道，安全方面万一出一点疏忽，可是重大的政治事故呀！但这是首长的指令，没有一丝商讨余地。于是，接待人员和警卫人员立即紧急行动。经过一阵突击，将三层大楼全部腾了出来。林彪住宽敞的一楼会议室，叶群和有关人员分别住一楼和二楼。

夜幕降临，井冈山宾馆内外的所有广播喇叭全部“扳闸”，变成了哑巴。宾馆内部的收音机也不准任何人收听。宾馆内外静悄悄的，警卫人员在四周戒备森严。

大约 23 时，突然从叶群的房间里传出了大声吵叫：“我一不在家，你们就成了霸王啦？你擅离职守，干什么去了？”

原来，叶群打电话找留守北京的耿秘书，恰巧耿秘书不

在。等耿秘书回来接电话时，她大发雷霆，大声训斥道：

“这次是首长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你知道不？你对首长的安全不放在心上，你对首长是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今后给你规定一条纪律：只要首长外出，你不能离开电话机一步，这是一条纪律，你知道吗？”

叶群的喊叫，整个楼道的人都能听到。

第二天，林彪继续在井冈山视察。在山区行走时，林彪奋力登上一块巨型岩石，这使警卫人员十分惊讶。平时，他走几十步路都要气喘吁吁，而这天却精神抖擞。

此时，山下白云翻滚，真像波浪滔天的大海。这里，就是毛泽东诗词中的黄洋界。

林彪信步向西慢行，突然在一棵大树前站住。这是一棵参天大树，树叶特别茂盛，林彪无限深情地说：“我认识它，想当年，毛主席领着红军战士挑粮上山，常常在这棵树下歇脚，这棵树也算是革命功臣了。”说到这里，林彪几乎流出眼泪，流露出了抚今追昔的情怀。

随后，林彪又走上黄洋界的制高点，指着一栋木制结构的小阁楼说：“当年红军在这儿设了望哨，你们看，小楼附近还残留留下了一处工事的废墟。”

说完，林彪背着双手，沉默不语，徜徉良久，仿佛在追忆着往日井冈山的烽火硝烟。随后，他诗兴大发，当晚叫人代笔写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

繁茂三湾竹树，
茫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勾掉，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在黄洋界，程世清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林彪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然后，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词：“早已森严壁

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林彪在井冈山休息了一天。次日，又来到七溪岭。这七溪岭也是军事要塞。在汽车不能行走的岭下，所有人员都下了汽车。崎岖不平的山路，林彪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大家劝他不要走了，他摇摇头，十分肯定地说：“一定要上去看看。”他气喘吁吁地指了指山上说：“红军在这座山上，凭借天险，用麻雀战术，一举打垮了敌人两个师五个团的进攻。这七溪岭也是我出生入死的地方。”

下午回到宾馆，林彪休息一阵子后，在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陪同下，又看望了老赤卫队员。期间，一位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十分罕见的精美玉石，宽约 20 公分，长约 25 公分。此石带回北京后，林彪让人刻成一方砚台，送给了叶群，砚台上还刻下诗句：“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

林彪在井冈山住了 4 天，决定翌日下山回京。

在临别的宴会上，程世清对林彪说：“上次主席到井冈山时，去了南昌。这次首长来井冈山，政治意义重大，恳请首长也能光顾”。林彪点头应允。可飞机起飞后，叶群却让飞机直飞北，让在南昌机场等候的人白等了一场。

林彪夫妇走后，程世清命令在黄洋界重立“界石”，一面刻上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是叶群抄的毛泽东的半阙词。

在此之前，1968年，程世清曾进行了井冈山形象改造。那年春天，根据他关于“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的指示，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专题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纪念馆里有一张1929年1月红4军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这次被要求处理掉“军长朱德”这4个字。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被列为当时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4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朱德的扁担，实物被撤走了，换成一幅油画：挑粮的毛泽东、林彪在黄洋界

的那棵槲树下小憩。由此，便有了后来“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的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是纪念馆陈列的十余幅大型油画之一，由于其现实意义，更被摆放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在一面闪动阳光的红4军军旗下，走来身穿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这幅印制好的油画。老师们看着，都笑了。陈毅看到这幅油画时说：“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

程世清还下令将茨坪纪念馆大门两边改装成火炬灯，并在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20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数万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4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1962年3月朱德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

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 11 个字，也是 1965 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老总题写的。老的黄洋界“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笔迹，程世清也令人搬走。

第 1106 回：抓战备，全军开作战会议

迎十一，副统帅忙碌不停

9月 22 日，周恩来参加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并讲话。

这天，军委批准总参关于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小组成员调整的报告，同意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任该小组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范天恩、总参二部副部长徐敏辉和总参三部副部长冯维精任副组长。

9月 25 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

这次会议是林彪报请毛泽东批准后召开的。

为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林彪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 7 米、宽约 3 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图，展开有半个房间大。这张地图是绘制在非常柔软的绢丝，不起皱，不怕卷，也不怕踩，字迹印刷得很清晰，上下都装裱有大卷轴，是根胳膊粗的棍，扛起来很重，足有二、三十斤，挂不到墙上，只能平展在地毯上。平时平放在档案室保险柜上，不能竖放，否则会变形。

林彪连着 3 天站在这幅“三北”地图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有时，他干脆踩到地图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镜看，看得很仔细。林彪眼花了，看不清地

图上的地名，让李根清在旁边拿着米尺为他指地名，量直线距离。因为图幅比例林彪知道，不用算，林彪就知道实际距离是多少。尤其是东北、华北这两部分，简直就烂熟在他心里。从东北的长春、沈阳，距离蒙古边境的直线距离，平原、山川，到西北毛乌苏沙漠、包头，……像南口，古北口，张家口这几个大口子，林彪张嘴就说出来。

林彪认为重点是华北，但对西北、东北也要注意到。林彪打仗最讲迂回，他也最害怕敌人大迂回。如果敌人大迂回可能从哪里进来？这是他必须研究的，所以他特别关注东北、华北、西北地段的主要山脉、河流、平原、山口的位置距离。这些，他都让李根清一一念给他听。

林彪尤其注意张家口，也着重了解华北长城沿线的几个口子，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南口。林彪还专门让李根清把冷口、喜峰口都找一找，看看它们在北京的位置。

林彪让李根清指了长城沿线的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问了居庸关和京西原平。原平地处山西中部偏北，东临五台，历史上是内地通往塞外的一条官道。从原平沿铁路线经涞源即可到北京。林彪还让李根清指了密云水库、官厅水库。

林彪不断提出问题，问距离北京最近的城市。华北这一块，张家口、二连浩特，到内蒙古的集宁，他注意到这一段的铁路线。

林彪研究了蒙古乔巴山、乌兰巴托，注意这两个城市的

方位，大体与北京的距离。

他专门问到赤塔，伊尔库茨克，在哪个位置？还特别叫李根清找出伊尔库茨克，让他拿尺子量一量，距离北京的大概距离，计算导弹飞行时间：从伊尔库茨克发射导弹到天安门大概要 9 分钟。然后林彪要求计算从天安门撤下来，撤到地下工事需要几分钟。总参作战部报告说，用不了 9 分钟。

乔巴山周边也有导弹阵地。所以这都是林彪关注的重点。

林彪在地图上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在地图上走来走去，看得很仔细。该休息了，林彪叫李根清先走，但不让他把“三北”地图拿走，说他自己还要在地图上再看一看。

林彪连续 3 天看“三北”地图。叶群则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

9 月 26 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

27 日，作战会议结束。当晚 19 时 40 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 70 多人早已成四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

皱起了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又说了一句：“讨嫌！”接着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作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作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

京。

20 年国庆将至，中苏关系如此紧张，核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国庆天安门集会还搞不搞？考虑到 20 年大庆有几十万群众要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国家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一颗原子弹下来，其后果不可想象。

不搞，其政治后果同样不可想象。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庆，又是“九大”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后的国庆，两军对垒，示弱于敌，这又岂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风格？

9 月 23 日和 29 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 2 万—2.5 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 300 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这两次核爆炸就是中国的公开态度，你有原子弹，我也有原子弹。但中国一改以往做法，未对外界宣布。

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9 月 26 日，柯西金给周恩来复信。他在信中说，“经仔细研究周总理 9 月 18 日来信，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根据相互原则采

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信中建议自 1969 年 10 月 10 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并说苏方已任命了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

9 月 29 日，由周恩来审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改到 10 月 20 日开始。”

临近 196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 周年大庆，林彪更是忙碌万分。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的他，此时都顾不得了。他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几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发痒。

9 月 30 日，林彪出外“转车”时，突然提出到南苑机场转转。从机场出来后，他又说要到附近的连队看看。于是，又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的一个连队。

“转车”一回来，林彪立即打铃叫来秘书说：“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卫戍区的温玉成立即到我这里来。”

很快，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叶群对秘书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档的。”

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大家落座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

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就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 10 月 1 日、2 日、3 日。1 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

接着，林彪拿着一米多长的指挥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军事地图，询问北京地区的节日防护工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分别作了回答。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蒙古方面通报今夜有暴风雪，情况可疑。”

林彪听到暴风雪，眉头一皱，马上警惕起来，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

阎仲川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派人询问了气象部门，证实

蒙古方面今夜确实预报有暴风雪。他说明后，林彪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研究研究。”

最后，林彪再次说：“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节日的其他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 10 月 1 日、2 日、3 日，10 月 1 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黄永胜带头表态说。

“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吴法宪抢上来说：“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

其他人也都表示拥护林彪的指示。

当天，9 月 30 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行“一等紧急战备演习”。除担负战斗值班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进入洞库或就地疏散；大部分师以上指挥机构开设了预备指挥所；所有机场紧急配发了武器；70 多个机场连夜挖了掩体、防空洞；“三北”地区临时不使用的机场全部设置了障碍；建立了空司指挥所与“三北”地区一线雷达站和技侦分队的直接联络。10 月 3 日演习结束。这是空军自组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备演习”。

9 月 30 日晚，周恩来在国庆 20 周年招待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侵略别人。我们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他在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说：

“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第 1107 回：庆大庆，北京城内紧外松

看地形，林彪飞抵张家口

1969 年的北京国庆活动，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按照原计划正常进行。10 月 1 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林彪在天安门讲话和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都一字不易地将国庆口号第 22 条作为结束语。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196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

康生向观礼台和广场上的群众招手致意。

国庆节这天，在天安门城楼，王震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他想去江西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的想法。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下去走一走，看一看，搞点调查研究、科学试验也好。”

其实，早在 1967 年 11 月，一直处在受批判状态中的王震就曾致信李先念，表示自己“反复地痛定思痛，想了又想，恳请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受基层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教育。”信中还具体提出到海边或山区“一个公社生产队去长期安家落户。”当时，李先念将此信批给联络员。后因具体事宜，下放事情暂时搁置。

国庆期间平安无事，而林彪、周恩来等也为它度过了几个难眠之夜。

10 月 4 日，新华社报道：“1969 年 9 月 29 日，在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在此以前，在 1969 年 9 月 23 日，我国还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这些新成就，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国庆节一过，林彪决定视察张家口。

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那里的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林彪此行是绝对保密的。动身之前，叶群忙着为此大做准备。一方面，她提前派出几个先遣人员到张家口，为林彪一行在那里过夜作食宿安排。另一方面，她让空军准备三架飞机待命。另外，由于张家口没有适合林彪坐的高级轿车，叶群下令从北京提前去一辆“吉姆”。

10月5日，正式动身的这一天，北京西郊机场戒备森严。上午8时，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时，随行的吴法宪、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马卫华已在机场等候，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

在停机坪上，并列着两架“子爵号”专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中国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架专机。它们是从英国进口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安全。据说它从出厂至今还没发生过技术事故。机身不算大，共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即便在飞行时一个发动机出了事故，另三个发动机仍可照常工作，因此作为短途专机比较理想。此外，机场跑道上还停着一架苏造“伊尔—18”型客机，它是为林彪的一般随员和警卫人员准备的。林彪一行近百人，3架飞机也是满载的。

根据叶群的安排，林彪带着女儿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号，陪同的有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参谋长马卫华。叶群自己带着儿子林立果，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叶群说，这样即便林彪的飞机出了事，仍可保证林家这条“根”不会断。

“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分乘两架“子爵”号。张云生和李文普以及林彪的内勤和8341部队的警卫值班负责人，及负责专机服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都上了第一架“子爵”号。叶群的内勤、“林办”驻地的医生和部分警卫干部、随叶群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其余警卫人员则乘坐“伊尔—18”。

林彪座机上有两个工作人员负有“特殊”的使命，一个是张云生，他的任务是记录林彪在途中的一切谈话，另一个是从《空军报》社临时调来的摄影记者，负责拍下林彪在视察途中的一切有意义的镜头。

“子爵”号的内舱，原来是个桶形，设有40多个座位。经过改装，机舱的前半部隔出两个单间：一个是工作间，另一间是卧室。工作间的一侧有个铺着白布的长方形的桌，两旁各有两个软椅；另一侧横放一个长形沙发。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间里。郑维山坐在林彪的旁边，以便随时回答林彪可能提出的问题。吴法宪和张云生坐在林彪的对面，阎仲川和马卫华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林彪乘坐的“子爵”号平稳地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后，另两架飞机也相继起飞，目标张家口。

专机腾空后，很快向西转头，朝着延绵不断的太行山飞去。林彪要看地形，飞行员受命把飞行的高度压得比较低，航速也比较慢。这一天又正值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因此地

面上的山川河流、桥梁隘口、庙宇村落，从机舱的玻璃窗望下去清晰可见。林彪不时拿起望远镜朝下望望，摄影记者及时抓住机会，把他的神态拍入镜头。

除了飞机的马达声外，机舱内一片寂静。因为林彪不吸烟，其余人的烟瘾再大也只能忍着。林彪不引出话题，谁也不敢吭气。

“前边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终于打破沉寂。

“是的，”郑维山用手向机舱下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这一带，林副主席很熟吧？”

“走过，”林彪说。“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林彪说着，又拿起放大镜，在地图上寻找他所关心的地名。

“这就是五台山。”郑维山指了指图上的一个标记。
“我们的飞机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郑维山又指着地图说：
“再往前飞，这就是雁门关。”

郑维山很健谈。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开始有点拘束，但林彪把话匣子一旦打开，他就滔滔不绝了。他向林彪介绍这一带的地形特点，讲到一些有利条件，也讲到一些不利因素；讲到入侵之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也讲到他对防御作战所作的部署和决心。他特别有兴致地讲起了他所提倡的用步兵打敌人坦克的一种战术，声称敌人如果敢于用坦克群在他所防御的地带贸然来犯，他有决心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来无回。

郑维山年过 50，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调，但很好听，也很好懂。他的口齿流利，讲起话来既精练，又有说服力。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在几十年的带兵生涯中，不但提高了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练就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所难得的口才。一路上，经五台山过雁门关，再到张家口，往往是林彪的只字片语，就能引出他的一套宏论。在平时，林彪是不大喜欢一个下级在他面前这样侃侃而谈的。但今天，尽管郑维山喧宾夺主，并使他身旁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副总长阎仲川无暇张口，但林彪并无反感。郑维山像连珠炮似地倾诉着自己的一些军事见解，林彪一直在洗耳恭听。

林彪大概是在有意观察和考核郑维山，而郑维山却向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林彪于是又改话题，进一步问郑维山的战斗经历。原来郑维山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和杨成武手下的一名爱将。

林彪又问郑维山：“你过去指挥过哪些大的战役？战绩如何？”

郑维山有些羞怯地回答说：“我指挥过的战斗很多。参加过平津战役，我直接指挥的最大战果是歼敌 5 万多。”

解放战争后期，郑维山仅是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他的战绩也算不俗。但在林彪面前，他确实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转瞬间，张家口到了。

林彪的专机在张家口机场降落后，驻在当地的 65 军杨军长和贺政委前来迎接，将林彪一行送到了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里是一座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后面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它装潢朴素，设施简单，当时作为张家口市政府所管的“交际处”，是当地接待宾客的一流建筑。条件低劣，好在林彪对此并不挑剔。

林彪从飞机上下来后，一直兴致很高。他在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当天下午接见附近驻军的师、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接见分成三批：第一批是接见驻张家口的 65 军的军、师两级主要负责人；第二批是接见驻延庆的 27 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第三批接见降了格：空军在张家口有几个“543”地对空导弹营，和陆军的军、师“老大哥”相比，这些营级“小兄弟”只是个基层战斗体，但林彪对空军的重视远远高于陆军，因此导弹营的负责人也得到了面见副统帅的机会。每次接见，都由吴法宪、阎仲川和郑维山作陪。接见一开始，先由林彪问一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氏、多大年龄以及有关战备的一些情况，最后再由林彪就战备工作做些指示。

被接见的部队干部，特别是两个军的师以上干部，难得有一次和副统帅兼国防部长当面交谈的机会。因此他们趁着林彪讯问“部队有什么困难”时，就纷纷提出一个他们共同

感到苦恼的问题：

“怎样正确处理一好和三好的关系？”

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倡普遍开展创造“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运动。在罗瑞卿任总长的总参谋部和肖华任主任的总政治部的具体推行下，这一运动在头几年搞得有声有色，对于部队基层建设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林彪于 1965 年提出“突出政治”以后，“四好”运动就越来越变形，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并且使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嘴上空唱高调成了时髦，埋头搞军事技术工作的却被批判，部队的战备工作和基础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一好”和“三好”的关系，在当时，是部队干部人人关心，经常议论，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林副主席亲自来了，虽然在大首长面前说话总难免有点拘束，但人们还是鼓起勇气向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在林彪看来，“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怎么会成为问题呢？他明明讲的是“创四好”，并没说只创“政治思想好”呀？他还曾讲过要以“一好带三好”，而不要只抓“一好”而丢了另外“三好”。他确实这样讲过，但下边执行起来却只有“突出政治”。据说，“突出政治”是“一突百通”，而“冲击政治”是“一冲百空”的。

面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林彪置之一笑。他说：“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林彪讲话，郑维山代表他的下属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林彪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稍感疲劳，早早地休息了。但精力充沛的叶群，却不肯轻易放过仅有的一宵良机的张家口之夜。天色刚过黄昏，她就让吴法宪、郑维山两员大将陪着去逛当地的百货商店。这时，商店已经关门点货，但因为“大人物”驾临，当然要破例将门打开。叶群等人进了商店，街上一些过往的群众也跟着一拥而进。他们也跟叶群一样，并不是真的想进商店买什么东西，而是各有所好。

“是叶群！”人群中有人高喊。

“是叶群！”又有人附和。

这几声惊叫，立刻把附近的游人和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吸引过来，一下就把叶群、吴法宪和郑维山围得水泄不通。随同叶群等人前来的 8341 部队警卫人员一时难以打破这堵人墙。

“还以为大家认不出我，但还是被认出来了。”叶群并不认为自己惹了祸，反而眉开眼笑地对着人们说。她似乎终于有了单独在群众场合露面的机会，立即拿出《毛主席语

录》，举在空中挥动几下，高喊：“我代表林彪同志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人群中发出一些掌声。有人带头高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又有人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这是空军的吴司令！这是北京军区的郑司令！”叶群又把她身边的吴法宪、郑维山介绍给大家，紧接着又带头高喊：“向吴司令学习、致敬！”

吴法宪也举臂响应：“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吴法宪胖得像个阿弥陀佛了。他在平静时，两只眼睛已被脸上肌肉挤得十分犯狭小，而现在，由于过分激动，嘴上的唾沫再配上含着报恩之情，使他显得更加可笑。

人群中又是一阵掌声和笑声。

警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终于设法把叶群等人护送出百货商店上了汽车，返回住地。

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参谋刘吉存回到住地就大发牢骚：“真不像话！主任给我们讲，首长这次来张家口是严格保密的，叫我们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她出去在群众场合这样大喊大叫，保什么密？谁还能保证首长的安全？”

次日下午，林彪一行返回北京。

林彪的张家口之行，使他对西北方向的地面防务稍感放心。但此时主要威胁是来自北面方向，而且主要是来自空中，

而非地面。

在当时，中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完全抵御敌人空中攻击。至于对手搞的核讹诈，当然吓不倒站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但来自敌方可能的核袭击，也不能掉以轻心。

林彪听讲国际动向，特别是苏联军方动向的兴趣，比过去明显增加。“讲文件”的秘书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第 1108 回：防突袭，研究老干部疏散

细安排，筹划与苏联谈判

国庆节平安渡过，苏联并没有袭击中国，但毛泽东高度绷紧的神经没有丝毫松懈，随着 10 月 20 日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将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又做出惊人之举。

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尤其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很可能是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实施突然袭击的时刻。为了应对这种危险，毛泽东明确表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应该于谈判开始前全部疏散到外地。

从张家口返京后，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

根据情报，苏联领导中，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长以 10 月 21 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

会上，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历史上帝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虎视眈眈，

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作好战备工作。他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他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防备核袭击的对策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后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

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对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 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的意见。

接着，康生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大声说道：“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呐！”

周恩来望着江青，不知是什么意思，一时没有讲话。

主持会议的林彪看了看江青，说：

“你是内行，你认为不好的地方，可以修改，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他带来了部署图，预先都挂了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这一下，他准备的材料没有派上用场。

10月6日，周恩来复柯西金9月26日信，指出来信对双方在首都机场会谈达成谅解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应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周恩来再次重申了9月18日信中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4项临时措施，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还宣布中方参加边界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名单。

10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总参10月2日关于建立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警报系统的报告，要求迅速组织落实。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恩来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中国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为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柴成文。代表团成员有：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

首席代表、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余湛；大使章文晋；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后，周恩来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

他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周恩来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谈判准备。

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全线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中国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消灭侵略战争。”在驳斥苏方上述言论和阐明中方立场后，声明又简述了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就两国边界问题等交换意见及中国方面的建议。声明宣布：“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中苏双方就中苏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副部级谈判”。

10月10日新华社报道，在北部湾公海上从事正常捕鱼的中国渔船，连续遭到美国军舰的炮击和美国军机的扫射。

“这是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对我在公海捕鱼的船队连续进行猖狂挑衅的极为严重的罪行”，我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严重抗议”和“严正警告”。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的准备工作于 1969 年国庆节后启动。10 月 10 日，林彪提名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0 月 1 日国庆节，田维新率领沈阳军区代表团进京观礼。抵京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国庆节后，观礼团继续在京参观。10 月 12 日上午，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一位总部机关干部一见到田维新就改变了称呼，一个劲地叫“首长”。田维新对他说：

“你别开玩笑。你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的，我怎么能当你的首长呢？”

那人说：“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我已经见到命令，您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你别开玩笑。”

田维新要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果然，军区已接到命令。很快，田维新和黄志勇被军委办事组叫到京西宾馆办公，办事组组长及组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那里。

邱会作认识田维新。田维新在 16 军任副政委时，邱会作曾以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前去检查工作。一见田维新进来，邱会作便上前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黄志勇。田维新和黄志勇两人是初次见面，又将一起共事，所以两人握手时都很热情。邱会作打趣说：“看你们俩的亲热样，以后能合作好。”

田维新对邱会作说：“我要回去交待一下工作。”

邱会作没有正面回答田维新，而是对办事组的办公室主任说：“给我要陈胖子。”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邱会作拿起话筒对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陈胖子，田维新不回去了，你给他派个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来。”

放下电话，邱会作对黄志勇和田维新说：“限你们在三个月内组起总政治部班子。”

于是，黄志勇和田维新在李德生的领导下负责组建总政工作的具体实施。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一是确定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编制，二是按编制选调干部。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生说：“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人不是照样工作嘛。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 200 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总政机关干部的编制定为 199 人；二是这 199 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按五个“五分之一”选调。这五个“五分之一”就是：

一、从原总政机关选调五分之一；

二、从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干部室选调五分之一；

三、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机关选调五分之一；

四、从军师机关选调五分之一；

五、从团营单位选调五分之一。

10月11日下午，陈毅等四位老帅开会。这是9月16日休会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陈毅说：“在加强备战声中，北京革命委员会送来观看体育表演的请柬，这倒是新鲜事，我想去看看。”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都收到了请柬，他们也觉得这和加强战备的气氛不大协调。

这天下午17时28分至17时32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万名国庆观礼代表。他和林彪先将董必武请到主席台前，二人站立在董老左右，毛泽东带头鼓掌向董必武表示敬意。

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肖华、王力、关锋、戚本禹7人专案审查小组，由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姚文元、汪东兴组成，汪东兴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情况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专列南下武汉。这是毛泽东在本年内第二次离京到外地。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

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当天，林彪在住处听取了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有关北线设防问题的汇报。

这天，军委公布空军战备值班部队，共有 9 个高炮师、16 个歼击机师、6 个轰炸机师、4 个强击机师、1 个运输机师、2 个地空导弹师等。

军委还批复了北京军区 9 月 14 日请示，同意以第 3、2、4、5、6 工区和 13 个工程兵建筑团，给陆军第 24、63、65、66、69 军各组建 1 个步兵师。北京军区于 12 月底完成组建任务。该 5 个陆军师依次称陆军第 71、186（后改 189）、195、198、206 师。为统一番号排列顺序，陆军第 69 军现辖第 28、107 师，依次改称陆军第 205、207 师。

10 月 14 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之苏谈判代表团于 10 月 20 日前抵京。

10 月 14 日晚，中共中央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下发关于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通知，要求在 10 月 20 日以前，在京的老干部全部实施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

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在京老干部的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这件事。

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该项报告确定：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疏散到武汉（已去）。林彪疏散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疏散到郑州。陈云、王震等人前往江西。

老干部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战略预备队由若干个陆军军、空降军和坦克师、地炮师、高炮师组成。

这天，军委命令，陆军第28军于12月底前由福建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同日，军委命令坦克第9师、高炮第67师分别由江苏、山东调往山西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领导。上述部队列入全军总预备队序列。调陆军第43、47军编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第43军于11月20日前进驻郑

州、洛阳地区，归武汉军区指挥；第47军于翌年适当时机进驻灵宝、潼关、渭南地区，归兰州军区指挥。

第 1109 回：林立果，任命空军副部长

看表演，周恩来安排疏散

10 月 16 日 16 时，林彪自北京乘飞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后，乘汽车来到苏州。

林彪未动身之前，先派出一列专车驶向上海待命，车上仅有几名警卫战士，但毕竟是专列，铁路沿线十分重视，一路放行，满以为车上坐着什么重要人物。专列到达上海后，铁路部门自然要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张春桥得知后，亲往车站迎接，但迎到的却是一辆空车。在他的询问下，警卫战士如实相告。

原来，出行前，叶群曾向工作人员宣布：对林彪和她去苏州一事必须对外严加保密，特别是上海，千万不能让张春桥知道。叶群说：“人家很忙，不要惊动。一但叫他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就得专程来看，那就添了麻烦了。”

次日下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乘军用吉普到苏州晋见林彪。

此时，张春桥也知道林彪到苏州了。既然叶群已有态度，张春桥便佯装不知。

林彪一行住在苏州市政府的交际处。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座西式平房里，叶群住在宋美龄曾经住过的一座旧式小楼上，值班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座西式平房里。林彪、叶群的住处与工作人员的住处正成一个三角，相距不过三、四

十米。

林彪住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总参通信兵部派来专人，为叶群的住处和值班室临时安装了军委一号台专线电话。林彪那里不需要通向外部的电话，但在林彪与秘书之间、叶群与秘书之间，特意架上一条简便的“热线”，只要他们想叫秘书，一个电话就能保证秘书随叫随到。

“林办”秘书随同林彪来苏州的只有张云生和李文普，外加一个管收发文件的保密员。其余秘书全在北京留守。

叶群到苏州后，向工作人员宣布：“如果江青来电话，问首长现在在什么地方，只告诉她她在南方，不要具体讲在苏州。”

但事隔不久，江青来电话，让叶群回北京一趟。叶群却说：林彪老是出汗，她离不开。于是江青说，她自己来苏州好了。

叶群为了挡江青的驾，一面派人去杭州、无锡重新为林彪物色房子，准备一旦江青硬要来就搬家。叶群一面给江青打电话劝阻。

江青人确实被挡住了，但还是把她致全党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和标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的附件寄给了林彪。江青特致林彪短信一封，在信中主要是讲她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苦于

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其实，两个月前，8月9日，江青就已经致信林彪，林彪未予理睬，是叶群让保密员李根清替林彪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将江青的信批给政治局，最后被毛泽东扣压。谁想事隔数月，江青又找上来了。

秘书将江青寄来的这些东西讲给林彪听。林彪仍然像上次一样说：“压下，不予理睬！”

叶群从她住的那幢旧式小楼走进来，大声对林彪说：“不理睬怎么行，这个人，你能得罪得起吗？再说，这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文革中除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听说她那封长信，是那个小的起草的，已经改过八遍。人家当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挥就给压下了，不能恨死你吗？”

叶群说的“那个小的”是指姚文元。

“你说怎么办？”经叶群一说，林彪反而没了主意。

叶群故伎重演，又让李根清以林彪名义批了“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事先，她与周恩来电话通气，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东西批给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叶群放下电话却说：“这个球总理不愿接也不行，还是得踢给他，明知要在主席那里碰钉子，那就让他去碰好了。”

叶群果然又说中了。江青的材料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碰

壁，送到毛泽东那里后又石沉大海。

毛泽东、林彪离开北京后，总参谋长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于 17 日前，进驻北京郊外山区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前指的各级工作人员于 16 日午夜接到通知，立即连夜向外秘密转移。他们的家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临时工作班子，进驻与军委办事组相邻的既定位置。周恩来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17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969年2月16日，林彪曾给空军吴法宪指定帮助林立果的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信：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二月十六日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

10月的一天，叶群对吴法宪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

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101’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101’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此前，毛远新已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吴法宪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于是，他考虑是否让林立果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空军即可任命的职务。他同空军党委的人作了研究，吴法宪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

此时，空军党办已合并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经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0月17日，由吴法宪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命令，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3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周宇驰和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三人找到家中谈话。他满脸堆笑地告诉林立果：“你的命令下来了。我们欢迎你今后更好地为空军建设出力。你今后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同志汇报。”

王飞、周宇驰立即向林立果祝贺，并表决心：“今后我们一切听林副部长调动，听林副部长指挥。”

林立果谦虚的说：“感谢吴司令和空军党委的培养。”

吴法宪说：“空军党委办公室情况你已了解，作战部情况还不大了解，请王飞找梁璞和作战部的同志向林立果介绍一下情况。”

当天下午16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听说我们老虎升官啦！”

吴法宪说：“是啊，这是你做母亲的教育有方。”

“还是靠空军的培养。”叶群说：“看来，我儿子比他姐姐要强了。”

叶群的投石问路立即得到回声：“林豆豆也不错嘛！在《空军报》很起作用。空军政治部已提出要任命林立衡当《空军报》副总编辑。”

叶群表示欣慰，说：“我的儿子、女儿都交给空军了，是你们的干部，今后就由你们安排了。”

吴法宪说：“有什么事，我会向林副主席和你请示的。”

不久，林立衡也被任命为《空军报》社副总编辑。

当时空军作战部部长是鲁珉，原在南京军区空军任训练部长，两个月前才调到空司任作战部长。他看到了林立果任空军党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却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一天，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时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鲁珉说：“林立果要到指挥所看看，你陪他，并告诉曾副司令员一下。”

陈绥圻说：“林立果对空军的情况不熟悉，我们领他一下。我和你一起在空军办公大楼门前等他。你通知一下司令部情报部、通信兵部、雷达兵部的部长们都来，好介绍情况。”

不久，林立果和周宇驰一起开车来到空军大楼前。陈绥圻上前和一个身穿空军服装，高高的个子、浓浓的眉毛、面色白净、举止文雅的男青年握手，并把他介绍给鲁珉说：“这位就是林立果同志。”

在一旁的周宇驰也向林立果介绍说：“他就是作战部部长鲁珉同志！”

林立果上前和鲁珉热烈握手：“您是空军的英雄，训练作战有丰富的经验，我是一个新兵，要好好向你学习。”

鲁珉回答说：“我欢迎你到我们部里工作，我要向革命小将学习。”

陈绥圻插话说：“鲁部长，我们年龄虽然都比立果同志大很多。但是，他是林副主席亲自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水

平比我们这些人高得多，对我们空军工作的贡献也大得多。”

周宇驰连忙说：“立果同志还不熟悉作战部的情况，鲁部长多和他谈谈。再找个时间，把作战部副处长以上干部召集起来，请立果同志与大家见见面，讲讲话，好开展工作。”

陈绥圻和鲁珉领着他们在空军大楼转了一圈，又进指挥所看了看。

快到中午了，陈绥圻说：“鲁部长，陪立果吃顿饭，我准备了一些螃蟹，招待招待你们。他是最喜欢吃螃蟹的。”

在吃饭过程中，鲁珉注意观察林立果。他吃螃蟹只吃蟹肚子里黄和大块的肉，完全可以吃的蟹腿却随便扔掉，吃水果也是浪费很多，表现出了他在优越环境下长大的少爷作风。

在送林立果、周宇驰出来时，鲁珉对周宇驰说：“林副部长是不是要到作战部和大家见见面？”

周宇驰说：“我回去跟林立果讲讲。”

过了没几天，林立果果然到作战部来了，和部里副处以上干部见面并讲了话。他说：“我是个新兵，在空军是个小学生。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鲁珉考虑马上给林立果腾一间办公室。周宇驰对鲁珉说：“他一般不到机关来上班，腾办公室的事以后再说。部里一般业务上的事不要找他，让他集中精力调查研究有关空军建设的大问题。他要看什么资料，可以交给我送给他看。”

事后鲁珉专门问过王飞：“要不要单独给林立果搞个办公室？”

王飞也说：“你不要搞。”

鲁珉又问王飞：“要不要在我的屋里给他摆个桌子？”

王飞说：“你不要摆，他不会来的。”

果然，林立果从此没再来过作战部。

这期间，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

10月17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邀请在北京外宾两千多人，今晚观看了我国优秀运动员的体育表演。体育表演在新建的现代化的首都体育馆进行。”“表演受到了全场中外观众近两万人的热烈鼓掌欢迎。”报道最后提到：“观看表演的，有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王震、邓子恢、陈云、陈毅、陈奇涵、李富春、张鼎臣等。”还有一些未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老干部观看了表演，新华社未作报道。

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把出席观看表演的老干部引入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几位成员来了。他们分批会见了这些老干部，并由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

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当晚的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向他们传达。

当天，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已全部撤离到北京西山。周恩来将中央已撤到西郊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周恩来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单独通知，时间略早些。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对她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

曾志回家告知陶铸。此时已患癌症的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护士又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第 1110 回：细安排，林彪苏州述“六条”

速整理，总参发“第一号令”

10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有关部门发表了《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当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这天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忠打电话，了解首都机场及附近地域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发生意外事件时的应急方案。吴忠作了扼要报告：卫戍区不但在首都机场而且在各个军用机场附近，配置了数团齐装满员能够快速起动的地炮、高炮、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各部队都制定了反空袭、反空降方案，具有应付相当规模意外情况的能力。周恩来听后仍不放心，他殷殷叮嘱：

“你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要接受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你们特别要把机场的调度指挥系统控制起来，部队不一定多，但要精悍。还要注意，我们不首先开枪。所以，部队要作两手准备，要配备一些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要挑选一些会武术的战士去执行这个任务。”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吴忠立即把卫戍区副参谋长邱巍高找来，作了具体布置，并要邱巍高到现场组织落实。吴忠又把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执行情况向总参作战部作了汇报。

阎仲川得到报告后，指示作战部的一位处长去现场对卫戍区部队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情况进行检查。

18日，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20日前离开北京。”

聂荣臻给周恩来打电话申请：“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

这天上午，陈毅邀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姚广和熊向晖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向前、聂荣臻传达了中央的疏散通知。

陈毅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总理已作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

他最后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聂荣臻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李富春去广州。另外，陈云、邓小平去江西。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并说他自己对郑州不熟悉，希望去邯郸。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到江西省革委会，通知

陈云、王震、邓小平要疏散到江西。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特意交代了邓小平，说：

“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还有陈云和王震）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 60 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放下周恩来电话，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连夜驱车 350 多公里，向正在婺源下乡的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的汇报。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表示：“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省委招待所），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介绍与汇报，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作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 3 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做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冲击揪斗

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接到江西省革委会电话后，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程世清与有关部门商定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19日，周恩来通知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聂荣臻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褡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

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女儿聂力都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他只带上孙女和3名工作人员，于10月22日来到河北省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

导汇报战备情况。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和兵力等情况。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

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1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我们再看林彪，他到苏州后的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17时许，就让内勤将随林彪一起到苏州的秘书张云生叫过来。

张云生以为林彪可能是叫他去讲文件。因为刚到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他还没有时间认真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他走进林彪的房间，看见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见他进来后，便停下脚步，说：

“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他示意张云生作下记录。于是张云生坐下，林彪仍然站着，像往常那样，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

“一、……；

“二、……；

“三、……；

“……”

林彪一共口述了 6 条，基本意思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 10 月 20 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样。

“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秘书。

“记下来了。”

“再念一下。”

秘书照念一遍。

“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

“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张云生请示道。

“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

看！”

张云生来到叶群那里，把林彪口述的 6 条记录稿给了她。叶群看了一眼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

“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

张云生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

“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事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

“第二，”张云生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

“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张云生说完，就站了起来：“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

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

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101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

“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

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

“什么建议？我想听听。”

叶群重复了秘书说的那两条意见。

“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张云生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

“再压多久呢？”张云生问。

“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

两个小时以后，当晚19时左右，张云生秘书见林彪、叶群那边再无动静，说明没有变化，便拿起电话，让北京的军委一号台总机找总参谋长黄永胜。

黄永胜此时正在西山的战备指挥所，电话接了过去，张云生向他传达了林彪的6条指示，黄永胜答应说：“好，我马上就办。”

而后，张云生将这个电话稿的原件以“首长让黄永胜去电话”作标题，存放在档案柜里。

18日晚20时左右，住在山下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接到黄永胜秘书打来电话，请他立即上山商谈工作。

黄永胜住在山上最高处原为林彪修建的一栋房子里，距山下阎仲川的住处约一公里。阎仲川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在黄永胜的客厅。黄永胜的客厅兼做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会议室。只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阎仲川刚一进屋，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

阎仲川赶紧打开保密本。

黄永胜没有照着记录念，也没有分条条。他只上过三年学，但在他们那一拨老红军中文化水平已不算低了。由于这是紧急的事情，他就自己记录了。但他毕竟文化有限，不是秘书、参谋，只记下了林彪指示的大意，所以，在向阎仲川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条理，有些地方他还要做解释和补充，弄得阎仲川也分不清哪些是林彪指示原文，哪些是黄永胜的话。

记录完毕，阎仲川问道：“怎样向下传达？”

黄永胜不假思索地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

在场的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都没有讲话。

阎仲川随即来到设在黄永胜住处旁的作战值班室。但是

他要把林彪的指示传达到全军各大单位，就不能像黄永胜讲的那样简单，真的随便用电话“说说就行了”。为了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他必须写出稿子，逐字逐句传达。阎仲川略作思考，便找来一名值班参谋，让他按照阎仲川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传达稿写好后，阎仲川稍作了一些修改，然后两眼凝视着稿纸说：

“加个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阎仲川想了想说：“这是我们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号号令”，经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阎仲川让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阅签发。值班参谋很快便回来报告：“黄总长的秘书讲：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身体不适，今天提早服用安眠药睡下了。”

阎仲川知道，多年来黄永胜全靠药物入睡，用药量很大，不宜再叫醒他。他看了看手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如果苏联真的要发动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传达和落实林彪指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间宝贵，一刻也耽误不得。他果断地决定：立刻向有关单位传达。

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

的贯彻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够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阎仲川指示值班副处长王显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

为了缩短传达时间，阎仲川指示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作战部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号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林彪的指示经过黄永胜、阎仲川两个环节的转述、加工，基本精神未变，文字确有不小变化。张云生传达的原稿标题是《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时，讲的是“林副主席指示”，经阎仲川整理加工以军委前指名义发出时，又简化为“第一号号令”；在传抄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把“第一号”写成“第一个”。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将“号令”依次下达给北京、沈阳、新疆、兰州、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武汉、成都这十一个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

参谋人员在紧张地传达，阎仲川也在紧张地继续思考。他感到，“第一号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合同号令，对于赋有特殊任务的部队、机关和业务部门，还需要分别给以具体指示。特别是二炮部队，情况尤为特殊。黄永胜在传达林彪指示时，只讲了二炮部队要作好战斗准备。阎仲川认为：第一，这样讲过于笼统。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第二，虽然二炮部队组建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大家都知道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倘若将它的任务写入合同号令之中，将会引起很大震动。于是，在下达“第一号号令”的当天，他又专门给二炮部队下达了“第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当天又

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第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要求按照国庆期间战备工作要求转入战备状态。凡已组织精干指挥班子、有隐蔽指挥位置的单位，应立即进入指挥位置；全部人员要做好就地疏散的一切准备。

前指值班室正在向下传达林彪的指示，又接到张云生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下：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阎仲川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

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立即与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43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干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21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堤被炸，对北京地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

要来源，因而除非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的意见上报后，林彪再无新的指示。

第 1111 回：急件到，毛泽东火柴烧掉

大疏散，苏联代表团抵京

总参谋部阎仲川几个号令全部下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阎仲川是一个老参谋工作者，几十年从事作战业务的不平凡经历，使他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养成了雷厉风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检查今夜的工作，他深感关系重大，但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此事的处理却未免过于简单。黄永胜是他的老领导，1952 年华南军区撤消，原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黄永胜改任中南军区参谋长，阎仲川是军区作战处（部）副处（部）长。此后，他一直在黄永胜领导下工作。黄永胜对阎仲川的使用可谓放手、放心。阎仲川对黄永胜很尊重，但在工作中他却不惟命是从，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黄永胜办事比较粗糙，在广州军区时，阎仲川作为老参谋，经常帮他堵漏洞，先斩后奏的事也有过。

对今夜发生的事情，阎仲川深有感触：林彪的紧急指示，是涉及千军万马甚至影响全国的重大决策，黄永胜却只是草草作了交代，也不审阅指示稿，便早早入睡，未免过于草率。阎仲川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无暇再作更多的思考。4 个号令下达之后，各单位很快作了反馈，报告请示接踵而来。

广州军区于 18 日 23 时 15 分收到号令稿，军区首长立即到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丁盛便率领军区前指人员按预定方案进入郊外山区指挥坑道，主管作战的江燮

元副司令员则住进作战值班室。军区根据号令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向军以上单位和军区空军、南海舰队发出贯彻号令的具体要求。19日1时40分，便将贯彻执行情况向军委前指作了报告。

随着号令的传达，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随即，这个“一号号令”很快就传达到了全国。

那时候，战备不仅是军队的事，地方也有责任，“全民皆兵”。而且，军区领导人还都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也立即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当时习惯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于是连夜就把指示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到街上，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有些群众大为惶恐。

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工作进入高潮。

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据情报报告，沿中苏边境一带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似有向中国前沿推进的趋势。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已呈现剑拔弩张之势，似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

10月19日，叶群才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

传阅件先送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到急件后，立即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汪东兴说：“烧掉。”

汪东兴原以为毛泽东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却看见毛泽东自己已经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毛泽东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汪东兴着急了，赶紧对毛泽东说：

“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毛泽东听了，这才作罢。

1969年10月19日这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最紧张的一天。远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电话联系。

林彪平时在中午12时以前就开始午休，但这天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吩咐秘书盯住北京电话，探明这架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起飞，何时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何时飞越中国边境小镇二连，何时飞经张家口，何时飞近中国首都北京。然后让秘书一步一报。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秘书转报北京传来消息：“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已经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代

代表团在库兹涅佐夫的率领下，已经从飞机上走下来。……我外交部官员上前迎接，……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汪东兴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恩来惊诧地问：“烧了？”

汪东兴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恩来没再说话。

依然是这天晚上，22时左右，正在作战值班室继续了解各单位贯彻林彪紧急指示情况的阎仲川坐，得到通知，到黄永胜哪里开会。会议室里坐的还是昨晚那几个人。还未等阎仲川坐定，黄永胜便大声问道：

“你们昨晚发的那个电报稿，为什么叫‘一号’号令？谁是‘二号’？”

黄永胜的质问突如其来，阎仲川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一时无法回答。稍停，他解释说那只是个编号，是前指发出的第一份文稿，所以编为一号，以后还发了第二、第三、第四号号令呢！

“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的指示扩散到地方呢？”黄永胜又问。

阎仲川听出了一点门道：准是有的单位把林彪指示扩散

到地方，出了问题。军内问题特别是涉及内部机密的事项一般不向地方通报，这是常识问题，本不需要特别关照。当然如果预见到可能向外扩散而发生不良后果，提醒一下也有必要，但这次阎仲川确未想到。他正想表示对此承担责任，吴法宪为他说了一句解围的话：

“这事当时我们也没提醒他们。”

“你们那个电话稿，如果就叫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不要编号，或者按过去的习惯编号方法，用‘参作字××号’就好了。”邱会作也插了一句。

阎仲川还是不明白这个编号有什么问题。

“这个事情你们搞得可不好啊！”李德生也笼统地说了一句。

李作鹏一言不发，此人一向话少。

没有人讲话了。

黄永胜扫了大家一眼，说道：“总理不是叫我们给各大军区领导打个招呼吗？大家分分工，分头打电话吧！”

于是大家纷纷自报单位。无人提到的单位就由黄永胜分配。在打电话的间隙，几个人不时互相交谈。阎仲川从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谈话中，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他们刚刚在周恩来那里挨了批评。林彪的指示是发军内的，但是，由于在地方也做了传达，声势很大，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一个省闹得更邪乎。这

些情况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19日晚，周恩来把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看来他对“一号”这个字眼极为敏感。又问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应有的混乱？这回黄永胜的粗线条工作作风受到惩罚，他因没有审稿，对周恩来的提问无法解释；其余四人也都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场面极为尴尬。

20日上午，黄永胜把前晚发出的4份电话稿全部要去，进行审查。他看后又发现了问题：

“林副主席的指示原来只有4条，现在怎么弄成了6条？你们把我们办事组的意见同林副主席的指示都混到一起去了！”

阎仲川心想：“你传达的时候，可没说哪些是林彪的指示，哪些是办事组的意见，而且根本没有分条，现在这6条还颇费斟酌呢！”他委婉地作了说明，黄永胜没再吭声。

当天下午，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黄永胜在会上讲了如何贯彻林彪指示问题，并特意对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又批评了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的指示扩散到地方。

阎仲川也出席了会议。他惊奇地发现，已随林彪去了苏州的叶群，不知什么时候又回到北京，并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当黄永胜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观念时，叶群突然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飞抵北京。团长是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边防军参谋长马特洛索夫为副团长。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中国外交部的许多人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

在当晚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中方代表团副校长、总参二部副部长柴成文，曾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他旁边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

马特洛索夫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10月20日谈判一开始，当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9月18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

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过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

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恩来指出：“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泽东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

接下来，中国代表团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中方人员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

10月20日，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对已被监护一年半的张闻天夫妇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遣送广东中小城市，三天内启程。

王良恩对王稼祥夫妇说：“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信阳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路途上有人护送，信阳那里已把你们的食宿安排好了。”

王稼祥希望能晚几天走，先把病治一下。回答是：“这是中央的决定，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也不是你一个人。”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

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留在北京原审查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干部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刘伯承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床前，要求徐海东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 日，陈毅离京。原定 20 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周恩来被批准后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 日，邓小平离京赴江西。

24 日，张闻天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干部，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此时在吉林省干校；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 10 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过了一段时间，她被允许到广州市内走走，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每天无事可做。李富春的咳嗽越来越严重，

经常牙痛，吃不好，睡不好。

在石家庄的陈毅，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每周3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参加活动。离开市区，要得到省革委会批准。他希望到附近农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张茜读书看报，阅读少量文件。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英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做出判断。”

王稼祥住在离信阳五六里远的一个大院里，围墙四周布置有警卫，不准到工厂、田间同工农接近。朱仲丽回忆：“我们只住一栋房，院内的另一栋房子住着武装战士，由一个姓黄的管理员监管我们。”“那个管理员是一副野蛮的表情，卫兵监视我们一举一动。从北京的囚室放出来，这又是一种

软禁。”

宋任穷、何长工、薛暮桥等人，多数在疏散地的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议上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被送到河南罗山农场。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转到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陈再道、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

实际上，从 1969 年 9 月至 12 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不仅是高级干部，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家属，都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协去了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 9 月 25 日、26 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 月 25 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 月 15 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5 日分两批疏散。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分校，一部分疏散到江西

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第 1112 回：扩军忙，小平、陈云在江西

献勇士，一首政治幻想诗

陈云初到江西，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到南昌，总是住在这里。后来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

邓小平、陈云到南昌后，程世清先去看望了陈云。他对陈云说：1963、1964 年发展速度太慢。他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 100 亿斤粮食；而 1963、1964 年恰恰是实行的陈云提出的经济调整方针。

当然，在程世清眼里，陈云毕竟是来此“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因此除了礼节上的尊敬外，并没有特别热情的交往。1969 年 11 月 16 日，程世清为了某项武器的制造和生产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金工车间视察，正巧 11 月 13 日到这里蹲点的陈云此时正在金工车间。厂领导请示程世清见不见陈云？程世清很干脆地表示不见。于是，厂领导赶紧派人请陈云领到楼上一个小房间休息。随后，程世清才走进了金工车间……

程世清在江西的所作所为，给陈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970 年，程世清在江西农村推行“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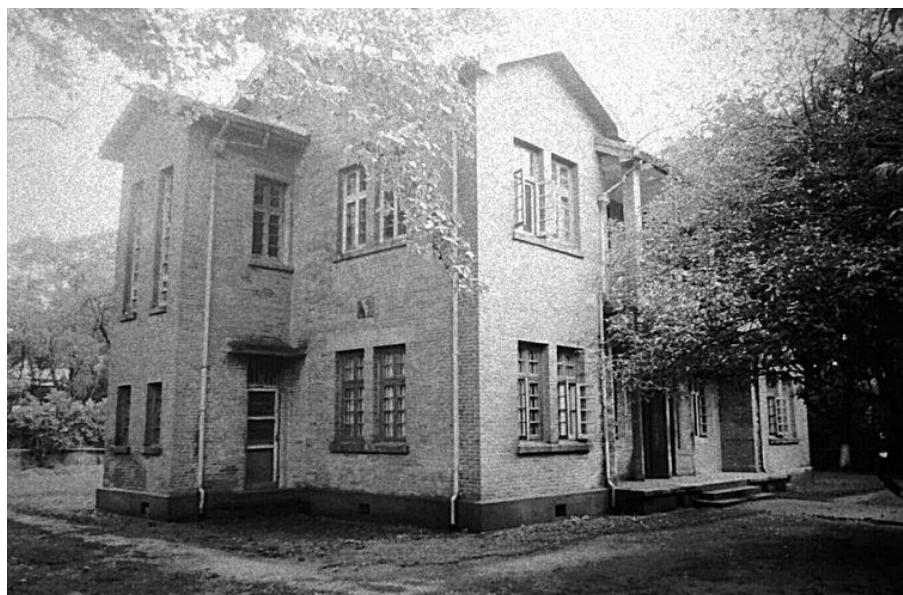
村图”，具体做法是：在“八”字形的山谷上端，建一个小水库，就是“一口塘”，用于蓄水；“一口塘”的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在山坡上盖起了一些农舍，让农民搬迁到那里。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要把农房全部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使数万劳力大干 30 天建成的“旱涝保收”的“梯田”还有新农舍被冲了个精光，农民又回到了他们祖居的地方……陈云从《江西日报》看到这一消息后，就批评说：“程世清呀程世清，看你将来怎样向江西人民交代。”

后来到了 1979 年，陈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再次批评程世清：“‘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像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 15 亿斤粮食。那时，全国每年进口粮食 107 亿斤，江西全年只产 197 亿斤稻谷，折合 133 亿斤大米。他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江西老百姓只剩下 90 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再说邓小平，他到江西后，先安排在江西省军区招待所二楼的一个套间里休息。3 天后，便来到位于望城岗的南昌步兵学校。送邓小平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回京后，写了报

告：

“22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26军76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12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



邓小平在江西住的“将军楼”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在江西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程世清和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代表江西省革委会、江西省军区过来看望邓小平。

程世清问邓小平，来江西后有什么体会？

邓小平回答：“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

程世清便调转话题，谈了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

然后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

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

程世清只好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整个见面过程，不到 10 分钟。

走时，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

在江西省革委会的指示下，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要求：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新建县委也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严格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准干扰这个厂，县有关部门见到江西省革委会派出的邓小平管理秘书黄文华落款的条子，需要什么就立即给什么。由于采取了比较周密的保护措施，邓小平自己除了一次在劳动中晕倒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1969 年 10 月 21 日，军委命令，陆军第 24 军由河北唐秦地区移防承德地区。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颁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规定指出：部队执行生产、施工、训练、助民劳动任务和正常部署调整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

兵种批准，报总参谋部备案；团（不含）以下由军委办事组批准；团以上报毛泽东及林彪审批。部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仍按以前规定执行。师、团机关离驻地野营训练，一周以内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军委办事组备案；一周以上报军委办事组审批。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行动、原则上仍按军委办事组 1968 年 4 月 26 日规定执行；对中苏、中印边境地区，无论大小部队的作战行动，均报毛泽东及林彪或中共中央常委批准后方可行动。为不失战机，可预先报告方案。对内地的平叛剿匪和东南沿海以及中缅边境的国民党军残部小股袭扰的反击作战，可边行动边报告。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部队的调动，营以下由各军区、军兵种批准，报中央军委备案，营以上报毛泽东、林彪或中央常委审批。

10 月 22 日，军委电复兰州军区 8 月 9 日请示，同意从军区机关和步兵学校抽调人员，组建 1 个陆军军部：陆军第 19 军，将陆军第 55 师、守备第 32 师和步兵第 3 团划归该军建制领导。

10 月 23 日，总参向各军区、海、空军和北京卫戍区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做好疏散部队工作，继续保持良好战备状态》的指示。指示指出：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逐渐转冷，要做好疏散部队的工作，减少非战斗减员，继续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指示要求：所有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抓紧时间进行战

备训练，保持常备不懈。

10月27日，军委发布各军区组建和扩编部队的命令。根据该命令，北京军区组建1个榴炮师（炮兵第16师）；沈阳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1个高炮师（炮兵第74师）；南京军区以该区野战高炮群为基础，组建1个高炮师（炮兵第75师），在安徽霍丘城西湖农场和江苏泰州红旗农场各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73、75师）；济南军区将陆军第26军第76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26军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78师），组建1个坦克师师部（坦克第13师），兰州军区骑兵第2师改为陆军师（陆军第20师）；广州军区陆军第55军第215师改归福州军区建制，另给55军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165师），另组建4个陆军师（陆军第142、143、145、146师），分别负责接管调防部队遗留的潼湖、台山、南湾、西湖等大型生产基地；昆明军区组建1个陆军师（陆军第32师）。

10月28日，军委命令，陆军第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接替陆军第69军防区。同时，陆军第69军北移，该军军部从山西太原北移至大同。原驻大同的该军第28师（已改称205师）从大同移防内蒙古集宁地区。

至1969年年底，北京军区达8个野战军的兵力，分别为：第24、27、28、38、63、65、66、69军。至此，加上沈阳军区6个军：16、23、39、40、46、64军，兰州军区2

个军：第 19、21 军，“三北”地区共有 16 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部总数的 44%，这表明了战略防御重心的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10 月 31 日，军委批准空军反空降作战措施：（一）加强反空降作战的思想准备；（二）充实反空降作战力量；（三）研制改进射击、轰炸武器；（四）加强反空降训练；（五）加强空军机场的防御。

11 月 1 日，总政治部开始办公。

11 月 14 日，军委电复昆明军区 10 月 30 日请示，同意在滇西地区组建 1 个陆军军部，称陆军第 11 军，辖陆军第 49 师和新建的 1 个陆军师（12 月 8 日，军委电各军区《变动部分陆军师的番号》，公布该新组建的陆军师称陆军第 32 师）。

至此，陆军军部达至 36 个，是自 1952 年全军精简整编以来最高峰。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柴成文对马特洛索夫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

马特洛索夫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

中苏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 11 月 18 日，苏联又在与中

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

这次中苏谈判一直持续了 9 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此时，大部分红卫兵已经成为知青，但许多人依然心存红卫兵情结，进行着“红卫兵运动何处去”的讨论。一批激进的红卫兵将视线转向了“世界革命”，1968 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划线”运动，许多红卫兵学生被关进“牛棚”。在昆明师大附中的禁闭室里，昆明 10 中、12 中、女中、11 中等校的红卫兵开始秘密商议：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队。1969 年 5 月 14 日，一支知青队伍从盈江小平原出发，几番聚散，经过瑞丽双印，来到潞西三台山邦滇寨。他们在乡村举行讨论会，核心议题是：中国红卫兵向何处去？会上，念了《缅甸共产党党章》，最后决定参加缅共。整个德宏地区边境五县的知青走访串连，最终导致了一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加入缅共游击队。据统计，仅 1969 年 6 月，参加缅甸游击队的“红卫兵知青”就有 300 人，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少数则属于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1969 年秋，一首佚名的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从北京传出，在全国各地流传。全诗共 240 余行，分 5 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

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射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

在“公园里
一起‘打游击’，
井冈山
一起‘大串联’。”
“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

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

“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共同
“编在同一班。”

在战壕里，
我们分吃一份面包；
含吮着一把咸盐，
低哼着同一支旋律，
同盖一条旧军毯。

.....

在冲天的火光中，
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
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风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
“浴血的南征北战”，
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
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

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3颗红色信号弹，
你拍拍我的肩膀：
“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

——这 20 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

“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

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
痛苦直播进我的心田，
空间——消失了，
时间——停止了，
胸中仇恨在燃烧，
耳畔雷鸣电闪。
山岳沉默、大海呜咽，
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

“安息吧，亲爱的朋友！
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联；
胸怀中，激情万千。
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

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
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
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
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伊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将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诗的作者是北京 101 中学高三学生臧平分，他于 1968

年入伍，在福州军区空军雷达 8 团修理所当兵。这首诗写于 1968 年 5 月 22 日。



右一为臧平分



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
人民日报

北京 红旗 洗印

右为臧平分



后排最左为臧平分

第1113回：九二七，中央取缔“北决扬”

鲁礼安，赴黄石铁山被抓

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67号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武汉市出现的“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组织是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其目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对这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而《扬子江评论》是反动刊物，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这就是当时闻名武汉的《九二七指示》，全文如下：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遙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

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 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

报请中央批准。

(八) 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九二七指示》中提到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在武汉简称为“北决扬”，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组织，其核心人物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和冯天文。

鲁礼安 1965 年由武汉实验中学毕业考入华中工学院，分配在造船系。1967 年 4 月 1 日，他贴出大字报，质疑中央《七三批示》中的天津延安中学大联合经验，认为一天内实现全校大联合根本不可能，说这是欺骗伟大领袖的假经验。他的大字报贴出后，当即遭到其他学生的大字报反驳，说他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7 年 4 月 6 日，鲁礼安又以“新华工敢死队”名义，贴出了那篇《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当即遭到武汉警备区通缉，但未被逮捕。

接着，他又在 1967 年 5 月 20 日贴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质疑 3 月 16 日毛泽东批转的中共中央 (1967)96 号

文件：《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认为“抓叛徒”背后有大阴谋。结果被郭保安领导的“新华工”开除。

此后，鲁礼安和他的“新华工敢死队”驻在了湖北艺术学院。

1967年复课闹革命后，鲁礼安他们回到了学校，“新华工”司令郭保安找到鲁礼安，希望他们解散“敢死队”，回校参加大联合。

据鲁礼安后来回忆说，他早有解散“敢死队”的想法，“之所以迟迟未作解散，一大原因是‘三钢’方面特别是工总的头头极力主张我保留新华工‘敢死队’这面在江城造反派中颇具影响和号召力的旗帜，以在即将到来的‘钢新’权力之争中为他们摇旗呐喊。”

10月底的一天，冯天艾、鲁礼安邀请了11人到东湖商谈，决定成立“北斗星学会”，并推举冯天艾为会长。

冯天艾提出要有一个自己的刊物，并将这个刊物起名为《扬子江评论》。他说：“不是有一个《湘江评论》吗？我们这个刊物就叫《扬子江评论》。”

鲁礼安起草了《北斗星学会宣言》。

11月7日，“北斗星学会”成立。就在成立会上，一位工人代表当场站起来尖锐批判《北斗星学会宣言》草稿。当时参加会议还有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员白桦、所云平等

人。会场上还有位武汉警备区的干部不请自到，没有说话，只是低头记录。不少人见状悄悄的走了，最后只有六、七个人留了下来。

“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一号人物梅子慧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梅子慧在“红八月”全体会员会上讲了这次会议内容，并宣读了《北斗星学会宣言》，当即遭到“红八月公社”全体成员的反对，并告诫梅子慧不要和鲁礼安这样的人来往，否则会败坏“红八月公社”的声誉。

“北斗星学会”在水塔墙上张贴了他们的《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是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像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

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

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不久，12月4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武昌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召集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组成员开会。会上，他们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曾思玉抖着手中的一张纸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很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他让同学们离鲁礼安远一点，不要和他搞到一起去。在场许多的人表态“坚决拥护军区领导人的讲话”，批判鲁礼安和那个“北斗星学会”。但是筹备组成员、武汉三中“红反团”的谢保安却对武汉军区领导的这些话非常反感和抵触，但是不敢说出来。

曾思玉的表态让“北斗星学会”中的一些人不安。一个叫周凝淳的人向鲁礼安建议：“毛主席说，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干脆就叫‘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湖北浠水县“巴河一司”占领《湖北日报》后，鲁礼安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12月，在报社的红旗大楼与王仁舟共同建立“湖北省决派联络站”，一些中学生报名参加。鲁礼安还专门到浠水考察王仁舟的“廉价政府”，不知何故，被王仁舟囚禁。从浠水回到武汉，鲁礼安退出红旗大楼，王仁舟以“省决联站”名义贴出《公告》，开除鲁礼安。

此后，鲁礼安等在湖北大学筹建“武汉决派联络站”。12月30日，“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召开成立大会，简称“武汉决派联络站”，设在湖北大学三号楼一个教室里。并发表了《决派宣言》：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

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

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

无不是农民的运动。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赃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门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宣言》的署名日期是 1967 年 12 月 10 日。

在这个成立大会上，宣读了鲁礼安撰写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刊登在当天的《扬子江评论》上，对王仁

舟的“廉价政府”大加赞扬，称其为“共产主义的萌芽”，并说农民运动的新高潮即将到来，预言 1968 年的元旦社论将提出在农村掀起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不久鲁礼安打算解散决派，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不同意，重新选举领导人，鲁礼安落选，水果湖中学学生李希九、无机盐化工厂工人蔡万宝分任一二号头头。在鲁礼安的坚持下，鼓吹“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十二中学生李建生被开除。

1968 年初，有一个武汉 12 中的学生说，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王盛荣知道许多的党内秘史，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党内斗争的情况。于是一天晚上，这位中学生带鲁礼安一行七八人来到王盛荣家中。

王盛荣虽然只是一个局级干部，但资格不浅，是参加过“五卅运动”的老革命，行政六级。年轻时，他曾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过，参加过长征，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

王盛荣非常好客，也很健谈，每天接待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年轻学生，大谈自己的革命历史，也介绍当年他们在白区开展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说他们过去缺少经费，就要找大阔佬、有钱人要。怎样要呢？也不用上门，写封信客客气气地开出数目就行了，但信封里封了一颗子弹。阔佬们一看心里就明白，乖乖地就把钱拿出来。“你们红卫兵现在造走

资派的反，想必也是缺少经费的，也不要搞打砸抢，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嘛，所以打砸抢是不好的。那你们怎样办呢？好办，你们也可以给那些走资派写信嘛，吓他一下，他还不乖乖地把钱交出来。”

王盛荣的一席话让鲁礼安等人听的目瞪口呆。

“我们有自己办事的原则，”鲁礼安说，“我们不会向谁要钱，更不会写恐吓信的。”

王盛荣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什么叫原则？你们还信那个呀？我告诉你们吧，原则这东西，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可肥可瘦，可方可圆，可有，还可无嘛！”

他的这番话又让大家笑成一团。

1968年3月份回校复课时，鲁礼安与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周岳森见了一次面。3月底，鲁礼安突然被“新华工”的张立国、郭保安抓起来“隔离反省，交待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与混进附中革委会权力机构的走资派周岳森是如何见面的”。

鲁礼安从华工逃了出来。随后，针对“新华工”的“关于鲁礼安的初步材料”，他写了三篇“我回答你们”。

1968年5月，“北斗星学会”的社长冯天艾找到“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表示想一起出版一份报纸。聂年生让贺光宇和他一起去商量。冯天艾拿出一份报纸的样稿，名称是《扬子江评论》，落款是“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其

中一篇文章是鲁礼安写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贺光宇觉得矛头明显是指向周恩来总理的，当即表示反对，并向聂年生说明了情况。聂年生也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新华工红反团”另外独立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新华工（聂派报）》。

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一周年之际，《扬子江评论》创刊。其实，它的前身《扬子江》在1967年9月就已出现，1967年12月25日更名为《扬子江评论》。

5月18日，鲁礼安和华中工学院附中的周叔瑜、干小雄、孙彦章三个同学一起前往黄石。而其中干小雄的父亲，就是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任教的干毅，解放前是国民党少将。

此时黄石市占优势的“钢派”正在与“新派”武斗，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就在当晚，鲁礼安几个人在途经铁山时被“新派”抓住。

随后，“新华工”组织了51人赴黄石调查团，调解两派纠纷。他们在经过铁山时，聂年生特地去看了关押的鲁礼安等人，而郭保安则到铁山联防处了解了他们被抓的情况。

第1114回：十月三，武汉修理造反派

判“无联”，山西班移到石门

1968年6月12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又发表了《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一文，系统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文章说：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

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分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 67 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

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6月15日出版的第95期《新华工》报上，整整八个版面都是揭批鲁礼安的“反革命罪行”长文。

“北决扬”人数最多时才20多人，当时影响并不大，造反派几乎无人参加。由于“北决扬”观点激进，公开攻击周恩来，除了“新华工”和“新一中”等“新派”组织大张旗鼓地批判鲁礼安等“决派”的极左思潮外，武汉的“钢”、“新”两派头头都不支持鲁礼安他们。

1968年8月22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曾思玉在省革委会上宣布：《扬子江评论》“是一本极端反动的刊物”，鲁安礼和冯天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8年9月，鲁礼安被正式逮捕。9月19日，又逮捕了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王盛荣、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干毅、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周岳森。9月21日逮捕了“决派”成员冯天艾、蔡万宝、甘勇、周凝淳、张志扬、童丹、马业成、

田国汉、严琳。

1969年5月后，“新湖大”收集了鲁礼安写的大字报和文章，并编成了两本小册子，题目是《把反革命分子鲁礼安揪出来示众》和《把扬子江评论揪出来示众》，供批判之用。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央写出报告，称“北决扬”为反革命地下组织。

第1105回提到的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关于清查“516”问题的谈话中，也特别提到湖北的“反复旧”和《扬子江评论》。

1969年9月27日，中央发出了取缔武汉“北决扬”的《九二七指示》。

10月1日，武汉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前举行国庆20周年的游行庆祝。活动刚结束，站在主席台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和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常委被通知一律到洪山宾馆报到，参加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当天即召开预备会，10月3日正式开会，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作关于“北决派扬”问题的专题报告。他说：

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决派”的反革命喉舌，就是说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为制造反革命舆论而搞起来的。……

一号头头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所谓的“鲁克思”，

是一个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二号头头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1968年7月28日在武汉开的反革命黑会就是他负责召集的。他恶毒攻击我们的党中央，攻击解放军，去年发表的极其反动的“四评”，就是他写的。杨秀林，武汉大学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就因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咒骂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企图外逃投敌，清理阶级队伍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刘丰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

曾思玉插话说：“可以肯定地说，还有一窝子。”

刘丰又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在大会上被点了的名。曾思玉说：“吴焱金得的什么病？气候病。运动来了就装病请假。”

刘丰说：“‘工造’有个严琳说，兄弟是军人，谁要敢撕水塔（决派）的大字报，我就打得他有来无回。”

他大声问道：“吴焱金来了没有？”

吴焱金在下面回答：“来了！”

刘丰声色俱厉地说：“严琳是你的部下，‘工造总司’和‘北决扬’是什么关系，你和严琳是什么关系？你要交待清楚。”

整个会议期间，领导找吴焱金个别谈话，小组会组织对他批判，吴焱金不服气，坚持说自己与“北决扬”毫无瓜葛，“工造总司”与“北决扬”没有任何组织联系，说严琳参加了“北决扬”，那只是他个人的事。

吴焱金说：“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

由于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抵制，不但没有把他本人打成“北决扬”分子或后台，“工造总司”在整个审查会当中也无其他人受到牵连。

有 70 位参会人员在大会上相继发言。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人都受到批判，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本来是一个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深挖狠批“北决扬”的会议，渐渐变成了揭、批造反派头头的会议，后来更是发展成以揭、批“北决扬”总后台胡厚民的会议。

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厚民。

据参会的“长办联司”负责人、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顾建棠回忆：

“10月3日，方铭拿着《九二七指示》对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说：‘指示中讲，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

外，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是合适的。你要第一个上台发言，说胡厚民是现行反革命。”张维荣被迫上台发言，给胡厚民扣上了北决扬总后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张维荣由此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

吴焱金在发言中检讨自己是“以我为核心”来反对别人的“以我为核心”，承认自己反“钢”派“钢化江城”是“以派性反派性”、破坏专县的文化大革命，检讨了1968年揪变色龙、揪武老杨的错误。并揭发胡厚民抵制批判《扬子江评论》，上纲上线说武汉工代会有《扬子江评论》的代理人，武汉工代会成了《扬子江评论》的合法的司令部，反复旧运动是“决派”、《扬子江评论》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工代会进行操纵的。

夏邦银批判胡厚民：“你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原来不痛恨的，现在才痛恨你，你阳奉阴违，现在认识到你是个坏人。”

吴焱金在发言中说：“胡厚民等与王关戚、林杰、吴传启有联系，与王仁舟有联系”。揭发胡厚民说过“林杰的四句话有道理”，即“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组织上结成死党、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革命的造谣好得很。”

在大会上发言引起轰动的有三位：一位是武汉锅炉厂钢工总小头头桂美和，他声泪俱下地承认自己填了表，加入了“北决扬”。被大会树为先进典型。可桂美和回厂不久就自

杀身亡了。

第二位是“新湖大”的彭勋，他在会上说，“一根毒瘤，两个毒瓜”，批了胡厚民，也检讨了自己。他的揭发发言最是声情并茂、深刻生动，在大会上引起了一定的震动。事后，他承认是军区“三办”向他施加了压力。

最轰动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对省革委会常委、“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的揭发批判。朱鸿霞在长篇发言中把胡厚民的思想归纳为“三个长期斗争”理论，即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的斗争是长期的，简称为“新与老、革与保，钢与新的斗争是长期的”。曾思玉、刘丰在大会上带头鼓掌，朱鸿霞顺利被解放。大家听了朱鸿霞的发言，震动极大，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怎么胡厚民是这种阴险狠毒的人？”而胡厚民既不申冤也不辩解，使大家真假莫辨，后来大家去问夏邦银，夏邦银说：“从没有听胡厚民说过这样的话。”

胡厚民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对别人的揭发从不申辩，更不会反过来去揭发别人。尤其是对朱鸿霞，他从不计较。在局外人看来，胡厚民和朱鸿霞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在这次大会上唯一不做检查的就是胡厚民，他一贯认为“违心地作检查就是上走资派的当，是授人以柄，自己搞垮自己，脱离群众”。

胡厚民被打成了“北决扬”的总后台，朱鸿霞揭发出来的“三个长期斗争”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黑纲领，要批倒批臭。

对朱鸿霞的发言，杨道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念了文件（九二七指示）后，中间空了几天要大家自己准备发言稿子。我们（省革委会的常委们）都住在省委 13 号楼，我跟夏邦银交换看了发言稿，但那几天就是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夏邦银说不用找了，朱的发言稿内容都还不是差不多的。后来等到朱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带头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国庆节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

说朱鸿霞“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指的是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朱鸿霞已看到《九二七指示》，当时他对促使这份文件出台的曾思玉、刘丰非常不满，对他们整胡厚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10月21日，杨道远发言，他依然按自己事先准备的稿子念，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一是全国支左抓军内一小撮；二是抢枪，武装左派；三是参加“反复旧”。对“北决扬”，他只是笼统地做些批判，划清界限，因为组织上不沾边，对别人也揭发不出来。

台下给他递了一大堆条子，他觉得自己回答不完这些条

子，也就不回答。发言一结束，把那一堆条子搂起来就下去了。还没等他坐下，曾思玉就开腔了：

“杨道远啊，看那一大堆条子我都替你着急。听你的发言，同志们感到不过瘾，……避重就轻，不痛不痒……你和胡厚民为什么抱得紧紧的，死不放？”

我们再看湖南。

1969年10月，湖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省无联”结案：

“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张家政被判20年

省文艺界“红造团”宋绍文判15年

湖南“红旗军”毕健判10年

“红中会”杨曦光判10年

“高校风雷”周国辉判7年

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张玉纲判3年

“湘江风雷”李仲昆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湖南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

1969年国庆刚过，在北京的山西学习班接到命令，全体人员离开北京，转到石家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继续办班，对学员也继续进行审查。同时，省级机关原副处级以上干部，还有刘格平新政权里各部门的大小头头们，也统统被调到石

家庄去参加学习班。这个庞大的学习班，人员达 8000 人之多。加上后来陆续被调来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的，学习班后来达到万人之众。这大批学员一到石家庄，负责学习班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就做了五不准规定：一不准串连，二不准开小会，三不准外出，四不准通信，五不准接受家属和朋友探视。在紧张的气氛中，再看桌子上的饭菜，也由原先在北京时众多的盘盘碟碟，变成了严格的四菜一汤。每逢开饭的时候，学员中那些群众组织中的头头们，一个个敲着碗筷，没精打彩地走向饭堂。叮叮当当的杂乱交响乐，显露出他们此时内心的不安和酸楚。因为此时他们都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山西的“兵团”司令刘灏想不通。当年他给别人糊大字报，用大字报埋葬着山西“黑省委”的一大批领导人。想不到如今自己也成了大字报埋葬的对象。他感到了无比委屈，同时也尝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刘灏不得不低头认罪，不得不随波逐流地进行着违心的“斗私批修”。

他检查说：“文革初期，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是捍卫红色江山，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带领‘兵团’狠揭猛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了‘黑省委’。首次揪斗卫、王、王，我也站到了第一线，在‘1·12’夺权中我也站到了第一线，带领‘兵团’冲锋陷阵，让‘黑省委’土崩瓦解。后来在两派大联合中，我不图私利，坚决搞大联

合……”

这分明是在为自己的革命造反历史评功摆好。

但也检查出了问题：“后来两派武斗，我迫于无奈才带领‘兵团’起来自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思想……”

以往就善于滔滔雄辩的刘灏，检查起来也是滔滔雄辩。无疑，这样的检查是无法过关的。此时的革命小将，与运动初期的当权派一样，就是想不通也得往通里去想。这样做毕竟是一种痛苦。他想获得解脱，不知怎样就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功过是非让后人评判去吧！是拿定死的主意了，可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又是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在夜深人静之时，完成自己去死的愿望。

等到了一个深夜。同屋的人睡熟了。看来是一个好机会。死是容易的，但死也是困难的。去死毕竟不是去睡眠，如果死如睡眠一样，可以躲过一段时光而日后再能醒来，那就可断言，刘灏这回是“死”定了。问题就出在 22 岁的刘灏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是非弄不明白，却明白死去了就不能再生。当他悄悄地爬起来，又像蛇行一般无声地爬上高楼的窗口时，面对着高楼下漫漫长夜，他犹豫了。只是一刹那间的犹豫，同住一屋的军宣队一位军代表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拉住了刘灏的胳膊：

“你要干什么？”

刘灏如大梦初醒，被人家硬拉回床上后先是捶胸饮泣，

继而沉默不语。从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中，跌入了沉默不语的境地，一句话，他就是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想不通究竟是哪里错了？

那位军代表开始劝他：“你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正确对待群众对你的揭发和批判，要正确对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问题……”

刘灏就曾用“正确对待”教育过业已死去的卫恒书记，卫恒书记也因不能“正确对待”而被刘灏批斗过。

此事惊动了学习班的一位领导，他赶来劝导刘灏：“运动初期你是有功的嘛，但后来你滑进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泥坑，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领导和群众也就原谅你了嘛……”

刘灏终于能“讲清楚”了。就在他自杀未遂后，学习班召开了一次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刘灏带头登台去“讲清楚”，老老实实地讲了，讲他如何对“1·12夺权”想过反夺权，如何在“七月会议”前后表面支持刘格平，暗中并不支持刘格平，如何与“红总站”争权夺利，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干扰了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个半小时的个人检查，一边“讲清楚”，一边泪花儿如雨。

学习班还将山西三大派组织的头头们全都带回太原，让他们一个个登台，向全省人民做斗私批修的深刻检查，会场设在迎泽公园内的湖滨会堂。4年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首都红卫兵就是在这里扮演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为山西送来

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如今就要登台去做检查的这些造反派头头们，当时正是举着从北京送来的火种，发誓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而4年后，他们也要登台去做必须“讲清楚”的检查了。

还有设在各地的分会场：五一广场、并州饭店、南北城区和河西区、各大机关和各大院校以及各大企事业单位，古城太原的每一个老百姓，都会听到这些派头头们在湖滨会堂里哭诉般的检查。

第1115回：说贵州，青岛学习班打架

批二张，王茂聚北京自杀

10月16日，在北京的贵州学习班和参加国庆观礼的贵州代表团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宣布中央的决定：“任命蓝亦农、张荣森领导贵州省的工作；李再含等7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暂不回去，留下继续学习、检查。”

蓝亦农1967年任驻重庆54军副政委的，此时已是昆明军区副政委。

张荣森，时任43军军长。

中央解决贵州问题领导小组为观礼代表团准备了统一的汇报提纲，打印分发给各地、州、市的观礼代表，要求大家回去后都要按照这个提纲的内容汇报。

10月17日傍晚，贵州国庆观礼代表团离开北京，乘火车返回贵阳。

10月20日，李再含在小组会发言中说：“我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坚决照办。实践证明我是两面派，抗拒中央。”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达（69）71号文件，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决定：

（1）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在京学习期间，蓝亦农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43军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

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

(2) 调 6908 部队进驻贵州，担负支左工作。

(3) 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各大学两派组织的部分头头，调来北京学习。

1969 年 11 月至 1970 年 4 月，中央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贵州学习班，全省共有 2019 人参加。

10 月 17 日 23 时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李先念、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中央在北京办的山东、青岛、内蒙、贵州等 7 个学习班的全体学员 14112 名。会议刚开始，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因为有事先走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人讲话。

康生在讲话时指着主席台后排就座的各学习班临时党委负责人说：“我还要补充说一点，对这一排我还有意见。特别青岛班，领导班子不团结，群众都说 67 军和北海舰队不团结，王金泉和韩玉樽先要搞好团结，”

67 军政委王金泉和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韩玉樽两人起立表态。

原来，在北京的青岛学习班上，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韩玉樽在批王效禹时，提到支持王效禹的 67 军的问题，67

军政委王金泉为 67 军辩护，俩人发生争执，发展到互相揪着脖领子争吵。王金泉与韩玉樽都是青岛学习班负责人。

此时，康生继续说：“你们当着 1 万多人表态，要实现诺言，要看你们言行一致不一致。”

接见大会结束已是 18 日凌晨 1 时 10 分，又专门留下青岛班负责人王金泉和韩玉樽。

周恩来首先批评二人：“你们不团结没道理嘛！”

黄永胜：“你们没道理嘛，两年来打官司。”他对 67 军的王金泉说：“我第一次接触你印象就不好，到现在还如此。你的派性挺足，你不像个样子，你是个老同志嘛，连党性不要了嘛，连原则都不要。你 67 军反北海舰队干什么？你的毛泽东思想就那么多，北海舰队就那么少？你一直那么搞，你跟杨保华站在一块。冲击潜土校，你不制止。”

王金泉作了回答。

周恩来：“那时我认为你也是批王效禹的。是不是你们支持了，转不过弯来？‘九大’以后态度应明朗嘛。”

周恩来说的“那时”是指“九大”期间。

李德生说：“中央对王效禹的问题有了决定了嘛。”

李作鹏说：“北海舰队开始支左，卢仁灿犯错误，67 军搞得开。后 67 军支持搞反复旧，搞了个稀巴烂。北海舰队你们也有毛病，不应该抓住小辫子不放，应是帮助态度。你不是急躁，你胸怀狭窄，你光看人家的缺点错误，看不到自

己的缺点错误。”

李德生继续批评王金泉：“你过去认识不是还可以嘛。中央指出王效禹的错误还不觉悟就不对了。你的旗帜不鲜明嘛。……”

康生说：“王金泉同志我怎么看你精神不那么振作，骄傲的人受了批评就泄气了？黄总长批评你骄傲，连杨得志的话都不大听。”

李德生：“你唯我独尊。”

周恩来：“青岛的漏洞就出在军队，军队根本不允许对立。你们不是听毛主席的话，听外边的话……”

1970年3月10日，67军军部和部队撤出青岛搬到淄博，支左人员也从地方返回部队。

1969年10月29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提到“516”的问题。他说：“学部和文化部系统方面，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当然，还有高教部。”

鉴于四川省1969年上半年受“反反复旧”运动的影响，以及当时地、县严重的武斗情况，1969年10月29日，周恩来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关于四川问题的汇报。第二天，周恩来致函毛泽东、林彪：“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周

周恩来提出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毛泽东 31 日批示：“同意。”

四川一班人又被拉到双流机场，直飞北京。重庆的黄廉问李木森是怎么回事？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回答说：“中央准备第三次解决你们四川的问题。”

到了北京，大轿车将他们拉到京西宾馆，当晚就正式开会。从 11 月 5 日开始，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

台上坐着周恩来和康生、陈伯达、李先念、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首先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毛主席说从前是这样，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找来解决四川问题，有些是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再来问一下，王茂聚同志，在攻打泸州的问题上，你调部队过去，有这个事情没有？”

王茂聚回答说：“当时泸州一派受压，我们不去支持，一派就要被消灭。”

康生：“我看你为人还算老实，是个木匠出身，办的蠢事也不少，身为政委，怎么调动军队去镇压？”

王茂聚回答说：“这个事情我向总理请示过。”

周恩来说没有说话。

康生又问：“彭家治来了没有？听说你把石油局的车子都开出来了，全部开出来干什么？真是败家子，什么英雄，搞武斗也是英雄？”

周恩来：“你英雄好好当嘛，当败家子干什么，我看你干坏事也干不出。”

康生又问邓兴国：“你派性克服了没有？”

邓兴国写了个东西准备发言，但此时一着急找不到眼镜了，双手在桌子上到处摸。康生说：“你是工人，还戴了眼镜，不像个工人。”

邓兴国回答说：“我在努力克服，派性是两方面的问题。”

康生又问：“谁叫康自忠？你写了个啥子东西，说革委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三结合也是一个形式，我们两个人500年前是一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

接着，康生又把郭一明点起来，说：“你在省革委会办事处组，办的是什么事？你恐怕是跟派性办事吧。”

康生一个个挨着批评，最后抱了一摞材料，是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康生边翻边念：“革委会是穿新鞋走老路，新瓶装旧酒；目前按劳分配是一个空壳，革委会所用人员还是旧省市委的人，还是按照老原则办事。”

这些都是黄廉等人的言论，康生念完之后，马上问：“黄廉来了没有？”

黄廉站起来，康生又对黄廉说：“你说反复旧，我看必
复旧。”

黄廉笑了，说：“我写文章就是给人看的。”

康生又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黄廉说：“是秘书工作。”

康生问：“不是说是会计吗？”

周恩来说：“听说你是海军的？”说着，他回头去找李
作鹏说：“这是你的部下。”

周恩来又对黄廉说：“你还精干，也会写一些东西，不
要再搞小报了，毛主席已经不看小报了，还是要克服派性。”

周恩来接着说：“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看你们怎么
搞武斗的电影。”

大家散开了，黄廉仍在桌子上埋头记与康生的问答，周
恩来走到他的桌子边上，问黄廉：“干什么呐？”

黄廉说：“整理记录。”

周恩来说：“出去走走吧。”

黄廉说：“好。”便站起来和周恩来边走边聊。

周恩来问：“你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
知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

黄廉回答说：“见过蒯大富，‘516’不知道。”

周恩来说：“你们夺权之后，还是要好好支持革委会。”

周恩来提到刘结挺、张西挺的派性问题，黄廉说：“根

子还是在军队。”

周恩来说：“黄廉，回去之后，还是要把革委会的威信提起来，还是要依靠军队。”

这时，周家喻也走了过来，周恩来对周家喻说：“你这个知识分子也是派性十足，你那个‘815’要注意一下派性。”

周家喻回答说：“我们谈不上派性。”

周恩来说：“你们看了电影之后就知道了。”

周恩来走后，已调防重庆的13军何云峰政委和苏副政委过来问黄廉：“总理谈了些什么？”

黄廉对13军没好感，心里想：“你们13军不知道整了我多少黑材料。”于是没好气的说：“没有什么。”

李大章也过来打听，黄廉说没有什么内容。

郭一明被康生骂了之后，萎靡不振。

休息过后，召集大家看王茂聚等人拍的记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拍摄的是“武装支泸”的事情，康生一开口就骂：“什么红旗飘，我看是黑旗飘。”

影片里面有打死人的尸体，燃烧的钟楼，王茂聚去送花圈的场景，康生大声问：“王茂聚，那个人是不是你？你看那个钟楼。”

影片中间有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康生就说：“你看派性害死人，你们真打敌人有没有那么勇敢？为了派性就这样。”

康生从头骂到尾，电影放完灯一亮，康生说：“四川怎么搞得好？你们明天就去讨论这个问题。”

陈伯达也说：“同志们要谦虚些，一个人要多找自己的毛病，多检查自己，你们要克服派性，不要光看到别人的缺点，派性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能不能斗自己的私，你们要克服派性，我有一首诗送给你们：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节末路之难也。”

周恩来说：“伯达同志的话需要翻译，他说最后的几步才是最艰难的，保持自己的晚节，最后的几步路往往是最难以做到的。”

过了半个月，11月21日晚上，王茂聚在京西宾馆住处自杀。

黄廉听到这个消息，就问与王茂聚同住一个房间的内江市革委会主任段守章是怎么回事，段守章说：“我出去耍了一会，回来就看见老王悬在窗户上了。”

黄廉随口就来了一句：“老王肯定不会是自杀。”

旁边的13军政委何云峰一听，脸色都变了，赶紧说：“黄廉你不要乱说，不要看中央领导对你好。”

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认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除了群众外，而在省革委会领导。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

建设的请示报告》。

四川省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在报告中对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集体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揭发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

《报告》提出：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实行统一领导，改变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状态；按军工第一、三线第一、配套第一的要求，把国防急需的重要项目、配套项目、对全局关系重大的项目和已经基本建成能够很快投产的项目迅速搞上去，改进三线的物资供应。

12月5日，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再次召开会议解决四川问题。12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69）87号文件，对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做出批示，决定调整四川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确定了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决定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

这次四川省革委会的调整，增加了两位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和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谢正荣，增补了四位部队常委。免去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826”派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者总团”负责人王阴均和梁善计的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免去的理由：王阴均已确定复员，梁善计犯有严重错误。

关于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中央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12月27日20时25分至28日0时10分，在京西宾馆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接见四川省革委及成都军区学习班成员。

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点了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他说：“省革委自始至终个别领导人，就是他们自己写的，错误的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他们这个是最大的错误。把群众搞成两派长期对立。”“‘二月镇反’到我们5月‘红十条’中央批示的时候，问题已经解决了嘛。如果不是王茂聚在那个地方‘武装支泸’闹得那么凶，形势也不会那么紧张嘛！”“现在我们查出来，王茂聚同郭林川在‘武装支泸’的前线打给省革筹小组的那个电报，坏透了，那完全是诬蔑，乱说。”

“在四川就是刘、张说话算数，别人说话不听，连张国华说话也不行。张国华同志也无可奈何。”

周恩来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是个人野心家。”为了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中央同意为四川再办一期5000人的学习班。泸州两派头目，被召到北京参加学习。

会后，让黄廉和周家喻回重庆传达会议精神。回去之前，周恩来在四楼会议室单独接见了重庆组。

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回去，两个都要作自我批评，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正确；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安定团结，要支持革委会发挥作用，把生产搞上去；回去的任务是着重作团结工作，要批判刘、张陷入派性的错误，克服派性很重要。”

黄廉在会上谈了一些具体的困难：革委会虽然成立了，解决问题很困难，一些基层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但是军队依然有倾向性，清队也是一派清一派，名义上是团结，实际上是暗斗。

周恩来说：“你们两个要首先团结起来，军队要起主要作用，必须一碗水端平。”

何云峰说：“过去有对不起‘反到底’的地方，但是不存在支一派压一派。”

周恩来最后说：“黄廉，刘、张是有偏向性，周家喻你一派自认为有优势，都要作自我批评，你们两个就起带头作用，懂不懂起带头作用的意义？”

第1116回：十一五，湖北学习班开学

一号楼，刘少奇开封逝世

与四川班开办的同时，1969年11月5日，刚刚结束的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人员及武汉市“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也来到北京的空军学院，参加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长是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副组长是“工造总司”成员平毅，成员有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刘海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大家按单位、系统组成班、排、连，从班长到连长，大部分由军人担任。

学习班宣布了“五不准”的纪律：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互相传播消息。一句话，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武汉搪瓷厂“钢工总”头头刘荣辉曾感叹道：“我的最大愿望是尽快结束学习班，最小愿望是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

虽然人身不自由，但气氛还不紧张，甚至还把三次蝉联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削球手张燮林请来，在大礼堂为大家表演精彩球技。伙食也很不错的，每餐都有荤有素有汤，主食的花品种也不少，大家对伙食一直是满意的，不少人长胖了。

11月底，武汉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头头共300多人也进京参加中央学习班。

12月3日傍晚，陈伯达在纪登奎等陪同下来到中央学习班湖北班，参加他们的开学典礼。全体学员在张昭剑指挥下，列队夹道鼓掌欢迎。

陈伯达看到水院的学员伍必慧，惊讶地指着他问：“你们怎么把中学生也叫来啦？”

当他听说伍必慧是大学生后，又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反反复旧’？在‘九大’期间，‘反反复旧’是严重的反党事件。”

在开学典礼上，陈伯达说：“这个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林副主席是咱们的校长，你们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来的，这是毛主席对你们的亲切关怀。你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根据陈伯达的指示，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开小组会，联系湖北、武汉实际，深入揭、批“北决扬”，挖出“516”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总头目。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

中央决定执行“战备疏散”后的第三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告知刘少奇要转移到河南开封，已通知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作好准备。

此前，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领导根据“保密、安全和

有暖气”的要求，秘密为刘少奇寻访驻地，选中了北土街 10 号，这里有一个带天井的院子，最早是银行家王曼卿在 1928 年建造的“同合裕银号”。1933 年银号倒闭，改为河南省银行，后改为河南农工银行。日伪时期开封市政府设在这里，日本投降后仍归河南省银行。开封第一次解放时，这里曾作为冀南中州银行驻汴联合办事处。解放后为开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称为市政府一号楼。

此时，刘少奇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由于不能正常进食，他的自身免疫力太低，从 1968 年 7 月至 1969 年 8 月 6 日期间，刘少奇肺炎反复发作 7 次，其中 1968 年 5 次，1969 年 2 次。在此期间，请专家会诊共 40 次，仅 1968 年 7 月会诊即达 23 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 3 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301 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经抢救、治疗后，均转危为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专门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一片抗生素药片就十几元钱，相当于当

时中国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十分昂贵。这些药用下去以后，很快就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不敢稍有懈怠。但是，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甚至现在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这样记载：“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

1969年10月17日16时30分，刘少奇被用随身盖的粉红色缎被裹着抬上担架，再蒙上一条床单，送上救护车。18时，救护车向北京西郊疾驶。19时23分，一架伊尔-14型飞机升空，直飞开封。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随机护送。

17日上午，开封驻军已调派一个警卫班，到北土街10号院外平房驻扎，不准任何人出入此院。警卫人员不准进院，也不准打听警卫何人。

这天上午，陆军155医院的一名医生和四名护士接到通知，跑步到院长办公楼开会。会上，院长对他们说：“军里

给我们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医院选派你们去接受任务，家里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只带牙具、换洗衣服，其他什么都不准带，纸条也不能带。”

当他们回家拿了东西，一辆上海凤凰轿车即将他们拉到医院西院。在那里，由 1 军王景春副政委向他们交代任务，他一上来便问：“你们都是党员吧？”

有两人说：“不是。”

王景春副政委说：“不是没关系，以后争取。”

他接着又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让张院长领着你们，可能是开封，也可能是别的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看看表，说：“你们吃饭吧，吃完饭就走。”

155 医院的医护人员坐上车，转了转，来到了北土街。警卫连的战士正在那里打扫卫生。155 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下车，也赶紧脱了衣服参加打扫。到了晚上 19 时左右，一切就绪。院长叫厨房开饭，吃完饭大家回房休息。

将近 21 时，1 军保卫处处长张金贵通知 155 医院的师振德随他到机场接人。师振德坐上一辆救护车，张金贵坐上一辆上海轿车，出新开门往南仅 3 分钟，就到了开封机场。这时，从机场西边来了一辆淡青色的伏尔加轿车，河南省军区

政委王新从车下来。

21时30分，搭载刘少奇的专机在开封机场着陆。同机护送的除中南海门诊部的董医生和两名护士外，还有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

飞机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一个人，是专案组副组长老邢。他和王新等人谈了几句后，155医院的张院长对师振德说：“振德，上去抬人。”

师振德等人上了飞机，看见刘少奇躺在机舱里面，护送人员正在给他换被子。因为机舱里面热，刘少奇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下飞机前，给他换上从中南海带来的粉红色棉被。刘少奇没有穿衣服，鼻子里还插着鼻饲管。

刘少奇被直送到了北土街10号——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北京随行护送的医务人员向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和常文秀等3个护士交代了刘少奇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并做了详细交班。

刘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北京医护人员还给开封医疗组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每天给他洗脚、梳梳头。

刘少奇到了开封，没有说过一句话。当开封医疗组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了，表情自然。

由于飞机机舱温度高，刘少奇来到开封第二天就感冒

了，体温升高。开封 155 医院的刘医生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又增加了一些抗菌素，立即输液打针。

10月19日凌晨，刘少奇肺炎复发，咳血、高烧。北京来的曹护士拿出北京带来的治疗肺炎的药物注射。黎明时分，刘少奇情况趋稳，渐渐入睡。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刘少奇睁开了眼睛，看着曹护士的手，大约认出来了，是一起从北京来的。

10月21日。刘少奇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11月6日，从北京来的医生、护士全部奉命返回，随行带来的进口药物也基本用完，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当地驻军负责。随后，1军又从警卫连挑选了6名战士前来参加监护。

11月10日，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开封 155 医院的医疗组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但他们不可能有进口抗生素，刘少奇高烧不退。

据刘建勋后来回忆，一天，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突然问刘建勋：“开封有没有带暖气的房子？”并说：“刘少奇现在开封 1 军，中央还派了五个人，包括医生、护士。”

刘建勋告诉王新：开封除了工厂、招待所外，一般住房都没有暖气。有一套房子有暖气，是过去一位副市长叫苟金笃住过的，现在暖气条件怎样还不知道，能不能住可以查一查。

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155医院院长也被唤到现场实施抢救。到6时38分，情况愈加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都来抢救。6时42分医护人员到齐，然而为时已晚，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

刘少奇停止呼吸后，医疗组按照程序进行了急救措施，5分钟后，无效，终止抢救。

155医院院长请示后回来说：“你们清洁遗体吧。”

155医院的师振德和曹文秀负责为刘少奇清洁遗体，洗澡，净面，然后在病床前照相。当遗体推到走廊时，155医院院长又在那里照了一张。



王新告诉刘建勋说：“刘少奇已经去世。”

1军军长徐文礼也赶来向他们汇报此事。刘建勋听完汇报后，马上向中央打电话口头报告，请示料理后事的问题。他们在郑州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刘少奇逝世的当天，刘少奇专案组人员和刘少奇的卫士长就从北京乘飞机赶到开封。当晚，决定将刘少奇遗体火化。1军警卫连的6名战士负责抬遗体，155医院的师振德在前面引导。当遗体抬到前院中间的时候，专案组副组长老邢命令停一下，将遗体放在地上。他交给师振德一块大三角巾，让他把刘少奇的脸蒙上。随即，开来一辆大六九中吉普，师振德和6名战士将刘少奇的遗体放进车内。师振德下车后，看见刘少奇的腿稍微露出了一点，又将覆盖的床单往下拉了拉，盖好。北京专案组组长和李卫士长及155医院院长在前面的引导车上，一行人来到了火葬场。

在火化场，155 医院的院长前去联系办手续，在专案组的指导下，登记申请人时用的是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刘少奇火化后，骨灰交给 1 军保管。

与刘少奇同时疏散到开封的徐向前，当时被安置在开封南关一个军分区干休所，内定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

11 月中旬后，北方转冷，干休所没暖气，徐向前患感冒。在干休所安装暖气时，他也被暂时转移到北土街 10 号，刘少奇刚在此逝世不久，徐向前并不知情。

徐向前带着秘书，被安置在西楼二楼南头套间，位置就在刘少奇病房上面。

1970 年元旦，徐向前孤身在开封度过了新年。春节前，干休所暖气安装完毕，徐向前从天井小院搬回干休所。

一年后，1971 年 1 月 23 日，杨成武夫妇和妹妹 3 人秘密转移到开封，他们夫妇也被安置在这里西楼一楼南套间，这就是刘少奇逝世的地方。杨成武的妹妹住在对面的北套间内。

杨成武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每天除了看看《人民日报》，就是在小院走走，与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找他谈话。

第1117回：时装会，美国大使追翻译

几回合，华沙会谈重恢复

我们再看看此时的国际形势。1969年8月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召见回国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约翰·斯托塞尔，他非常认真地说：

“沃尔特先生，我希望您以一种非常谨慎并且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中国人进行接触，告诉他们，我愿意举行会谈是很认真的，我们应当改善关系。”

亨利·基辛格参加了这次秘而不宣的召见，他是惟一的陪同者。

但是，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斯托塞尔大使在华沙依然是“按兵不动”。基辛格大为不悦。10月初，他发急电催促其尽快行动。可是，直到11月下旬，斯托塞尔依然不动声色。基辛格勃然大怒，给远在华沙的斯托塞尔疾书一道“炒鱿鱼”式的“最后通牒”：

“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将美方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但是在中美关系严重对峙的情势下，两国外交官接触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斯托塞尔在时隔十余年后撰写的回忆录这样写道：“这就是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如何谨慎地办

好这件事。我们共同参加的宴会很少，而且总是有很多人在场，乱哄哄的。因此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实在很难。”。

斯托塞尔讲的确实是实情。多年来，中美两国外交人员在公众场合碰面根本互不理睬，始作俑者当然是那位可爱可悲的杜勒斯先生。及至文革高潮，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中国外交官对美国人就更不客气。在那种情况下，中美双方会面都在公众场合，要找到尼克松所说的合适的机会实在是太难了。

说话就到了 1969 年 12 月 3 日晚上，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邀请各国驻波兰使节前往观看。

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请柬时大喜过望，他猜想中国驻华沙的临时代办一定会应邀出席。志在必得的斯托塞尔这一回是带着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联络秘书、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御驾”亲征。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接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送来的请柬之前，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雷阳已经接受了阿尔巴尼亚驻波兰大使馆为其接风洗尘的邀请。所以使馆领导决定，由二等秘书李举卿携波兰语译员景志成前往参加南斯拉夫的时装展览会。

时装展览会在华沙文化科学宫地下室的一个舞厅里举行。这是一个圆形舞厅，中间是舞池，环绕着舞池四周的便

是观众席。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和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首先自入口处进入舞厅。他们坐下后就紧张地等待中国人的出现。时装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有看见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斯托塞尔、西蒙斯心灰意冷之际，中国外交官终于出现在两位美国人的视野之中——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偕波兰语译员景志成从另一入口处匆匆进来，并在靠近入口处的观众席就座。

此时的西蒙斯最想找的是他谈判桌上的对手和熟人，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他在四处搜寻骆亦粟不果后意外发现了景志成。西蒙斯在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时偶尔也见过景志成。他迅速认出了景志成，只是二秘李举卿是1969年仲夏才随中国驻华沙临时代办雷阳前来华沙就任新职的，故而不仅是斯托塞尔，就连西蒙斯也不认识李举卿。西蒙斯吃不准与景志成同来的那位中国外交官究竟是不是雷阳？他有些失望，眼前这位陌生的中国人是不是雷阳姑且不论，他想找的那位中国人，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也没有来，西蒙斯将自己的疑惑与踌躇告诉了斯托塞尔。

“好，机会来了，不管他们是谁，”斯托塞尔用手肘碰撞西蒙斯轻声而果断地说：“我们要走上前去缠住他。”

几乎在美国人严密注视中国人的同时，景志成也发现了斯托塞尔和西蒙斯，看见他们在对面入口处一人用手指着他

们，一边对他身旁的另一个人窃窃私语说着什么。这位出道不久的年轻翻译认出了西蒙斯，他在陪同骆亦粟参加中美会谈联络官员会晤时见过他。同样，他也不认识斯托塞尔为何方人氏。当他发现自己和李举卿在“美国佬的监视之中”，心中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立刻绷了起来，立即把情况告诉李举卿。

比起初出茅庐、稚嫩年轻的景志成，李举卿毕竟沉着老练多了。当沉不住气的景志成把“敌情”向李举卿耳语一番之后，他说：“美国人说不定要耍什么花样。不要理他们！活动一结束，我们马上离开！”

时装展览会在当晚 20 时许结束。当最后一位时装模特穿着一件透明的结婚礼服出场时，有意避开美国人的李举卿和景志成起身退场。波兰人谁也没有站起来。斯托塞尔见状，也站了起来，紧跟在中国人后面来到衣帽间。

由于李举卿、景志成来时未穿大衣，因此他们没有在舞厅的衣帽间停留。这样便与进入衣帽间取大衣的美国外交官拉开了距离。

李举卿和景志成一前一后径直向楼梯口走去，在察觉了美国人的追踪后，他们更是有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当走到楼梯一半时，紧追不舍的西蒙斯终于赶上了景志成：

“先生，这是我们的大使，他有话要跟您说……”西蒙斯指着身后快步赶来的斯托塞尔，气喘吁吁地对景志成说。

未等西蒙斯介绍完，斯托塞尔就急切地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和你谈谈。”

景志成吓了一跳，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怕别人发现他在和美国人说话……在当时，如果中美两国外交官回避不及，狭路“遭遇”，中国外交官甚至还会“即兴”“声讨”一番：“为什么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等等。

但是，对景志成而言，作为一名未经多少世面的年轻译员，那时他甚至还够不上“随员”这一使馆最低级别的外交衔，当他第一次单枪匹马，面对美国大使突然“袭击”，其惊慌乃至失态是可以想象的。

景志成快步走向通往上面的楼梯，西蒙斯紧跟在他后面。当他们来到一个大平台台阶时，景志成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更加快了步伐。斯托塞尔紧追不舍，气喘吁吁，边走边说：“我想会见你们的代办先生……”

“代办没有来……其他我不知道……”心神不宁的景志成语无伦次，只想早点摆脱这位讨嫌的美国人。眼看李举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文化科学宫，两人已经相距二、三十米。惊慌失措的景志成不敢“恋战”，加快了“撤退”的速度。

斯托塞尔眼看鱼儿要脱钩，愈发穷追不舍：“不久前我回了华盛顿一次。我见到了总统。总统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先生，我想告诉你，总统想与你们领导人

会谈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我们希望与你们的国家改善关系。

请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我乐意听你的回音。”

天很黑，正在下着大雪。天气很冷，四周没有人……

“我转达，我……转达，……我将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景志成被这种外交场合中前所未有的出奇出格的做法吓住了，他心有余悸地边答边走。他与走向停车场的李举卿已有相当一段距离。

满脸通红的景志成终于坐进了使馆的奔驰 230 轿车。刚坐定，便立即向李举卿汇报刚才发生的“险象环生”的一幕。

“这是新的动向，回去以后要马上汇报！”李举卿立刻明确表示。

李举卿和景志成返回使馆后直奔雷阳办公室。雷阳闻讯，沉吟片刻，立即召开使馆党委会议。李举卿首先简单介绍了情况，稍作商议后，雷阳当即决定连夜报告国内。

平素寡言少语、几近讷讷的雷阳这次为何如此决断，雷厉风行呢？

“九大”闭幕后不久，耿飚将军出使地拉那。稍后，中国外交当局陆续向已建交诸国重新派出大使。为了使这批大使了解外部情况和发展中的国际形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他们离京赴任之前每每拨冗接见。

1969 年 6 月，雷阳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在济济一堂的“大使群”里，雷阳显得非常引人注

目。在普遍由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甚至三等秘书“留守看家”的中国驻东欧国家使馆里，雷阳的外交衔也同样显得“鹤立鸡群”。中国派出如此一位正司级的“准大使”资深外交官员常驻华沙，其意不言自明。另一个事例也能说明问题。直至70年代初，中国数十个驻外使领馆，只有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才配备红旗轿车。前者不难理解，后者盖出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矣！

周恩来在接见雷阳时，特别指示道：“雷阳同志，到了华沙以后要密切注视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新动向，一有情况要立即报回。”“总而言之，我们要保持‘华沙渠道’，不能中断。”

事实上，遵照部里指示，雷阳赴华沙履新之前已经详细调阅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中美关系的文字材料。

就在时装会的第二天，12月4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记者招待会上将斯托塞尔大使3日晚间与景志成的对话公之于众。麦克洛斯基在回答提问时称：斯托塞尔大使3日晚间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会谈事务联络的“骆先生”。这位“骆先生”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骆亦粟。麦克洛斯基“景冠骆戴”，皆因斯托塞尔误认而至。

12月4日深夜23时15分，华沙时间12月4日下午16时多，周恩来抱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

华大使萨利姆。会见结束时，手抱公文夹的总理秘书钱嘉东急匆匆进来，取出一纸电报呈请周恩来批阅。毫无倦意的周恩来展开电文，嘴边便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就是雷阳华沙来电。周恩来招呼大家重新落座。“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尼克松上台后多次表示要同中国对话，外交部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早在雷阳刚刚跨进波兰国门的时候，周恩来就通过伊斯兰堡和布加勒斯特的两个“邮箱”告诉美国人：中国不久可能会有意于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1969年8月8日，罗杰斯国务卿表示美国政府有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这显然是美国人得到周恩来口信后作出的答复。

1969年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代表齐奥塞斯库为美国传话，周恩来说：“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和联合国问题。他们想解决，有渠道嘛！渠道就是华沙（大使级）谈判”。

9月11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告诉对方：中国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询问今年2月16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

11月7日，外交部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来函一事报告：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12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

11月，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又采取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

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近期内，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在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积极地做出一系列姿态，如：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限制，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下令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等。”

作为对美国发出善意信号的回应，12月4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11月20日关于两个美国人被拘一事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的意见，时间拟定7日或以后。”

毛泽东批示：“照办。”

秋去冬来，周恩来在北京等候来自华沙的美方的反应已有数旬了。12月4日收到华沙来电的当晚，大喜过望的周恩来立即将华沙来电急报毛泽东，并说：“找着门道了，可以

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华沙的美国人上上下下也一起忙碌起来。4日晚间，北京时间已是5日凌晨，华沙早已过了下班时间，美国驻华沙大使馆二等秘书西蒙斯突然给中国驻华沙大使馆打电话紧急寻找骆亦粟。在电话里，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受美国政府委托，询问骆先生：美国大使昨晚与中国使馆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接着，精明的西蒙斯话锋一转，无中生有地谎称：“昨日晚间的谈话已被美国记者看到，他们现已向使馆提出问题。美国使馆拟予确认，但不透露谈话内容，也不加评论。”云云。

西蒙斯显然是无中生有，故意杜撰。他之所以如此空穴来风，无非是为美方找一个将中美外交官员接触通过媒体公布于众的合法借口罢了。美国人很聪明，无论中方默许还是反对，他们都是“赢家”。你若默许，美国人自然求之不得；你若反对，做出澄清，反而增添了美国人期盼的“炒”的效果，因为中美官员接触的事实无法否认。

中国使馆立即如实将西蒙斯的电话内容报回国内。几天后，国内复示华沙使馆：“美大使要求会见我代办，这是继美对我做出一系列的‘和缓’姿态后，又一直接试探。在目前形势下，美急于同我对话，看来主要是为了压苏联，以增强其同苏联争夺的地位。为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以利于当前对苏联的斗争，我对美在策略上可适当加以运用。”

12月6日，周恩来亲自批准释放2月16日因乘游艇误入广东海面的两名美国人。因为当时在他们的游艇上发现有收发报机。周恩来要有关方面认真负责地查清此事。经过认真全面的审查，认为间谍的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性很大。

周恩来还要外交部把释放两名美国人的事通知驻波兰使馆告知斯托塞尔，说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就是对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答复。特别指示华沙中国大使馆，以代办名义致函美国大使，通知他们中国政府这一缓解中美关系的重大决定。12月7日，骆亦粟奉命约见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并面交信件。

春风满面的西蒙斯向骆亦粟表示很高兴转达雷阳代办的信件，并再次强调：“3日晚间与贵国使馆官员的谈话是十分严肃的，美国重视同中国的意见交流。”显而易见，这是美国大使又一次正式表示要求会见雷阳，美国人实在等不及了。当天，中国驻华沙大使馆就将此事上报国内。

此时，中美两国外交官接触的消息不胫而走，迅即传遍全球，为各国传媒广泛瞩目。

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相互探询，称为“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2月9日，中国国内正式复电雷阳：“国内决定，我代办可与美大使会见。”雷阳、李举卿、骆亦粟、景志成等中

国外交官的心终于踏实了，他们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2月10日上午，骆亦粟再次打电话给西蒙斯，正式通知：雷阳代办打算于次日（11日）在中国使馆会见美国大使。当晚23时，美方来电话告知：美国大使同意第二天与中国代办在中国大使馆会晤。

这次两国高级外交官的会晤虽非正式性的，但是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会谈主要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议做出程序性安排。在会晤中，美方重申了缓和美中关系的良好意愿。斯托塞尔大使表示：尼克松关于美国愿同中国“保持更大的交流”的声明是“权威的和严肃的”。最后，斯托塞尔大使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建议，明年1月14日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方代表雷阳代办正襟危坐，侧耳倾听斯托塞尔的“高见”，他的任务是了解对方意图，故而对美方意见未置可否。

12月底，美国政府宣布又一次放松对华贸易限制，使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基本取消。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1969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

1970年1月8日，中方对美方恢复会谈的程序性建议正式作复，建议会谈于1970年1月20日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

双方商定：今后正式会谈改为在两国使馆轮流举行。

1月20日，迭经磨难、姗姗来迟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终于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会议厅揭开序幕。

由于双方都带着成功的希望，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代表转达了两国领导人关于举行高级别直接接触、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第1118回：转弯急，大草原再陷“真空”

设前指，内蒙古二次军管

我们暂且放下中美两国的“小步舞”，再回到国内。

1969年5月22日中发(69)24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全区沸腾了，政治风向标一夜逆转，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滕海清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然而，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的工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第一批被强行打成“内人党”中央执委和骨干分子的特吉斯、毕力格巴图尔、巴图、木伦等“要犯”，仍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粮食干部学校，不久，又秘密转移，远离自治区首府。军区系统包括鲍荫扎布在内的“内人党”要犯被解往黄河以南的准格尔旗，地方系统的“内人党”骨干则押送到伊克昭盟的东胜。

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受难者，不少人是当年的老“内人党”党员，而这些人也正是“挖肃”运动中一系列假口供的主要来源，是全自治区愈演愈烈的挖“内人党”运动的重要依据。比如鲍荫扎布，军区政治部的许多二级部长都是他在严刑之下，被逼无奈供出来的。

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做好各级“挖肃”骨干的思想工作。中央“522批示”下达后，他们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甚至一些积极参与“挖肃”运动的人们不相信这个“522批示”是“最高指示”，各级革委会都有对

“522 批示”强烈抵制情绪。

另一方面，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毕竟只是执行者，不负有决策之责。因此，当众多受害者的满腔怒火朝他们头上宣泄的时候，这些人就更是满腹怨气，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于是，“落实政策”就成了一句空话。

自己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是很难的，对于当时在全自治区一言九鼎、手操党政军大权的滕海清来说，尤其如此。他虽然在中央的严令之下口头上认了错，但思想未通，抵触情绪很大。

当时，吴涛、高锦明等人倒是希望能尽早落实政策，以安定人心。但他们支配不动下面革委会的许多领导人，因而也是无能为力。由于核心小组态度不明朗，措施不得力，处境越来越被动，终于激出了变故。

就在 5 月 22 日中央 24 号文件下达一周后，呼市地区、各军分区、各盟、市、旗、县那些曾身陷冤狱的人们及死难者家属，自发地组成上访团，汹涌的人流直奔自治区核心小组所在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往日警备森严的新城宾馆，如今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了。

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专门揭批滕海清的群众组织，例如“批滕联络站”、“批滕前线”等，也在数日之内相继成立。

各群众组织召集的批判会接二连三地召开，大字报贴满

了呼市全城。在高压之下，积郁已久的怨屈、愤懑、思索，此时如沸腾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们不得不撤往呼市郊外，东躲西藏，今天还在 30 师师部，明天就到通讯营，后天又转往 89 团。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干脆称病，住进了 253 医院，并对外保密。

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滕海清无处藏身，高锦明主动请他到自己家里暂避一时。因为在内蒙古尽人皆知，“滕老左，高老右”，两人曾是对立面，因此绝不会怀疑滕海清竟然藏在高锦明处。

然而，滕海清在高锦明家心神不定地躲了几天之后，突然踪迹杳然。

高锦明心急火燎。

因为落实政策极不得力，已经激起众怒，再加上前一阶段“挖肃”高潮中曾打死不少人，所以高锦明十分担心，怕滕司令出什么意外。

正在这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滕海清在电话中低声对他说：“老高，我现在很安全，请放心。”

原来，滕海清在高家还是感到不保险，悄悄转移到军区大院里的肖应棠家，钻进了防空地道。

6月9日，内蒙古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联合发出了 165 号文件：《关于认真贯彻“九大”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5. 22”批示及中央对内蒙古当前工作的指示的通知》。之后，内蒙古革委会又连续发出 186 号、189 号，一共三个文件，试图加快落实政策工作的步子。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对内蒙古局势十分关注。5月 22 日，滕海清一行刚刚回到呼市，他便打来电话，到 6 月 23 日再次来电，反复叮嘱要尽快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周恩来说，虽然内蒙古犯的不是路线错误，而是违犯政策的错误，但违犯政策的错误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周恩来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八一”南昌起义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违犯政策，最后遭到极大的损失以至于失败。所以，不能说违犯政策的错误就小。

6月 24 日下午 16 时，迁延时日、一拖再拖的滕海清的“单独的检查”，终于在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和大家见面了。

这时，从 4 月份中央正式批评滕海清算起，已经过去近两个半月了；如果从毛泽东“5. 22”批示、中央下达 24 号文件算起，也已经是一个月零两天了。

时间拖得愈久，内蒙古广大军民的心情也愈焦急。然而，当他们听过滕海清的检查之后，却大失所望。

在数次的“批滕大会”上，滕海清不得不面对着那些孤儿寡母、身体残废的受迫害者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内，一手制造了“内人党”事件这一特大冤案

的始作俑者，也尝到了被整肃的滋味。

“522批示”非但没有平息大众的情绪，反而使得参与挖肃的各级领导也加入了上访的队伍。他们指责中共中央的方针朝令夕改，过去不挖肃是右倾，现在挖肃了是左倾，基层领导成为了平反运动的替罪羊。于是，全自治区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批滕派和保滕派。保滕派大多是原先的“挖肃”积极分子，当时被称为“扛铁锹的”。这些人保滕，无非是把腾海清当作保护伞，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自保。

以受害人及其家属为主的批滕派与保滕派舌战、冲突、武斗，上至自治区首府，下至各盟市旗县，无不如此。锡盟发生武斗，还打死了人。

全区各级革委会瘫痪或半瘫痪。更令人担忧的是军队也几乎陷入瘫痪，地方军分区的领导公然不买内蒙古革委会的帐，政府机关被围攻、武器弹药被抢夺，内蒙古出现了权力真空，形势再度大乱。

面对内蒙古的危局，中央反过来又对“批判腾海清”踩刹车。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

黄永胜说：“内蒙古批判腾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

于是中央对内蒙古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内蒙古东西横跨边境线太长。为此将两头切下，东

部划给辽、吉、黑三省，西部分别划给甘肃、宁夏；

二、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三、内蒙古党政军机关干部移往河北省各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检查“前后两个扩大化错误”。

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决定：“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为了便于领导和加强对苏（蒙）修作战的战场准备，以便战时更好地支援对修作战，将内蒙古自治区东、西两段的部分行政区划作了跨区调整，即：东段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三盟全部划归东北；西段的巴彦淖尔盟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宁夏”。“整个交接事宜，责成北京军区负责召集兰州、沈阳军区及有关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共同研究商定，并将交接情况报告中央”。“全部交接工作，应争取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底前完成”。

196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兰州、沈阳三大军区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召开了一个分割内蒙古的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工作会议纪要》，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内蒙古部分的行政区域一分为五，分别划入周围省份。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一是尽快结束内蒙古动乱的局势；二是考虑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曾经有过酝酿内外蒙古统一合并的历史背景，担心“内人党”

事件重新燃起蒙古人的民族统一情绪，因而缩小了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范围。具体是将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除外）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巴彦诺尔、乌力吉、塔木素、阿拉腾敖包、笋布尔等公社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右旗其余部分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缩小，变为四盟二市，即：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

1969年9月13日，周恩来、李作鹏、李德生接见内蒙古核心小组成员。周恩来说：“你们的共同点是不顾大局，目无敌军，你们在地图上看一看。你们边防距北京有多近？你们还在那里那样搞，分成两派……苏、蒙修一来怎么打仗？……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准备打仗。滕海清同志不再做检查了。”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因内蒙古各级权力机构运作瘫痪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动乱局面依旧存在。

进入冬季，中央军委发出《高度加强戒备防止苏修突然袭击》的指示，通报中苏谈判50余天毫无进展，目前“三北”地区江河封冻，装甲车辆皆可通过，是苏修发动突然袭击的最有利时机。为此，要求一线部队严加戒备，加强侦察，

掌握敌人动向，纵深地区要继续抓紧战备工作的落实。

12月11日，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12月18日，中共高层紧急将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以及雷代夫、张平、张鲁召进北京，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当面向他们宣布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发[69]8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并由北京军区组成前线指挥所，领导这一军管”。具体部署主要为：

一、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以上四人组成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书记，黄振棠、杜文达为副书记，实行对内蒙的一元化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前指党的领导小组下进行工作。从北京军区抽人组成前指办事机构。

二、在北京军区前指的统一指挥下，包头市、巴盟、锡盟、乌盟、呼和浩特市、伊盟等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警备区），分别由63军、65军、69军、27军组成前指，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所有军管单位，均以战备为纲，抓好革命和生产。

三、63军由曹步墀副军长、田荫东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负责包头市、内蒙铁路局、乌达、石拐子两煤矿、

河西公司的全面军管工作。

四、63军187师的原定部署不变。由63军副军长余洪信和187师副政委王雪，并加强干部40至50人，带560团三营负责巴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巴盟革命委员会和军分区从磴口迁到临河。

五、65军由耿淑明副军长、靳甲夫副主任和195师崔毓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195师583团，进驻锡林浩特，负责锡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六、69军由周衣冰副军长和周发言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进驻集宁，带领一个团负责乌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七、27军由向孝书副军长、蔡云璞副政委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四个连负责呼和浩特市的全面军管工作。

八、27军由81师常道德副政委、郭学泮副师长组成精干的领导班子，带领必要干部和部队，负责伊盟地区的全面军管工作。

军管范围不止于地方各级革委会，还包括军分区、警备区，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独一无二、未有先例的。

依照决定，12月19日，北京军区立即由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进驻呼和浩特，前来执行军管，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对苏联的备战，另一

方面是中共高层为了解决内蒙古的尖锐社会矛盾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北京军区下属的几个野战军也立刻行动起来。由 10 余名军、师级干部率领，从几个野战军中抽调精锐部队，对区划变更后留存的呼市、包头和巴、锡、乌、伊各盟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华北地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开始了。

第1119回：建总政，部队疏散返营难

判罪犯，下通知征求意见

1969年10月24日，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向中央提请要求批准并任命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1日，总政治部正式在旃檀寺大院总政办公大楼开始办公。

在军委办事组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是李德生。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总政主任的人选，林彪提议李德生，谢富治说：“李德生是军事干部，带兵打仗的人，搞政治工作，不太适合吧？”

毛泽东说：“李德生不适合，你适合？”

李德生任总政主任就这样在政治局讨论确定下来。按照惯例，李德生的任命手续，是应当由军委办事组办理的。11月，军委办事组在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议：“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上了“同意”二字。究竟是同意哪一个职务，毛泽东没有明说。中央办公厅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那么，究竟是任命为主任呢，还是任命为第一副主任？黄永胜又在报告上批示：“请黄、田两位办。”

“黄、田”即黄志勇、田维新。主任的任命让副主任办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很多怪事中其实是透着必然。他们接到上任后的这样第一份批件后，

黄志勇和田维新二人凭多年的工作经验，其实都参透了其中的奥妙，他们非常慎重，不敢贸然行事。田维新主张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等有明确的指示后再办。

11月28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据此，总政机关由原编的13个部、院，缩编为6个部、室。即：办公室、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众工作部。12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总政的工作。12月10日，中央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

12月26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通告总政治部正式开始办公。

12月31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送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毛泽东当天指示：“照办。”

各部队根据总参传达林彪指示的“1号号令”进行紧急疏散，准备打仗，已一月有余。仗没有打，天却越来越冷，部队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北部几个军区的部队，有的野营在外，有的散在民间，有的隐蔽在战备工事里，有的据守在深山隘口。部队的给养、运输、训练、管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果确实处在战时条件下，环境比这再艰苦，也没什么说的，命都可以不要，冷点算什么？可是看样子仗打不起来了，部队还冻在野外干什么呢？官兵们受不了，重型武器装备也受不了。上边好像把他们忘

了，左等没有撤的命令，右等还是没有撤的命令，因此，人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疏散逐渐感到不可理解，有的甚至感到厌倦，各种“活思想”也随之增多。各大军区纷纷叫苦。

“林办”秘书根据各军区来电反映的实际困难，及时向林彪作了报告。

林彪表示不解：“部队可以回营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

林彪真是大处抓得住，小处不爱管。在他看来，部队的疏散之权由他掌握，何时收回营就是各军区自己的事，至多由军委办事组发个通知就够了。但各军区是根据副统帅的命令进行紧急疏散的，上边不发话，他们不敢擅自作主呀。

秘书张云生对林彪解释说：“部队是根据首长的命令疏散的。首长不发布新的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做出部队回营的决定。”

“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叫他们研究一下。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林彪表态同意。但这时叶群又出来说话了：“首长不能发这样的指示。疏散出去没风险，过早收回来就有是非。如果现在就把部队收回来，一旦战争爆发，这个责任谁来负？”

由于叶群的干涉，直到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才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

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战备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为朝鲜战争以来所仅见。它的功过是非和经验教训，在事过之后许久，还是人们谈论的话题。

1969年就这样在紧张的战备声中过去了。这一年，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和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努力，全国的生产情况主要是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基本上刹住了前两年生产下降的趋势。

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为2495.5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7.2%。其中，农业总产值为642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66年增长0.2%，工业总产值为1853.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比1966年增长9.9%。

财政收入增长很多，达到526.8亿元，比上年猛增45.8%，收大于支9000万元，但仍未达到1966年的财政收入水平；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00.83亿元，比上年猛增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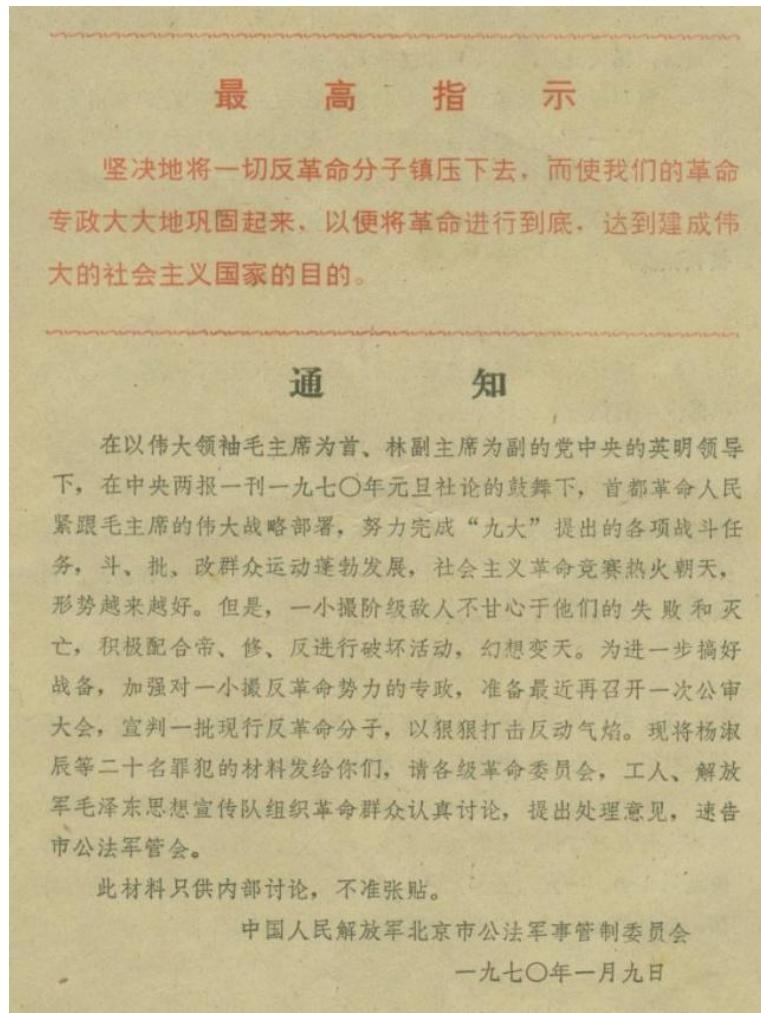
1969年的经济回升，与1969年的计划指标相比，除了原油产量而外，几乎全部没有完成计划指标。

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516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516

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农口那些保秦化龙的干部，也被划为“516 反革命”分子骨干，隔离审查，交代“516 反革命”罪行。

1970 年元旦刚过，“五七”干校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作为“516 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秦化龙秘书许人俊，分别作为“516”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随后，对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有一次，竟对许人俊连续进行三天三夜 72 小时的审讯。在这次清查中，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

1970 年 1 月 9 日，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通知》说：“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通知》提到的“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有：

1、杨淑辰，女，48岁，北京通县人，罪行是“1966年充当外国特务”，“仅1967年3月杨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4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抓获”。

2、唐志强，男，25岁，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1967年7月20日“化装成外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3、宋惠民，男，49岁，山东省人，偷越出境被引渡回国。

4、邓振铎，男，26岁，北京市海淀区人，曾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出狱后偷越出境被引渡回国。

5、尉尤山，男，45岁，无业，住北京市东城区，材料上称其为资本家、国民党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6、王宗海，男，52岁，山东人，资本家，住北京东城区。材料称，1960年底，被台湾“蒋匪组织委任为‘北平联络专员’，向特务组织密报我重要情报，并发展特务组织1人”。

7、刘镇江，男，40岁，北京市人，“军统特务分子”。

8、于江林，男，40岁，北京市昌平混凝土构件厂合同工。

刘镇江、于江林二人为“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他们在1966年春，合谋组成“国民党党政军警张家口联络总处”，并附设“国民党京绥张家口(检)查总站”，下设“宣化联络分处”、“涿鹿、蔚县、怀来联络组”等。

9、宗福海，男，32岁，北京市密云县人。

10、侯庆龙，男，28岁，北京市密云县人。

宗福海、侯庆龙二人系编号八的同一案件。

11、元令秀，男，34岁，山东省人。

12、孙义，男，32岁，河北省人。

元令秀、孙义二人系编号为九的同一案件，罪行主要为：“窃得电动机6台，自行车195辆，缝纫机4架等大量财物，价值3万余元”，目的是“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

13、遇罗克，男，27岁，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案件编号是十，罪行是：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14、王佩英，女，54岁，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在公开场合呼喊口号“刘少奇万岁”。

15、李定一，男，44岁，河南省人，右派，并因此多次被拘和“劳教”，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6、唐赞义，男，32岁，北京煤气热力公司调度员，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7、李世安，男，43岁，北京木城涧煤矿工人，罪名：“现行反革命犯”。

18、马正秀，女，38岁，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罪被处决，材料称她，“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1967年8、9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19、王步云，男，60岁，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小学合同工，1966年7月用菜刀砍孙某20余刀，“重残一人”。

20、张长利，男，22岁，北京市平台区芦沟桥公社农工厂工人，1968年1月用铁棍致死1人。

在这20名罪犯名单中，有《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名字。在他的罪行材料中，特别提到的“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据《中学文革报》的主编牟志京后来回忆：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串联。在长春，遇上武斗，“一下火车就有人向我们发武器，其中也有手榴弹。在我们离开长春时候，我对大家说把武器都缴回给当地人，遇罗文却把一颗手榴弹给带了回来。他是一个非常爱好化学的人，他给我作过多次化学试验，做过催泪弹，小小一滴，就可以

把整个屋子的人弄得喘不过气来。他还在颐和园发射过小火箭。我想那个火箭的火药就是从手榴弹里拆下来的。这就是他带回手榴弹的目的。他这个人很幼稚，不仅在那个时代冒险带回手榴弹，而且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至少两个人。我当时也很奇怪，原先公安局一直逼问我遇罗克有什么反动言行，后来突然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只问手榴弹的事情。而当时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我看见过遇罗克的判决书，才恍然大悟。其实抓遇罗克的真正原因是他撰写《出身论》。”

遇罗文将长春车站发的手榴弹带回到北京，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了。

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李震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

1968年1月1日，谢富治批准逮捕遇罗克。1月5日，遇罗克被投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遇罗克正在撰写《工资论》。

他在被捕前几天的日记中还这样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索真理之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第1120回：一二四，众领导说“五一六”

震动大，全国再次掀高潮

1970年1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

周恩来在讲话中介绍了“516”著名头头的情况。他说：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撒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探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江青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

唐平铸。”

周恩来接着说：“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

康生插话说：“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周恩来又说到王力：“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

康生：“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

江青问：“三个办公室都来了？”

答：“来了。”

康生：“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

不理这个事情。”

周恩来继续说：“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

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

江青：“王力的屋子里有两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

周恩来：“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肖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516’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8月7日要夺外交部大权，8月7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516’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话：“想当总理。”

周恩来：“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

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肖华。在66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

江青：“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

周恩来：“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66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66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

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67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肖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516’兵团。现已查清，‘516’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7月1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6、7月闹的最凶。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516’这个问题上，名字叫‘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

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康生：“王、关、戚、杨、余、傅、肖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516’专案的主要问题。”“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66年10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67年1月14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66年12月28日，67年1月5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1月27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28天。”“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

“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

周恩来：“67年7月去武汉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

康生继续说：“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

江青：“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

“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7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

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67年7、8、9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副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她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

“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

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肖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副主席去看我，林副主席去看我，林副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副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68年3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4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8341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4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

姚文元：“很凶恶。”

江青：“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

“傅崇碧还给坏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顶着子弹。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68年林副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

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

中央领导的“124讲话”震动很大，自此，全国再次掀起了清查“516”的新高潮，涉及到全国各行各业。

第1121回：下文件，掀“一打三反”运动

说湖北，北京召开公判会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西安等地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有人因写信反映铺张浪费问题而被指责为“搞非法活动”、“越级上告”、“眼中没有市革委”、“不符合组织原则”等。

1月18日，周恩来批示：将此报告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他还要求工作人员电话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注意纠正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违反新党章的错误现象。

这一天，周恩来审改了印送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稿，稿中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一律暂停，“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1月30日，周恩来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70]3号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说：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

《指示》要求：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

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批臭。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群众专政的目的。”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重要案犯需作紧急处理的，可用电报宣报中央请批。”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此文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2月3日，周恩来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

2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通知》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

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当天，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

指示》。

自此，全国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反革命”和“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

2月6日春节后，中央湖北学习班临时党委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钢工总”汉阳区办事处一号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还有“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和“钢九一三”头头、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总指挥张鹏程大会，说他们3人是现行反革命，当场逮捕，押送回武汉。

就像1968年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分配席位时，“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三大组织各摊一个，这次抓反革命，也是三大组织各摊一个。

刘万泰在北京学习班上，顶撞陈伯达，公开反对国棉一厂劳模陈爱娥作为“九大”代表，因为她参加了“百万雄师”；还说那些揭发、承认自己是“516”、“北决扬”的人是无中生有，不要脸；并叫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5军军长方铭，说“方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个人带一个营，可以对搞。”结果被认定是对抗中央清理“516”和“北决扬”运动，散布反军乱军言论。

刘万泰在大会上不低头，上来两个人也按不住，他高喊：“我不是反革命，只要朱、李、吴的大旗一摇，我照样打头阵！”刘万泰的宁死不屈引来一阵阵“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万泰”

的口号声。

“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是因为“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宏斌向学习班揭发，说王锦铭说过“男人当道，女人得势”这句话，学习班领导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和叶群，是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现行反革命言行。王锦铭就这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坐了多年的牢。但也因祸得福，后来反而成了反对林彪、江青的英雄，平反昭雪，回厂上班，最后正常退休，安度晚年。

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讲话，他说：“‘516’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把‘516’一抓，就都跑到武汉去了，武汉成了‘516’的根据地、据点、仓库、保险柜、档案库。武汉的‘北决扬’是‘516’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现在是到了全面清查的时候了。”

陈伯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原来，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曾于1967年2月和吴传启的入党介绍人、原武汉市委宣传部处长宋洛一起到北京见过吴传启，交谈对武汉文革形势的看法。既然吴传启现在成了“516”的头头，那魏绳武不应该交代清楚吗？此时，魏绳武和支持造反派的武汉市电信局局长杨友山被单独隔离，而且，武汉市机关“红司”也就被说成是“反革命阴谋集团516”的仓库、保险柜，钥匙就在柜长魏绳武手里。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时说：“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毛泽东的这段话，曾思玉直到1972年9月才让秘书写个纸条交给武汉军区负责清理“516”的“三办”。而在1972年9月7日，中央发出的33号文件已经载有毛泽东的这段话了。

1970年2月11日，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再次收到了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1970年2月11日

《通知》里提到的顾文选，《通知》里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

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顾文选，原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1957年“整风运动”时，该系讲师黄继忠召开了一个“控诉会”，由3名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同学上台控诉，顾文选是其中之一。他在会上说：“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坐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

这个“控诉会”先是在该系的教学楼里开，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前往制止，但遭拒绝。校党委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亦不被接受。反右运动一开始，顾文选自然被打成了右派。他跑回杭州家中，还是被抓回北京，判了5年徒刑。刑满后留场。顾文选决定叛逃。之前，他去看望也在清河农场留场的黄继忠，对他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

来看你了……”

顾文选逃出清河农场后，跑到了苏联，后被引渡回了中国。

《通知》中提到的 55 名罪犯中还有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历史系的，也是右派，名叫沈元。他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将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通知》是这样说的：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说是沈元在文革中被斗得受不了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跑进了马里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马里使馆把他交给了中国。

55 名罪犯中的张郎郎，1943 年出生于延安，是著名美术设计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1962 年，还在上中学的张郎郎与几个同样爱好诗歌的年轻人经常聚会，形成了一个文学沙龙，被称之为“太阳纵队”。1963 年秋，张郎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太阳纵队”及沙龙人员

又有所扩大，其成员大多是出身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着阅读“内参书”的天然渠道。这是北京当时最为活跃的两个文艺沙龙之一。另一个就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组建的“X诗社”。这两个沙龙曾被他们自己称作是“中国文艺复兴最初的梦想”。

“太阳纵队”沙龙成员之一“老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文化部代部长肖望东。肖望东和妻子曾找张郎郎谈话，担心他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张郎郎很耐心听两位长辈的劝说，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张郎郎他们兴致所至，这群疯狂的年轻人竟然把披头士的音乐带到了公共场合。后来在对张郎郎的起诉书里，还有一条罪状是：“在公共场合作传播反动音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仃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张郎郎被拉去陪斗。从批斗现场回来之后，张郎郎便为“太阳纵队”的杂志设计了一期封面：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四面布满黑色的栅栏。

1968年初，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公安局对一个年轻人的通缉传单。传单上的男青年有着浓密的、长长的眉毛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他便是张郎郎。

此前，听说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员悉数被捕后，张郎郎“太阳纵队”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化整为零。张郎郎后来说：“必须说明，那时候我们‘太阳纵

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张郎郎决定南下杭州。

当时北京高干子弟圈子里很多人都在流传有关江青历史问题的话题。张郎郎逃跑后，大家都以为他已经跑出国了，再追问是谁散布江青历史问题时，众人就说：“是郎郎说的。”于是，传播江青的历史成为张郎郎的又一罪状。



张郎郎

1968年6月14日的杭州正是炎炎夏日，“反革命分子”张郎郎在杭州龙井村被抓捕归京，罪名有三条：“恶毒攻击中

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北京市公法军管会的《通知》里是这样介绍张郎郎的：

二十九、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张郎郎，男，二十六岁，辽宁省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周七月，男，二十二岁，河北省人，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

张、周二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周二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并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一九六六年二月，张、周二犯与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取得了联系，出卖了我国大量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周七月是女高音歌唱家王昆的儿子。

1970年3月5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公判大会”。这天，后来成为导演的何群与张郎郎的弟弟相熟，他爬到工人体育馆外的树上听最后的宣判结果，但没有听见张郎郎的名字。他连忙赶到张郎郎家告知。后来听说，是周恩来要求“留下活口”，不知真假。

画家黄永玉后来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一文中回忆说：“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公园），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

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

在这次公判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年仅27岁。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理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在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并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

张郎郎与遇罗克同室，他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遇罗克回答：“值得。”他对张郎郎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克还说自己跟“516”有关系。

由于违反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

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虽然当年北京《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均受到审查和关押，但是被判死刑的只有遇罗克，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写的《出身论》，也有人说是因为那颗从长春带回北京的手榴弹。

有中央具体的指示，有首都北京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

第1122回：南京判，上海批斗“孙悟空”

孙蓬一，北大又贴大字报

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江苏省《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料，此举竟引出著名的南京“213反革命案件”。

第二天，2月13日早上，在鼓楼、丹凤街一带，发现用报纸上的字剪下粘贴的反革命标语，有六条：

“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

“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

“打倒林彪！”

“打倒江青！”

“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太长了！”

“上山下乡好个屁！”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查金华曾组织过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看来是有人因此为他打抱不平，而且与上山下乡有关。破案工作在全市展开，案发地附近，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人民银行新街口支行的倪寒予，在银行为他办的经济问题学习班上，坦白交代了自己女友的哥哥，正在苏北洪泽县人河公社下乡插队的知青陈卓然，和与他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就是“213反革命案件”的作案人。2月12日晚上，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

的字，再粘贴在纸上，组成那些标语，当时，倪寒予就在现场。当天夜里，他们沿着鼓楼、百子亭、丹凤街，一路张贴，直到苏小彬家附近的香铺营菜场后面烧饼店，贴完最后一张标语。此时已是 2 月 13 日凌晨，他们把浆糊桶、刷子丢到旁边公厕粪坑里就回家了。出发前，倪寒予说他肚子疼，没有与他们同去。

4 月 12 日，陈卓然和苏小彬在知青点被省革委会政法组刑侦局带回南京。4 月 18 日，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批斗陈卓然和苏小彬大会，陈卓然的女朋友王茂雅上台控诉陈卓然的罪行。轮到倪寒予上台揭发时，陈卓然狠狠瞪了他一眼，说：“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

4 月 28 日，陈卓然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 11 人。苏小彬判刑 15 年，倪寒予当场释放。

南京大学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揭出来的图书馆三楼阳台墙上国民党党徽案，一直没有结果。“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又重新拿出来排查。有天晚上，在男生宿舍召开图书馆全馆人员会。工军宣队负责人张连长说：

“经过长时间的仔细排查分析，本案现在有眉目了。我们知道他是谁，之所以没有点他的名，揪出来示众，是为挽救他，给他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这人就在眼前，坐在大家中间，他已经脸红心跳，变神变色了。”

张连长停下来，向每人脸上审视。

全场死一样的寂静。过一会儿，张连长突然大喝一声：“你看什么看？！”

停一下他又说：“我知道，你已经很心虚很害怕了，奉劝你，不要再有侥幸心理，党的政策是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不要错过机会。”

张连长说说停停，停停又说说，煞有介事。

幸亏灯光昏暗，地方小，大家密密地靠坐在一起，互相看不清，也不敢向别人看，都保持着木偶姿势，不随便动。如此这般，最后张连长宣布：“为体现无产阶级政策，再给这个反革命分子一次机会，希望他放明白些，赶快向专案组自首。今天夜里专案组 24 小时值班，半夜来交代都可以。”

物理系有 8 位教师住在南京大学“陶园”单身教工宿舍，他们开玩笑自称“陶园八怪”。这时，有人揭出“陶园八怪”是反动集团。于是，将他们 8 人隔离，逼他们交代自己和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论。后来，“陶园八怪”又由反动集团升格为叛国集团。因为在 1960 年，同住陶园的教师沈云得了肝炎。沈云的哥哥在加拿大，得知弟弟的情况后，通过外交途径，申请接弟弟去加拿大养病。经过批准，沈云办妥出国手续。同住陶园的物理系教师“陶园八怪”，在大三元酒家为沈云设宴饯行。而到了“一打三反”时，沈云被说成是叛国分子，参加送行宴会的人于是也就成了“叛国集团”了。这

个“叛国集团”的头子，就是当时负责联系大三元酒家，张罗饯行宴的“陶园八怪”之一的物理系老师蔡鲁戈。对他的逼供不断升级，压力越来越重。最后，蔡鲁戈用剪刀自杀未遂，又在住地屋后树林里上吊身亡，终年不到 40 岁。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各级革命委员会，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清查。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办公室，即“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都受到审查，参加“学习班”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有少数在武斗中有命案的被枪决，还有相当部分的人被拘捕入狱，很多人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清除，大部分人被批斗。造反派工人代表、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勇，被隔离在长沙县格塘公社两个月，由专案人员对他一个人办“学习班”，审查他的文革中的活动。

在两个月中，长沙市一连杀了两批。《长沙报》3月5日在报道宣判大会实况和《镇压敌人 保护人民》的社论中，竟用了八个“杀”字：“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3月17日欲举行第三次宣判大会，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但在大会前一日，突然又宣布取消这次大会。据说，是中央有特别通知，决定取消这次大会。



“青年近卫军司令”谭海清，因涉嫌一件在武斗中虐杀“俘虏”致死的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因为对谭海清的领导责任罪名，当时只有个别当事人的证词，并无确切证据。还有若干当事人提出的是谭海清并无责任的证词。所以，此案拖了数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谭海清

才被保释出狱。

复旦大学又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此时，炮打张春桥的“孙悟空”头头胡守钧已躲到了外面。

是年春节，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便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谁知刚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独关在一间小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学校的文攻武卫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也都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此时的“孙悟空”正式被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专案人员在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数抄出审查。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感。这句话，专案人员说是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

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横批是“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的铁证。

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印发了 20 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都卷入了这场大批判，各单位组织群众去复旦大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当时的上海，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1970 年 1 月 27 日，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孙蓬一、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韦全贵等位教员贴出了一份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字报，认为北大也有“516”，“而且是‘5·16’的一个重要据点。”

他们提出：“目前，在如何对待‘516’匪团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站队问题。”“如果你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516’的穷凶极恶的反动本质，那就必然会滑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当了‘516’的防空洞，起着掩护、包庇‘516’的作用。”

2 月 6 日下午，北京大学工、军宣队负责人迟群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说：

“最近有孙蓬一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张大

字报不能孤立的来看，……这张大字报涉及到工人阶级，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毛主席的这个点。大字报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宣传队：‘你们已经滑到右倾泥坑中去了’。这是对毛主席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毛主席讲，无论如何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这是忠于毛主席。锋芒所指非常清楚，我们不是瞎子。”“大字报还说：‘请那些闭眼的人……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还什么历史本来面貌？工人阶级 68 年 8 月 19 日进来，8341 部队 69 年 3 月 24 日进校，这都是工人阶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作者提出‘乱敌人树队伍’，就是要大乱一场，重新组织队伍。你要乱谁？重新组织什么队伍？你那个队伍清吗？清出 102 名叛特反，这不是事实吗？”“作者不但在乱群众，要乱工人阶级，乱团结。他到工厂后到处造舆论，北大的原则问题没解决，问题不在下面，在上面，挑拨工人与解放军的矛盾，两个解放军的关系。”“既有 8 个有，又不拿出材料，这是居心何在？这是捍卫毛主席的点，保卫毛主席的成果问题，这是不能允许的，他要来领导，权，我们是不交的。用那些响亮的口号来欺骗群众，是办不到的。”

孙蓬一后来在写给一个叫陈莲的信中，讲述了他“127 大字报”贴出后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写到：

自从一月廿七日贴了一张大字报以后，宣传队开始在表面上保持了一段沉默。二月二日，开了指导员会议统一了思

想，紧接着就分头在骨干中统一思想。说我们的大字报要害在“夺权”、“反右倾”、“反工人阶级”，是“5·16”嫌疑等等。四日，我所在的小分队，则布置整我，由于我的坚决抵制，使他们几个会都未开成。五日凌晨突然作出决定，把在京分散在各个点上面的所有人员一律撤回。昨天才开了革委会，主要领导全员参加，主题是批判我们的大字报和我。除了反革命的帽子未戴以外，什么帽子都扣上了。说大字报是“反党”，说我是“右派”，连个劝退与吐故的党员都不如，等等。下午则召开了全校大会。迟群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讲话，对我们的大字报逐段批驳。气势汹汹，简直是泰山压顶，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会上我公开表示绝不能接受他们强加给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不让我发言。在全校大会上，我当众三次要求发言1~2分钟，也被无理拒绝。

大会后，则动员全校群众对我们进行围攻。现在一个调子的大字报、大标语已贴了不少。什么“强烈要求开除孙蓬一的党籍”、“撤销孙蓬一的一切职务”、“彻底批判孙蓬一的1·27大毒草”、“坚决打掉孙蓬一的反动气焰”等等，好家伙，神经衰弱的人可真会给吓死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既然扪心自问是为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主席思想，为了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如您们感人极深的诗句中

所说的：“革命何惧苦与死，无私无畏壮志情，朝阳驱散千层雾，万里长征第一程”，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心情。我们五个同志中，除了一个同志外，没有任何压力之感。我们通过几年来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摔打，深知，“压力者，纯属自己压自己也”。

很快，北大开始了批判孙蓬一的运动，工宣队也投入了批判。揭发出来的孙蓬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有：怀疑、反对康老，反张春桥，反对谢富治等等，还有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倾言论。

2月9日，哲学系赴二机床教改小分队的大字报：

孙蓬一到二机床不久，他就经常和一些同学谈外单位抓“5·16”的情况，说这个宣传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个学校宣传队做了检查，然后就意味深长地说：“北大问题真有意思，颠过来倒过去，翻来覆去的。”

2月10日，政治系赵八路、王玉珍等大字报揭发：

孙蓬一说：“谁也管不了我”，说军宣队负责同志“没有什么了不起，脱下军装还不是同我一样。”

孙蓬一到二机床经常外出总不请假，当工人师傅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时，他竟暴跳如雷说：“我根本不存在向你们请假不请假的问题”，“有话直说，根本就不是纪律不纪律的问题，就是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你们害怕了。”他还冲着工人师傅、军代表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有的人

笑了，有的人跳了，有的人心虚了。”当军代表批评他时，他马上对军代表说：“你不就是个军人吗？我也当过兵，我就是不穿军衣的军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2月14日，又有人揭发孙蓬一吹捧杨献珍，搞合二为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8341部队的王副政委在对宣传队的讲话中说，孙蓬一是比“516”还“516”，这种思潮不仅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这天，工宣队师傅找原“新北大公社”的章铎个别谈话，要她揭发孙蓬一的反动言行。可章铎实在想不起来，觉得很难。当天，她即给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写信，说道：“过去我们受孙蓬一蒙蔽，看不清他假左派真右派的实质，现在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孙蓬一作坚决的斗争。”“你是不是替我想想，孙蓬一过去所干的有哪些坏事，说过哪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话？（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比如反康老，反谢，反张春桥等？）我们过去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我们是‘知情人’，揭发不出来，也就等于包庇孙蓬一，这可非同小可。”

因为批判孙蓬一，北京大学的毕业分配也推迟了。

2月24日，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召开揭发、批判孙蓬一反动言行大会，要“揭穿孙蓬一资产阶级右派的真面目”。

陈伯达1970年4月3日到北大讲话，也谈到孙蓬一的

问题，他说：

“‘127’大字报我看了，主要是个权的问题。孙蓬一不是还反对过聂元梓吗？这些人都是争权夺利，对他们搞吴传启你们还是要承认的。吴过去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送了一些材料，还是比较早的么，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送给谢富治同志，只是给我？这里也就有名堂了。”

宣传队说：“他们搞吴传启，也搞了谢副总理，还有什么‘×××’。”

陈伯达：“可能还有陈伯达。你们还是说他们搞吴传启，都否认了他，他总是不服气。”

第1123回：再办班，内蒙古仍不安定
订计划，筹备开四届人大
就在国内大查“516”，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中，
华沙，中美会谈也在进行。

1970年2月10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同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美国使馆举行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会谈中，雷阳再次强调应首先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根本问题即台湾问题，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雷阳的发言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周恩来亲笔修改。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外交部给雷阳电稿和参加第136次中美会谈中方发言稿时，根据周恩来提议，将中方发言稿中“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予考虑”中的“考虑”二字改为“接待”。

会后，周恩来又在改处加旁注：“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已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

当天，周恩来将讨论结果报毛泽东、林彪。

毛泽东批示：“照办。”

此时，内蒙古已实行军管。1970年1月8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向“前指”呈交了一份《关于整顿内蒙古革委会办事机关的建议》，要求“自治区革委会办事机构除留少数人外，其余人员调出内蒙古地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前指”当即批复了《建议》。

从1月10日开始，自治区革委会领导成员、区直机关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共计7769人送到唐山，参加中央在这里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盟、市干部3337人，也分别送到河北省柴沟堡和山西省阳高等地参加学习班。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各盟市革委会的工作，实际上由“前指”和各军“领导班子”取代。在学习班里，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段队伍”、“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运动。陈伯达也为内蒙学习班规定了“五不准”：不准串连、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会客接待亲友、不准私自出入。

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新的权力机构——“前指”发指示、下命令，草原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感觉到“前指”的存在。军管一个月后，“前指”将内蒙古军区团职以上干部，向河北、山西、天津和陕西汉中地区各调走100名。其中既有“内人党”案的受害者，也有“挖肃”积极分子。

对于全自治区瞩目的“内人党”一案，郑维山的态度是，按照中央精神，内蒙古平反工作犯了“一风吹”的扩大化错误，并以“前指”党的领导小组名义，宣布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颁发的第 165 号、186 号、189 号三个文件停止执行。刚刚启动的“内人党”案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月20日，内蒙古学习班正式开学，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兼管学习班事务。

学习班自 1970 年 1 月开办，到 1971 年 5 月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这期间，中央领导人曾两次接见内蒙古学员，一次是 1970 年 3 月 3 日，一次是 1970 年 6 月 6 日。

3月3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晚 7 时，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叶群、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小班学员。

接见时，周恩来一一点名。接着，他耐心、解释中央办学习班的用意，指出内蒙古地处北疆，必须保持团结和稳定。他旧话重提，问滕海清：

“1969 年国庆节前，我让郑维山同志给你转信，你接到了吗？”

滕海清说：“接到了。”

周恩来提高了嗓音：“接到了还这样做？挖‘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这不是和中央唱对台戏吗？！”周恩来感慨地说：“你真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

滕海清低头检讨：“我有罪。”

康生疾言厉色地说：“滕海清，站起来！”

滕海清垂手恭立，康生说：“你把北疆、把少数民族地区搞乱了，我‘九大’时怎么跟你交待的？！”

滕海清一直站了一个多小时，被康生说得唏嘘啜泣，周恩来几次让他坐下他都没敢坐下。

接着，周恩来又批评高锦明，在平反工作中没有全力支持滕海清。周恩来说：“你态度不明朗，应该明朗。”又批评权星垣“没有原则性。”

康生说：“你们‘522’后把内蒙搞乱了，一风吹了，所以才实行军管。军管革委会，军管一切。”他随口问：“呼和浩特平反了多少人？”

呼市革委会主任高增贵起立回答：“3000多。”

康生追问：“平反有何根据？”

高增贵答：“平反的都是‘内人党’，打的时候也没有根据。国民党、特务、叛徒一个也没平反。”

当话题转到李质身上时，康生又问李质：“什么时候入的党？谁介绍的？是什么人？”

李质一一回答。康生又说：“你入的什么党，国民党还

是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叛徒。”

黄永胜等人也对李质提出质问。结果，内蒙古学习班结束后，核心小组成员中，只有李质被留下，继续审查。

接见会快结束时，周恩来再次申明：对内蒙古实行军管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号召大家“在批判乌兰夫的立场上团结起来”。

自从 1967 年初以来，内蒙古局势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以及康生等人接见内蒙古各方面人员已达数十次之多，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在 3 月 3 日的接见会上，康生发感慨说：“关于内蒙古问题，我和总理说的最多，可以编一本书了。”

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订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

会议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的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准备报请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批准。

1970 年的计划，根据要抓紧“两个拳头”（即农业和国防）的指导思想，提出五项任务：首先要加快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第二是大力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三是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尽快做到县县有农机修造厂；第四，着

手进行建立经济协作区的试点工作；第五，搞好企业下放，争取年内完成。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计划：

第一、会议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划为十个协作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各自建立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做到“自己武装自己”。从而要求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权力和财政、物权、投资权等，更多地下放给地方，这就是 1970 年计划中的第五项任务。1970 年，全面展开了一场企业大下放的运动。

第二、加速内地和战备后方（即三线）建设。这是继 1965 年三线建设第一个高潮之后的又一个高潮。1970 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完成额中，内地建设为 197.98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67.1%，其中三线建设投资为 163.13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55.3%。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根据毛泽东关于经过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有 3500 万到 4000 万吨钢”的设想，确定 1975 年钢要达到 3500 万吨至 4000 万吨，比 1970 年增长 106%—135%，生产能力要达到 4000 万吨以上。与之相适应，规定 1975 年粮食要达到 3 亿吨至 3.25 亿吨，煤要达到 4 亿吨至 4.3 亿吨。电力、轻工等部门先后提出 1975 年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燃料工业部也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

南运”的口号，要求到 1972 年江南九省实现煤炭基本自给。其他各行各业也都酝酿着要大上、要翻一番。

第四、1970 年计划安排的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 228 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47%，执行中又一再突破，全年共追加投资 50 亿元左右。国家预算内投资实际完成 255.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3%，加上地方自筹资金，全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完成总额达 294.99 亿元，比上年猛增 109.34 亿元。全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 1409 个，比原计划 1113 个多 296 个，全部建成投产只有 235 个，投产率只达 16.7%。由于基建规模骤然扩大，积累率也就急剧上升，由上年的 23.2% 提高到 32.9%，造成人力、物力的紧张。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召开人代会，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据汪东兴后来说：1970 年 3 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恩来在信中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看了周恩来的信，3 月 7 日，毛泽东在武昌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对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对汪东兴说：“国家体制可以改变，不要设主席、副主席，就由人大常委负责人代表。”他让汪东兴回北京传达这个意见。

第二天，3 月 8 日，汪东兴自武汉来京，向周恩来传达

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

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说：“毛主席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宪法》中也不要国家主席这一条了，我也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拥护。周恩来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

会议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

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面商；

（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四月八日完成修改工作；

（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

会议委托叶群向在苏州休养的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

会后，汪东兴要叶群尽快把毛泽东的意见传达给林彪，并请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他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来到靠水边的小楼，那里是汪东兴的家。他们下了车，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汪东兴对他们说：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的特别信任。汪东兴也很兴奋。“九大”以后，他同林彪走的很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江青。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骂汪东兴，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

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老人家很高兴。从此，汪东兴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

此时，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的人说：“主席对林副主席是绝对信任的；对党内的高级干部讨厌中央文革一伙人老人家很清楚，他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他还说：“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当成政治上的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大家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3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还有保存。大家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3月9日，已回到苏州的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周恩来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及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的两个协商方案，周恩来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和两个协商方案。

次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商议情况。报告说：

“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

示，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恩来、春桥、永胜、富治、东兴五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已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十三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当人大代表的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九大代表当人大代表的也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非党员代表不应少于百分之四十，爱国人士恐不应少于一百人，党内需要安排的如张闻天、王稼祥等，拟从机动名额中出。第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春桥、法宪、作鹏、登奎五人组成，拟在三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由文元、恩来组织人动手起草。第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收回程时再请他面报。”

当天下午，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关于筹备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报告，批示：“同意中央的部署。”

随后，林彪也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第二天，3月1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关于修改宪法和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安排等问题。报告说：

“十六日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请主席审阅后

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十七日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名单。”

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留阅。”

林彪阅后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3月17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共103人。会议讨论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草拟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协商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

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委托叶群将有关战备、《宪法》起草、国民经济以及四届人大的安排等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林彪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他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听后，对秘书说：“问候林彪同志好。”

第1124回：汽车上，得知柬埔寨政变

不屈服，西哈努克要战斗

3月19日，北京机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几乎所有驻京的外交使团，都在这里迎接从苏联莫斯科前来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就在一天前，3月18日下午13时，柬埔寨发生政变，那里的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决议。

西哈努克亲王是在1970年1月7日，携夫人莫尼克公主以及宾努亲王等随行人员离开柬埔寨，到法国进行例行的治疗和休养。

3月9日，在柬埔寨柴桢市和该省的“鹦鹉嘴”地区的五六十个城镇里发生了反越游行示威。3月11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始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参加者主要是那些反西哈努克的大中学生，他们闯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共和政府的大使馆，大肆抢劫和破坏，捣毁了办公室，焚毁了汽车和家具。

在法国的西哈努克收到有关这些事件的报告后，断定是时任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内阁首相兼国防和新闻大臣朗诺和他弟弟朗农上校唆使部分军人蓄意制造的。之后，他向柬埔寨哥沙曼王后发了一封电报，谴责这一暴行，并表示要立即回国，让柬埔寨人民做出选择。如果人民支持朗诺，他就辞职。

很快，王后回电报告知：“你别回来了，朗诺已经用那些突击队中的假柬埔寨人取代了王家卫队，他们将会害你。”

西哈努克改变了立即返回金边的决定，继续他原订计划的旅行：从莫斯科经北京到河内，他要寻求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支持。

3月13日早晨，巴黎仍是春寒料峭。西哈努克及其随行飞往莫斯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在机场迎接了他。因为不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只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

苏联领导人对金边的局势已了如指掌。他们很担心朗诺集团的反越浪潮继续发展，特别担心柬埔寨落入美国人之手，那样就会改变整个印度支那战争的形势。他们清楚地知道，西哈努克这种带有亲共色彩的中立立场的重要性。他们希望西哈努克尽快回国以控制局势。因此，就在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就对亲王说，他们已准备了一架飞机等着把他直接送回金边，希望他第二天就能动身，于明天早上飞往金边。波德戈尔内对西哈努克说：“您直接飞回柬埔寨去掌管国家事务，不要让它落入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手中。您必须采取措施，不让柬埔寨逐步陷入被美国人接管的局面。您必须阻止朗诺和施里玛达给正在为自己的祖国的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越南南方人民制造各种困难。”

然而西哈努克却并不那么紧张匆忙。他要实现他来

莫斯科的意图，希望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他更大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建议苏联派一支像美国最初在南越的军援顾问组那样的小型军援代表团，到金边考察军事需要情况，并为柬埔寨培训武装人员。西哈努克告诉波德戈尔内，他将按照原定计划访问莫斯科，然后访问中国。

经过谈判，苏联同意提供西哈努克所需的一切援助。但苏联方面要求西哈努克“必须防止朗诺和施里玛达从背后捅民族解放阵线一刀。如果他们竟敢这样干，我们永远不会饶恕他们。……您给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宝贵的支持。您已经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将来也指望着您。”西哈努克保证一定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和他们的独立斗争，决不动摇。

这期间，西哈努克也收到周恩来发给他的一封电报。中国对金边的形势也极为关注，尤其是亲王的态度。

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许诺之后，西哈努克给母亲沙曼王后发了一个电报，其目的是要母后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他特别强调了柯西金的一段话：“您的越南盟友是不会健忘的。正如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在他们斗争非常艰苦时给予他们的支持一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极右派在他们反对美帝的斗争的更加艰苦、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对他们的恶毒打击。如果右派继续对我们的盟友进行这些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战争。”

沙曼王后收到电报后，立即召见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传达了苏联的警告，并要求他们停止反越暴行。但朗诺和施里玛达置之不理，决定继续按他们的计划行动。

3月16日至17日，柬埔寨首相朗诺，命令陆军和卫队逮捕了西哈努克的20余名亲信文官和军官，封锁了金边机场。

3月18日，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于上午9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怎样宣布国家正面临着危险以及授予政府最高权力的问题。这时，议会被坦克包围，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会议厅。下午13时，国民议会在恐怖要挟下，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选举郑兴为国家元首，实际上建立了朗诺—施里玛达军事政权。这是柬埔寨右派集团在美国策动和支持下发动的政变。美国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在柬埔寨建立亲美政权，摧毁柬越边境地区的“越共庇护所”，实现其从西部包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以改变其在越南南方的被动局面。

金边政变的次日，朗诺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B-52机群，“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朗诺军队对境内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发动长达两小时的进攻。

就在柬埔寨发生政变的当天，西哈努克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于18日下午离开莫斯科，在驶往莫斯科机场的汽

车上，送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对西哈努克说：

“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

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西哈努克毫无表情地答道。

“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进行反击。”

柯西金表示将继续支持他，但怀疑中国是否会采取同样的立场。

西哈努克对柯西金说：“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

“不管您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柯西金回答道。

到了机场后，西哈努克召集随行人员，宣布了他的决定：考虑成立一个政府来组织抵抗运动。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开始筹划他的抵抗运动。他同宾努亲王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开会研究，最后一致决定呼吁柬埔寨全体人民开展抵抗斗争。

飞机在西伯利亚的万米高空飞行，西哈努克在飞机上奋笔疾书，写就了《告高棉同胞书》。

当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后，西哈努克走出了机门，第一

眼就看到了周恩来正等候在舷梯旁。考虑周密、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似乎早已觉察到了这位被“抛弃”、被废黜的西哈努克渴求支持的迫切心情，因此他邀请了几乎所有驻京的外交使团到机场来迎接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看到这样阵容庞大的欢迎场面，万分激动。

周恩来大步跨向前去，和西哈努克紧紧拥抱，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的唯一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那天到机场欢迎的共有 41 个国家的代表，几乎所有的在京使节都到了。

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亲王陛下，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周恩来平静地问。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周恩来显得格外坚定。他接着说：“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

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

西哈努克充满着自信。

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越南总理范文同即来到北京与他会面。一见面，俩人就紧紧拥抱。范文同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美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

“我们能够帮点什么？”范文同平静了一下，把对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军事教员，我们不缺人力，而且中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我们缺乏有训练的干部，打我们将要打的那种战争。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有训练的干部。”西哈努克坦率地讲了他目前最大的需要。

“我会告诉武元甲派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范文同十分慷慨地满足了西哈努克的要求。

西哈努克提出，越南、老挝、柬埔寨这印度支那三国可以联合抗美斗争，范文同极为赞同。之后，他们详细讨论了协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最好方式，由此产生了召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的想法。“三国四方”即越南、老挝、柬埔寨这三个国家，加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共四个方面。

3月23日，西哈努克通过北京的电台，向全世界和他国内的同胞发布了《告高棉同胞书》和一个郑重声明。他宣布

解散非法违宪的朗诺政权。他呼吁“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形势恢复正常以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协商会议。它的成员将包括一切爱国、进步并且具有反帝倾向的佛教僧侣、军队、警察、省防军、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工业家、商人、政府职员和妇女的代表。”

从此，北京电台成了西哈努克战斗的喉舌，北京则成了他活动的国际舞台的中心。西哈努克的形象频频出现在中国的新闻记录片中，为全中国人民所熟悉。

3月24日，亲王又写信给各国政府，呼吁它们支持他的民族解放斗争，拒绝承认金边的朗诺政权。

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发表后，在柬埔寨国内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柬埔寨境内的各收听站收听和录制了通过北京向河内广播的亲王的呼吁，然后又在国内广泛传播。最初人民对朗诺的政变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当他们听到了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后，立即发动了示威、反抗和起义。在磅湛市，全城各个角落都是示威者。他们在汽车上张贴“西哈努克万岁”的标语，向司机散发亲王的照片。由50辆卡车和轿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示威者向金边进发。他们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职位。有两个国会议员奉命向群众解释驱逐西哈努克的理由，却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从而导致警察

向群众开枪，结果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朗诺的兄弟朗厄在磅湛省一个橡胶园遭袭击，被碎尸万段。在茶胶和贡布两地，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和暴力事件。

就在西哈努克发布《告高棉同胞书》的 24 小时内，曾被西哈努克追杀，于 1967 年逃入丛林，加入柬埔寨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三位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不计个人恩怨，积极支持亲王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纲领。他们在声明中称：“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3 月 23 日在北京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我国城乡的全体同胞，不要在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一伙卖国贼的军警中充当炮灰；不要给他们交税或遵守他们的残暴的法律；忠诚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建立村、乡、县和省级的新的抗战行政机构。”他们还呼吁士兵和公务员支持人民的斗争，参加到抗战中来。在他们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学生进入丛林，参加了抵抗力量。甚至连驻在桔井的第六军区副司令丁乃英少校也加入了游击队。朗诺的政府军迅速瓦解。数以千计的政府军，或者弃甲回乡，或者投奔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高棉的游击队。

3 月 26 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表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声明，支持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不仅需要中国、越南的支持，也需要所有社会

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十分欣赏河内的外交艺术，能在中苏对立中获得双方的支持。他说：“他们的天平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另一头是苏联，保持秤盘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可是另一头却是空秤盘。”

精明的西哈努克抓住在离开莫斯科时柯西金向他做出的非正式保证紧紧不放，他要以这一点为突破口，使苏联兑现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到北京后的重要外交活动之一，就是接见苏联代办。在谈话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到了他同柯西金在车上的那段谈话，并以激将法的方式提到，中国已经正式表示了对亲王的支持，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苏联代办似乎面有难色，他说，由于西哈努克现在在中國境内，让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较好。苏联将会接着这样做。这使西哈努克有些不解。他想，最先发表支持声明是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本来想把这个机会让给苏联，然而却遭到了冷遇。

4月5日至7日，周恩来访问朝鲜。他在同金日成的讲话以及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都对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所提到的高棉民族统一战线和西哈努克本人表示了最有力的支持。这时西哈努克再次会见苏联代办，向他指出中国的支持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和正式的了，希望他的政府也

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

这位代办居然拿出了新的理由回避亲王的要求：“但是支持（柬埔寨）的声明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发表的。”

西哈努克立即反驳说：“如果柯西金总理在波兰或捷克的领土上发表类似的声明，我也不会反对。”

第1125回：下《通知》，抓“五一六”勿扩大

游雪涛，上海清查中被抓

1968年秋天，章士钊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章含之和另外一位教师、她的邻居张幼云一起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驻校的海军军宣队、工宣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的情况，请求毛主席派人调查外院情况。

章含之所说的“极左势力”是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组织。这个组织曾参与过反对周恩来的活动。

毛泽东批示了章含之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一天下午，章含之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会议室，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在那里等她。他见章含之进去，很热情地与她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

丁国钰说，知道章含之给毛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前来听取章含之的意见。章含之向他大概重复了向毛泽东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九大”结束后，章含之和张幼云认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没有改变，再次上书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

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说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要派 8341 驻。

汪东兴找吴德去阅看毛泽东对北京市有关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报告的批示。据吴德回忆，毛泽东的批示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并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旁边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恩来找谢富治谈话，指示：由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他提了三条：一是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 8341 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

考虑到北京外院有人保谢富治，也有人反谢富治，他去不合适。于是确定由吴德、丁国钰、刘绍文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以后，江青、谢富治召开北京市革委各部门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

1969 年 11 月的一天，谢富治把北航革委会主任韩爱晶叫到他办公室，把腿往沙发上一盘，对韩爱晶说：

“韩爱晶，我找你谈一件事，你找一个地方去劳动吧，离开北京越远越好，不管北京发生什么都不要管。”

韩爱晶说：“好，我抓紧找个地方。”

谢富治说：“定下来以后，具体的事你找吴德同志和丁国钰同志安排。”

韩爱晶经过一个多星期，确定去湖南株洲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后，给吴德打了电话告知。接着他来到吴德办公室，由吴德和丁国钰二人一起和他谈话。随后，1969年12月，韩爱晶离开北航去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劳动。

1970年，中央调查部一位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毛泽东于2月9日将此信批转周恩来、康生。2月13日，周恩来将信和批示转告康生、黄永胜等，并写道：“该信所说似乎有一点道理。既然主席有了批示，我们必须认真查实，坚决照办。”

2月19日，周恩来将北京市谢富治、温玉成、吴德写的《关于北京外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报毛泽东。周恩来在报告上写道：“……国务院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潮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份分子，并防止扩大化。”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在一次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外交部“大联委”负责人时，周恩来指示他们要作好清查工作，并多次提醒外交部防止清查“516”扩大化。

3月5日，周恩来对国防科委九院下属一个工厂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作出指示：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要“稳、

准、狠”，特别是“准”字，强调：防止“逼、供、信”，肃反发展到追查反革命组织时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

由于对什么是“516”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516”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516”分子。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516”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516”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516分子”的帽子。

3月23日晚，一次外事活动后，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副处长冀朝铸对周恩来说：“翻译室已经有10个人交代参加了‘516’。”

周恩来惊讶的反问道：“10个？那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们是否搞扩大化了。我看你们头脑发热，要泼点凉水了。你们那么大压力，不是也得是。”

事后，周恩来对姬鹏飞、宫达非等外交部领导人说：“小冀说，翻译室一百多人，已有十个人交代参加‘516’。可能扩大化了，外交部可不要扩大化。你引导人家，人家就承认。一百多人有十个‘516’，怎么可能呢？时间又这么短，极左思潮被‘516’利用了。但不等于有极左思潮就是‘516’。”

‘516 分子’一定要搞反革命阴谋，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样才能算是‘516 分子’。”

周恩来叮嘱姬鹏飞给外地外交部的“五七干校”打电报，提醒他们注意。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0〕2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首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通知》接着又说：“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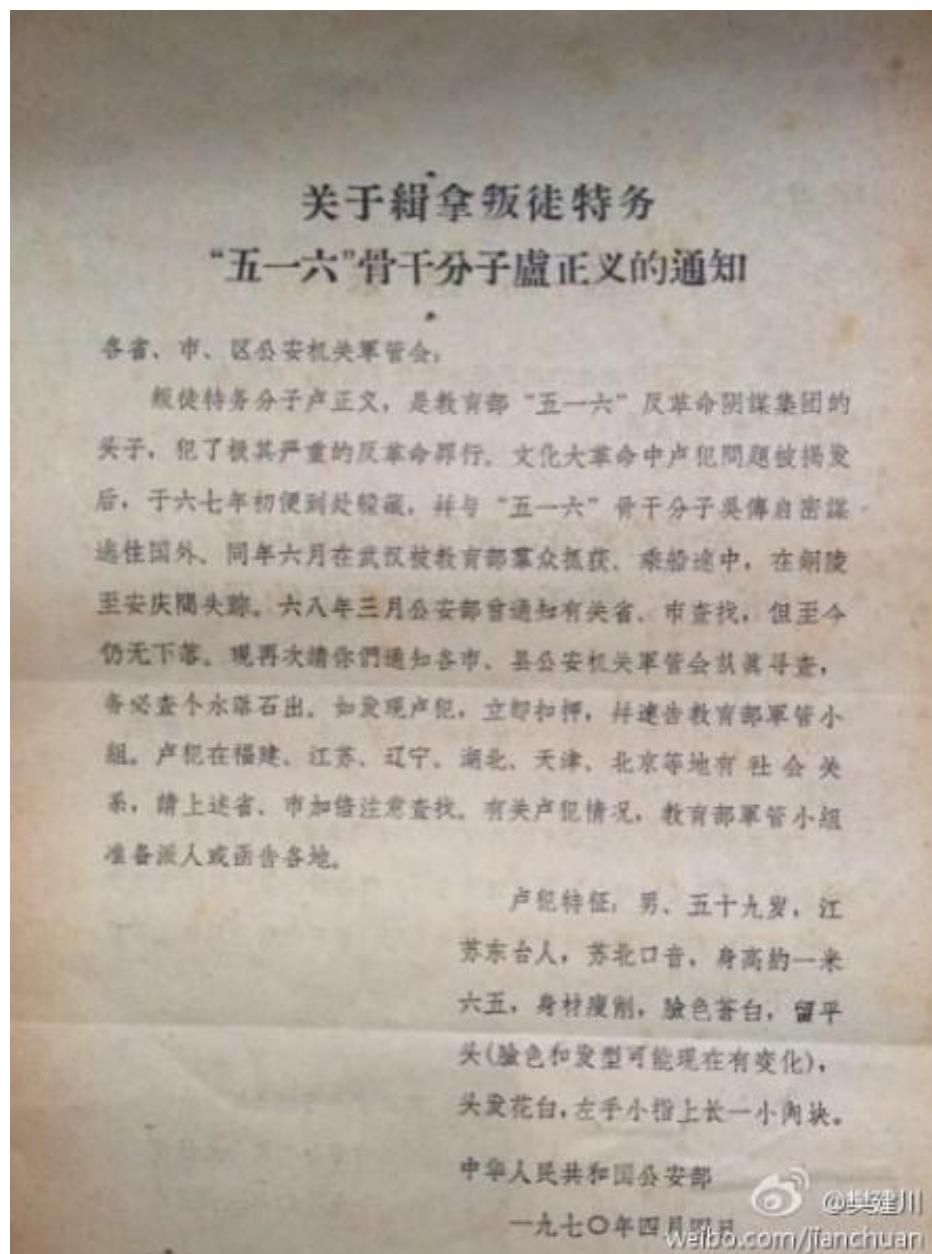
《通知》特别批评“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

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并提醒说：“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通知》最后指出：“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3月31日，周恩来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29日关于新疆地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的汇报批示陈伯达、康生：“我意打击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国集团要严，处理受蒙蔽被胁从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否则就有扩大的危险，应提起他们注意。”

1970年4月4日，公安部发出缉拿教育部“516”分子卢正义的通知。



这是 1970 年 4 月 4 日公安部发出的缉拿卢正义的通知。“文革”后期，据当时航行日志记载，得知他在长江航行时投江身亡。

4 月，周恩来再次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

在揭批“516”的运动中，上海著名的“游雪涛小组”负责人游雪涛也被卷了进去。

上海游雪涛的“二二四小组”，在其两年多的活动期间，共编送了《动态》、《动态增刊》及其他手写的情报有300多（期）件。其中，张春桥亲自在上面批过字的就有54件。有时张春桥还会就其中的某个问题，另行召见游雪涛，予以询问。

游雪涛的那些《简报》、《动态》之类，只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极少几个人。有的，则只手抄一份送张春桥。而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却始终被游雪涛排除在送阅情报的人员名单之外，而且王洪文本人及“工总司”还经常成为侦查的对象。对此，王洪文在风闻游雪涛的一些活动后，特别是听说“工总司”高层的一些情况，是被游雪涛小组刺探出去的，更为恼火，欲予追查却又碍于张、姚而不能。

有一天，游雪涛突然来到徐景贤在康平路的三楼办公室，很神秘的对徐景贤说：“前天，春桥同志找我去谈了一次话，听我讲了一下最近的情况，谈到最后，他征求了我对市革会领导的意见。”说到这里，他露出很洋洋自得的神情，继续说道：“春桥同志说，今后他在北京的时间比较多，在上海的时间少了，因此，正在考虑谁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个人，究竟谁比较适合。”

这样重大的事情，张春桥居然会征求游学涛的意见？！

这让徐景贤很吃惊，但又不便表态。

看到徐景贤好像不大相信的样子，游雪涛就有声有色地讲起了当时谈话的细节，他说：

“春桥同志先是坐在椅子，接着站起来，把身体靠在他背后的热水汀上面，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徐景贤对张春桥办公室很熟悉，他说的环境及对话的情况，不能不让徐景贤相信。

游雪涛继续说：“我当时回答，还是徐景贤比较合适。”

徐景贤似乎明白游雪涛向他透露这一重大信息的含义了。谈话结束后，游雪涛又主动邀请说：“你是不是到我的永福路去看看。”

游雪涛小组重组后，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新工作地点。康平路一般人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只有他的电话号码。徐景贤也只是听王承龙讲起过那地方。这次，游雪涛主动把永福路的具体地点和门牌号码告诉了徐景贤。

徐景贤跟游雪涛来到永福路 244 号。这是一幢花园洋房，两层楼，白墙红顶，外面有个很大的花园，有扇很大的木门，院墙上面都带着铁丝网。徐景贤注意到，楼外面没有门牌，游学涛说，是为了保密，把 244 号门牌摘掉了。游雪涛说，这里从前是一个北欧国家驻上海的领事馆。文革后，领事馆撤走了，这房子就腾出来了。

进院后，有一条柏油路、可以开汽车，旁边是冬青树，

还有很高的大雪松。游雪涛说，刘晓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在这里住过，后来柯庆施也住过。

进了洋房，在一个大饭厅旁边有个小房间，复旦大学“红三司”一位姓谭的学生正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看见游雪涛陪着徐景贤进来，很客气的站起来，和徐景贤握握手。游雪涛向徐景贤做了介绍说，他是很能写文章的笔杆子，一度负责主编过上海《红卫战报》。游雪涛不无得意的在徐景贤耳边小声说道：“这个小谭，还有戏剧学院的小侯，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

徐景贤明白，只要这两个红卫兵负责人在游雪涛那里，他就可以动用这两个单位红卫兵的力量。这两个人过去徐景贤都认识，他没想到，此时这二人却成了游雪涛的左膀右臂。

洋房的底层，有大餐厅和小餐厅，平时他们就在这里开会。二楼是正屋，游雪涛妻子吴锡敏在那里，里面有办公桌，有床。徐景贤很奇怪，这地方怎么好像是住家呀？他问：“你们把家也搬来了？”

游雪涛笑了，吴锡敏说：“有时候工作忙了，晚上就睡在这里，不回家了。”

徐景贤问：“其他人呢？”因为他进来只看见外面那位姓谭的学生。

游雪涛说：“都去执行任务了，每天都要很晚才回来。”

徐景贤走到阳台上一看，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一

个池塘和造型很好的假山，便说：“你这里比我们康平路还幽静嘛，你真是成了‘独立王国’了。”

1968年11月30日，游雪涛送了一份材料给张春桥，这是他就“二二四小组”的活动写的《一年工作总结》，游雪涛也打了一份给徐景贤。在《一年工作总结》的前面，游雪涛附了一封写给张春桥的信。信里说：“过去的一年，是自己参加工作18年来最幸福的一年。听到您在百忙中还曾问我到我的近况，不禁热泪盈眶。”在《一年工作总结》中，游雪涛写道：“一个非正式的工作机构，二十几名没有合法活动身份的‘小小老百姓’，由于是在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突然离开战场的，又长期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引起别人无意的猜疑和有意的诽谤，这一年来，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一年多来，绝大部分同志始终像战士处于一级战备那样，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什么时候有情况，就什么时候出动。从1967年8月到1968年9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100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预报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现了一批混进革命阵营的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在这份《一年工作总结》上，批了两句话：“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你们的经验，我还要

想一想。”

游雪涛为搞情报，四处插手，不仅监督“工总司”的动态，还插手上海警备区、南京军区等军队系统。特别是他插手上海公检法系统，为自己惹来了很大的麻烦。

上海公检法军管会是由空4军负责。空4军政委王维国本来就和王洪文、徐景贤等人面和心不和。他在延安中路仪表局旁边设了一个密点，专门收集各种各样的情况，当然也收集到了“游雪涛小组”活动的材料，特别是游雪涛插手公检法的活动。这一情况让张春桥感到事态很严重。他把徐景贤找去，问“游雪涛小组怎么办？”

徐景贤说：“是不是把他弄到市革会专案办去？”

张春桥表示同意，说：“这样吧，‘游雪涛小组’解散，永福路停止，让游雪涛到市革会专案办去担任领导核心。”

徐景贤将这个决定和游雪涛谈了，游雪涛同意。但他到专案办一段时间后，“游雪涛小组”的一群人还是每天围在他身边，活动频繁。张春桥为此事专门下了一个批示：“游雪涛同志同各方面的联系还是太多，要十分警惕！”

然而，游雪涛似乎不搞特工，不与他的那些有狂热精神的弟兄们来往，他无法活。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能采取非常措施。他让徐景贤找游雪涛谈话，要游雪涛离开市革委机关，或去市直机关五七干校，或下放工厂，任选其一。徐景贤意识到这次很难谈，但

没有办法。

1970年8月，徐景贤将游雪涛和他的妻子吴锡敏两人约到康平路小礼堂，对游雪涛说：“春桥同志决定，你从明天起下放劳动。”

闻听此话，游雪涛和吴锡敏都跳了起来……

下放劳动就是撤职，俩人当然非常生气，吴锡敏当场就哭了，他们没想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那么久，却落得这样的结果。

徐景贤继续说：“一个是到工厂去劳动，一个是到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去劳动，两个里面选一个。”“你们回去很好的安排一下，这次是要坚决落实了。”

徐景贤还对游雪涛说：“我曾叫我的秘书张家龙到你家，劝过你两次，叫你不要再搞这么大的活动。他到你家里来，进门之前从窗子里看到你家灯亮着，有人在你家谈话，等到他一敲门进去了，人不见了。我们不是特务，也不搞情报，他是受我委托来看你的，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怎么能这样搞呢？来过两次，劝告你不要再搞这种活动，我是以朋友的名义，关心你，但你们已到了打不散的程度。”

游雪涛说：“哦，还有这种事啊？”

游雪涛毕竟只是一个由浪漫文人自个儿转行、无师自通而从未受到过真正专业训练的特务，却不是一个像戴笠那样守纪律、能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更缺乏一个政治

家应有的素质。因此，他不仅不能理解张春桥的意图，反而将张春桥对他的举措视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打击，极为不满。在徐景贤找他谈话后，他立马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通过文静转交，信封上写“文静同志转张春桥同志”，由吴锡敏送到文静那里。信上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永福路的人置于转过头要枪毙的地步，我好比一头受伤的熊，躲入丛林，舔掉自己身上的血，准备战斗。”

他在信里把牢骚主要发在王洪文、王少庸，王维国、王秀珍等人身上，意思是他被这些人陷害的。张春桥看了这封信，非常生气，说“这是给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战书了！”但，一时也没将游雪涛怎么样，只是宣布了将他下放工厂的决定。

可是，不识时务却只有满腹牢骚的游雪涛，自视有功，拒不下去，称病在家。不下去就不下去，养病就养病，也没人催他。游雪涛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在哪儿出了毛病，而惹得张春桥对他做出了这么个决定？而是仍然经常不断地找他那班前特工兄弟来谈话，不断地发牢骚，讲话又常走火，不是同情陈伯达，就是开始说对文革不满的话。而他这些话，又被他手下的一些弟兄传了出去，或揭发出去。这一来，不要说张春桥，就是王洪文、徐景贤等造反派头头们都不能容忍他了。1971年，经张春桥批准，王洪文派民兵将游雪涛抓了起来，关进市民兵指挥部的监狱

“隔离审查”。负责该案的是市委组织组的金祖敏。张春桥对隔离审查游雪涛有批示：“不要点什么问题，心平气和、讲道理，使他感到不是打击他，而是帮助他弄清问题，大家主动。”项目组根据张春桥批示去查，但能查出什么东西呢，结果把他一直关了3年多。直到1975年，经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等人同意，才将他放了出来，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仍要他下五七干校，发生活费。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游雪涛重新被捕，并被判刑15年，而且，前段王洪文关他的那3年多，算白关了，不能抵刑期。因此，游雪涛为他的特务生涯，前后便共蹲了18年大牢。

第1126回：江苏省，南京大学突破口

文风来，“江苏没有‘五一六’”

1970年4月起，江苏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江苏省军区政委、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大胜负责，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

江苏首先将南京大学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负责，江苏省党的核心组成员、省革委会副主任迟明堂为驻南京大学清队工作队长，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当时，南京大学师生员工基本都在溧阳五七农场。5月28日，学校通知，除中文系和后勤机关人员继续留在溧阳外，其余的返回南京。

大家回到南京，休息了两天后，即集体住在学生宿舍，每天上午、下午、晚学习中央关于清查“516”的通知，20号文件，展开讨论和揭发。

校园内刷出巨大的标语：

誓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血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16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一切可以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大字报。内容全部是

揭发学校“红四联”，即“红总派”主要头头的罪行，说他们就是“5.16”阴谋集团的头子或骨干。

不到一个月，出现了几个跳楼、触电“自绝于人民”、对抗运动的反动分子。于是从二楼开始，凡住着审查对象的房间，窗户都钉上木条。

为了防止跳楼、自杀的事件发生，每个被斗的对象配备两名专案人员或积极分子紧跟着。每个楼道的进出口，派两个人日夜值班，监视住在楼里的人。

住在第8学生宿舍的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体育教研室、图书馆的教职员，他们组成为一个连队，简称“马体图”。6月中旬的一天早饭前，工军宣队通知他们在饭厅前集合，宣布说：“大家注意，每人都要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擦亮眼睛，积极投入揪‘5.16’的战斗。我们的仗有得打呢。实话告诉你们，马体图里的‘5.16’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我今天先点一个不大不小的‘5.16’分子的名，这人埋藏得很深，你们不要看他是什么马列主义专家，什么老党员，剥去外皮，他是个货真价实的‘5.16’。他是谁？”

说到这里，领导有意停顿一会，然后，加重语气说：“他的名字叫陈向阳！姓陈的，你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有幻想……”

突然，“嘭”的一声，只见陈向阳重重地倒在了地上，昏厥过去了。

陈向阳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党员，参加革命 20 来年了。文革初，他是保守派，参加“红四联”后，也基本是个逍遥派。说他是“5.16”，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陈向阳承受不了这泰山压顶的沉重打击，昏倒了。

7月1日上午，外文系教师史兆瑜在第七宿舍四楼跳楼自杀。

史兆瑜是烈士子弟，其父当年与李先念一起革命。牺牲后，他母亲寡居抚孤，千辛万苦将他养大，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因是烈士子弟，被派往东德留学。

7月2日，系领导宣布，史兆瑜跳楼自杀，自绝于人民。

当天傍晚，史兆瑜母亲在第七宿舍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凄厉惨痛的嚎哭声在南园上空回荡。

7月4日，全系召开声讨史兆瑜大会。史兆瑜的自杀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因为他选择在7月1日自杀。

7月9日清晨，外文系陈慧彬跳楼自杀，下午全系开大会，批判陈慧彬自绝人民、畏罪自杀。

从7月1日至13日，南大接连发生4起审查对象自杀事件。

南大外文系沈宗美，原为“827”勤务组成员。清查“516”开始后，他以外文系革委会主任的身份领导外文系的清查。4个多月后，1970年9月2日晚，省调查组组长迟明堂把他叫去，冷冷地问：“你有没有问题？”还没等沈宗美反应过

来，迟明堂就以威严的口气宣布：“从现在开始，外文系的工作不要做了。明天办你的学习班。”

沈宗美进了“学习班”，因态度顽固，小分队的骨干们便在他的床四周钉上木板条，围成一个严严实实的木笼。与他一起造反的李忠清、夏常乐、曹漫西、张家霖，也都被圈起来。很多单位的专案组，也像走马灯似的换人，昨天还在审查别人，今天就成了被审查的对象。

一天刚吃过午饭，外文系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曹漫西突然跑到政治系小分队队长蒋广学的家里。她因为在文革中曾跟着沈宗美参加了造反派，这时也被圈起来，让她交待。可是曹漫西连“516兵团”的名称都不知道，怎么交待呀？无奈之下，她只好求助于自己丈夫戴立泉政治系的同学、曾担任政治系郁慕镛小分队队长、此时在校教育革命组的蒋广学，觉得他肯定了解“516”组织的内幕，希望能给她吐露一些真情，帮她尽快过关。

蒋广学担心学校有人看见他和被审查对象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俩人一起来到夫子庙，冒着小雨，用伞盖着脸，在湿滑的石板路上，边走边谈。

曹漫西对蒋广学说：“老蒋，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老戴又在溧阳，我不能天天被围在那个地方呀。我交代完之后，这个事情不就算了嘛。”

蒋广学知道曹漫西出身不好，不想让她再背上“516”

的包袱。但是，又不能明确地让她不交待，担心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反复跟她说：

“你有没有参加？参加了就能记得它的名字。如果一时记不起来，好好想，如果想不起来，千万不要瞎猜，也不能去瞎讲啊。”

虽然蒋广学绕着弯子，用各种方式来暗示曹漫西不能交待，但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让曹漫西拖下去，不知是谁告诉了她“516”的全称，最后她还是交待了。

而外文系的李忠清，被逼的直接跳楼自杀，未遂，但是断了一条腿，终生残疾。

外文系的张家霖则被逼得神经错乱，在办案人员的一再逼迫、暗示下，到最后产生幻觉，不仅觉得自己参加了“516”，而且在别人的诱导下，还说自己直接参加了一个阴谋刺杀毛泽东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竟是外文系造反队头头沈宗美，其活动听从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吴大胜直接指挥，准备在毛主席来南京接见和检阅群众时，乘机刺杀他老人家。

其实，吴大胜指挥江苏“516”不是张家霖第一个交待的，在此之前已有多人相继交待了。但是，唯有张家霖的交待最为翔实、具体。

几乎所有被圈起来要求交代“516”问题的人都遇到了外文系曹漫西的情况。

一天，一份标题为《如果小分队长也是“5.16”怎么办？》

的大字报，引起图书馆正在接受审查的吴老师注意。小分队是专门负责审查“516”的，小分队的分队长怎么是“516”呢？根据大字报的描述，这个小分队的分队长应该是体育教研室的言老师。

晚饭后，图书馆吴老师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来者正是体育教研室的小分队的分队长言老师。吴老师堵住门问他：

“有什么事？”

言老师推开吴老师，强行进屋后又返身关上门，神色紧张、结结巴巴、慌不择言地对吴老师说：

“请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帮帮我，求求你了。”

吴老师懵了，莫名其妙的呆立在那里。突然，言老师双膝跪下，哀求她说：

“我给你跪下了，求你救救我，告诉我‘516’组织的名称。我被点名了，不得了了，性命难保，你一定要救我，告诉我啊！”

吴老师木然站着，她和言老师都是在“马体图”连队，深知言老师在审查“516”中表现积极，所以从心里不同情他，同时感到非常意外：“他怎么来问我？”只能冷冷地说：“我又不是‘516’，怎么知道‘516’的名称，拿什么告诉你？”

言老师睁大眼睛，很惊奇的问道：“什么？你不是

‘516’？”

“当然！不是！”吴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

言老师愣住了，口中喃喃地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满脸尴尬，匆匆转身走了。

经过数月的战斗，学校终于得到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口供。

数学系革委会副主任、原“红四联”核心成员徐福培，交待自己由全国“516”的总头目之一的吴传启亲自发展，回南大后，接受文凤来、张建山直接指挥，掌管南大“516”的组织工作，发展了一批“516”骨干分子等。

“红四联”的勤务组成员之一王继志则是在小分队的轮番逼迫、神情恍惚的情况下，被学校革委会主任王勇、副主任王良才拿着手铐威胁说：“你的上级和同伙都交待了，如果再不交待，就送你到‘老虎桥’。”于是，也承认自己是“516”了。

地质系教师，原“827”驻京联络处主任潘恩沛，交待出他与首都“516”核心成员、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关系密切，由全国“516”总头目吴传启等人发展，尔后领旨在南京大学发展“516”。

生物系女学生朱念周，“827”最早的成员之一，曾是“红四联”驻京办事处的，组织过批谭（震林）联络站。调查组进驻南京大学后宣布的第一份“516”名单中的五个人之一。关押后态度顽固，拒不交代，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9月

5日，她终于在全校“宽严大会”上坦白交代了，说自己是被“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拉下水的。她是江苏“516”元老，南北联络员。她在威逼下还交代说，她组织的批谭（震林）联络站就是一个“516”组织。还说自己是“516”的元老、种子，并供出一串“516”。

还有人在小分队的逼迫和诱导下，画出了“516”的“联络图”。这张“联络图”，几乎囊括了南京大学原“红四联”所有的积极分子和支持“红四联”的干部，他们或被说成是“516”分子，或被说成是“516”的幕后策划者。“红四联”的组织部长，则被说成南京大学“516”的组织部长。她说：“首长一次又一次找我谈话，反复耐心给我‘三个大讲’，并且严肃地多次指出：‘你的罪行是客观存在的，组织上早已是掌握得清清楚楚的，凭你的罪行，看你的态度，坐牢杀头哪样都够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早就可以法律制裁你了，但现在所以不这样做，还是为了挽救你……’”

她说的首长，是省调查组副组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省革委会政法组组长赵洪。这样重要身份的人，讲这样严厉的话，朱念周怎能不胆战心惊？

得到这口供后，省、校领导便非常兴奋、非常自信的认为：南京大学“516”是由“红四联”的核心成员为领袖，以此骨干成员为彼骨干成员，上由王关戚的线人吴传启直接发展与指挥，下深入到“揪军内一小撮”反军活动的积极分

子，即组织结构非常完整的现行反革命组织。于是，大张旗鼓地乘胜追击。

政治系逻辑学教师郁慕镛在 1967 年 7、8 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参与组织了“紧跟战斗队”，所以，学校在“一打三反”排查现行反革命活动时，不少事情已经指向了他，但是还未组成清查他的小分队。5 月底，政治系的教师从溧阳集中搬进南京大学南园十栋一楼后，工宣队就把郁慕镛作为“516”的怀疑对象圈起来，还组织了专门小分队对其展开政治攻势。

郁慕镛的记性确实是好，在要求他交代问题时，他几乎把 67 年江苏“1.26 夺权”后，每一天他的行踪都排列出来，特别是对大家感兴趣的 67 年 6、7、8、9 几个月的活动排得清清楚楚，然而就是没有他参加“516”的一项。

政治系郁慕镛小分队队长蒋广学去找他岳父的朋友，校革委会主任王勇，问郁慕镛是不是“516”？

王勇略加思索地回答说，郁慕镛在“516”的名册上。于是，蒋广学以小分队队长的身份明确地向郁慕镛宣布：

“郁慕镛，你一定要丢掉一切幻想，你的‘516’问题是铁板钉钉，必须老实交待，特别不要把我们几个月来的耐心当作驴肝肺。现在你的上级、同伙早都交待了，名册在案，就等你的态度。”

郁慕镛显得比较紧张，说：“蒋广学同志，我不是不想

交待，我天天排来排去，除了‘紧跟战斗队’，我排不出参加了其他名称的组织。”

“我再强调一遍，你的上级，你的同伙已经交待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够长的了。”

“让我再想想吧。”郁慕镛说这话的时候，甚至要流出泪来。

郁慕镛仍没有交代。小分队又找郁慕镛的新婚妻子前来劝说丈夫。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正当蒋广学他们等待郁慕镛交待的好消息时，他突然伸着被绳索勒红了的脖子来找小分队说：

“昨夜，在你们睡觉的时候我去上吊了”

蒋广学的第一反应是“绝不可能”，然后逼着郁慕镛到上吊的地方查证一番。

郁慕镛有些惊慌，而他越是惊慌小分队越是觉得他是在撒慌。

无奈的郁慕镛领着大家来到走廊中间的洗脸间，指着洗脸间靠近窗口的墙角上的下水道弯头，说是在那里上的吊。

蒋广学觉得那里怎么能上吊呢？于是声嘶力竭地命令郁慕镛演示一遍。郁慕镛只好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解释说：上吊的时候，把自己的腰带绕在下水管道的弯头上，系了一个活扣，把头放进扣里。由于扣子高过了头颈，就拿了一个方凳站上去。当把脖子套进扣子里，方凳倒下那一刻，他全

身猛地向墙角倾斜，结果又反弹到地上。最后，他指着离墙角一米多远的地方，那里真的有他摔下来的痕迹。

听完了郁慕镛的解释后，蒋广学突然意识到刚才让郁慕镛重演一遍自杀的过程，对一个刚刚从死里逃生的人是多么残酷。他开始害怕起来：“如果郁慕镛真的死了，我怎么好意思安心地活下去？”但此时，他还是大声地威吓郁慕镛说：“你这是自绝人民，罪上加罪！”

南大原保卫科科长陈霖被关押后，7个多月没攻下来。11月3日，迟明堂指示陈霖小分队：“陈霖是一个很狡猾的反革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他搞得缴械投降。要打到他自己要交代的地步，要用斗争方法把他斗垮。”随后，小分队接连批斗陈霖数十次，经常从晚上斗到第二天早晨。一次曾连续斗三个通宵。陈霖终于“缴械”了，交代了“十分重要”的问题，供出省调查组组长迟明堂就是“516”。袁服武、康炳成也说迟明堂是“516”。吴大胜有规定，三个人交代你是“516”，就可以定案。很快，迟明堂也被作为“516”审查，后被关进监狱。

南京大学召开了揭批文风来的全校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多达几万，大部分是外单位来的。在大会临近开始时，忽然听说有人从“文革楼”跳下。死者名金鉅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青年女职工。那天，她被押进南大后，乘人不备，突然跑上“文革楼”跳楼自杀。

文凤来是被绑着双臂由两位穿军装的年轻人押上台的。昔日的同伴和战友、今日反戈一击的葛忠龙在台上激昂慷慨，揭发他在何时何地与葛忠龙、曾邦元、张建山一起加入了“516”，他们又发展了多少、多少成员，虽然表面上分为两派，但相竞发动了一起起的反军活动。讲的有鼻子有眼。

接着，又有一人上台揭发文凤来。但文凤来这条东北汉子没有一点恐惧，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该受什么惩罚我都接受，我有罪，我认罪。但是，我不是‘516’！我和‘红总’其他头头与北京‘516’没有任何关系，南大没有‘516’！江苏没有‘516’！”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引来的是台下“打倒文凤来”的口号声，声震屋瓦。

文凤来没有屈服，在雷暴暂歇之际，对葛忠龙说：“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有的会家破人亡，你对得起谁？”

因为“气焰嚣张”，文风来当场被用手铐铐了起来。散会的时候，有人低声的说：“乖乖，这家伙厉害。”从1970年4月上旬开始，到1970年8月，南京大学经过4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的“516”分子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第1127回：无锡市，许世友传达文件

查黄廉，湖北班批判三人

1970年的初春，许世友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有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市革委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许世友说：“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

在清查“516”的运动中，无锡市将1967年发生的几次针对27军的游行、静坐等事件都作为“516”的重大案件，如：

1967年2月16日、17日发生的反对27军以“反动组织”的罪名取缔“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1022兵团”等群众组织的请愿大游行。1970年下半年，此事定为“216、217反革命大游行”，并把这件事的参与者、组织者作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1967年4月《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当时军管会已经承认错误，此时，又把这件事作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清查对象。

1967年5月，因为争夺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12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而爆发的全市大规模武斗，被说成是在“516”策划下，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

命武装暴乱”。

1967年6月发生的土制“装甲汽车”参加武斗，驾驶失控后撞树起火的事件，此时也被说成了是在“516”策划下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1967年7月3日，“革派联总”撤出无锡，跑到南京、上海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的行动，这次被定性为“在516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1967年7月发生的洛社镇武斗，此时被定性为“516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篡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

另外，1968年5月，无锡上千人出逃躲避，集聚徐州和鲁南等地的事情也被定为“516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围绕这些事件追查过程中，发生许多严刑逼供的事情，一些人自杀身亡。

中央湖北学习班在刘万泰、王锦铭、张鹏程被逮捕后，各个连队就掀起了狠抓“北决扬”、“516”份子的高潮。

水院一位同学在“送卫戍区”的恐吓、逼迫下，于3月28日承认自己和丁家显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在1967年8月介绍签名加入“516”的。4月初他又交代说，他和

丁家显把水院闯派学习班的名单交给魏绳武了，于是水院闯派学习班就集体加入了“516”，责任由他和丁家显负。

水院的学员们作梦也没有想到会集体参加“516”。随即，水院在北京学习班的学员被隔离审问，被告知：“其他人都承认参加了‘516’，唯独你不承认，再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很多人感到很冤枉，也很绝望，觉得别人都承认了，自己一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想一死了之，又怕说是直接对抗党中央，怕打成反革命，怕送卫戍区，怕这一辈子完了……于是，又有人承认了水院闯派学习班是“516”组织，还承认自己是水院“516”的“组织部长”。就这样，水院更多同学受到牵连、审查、批斗、关进五不准学习班、被打成“516”分子和“北决扬”分子。

学习班发动群众猛揭猛批杨道远、胡厚民。

终于有一天，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上台发言说，杨道远发展他成为“516”成员。

武汉水院参加北京学习班的张建成当时在湖北班材料组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他回忆：

“我在材料组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熟悉、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不管哪个连、哪个人，凡是揭发、批判杨道远的材料，我都要了解。后来王步青副参谋长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做批判杨道远的系统发言，所以要了解、熟悉杨道远的所有材

料。”

张昭剑给张建成系统揭批杨道远的发言定了基调：“杨道远是湖北‘北决扬’、‘516’的总负责，他通过两条线与王、关、戚联系，一条是魏绳武——宋洛——吴传启——王、关、戚，另一条线是‘二司’驻京联络站——林杰——王、关、戚；杨道远的理论基础是‘二论’，即‘阶级斗争演戏论’、‘路线斗争循环论’。结论是：必须对杨道远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把湖北的‘北决扬’、‘516’两个反革命组织彻底清除。”

张建成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批判发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领导很满意，后来把我的发言录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过我的口，告诉人们杨道远是湖北‘北决扬’、‘516’的总负责人，他参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证据充分。”

虽然上台揭批胡厚民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批判揭发都没有分量。这时，胡厚民的上级兼战友、“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揭批了胡厚民的反动思想，总结为三句话：“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干。”湖北班立刻将这“三干”宣布为武汉五一六、北决扬及胡厚民的“反革命纲领和策略”，立为批判的靶子。

胡厚民非但不作任何辩解，反而就汤下面，把朱鸿霞总结的“长期干”改成“二十年后大干”。有一次，军代表组

织大家到小组会上去揭批胡厚民，胡厚民非但不检讨，反而借交待为名，大谈为什么要“二十年后大干”。他说：“二十年后，老红军不多了，抗日干部掌权的也不多了。那时造反派已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的战士，将是战无不胜的！”军代表指责他边交待边放毒，胡厚民照说不误，直到军代表不准他讲话。

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为了整胡厚民，学习班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武钢工人陈祖坤是不认错的人中的一个，他在学习班里始终坚持“反复旧”没有错，一再声称希望就这个问题，还有文革是否搞错了，和武钢当权派辩论。经过几次较量，没有人再让他承认错误。以后除了湖北班的大会，他们连基本就不开会了。因为连里一开会，陈祖坤就和大家辩论，没人再惹他了。

朱鸿霞、杨道远、吴焱金等在学习班大会上检讨的录音，雷志茂等承认加入“516”的录音，也在湖北各地同时举办的学习班上播放。

与造反派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很有经验，如武汉市统计局长崔放鸣，他一点也不紧张，字斟句酌地写好

三张纸的检查交待，除了给自己扣大帽子外，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张纸就开始接受批判，无论别人怎么样批判，他总是虚心接受，然后下次还是这三张纸照念不误。后来军代表恼火了，把他那三张纸收走。但他对检查交代的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写三张。9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念下去，软磨硬抗，军代表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原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在这9个月里，始终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不写，任凭你如何批判，他始终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军代表有次组织大家去打薛朴若的态度，他依然是半闭着眼端坐不动，像和尚坐禅一样。个别人为表现自己，不但大声吼叫，而且拳头几乎要挥到他的脸上，他也纹丝不动。有人吼道：

“你为什么打瞌睡？”

只见他并不睁眼，轻声说：

“听着呢！”

这是在半天的批判中，人们听到的唯一的三个字。薛朴若就这样硬顶9个月，居然也平安无事。

但那些造反派头头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认真的做检查，态度诚恳。

1970年3月16日，谢富治说：“‘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

4月6日，纪登奎说：“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

曾思玉的回答是：“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愿意下来就下来。”

5月底，北京学习班结束。在张昭剑主持的总结大会上，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宣布：“经伯达同志批准，黄总长签署，决定将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继续批斗，彭勋送农场劳动改造，魏绳武实行专案审查”。

吴炎金、彭勋等在大会发言。

陈伯达在纪登奎陪同下到会，还讲了话。陈伯达一开始就说：“清华大学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窃国大盗，你们看我像窃国大盗吗？清华要把这个人抓起来，我要清华不要抓。”

纪登奎说：“伯达同志是不能反的，反了就要抓起来。”

陈伯达在讲话时还点了支持“钢派”的任爱生和支持造反派的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科长、闻一多的侄子闻立清的名。

陈伯达先说任爱生：“你造反有野心，想当大官。”

任爱生站起来反驳陈伯达：“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造反派，出于公心。你不要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我不怕你。”

任爱生和陈伯达互相大声喊叫，只是，陈伯达的福建话

和任爱生的山西“鸟叫”谁也听不懂。

陈伯达又问闻立清：“‘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是你讲的吗？”

闻立清挺直腰板，昂首直视陈伯达：“是我说的，么样？”

陈伯达提高嗓门：“我要杀你的头。”

闻立清说：“你敢！”

张昭剑插话：“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纪登奎马上解释说：“伯达同志说的要杀头，是指要杀你反动思想的头。”

1970年5月30日，在北京的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516”总头目。

6月6日至13日，湖北省革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按照陈伯达、黄永胜的指示，批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包括刚回汉的北京学习班全体人员在内的3000多人参加，300多万人收听会议实况。刘丰首先作报告，他说：

“胡、任、李本来就不是好人，不是好人犯错误。胡厚民是‘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任爱生是地地道道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李想玉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在文革中坐车到他老家为地主父亲翻案。他们勾结叛徒、特务和一小撮牛鬼蛇神大刮妖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坏，湖北两次反复的根子都在这里，干了大量的坏事。我们多次挽救，他们拒不接受，在这次贯彻‘927’指示时也挽救，在北京学

习班态度也不好。任爱生在北京还准备告状，现在不把他们交给群众批斗不足以平民愤。”

会上安排 48 人发言，其中武汉市电信局“工总”头头刘闯揭发说：胡厚民是“五一六在汉的前台指挥”，1967 年 1 月至 3 月指使电信局的和其姐胡秀娟组织“516 兵团”，在电信局发展组织；“‘720’后指使胡秀娟发展了我。”“胡厚民还是‘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北斗星学会’成立胡是点了头的，‘决派’的名字是胡取的，《扬子江评论》的文章是胡修改的，胡想什么‘扬评’就评什么，‘扬评’什么时候出也由胡决定。”

这次会议宣布撤销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会后 3 人被关押。

1970 年，周恩来指示，要重庆的黄廉和周家喻到工厂里去与工人打成一片。市革委会征求他们两人的意见，周家喻说，他还是回原来分配的单位红光厂，黄廉也说回原单位。被结合进市革委会的原重庆市副市长岳林对黄廉说：“你回木材公司还是当干部搞宣教，等于没有下放，要真正摸到机器，出产品。”

最后，革委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把他们两个都下放到长安厂三车间。

4 月 30 日晚上，重庆市总工会开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文艺晚会，市领导只有黄廉和周家喻参加。演出结束后，工人

员通知他们两人坐一辆车子回市委。到了那里，鲁大东、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和丁长河3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们。陈占楼先说：“黄副主任、周常委，中央有个通知，为了提高思想觉悟，进一步克服派性，是不是就请你们从明天开始就进学习班，学习班就办在你们本单位。”

第二天，黄廉的伏尔加换成华沙车，将他送回木材公司。迎接他的是工厂的书记和保卫科长，他们说前两天刚刚听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就在礼堂的地下室将就，为了黄廉的安全，他们安排3个人陪他一起学习。

黄廉学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之后，13军政治部主任陈占楼对他说：“你学了这六本书，提高了觉悟，现在转入下一个阶段，主要是交代在北京怎么与‘516’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

黄廉对陈占楼说：“你们这个搞法是非常错误的，我的副主任是毛主席定的，你只是军队支左干部，在革委会办事组负责，关了我3个月不让出门，还要搞四不准，不准会客、不准写信打电话，不让家属探视，连饭也不让吃饱。”

陈占楼说：“现在是我们军队管这个事情，‘516’有国际背景，还与拉美的游击队和格瓦拉有了关系。”

旁边的人也劝黄廉好好说话。黄廉说：“你们懂什么，他是我的下级。”

陈占楼说：“从今天起明确，生活上丝毫不要克扣他，

他自己出钱买饭菜票，但是要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回市革委会。”

黄廉问陈占楼：“你告诉我‘516’有什么破坏性？”

陈占楼说：“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黄廉又问：“反不反周总理？”

陈占楼说：“凡是中央领导都反嘛。”

就这样，黄廉被要求交代他与北京“516”的关系。

有一天，黄廉翻窗户进入储运科，给新华社拨电话找谢文欣，谢文欣不在，接电话的人问他是谁，有什么事？

黄廉说：“我是黄廉，已经被人扣在地下室快半年了，是偷跑出来打的电话。”

这下子可不得了，13军的领导，市委的处长，公安局的人，都来了，询问是怎么回事？

黄廉说：“打个电话有什么不得了？”

他们说问题大了，训斥那些看守的人，说他们无用，说从此之后要加强看守，吃饭上厕所都要跟着。

有一天，外头一个挑泔水的人，趁人不注意，丢给黄廉一个字条，上面只有几句话，说：“中央出了大问题，你要保重身体。”那个人说：“这是外面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叫我摔给你的，我认不到他们。”

9月底，木材公司开批判大会，批判黄廉“516分子”的问题。黄廉要求在大会上发言，他说：

“你们说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事实，我来跟你们讲一讲‘516’，北京最开始是有个‘516兵团’，是从‘联动’演化过来的，他们反对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你们这么多的科级以上干部和党员，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我来了有半年多，走进门来就被关起，这一次清查‘516’完全是人身迫害，是慢性谋杀，你们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我料定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这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反扑。”

黃廉等人的“516”问题一直持续到批林批孔运动前才算告一段落。重庆市委又给他们安排了工作，黃廉和周家喻又回到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第1128回：“火上烤”，谈“不设国家主席”

在广州，开“三国四方会议”

4月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陈伯达、康生4月1日报送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写的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把文章题目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并批示：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泽东删掉的那些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毛泽东同志……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4月4日，陈伯达致信周恩来、康生，提出毛泽东批评的缺点方面，主要应由他负责，并建议在中央范围内先开一次会，学习研究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批告：先将毛泽东批示、修改件在政治局范围内传阅。

4月11日，毛泽东从武汉到达长沙。当晚，与湖南的华

国锋和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卜占亚谈话，汪东兴在场。

在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省委一些干部当时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湖南省委比较起来还是不错的，好人还是大多数，张平化也还是好人，他现在湖北。他还说：胡继宗这个人干劲还是大的，他就是不太注意调查研究，不愿意深入下去，现在甘肃实际上就是他在哪里主持工作。毛泽东继续说：还有李瑞山，现在在陕西工作。公检法也不能说都是坏人，也要一分为二。像张平化这样的人叫他做点工作能通过吗？还有像谭启龙这样的人都要给点工作的。过去群众不谅解，现在准备叫张平化、谭启龙他们做人大代表。

在卜占亚汇报到解放军支左情况时，毛泽东说：还是三结合好，一个是解放军，一个是干部，一个是群众的代表。要互相学习。还是要地方和军队结合起来，实行一元化领导。

这天夜里 23 时 30 分，正在苏州的林彪让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主席的秘书，转达他的三条建议：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个电话记录于运深在传给毛泽东机要秘书徐业夫的

同时，也传给了中央政治局和北京毛家湾的林彪办公室。

次日，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11日晚的电话意见，大多数与会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会后，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

当天，正在苏州的林彪秘书于运深，接到长沙毛泽东机要秘书高碧岑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向毛泽东汇报了11日晚于运深打来的电话记录，“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于运深将高碧岑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但此时林彪正在生叶群的气，说“一听女人的声音就头痛”，宣布一星期不见叶群。这时，林彪规定不见叶群的期限还没到，她只好让于运深自己去向林彪报告。林彪听了于运深的传达后，相当重视，让于运深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

这天，4月1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当天政治局讨论林彪电话意见的报告上作了文字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稍后，中共中央办公室印发出两份不同的修宪方案，一份列有“国家主席”一章，一份则没有“国家主席”这一章。

4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长沙与黎原、华国锋、卜占亚谈话。当天下午，离开长沙，于14日到达杭州。

4月24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

4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北上，张春桥随他一起到了苏州。正在苏州的林彪前往火车站迎接毛泽东。

因为要接张春桥返回上海，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开车从上海来到苏州，在苏州火车站候车室等候张春桥。他从候车室的窗户往月台望去，看见林彪和张春桥从专列上下来。专列开走后，他们二人站在月台上又谈了几句。

当天下午，叶群离开北京回苏州，行前特地向林办秘书们指示：

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

二、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

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诉我们不要去，只要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要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

第二天，4月26日，林彪、叶群乘飞机离开苏州回到了北京。

4月28日，林彪前往周恩来处，就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进行讨论。

4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再

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三国时期“劝进”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作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寓意深远的讽喻。

4月30日，李德生被中央正式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为了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斗争，中国将北京东交民巷的那套漂亮宽敞的前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给西哈努克，作为他在北京的官邸。

作为美国盟友的法国，不可能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斗争。但它毕竟是西哈努克所尊敬的国家，因而法国政府采取了两边讨好的做法。法国驻北京大使交给西哈努克亲王一封法国政府的信。信上说，如果亲王隐退到法国，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亲王谢绝了这番美意，但他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隐隐的侮辱。因为他在法国治病时，在街上曾听到了巴黎人带着轻蔑的目光，耻笑被废黜后在巴黎流亡的前越南皇帝保大。而在北京，他听到的是另一种议论。他说，一次他在北京街头散步，有人认出他后，说：“您为我们国家，为亚洲和世界立了大功。您帮助越南的抗战英雄。现在柬埔寨人民参加了这个斗争，而您是他们的领导人。”这番话使亲王感到自豪。北京肯定不如巴黎舒

适和华丽，但北京肯定比巴黎使亲王坦然和从容。因此，他对法国人说，谢谢法国提供的一切，不过，“中国政府刚为我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你们的建议。”

4月24日至25日，在中国广州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四方代表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以及越南北方代表范文同，所以通常称这次会议为“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各方代表邀请西哈努克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西哈努克在开幕式上十分感动地说：“尽管我们不能像1965年那样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你们还是邀请我主持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你们的这一邀请，雄辩地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对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尊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我国历史和国家生活面临着黑暗和痛苦的时刻，你们的这一邀请就更有意义。”

会议就印度支那形势和共同斗争交换了意见，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最后，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

会议闭幕后，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三国四方代表。他在讲话中说：“7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人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4月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

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其在印度支那的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作战，打击经“胡志明小道”来到这里屯兵的越南人民军主力，从而把侵略越南的战争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

5月1日，西哈努克被邀请参加中国五一节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站在毛泽东身边。



1970年5月，毛泽东（左）、周恩来（右）与西哈努克亲王（中）在天安门城楼



1970年5月1日晚毛主席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群众
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四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甘科夫斯基。毛泽东同甘科夫斯基谈话时说：

“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

“要有耐心。”

“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对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米希拉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毛泽东见到年仅 30 多岁的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他用西班牙语向加西亚致意，加西亚非常兴奋。

当晚 18 时 50 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林彪、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朗诺的情况，对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以及亲王在柬埔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都十分关心。他风趣地说：

“我宁可同您这样的爱国的亲王握手，而不愿同像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您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您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

西哈努克感到这是毛泽东对他所能表达的最高的敬意。

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及周边国家的情况。

毛泽东以一个大战略家所特有的胸怀继续说：“您必须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您。我们给您的任何东西，同您通过您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西哈努克向毛泽东表示感谢，还谈到了将来的偿还问题。

毛泽东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

西哈努克对毛泽东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的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援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却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负担你的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两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说：“你们的国情和我们基本上相像，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抓住农民问题。你现在走我们的老路了。我们先是城市，然后农村，然后再夺城市。早先我不是劝过你嘛，你何必当亲王就不能够做人民领袖啊？可以嘛。我就劝你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介绍给你两本书，也许你已经读了，一本叫《共产党宣言》，一本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敌人可以在一个早上把工会、农会全都扫光，结果还是上山靠得住。”“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我们的教员是蒋介石，你们的教员是朗诺。你们现在的革命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是二十二年再加上六年，实际上是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走这一步，社会主义是搞不了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点主要纲领，

一是反帝，一是反封建。这么一搞，你的旗帜就鲜明了，全世界人民都赞成你们嘛。”“我赞成这个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整美帝国主义，对法国可以暂时不触动。不反封建也是搞不成的。一个国王搞反封建，怪事了，但是你是民主国王，不是什么封建国王嘛。你不取得农民的同意，事情是搞不成的。”“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你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朗诺，这个口号提得好，就要这样提。”

毛泽东还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

5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中国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人员代表，看到聂荣臻。

聂荣臻因为在邯郸水土不服，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周恩来批准，于1970年2月11日到北京治病。这时，毛泽东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后对他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5月1日晚上，林彪从天安门回到毛家湾后，十分烦躁的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内勤不敢再去惊动他。

叶群来到林彪的房间，十分关切的问：“怎么样？今天很累吗？”

“唔，还好！”

叶群又说：“101，老虎那里的一帮人，是经过考验的，是过得硬的，将来用得着的地方多得很，你就早点见见吧！”

林彪思忖了一阵开口说：“你定一个日子嘛！”

“那就明天晚上吧！”叶群高兴地说：“算是过五一节，有个名目。”

林彪说：“把老虎叫来，再商量一下。”

叶群立即让内勤去叫林立果来，一起为5月2日的活动作安排。在确定名单时，林立果说：“有的人不在北京，就让老婆、孩子参加，算是代表。”

叶群说：“什么代表不代表，夫人、孩子都请来，这样才热闹、亲切。”

林彪为难地说：“老婆、孩子一大堆，我怎么讲话？”

叶群说：“101，你随便说几句就行了，反正有些话也不能明说。把他们请来了，一切意思就都有了。俗话说，吃了我家的饭，就是我家的人……”

叶群还想说下去，看到林彪瞪了她一眼，知道是嫌她噜苏，就把到口的话咽了下去。抑或她突然想起了林彪让内勤在她床头贴的“做事莫越权，说话莫罗嗦”的字条。

林立果说：“只要首长和大家见见面，其它的事有我！”

5月2日晚上，一辆空军大轿车驶进了毛家湾。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依次从车里钻出来。接着从车上下来

的，有男有女，成对成双，有的还带着小孩。林立果亲自站在门外迎接大家，并和大家一一握手。

叶群在屋里等候，与大家寒暄、问候。她对大家说：“这一阵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见见大家。今天请大家来一块过节，和大家见见面。”

叶群的“主旨演讲”后，林彪光着脑袋从里面出来了。叶群、林立果把客人们一一介绍给林彪。

林彪坐在前排沙发上，一边是周宇驰，一边是王飞，他们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林彪对周宇驰说：“听说你教会老虎开汽车？”

周宇驰马上回答道：“不是我教立果同志开汽车，是立果同志教会我开汽车。”

林彪笑了，又问：“是你领导老虎，还是老虎领导你？”

周宇驰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同志领导我们喽！”

林立果要学开车，是空军司令部汽车队队长王琢教的他，练习地点在西郊机场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林立果办了张驾照，姓名吕果。

林彪本来是不看电影的，特别是有关战争的影片。但此时，林彪却陪着大家看了一场“内部电影”，然后，林彪在一片“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欢呼声中首先退场了。随后，叶群给大家送纪念品：每家一个塑料图片，每人一枚毛主席像章。她又拿出一包糖，每人分

了一块，一边说：“这是‘五一’节晚上天安门城楼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桌子上的糖，特地拿了回来，想了想，还送给在座的同志们好，因为你们帮助我们办了很多事情。每人一块，不是给大家吃的，留作纪念，这是最大的幸福。”

5月3日晚20时至24时，周宇驰把林彪昨天接见的人又召集起来，开了一个“表忠会”，他在会上说：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也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很久，觉得到提出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

周宇驰所说的这个“战斗集体”，就是指经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的那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它的任务是给空军出点子，提建议。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1970年5月，经吴法宪批准，“调研小组”的人员进行了增加，有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

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玲、空军雷达兵部副处长许秀绪、空4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人。

此后，王飞、于新野、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眠先后向林彪写了“效忠信”。

第1129回：谈抗美，毛泽东会见黎笋

“谁怕谁”，拿起武器敢斗争

5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

这天，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政府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团结政府分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部分的总部设在北京。

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20多个国家给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承认，而苏联却没有给予承认。出乎西哈努克意料并博得他欣赏的，是古巴政府对他所表示的支持。柬埔寨政变后不久，柬埔寨驻哈瓦那大使求见古巴外交部长罗亚。这位外交部长像往常那样接待了他。但是他见面后首先就问这位柬埔寨驻哈瓦那大使：“你是不是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滚出我的办公室！”外长怒斥那位大使，“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24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但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替你们柬埔寨人民丢尽了脸。不！我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时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几天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来到北京，要求中

国进一步支持越南正在进行的战争。

5月11日，毛泽东会见黎笋。新华社摄影记者、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杜修贤接到拍摄这次会见的任务。

杜修贤是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客厅，他不禁好奇地环顾四周。

这里，没有脑海里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可以说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单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是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乍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中华香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是毛泽东的书房。自从1966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发现原来居住的丰泽园没有告诉他重新进行了修缮，十分生气。为表示抗议，他搬到了游泳池居住，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丰泽园。

毛泽东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

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杜修贤急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作……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他，正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两位记者怕惊动毛泽东看书，悄悄地走出去，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靠窗有一排椅子和沙发，杜修贤和同事们就在这里等候活动开始。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这时走过来看见杜修贤，对他说：“主席常夸你呢！”

“夸我？”杜修贤不相信地反问。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杜修贤笑笑，手快是他的一个特点，别人还在找角度时，他已经摁下快门了。在延安就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他，在共和国成长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间，那些传神画面早被亿万人民熟烂于心，呼之欲出。

晚 18 时 15 分，外宾来了，毛泽东马上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身，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大步向门口走去。此时的毛泽东，脸色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睿

智与慈祥。

毛泽东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这次是秘密会见。他们一见面就显得格外亲切，毛泽东一边同黎笋握手一边问：“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1964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黎答回答着，挽着毛泽东的手，一同走进客厅。

落座后，黎笋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毛泽东说到这里，略一思索，又接着说：“还是大国怕

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他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毛泽东说着开怀大笑起来，周恩来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

毛泽东继续风趣地说：“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他问周恩来：“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答：“朱其文。”

毛泽东说：“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9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

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么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 16 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16 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点了一下头，赞同地说：“正是这样，光是 1969 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 61 万人，其中美军就有 23 万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 17 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 9 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

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彪：“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毛泽东：“国民党的党部甚至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北伐。那时，在北方，在黄河一带地区，他国民党连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他是靠共产党帮他组织。”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 190 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侧过身来，对着黎笋，若有所思地说：“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文学家，叫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做‘黔驴技穷’，说明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时只有 70 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也可以谈，但主要还是打。”

毛泽东又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说：“……今天

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516’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然后说到：“……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

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1200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50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

毛泽东充满了自信。他说：“从当时的总体形势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出现。提出‘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国际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动员世界人民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新高潮。”

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十分坚定的表明了一个态度：坚决反对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联合声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同时还很深刻地提出了两个论断：

一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见性地感到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

再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

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会见一结束，周恩来马上将谈话记录整理打印成文，交给了外交部。

第1130回：游长城，林彪接见新总政

五二〇，毛泽东发表声明

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叶群写了一封信：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時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叶群看了这封信后，非常高兴，于是她邀请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于5月14日同游长城，在长城上照了一张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胳膊紧紧挽在一起，一字排开的合影。他们把这张合影称之为“新的长城”。



叶群从长城游回到毛家湾兴犹未尽，把几个秘书叫来，要他们代她起草几首诗，赠给黄、吴、李、邱。

叶群想写诗，但水平一般。于是，她找了一个专门教她，为她捉刀代笔，名为教师。这时，叶群对她的教师和秘书们说：“要把我和黄、吴、李、邱的深切关系写出来。”

叶群也调动她的全部灵感，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相将奋起卫红旗”。她十分得意地说：“这是警句。”并解释道：“我们有相也有将，相就是陈伯达，将就是黄、吴、李、邱，现在要相将一起奋起，保卫林副主席。”

5月16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外交部的建议，商定：

（一）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将双方联络员的会晤，定在6月20日；

（二）建议毛主席发表一简短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和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及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三）召开群众大会，拥护毛主席声明，庆祝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并请毛主席、林副主席出席，西哈努

克讲话。会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

次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所商定各事，并附外交部本日“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三七次会议的请示”件。毛泽东阅批：“照办。”

5月17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由乔冠华起草的毛泽东声明稿。会议认为，该声明内容应突出毛泽东5月11日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5月18、19两日，又对毛泽东的声明稿进行多次修改。19日，周恩来与康生、陈伯达将修改后的声明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

受毛泽东委托，19日晚21时30分，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与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第13次会谈，将毛泽东的声明法译本交西哈努克征求意见。

5月19日下午16时，总政治部值班室军委一号台电话响起，林彪办公室通知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副部长，包括《解放军报》的负责人，集中乘车，17时到达毛家湾。

原来，这是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商量，确定在他的住地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总政治部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

总政治部办公室急忙通知有关人员集合，当时有5位部长、副部长出差，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11位正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社负责人一共14人，按时从总政治部机关出发，赶

到毛家湾。只见在客厅门外，叶群，还有早已到达的黄永胜、吴法宪已经站在那里迎接。

大家第一次来到毛家湾，第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有几分神秘，几分荣幸。进入会客室，只见里面沿墙摆着一圈沙发，大家在叶群的招呼下坐定后，看见林彪从西面内室走出来，向大家致意，然后径直坐在中间沙发上。

事先安排的摄影人员开始照相。镜头转到林彪，林彪摸摸胡子说：“我还没有刮胡子呢。”

叶群迈着小碎步跑过去说：“我就喜欢你的胡子。”并且让摄影员多给他们两人照几张。林彪指着在座的众人说：“照片洗出来，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上。”

摄影完毕，林彪开口讲话说：“第一次见面，都不认识。只认识李德生同志、黄志勇同志。”要说他认识李德生，其实也只是在“九大”几次会议上见过，还没有单独谈过话。黄志勇原是四野的兵团参谋长，倒是熟人。

接着，林彪对其他 12 人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然后夸奖说：“你们这个年龄正是办事的时候，比较成熟了。”“你们是个新班子，是新气象，已经看到了新的做法，将来会有新的成就，部队里头会出现更新的面貌。”

他说：“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

叶群插话说：“林彪同志十几岁的时候，就爱读政治理论书籍。”

林彪再次肯定说：“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指着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知道，我在东北，首先也是搞政治。”

黄永胜说：“东北的胜利，也是靠政治。”

林彪话锋一转说：“你们不要走不合法路线，要走合法路线，要吸取过去总政、报社的经验教训。不抓根本，不走正道，总有一天要垮台。合乎政治原则，合乎组织原则，对革命有利，就不至于垮台。”

最后，林彪对李德生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

5月20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新闻联播节目广播毛泽东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指出：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

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声明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由于这篇声明是 5 月 20 日发表的，后来就简称为《520 声明》。

5 月 21 日上午，《人民日报》全文刊载《520 声明》。

当天上午，北京各界群众 5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毛泽东发表的《520 声明》。毛泽东率政治局常委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

上午 10 时，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和林彪等人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城楼上……顿时天安门广场成了群情激昂的浩大海洋，极目远去，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反美、反战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人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样的场面，几乎每个北京人都亲临过，而且为此不断地热血沸腾。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林彪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盛大集会。”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由林彪宣读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

林彪为了第二天能在天安门上宣读毛泽东的声明，头天晚上加服了安眠药，以致第二天上午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见他摇摇晃晃地向毛泽东走过去，扯着嗓子大声喊道：“主——席——呀，你——好——吗？”全场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

毛泽东问他：“我好。你怎么样啊？”

林彪又尖着嗓子回答：“我——老——出汗呀。”

毛泽东说：“人哪有不出汗的？”

会见西哈努克时，林彪靠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以致在天安门宣读毛泽东的声明时，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我要发表讲话！”林彪拖着长长的湖北腔，经过麦克风的传递，在整个广场上空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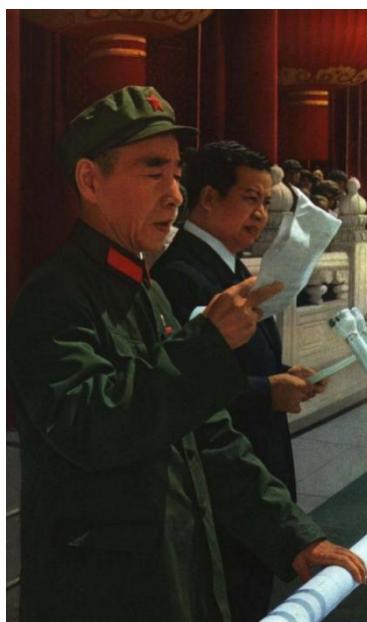
“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林彪离开了讲话稿，不知所言。但他稍稍镇定了一下，工作人

员为他移动了下麦克风，林彪开始照着稿子念开了：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毛泽东走了过来，站在他的旁边，看着他宣读自己的声明。

林彪这次吐词尚清楚，但还是把“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而且还念错了几个字。



1970年5月21日，林彪在大会上宣读毛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讲话稿。

毛泽东声明的标题《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人感到空前的强硬。让全世界都看见，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是用交涉、要求、抗议的字眼对待

美国，而是指名道姓地要“打败”它！

1965年2月10日，北京曾举行过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的集会。那次集会人数有150万人之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时，天安门城楼前有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所不同的那次是“美帝国主义滚出去”，而这次是“打败美帝国主义”。

从“滚出去”到“打败”，表达了毛泽东已预见到美国开始在印度支那走下坡路。蔑视强权，不畏强势，渴望挑战，这是毛泽东鲜明的性格特点。

宣读声明后，群众开始游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兴奋地看着沸腾的人群……

这次集会之后，印度支那国家把中国看成最可靠的大后方，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原来惧怕霸权大国的中小国家也受到鼓舞，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正迈着巨人般的步伐带着他们与美国斗争。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失态，是因为那天夜里服了三次

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会后，叶群安排“林办”秘书李春生和保密员李根清去钓鱼台“旁听”审查大会的新闻纪录片，康生、江青都建议对片子作技术处理后再在电台、电视台播放。这样，在以后的广播里就听不到林彪说错话了。

回到毛家湾，叶群又大骂几个有关的工作人员，批评内勤给林彪服安眠药“过量了”、“服晚了”，批评警卫参谋李文普“没有把好关”，“失职”。



1970年5月20日，在天安门城楼，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5.20声明》之后，对越南南方的英雄代表说：对付美国人，不正面作战，不谈判，用游击战！一个字“熬”！

第1131回：林家忙，温玉成被贬成都

轰江青，召集宪法修改会

1970年6月2日，林彪单独召见温玉成，向他宣布说：“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温玉成目瞪口呆。

林彪又说：“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这才猛然清醒，条件反射地答：“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温玉成是1967年11月调到总参任副总参谋长。1968年3月，在杨余傅事件中，他又开始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协助谢富治兼管“样板团”的工作。

“九大”时，温玉成作为主席团成员，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前排，进入了他人生辉煌的顶点。当时，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上，温玉成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成为在九大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唯一没有进入政治局的成员。

这次，温玉成终于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

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很

好的人问他：“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即使调走，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广州军区？”

黄永胜回答说：“是江青要赶他走！他过去在广州搞得那个样子，还怎么回去？！他到成都去，梁兴初对他总还了解嘛！”

梁兴初去成都军区前，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对温玉成当然熟悉。据说，温玉成是为“样板团”的军装等事，不知怎么得罪江青的。

6月4日，林彪要接见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及其家属，郑维山当时正在内蒙赶不回来，于是把郑维山的妻子孙景波和孩子接到毛家湾，同林彪、叶群一起照了像，叶群还陪同看了电影。

当天，林彪说：“想到五台山休息一段时间”，问“那里有没有招待所”。

郑维山在内蒙得知林彪接见他家属后，连夜给林彪写信，说这次接见是他全家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励”，“一定要以接见为动力做好工作”。

郑维山的妻子孙景波也单独给林彪、叶群写信表示效忠。

6月，郑维山派人到五台山专门勘察，并决定立即在五郎庙为林彪修建一所“行宫”。

郑维山向叶群专门汇报了建宫方案。叶群说：“如果保

证明明年能用，我们先谢谢你了。”

“行宫”基本建成后，“林办”要郑维山先去住一住，郑维山欣然答应去试住。

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庭院内常常停放着一排客人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别邀请来的。因为每场电影只能容纳一、二十人，加上主人有意让某些“观众”之间不“碰面”，所以只好分场放映。影片大部分是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含量”是不轻的。一遇有这样的事情，作为毛家湾“里里外外一把手”的郭连凯秘书，就几乎忙得不可开交了。

“老张，我实在忙不开，你得出来支援支援了。”一天晚上，郭连凯主动向秘书张云生求助说。

“支援什么？”张云生问。

“主任又要请客人来毛家湾看电影，”郭连凯说，“你没看我正在忙着打电话吗？”

“请人来看电影，已经好几次了，怎么还要请？”

“请过多次，但客人并不重复。”郭连凯解释说，“有几次是请老夫子和黄、吴、李、邱的；有几次是专请各家的夫人和子女的；有一次是专请老虎在空军党办的战友的；还

有一次是专请为找人出过力的；……我倒好，现在快成了毛家湾的俱乐部主任了！”郭连凯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想让我干什么呢？”张云生问。

“别的事也不用你帮忙；你就在晚上7点钟以前往西院的门口一站，见有客人前来，热情地把他们让到西院客厅去就行了。”

“那你干什么呢？”

“我的事多着呢！”郭连凯说，“你在西院接待的是黄、吴、李、邱的夫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我却要在东院迎接黄、吴、李、邱本人。主任说，老夫子今天还可能来呢。他们一到，首长先要见见，然后由主任陪着去西院看电影。这个戏的大头在东院，西院只管等着看电影就行了。”

这场戏由叶群导演，郭连凯出面张罗，毛家湾的不少工作人员参加助阵，终于顺利开场了。

电影散场后，张云生又接到郭连凯从西院打来的电话。

“老张，又得请你去支援一下。”

“又支援什么？”

“主任准备请客人都到三座门招待所去吃顿忆苦饭。一切都由我安排好了，只想请你提前去看看。等我们前去时，能有人在门口招呼一下就行了。”

“现在都快半夜了，还吃什么忆苦饭呢？”张云生问郭连凯。

“别问了，我以后有机会再说吧！”郭连凯有些不耐烦地催促说，“你快坐车到三座门去吧！”

张云生到了三座门招待所之后，见那里已经按郭连凯的布置准备停当。

不多会儿，一辆辆小轿车从门外开进来了。为首的是叶群和陈伯达，然后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再然后是黄夫人项辉方，吴夫人陈绥圻，李夫人董其采，邱夫人胡敏以及他们的子女，最后是随员和工作人员。郭连凯跑前跑后，把这些人一一安排入座。在左侧第一席上入座的是叶群、陈伯达和黄、吴、李、邱等几员大将；第二席上是各大将的夫人；以下各席是各大将的子女和工作人员。虽然不算盛大，但也坐了六、七桌。

只见在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一般比大拇指稍大一点的精制包米面窝窝头，看样子算是“粗粮细作”，但吃起来却香甜可口。除此之外，主食中还有大米绿豆粥，新做的油酥烧饼；副食以凉拼盘为主，每桌都摆了八大盘，品种新鲜多样，味道也能证明它是出自高厨之手。

在吃“忆苦饭”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致辞、讲话，只有叶群所在的那张桌子上一直谈笑风生，其他各席都哑然沉寂。第一席的“大人物”先动了筷子，别席上的人们也都不

客气了。席尽人散，每张桌子上的那盘“黄金塔”象征也大都不见了。

散席后，客人陆续离去。最后离开的是黄永胜在登上汽车前拉了拉郭连凯的手，然后说：“今天晚上用的钱，记在我账上！……”

毛家湾的客人其实就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左鹏、邱会作这些人。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而且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有一次，吴法宪正在毛家湾看电影，江青要找他听电话。吴法宪住地的秘书告诉江青，吴法宪不在家。江青问吴法宪干什么去了，秘书说不知道。其实这个秘书知道吴法宪正在毛家湾看电影，但由于吴法宪有过“保密”禁令，因此只能对江青讲假话。电话放下后，这个秘书急忙再挂电话告诉吴法宪，吴法宪又急忙从毛家湾坐汽车到三座门。从另一个地方给江青回了电话……

6月6日，中央再次接见内蒙古小学习班。周恩来讲话说：革委会领导单独学习，下面广大干部有意见，要求你们同各大班合并，接受广大基层干部的帮助。以后，自治区领导到唐山大班，各盟市领导回各盟市学习班。6月11日，内蒙古的北京小班宣布撤销，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来

到唐山大班。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

文化大革命是在学校最先展开，毛泽东对学校以考试为手段，以分数为标准教育方法深恶痛绝，在文革刚开始就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得到了学生们的普遍拥护。如今，文革的大动荡时期已基本结束，教育究竟怎样革命？大学还要不要办？早在1968年7月，北大、清华武斗正酣时，毛泽东就已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大学还要办，学生怎么招？怎样“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北大、清华的《报告》中介绍的“招生办法”，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分配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概括起来，新的招

生制度主要是两条：一是停止从应届高中生经统一考试直接升入大学的传统做法，改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知识青年中招生。二是废除升学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新的招生制度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的一次革命。

在大学停止招生整整 4 年后，北京大学于 6 月 4 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

6 月 14 日 8 时左右，北京针织总厂 8341 部队军代表孙毅接到中南海电话，说毛主席要见正在这里上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老师章含之。军代表立即通知了章含之，并对她说：“主席特意关照，要你向工厂请假。”

章含之急忙换下工作围单，骑上自行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当她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看见毛泽东正半靠在床上喝茶。

章含之赶紧打招呼：“主席，你好！”

毛泽东笑着拍拍床沿，边让她坐下边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章含之从 1964 年开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持续了半年。1966 年 6、7 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章含之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她，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

愁’。”

章含之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

接着，他问到章含之父亲章士钊的情况，并多次嘱咐章含之好好照顾她的父亲，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毛泽东站起身来，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

他们来到大会客室。毛泽东问章含之：“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

“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章含之说。

毛泽东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

章含之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

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

章含之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

毛泽东问：“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章含之答：“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喔！要弄清楚再解决。”他又问到：“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章含之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然后仔细地讲了她的意见。

毛泽东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让章含之向周恩来报告他和章含之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

一个月前，北京外国语学院在 8341 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周恩来考虑到章士钊无人照料，在请示毛泽东之后，建议章含之留在北京，安排去北京针织总厂劳动。所以此时，章含之向毛泽东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泽东嘱咐她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后再动身。并说给章含之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

毛泽东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

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中 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章含之先向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恩来汇报。

6月27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照执行。《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已具备招生条件，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

7月中旬，章含之一行7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五七干校，贯彻毛泽东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10月15日，国务院电告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北大、清华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9月1日，北京大学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在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8341部队的政委、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杨德中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并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江青、姚文元等人特地在中央开会时请假前来出席这次

活动，一直到中午 12 点开学典礼结束，他们才匆匆忙忙地坐车离开。

开学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工农兵大学生开始正式上课学习。

本年度北京大学共招生 2665 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 171 人，初中 2142 人，小学 79 人。

1970 年 6 月 18 日，周恩来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 7 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

6月27日，周恩来就举行成昆铁路、焦枝铁路通车典礼事批告以中共中央名义前往参加庆祝活动的吴法宪、纪登奎：“不要铺张浪费，要做增产节约的模范。”

7月，在湖南衡东县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出现了一张“炮打”江青的大字报。

大字报的作者，颇有来历，乃陈云夫人于若木也。她先写了一份交给党组织的揭发材料《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接着，她又于 7 月 3 日贴出一张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字报，说

的是 1962 年在上海的事情：

1962 年春天，于若木随陈云到上海，住进上海交际处的一所房子。刚一进门，就感到异常豪华，尤其是清一色的绿颜色，别具一格：地毯是绿的，沙发是绿的，窗帘是绿的，甚至桌子也是用绿绒布包了的，连厕所里马桶的盖子和坐圈也用绿丝绒包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是三米多高的落地窗，每扇窗都是两层窗帘，且系用高级质料做成，仅窗帘布就不下几十匹。

陈云同志说：“这房子过去我住过，怎么现在全变了？”

原来，这是专为江青整修的。在上海，像这样布置的江青住所还有三处……

奇怪的是，于若木的大字报贴出后，竟然没有人理会。

7 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又接见了在唐山学习班的几位内蒙古负责人。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 55 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 57 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恩来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

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恩来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周恩来还对与会者说起5月20日集会后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他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将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一进北大厅，毛泽东又对到处挂着的《毛主席语录》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毛泽东画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毛主席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保留了下来。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让与会人员都不由地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7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7月2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月26日，林彪与叶群前往北戴河避暑。

7月27日，政治局开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两报一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文稿时，就社论中要不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

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一事，陈伯达与张春桥发生争论。

文革前，文章中一般只提毛主席“缔造”或“领导”。1967年4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社论，称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1969年“两报一刊”国庆节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中，又改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这次讨论，陈伯达主张用1967年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张春桥主张用1969年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双方为此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说：“还是请主席决定吧。”结束了这场争论。

当时毛泽东住杭州，患白内障，视力模糊，看不了文件。周恩来将会议争论的情况写信过去，由汪东兴读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后，让汪东兴代他划圈后退回去。

汪东兴觉得此事重大，就把信带在身边，等有机会当面向周恩来说明。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外宾后，周恩来、黄永胜都问“那个报告主席圈阅了没有？”汪东兴说：

“你们去问毛主席。”

当时，毛泽东正在一旁点燃一支烟抽着，听到他们的对话，不高兴地对汪东兴说：“怎么搞的？”

汪东兴照实说道：“主席，这么大的事，我不敢圈。再说，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

毛泽东把长长的烟灰抖到烟灰缸里，表情平淡地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汪东兴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恩来、黄永胜的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圈阅，但还是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 1967 年的提法。

第1132回：声震瓦，修宪会争论激烈 被判刑，抓《知青之歌》作者

7月31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年1月的死亡问题。当天，国务院给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张霖之问题的《通知》：“国务院业务组于1970年7月31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1970年5月20日和7月31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1970年5月17日的报告，同时，并阅读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1966年12月24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通知》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8月4日，林彪在北戴河会见周恩来，并谈话。
8月13日下午，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继续在怀仁堂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宪法。会议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出席。这次会议争论异常激烈。用陈伯达的话说，当

时是“声震屋瓦”。

首先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主张设，争论不下。最后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

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

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吴法宪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

张春桥说：“有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吴法宪认为张春桥这句话是冲着他去的。

没想到张春桥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当即就说：“张春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份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

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吴法宪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吴法宪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

吴法宪又拍着桌子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时康生也着急的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吴法宪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连忙说：“对、对、对，写上、写上。”

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黄永胜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

双方争论时，陈伯达不在会场。

不过，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

案：（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伯达说吴法宪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吴法宪把情况报告林彪。

在陈伯达的家里，吴法宪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汇报了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下午讨论时争论的情况。

回到家里，吴法宪又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过了一会儿，叶群回电话说：“101 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于是，叶群又忙乎起来。当晚和第二天，14 日下午，她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 8 月 14 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

8 月 14 日，黄永胜也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以壮声势。

说来奇怪，在第二天，8 月 14 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张春桥与康生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缄口不语。宪法草案“一读”就通过了，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

8 月 17 日，林彪对秘书说：“把 1954 年宪法对资产阶

级是怎么提的，现在宪法稿又是怎么提的，翻一翻，看有什么区别”。

蓝蓝的天空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啊

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雄伟的大桥横跨长江

威武雄壮

巍巍的钟山

就虎踞着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我的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呀

就伴随着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反

啊……

未来的生活

多么艰难多漫长

生活的道路

就夺取了我的理想

随着太阳出

伴随着月儿归

沉重的修理地球

那是我那终身的职责

我的命运哪

啊……

心上的人哪

告别了你奔向远方

爱情的花朵

就永远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不能开放

.....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它的作者是南京的知青任毅。

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 66 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

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大卡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毛泽东的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其中一首，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

爱人已失去。

内心无比凄凉，

我活……为什么？

应该怎样活？

我不敢想，

也不愿想，

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一个晚上……当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已经完成了。

任毅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曲，任毅是在《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 $2/4$ 、 $3/4$ 、 $4/4$ 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是重新填过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是1964年一批南京五中毕业生志愿到新疆后创作的。

《我的家乡》这首歌一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就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

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

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

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但是，对任毅来说，他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不幸降临……

1969年8月，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 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收音机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16时，他们躲在郑剑锋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都惊呆了。

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

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要知道当时中苏两国就要打起来了。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来抓他的人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拿枪的军人押送下，走出了房门。

1970年8月3日，任毅在全省公判大会上被判处10年刑期。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

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问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深浅”，可以批判是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就是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了。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

在审讯任毅的 5 个月期间，将他提出去批斗是家常便饭，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 80 元钱和 50 斤粮票。知青们的同情使任毅感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8 月 4 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负责人之一的女学生董临平在审查“516”，追查“围困中南海事件”中自杀身亡。

8 月 29 日，宁夏银川市革委会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 13 名 66、67 届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于 1969 年 11 月在银川成立的自修组织。他们中年纪最大的 26 岁，最小的 21 岁。其中有 3 名是知识青年。实际组织者吴述樟，文革开始时是银川二中学生，后来是“宁三司”银川二中分部的成员。他们 1968 年底以后或分配工作或插队落户，分散在六个地区，但保持通信关系，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吴述樟分配在西吉县玉桥公社。1969 年国庆前夕，

他们创办了一个称为名叫《学刊》的油印小报，刊登每人写的理论文章、读书笔记和调查报告。11月13日，吴述樟和他的哥哥、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森及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鲁志立，还有原“宁三司”银川二中分部的成员陈通明、张维智聚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小组”性质的组织，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中写道：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守则》还说，“自修大学”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

《学刊》自筹经费印过两期，刊登了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有对林彪《再版前言》的批判。而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文中，吴述森说：

“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强调说，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制造新阶级，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变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鲁志立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则写道：“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暴力手段。”“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1970年春节后，这个组织及其活动被揭发。3月12日吴述樟在西吉被捕，很快鲁志立在北京被抓获，吴述森、陈通明、张维智等分别在宁夏各地被押解归案。另一些则在本地监押。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定为“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他们的罪证，就是他们在两期《学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们的来往书信。

这13名青年中，女青年熊曼宜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

第1133回：轰隆隆，“行宫”上面建机场

开全会，众仙纷纷登庐山

8月下旬，中共中央准备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为了做好全会的安全保卫和接待服务工作，作为东道主的江西省革委会专门成立了接待委员会，由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杨栋梁、常委文道宏、陈昌奉，还有马志勇组成。

根据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时，一般提前两个小时戒严，并在45分钟前派出一辆检查车，巡逻检查哨位，实行单线行车。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上下山时分段戒严，实行半单线行车。毛泽东上山时，从九江火车站到威家一线全长20多公里，定350个哨位，安排406名战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个哨位，安排200名战士。此外，为加强上山车辆和人员的控制，上山汽车一律由交通组发放统一通行证。山下人员确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宾馆由九江地区保卫部开具证明，方可到车站购票上山。由南昌运往大会的物资，指定运到威家，然后由物资组派生活专用车到威家转运上山。凡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员，统统举家迁往山下安置，牯岭东谷机关单位和居民全部搬迁到西谷，定点、定时、定人设立哨卡，确保大会绝对安全。

对程世清亲自设计并监工、几乎一只野兔也溜不过去的这张安全网，汪东兴却看出了一个天大的漏洞。

早在 7 月 2 日，汪东兴就召集中央警卫局开会，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和服务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安排：

首先，由负责玉泉山警卫的警卫处副处长李钊带队，提前上庐山为会议打前站。警卫值班室、警卫团、交通科等部门，都要派人去做会议准备工作。打前站的人到庐山牯岭，先要看房子是否能住；将大会会场、小组会场看好和布置好；还要到庐山下的九江市，把落脚点准备、布置好。

第二是交通工具的准备。汪东兴估计会议上大概需要汽车 50 辆左右，大部分都从北京运过去，如果还不够用，再临时从湖南和湖北的武汉借用一部分。

负责通信联络的部门，要把会议区域内的电话安装好，从庐山上到九江市的电话线路如何装设，要进行勘察。电话和线路装设完毕，要认真检查，一定要确保联络的通畅。

对会议期间的服务招待、伙食等问题，汪东兴也作了安排。为了方便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可以设些小卖部，还要加设几个食堂。厨师不够，可以从有关部门调一些去。

他要打前站的人先到江西省军区了解一下，能派多少部队上庐山会议区域执勤。除了随卫之外，警卫团还要去人参加警卫值勤。在会议前，还须对会议区域一带的可疑人员进行清理。

汪东兴提出值班室警卫一科要派两个人，先到九江的飞机场了解一下情况，确认机场究竟能降落什么型号的飞机？

是否需要换乘飞机？在哪里换乘？他还吩咐医疗保健门诊部，也要先去几个人，做相应的准备。

最后，汪东兴强调，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注意保密。

庐山会议前，汪东兴提前到庐山看毛泽东要住的房子。谁知到了庐山一看，他吓了一跳。原来在毛泽东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

“这是在搞什么？”汪东兴赶紧问身边的程世清。

“在修飞机场。”程世清说。

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

汪东兴问：“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汪东兴问：“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

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

汪东兴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

程世清问：“那怎么办？”

汪东兴没有说话。

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谁下的命令呀？”

汪东兴说：“不知道。”

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汪东兴打电话问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也不知道。”

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恩来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

黄永胜说：“报告了林副主席。”

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点了一下头，没再说什么。

程世清没有料到，这个直升机场本是由中央首长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两位一起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后定下的。然后派两架伊尔-14 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亲自带领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驻在山上。

8月18日，周恩来和吴法宪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决定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安-24小飞机转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

空34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255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

为了保证安全，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骚扰。

吴法宪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立即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嘱咐：“等主席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8月19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吴法宪早上7时多赶到北京西郊机场。7时40分，江青到了。但此时周恩来让吴法宪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了后问吴法宪：“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

吴法宪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含糊其词推托而过。

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吴法宪打电话去催一催。吴法宪只好打电话问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吴法宪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

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吴法宪、江青上了飞机，一位乘务员满面笑容地引导他们进了前舱。前舱有沙发、扶手椅、办公桌和床铺。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寒暄了十几分钟以后，吴法宪说：“今天江青同志起床早，现在休息休

息吧，您有什么事再叫我们，我们过去了。”

飞机到了安庆，天气转好。江青、吴法宪等人下了飞机，没有进候机室休息，上了一架苏制安-24小型客机，不一会儿就起飞了，过了长江，很快就到了九江机场。原26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杨栋梁在九江机场迎接。他告诉吴法宪：

“毛主席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

九江的天气一丝风都没有，闷热难耐，使人喘不过气来。停机坪周围来了不少人，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司机等。

吴法宪对江青他们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还要等几架飞机的降落。”

江青说：“那好吧，我们先走了。”

吴法宪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自己留在九江机场，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他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江青的坐车是苏制吉姆轿车，前后还有开道车、随车、机动车各一部。车队在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林间的大路上拐了数个弯，旋了数个之字形的路段，就感到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了。再穿过一个拱门式的大隧道，就到了庐山牯岭街上。

江青住在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以前

来庐山时就住在这里，这一次让给江青一个人居住了，因为毛泽东住到了脂红路 175 号。

脂红路 175 号别墅从前属于美国亚细亚银行，建造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幢用高墙围起的别墅，便于保卫，所以汪东兴选择这里作为毛泽东的住处。

江青上山以后，精神很愉快，一身轻松。刚安顿好，她就笑着对杨银禄说：“请你把老邬请来，我问他一件事。”

老邬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他来了以后忙问杨银禄：“江青同志找我有什么事？”

杨银禄说：“今天你不用紧张，她精神好，挺高兴的。”

江青见到邬吉成就问：“主席上山了没有？”

邬吉成回答：“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

江青说：“那你现在就乘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主席的安全问题。”

邬吉成刚走，江青又对杨银禄说：“老邬刚上山，现在又叫他下山了，他太辛苦了。”

像这样的客气话，杨银禄还从来没有听江青她说过。

中午，杨栋梁带吴法宪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火车站接毛泽东。

8月18日下午14时，毛泽东离开居住了3个月的杭州，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19日下午约13时，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九江火车站，见

到汪东兴从车上下来，吴法宪迎上去，告知：“总理有两份文件要转交主席。”

汪东兴说：“主席正在休息。”

吴法宪便把这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他又回到九江机场继续接人。

吴法宪刚回到机场，就遇见江青派来的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找他，说是江青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100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

吴法宪赶紧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转告给他。

杨栋梁听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啊！”

吴法宪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呐。”

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下午，毛泽东在九江市下了火车，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同，换乘汽车登上庐山，在庐林湖游泳 25 分钟，尔后在“芦林 1 号”休息。晚上住在脂红路 175 号。



芦林湖的雨中风景

“芦林一号”别墅是专为毛泽东在庐山工作和休息修建的，离枯岭街 25 公里，坐落在庐山牯岭南面吼虎岭下芦林湖畔，九奇峰下，三面环山，背倚芦林湖，依山临水，风景秀丽，幽绮胜绝，人称芦林别墅。因为房号是一号，故亦称“芦林一号”别墅。这一带原来是一块山间小盆地。1955 年，庐山人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在芦林玉屏峰和星洲峰之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坝桥，蓄水成湖，以桥为路，于是，在这里形成长桥卧波、影落平湖之佳景胜境。

1949 年后，毛泽东曾三次登上庐山。第一次是 1959 年，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住在 180 号房，就是美庐别墅，住了 51 天。其间曾到杭州接见外宾，去了一个星期。1959 年 8 月，毛泽东离开庐山时，曾对前来送行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说，“过两年

我还要来的。”

他走之后，庐山管理局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上庐山却居住在国民党首领的官邸，似有不妥，遂有建造毛泽东别墅的设计，经请示上级同意，由武汉中南设计院设计，1960年动工兴建，1961年暑期前竣工，取名“芦林一号”。

“芦林一号”竣工不久，1961年7月17日，毛泽东又一次跃上葱茏，再次登上庐山。晚上22时左右，毛泽东一行抵达牯岭。夜幕中，车队停到180号别墅门前，毛泽东又一次下榻在“美庐”。

可能是因为“芦林一号”刚刚竣工，屋内比较潮湿或者其他的原因，毛泽东这次在庐山，只在这里住了一夜，一般都是晚上住在美庐，白天基本上在“芦林一号”办公、活动。当他第一次步入“芦林一号”时，看到建筑如此豪华，笑着对身边陪同的江西省委和庐山党委的领导说：“怎么搞得咯样考究哟！”

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也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1961年9月6日傍晚，毛泽东外出散步，登上了牯岭西北面的仙人洞。这个悬崖石壁上的天然石洞，洞口有700多年前的石刻，洞旁还有傲然挺立的青松。夕阳西下，仙人洞周围被朦胧、迷离的暮色所笼罩。

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曾挥笔写下了气势恢宏的诗篇《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次他从仙人洞回来后，又挥笔写下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即江青，所摄照片，没有正面拍摄仙人洞，而是以仙人洞北“仙路”边苍劲的松枝为近景，摄取了仙人洞左前方的御碑亭影、空中飞动的白云、山麓依稀可见的山川等景象，画面别具一格。

1970年8月19日，是毛泽东第三次登上庐山。

当晚21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

吴法宪便乘车山上。车到半山腰，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吴法宪的车对撞，差一点被掀到沟里去，车门碰坏了。情况很险，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吴法宪勉强上了山。

吴法宪是第一次上庐山。他到了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他们比较靠近。在他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4 位老帅。当天，除了叶剑英外，其他 3 位老帅都已经到了。当晚，吴法宪抽空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吴法宪一直送到了门口。

第二天，吴法宪约东道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吴法宪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在下山的路上，程世清对吴法宪说，昨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说：“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

哪里摆？”

原来，19日中午吴法宪回机场后，程世清继续在火车站和汪东兴边聊天边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庐山。就在聊天时，汪东兴向程世清说了这些话。

吴法宪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他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他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车到九江后，吴法宪和程世清就分开了。吴法宪在机场先接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16时，周恩来、邓颖超也到了。

第1134回：带“老虎”，空军的“两个一切”

接通知，上海代表团启程

8月20日，林彪与叶群抵达九江机场，前往庐山。他们见到前去迎接他们的吴法宪等人时，叶群告诉吴法宪等人：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到了庐山，周恩来前去林彪驻地与之交谈。

下午，陈伯达拜访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作为“军委秘书”，也和林彪一起上了山，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并带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

此时的林立果，羽翼似乎正在丰满。那是1970年6月下旬的一天，空军政委王辉球接到吴法宪夫人、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陈媛圻的电话。她在电话中以神秘的语调告诉王政委：“吴司令请他来一趟，谈谈工作，一个人来，不要带别人，并派车去接。”

一辆伏尔加轿车把空军政委接到吴法宪在西山的别墅。

吴法宪和政委问候、寒暄几句，便进入要谈的“工作”。吴法宪以赞美的口吻道出了开场白：“今天请你来，主要谈谈立果的事。林立果不简单呀！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搞出来，是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他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了，将来的空军领导就要靠他接班了。林立果是

代表林副主席的。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

然后又说：“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我这个空军司令只是挂名的，实际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天天在关心空军的建设……”

7月6日，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周宇驰讲了吴法宪在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下达时，对王飞和周宇驰说的：林立果在空军“今后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这次会议吴法宪没有出席，他的夫人陈媛圻在会上率先说：“应该向立果同志学习。立果同志在林副主席、叶主任身边，领会林副主席指示深。主要还是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

周宇驰先是大力称赞吴法宪慧眼识英才，又说：“吴司令、陈主任对立果同志的感情很深。”

会后列席的鲁珉问周宇驰，林立果在空军“今后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是怎么回事？周宇驰说：“管他呢，就这样说。”

7月9日和16日，王飞又先后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讲了吴法宪的“指挥一切，调动一切”，随后，在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王飞说：“吴司令员的指示反映了空军广

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这“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就这样，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越刮越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制定了贯彻落实“两个一切”的措施。

空军政治部党委在贯彻“两个一切”的五条措施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等，都要及时主动地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时时想到他们”，“事事请示他们”，“处处保卫他们”，“恭恭敬敬地向他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林立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

7月23日，林彪亲临国防科工委所属某工厂进行视察。

视察前一个多月，林立果、周宇驰就同国防科工委负责人进行了安排。视察那天，组织了成千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激动的欢迎人群，欢呼雀跃，口号声响彻云霄。

当林彪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从夹道的欢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位于林彪右边的是总参谋长黄永胜，走在林彪左边的就是林立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尾随其后。



7月中旬，周宇驰、刘沛丰替林立果起草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初步定稿。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在当时很盛行。7月下旬，叶群交代林彪办公室党支部召开一个支部大会，让林立果进行“预演”。叶群对秘书们说：“林立果在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有一些体会，空军要他讲用，没把握，先在这里讲讲，请叔叔们提提意见，把把关。”

林立果对母亲的安排并不满意，他斜歪着脑袋，拿着稿子念，念了不到一个小时，连叶群也不耐烦了，宣布休会。然后把林立果和两个秘书叫到电话室，对林立果说：

“你讲的什么玩意？干巴巴的，都快叫人睡觉了。”

她又对两位秘书说：“你们是秀才，有什么意见，帮他出出点子。”

秘书只好应付着提了些意见。

休息后，林立果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进。叶群不满意，但

她觉得时机比内容更重要，于是决定立即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抛出去。她告诉吴法宪，“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吴法宪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政委王辉球。

7月31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当时，吴法宪和陈绥圻正在西山。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让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就让他帮助拟几条口号。

这次，林立果没有像在“林办”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声情并茂，举例发挥，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俩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特别提到：“吴司令一向很欣赏立果同志的天才。吴司令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紧接着，吴法宪的老婆陈绥圻带头振臂高呼：“向立果

同志学习！向立果同志致敬！”一连喊了十几句。接着，她深情地大声地说道：“立果同志的充满辩证法的讲话，给我们空军指明了方向，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它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领会！”

吴法宪调来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听了一遍。觉得林立果这个报告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事后，吴法宪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到处宣传他说过的“两个一切”？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吴法宪要王飞把录音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要再扩散。

过了两天，林立果回到家里，问林彪：“你听了我在空军干部会讲用报告的录音了吗？”

“听了。”林彪说：“不仅仅思想语言像我的，连声音也像我的。”

几天后，周宇驰见吴法宪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没有态度，就和林立果一起写了一篇稿子，让叶群按照他们拟好的稿给吴法宪打电话，用叶群去压吴法宪。在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时，他俩在旁边听，看叶群是否照办。

叶群果然按他们的意思给吴法宪打电话说：“吴司令啊，老虎的讲用报告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

吴法宪一听，马上说：“很——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在林彪和您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叶群听了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1970年8月1日，空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简称“三代会”在北京开幕。这个会原计划5月1日召开，先后推迟了3次。会议代表人数原定2000人，也增加到4054人，破空军历次会议记录。会期原定15天，实际开了50多天，成为空军大型会议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时，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一再要求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开始有些犹豫，后来在代表们的再三要求下，也就同意了。8月4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

在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吴法宪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陈绥圻也向吴法宪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

8月6日和8月13日，空军“三代会”两次听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在代表们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印发

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馈给了吴法宪。

吴法宪不同意印发，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吴法宪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他的看法。

叶群完全同意吴法宪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在王飞等人的安排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4个“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

吴法宪也在空军“三代会”上说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他说：“立果同志是我们空军的骄傲，他是一颗政治明星。谁说世界上没有天才、帅才？立果就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的红太阳，第三代接班人……”

周宇驰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

是“第三代接班人”。

王辉球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

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作为空军“三代会”会议秘书长，要求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民航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做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

此时的林立果也开始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甚至说“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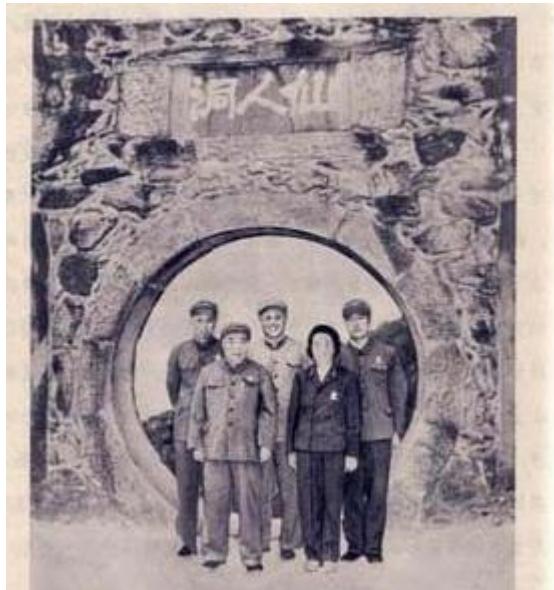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8月20日傍晚，吴法宪上了庐山。他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和林立果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他。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他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时近黄昏，几

辆小轿车盘旋在云雾缥缈的盘山公路上。

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有水。来到“仙人洞”三个字的圆门前，叶群停下来，招呼大家：“就在这里照相吧！”他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吴法宪他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

叶群说的“他们几个”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

黄永胜没有上山。周恩来18日决定，会议前一阶段黄永胜在北京值班，会议后一阶段再派人来替换他。

8月20日，中央办公厅给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和徐景

贤两个人打来保密电话，告诉他们：通知在沪的中央委员第二天集中登机到庐山开会。特别提到：“一定要保守机密：领导的去向对自己的机要秘书都不能讲，会议期间上海如有急事或急件需要处理，可以通过北京中央办公厅收转，对其他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只能通知在上海的集中地点和时间，同时通知随带外衣和薄的毛线背心，集中以后再告知开会地点。”这样严格的保密，在当时是为了战备的需要。

这天，中央向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们都发出了同样的通知。

8月2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通知在上海的九届中委王秀珍、杨富珍，候补中委马天水，金祖敏、陈敢峰和王维国，到上海空军招待所集中。一直到登机前，上海的这些中委和候补中委仍不知道是去庐山开二中全会。当得知是去庐山时，上棉一厂的杨富珍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到北戴河或者青岛去开会呢！”

而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济大学学生陈敢峰跳了起来：“哎呀，我什么衣服都没有带，怎么办？”因为当时上海正值摄氏38度的高温，他只穿了汗衫，短裤前来报到。没办法，只得临时借了几件衣服。

他们乘北京来的专机飞抵南京，江苏以及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许世友、杜平、彭冲、吴大胜、张才千、王六生、尤太忠等人在这里登机，和上海的中委们一起飞到

在合肥降落，再转乘“安—24”型的小飞机，最后降落在九江机场。前来迎接的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所有参加全会的人，都是由空军派专机接来的。

第1135回：会前忙，为二中全会准备

牯岭上，庐山会正式开幕

各地的中委们分乘小轿车上山。山下正是盛夏酷暑，气候闷热异常。但是上得山来，汽车在茂树密林间的公路上拐了几个弯，在“之”字形的路段上盘了几个旋，马上使人感到通体凉爽。山上的夏季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7、8度，早晚还得穿毛线背心呢。

车到牯岭，这个设在庐山上的城镇已被修葺一新，汽车再穿过一个圆洞形拱门式的大隧道，就进入了全会委员们居住的禁区。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住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走，负责整理房间，做清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面的树林里，警卫战士们日夜站岗放哨。

上了山的中央委员们，情绪都很高涨。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都比较乱，中央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都只能在北京开，现在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开会，说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同时也说明他的健康情况是良好的。以77岁的高龄而能重登庐山，这是当时的中委们都为之欢欣鼓舞的事。大家都利用会前的闲暇，饱览了雄奇秀丽的匡庐风光。张春

桥，姚文元和上海的中委们在瀑布前合影，姚文元还陪同江青游了仙人洞。

会前，上海几个年轻的中委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他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他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啊，只有三五天！”上海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邓颖超也说，好不容易来江西一次，她已邀了几位老大姐，在全会结束以后到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去。

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在住所的阳台上安排这些年轻的中委们和周恩来比赛了几场乒乓球。

大家说：“总理是今日得宽余呀！”

周恩来微笑道：“我还踢足球呢。”

大家都很诧异，钱秘书说：“就在走廊里踢，每次两三分钟，活动活动身子。”

大家哄堂大笑。

8月21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一) 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

(二) 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

(三) 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

(四) 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关于备战工作的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

(五) 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大会外，拟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这天，周恩来还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当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

放下电话，汪东兴跟与他同住一屋的江西省军区副政委、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主席呢？”

8月22日一大早，文道宏将汪东兴的话告诉了程世清。

这天上午，陈伯达去看吴法宪，没有见到。此时，吴法

宪正在庐山新修的直升机场看望驻守在那里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

下午 14 时，在庐山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5 位常委出席，汪东兴作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

会上，毛泽东又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他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泽东讲形势问题。

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关于会议日程，毛泽东说：“23日到29日，差不多了吧？在这个月结束。”

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毛泽东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做国家主席、元首，就是有点好像不太好不见。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负责。”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也附和同意。

“是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说。

周恩来接着谈计划问题：“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泽东同意：“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恩来继续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

毛泽东插话：“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恩来说：“人民生活确实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又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泽东摇摇头，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仍是少言寡语，只说了一句：“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随声附和：“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议题又从经济转入政治。

周恩来提出：“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泽东点点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恩来做了一些分析：“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泽东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啊？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1968年毛泽东曾就整党问题借用了“吐故纳新”这个词，被劝退或开除出党的人就是“吐故”。

周恩回答：“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

“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搁置起来。

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恩来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陈伯达有些忘乎所以，禁不住又提到毛泽东反感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他说：“主席做主席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搞得很好，后来叛徒刘少奇做主席，这个国家弄得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生气了，说：“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

见无人说话，毛泽东宣布：“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这天，周恩来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宪法的修改作了说明。

下午，吴法宪回到住处，听说陈伯达上午来找过他，便赶紧去看陈伯达。陈伯达告诉他：“政治局常委已经开会了，研究了会议日程。今晚可能开政治局扩大会，总理会传达。”

接着，吴法宪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

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

吴法宪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

放心。”

8月22日这天，空5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励耘在庐山接到一个电话，他拿起话筒，只听里面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

陈励耘楞了一下，心想：“这不是林立果嘛。”

电话里，林立果接着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

陈励耘说：“没有。”

林立果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陈励耘想起自己在上庐山之前，被江腾蛟请到北京写文章的空5军宣传处长徐曙正好回杭州，给陈励耘带了江腾蛟的口信：“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这天，林立果也给王维国打了电话，问了他和陈励耘的住房门牌，并告诉王维国，有什么事情听吴法宪招呼。

当晚20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恩来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当晚，陈伯达再次造访林彪。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

陈伯达认为，“在罗瑞卿，杨、余、傅，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意见都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

林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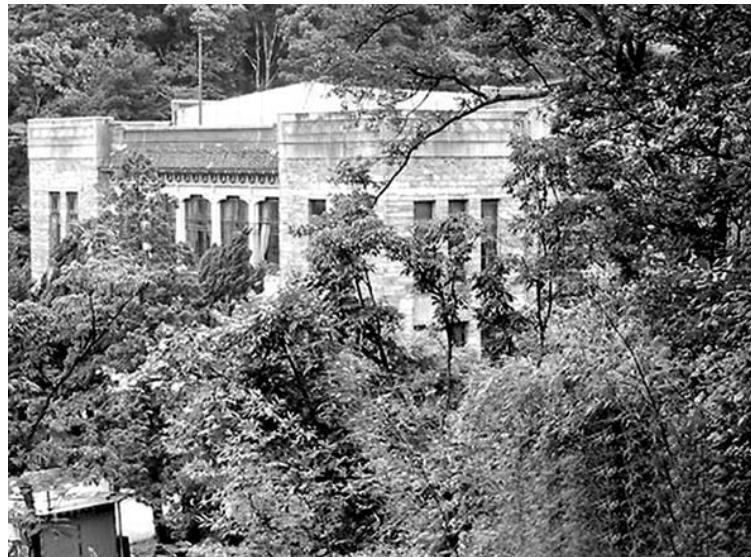
8月23日早晨，经过一夜的调整，叶群破例起了个早，向秘书交代说：“下午全会要开会，首长可能要讲话，赶紧把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改一改。”

秘书把讲话稿誊清后，叶群、林立果立即拿着稿子进到林彪的房间。

上午，林彪会见来访的陈伯达，讨论会议问题。

牯岭镇的半山腰有一座大礼堂，可以坐五、六百人，1959年曾在这里举行过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出了彭德怀的问题。现在，这座灰色的庞大建筑物，又成了九届二中全会的

会场。



中共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院



九届二中全会会址

下午 15 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林彪去开会，上车时，若有所思的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

叶群肯定的说：“要讲！”

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中，毛泽东环顾常委一圈后，慢条斯理的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

讲啊？”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侧过身，不动声色的说：“我要讲点意见，主席看可以不可以？”

周恩来、康生都谦让的说：“那好，请林副主席先讲。”

毛泽东看了看林彪，又看了看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3人讲吧！”

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林彪把8月14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

毛泽东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他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彪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

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庐山大礼堂就坐完毕。这次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15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坐在前排。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坐在后排。

过了好长时间，常委们才进入会场。在台下等候了一段时间的众委员们，看见林彪一边和毛泽东说着话，一边往主席台走，与会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上主席台。毛泽东坐在正中间。左边是林彪、陈伯达，右边周恩来、康生。

毛泽东宣布开会后问：“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

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他说：“第一项议程是修改宪法的问题，昨天晚上就向全会到会的同志发了五个文件：1954年的宪法；关于宪法修改的请示；关于7月20日的通知；反映各地讨论修改宪法的意见的综合简报；修改稿三十八条八月十五日稿。今天上午在阅读。第二项议程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提纲，着重在1970年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报告，这个将在今天晚上和24号晚上政治局讨论，然后提交全会通过。第三项议程是战备工作。还有一点其他的，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中的特邀名单、华侨和爱国人士名单，是不是也要在全会上报告和通过一下。另外一项，昨天毛主席指示说要谈一谈形势。”

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会议分组情况和会期。

这次全会共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组。

东北组组长陈锡联，副组长潘复生、王淮湘；

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吴德、解学恭、郑维山、陈永贵；

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副组长王洪文、杨得志、李德生、南萍、程世清、韩先楚；

中南组组长曾思玉，副组长刘建勋、华国锋、刘兴元、

韦国清；

西南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谭甫仁、蓝亦农、曾雍雅；

西北组组长冼恒汉，副组长李瑞山、龙书金、张江霖、康健民。

第1136回：先讲话，林彪发言受欢迎

听录音，众人要求印材料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

“现在还请哪一位讲啊？”

林彪说：“我讲几句。”

接着，他摘下军帽，漏出童山濯濯的额头，只有两旁长着少许稀疏的头发。 he 说道：“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

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完话，会场上掌声雷动，场面非常热烈。林彪走下讲台时，已经是 16 时 30 分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恩来说道，“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说：“刚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法，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

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泽东手一扬：“散会！”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许多人还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很高，也很兴奋。张春桥主动过来问吴法宪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你记录得比我好。”

到会的大多数人都将林彪的这次讲话看作是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开幕词。

在回住所的路上，浙江省革委会主任、20军政委南萍若有所思的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

与他同行的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5军政委陈励耘含糊的应道：“是有所指的。”

陈励耘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所以那天接到林立果的电话后，没有敢电话告诉南萍。

散会回去的路上，叶群对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讲，林彪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并说林彪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

回去后，叶群兴奋地对秘书说：“首长在会议上讲话了，讲得很好，他讲话没有完全按照你们起草的提纲讲，专门讲了下天才问题，没有点名，讲得很策略。”“首长在开会前和主席谈话，我就在走廊散步，防止十一楼（江青）闯进去。”

傍晚，陈伯达去林彪处。他问林彪：

“你今天的讲话，事先同毛主席谈过？”

“你听谁说的？”

“是叶群同志讲的。”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晚饭后，吴法宪他们去见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叶群将会前常委们在小会议室时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说：

“101说：‘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文件。吴法宪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他提出“要很好学习”。

陈锡联首先站起来响应。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表示同意。汪东兴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他说：“各组反映没有听清林彪同志的讲话。”

周恩来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

向毛主席报告。”“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会上，康生批评说，上海同军队的关系不好。

张春桥说：“这方面我们负主要责任，我准备作检讨。”

说着，张春桥掏出烟，顺手递给身边的邱会作一根。

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大家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问：“政治局的意见怎样？”然后表示：“大家同意我就同意。”

于是决定 24 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

散会后，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来到吴法宪住处。陈伯达向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讲了张春桥的问题，讲了“安亭事件”。因为林彪讲话中有坚持“天才”的观点，为了有理论依据，吴法宪他们对陈伯达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

陈伯达答应去找。但他上山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没带几本书。当夜回到住处在随身带的几本书中找来找去，不够，赶紧让秘书缪俊胜连夜从庐山图书馆的藏书中找马列著作。山上的书也不全，又打电话请留守北京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与中央政研室的人联系，帮助找一下有关

天才的语录。随后王保春、王文耀他们将政研室工作人员找到的“语录”通过中办收发室送上庐山。当晚，随陈伯达上山的史敬棠等人也帮助找到几条。

因为太匆忙，没有查到马克思论天才的语录。陈伯达根据查到的资料，连夜编成七条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也只能这样了。他找到一条就用电话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外抄好。

吴法宪自己也找了八条林彪关于称天才的语录，连夜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出来，送林彪审定后，给了陈伯达一份。

当晚，叶群从庐山给在北京留守“林办”秘书打电话说：“首长在会上即席讲了话，根本没用你们写的稿子。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坚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讲天才是有针对性的，讲话后反映很强烈。他讲了，我也准备讲，在明天的小组会上，我也准备开上一炮。我不想讲别的，就是讲讲毛主席的领袖地位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好的领袖行吗？那肯定不行！苏联没有一个好领袖，结果变修了。印度的客观条件很好，但印度共产党没有一个好领袖，至今革命也没成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也不会有今天！所以毛主席是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是现代最伟大的天才！谁反对这一条，谁就要倒霉……”

叶群在电话上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这让秘书很纳闷：

“她对我讲这些干什么呢？”再听她讲下去，终于明白了她的用意：“赶快叫姜思毅帮助我写个发言稿子，我明天就准备用。文字不要长，但要有分量。今天晚上，让老姜连夜突击；明天早晨让郭连凯托中办送信的飞机给我带到庐山来。……我说的这些，你作记录了吗？”

“我没记。”秘书如实回答。

叶群与林彪不同，林彪交代什么，秘书当面记录，他从不阻拦。而叶群严格规定，她不管说什么，都不准秘书留下“文字根据”。而这次，她“连珠炮”的话，秘书想记也跟不上。

“我是想叫你把我讲的意思传给老姜的。”叶群说，“既然没记，我讲多了也没用。姜思毅在吗？我直接和他讲讲算了。”

姜思毅，原谭政任总政主任时的宣传部长，是全军有名的年轻有为的“笔杆子”。后来谭政下台，姜思毅也受到牵连，在总政降职留用，一连10年一蹶不振。1970年4月，姜思毅被分配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当副主任，又从军职降到了正师职。

5月下旬，叶群为了给林彪准备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讲话，将姜思毅从广东请到毛家湾帮助工作。

一次，秘书张云生给林彪讲完文件后，林彪问：“姜思毅在干什么呢？”

张云生答：“主任让我们找些资料给他看，……”

林彪自言自语地说：“姜思毅是个秀才，能写点文章，但放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个人讲话，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姜思毅这个人，可以放他到一个常写文章的地方去，例如放到报社……”

张云生后来把林彪说的关于姜思毅这些话传给了叶群。叶群一听就发了牢骚：“首长这个人，是又想吃，又怕烫！姜思毅是把快刀，他不用，我还想用呢！”

叶群想了想，又说：“把姜思毅放到首长眼皮底下，他想来就问，怎么办？为了不让首长看到姜思毅，可以把老姜派到外地去搞搞调查研究。如果首长再问，你们就说他下去了。”

于是，姜思毅于 6 月初赴广州军区某师，6 月底返回北京。之后，他又主动要求去东北部队有名的“红九连”调查，谁知他刚去东北一个礼拜左右，就被叶群一个火急命令召回来，让他为林彪准备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并限 3 天交卷。

3 天后，姜思毅如期交卷，写成 5000 余字。但在这时，林彪又决定不讲话了。

7 月 26 日，林彪、叶群到北戴河后，姜思毅一直留在毛家湾。叶群给他的任务，是继续考虑并且准备给林彪在四届人大上讲话写个讲话稿。后来听说中央决定要先开二中全

会，他这几天正没什么事干，又不敢离开毛家湾，就在闲得难受的时候，叶群又找到头上了。姜思毅放下叶群的电话后，连夜突击，仅仅经过半宿的“夜战”，就“突”出来一份几千字的发言稿。由于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推敲修改，第二天大清早，就让郭连凯转送庐山了。

8月23日深夜，吴法宪把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王秉璋找来，告诉他们：“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讲话前报告过毛主席。向毛主席报告时，叶群守着门没有让别人进去。”吴法宪要他们在组里对林彪讲话高姿态表态，但不要点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

8月24日早晨7时，叶群又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她那里，对他们说：

“我先给你们讲讲首长的意见。下午分组讨论时，你们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首长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如果你们不发言，首长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有人反对毛主席。要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感情。发言要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的人物，打击面要小，不要点名。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

从叶群那里回来后，吴法宪向李作鹏、邱会作提出，黄永胜没有参加会议，对林彪的讲话要表态，要搞个书面发言。李、邱二人都同意。回去后，吴法宪打电话给留守北京的黄

永胜，通报了庐山会议的情况。

黄永胜同意吴法宪的意见，他亲自打电话给正在庐山的宋城，他的秘书，要他组织人帮他起草一个书面发言稿。黄永胜讲了发言稿的要点：1、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但不点名。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并交代写好后用电话传回北京。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泽东、林彪外，其他人都到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到11时30分才散会。

听录音时，陈伯达的座位和汪东兴靠近，他把已经找到的那七条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汪东兴，对他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陈伯达说：“是。”

汪东兴一看，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he 觉得常委看完后，还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了20份。

那天，江青也没有去听录音。后来，她为此大发脾气，质问：“怎么把原定的程序都推翻了？全会究竟是听谁的？”

但是，没有人理她。

在播放林彪讲话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支持。周恩来要汪东兴去向毛泽东请示。

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泽东还嘱咐汪东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汪东兴又将毛泽东的指示用电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 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汪东兴让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没有拿来。

听完录音后，叶群又找到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要他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她特别算了一下，认为各大组差不多都有他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吴法宪他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吴法宪把空军的王辉球、王秉璋、曾国华、曹里怀、邝任农找来开会，要他们“按照林副主席讲话的路子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但不要点名。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着林立果来到吴法宪的住处。林立果一见到吴法宪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

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

出来重放录音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吴法宪把陈伯达整理的论天才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后来，汪东兴将陈伯达搞的“语录”给吴法宪送来了几份，吴法宪连同他自己整理的那八条林彪的语录打印好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他要了一份。

中午，吴法宪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4军的王维国和杭州空5军的陈励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

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他问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他，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副主席。吴法宪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他告诉王维国和陈励耘：“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有所指的。”

王维国、陈励耘拿不准林彪讲话是指谁？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字，并关照：“这件事你们可不能说，叶群同志讲过不能点名，只能不点名的点名。”

第1137回：华北组，陈伯达手舞足蹈

也表态，汪东兴讲话支持

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

临去开小组会时，叶群给邱会作打电话，要他在小组会上发言对林彪讲话表态，一是讲天才问题，二是坚持设国家主席。

邱会作要秘书打电话给总后勤部政委张池明，对他说：“设国家主席问题，要用肯定口气讲。”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分别编到各组参加讨论。许世友、张春桥、李德生在华东组，陈伯达、汪东兴、李雪峰在华北组，李先念、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姚文元在西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陈锡联在东北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未编入各组，江青属自由参加。

这天，周恩来出席东北组的讨论。他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他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但客观上就是这样。”“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民。”

陈毅原在华东组，因为“九大”时，他在华东组屡屡受到上海人的围攻，九届二中全会，他提出来换个组，于是，

来到了华北组。下午华北组讨论时，陈毅第一个发言。大概是被批怕了，他在发言中屡屡表态：“我到石家庄后没有看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文件。据我所知，毛主席不愿当国家主席。如果他改变了初衷，愿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他还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是天才。

在陈毅发言时，有两个中央委员大声对他说：“你骨子里就一贯反毛主席，老右……”

坐在陈毅身边的郑维山小声对他说：“言多必失，不要再说了。”

陈毅点点头，停止了发言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他正好坐在会场的正座，此时他知趣地挪到旁边。

接着是钱学森不短的发言，他坚决要求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愤怒声讨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会议休息后，河北省的工人代表马福全发言，他还没说完，陈伯达和汪东兴结伴走了进来，大家热烈欢迎。

华北组的主持人李雪峰向陈伯达和汪东兴汇报了发言的情况后，请陈伯达讲话。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大多数人听不懂，比较重要的内容由汪东兴和李雪峰帮助翻译。

陈伯达出口成章，他说：“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

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陈伯达讲完后，陈毅接着发言。他说：“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讲到毛主席的天才，我谈谈自己一贯对毛主席的看法。从1927年认识毛主席起，我犯过错误，反对过毛主席。后来我发现毛主席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因此我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天才这个解释，主要是从实践中经过锻炼，锻炼了人的才能。这样解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

这个问题不简单。如今竟有人否认毛主席的天才，肯定是居心叵测。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对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

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意站在林副主

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与他们斗！”

有人当场说：“你还有资格讲话！”

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

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陈永贵对汪东兴说：“听林副主席的讲话后，我很激动，想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还要放炮，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你看可以不可以？”

汪东兴回答：“当然可以，不但你讲，我也要讲。我早就对那几个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们坏得很，现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放在眼里，将来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给弄坏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随后，汪东兴也作了支持陈伯达的发言。他说：“完全赞成林副主席非常重要的讲话。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形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

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他说：“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陈伯达插话说：“有的反革命份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他怕别人听不懂他的闽南话，站起来手脚舞动着说，话音未落，全场愤慨。

汪东兴接着说：“有人天真得很，以为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减少主席的外事活动，我就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完全清楚，哪次外事活动少了主席？主要外宾见不到主席就不肯走，主席也乐意会见他们。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伟大谦虚。我非常清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

发言最后，他激动的说：“我代表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要求新宪法恢复国家主席一节，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汪东兴的发言，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群情激奋，汪东兴可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与会人员，以为心里有了底，不少人争相要求发言，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中央揪出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一位晚上要去开三北地区战备座谈会的老干部说：“我晚上要去开会，

不能参加讨论，先让我表个态：我完全拥护伯达、东兴同志的发言，大是大非重大原则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仇恨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我响应东兴同志的倡议，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国家副主席，决不能让妄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

陈永贵也十分激动的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把反对设国家主席的人狠狠的痛骂了一顿。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后，他说这回明确了，也表了态，说要对反对毛主席的人“千刀万剐”。

此时已到晚饭时间，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解学恭、郑三生和谢振华等部分老干部还未发言。

散会后，陈毅问汪东兴：“汪主任，汪主任，我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

汪东兴说：“没你的事，老实呆着。”

陈毅上山后，曾找汪东兴询问是否该在会上做点自我检讨。汪东兴回答说：“轮不到你，这回批别人。”

汪东兴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他说：“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

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回去后，汪东兴又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回到住处，华北组的郑维山还是有些嘀咕，他对陈先瑞、尤太忠、郑三生说：“主席几次讲不再设国家主席，这次又要设国家主席，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郑维山和其他几个人向李雪峰建议，晚上讨论前能否先约见汪东兴，再摸摸底。

吴德因为组织一份材料，没有参加下午的小组讨论。散会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下午小组会讨论发言的情况告诉吴德，对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吴德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

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

按照大会秘书处规定，每天讨论情况，各大组要编简报，由大会秘书处简报组统一编号印发。简报要快编快送，内容要“有闻必录，如实反映。”下午讨论结束后，汪东兴要求快发简报。华北组负责简报工作的是几位组长和副组长的秘书，当天值班的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的秘书王振，另一个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还有一个是郑维三的秘书杜辛。三位

秘书请示组长李雪峰，李雪峰说，下午和晚上讨论情况编个综合简报，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先整理出来，是否单出简报，晚上由他们二人自己决定。

于是，3位秘书进行了分工：黄道霞负责整理综合简报；王振负责整理陈伯达的发言记录；杜辛负责整理汪东兴的发言记录。

我们再看中南组。8月24日下午，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

接着，她念了林彪的一些称颂毛泽东“天才”的讲话，然后声泪俱下的说：“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戴着一副墨镜，附和着叶群：“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中南组组长张国华和三位副组长也都先后发言，虽然很短，但都表示响应和支持李作鹏和叶群的发言。

第1138回：小组会，庐山上热闹非凡

争发言，华北组《六号简报》

8月24日下午，西南组。吴法宪那厚厚的嘴唇一张一合，气嘟嘟地说道：“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

吴法宪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

这时，曹轶欧插话说：“向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我们同外宾接触时，发现不少把毛主席的‘老三篇’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世界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热爱的。”

吴法宪接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接着，他念了陈伯达整理的毛泽东、林彪以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天才的语录，然后说：“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是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像 8341 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吴法宪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不过，他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小组会休息时，很多人过来向吴法宪打听是谁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吴法宪不好说，只悄悄对四川的张国华和梁兴初说：“是张春桥”。并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朱德、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后来，李先念也问吴法宪谁反对天才论？吴法宪说是张春桥。李先念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晚饭前，林彪叫吴法宪去他住的地方。林彪对吴法宪说：“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吴法宪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

林彪嘱咐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我们再看西北组。

邱会作在 8 月 24 日下午西北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说：“一、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后（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康生也在西北组讨论会上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

8 月 24 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又到林彪住处取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稿，林彪接见了他，但还是没有把讲话稿给他。

华东组 8 月 24 日下午开始讨论时，张春桥前来参加。他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含笑和大家打招呼。

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主持了下午的讨论。

讨论一开始，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就提出：“陈云为什

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

陈云身体不好，到了九江，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王洪文、徐景贤坚持等陈云来了再讨论。

接着，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中央委员作了发言，华东组省一级领导人没有发言。大家在谈到林彪讲话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的时候，一致表示拥护，而且讲了很多颂扬毛泽东的话，在谈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从自己的愿望来说，还是希望毛主席能够当国家主席，但是最后究竟怎么办，听从中央的决定。

晚饭后，邱会作给北京的黄永胜打电话说：“现在可热闹了，都动起来了。”

黄永胜说：“知道了，吴法宪来过电话。”

邱会作要秘书给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打电话，坚持设国家主席。

叶群给黄永胜打电话说：“四个人跳出来了。让他们好好表演。”

晚饭后，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把写好的华北组简报交给李雪峰，李雪峰说：“先放那里，等我开完会回来再看。”

李雪峰要去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晚上，政治局的会议临时决定不开了，分别参加小组会。各小组继续讨论。李雪峰回到华北组时，华北组晚饭后的讨论还在进行。晚上讨论

前，李雪峰曾问汪东兴：“你们下午那样讲，主席知道不？”

汪东兴说：“主席知道，就是不让点名。”

正在旁边的海军司令肖劲光接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不设国家主席嘛，现在又要设？”

汪东兴说：“你老糊涂啦，笔杆子压枪杆子，厉害呀！”

这时郑维山正好进来，刚要开口，汪东兴说：“你这个郑司令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同志，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大了。”

未参加下午讨论的吴德，看到大家都向汪东兴摸底，他也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

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大家以为在汪东兴那里摸到了底，晚上讨论时，参加华北组的海军司令肖劲光、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刘子厚、副总参谋长彭绍辉等老干部都纷纷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

晚上讨论结束后，华北组的3个秘书迅速整理出综合简报和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记录整理稿。李雪峰当场问陈伯达、汪东兴：“你们的发言是否单出简报？”他们都说单出。秘书当即把他俩的发言记录整理稿装上简报头，分别送他们二人审阅签发。

陈伯达说，他的稿子还要再看一看，就拿走了。

汪东兴后来说他的发言不单出简报了，于是将他的发言编到综合简报里了。

当晚，华东组继续讨论。中途，江青到会。许世友看见江青进来，热情地招呼她坐在前排沙发。这时，这次庐山会议的东道主程世清开腔了，他说：“宪法还是应设国家主席。”

一些人附和。

许世友说：“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

江青看到有不少人要求设国家主席，就插话说：“我觉得，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作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

“不设国家主席，群众从感情上通不过。”浙江的陈励耘说。

“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江青答。

“毛主席也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嘛！”程世清说。

“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主席不但高胆远瞩，而且深谋远虑……”江青扶了扶眼镜，朝会场四周看了一眼，慢条斯理向众人交底，“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

江青在这里引用毛泽东所说的“黄袍加身”的典故，是指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时，他的部将用黄袍披在他的身

上，拥立他做皇帝。毛泽东以此借喻他自己不愿意别人拥立他当国家主席。

听了江青如此明确的话，大多数人都不吭声了，有些人在嘀咕，这时，江青侧过脸去对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许世友说：“许师傅，你来帮帮我的忙嘛……”江青称许世友为“许师傅”因为许世友年轻时在少林寺当过和尚。

许世友说：“别的事我可以帮你的忙，这件事我思想还是不通。好了，好了，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江青同志，欢迎你什么时候到南京去。”

“好罢，我们到南京去再较量……”江青一边笑着回答，一边和许世友等人握手告别。

晚上，许世友和陈励耘分别向林彪、叶群报告说：“有人干扰华东组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

19时10分，陈伯达给叶群打电话，商量修改林彪的讲话稿。叶群要秘书李春生把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连同陈伯达送给她的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的发言稿，整理个书面发言。

晚上，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叶群同志：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李作鹏 8月24日”

24日晚，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上来，汪东兴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要印发的语录，他打电话告周恩来：“总理，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恩来让他先不要发。

晚上22时多，大会秘书处催要当天简报，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将整理出来的华北组二号简报综合稿送李雪峰审签。此时已经是半夜23时多了，李雪峰正和吴德、解学恭一起吃夜餐。李雪峰问黄道霞：“陈伯达的简报呢？”

黄道霞说：“催了，秘书说还没弄好。”

李雪峰说：“这个简报我还没看，学恭你年轻，眼睛好，你看一看。”

解学恭是华北组副组长，他看后，提了两条意见：“‘陈伯达的稿子另发’，把这一句勾掉，免得提了留个伏笔，他的稿子来了，他发他的就行了。”

还有一个是陈毅在华北组有两次发言，简报上说了两句。解学恭说：“简报上别提陈毅了，把这两句勾掉。”

李雪峰表示同意，黄道霞当场勾掉了这两句。

简报再让李雪峰看看时，李雪峰说：“我没带花眼镜，反正是如实记录会上的发言，你们就签字吧。”

于是，解学恭先签了，李雪峰也签了。吴德说：“我不签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参加讨论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

李雪峰说：“你签上吧。”吴德便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

华北组有5个组长、副组长，山西的陈永贵、北京军区郑维山两个副组长当时没在场。黄道霞给陈永贵打电话时已经是夜里12时了，陈永贵和郑维山都睡了，他们俩没签字。黄道霞便把简报亲自送到简报组，算完成了任务。

简报的全文是：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

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

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第1139回：再震动，张春桥急见江青

看《简报》，毛泽东批汪东兴

25日晨，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以会议的《六号简报》印出分发下去。全会立即轰动。

当时，上海的徐景贤和马天水正在吃早餐，收到了会议秘书组送来的两份《六号简报》，徐景贤看了，大吃一惊，连早饭都无心吃了，马上找到王洪文，给他看了《六号简报》。两个人议论开了，越谈越觉得无所适从，疑窦丛生。上午华东组又要开会，上海小组该怎么表态呢？他们想去找张春桥请示，可是又想此刻恐怕不大适宜。徐景贤拎起电话，要总机接到坡下张春桥住的那幢别墅。接电话的是严秘书，他说张春桥还没有起床。徐景贤问他看到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没有，严秘书说没有收到。徐景贤就在电话里把《六号简报》的主要内容告诉了严秘书，让他叫醒张春桥请示下一步该怎么办。

徐景贤搁下电话，过了片刻，电话铃响了，还是严秘书打来的，他说已经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要严秘书马上到徐景贤这里来拿《简报》。

电话挂断不久，严秘书就气喘吁吁地爬坡上来，从徐景贤手里取走了那份《六号简报》。

很快，江青的秘书杨银禄接到张春桥打来的电话，问：“江青同志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们那

里，我有急事想跟她说说。”

杨银禄说：“江青同志起床了，我去报告她。”

张春桥急切地说：“你快去报告，行与不行，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电话，请你快一点。”

张春桥性格内向，平时说话较少，没有急事他不那样着急。

杨银禄放下电话，马上到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说：“春桥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有急事想见您。”

江青听了立即答复：“请他快点来，他肯定有急事。”

杨银禄正准备回他的办公室给张春桥回电话，江青说：“就用我的电话给张春桥同志回电话吧。”

杨银禄给张春桥回完电话，就到走廊里迎候他。没有多大工夫，张春桥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他见到杨银禄主动跟他握手，并说：“谢谢你了。”

平时，张春桥是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的。

杨银禄把张春桥带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张春桥走了。江青打铃叫杨银禄进去。见到他，江青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问道：“小杨，华北组的《简报》你是送给我了还是压下没有给我？你老实交代，我怎么没有看见？”

杨银禄回答：“江青同志，我送给您了。”

他一边回答一边寻找，一眼看见文件夹里的那份《简

报》，赶紧说：“江青同志，那份就是。”他指着那份《简报》说，“刚才王良恩同志来电话说，这份《简报》要收回去。”

江青看到简报，心情平静了一些。她说：“你给良恩同志回电话，就说我没有看，看完了再交回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有人做贼心虚了。”

她转向杨银禄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如果总理有时间的话，我到总理那里去一下。”

杨银禄说：“好，我去给总理打电话。”

杨银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给周恩来的秘书钱嘉栋打了电话。等了一分钟，钱嘉栋回电话说：“总理说请江青同志现在就来。”

杨银禄放下电话，跑到大院里报告正在散步的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现在就去。”

江青上车走了。

再说上海组这边，徐景贤送走严秘书，和王洪文商量后，赶紧把上海的中委们全部找来，紧急讨论上午如何表态。

小组的成员们没有到齐，王洪文和徐景贤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朝坡下望去，只见张春桥从他的住所急匆匆走出来，几乎是同时，左首别墅里的姚文元也出了他的屋门。两个人见了面，不说一句话，就一起坐进了早已停在院子门外的一辆轿车里，疾驰而去……

上海的中委们齐集在王洪文的住所，大家翻看着《六号

简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大家认为，上海小组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态度，由王洪文代表小组集体发言。对于林彪的讲话，上海小组一致表态：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觉得还是应当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以不设国家主席为准；至于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因为不了解情况，上海决定暂不表态。讨论的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以后，大家推举由徐景贤执笔起草一份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

徐景贤把发言稿写完后给大家念了一遍，征求意见，大家表示同意，只有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4军政委王维国脸上毫无表情，一声不吭。在大家议论纷纷时，他也是沉默不语。王洪文看了王维国一眼，然后宣布：“没有不同意见就算一致通过。”

散会以后，和王维国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上海电机厂候补中委金祖敏告诉王洪文和徐景贤，王维国这几天接到过吴法宪的电话，多次单独出去。

此时，李作鹏也拿着《六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

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他让秘书打电话问张池明、张令彬在小组会上发言没有？张池明回电话说：“国家主席、副主席讲了，整简报时写上了，陈锡联、潘复生审稿时给去掉了”。

吴法宪看过修改后的西南组简报，马上找西南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写得还不够，要把气氛写足一些，”，要参照《六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但不要写他的名字。他还亲自交代了用哪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

再说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在她走后大约有 15 分钟左右，突然接到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给他打来的电话，着急的问道：“老杨，怎么搞的？主席没有请江青同志到这里来吧？我看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怎么会叫江青同志来呢？看来咱们今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啦！”

杨银禄说：“她怎么会到主席那里去了呢？是总理请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说小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吗？要是主席请江青同志去，我就会说是老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呀。”

周金铭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去再说吧，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周恩来的警卫员叫高振普，江青对他很熟悉，见面就叫“小高、小高”的。毛泽东的秘书叫高碧岑，江青对他也很熟悉，见面就叫“老高、老高”的。通常，如果对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周恩来请她去；如果对她说“老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毛泽东请她去。这是不会出错的，今天是怎么了？杨银禄放下电话，害怕极了，也后悔极

了。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还是向江青实话实说，而决不能说是谎报了军情，只能承认自己没有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说了“小高”那里，语言表达得不明确，这样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多作解释，听天由命吧。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杨银禄拿起电话，是周恩来秘书钱嘉栋的声音，他说：“总理叫我问一下，江青同志怎么还没有来呢？总理等得时间不短了。”

杨银禄说：“江青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她回来以后，我马上报告她。”

钱秘书说：“那好，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就在杨银禄放下电话的同时，听到院子里有汽车的声音，是江青回来了。他急忙跑下楼去，小心谨慎地问道：“江青同志回来了？”同时，还特别注意了一下江青的情绪，看得出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反而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

江青高兴地说：“回来了。总理没有来电话吧？”

杨银禄说：“总理刚刚来过电话，他请您快点去，他已经等得时间不短了。”

江青说：“那好，我现在就去。”

说着，又上了汽车，到周恩来那里去了。

江青从周恩来那里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一直没提起莫名其妙到毛泽东那里去的事。

原来，江青到了毛泽东那里，一下车就喊：“小高，小高！”

这时，她看到是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忙说：“怎么把我拉到这里来了？”她又说：“既然来了，我就进去见见主席吧。”

江青进去以后，张耀祠副主任发了大火，他对周金铭说：“不叫她现在来，她非要现在来，主席责怪下来谁负责？”

周金铭把责任揽过来说：“是我搞错了，我作检讨。”

不一会儿，江青从毛泽东的卧室出来，高兴地对周金铭说：“今天是歪打正着，下不为例，你给春桥、文元同志打个电话，请他们二位也来主席这里。”

没有多长时间，张春桥、姚文元就到了。

毛泽东让江青先回去，然后听张春桥汇报。

张春桥缓缓说道：“说起来，有不同意见也不足怪。奇怪的是一种气氛。一些同志明明自己同主席的指示对立，却反而指责不同意他们的人是反对主席，还要‘揪出来’，‘斗倒、斗臭’。这种气氛几乎控制住了会议。”

毛泽东又问：“那么，就没有替我做做工作，说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也不愿当什么天才？”

张春桥犹豫一下，字斟句酌：“就算有，也遭到围攻。当然，其中多数人也是出于对主席的热爱。”

姚文元小心地补充：“华东组，春桥同志讲了这个观点，

还强调了是您的意见，结果遭到围攻。”

毛泽东点了点头：“可见，打着我的旗号跟我唱对台戏，是个高明的战术呢！”

张春桥、姚文元走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吴法宪，告诉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接见江青，对她说，你走。

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

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不知道。

这个情况已经告诉了叶群。叶群叫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你要沉住气。”

张春桥、姚文元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又和江青一起到周恩来那里谈话。

上午，林彪在听秘书读完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后，极为重视，让秘书念了两遍。然后笑着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毛泽东看了《六号简报》。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叫人通知汪东兴过去。

汪东兴一进门，毛泽东就问他：“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说：“刚看到。”

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他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东兴一听毛泽东叫他“汪主任”，知道事情严重了，以前，毛泽东从来没有称呼过他的职务。他赶紧向毛泽东解释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泽东脸上仍然没有笑意，威严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又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汪东兴赶紧向毛泽东检讨。这时，已经是下午 14 时了，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组组长下午 15 时到牯岭毛泽东办公处开会。汪东兴亲自通知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四位常委，其他人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

林彪乘车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常委会。叶群知道后急忙乘车追赶，车未停稳她就急忙下车，结果跌了一跤。

叶群疾步走到林彪的车前，对林彪说：“如果会上有什么情况，除了要保吴、李、邱外，千万要保汪东兴。”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谈话。

第1140回：华东组，陈励耘指向明确

急叫停，庐山上风标再转

25日午饭后，许世友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了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问陈伯达的讲话是否经常委会讨论？周恩来说没有。

接着，许世友又给汪东兴打电话。

下午，华东组的讨论继续。会场设在庐山图书馆旁边的一幢小楼里，场内的气氛异常，其他省、市的中委们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很多人的手里都拿着那份《六号简报》。他们一见上海小组的人员进场，马上停止议论，用一种沉默的目光打量着上海的中委们。

会前，徐景贤拿了誊写清楚的上海小组集体发言稿《我们的态度》，给上海的每个中委传阅，以便让王洪文代表大家发言。大家都在发言稿上都画一圈表示同意，只有传到王维国那里时，他在发言稿的下方批了一句话：“不搞集体发言，各人发各人的为好。”

徐景贤拿到稿子一看愣住了，赶紧找王洪文紧急磋商：“王维国这家伙怎么搞的，讨论时不发表意见，现在突然来这么一下子，简直是从背后戳一刀……”

王洪文气得呼哧呼哧地：“不晓得他在搞什么名堂？真见鬼。只好不发言了，看看再说。”

张春桥依然是面带微笑走了进来。但是这回没有人招呼

他，也没有人回他一个笑脸。会场里寂无声息，空气简直像冻结了似的。

张春桥显得十分尴尬，讪讪地找了一个单人沙发坐下，连开水也没有人给他倒一杯。

陈云果然上山了，坐在那里气喘吁吁。

14时，华东组组长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他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接着，王维国发言。他先是赞扬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为全会指明了方向，接着说：“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一切野心家、阴谋家！”

他说：“宪法里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头嘛”，希望毛主席考虑大家的意见。

此时，张春桥板着面孔不动声色，听得非常仔细。

接下来几个人的发言后，陈励耘发言，将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他一上来就慷慨激昂的说：“林副主席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那

么一些人自不量力，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为什么要反对林副主席？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陈励耘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他前面，还没等他讲完，就回过头来支持他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叫他到江苏农村去劳改！”

时任福州军区空军政委的韦祖珍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陈励耘最后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坐在徐景贤旁边的马天水，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徐景贤，轻声问道：“把野心家，阴谋家揪出来，究竟要揪谁呀？”

徐景贤只是朝他笑笑，他也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陈励耘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向卫生间走去，马天水也跟了进去。片刻，马天水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满脸懊丧地对徐景贤说：

“刚才我问陈励耘究竟揪谁，他在厕所里说：谁是阴谋家、野心家就揪谁！这小子，看来他是知道底细的，不肯对我们说。”

陈励耘从厕所回来，也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张春桥的位置正好在他的左侧，两个人的座位是九十度直角形。说来也巧，这时，正好有一个中委在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是“不

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

陈励耘听到这里，马上打断他的发言，侧过脸去冲着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

张春桥的脸色非常难看，但他强作镇静，也不看陈励耘一眼，把眼光落在沙发前面的地毯上，只是不断地吸戳着手中的香烟……

会场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候补中委，索性站了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呼声一直传到外边的街道上去。

华东组“烧”起来了，上海的王秀珍也发言表态说：“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此时的华东组，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人就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

有的人发言时拿着《六号简报》，直接引用陈伯达等人的讲话。

也有人干脆就念《六号简报》。

张春桥一声不吭，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做着笔记。

郭沫若编入华东组，他戴着助听器，很困难地听着。听到一半，郭沫若也要求发言。他说：“我是‘懵懂’派，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看了华北组的《简报》，又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才知道全会上出了大事……”

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进来，跟许世友耳语了几句。许世友宣布：“大家等一等，休息一下，等我回来！”

随后，张春桥也走了。

大家守在会场里，不知道上面有些什么精神。

这时，杨得志问陈励耘：“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

陈励耘答：“什么人反对毛主席就指谁。”

许世友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到牯岭毛泽东处开会。正在院子里的毛泽东看见许世友进来，一边和他握手一边问：“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照直说：“凉。”

毛泽东叹道：“我年龄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红娘总理当，我只能当老夫人。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泽东对来开会的各组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们宣布：

“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

开幕式的讲话；收回《六号简报》……”

毛泽东这位古稀老人，他不再有那种高亢有力的川江号子般的湖南音调了，他缓缓地说：“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下面有人不理解，小声议论着。毛泽东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搞。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向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话里透出一种凄凉。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永远地消失了。

他说：“本来我们这个会议，方针嘛，是开好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呢，还是开不好的会议，变成了分裂失败的会议呢？还是要争取开一个团结的会，争取更大的胜利。如果开不成，仍要分裂，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党是经过挫折的，千锤百炼。如果搞不好的话，那我就下山，你们去开，开完了会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他说陈伯达：“人家搞阴谋，就你不搞阴谋？”“我们共事30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

散会了，人们陆续走了。心情烦躁的毛泽东正想坐下休息，忽然看见周恩来在不远处站着。

“哦，恩来，你没走？坐，坐下。”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一定有话要说。

周恩来显得心神不安：“主席，压力，是不是不宜过大？留有余地。温度降下来即可。我赞成主席的话，九届二中全会，只能开成团结的大会。”

两人相视一小会儿，毛泽东没说话，摸起一支烟，点着。

“船大不好调头，”毛泽东抱头仰靠在沙发背上，无奈地吁一口长气，“行，就按这个思路。”

周恩来点点头，站起告辞。

毛泽东叫住了他：“你让办公厅发个通知，明天不开分组会了，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沉吟片刻，他又说：“可是，事情要搞清楚。你和康生，找那几个‘大将’谈谈，无论如何，错误必须追查。吴法宪私拟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要弄清楚。其他的人，我亲自谈。”

周恩来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

从毛泽东那里回到住处的陈伯达，很不高兴对秘书缪俊

胜说：“主席批评了我。”

缪俊胜听了陈伯达的叙述后说：“这个事情没弄好，会议没有这个议程呀？”

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讲话主席是知道的呀。”

随后，陈伯达、汪东兴被叫到周恩来那里谈话。

这天下午，邱会作来到西北组会场，看康生和召集人都不在，得知毛泽东把他们召去开会，便没把《六号简报》从皮包里取出来。但是西北组仍然集体通过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下午开小组会前，吴法宪又找王辉球、王秉璋、曾国华、曹里怀、邝任农开会，问他们是否看了华北组的《简报》，还说：“这一下好讲话了，有材料，有根据了，你们还顾虑什么？对设国家主席问题，还是要表态。”

吴法宪来到西南组，看召集人不在。他把《华北组简报》拿出来给西南组副组长谭甫仁看，并问：“人家一致通过设国家主席，我们这个组怎么办？”

谭甫仁说：“照样来吧。”

吴法宪在小组会上宣读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结果，西南组也来了个一致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很快，西南组召集人张国华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

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中南组曾思玉回来后，首先十分紧张地问：“我们的简报出了没有？”因为李作鹏曾说：“停一停，咱们中南组的简报先压一压。”所以中南组的简报没有出。

曾思玉听后，如释重负，说了句：“谢天谢地。”

华东组这边，正当众人翘首盼望的时候，许世友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大声嚷道：“不开了！不开了！散会！”

大家都愣住了，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动弹。

许世友一把扯开军装的扣子，敞着怀，在会场门口不停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看大家谁也没动，又挥挥手：“不开了。刚才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了，这是毛主席的决定，休会！大家回去吧。”

人们纷纷返回住处。

这时，韩先楚追上许世友问他：“你会上指的是谁

呀？”

许世友说：“鳄鱼眼嘛！”

“谁是鳄鱼眼？”韩先楚继续追问。

许世友用手做成眼镜状放在眼前说：“那个带眼睛的！”

25日下午，李雪峰接到去毛泽东处开会通知后，华北组的讨论改由吴德主持。河北省4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央委员吕玉兰、王国藩等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他对吴德说：“会议立刻停止。”

吴德觉得意外，问：“为什么停止？”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然后向大家宣布会议结束。

北京的工人代表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同在一个小组里，突然宣布会议停止，他们很奇怪，问聂元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就突然停会了？出什么问题了？

散会后走出会场时，代表们很拥挤，石家庄一个工人代表在门口见到聂元梓也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讨论着、讨论着就突然停下来了？”

聂元梓说：“我也不知道。”

他们很快就被人流冲开很远了，那位工人喊着对聂元梓说：“你要有工夫，到我那里坐一坐吧。”

聂元梓对他喊道：“再说吧。”

散会的路上，吴德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议要停止？”

李雪峰解释：“毛主席主持各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刻停止。”

吴德提到河北省4位劳模下午的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还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回到住处，北京的倪志福、刘锡昌、张世忠等人一连找了聂元梓3次，请她到他们的房间去坐一坐。聂元梓去后，他们问她选举国家主席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聂元梓说：“我也不知道。”

这些工人中委和候补中委还找到吴德，表示他们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些人走后，吴德立即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聂元梓在会上到处串联。吴德后来回忆说：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

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

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8月25日，林彪再次会见前来取讲话稿的王良恩，仍然没有把讲话稿交给他。

第1141回：问情况，聂元梓再次挨批

收记录，三司令同时写信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后回到住处，立即把叶群叫到房间。

.....

不一会，叶群出来对工作人员说：“首长开会回来了。主席说，张、姚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了。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以后可能还要用。”

叶群让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第二处长宋城找到当时担任中南组记录的军委办公厅秘书郭士兴，从记录本上撕下她的发言记录，由宋城交给叶群。

吃过晚饭，吴法宪急忙到林彪的住处。林彪对他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回来后，吴法宪给邱会作打电话，问他：“你的发言简报发了没有？”

邱会作说：“还没有发。”

吴法宪告诉他：“情况有变化，简报不要发了。”

邱会作即将其发言简报、记录稿压了下来。

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北京的黄永胜。

晚上，宋城从庐山打电话到北京，口述了为黄永胜起草的书面发言稿。

黄永胜听后，做了一些修改后，就让发出去。吴法宪对宋城说：“最好再等一等。”

秘书报告黄永胜后，黄永胜批示：“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并让秘书打电话告诉了宋城。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根据中央指示，通知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林彪、叶群一面让警卫参谋抄一份留存，一面给中办秘书处打电话说：“毛主席决定收回《简报》，我们带头交。”

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以后不要通电话了。”

林立果打电话转告王维国不要发言了。

晚饭后，陈励耘到福州空军政委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跟了进来，问他：“老陈，你到底在讲谁？”

陈励耘反问：“你看我是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

韩先楚不说话，走了。

韩先楚一走，韦祖珍拉陈励耘出去散步，边走边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25日下午和晚上，周恩来同前来的陈伯达、汪东兴谈话，

还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

25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晚上，吴德正在看电影，周恩来派人找到他，要他过去谈话。

见面后，周恩来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并指示吴德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委员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

吴德向周恩来汇报了河北省4位劳模下午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周恩来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吴德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吴德向周恩来请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

周恩来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从周恩来处回来，吴德立即组织召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批评聂元棒的非组织活动。吴德将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

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周恩来。周恩来批示政治局传阅。后来在开大会的时候，周恩来还为这事点了聂元梓的名。他说：“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一个大阴谋。有的人不了解情况，就乱表态。还有咱们的聂元梓，也在下边串连。”

这天晚上，徐景贤他们正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 21 时左右，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徐景贤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

首长？哪一位首长？王洪文和徐景贤不便多问，只是紧随着那人走下坡去，一起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红旗”在牯岭的柏油马路上行驶片刻，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外停了下来。

夜已深，一幢长长的房屋好像一艘军舰，停泊在大院里的草坪上，房屋的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幔，屋内的灯光都无法透射出来，只看得见整幢房屋的黑黝黝的轮廓，使人感到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穿军装的人把他们引上高高的台阶，穿过一条狭长的玻璃棚信道，走入房屋，这时，只见江青的警卫员大周迎了出来，原来是江青接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交换了一下眼色。

他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王洪文他们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

们。”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一头乌黑的头髮齐耳根剪短，朝后梳着，看得出还吹过风，有一点暗波浪。她里面穿着白衬衣，外面罩一身浅灰色的毛料服装，从眼镜后面仔细打量了一下王洪文和徐景贤，热情地伸出手来握手，接着轻松而随便地往身后的长沙发上一靠，边坐边说：

“今天——找你们两位来——是想听听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接着，她就侧身朝左首的张春桥看了一眼，说：“我听春桥说，你们华东组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很凶呀。”

张春桥微微一笑，坐在一旁的姚文元却接上了口：“其实各个组都差不多，我这次参加西北组，也有‘宣讲员’。”

江青打断了姚文元的话，自顾自地说下去：

“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儿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到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呐！看完《简报》，我们3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开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

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主席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这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

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份折迭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喏，这就是那份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

“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

“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号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个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

“那末。东兴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王洪文把憋在肚子里好久的问题、当面向江青提出来了。

“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语录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起来，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经向主席作了检讨，那份语录材料也上交了。”

“你们知道吧，在8月份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就和春桥大吵一场。其实，矛盾也不是今年才有的，前次文元回上海去，是空军派的飞机，半路上就遇到了雷雨云。”

姚文元听到江青提到他的事，就介绍起来：“那次可危险了，飞机进了雷雨区，差一点飞不出来，后来又迫降在济南……像这种事，在空军里照理是不允许发生的……”

“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是有办法处理的。”江青说完这一番话，停顿了片刻，用手背掩着嘴打了一个呵欠，张春桥及时提醒：“请江青同志早点休息吧！”王洪文和徐景贤站起来来告辞。江青就在沙发前握手告别，一边握手，一边用左手食指点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很大的！”

江青在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希望。在“九大”期间，毛泽东曾几次接见王洪文，并要他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大会上发言。

王洪文很快反应过来，流利地回答：“我一定不辜负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

徐景贤紧跟看说：“前一阵子听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头痛，请多加保重。”

“是呀，不过这几天他们一闹，我的头痛反倒好得多了，哈哈……”

王洪文和徐景回到住处，三脚两步跨上台阶，雀跃不已。王洪文将住处酒柜里剩下的半瓶茅台，一饮而尽。

8月26日晨3时，吴法宪打电话，把毛泽东的批评和指示传给黄永胜。黄永胜要吴法宪赶快告诉宋城，把他的书面发言稿烧了，要宋城把在北京搞的一些语录也烧了。

早上，周恩来致函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我再转请你校阅一次。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改。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恩。”

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退给周恩来说：“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学习。”

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小组会，各省自己谈，可以参观庐山，晚上准备看电影。

秘书于运深给林彪讲文件时，林彪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子，说话走火。本来是好事，给他们弄糟了。”“这些老干部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

部，那些人能干什么？”

于运深理解，林彪说的“那些人”应该是指张春桥等人。

叶群说病了，躺在床上了。林彪口授了一张“三心”和“三好”的纸条：“忠心、热心、细心，好学、好问、好帮助人”，让秘书于运深写好交给叶群。

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叶群，要回他的书面发言稿。

不仅叶群撕掉了她的小组发言记录，李作鹏也要收回他在中南组的发言。两位中南组的原始记录人，将记录本编上页码，注明几页到几页谁的发言，被谁撕走了。

邱会作也要撕下他的发言记录。记录人员告诉邱会作的秘书：“修改可以，撕下来不行。”邱会作只能作罢。

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显得轻松，他笑着说：

“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8月26日以后，毛泽东要看中南组的会议记录。因为李作鹏和叶群的会议记录被撕走，组织人力整理了两天，整理好后送周恩来转毛泽东。

林立果到处打电话叫“撤退”，他气急败坏地给北京林办秘书打电话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从8月23日到26日，中央委员们从各自不同理解与立场，

群情汹汹，矛头直指张春桥。许多组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纷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

8月26日，刘贤权告诉吴法宪：王辉球、王秉璋在小组会上仍坚持的意见后，吴法宪把王辉球、王秉璋找来，对他们说：“不要再讲了，我都犯了错误了，要写检讨了。你们不要再坚持，赶快收场。”

许世友觉得应该给毛泽东、林彪写封表态信，他让秘书李文卿替他整理。意思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的英明决定。”同时提出四条建议：一是犯错误的人必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请罪；二是犯错误的人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下放到基层，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三是这些人也不能参加人大常委；四是错误思想要进行批判。

信写好了，秘书李文卿拿去请许世友审阅签发，看见韩先楚正在许世友那里和他聊天。韩先楚问李文卿：“写的什么？”

李文卿不敢做主，没有吭声。

许世友签完字，示意给韩先楚看看，李文卿才把信递给韩先楚。

韩先楚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他以为许世友信中所说的犯错误的人是指张春桥。林彪8月23日下

午的讲话，也让韩先楚兴奋不已。他觉得，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他仿佛阳光驱散云雾，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毛主席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回到住处，韩先楚也写了一封表态信。他说：“这两天真是痛快！”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的隔壁，他看了韩先楚的信，也照猫画虎地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表态信。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除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外，还有浙江的南萍、熊应堂……等等，不少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都是批判张春桥的。

8月26日下午，许世友、韩先楚将他们的信交给中办在华东组会议的秘书洪雪竹。随后，杨得志的信也由山东小组秘书送来交给洪雪竹。许世友等人说：“这几件信很重要，你带回去，请王良恩转呈主席，一定要稳妥送到。”

洪雪竹回到秘书组。晚饭后，王良恩要洪雪竹汇报华东组的情况，他把三封信交给了王良恩，并把几位司令员的嘱咐转告他。

这三封信和浙江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都送到大会会

务组，最后转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把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的三封信转给叶群并附一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

山东小组除张延成、易耀彩在 25 日下午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外，其它 5 人均未发言表态，但是他们感到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表态或态度不鲜明是不应该的。于是，山东小组便在 26 日上午，仿照华东大组其他小组的作法，召开会议，联名写了一封表态信。信中写道：

“在我们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有人竟敢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强烈要求：

- 一、犯错误的人一定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 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将这些反动思想彻底批臭！犯错误的人要向全会作深刻检讨或书面检讨；
- 三、犯错误的人立即离开中央；
- 四、到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彻底改造反动的世界观。”

信封上写是“呈伟大领袖毛主席华东组山东小组”。

据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后来回忆：“写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真实感情主要是两点：第一，确实出

于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第二，确实出于对张春桥之流的愤慨。”“这不仅反映在‘表态信’上，而且流露在闲谈中。华东组的饭堂离杨得志同志住所很近，饭前饭后，大家围坐在他门前的大树下闲谈，话题常常是对张春桥之流的痛斥。韩先楚同志说：‘你们山东有材料，你们说嘛。’我说：‘打仗的时候看不见他们，现在出来掌权了！上海市委竟代替了党中央，他们在中央胡捣，这样的人要离开中央，不能在中央工作。极左派篡权，一定要下来，要下放。’这种愤慨情绪，在休会期间，一直延续了三四天。”

8月26日休会期间，聂荣臻与叶剑英相约去游览庐山风景。他们在游览中边走边聊。

聂荣臻说：“吴法宪在小组会上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又不指名。昨天来了华北组的会议简报，陈伯达也说了这个问题。”“不知他们指的是谁？华北组简报刚发下来，我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通知收回。今天宣布休会，不知在搞什么名堂？”

叶剑英说：“我所在的小组，李作鹏参加会议，也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我叫他点明是谁，他就是不说。反正里面肯定有问题，就等着瞧吧。”

第1142回：找谈话，毛泽东召集开会

汪东兴，陈伯达都做检讨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8月26日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碧岑打电话通知：“主席叫伯达同志去一下。”

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并让他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谈。

临别，毛泽东将陈伯达送到小车边。陈伯达回去后，挺高兴，说：“主席就是批评我：‘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也不写文章了。’主席说，‘你要跟他们见见面谈一谈’。”

8月26日下午，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主要是了解小组会发言的情况。

听了大家汇总的情况，康生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因为“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庐山上的这场斗争是“二月逆流与八月洪流之合流”，“是二陈合流。”

面对康生的指责，汪东兴没有看康生，也没有吭声，吴法宪他们则认为是行使正常的党员发言权利。

会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

26日下午，徐景贤到张春桥的住所去看他。张春桥对徐景贤说：

“他们早就想揪我了！就在8月份，宪法修改小组开会

时候，吴法宪就和我大吵了一场。”

接着，张春桥把因为删去三个副词而引起的争吵经过讲了一遍。

徐景贤问：“那么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提法，指的就是删去三个副词这件事情吗？那是毛主席自己的意见呀！”

张春桥愤愤地说：“就是。他们存心要寻事，才不管这些呢？”

徐景贤又问：“那么伯达同志为什么会在华北组作那样的发言呢？”

张春桥说：“咳，你不知道，这个陈夫子呀，我和文元给他做了多少工作，想不到他竟……”张春桥长叹一声，又讲下去，“毛主席对他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

徐景贤对张春桥说，目前有些情况还弄不清楚，这几天想分别去接触一些人，听听情况，过几天再来看他。张春桥颌首赞同。

徐景贤回到住所，向王洪文、马天水等人介绍了去看望张春桥的情况，大家一致觉得不能关在屋里，要多出去走动走动。于是，在以后的几天里，王洪文和徐景贤找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组组长李雪峰，马天水找了河北省的刘子厚，徐景贤和陈敢峰还找了浙江省的南萍和陈励耘……

吃过晚饭，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告诉他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

吴法宪他们把下午周恩来和康生找他们谈话调查的事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

林彪听后，只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8月26日晚上，郑维山口述，秘书杜辛整理，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主要讲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所起的作用，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

信写好后，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

当晚21时30分，陈伯达找到李雪峰，说：“与主席谈话一小时余，主席批评了。”他问李雪峰：“是否到华北组作检讨？”

晚上，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组长开会。他在会上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还说：“一句顶一

万句”、“四个伟大”这些说法都不恰当。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了检讨，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

会后，周恩来到康生处商谈。22时30分，周恩来、康生又约六个大组组长开会。

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吴法宪，给他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来的，并告诉吴法宪：“首长要你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

吴法宪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27日上午，陈伯达打电话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的住处，对他们说：“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再不要同我往来了，不要相互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

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吴法宪他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编的语录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邱任农的名字，你们也要注意。”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从陈伯达的住处出来以后，又到了林彪那里。林彪肯定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

这天上午，周恩来、康生继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吴法宪带上了林立果早上给他的那本党章。

康生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

吴法宪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对康生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8月14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

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

这时，邱会作说：“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

康生脸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

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吴法宪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问：“‘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周恩来一下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要查一查。

此事康生也搞不清楚。

周恩来指示中央办公厅调来“九大”修改党章的原件，结果发现是毛泽东审阅党章时亲自圈掉的。

8月27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

这天，汪东兴交给毛泽东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自己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看过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

汪东兴的检讨书，经周恩来批阅修改后印发给全体与会人员。

27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省自行安排座谈。谈三个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学林彪的报告思想问题可以谈深一点；不要揪人，要谈遍。”

中午，陈伯达无精打采地来到江青的住地，用低颤的声音对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小杨，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想见见她，我有要紧的事想和江青同志说说。”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緊的事要谈，精神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秘书，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秘书说：“在会客室。”

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

秘书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陈伯达又到康生那儿，康生对他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

这天，心情忧郁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3人坐车到庐山含鄱口合影。

下午，各省、市讨论修改宪法。

叶群对林彪说：“几个组都闹起来了。矛头都是对着你来的。”

林彪说：“那是吓唬人的。”

下午，江青起床以后，到办公室看文件，大约看了10分钟的时间，打铃叫杨银禄。杨银禄进去以后，她很客气地说：“请坐。”

杨银禄坐下以后，江青说：“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有许

多使我很为难的事情，又不好对你们讲。就拿叶群同志来说吧，她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地叫我向主席说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说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

可以看得出，江青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她站起来说：“说不准今天下午叶群同志就会来找我，你出去等她吧。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考虑见还是不见。你去吧。”

杨银禄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大约过了 10 分钟，叶群果真急匆匆地来求见江青。

江青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暗廊，暗廊里有几把藤椅、几张茶几。杨银禄很礼貌地对叶群说：“请叶主任在这儿坐一坐，我去报告江青同志。”

叶群问道：“江青同志休息得好吗？精神好吗？身体也好吧？”

杨银禄说：“都好。”

叶群说：“麻烦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就说 I 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叶群每次到江青处，对工作人员都很客气。

杨银禄说：“叶主任，不要客气，我去报告江青同志，

请您在这里等一下。”

杨银禄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紧闭双眼，嘴唇微动。杨银禄报告她说：“叶群同志来到这里要求见您。”

江青听后沉思不语。足足等了5分钟的时间，她才开口说话：“叶群这个人呐！嗨，不说了。”

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会见结束了，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习惯性地低头哈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幸福。”

杨银禄把叶群送走了，江青又打铃把他叫到办公室，眉飞色舞地对他说：“叶群同志这样精明的人，多年在林副主席身边工作和受林副主席的熏陶，竟然也上了陈伯达的当！我看不仅仅是上当受骗吧？哈哈哈，她也有会犯错误的时候。”

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我会见叶群同志的事和我刚才

对你说的话，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这是铁的纪律，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杨银禄回答说。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原来，江青到毛泽东那里，惹得毛泽东不高兴。批评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这天下午，周恩来、林彪与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

晚上，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会后，周恩来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吴法宪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当晚，吴法宪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此事，周恩来 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

吴法宪把庐山这两天的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

黄永胜听得不明不白，很着急，一再让吴法宪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

吴法宪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吴法宪：“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

遂后，周恩来、康生到林彪那里汇报吴法宪等人的情况。

8月27日这天，林立果跑到林彪住处，向林彪秘书于运深大发议论，说：全怪“叶老胖”，“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要抢头功，尽是瞎指挥。”随后，林立果打电话给在北京毛家湾值班的“林办”秘书张云生，也说了同样一些话。

林立果这里说的“叶老胖”、“主任”都是指叶群。

8月28日子夜0时过后，陈伯达来到吴法宪处，核实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这天早上，吴法宪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电话，让他马上去一趟。

吴法宪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承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吴法宪说：“我一定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

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

吴法宪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周恩来说：“对宪法小组争论的问题，既要说清楚，又要合情合理。”

他问：“你们搞语录了吗？”

吴法宪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让吴法宪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吴法宪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给周恩来送去。

第1143回：谈话忙，吴法宪斟酌检讨

刚上山，黄永胜即被召见

8月28日上午，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综合宪法修改意见，可以个别出去参观，下午不要外出。

邱会作对秘书讲：“以后不要同张池明政委联系了，资料也不要送了。”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司令员的信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天转到了林彪秘书于运深这里，林彪听了这三封信，对于运深说：“此件压十天。”

叶群知道后，对他说：“今后凡是遇到称赞首长的和要揪人的事，要注意把关。”

这天，周恩来先后到林彪、康生处谈话。之后，周恩来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上午，周恩来通知李先念、李德生明天回北京担任中央值班，换纪登奎、黄永胜上山。

下午，周恩来又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吴法宪说：“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下午，林彪去见毛泽东。走之前，叶群对他说：“吴法宪空军司令的职务，要向主席建议不要动。”

林彪回来后告诉叶群：“吴的职务可以不动。”

叶群打电话告诉吴法宪：“林总在主席那里说话了，你

的职务不会动。”

晚饭后，吴法宪到林彪处，林彪对他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的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8月14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谣过。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后，吴法宪向他报告说：“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

林彪说：“你不要作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

吴法宪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

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

他还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

叶群也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沉住气：“你为了捍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后来她又对他说：“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如果屋里坐不住，可以到外边去玩玩。”

林立果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让周宇驰代表他给吴法宪家里送糖果，以示慰问。

吴法宪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检讨提纲：

一、讨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

二、我对林副主席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

他拿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他们研究了“不能过线”，不能承认提供假材料，顶多承认错误核实不够等等，结果，这份检讨一共写了不到 20 句。吴法宪让军委办事处组秘书宋城和他自己的秘书张云龙修改这份检讨稿，然后又找李作鹏、邱会作和宋城一起研究，一段一段修改。

此后，李作鹏、邱会作多次帮助吴法宪写检讨，再三交代吴法宪不要涉及叶群和他们二人，但责任他们三个共同承担。还强调说：检讨时，“只能照稿念，不能多说一句，要沉住气。”

8月29日晨，陈伯达将他的检讨送周恩来和康生审阅。

这份检讨稿是康生帮助写的。检讨中说：“24日，我在华北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没有预先请示主席，也没有预先请示林副主席，同时也没有预先同总理、康老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商量过。”“在这次修改宪法的问题上，关于国家设不设主席的问题，主席多次指示，我都是知道的，亲自听到的，但我没有深思主席的指示，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我说的那个‘天才’问题，主席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已经把这类字眼删去了。”

周恩来阅后批示“同意”，将改稿送康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方式打（印）六份交我”。

29日清晨，李德生临下山时，又去见周恩来。此时，天还未大亮，周恩来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向李德生交待说：“李先念回京是主持国务院工作，你回去接替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林副主席先发言我没有想到。事先并没有经过常委议定。华北组里陈伯达搞的《简报》是突然袭击！”

这天上午，毛泽东让林彪在住地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这次会议是主席要他召开的，做做思想工作，要互相消除误会。与会者说要改造世界观，要好好学习，要搞好团结等。

最后林彪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他不是说假话的人，

他跟我几十年都没有听到过他说假话。”

当天，周恩来约计委副主任顾明等人开会，听取有关“四五”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起草情况汇报，提出作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下午13时40分，黄永胜上了庐山，立即打电话向叶群报到。

叶群放下话筒，照着镜子打扮了一下，便去看望黄永胜。几天以来，她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掉泪。可是在旁人面前，是从不掉泪的。今天一见黄永胜，没有说出一句话，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情人，扶在黄永胜的肩膀上，竟抽泣哭泣地哭起来了。

黄永胜一下子慌了手脚，连声说：“别这样，别这样，别让外人看到了。”

叶群掏出手帕擦擦泪水：“你不知道，这几天，日子可难过了。”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又淌了出来。

叶群与黄永胜的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在黄永胜还没有登上总参谋长的位置时，他俩私下即有来往，并互赠诗词。如有一首最能代表二人特殊关系的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

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这首诗，是两个多月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林彪的秘书李春生等人从叶群装语录卡片的盒里发现的，是黄永胜写给叶

群的。

眼前，叶群的日子很不好过。从8月25到26日，眨眼之间，处境竟然翻了个，从原告变成了被告，从进攻变成了防守。她的情绪非常低落，老是哭，林彪反过来安慰叶群。

29日下午14时30分，周恩来召开组长会。

16时30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主持，周恩来、康生及全体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参加。会议扩大吸收了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如吴德、王洪文等人，其它中央委员们听会议的录音。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8月25日下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康生介绍修改宪法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8月25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

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周恩来强调：“主席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

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康生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吴、李、邱几个人也拉上了。”

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检讨。他满口的福建惠安土话，别人很难听懂。于是，让陈伯达开了一个头以后，由周恩来替他把检讨发言稿念了一遍。

陈伯达在检讨时想把责任往陈毅身上推，时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的苏静打抱不平，发言说：“我们明明是听你陈伯达传达后才表态拥护的，陈毅也是受了你的骗，站起来支持的，怎么就变成他的了？”

事态变成了这样，陈毅也懵了，不敢说话，眼看着苏静替自己辩护。

因为苏静是国务院所属的中央委员，分管国务院工作的余秋里和李先念下来后跟苏静讲：“现在庐山上比较复杂，你们不要乱走，一乱走串门子就成问题，……”

接着是吴法宪作检讨。他说自己不学马列，不懂理论，上了陈伯达的当等等。

汪东兴则在检讨中说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是我向政治局传达的，但是在这次会上我头脑发热，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

见，毛主席已经批评了我……”

会议开到最后，林彪让张春桥发言。大家感到很突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张春桥说些什么，张春桥发言很简短，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二是表示坚决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做好工作。

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的批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提醒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不要学陈伯达的样子，注意保持晚节。年轻的中央委员听不懂这两句话，也不了解这两句话的出处，徐景贤在会场上递了一张纸条给郭沫若，请求解答。郭沫若当场拿起笔写下了答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大雅》。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

会议开到晚上 21 时 30 分散会。

开会期间，20 时 05 分，陈伯达秘书缪俊胜给林彪处打电话，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接听了电话，并手记下电话记录。

缪俊胜说：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23时40分，叶群让秘书于运深给陈伯达秘书回电话说：“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毛泽东、周恩来召见刚到庐山的黄永胜。

毛泽东对黄永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

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

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让我再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

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群众意见很大。”

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

听说黄永胜被毛泽东召去谈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完吴法宪的检讨后，相约一起来到黄永胜的住处。他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他们关系重大，因此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这次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

他们在黄永胜那里一直等到下半夜，终于等到黄永胜从毛泽东那里回来。谁知刚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吴法宪他们只好继续耐心等待，直到次日凌晨4时，黄永胜才回

来，对他们说了一些毛泽东接见他的谈话情况。

接着，叶群也来了。他们一起商量如何检讨，谈了约有4个小时。叶群、黄永胜要求统一口径，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只讲自己，也互不涉及。叶群还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大家不要着急，锅里有饭，不愁碗里空。”

30日上午，吴法宪把自己亲自抄写的检讨稿报送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康生看了吴法宪的检讨，写了一大片，说“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

吴法宪又修改了两次，最后由周恩来、康生签名印发全会。

8月30日上、下午，大会分组听8月29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录音。

这天下午，周恩来把吴法宪送来的《语录》送往毛泽东处。

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

周恩来在庐山上对吴法宪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

毛泽东办公室的人也对吴法宪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正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紧张不堪的吴法宪听到这些，立即同叶群联系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吴法宪马上打电话给妻子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要统统洗掉。同时，吴法宪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要求他也这样做。

这期间，林彪为叶群写了六个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书赠叶群，七〇、七”。明明是在叶群情绪低落时写的，落款时间却提前了一个月？不知是一时笔误，还是有意为之。总之，林彪叫人把这六个字刻好送给叶群。

这事让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想起林彪卧室床头左侧墙上，曾挂过自书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8月30日这天，周恩来往返于毛泽东、林彪、康生处。

庐山的别名云雾山，在7、8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时，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难辨东西，能见度极低。周恩来每次会议后，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汇报。从周恩来住的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他乘车往返，中央警卫局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

第1144回：毛泽东，深夜召见叶剑英

再挥笔，写《我的一点意见》

8月30日夜23时已过，叶剑英刚入睡，秘书王守江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问：“王秘书，叶帅睡了没有？”

王守江如实相告：“叶帅刚刚睡下。”

周恩来在电话那头笑了，遂后问道：“吃安眠药了吗？”
“没有。”
“那好，你把他叫起来，在家等着，我派车去接他。毛主席要见他。”

王守江激动地说：“我马上叫醒叶帅。”

王秘书轻轻地走近叶帅身边，刚说了一句：“总理刚来电话”，叶帅马上坐了起来穿衣服，问：“有急事吗？”

“是，毛主席要见您。”

“好，好。”叶剑英连说了两个“好”字。

不一会，中央警卫局的人到了，他们是开着毛泽东的座车来的。此时，正是庐山云起时辰，满山漆黑如墨，浓雾弥漫，雪亮的车灯被云雾吞没的只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見了。路一边是陡峭山壁，另一边则是万丈悬崖。为了叶剑英的安全，两名警卫员打着手电筒，一边一个在汽车前面开道，大家几乎是一步一步“牵”着汽车走到毛泽东住地的。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他意味深长地对叶剑英说：“机会难得。”

毛泽东抬起头，看见叶剑英，站了起来，问：“近来身体可好，湘潭习惯不习惯？”

叶剑英笑着说，1969年11月，他和曾山、邓六金等一起从湘潭第二次去韶山的事情。

毛泽东开玩笑道：“你一再去韶山，不要把我搞成什么天才哦！”

“不。您是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叶剑英说。

毛泽东认真地说：“还是那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陈伯达说我是天才，其实发现天才的人，才是天才。我多次说过不设国家主席，别人偏偏要设国家主席，哪个想当就当，他们想当国家主席嘛，搞突然袭击。要和老帅们通通气。”

叶剑英频频点头。

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谈了很长时间。

8月3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组自己安排活动。

这天，周恩来先后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

这天，心情舒畅的康生叫来摄影师杜修贤，他要和妻子曹轶欧在庐山多照一些照片。杜修贤发现从不苟言笑的康生，眉眼间露出了罕见的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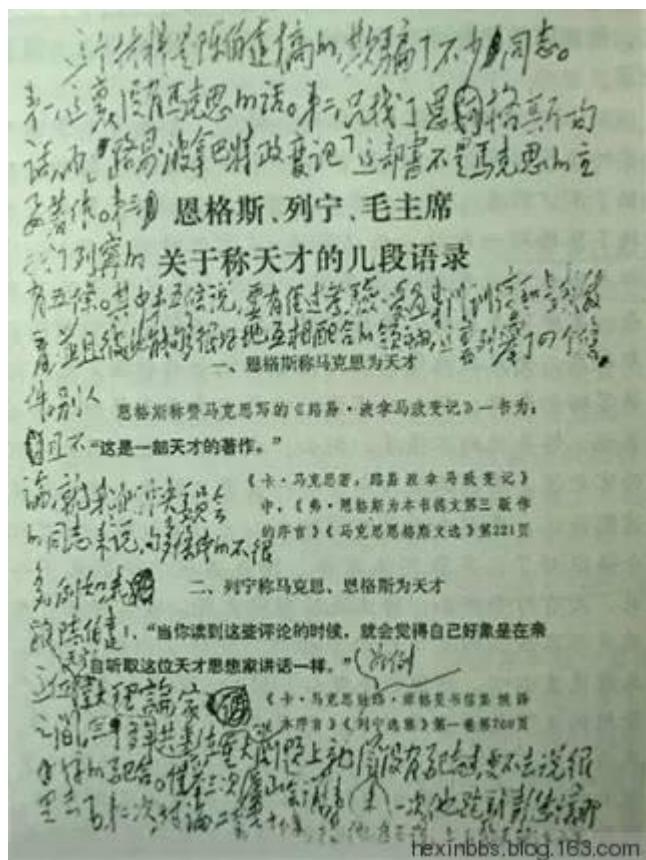
邱会作在吴法宪处碰见林立果，他说：“这场斗争有得有失，打了个平局，一比一。”

8月31日，毛泽东用铅笔在陈伯达编选的那份论述“天

才”的语录材料上，挥笔写下了如下 700 字：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

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谎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几乎没有什么修改，挥洒而就，一气呵成。第一页纸的天地边缘都写满了，再转到第二页，写在背后，文字

密密麻麻……写完以后，当晚 23 时，他约周恩来和康生过来说话，给他们看了他写的批语。

周恩来、康生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已是 9 月 1 日凌晨，他们二人先将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拿去给张春桥看，并同张春桥谈话。

上午 10 时，周恩来和康生又来到林彪的住处，将毛泽东的批语给林彪看，林彪表示同意。

康生对林彪说：陈伯达煽风点火，吴法宪说假话。

林彪说：“我观察了吴 20 年，没有发现吴讲假话。”

此时，黄永胜要过来见林彪，叶群赶紧安排秘书把黄永胜挡住，不让他与周恩来他们碰面。于是，林办的秘书将黄永胜的电话作了记录：

“黄电话，请注意：1、一组（毛泽东）昨夜谈话很高兴，说 101（林彪）好。有脾气也是好的。这次是为一组（毛泽东）好。2、严格要求部队干部。3、对‘十一’（江青）问题勿表态。防骄。读书。团结。勿偏耳”。

周恩来、康生走后，叶群将二人与林彪的谈话情况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讲了。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要顶住，不能承认是说了假话。不然林副主席的话就站不住脚了。”

中午，周恩来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即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又在他昨天写的那个批语的抄清件上加上一个标题：

《我的一点意见》，同时在文中陈伯达的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周恩来将《我的一点意见》逐字、逐句、逐个标点做了认真的校对，然后准备拿去付印。在付印前，毛泽东又删去了批语中的“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如获至宝”一句，并将林彪叫去，将修改件拿给他看。

《我的一点意见》排印出来后，周恩来即交毛泽东作最后审阅。

下午 15 时，周恩来将印好的《我的一点意见》交陈伯达阅，并同他谈话。

陈伯达看完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真是欲哭无泪，脑袋都要炸了。他知道自己完蛋了，但还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林彪身上，他毕竟还是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嘛。

此时，下午 15 时，林彪也在自己的住处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

林彪首先批评吴法宪，说他没有核实情况就上报，引起自己动了气，就在会上讲了话。他接着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行先找你们开个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

一会儿，陈伯达来了。

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还是陈伯达首先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

吴法宪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

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往来了。”

又没有人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林彪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这时，汪东兴开口，批判了陈伯达。他说：“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

随后，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批了陈伯达一顿。会议开了约两个小时后散会。

汪东兴回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问汪东兴：“会还开不开？”

汪东兴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17时，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陈伯达看到林彪和叶群见到他时，都把脸扭到了一边。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

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他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他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接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学习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

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战无不胜。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对那些没有参与争先恐后“表态”的人，姚文元说：“不表态本身也是一种态度。”

邱会作回应说：“表了态，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

会后，23时30分，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

接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连夜找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谈话。此时，周恩来已经连续30多小时没有休息了。怕出意外，心脏病专家胡旭东和护士带着氧气瓶守在周恩来办公室门外。

会前，黄永胜对李作鹏说：“你的发言不能作检讨。因为你同叶群是一个组。你作了检讨，叶群就要作检讨。而叶群作检讨，就势必影响林副主席。”

黄永胜秘书宋城召集吴法宪秘书张云龙、李作鹏秘书刘继祥、邱会作秘书刘作山开会，传达黄永胜的指示：“这次会上的问题，你们都听了录音。回去谁也不能说，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谁泄密，按党纪国法处理。”

黄永胜还让宋城查一下空军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谁到了庐山，准备找他们开会，讲一下吴法宪的问题，做做工作。后因吴法宪不同意未开。

《我的一点意见》印成铅印的会议文件，附陈伯达编的语录，分发到每个中央委员的手里。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里说的那个“上过庐山的那古人”，是指唐朝大诗人李白。文章中引了李白的气势奔放的《梁甫吟》中的一句“杞国无事忧天倾”，来劝喻各位中央委员不要学“杞人忧天”，因为庐山不会炸平，地球不会停转。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又一次使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原来的“群情愤慨”地揭发张春桥，变成了一个个的“自我检查”。对陈伯达的批评也转成批判。

9月2日上午8时35分，林彪要秘书对战备问题、经济问题“拉条子”，搞发言提纲。

这天，全会各小组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集中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判。

西南组上午开会，康生参加。

会上，曹轶欧发言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

这时有人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和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也都纷纷指责吴法宪。

散会后，吴法宪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

叶群对他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吴法宪打来电话，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把西南组的情况说了说，电话里静了一会儿后，周恩来说：“下午我来。”

西南组下午再开会，周恩来过来参加，康生去别的组了。西南组继续批判吴法宪，周恩来听了一会儿后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

这天

下午 16 时 30 分，开战备会，林彪主持。

晚上，开宪法起草委员会。

第1145回：各小组，开会批判陈伯达

见江青，再接受“战友”斗争

9月2日晚，周恩来飞回北京。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的领导开会，对他们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9月5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定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

9月3日，周恩来飞返庐山，先后参加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的讨论。

周恩来在发言中继续批判陈伯达，在提及《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3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华东组开讨论会，周恩来、江青都来了。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4军政委陈励耘作检讨。他还没讲完，张春桥就指着他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

江青插话说：“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

这时，程世清说：“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

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

程世清一讲，周恩来也说：“你们让陈励耘同志把话讲完。”

陈励耘见状，赶紧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深夜，周恩到毛泽东处开会。

局面明朗化以后，上海的中委们兴高采烈，只有候补中委王维国，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哭了两次。

在小组讨论时，王洪文追问王维国：“为什么事先不提反对意见，临时推翻上海小组的集体发言稿？”

王维国皱着眉头，噘着嘴巴，连声检讨有错误，说着说着，竟又哭了起来……事后才知道，不但吴法宪给他交了底，林立果还秘密约他出去，两个人坐在汽车里一边兜风一边密谈。林立果要他在华东组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的话，101可以当嘛！”

9月3日下午13时55分，林彪在床上叫秘书读了陈伯达9月2日凌晨写给毛泽东的信及陈伯达8月29日《我的检讨》。念完后，林彪询问了文件发的范围和去听录音的情况。他告诉秘书：“要帮助首长把关，发现有不适当的地方就同首长讲”。还说“陈伯达的检讨，强调要注意请示报

告”。

这天，林彪又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汪东兴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再通知汪东兴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泽东知道后对汪东兴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4日，毛泽东找林彪谈话。这一次谈话时间较长，主要内容是怎样批判陈伯达。毛泽东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下山前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

这天，北京毛家湾接到庐山“林办”秘书李春生打来的电话：“首长和主任让查一句话。有一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处在什么地方，请告诉杨老帮助查出个结果后，尽快打电话给我。”

毛家湾从8月23日晚上接到叶群让姜思毅连夜写发言稿的电话后，已经一连七、八天没接到庐山方面的电话了。以往，叶群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毛家湾打一两次长途电话。但在这七、八天中，叶群像是变成了哑巴，一个电话也没有了。在庐山的其他林办工作人员，也像断了线的风筝，和毛家湾断绝了联系。这可把整天习惯于忙忙碌碌应付叶群的郭连凯急坏了，他经常在办公室里念叨：“怎么搞的？庐山怎么一次电话也不来了呢？……出了什么事了吗？”

其他秘书也觉得情况有些反常。就在他们正在疑惑的时候，李春生的电话过来了。接电话的留守秘书张云生赶紧问

李春生：“最近一个礼拜以来，主任没往回挂过一次电话，这是怎么回事？”

“在电话里不好讲。”李春生回避了，他让张云生赶紧去找杨老。

杨老是中国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前担任过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授，此时正在毛家湾帮忙。

对这位年至花甲、学识渊博的老学者，林彪、叶群都很尊重。一天，林彪让秘书张云生传话给杨老：“让杨老来帮助我研究一下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是怎样论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大概是主张团结，反对斗争；法家大概是主张一切斗争，不要团结；道家大概是以为团结、斗争都无所谓，但他们是怎样具体论述的？叫杨老将有的放矢摘成卡片，而不要整理成文章。摘卡片，也主要是摘各家代表人物的原话，例如儒家的孔、孟，法家的韩非，道家的老子等等。……”

“限他多长时间内完成？”张云生问。

“不急，”林彪说，“当然也要抓紧一些。”

林彪布置秘书干什么事，都必须报叶群知道。叶群听了张云生的汇报后说，“我不管。他爱叫杨某某搞什么就搞什么，反正老杨头帮我干的事不能耽误。”

这时，杨老根据叶群的布置，正在准备给她讲中国古代史，还要帮叶群搞点诗词格律的研究。说是“讲”历史，实

际上大半天都是在写提纲；提纲必须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叶群，一份由讲者参用。而每隔两三天，叶群就要给杨老布置一项“新内容”。秘书担心，年已 60 岁的杨教授，一面要紧张地应付叶群，一面又要为林彪摘录儒、法、道三家的语录卡片，这受得了吗？

“不要紧，”杨老说，“别看我的年纪大，可是身上没什么病，精力也还行。更重要的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作，心情舒畅！”

他也真不愧是老当益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不但应付自如地完成了叶群的任务，而且星夜为林彪摘录了上千条儒、法、道三家代表人物的语录。

但自从林彪、叶群上了庐山后，没人再给杨老新的任务，正感到闲得发闷，张云生通知他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个典故，他竟毫不费力地回答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他同时也点了这句话的出处。张云生遂用电话告诉李春生。

9月4日，周恩来先后参加中南组和西南组小组讨论。
21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组长开会。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

此时的陈伯达已无法再作检查了，他对毛泽东和林彪说：“我现在的脑袋已经乱了，我要好好地休息休息，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谈了。”

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当时整个会议的气氛真是紧张极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睡不着觉，都在打听各种消息。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说，这种政治气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绝对不会理解的。

毛泽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会议决定，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

常委会结束后，林彪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在黄永胜处，叶群告诉他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主席还提出，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决定，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对中央警卫团副团长邬吉成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并不知道大会的情况，他奇怪的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

“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王良恩欲言又止，没有细说。

邬吉成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变了，以前如果警卫跟着保护他，他会发脾气，说自己“只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的。”而现在，陈伯达不发脾气了，更不会撵走他们，只是自己默默地走着，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警卫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孙凤山，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

9月5日凌晨，周恩来因劳累过度，心脏出现异常，开始吸氧。此后，办公时均有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上午，周恩来见到吴法宪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

因为自从“九大”吴法宪担任大会副秘书长以后，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他一直都参加。

吴法宪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

9月5日上午，陈伯达求见毛泽东。很快，毛泽东那边便回了电话，让他过去。

毛泽东一见陈伯达，握手后便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看我了。”

这句话，让陈伯达一阵辛酸……

解放初，陈伯达因协助毛泽东做一些文字事务，从党校搬到中南海住。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他干涉毛泽东的事。恰巧这时他后院“起火”，他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说她家的后院发现生人脚印，但她没有报告警卫局，家里谁都不告诉，而是让专案组成员、公安部的刘凯找公安部的摄影师来，到她家的前后院里拍照，这显然是违反中央警卫工作规定的。此事后来被江青知道了，大发脾气，让陈伯达一家搬到中南海外边的新建胡同去住，赶出了中南海。

陈伯达搬到北京新建胡同后，要见毛泽东自然就成了一件难事。

接下来，毛泽东说陈伯达：“这几年官做大了，不来了，也不写文章了。参加‘军事俱乐部’。”

陈伯达表示：“我愿意检讨。”

毛泽东说：“很好。可以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

所谓“那几个与你共事的人”，即“中央文革”的人。

当天，陈伯达到了江青处，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江青带陈伯达来到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已在那
里。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
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
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两天之后，继续开会。江青等人说陈伯达是叛徒，背叛
中央文革，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陈伯达的
战车上。

9月5日上午，开大组会。

下午，大组会传达毛泽东指示。

叶群为5日晚和6日林彪要主持政治局扩大会和闭幕会
问题向林彪作了报告，并对秘书说：“首长讲几句话，强调
团结，反对分裂。强调辩唯、历唯。学毛主席著作，‘一点
意见’。”“不要出影响团结的话，出形而上学的话。首长
地位不同，提口号要慎重。注意科学性和基本理论，科学、
严谨、热爱。”“严格要求高干和军队干部，要戒骄戒
躁。”“鼓掌通过拥护主席的‘一点意见’，点一下夫子问
题，揭了隐患”。“收文件事，由总理说。不宜早”。叶群
还专门交代秘书李春生：“搞一个详细点的稿子，准备明天
叫首长照念。不发挥”。“要帮助首长把关”。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毛泽东说：“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最后还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9月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各大组组长和副组长参加，林彪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他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

当晚，叶群提出林彪应该去看望江青。林彪给了叶群一个嘴巴。叶群哭着说：“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位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说明你诚心。”

当晚，林彪带着叶群亲自到江青处拜访，林彪说了几句寒暄话后，便一声不吭了。他亲自到江青这里来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无需用语言表达了。

林彪、叶群走后，江青立即向工作人员口述了一份给林彪的电话记录。

9月6日凌晨1时，江青打电话给林彪说：“一组（指毛泽东）特别高兴，问副统帅好，说培养不易，是亲密战友……夫子（陈伯达）同张、姚有矛盾，文人相轻，利用我们……

吴法宪没事，不调工作……”

第1146回：和为贵，庐山会议终结束

再拜访，叶群诸人心不服

9月6日上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11时，政治局扩大会，讨论全会公报。

下午16时，叶群交代秘书：“简报、文件通通交回”，“《我的一点意见》作抄存件，把字擦掉”。

17时，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这时，主席台上5位政治局常委还剩4位，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会场气氛紧张。前几次，会场内外回荡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此时已变得一片死寂，针落闻声。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气愤里带着悲楚，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

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泽东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

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

九届二中全会的讨论快结束时，毛泽东找来张春桥，特意叮嘱他：“要在浙江请许司令吃一次饭。”

张春桥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让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厨师还别出心裁地烹调了庐山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和石耳。石鸡是一种长在山间石罅洞穴里的蛙类，上海人把青蛙叫做田鸡，这里便把庐山上的蛙类叫做石鸡；石鱼是在山涧清溪里的鱼类，身体不大，肉质特别细嫩肥美；石耳是生长在庐山岩边缝里的一种菌类，很难采集到。“三石”俱全，这桌筵席就真正上了档次了。

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许世友欣然应邀赴宴。这桌筵席就两个人吃，没有陪客，两个人又都善饮，许世友喝茅台量大是有名的，张春桥呢，别看他文绉绉的，喝起茅台来却很凶，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对喝茅台，打了个平手，这

一次在庐山，许、张两人第一次开怀畅饮……

会议结束前，各大组分别搞了一次会餐。华东大组的会餐地点设在山坡上的一幢俱乐部里。南京军区和上海、江苏、浙扛、安徽、山东、福建的中委们济济一堂，许世友特意把张春桥也请来了，作为对张春桥设宴的回请。

张春桥和许世友坐在一桌。酒喝到一半，空5军政委陈励耘，手里举着一杯茅台酒，一摇一摆地从浙江省中委坐的那张桌子旁走到张春桥身边，脸上露着不自然的笑容，谦恭地说：“春桥同志，对不起，多多冒犯，请允许我敬你一杯！”

张春桥把眉毛一扬，嘴角略带微笑回答：“我不在乎。”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把各自杯中的酒喝干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留住叶剑英，要他散会后先不要回湖南，和他一起回北京。

9月6日晚20时，江青打电话到“林办”问：“林副主席累不累，我想去看他。”

林彪马上回电话说：“江青同志就不要来了，叶群马上去看你。”

江青请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说：“这次不回北京，直接去北戴河养养身体。”

随后，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让他叫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她一起去看望江青。

吴法宪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

叶群说：“首长都去了，去做做样子嘛。”

随后，叶群打电话到江青处：“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如果精神好，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就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

杨银禄说：“请叶主任等一等，我马上去报告江青同志。”

他放下电话赶快跑去报告江青。江青略加思索以后，高兴地说：“既然是林副主席派他们来，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杨银禄正要走，江青又说：“小杨，你是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的，你也知道他们在会上是犯了错误的，受了批评的，中央责令他们作了检查的。他们来了以后，你不要走，听听他们讲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以后你可以给我作证，否则，以后我一个人说不清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然啰，我也不怕，怕的话，我还见呢。”

杨银禄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叶群的电话，说：“江青同志说，请你们现在就来。”

叶群高兴地说：“谢谢江青同志，也谢谢杨秘书。”

20时左右，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来到江青的住地。

“哎呀！太劳驾了！”江青见他们进来，赶紧站起来，

迎上去，兴高采烈地同他们握手，并与叶群热烈拥抱，热情让座。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说：“林彪同志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他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咱们都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和接受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的长期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笑着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他同春桥、文元同志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及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诡计，上了他的当。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

要我约他们 4 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江青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这时，叶群转脸去对黄永胜等 4 人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

黄、吴、李、邱同声说：“是。”

江青对他们 4 人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主席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们接受教训，听主席的话就是了。”

吴法宪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

江青说：“你们今后要吸取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多多联系。”

黄永胜阻止吴法宪再说话。

叶群起身说：“谈的时间不短了，快 1 点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说：“林副主席和你们天亮就要下山，我也就不留了。”她对秘书杨银禄说：“小杨，你代我送送他们。”

回去的路上，黄、吴、李、邱一起大骂：“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

李作鹏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

从江青那里出来，叶群老大的不高兴，说：“我们诚心来认错，她倒摆起架子来了。”她狠狠地说：“姑奶奶这次倒了大霉，还有下次。看谁笑到最后，走着瞧！”

9月6日晚上，林立果开着一辆汽车，拉上王维国、陈励耘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他说：“这次事情坏在几个老总身上”，“主任根本没有理解首长的意图，开会也讲不清楚。首长很生气，主任只是哭。”

“本来首长只是说拉一个满蓬风就行了，这次打是打不倒的，结果搞得很被动。”

“丘八斗不过秀才。看来这个斗争还长，军队日子难过一些。”

以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讲庐山会议时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他还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

一天夜里，林立果从庐山给北京毛家湾打来电话。

“你值班吗？”林立果问。

“我值班。”毛家湾林办秘书张云生回答。

“值班室里还有谁？”

“就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下半夜，别人都休息了。”

“那好，请你打开电话保密机。”

张云生随即打开了电话保密机的开关，林立果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林立果在保密电话上讲话不再有所顾忌。“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了损失……”

“主任为什么煽风点火呀？”张云生问林立果，“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她曾给姜思毅来电话，让他给写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发言稿，还说要在小组会上放炮。是不是这个原因？”

“比这复杂得多，我也几句话讲不清楚。不管怎样，主任今后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主任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张云生又问，“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更加暴躁了吧？”

“还暴躁个屁！”林立果幸灾乐祸地说，“她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首长面前，她经常哭鼻子，他妈的，这怪谁？都怪她自己！”

“主任干这种事，首长事先知道吗？”

“首长不知道，但也不能说首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作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集中批陈，但陈的后台是主任。”

最后，林立果叮嘱张云生说：“我对你讲这些，是表示对你的信任。你可以把这些情况转告在北京的豆豆，但不要告诉郭连凯。郭连凯这小子只知道跟着主任跑，我对他没好感！”

第1147回：九江送，林彪没有再停留

下庐山，陈伯达形影孤单

庐山的雾气早已弥漫了山冈。

九届二中全会没有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作为东道主，江西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程世清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他心烦、焦急，莫名其妙地和老婆、秘书发了一通脾气。后来他打定主意，要促成毛泽东和林彪谈一谈，说不定能缓解一下气氛或情绪。

庐山会议最后一天晚上，9月6日深夜23时左右，程世清来到毛泽东住处，谈话中，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叶群常以为林立果找对象的名义，派人在各大军区乱窜，还特别向毛泽东讲到林立衡在1969年游井冈山时告诉他，林彪家里有三派：林立衡说自己属于中间派，林立果和叶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后，他说：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南昌市郊给主席盖了一所房子，不大，平房。江西军区也为林副主席盖了一所房子，是不是都在南昌休息休息再走。”

毛泽东说：“好。”又说：“林彪啊，还是要保的。”

程世清走出大门，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即去304号别墅。叶群正在手忙脚乱地指挥着工作人员整理东西。林彪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见程世清进来，点了点头。

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庐山问题

没有完，搞不好会涉及党内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经将主席和您住的地方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两天，和主席谈一谈？”

林彪点点头，说：“好吧。”

程世清又把这个情况连夜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好。”

翌日，9月7日一清早，程世清的秘书火急过来报告：“林副主席马上下山，要回北京。”

程世清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是昨天刚说好留在南昌和主席谈一谈吗？怎么突然变了？”他带着夫人刘秋萍赶紧前去，一见到林彪就问：“林副主席，什么事情急着回北京，昨晚不是讲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吗？”

叶群听到说话声，从隔壁的房间走进来，把门一摔，说：“林副主席要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昨晚我已经向江青同志汇报了，马上回北京。”

程世清哑口无言，只好再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奇怪的问：“变化这么快？”

这天早晨，林立果去看吴法宪，两人共进早餐。

上午8时30分，林彪乘车从304号驶出，人们夹道欢送，他从防弹车中探出头来，频频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浓眉肃目，脸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相送。

气氛是沉重的，最爱唠叨的叶群，也很少讲话。所有的话都在山上讲完了，而所有的事都还没有见到结果。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把林彪送上飞机。叶群还是老习惯，在这样的时刻，不能不有所表示，在她导演下，林彪和他们4人一起照了相。



庐山会议期间，和黄吴李邱在一起。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飞机就要起飞了。叶群把黄永胜他们4人送下飞机，一一握手道别。李作鹏紧紧握住叶群的手说：“你一定要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叫林总放心，我们一定照林总的指示办，任何时候保证叫林总放心。”

当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

在飞机上，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他们强调，这一切都是 8

月 13 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起来的问题。

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法宪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作鹏、邱会作也不抱怨。他们说，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警告安慰吴法宪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9月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黄永胜给郑维山打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离开庐山。

9月9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离开庐山。

下午，庐山秋雾蒙蒙，几片早衰的梧桐树叶，在已有凉意的山风中，不被人注意地飘荡下来了。秋天，总是能引起人们伤感的季节！这不是自作多情的悲悯，而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

14时，毛泽东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照完像后，下了庐山。

参与庐山会议的工作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和部分群众，聚集在牯岭隧道两侧，等待着伟大领袖的接见。在数千人的

“万岁”声中，毛泽东穿着银灰色的风衣，从牯岭饭店门前下车，缓缓走着，他不再有那雄健的步伐了，他每迈出一步，不知要用多大的力气，而他不时地还要向两侧的群众招手。他深深的感动了，从十几岁的伢子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见到他仍然热泪盈眶，忘情地狂欢着，激动地雀跃着，眼看两边解放军手拉成的防线，不断被突破。人越来越多，公路越挤越窄。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复杂，却又深情地看了他的人民一眼。他由汪东兴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搀扶着，在隧道口上了汽车。

梧桐叶无声地被萧瑟的秋风吹落，飘荡着。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达到了顶峰。

轿车拐过日照峰的隧道，越开越快，“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还从云雾里隐隐传来。

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庐山。他在南昌“828”一号楼仅住了一晚，服务人员看到，他的腿已很不方便，坐下后自己站不起来，需要两个人扶着才能站立。9月10日早上，毛泽东悄然离开了南昌。他的专列先到长沙，毛泽东与华国锋在车上谈了话。

离开庐山前，叶剑英将由他负责审查陈伯达历史一事告诉了聂荣臻，聂荣臻对叶剑英说：“陈伯达历史上肯定是个叛徒。十二中全会上，他责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被捕的历史，从他当时的口气和神态看，我明显感

到他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

1970年9月初的北京天气不好。陈伯达的秘书冒着瓢泼大雨去西郊机场接他。

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朱德、董必武他们先下了飞机，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飞机的人打招呼，人家都是爱理不理的样子。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他的两个秘书说：“这下完了！”

秘书们怕司机听到，缪秘书就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

陈伯达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

小缪又阻止说：“不要说了嘛，回家再说，回家再说吧！”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地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然后，让秘书看了他带回来的文件中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秘书们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

陈伯达说：“在毛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我找毛主席谈过一次，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我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

陈伯达又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主席说，对知识分子应该宽容一些嘛！我告诉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干校劳动。主席说：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讲到自己的烦恼事，说他的女儿身体不好。我说，那我去找她谈一谈。主席说，你就不用管了。”

陈伯达说：“所以，我觉得这次和主席谈话还好，我犯了错误下去就行了，可他们（指江青等）把你们寄去的语录给了主席，其实吴法宪他们早有了语录，这个语录他们实际上没有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后对我非常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我。”

陈伯达这时坐在沙发上，他微微摇着头叹息着，然后，他又极为懊悔地说：“我使主席太生气了，太生气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儿，他又似有信心地说：“嗯，主席还是很喜欢知识分子的，过一段时间，他会对我说些公道话的，会宽容些的。”

陈伯达说：“原来主席让我找他们谈，我去找了江青，她见我便说：‘啊！稀客！稀客！’我说和她谈谈，她不谈，说要谈就一块谈。于是江青把我带到康生那儿，我以为是和

康生谈，结果进门一看，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早就坐在那里了。江青说：‘你不是找我们谈吗？你说吧！’我还没说上几句，他们就骂上了，康生说：‘你自称是什么小小老百姓，其实你是大大的野心家！’江青说：‘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你是推脱责任！’他们都骂我，无中生有地骂，哎呀，什么都骂了呀！叫人难以启齿！……我真是无地自容呀！’

“我觉得总理还好，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他说主席说30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是说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配合。这是总理在人极为困难的时候说的公平话呀，我心里很感激他！反正这次我使主席太生气了。”

“在会上，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边，这是可以理解的。”

起初，中办还给陈伯达照送文件，后来文件也逐渐不送了，只给报纸、参考资料。陈伯达起初一味要下乡当农民，他问秘书们愿不愿意和他下乡当农民，他说在山上问过小缪，“小缪好，他愿意和我下农村。”他经常说这样的话，大家都听烦了，有人就对他说：“你将来怎么样，中央还没有说，这得由中央决定，不是你说下农村就下农村了，也许你想下去还不让你下去呢！”听了此话，他不说话了。其实，他是心情烦闷，不知所措，看书看不进，坐立不安。

陈伯达想给毛泽东打电话约个时间去谈谈自己心里的

想法，三次让秘书去联系，前两次被婉拒，第三次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说：“主席刚开完会，等什么时候主席有时间，我通知你就是了。”

陈伯达看到给毛泽东打电话约谈无望，毛泽东不会再见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康生打电话。秘书告诉康生，康生不接电话。陈伯达又给康生夫人曹轶欧打电话，曹轶欧也不接他的电话。

后来，陈伯达给周恩来打电话，是秘书接的。周恩来接了电话，他对陈伯达说：“你现在不要到处找人谈，你要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习学习，现在大家都需要学习。”

周恩来后来又让王良恩等人来陈伯达家里通知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不要到处去跑，北京的外国人多，叫他们看见了也不好。陈伯达当时对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还抱幻想。王良恩对他说：“你上不上天安门还没有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庐山会议结束了。毛泽东希望“九大”以后，全党能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正如毛泽东经常说的，往往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庐山会议后的惊心动魄又会如何？且看第五部《折戟沉沙》继续分解。

第四部下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 1107 回；第 1119 回；第 1121 回；第 1125 回；第 1131 回；第 1132 回；

第 1141 回；

五一六：

第 1103 回；第 1105 回；第 1108 回；第 1115 回；第 1119 回；
第 1120 回；第 1121 回；第 1122 回；第 1125 回；第 1126 回；
第 1127 回；第 1132 回；

外事口、陈毅：

第 1097 回；第 1098 回；第 1099 回；第 1103 回；第 1104 回；
第 1105 回；第 1106 回；第 1108 回；第 1110 回；第 1117 回；
第 1123 回；第 1124 回；第 1125 回；第 1137 回；第 1142 回；

中美关系：

第 1097 回；第 1098 回；第 1099 回；第 1104 回；第 1108 回；
第 1117 回；第 1123 回；第 1130 回；

中苏冲突：

第 1098 回；第 1099 回；第 1103 回；第 1104 回；第 1105 回；
第 1106 回；第 1107 回；第 1108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

刘少奇：

第 1109 回；第 1116 回；

邓小平:

第 1109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第 1112 回；

王、关、戚:

第 1108 回；

杨、余、傅:

第 1108 回；第 1116 回；

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

第 1099 回；第 1105 回；第 1106 回；第 1107 回；第 1108 回；

第 1109 回；第 1110 回；第 1111 回；第 1112 回；第 1118 回；

第 1119 回；第 1130 回；第 1131 回；第 1134 回；第 1136 回；

第 1141 回；第 1142 回；第 1143 回；第 1144 回；第 1145 回；

第 1146 回；

总政:

第 1105 回；第 1108 回；第 1119 回；第 1128 回；

空军:

第 1109 回；第 1134 回；第 1135 回；第 1140 回；

二月逆流:

第 1099 回；第 1104 回；第 1108 回；第 1110 回；第 1110 回；

“一打三反”:

第 1121 回；第 1122 回；第 1132 回；

北京大学:

第 1122 回；第 1140 回；第 1141 回

四届人大：

第 1123 回；

印度支那：

第 1124 回； 第 1128 回； 第 1129 回； 第 1130 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 1125 回；

上山下乡：

第 1132 回；

徐向前：

第 1109 回； 第 1116 回；

专案组：

第 1108 回； 第 1116 回；

红卫兵：

第 1112 回；

农口、谭震林：

第 1119 回；

教育革命：

第 1131 回；

整党建党：

第 1135 回；

国防科委、聂荣臻：

第 1109 回； 第 1110 回； 第 1128 回；

工交口:

第 1132 回;

上海:

第 1109 回; 第 1122 回; 第 1125 回; 第 1128 回; 第 1134 回;

第 1135 回; 第 1139 回; 第 1140 回; 第 1141 回;

天津:

第 1105 回;

华北地区:

第 1137 回; 第 1138 回; 第 1140 回;

河北:

第 1098 回 (保定); 第 1107 回;

内蒙:

第 1103 回; 第 1118 回; 第 1123 回; 第 1131 回;

山西:

第 1096 回; 第 1114 回;

西北地区:

第 1138 回; 第 1139 回; 第 1140 回;

陕西:

第 1121 回；

宁夏：

第 1132 回；

新疆：

第 1098 回；

西南地区：

第 1138 回； 第 1139 回； 第 1140 回；

四川：

第 1100 回； 第 1101 回； 第 1102 回； 第 1115 回； 第 1127 回（重庆）；

贵州：

第 1097 回； 第 1103 回； 第 1105 回； 第 1115 回；

云南：

第 1112 回；

西藏：

第 1103 回；

中南地区：

第 1137 回； 第 1140 回；

湖北：

第 1105 回； 第 1113 回； 第 1114 回； 第 1116 回； 第 1121 回；

第 1127 回；

湖南:

第 1114 回; 第 1122 回; 第 1128 回;

华东地区:

第 1138 回; 第 1140 回; 第 1141 回;

山东:

第 1103 回 (青岛); 第 1105 回; 第 1115 回 (青岛); 第 1141 回;

安徽:

第 1097 回; 第 1105 回;

江苏:

第 1098 回 (徐州); 第 1103 回 (徐州); 第 1109 回; 第 1122 回;

第 1126 回; 第 1127 回 (无锡); 第 1132 回; 第 1134 回; 第 1141 回;

浙江:

第 1135 回; 第 1136 回;

江西:

第 1105 回; 第 1110 回; 第 1111 回; 第 1112 回;